

——基辛格回忆录

动乱年代



动乱年代

—基辛格回忆录

第一册

〔美〕亨利·基辛格 著

张志明 邱应觉 过家鼎
张幼云 朱振国 戴树乔 译
沈寿源 黄钟青 尤 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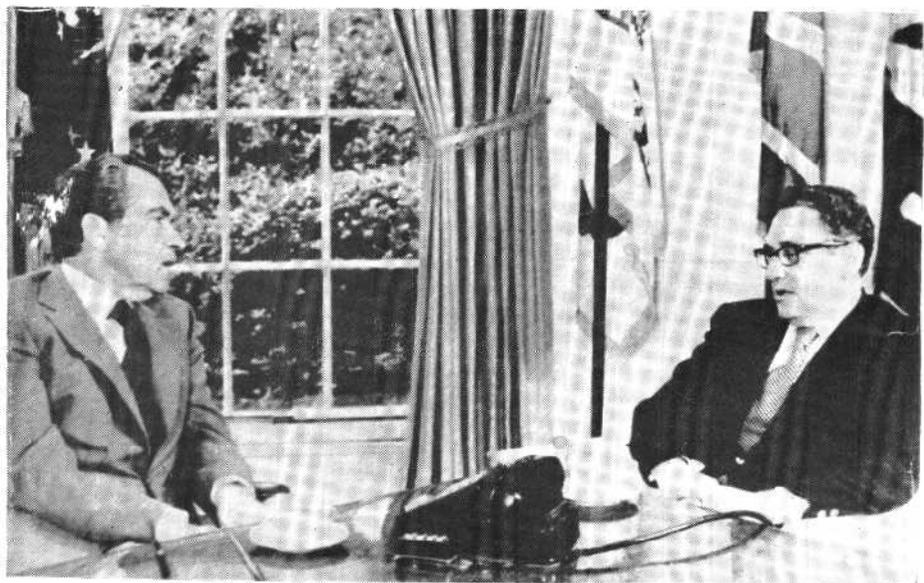
世界知识出版社



本书作者亨利·基辛格博士。



一九七三年九月基辛格宣誓就职后的第一天在国务院办公室里。



基辛格和尼克松在一起。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一线希望	5
第二章 河内之行	13
第三章 中国：又前进了一步	57
第四章 即将爆发的水门事件	92
第五章 欧洲年	165
第六章 动乱中的中东	245
第七章 缓和：从扎维多沃到圣克利门蒂	286
第八章 印度支那：一叶知秋	384
第九章 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倒台	479
第十章 担任国务卿	534

前 言

各种情况的奇特结合，使得我在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二届任期——本世纪内空前动乱的时期——内被委任处理我国外交政策的日常事务。一位刚刚赢得我国选举史上第二大胜利的总统，被他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而他的作为又无法平息的巨大变革赶下了台。在尼克松总统的权力土崩瓦解的过程中，中东爆发了战争，我们与盟友发生了争执，能源产生了危机，越南问题的解决有了头绪，国内对美苏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尼克松第二届任期伊始，我们曾想象即将跨进国际事务中一个创造性的新时代；外交政策中同时有如此多可有作为的情况，在以往即使有，也很罕见。但不到几个月的功夫，我们就面临国内权力崩溃的梦魇，以及为了防止外国敌手把此变成向我国的安全和各自由国家人民的安全进击的殊死斗争。

尼克松的第一届任期（一九六九—一九七三）——这是我前一卷回忆录《白宫岁月》所涉及的题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青春期。在印度支那的动乱中，尼克松政府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使超级大国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第二届任期内的外交——这在一九七四年夏末突然终止——已大致趋向成熟。尽管全世界没有让民主国家的领袖和保护人美国从其职责中得到喘息的时间，但是，已被削弱的政府权力却扩大了每一课题的困难。

水门事件对外交政策的几乎各个方面都有严重的影响。如果需要什么借鉴的话，它就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教训：对于制订和执行创造性外交政策来说，有一位强有力的总统是多么至关重要。然

而，在整个水门事件中，我们设法维护了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甚至还取得了某些重要成就。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期间和以后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促成了和平进程，这一进程有很大的进展，也有某些挫折，直至今日还在继续。我们还为控制能源危机奠定了基础。这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受考验的时期，但是政治家们没有权利要求只在寻常的时期供职。

在本卷所涉及的年代里，我自己的看法有了改变，而这不仅仅是由于我们国内的动乱。我在尼克松的第一届任期的四年半时间内担当了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后，于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成为国务卿。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可以舒舒服服地选择那些似乎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作为国务卿，我所负责的问题的范围就广泛得多了。最重要的是，要由我来尽可能地把外交政策同国内的灾难彻底分开。这一作用，是出于必须，出于表面上求生存的民族本能，在许多方面得到了两党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意见为美国政府的国际行为制造了几乎是另外一种受保护的政治进程）的支持。

在描述尼克松垮台阶段的外交政策时，回忆录作者的任务就比通常的更为复杂。有关动机和心情等等无形的东西比之前一阶段来说更加难以捉摸。我所写下来的东西势必反映了我自己的有利地位，叙述了我的看法和信念，而这些还得与其他人的想法和感觉、与我的研究人员和我无法利用的文件——其中有许多在外交档案中——届时能对明白显示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有什么帮助结合起来去评判。我打算留下本卷著作的一册注释本以及我的文稿，供那些有朝一日希望对这一阶段作更加详细探讨的学者之用。这部回忆录描述了制订决策的一位参与者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我已作了巨大的——而且我希望还是认真的——努力来用文件证明我的主张。

我很感激国务卿、中央情报局长、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负

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以及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检查和清理分类资料(包括引文)的工作中给予了合作。他们要求作的修改都作了。尼克松总统也亲切地同意从他的总统档案中引用某些材料。

我十分感谢自从在政府中共事时起就一直支持我的同事们，没有他们的技能和贡献，这部著作永远也不可能完成。彼德·W·罗德曼，我十多年来的朋友、知交和同事，作为编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的有见识的指点是非常宝贵的。威廉·G·海兰以其对西欧和苏联事务的研究和深刻见解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罗斯玛丽·尼赫尔·尼赫斯对于中东问题和能源危机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她在一大堆材料中进行去粗取精的工作，她技术熟练、肯动脑筋、孜孜不倦。玛丽·E·布劳内尔在深入研究智利问题、水门事件和华盛顿能源会议等一系列题目时充分展现了她的知识、判断力和耐心。

威廉·D·罗杰斯和温斯顿·洛德出于诚挚的友谊，阅读了全部底稿并对底稿提出了许多建议。哈罗德·埃文斯是位了不起的编辑。他以对文章结构的锐利眼光，对累赘的部分加以剔除和斧正。读过部分底稿并提出了有益建议的还有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伦纳德·加门特、戴维·金斯伯格、约翰·弗里曼、艾伦·格林斯潘、彼得·格伦维尔和黛安·索耶。

我的私人助理克里斯廷·维克是上述所有事务的总管和协调人。她的才能绝非只是能看懂我的手迹，她还负责底稿的打字。克里斯对本书写作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很关心，在有关的女工作人员中起了主导作用，使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她总是很乐观，一句话，她是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在需要打字的时候，黛安·廷克、莫伊拉·道森、卡西·布坎南、琳达·科莫尼克和克里斯蒂·贝斯特都给予有效的援助。

作者从出版商那里得到的最好帮助，莫过于利特尔和布朗。我感谢吉纳维夫·扬就编写工作所提出的有见解（和不懈）的忠告，感谢贝特西·皮撒的校订才华。迪克·桑德森绘制了极佳的地图，梅利莎·克莱门斯为本书作了非常出色的索引。

我的机密文件存放在国会图书馆。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感谢国会图书馆管理员丹尼尔·J·布尔斯廷和文稿处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的好意和协助，其中有：处长保罗·T·赫夫龙博士、职员约翰·诺尔顿、理查德·比克尔、约瑟夫·沙利文、格罗弗·巴茨、玛丽·玛格丽特·沃尔弗斯基尔和迈克尔·J·麦克尔德里。

我还需感谢（虽然迟了一点）哈里·朱布柯夫，他在空军部工作时所做的新闻剪报和分析多年来对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有着巨大的价值，在准备《白宫岁月》和本卷著作的过程中，对于我的工作研究给予了非常宝贵的帮助。

我把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南希，她赋予我的生命以新的意义。

正如我对本书所描述的行动负责一样，本书的内容由我一人负责。

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第一章

一线希望

游泳池里的决定

一九七三年八月，加利福尼亚天气晴朗。每天清晨，我丢下公文，坐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我办公室后面的平台上，遥望着朝阳冲开洋面上的薄雾。偶尔地，我看到一个瘦小的、肩头有点佝偻的身影踟蹰在峭壁的边缘。峭壁的那一边便是海滩和太平洋。在这宁静的环境中，理查德·尼克松正在忍受着他政治生涯中漫长的最后折磨。除了与世隔绝的圣克利门蒂之外，全国都在风传着他是否能继续担任总统的猜测。尼克松本人似乎沉着、镇静。他很少谈到水门事件——从来不明确谈论。只有非常了解尼克松的人才能从他神思恍惚和闷闷不乐的神态中看出他内心深处的剧烈不安。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两个孩子伊丽莎白和戴维是否想去尼克松官邸的游泳池游泳。他们确实要去。稍后，她又打来电话，邀请我一起去游泳。我拎起游泳衣箱，从我的办公室徒步穿过直升飞机起落场，来到尼克松家的住区“太平之家”，这是一幢宁谧恬静的西班牙式别墅，由嵯峨的柏树和一堵白色高墙同工作人员的院子隔开。迎接我的是尼克松的男仆马诺洛·桑切斯。古谚说，仆人眼里无英雄，可是他

对自己的主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一会儿，尼克松也来到游泳池同我和我的孩子们一起游泳。稍后，他提议到浅水区去谈一谈他定于第二天上午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我的主子在水边同我讨论重要事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九七〇年四月，他就是在戴维营的游泳池里一边游泳（我在池边漫步），一边把他下令美国军队进入柬埔寨庇护地的最后决定告诉了我。

我坐在游泳池的台阶上；美国总统仰面飘浮在水面上。我们平平淡淡地回顾了他就外交政策问题所作的某些答复。突然，他既不热情也不激动地说：“我将在记者招待会一开始宣布任命你为国务卿。”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谈起这件事。

当然，这并非我第一次听到此事。水门事件已使白宫助理们迄今为止的显要地位难以保住。我在政府其他人员中的影响取决于总统的权威，而总统的权威正随着各种庸俗行为（某些是无聊的，某些是非法的）被不断揭露而江河日下。五月份被召回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的亚历山大·黑格早在夏初就曾对我说过，除了任命我为国务卿之外，别无其他解决办法。当时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预定在夏末无论如何要离职。黑格经常向我通报他与尼克松就此问题的曲折磋商情况；这些磋商是不容易的。对于尼克松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因为这表明——也许比有关水门事件的任何大字标题都更加强烈地表明——他遭到了多么严重的创伤。他从来就不想有一位强有力的国务卿；他在一九六八年的竞选中就曾断言，外交政策将由白宫来处理。后来果真如此。假如他准备改变这一原则，这表明他已是多么软弱了。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希望我能不辜负他对我的信任。这是一种陈腐的老生常谈，旨在维护似乎他给了我极大恩惠的假象。其实，尼克松和我都知道，舍此别无其他选择。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了副国务卿肯尼思·拉什的电话。他向

我表示祝贺，并保证全力支持国务院。这是一种气度宽大的姿态，尤其是因为拉什无疑知道，若不是因为水门事件，接替比尔·罗杰斯之职务的应是他，而不是我。^①罗杰斯也打电话来表示祝贺；我们作了客气而简短的交谈。然后我就坐下来观看记者招待会的电视实况转播。

尼克松正要开口说话时，我的好友、聪慧漂亮的挪威女演员莉夫·乌尔曼从奥斯陆打来了电话，所谈之事我已忘却。我拿起话筒解释当时我不能与她讲话的原因。我说总统正在电视上发表一个重要公告。由于我不好意思告诉她是什么内容，我需要再补充解释一句。我刚刚挂上电话，尼克松宣布我任国务卿的简短讲话也结束了。在以热情和慷慨的言辞宣布罗杰斯辞职以后，尼克松提名我接替他的职务，并说，“我认为，基辛格博士担任这一职务的资格是诸位女士们和先生们以及在电视和电台上看着我们（原文如此）、听着我们的那些人们众所周知的。”他没有详谈我的资格是什么。就这样，在我挂电话的时候，我碰巧没有听到自己被提名为国务卿的讲话。

尼克松的记者招待会的其余时间都花在有关水门事件的讯问上。与此同时，恭贺的电话象潮水一般向我的办公室涌来。我接电话的感情是复杂的。本来可以叫人高兴的时刻却充满了深切的忧虑，因为人们从记者招待会上看出，本届政府遭到的围攻有何等严重。我们正在不遗余力地防止美国的外交政策随着尼克松总统的权力及其所有的行政权力的逐渐瓦解而分崩离析。我得到了一个我从来想象不到的职务；然而我却没有闲情逸致来庆祝这件事。我无法驱散萦绕在我心头的痛切之感；正当我飞黄腾达之时，就在几码之外，理查德·尼克松却如此孤单和备受折磨，在那冷若冰霜的外表下，还有一种恐惧之感。

丧失时机

一切都与我们在一九七三年早些时候的期望大不相同。这一年开始时充满了光辉的希望；一届总统任期开始就展现了如此灿烂的外交政策前景，这还是少见的。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年来的国内尖锐分裂看来将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而终止。前一年十一月尼克松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已给他提供了一次不寻常的机会来向所有善意的男男女女伸出手来，并医治国家的创伤。关于越南战争的辩论依然存在怀疑，但是其主要角色部分已被这场苦难的经历耗尽了精力，部分被一个新世界（此时关于十年的口号已失去其意义）弄糊涂了。我们希望，反战的批评家们迟早会在战争的结束中得到安慰，尽管他们还会继续对所使用的策略提出异议。而那些支持过我们的人则可以从民族牺牲维护了民族荣誉这一事实中感到自豪。尼克松本人可能会预感到一切成就都是短命的而忧心忡忡；他经得起终生灾难的折磨。实际上，他面临的反对并不重大；他毕竟赢得了美国除一个州之外的每一个州。有可能希望，过去十年的剧烈痛苦会给予各方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训，即：一个社会成为伟大的社会，不是靠各派互相制胜对方，而是靠调和。

也许我们想得太好了，但我们深信，美国面前有着展开创造性外交政策的难得机会。我们终于可以使团结一致的人民投身于因忙于印度支那事务而使我们未能从事的任务。领导人的一般命运是继承某种自有其规律、难以处置的问题或义务——越南战争就打击了尼克松的第一届任期。现在国际关系中的许多因素一下子似乎都同时有助于展开创造性的外交了：

①在同我们的盟友，同北大西洋联盟的各工业民主化国家和

日本的关系中，尼克松在其第一届任期内结束了与法国的野蛮争吵，维护了我国军队在欧洲的义务免遭来自国会的攻击，并且在美国向其共产主义对手作出新的首创精神所引起的表面上的“震惊”中维持了盟友间的联系。欧洲和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又引起了重申民主国家的共同前途和共同价值的新的首创精神。

⊙在尼克松的第一届任期内，我们同两个共产党巨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改善了关系。鉴于它们之间存在的互不信任和恐惧使它们在思想意识方面对我们的敌意难以具体化；任何一方对我们的挑战都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就会把我们推向他自己的死敌一边。美国摆脱了越南战争之后，能够抵制威胁国际秩序的侵略行径。尼克松有强大的支持作后盾，有可能进行基本范围内的谈判。

⊙在中东，埃及正开始摆脱苏联。美国坚持不渝的外交战略促进了这一事态的发展，这给和平外交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前景。

⊙有了解决越南战争的声望和改善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之后，尼克松政府便可以满怀信心地转向第三世界。我们确立了对待拉丁美洲的新态度，并打算把此当作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新格局的出发点。

至于我，一九七三年伊始，就因同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内的种种斗争没有什么瓜葛而感到特别超脱。官僚主义的压力和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构成了华盛顿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于我来说，它们已失去了许多意义，因为我已决定于当年年底辞职。

我感到可以自在地这样做了，因为我看到了外交政策的新阶段，不再被蒙上一场分裂斗争的阴影，同时还相信，尼克松总统第一届任期的那种拜占庭式的行政程序非结束不可。权力不应再集中于撇开政府其他成员秘密办事的总统助理手中。我的朋友、可敬和聪慧的戴维·布鲁斯争辩说，如果我当真要使我们的成

就永不磨灭的话，我应当准备把发扬成就的任务托给别人。如果我们做得一丝不苟的话，国家的外交政策就得制度化。如果要留传一点东西而不是仅仅露一手绝招，我们就得委于国务院和外事部门的常务官员以更大的职责。布鲁斯不太客气地提出，只要我从我的白宫办公室里决定一切，那么这一点就做不到。

我勉强地同意了他的意见。当然，还有不那么高尚的理由可以从原则上加强这个论点。一九七一年我秘密的中国之行破坏了我先前不抛头露面的状况，使批评尼克松的人有可能以赞扬我的成就来贬低尼克松的成就。我虽然没有有意识地去鼓励这个过程，但是我也没有加以抵制。从此以后，白宫不失时机地降低我的威望：在印一巴危机中、在导致一九七二年莫斯科首脑会议的准备工作中、以及在越南和平谈判的最后阶段^②都是如此。

尼克松并没有错；我的名气大得已经超出了国家安全顾问的职务。复杂的总统决策体系绕开正规的官僚机构，假如这样一种体系无论如何可以再维持四年的话（对此我表示怀疑），总统与助理之间的无形关系已经磨损得使我不可能再在这个体系的中枢发挥多长时间的作用了。

此外，国家安全小组已经重新组合，在新成员试图建立他们各自的地位时，我可没有心思再投入一轮争权夺利的斗争了。不倒翁国防部长梅尔文·R·莱尔德已表示希望早在一九七二年的选举之前就离职。在新的一年里，他由善于思考问题的埃利奥特·理查森取代。在理查森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担任副国务卿时，我同他合作得很好。尼克松在选举中获胜以后，便任命理查德·赫尔姆斯为驻伊朗大使，实现了要撤销他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的长期打算。赫尔姆斯的接班人是詹姆斯·R·施莱辛格。施莱辛格在预算局的管理才能以及他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时处理一起核试验争执的勇气引起了尼克松的注意。在这次全面清洗

中，罗杰斯国务卿得以幸免。那仅仅是由于他已要求选择另一个时机离开国务院，以此表明，他的离开是他自己的抉择，而非大批改组的一部分。他的要求得到了允许，但尼克松打算在那年夏天用新副国务卿肯尼思·拉什来代替他。

几年之前，在某次官场斗争的高潮中或其他场合，我曾对当时的总统讲话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说过，我的胜利必然是暂时的、脆弱的。若要继续发挥我的影响的话，我就得在官场的每一场斗争中取胜；而要摧毁我的权威的话，某个内阁成员只需有一次成功就够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风险是不可能逾越的。^⑤事实上，在整整一届总统的任期内，我都回避了这种风险，但是，把命运同一批能干的、心理上无经验的新人拴在一起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打算在一九七三年再任职一段时间，直至看到印度支那实现和平，对工业民主国家提出新的倡议（后来这一年被称之为“欧洲年”），以及巩固新的莫斯科—华盛顿—北京三角关系。我已同几位密友初步谈了离职后的事业：也许在牛津万灵学院当一名会员。南希·马吉尼斯刚刚同意做我的妻子，尽管我们的计划后来被不久就降临于我们头上的危机而一再耽误了。

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实际上是否能实现我的意图，或者一心忙于处理事务而推迟我的辞职。我也不能证实我们对于充满希望的未来的远见是否能实现。对于“也许可能的事”乱加猜测是徒劳的。我们的一切打算不久就被水门事件的灭顶之灾淹没了。

但是，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就在尼克松宣誓就任第二届总统四天以后，我仍是带着这种高兴和宽慰的心情穿过了白宫与旧行政办公大楼之间的狭窄街道，就新签署的越南协议向记者吹风。在逐段讲解了协议之后，我以呼吁全国和好的强烈心情结束我的讲话。

总统昨天说，我们得保持警惕，我们一定会保持警惕的，但是我们还要作出积极的努力。就我们国内的情况来看，现在应当清楚了，没有任何人在这场国内战争中独自感到极度的痛苦，也没有任何人在这些辩论中垄断道义上的远见。现在我们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美国没有在协议中为其盟友规定政治前途，这项协议应能维护各方的尊严和自尊心。我们一起医治了印度支那的创伤，我们可以开始医治美国国内的创伤了。

一位西班牙诗人曾经写道：“旅客，道路是没有的，路是走出来的。”在那转瞬即逝的、单纯无知的时刻——这与尼克松政府的特性是极不相称的——我们满怀信心，在尼克松的第二届任期内，遨游我们的希望之路，我们将走出一条通向更加美好未来的路。

① 见H·R·霍尔德曼和约瑟夫·戴蒙纳著：《权力的终结》（纽约：纽约时报丛书，一九七八年版），第一七五——一八〇页。同时见本书第十章。

② 见《白宫岁月》（英文版——下同）第九一七——九一八页、一一八五——一一八六页、一四五五——一四六五页。威廉·萨菲尔在《垮台之前：水门事件前的白宫内幕》一书中微妙地描写了白宫处理其“基辛格问题”的方式（纽约花园城：道布尔戴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三部第五章。

③ 萨菲尔著：《垮台之前》，第一七〇页。

第二章

河内之行

一九七三年，我们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巩固一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字的越南和平协定。为此，我对河内进行了第一次访问，这是我的生涯中最不寻常的一次旅行。河内在印度支那发动战争，从而在美国造成了动乱，是我们凶恶敌人的国都。我到那边去是为了同北越领导人讨论严格遵守我同黎德寿所谈妥的巴黎协定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讨论我们两国之间建立较积极关系的可能性。

巴黎协定

经过十年的激烈战争和拖了四年之久的谈判，终于签订了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北越接受了西贡政府的继续存在，而这是它过去一直顽固拒绝的。协定规定：越南全境立即就地停火；剩下的约二万七千美军全部撤走；释放印度支那全境内的战争俘虏。禁止河内向南越渗透部队和运送战争物资。由国际监察机构监督停火，监督通过指定的口岸运入供替换的军事装备。协定中有一个条款重新规定北纬十七度线为南、北越之间的临时军事分界线，禁止一切军事人员越过这条线，民间交通必须经过南、北越双方协议。河内还同意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其军队，同意不利用这两国的领土对南越采取军事行动。南越的政治解决留待越

南双方以后去谈判。

美国作了坚决的努力，不但要结束在越南的战争，而且也要结束在老挝和柬埔寨的战争。但北越一直拒绝后一点，宣称那是应该由老挝和柬埔寨人民自己决定的事。北越居然关心起邻国的主权来了。假如它是一贯如此而非仅此一次，那倒要令人感动。可惜这只适用于河内军队撤出的问题，而不适用于他们的进入问题。二十年来，数以万计的北越军队一直破坏老挝和柬埔寨两国的和平与主权，至今还赖在那里。

黎德寿终于同意安排在老挝的停火。经过与老挝的共军（即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河内的巴特寮）“磋商”之后，黎德寿于一九七二年十月表示河内同意在越南实现停火，三十天内达成老挝境内的停火。一月初的时候，黎德寿把这个期限缩短为十五天。

关于柬埔寨问题，他断然拒绝作明确表态，声称河内对柬埔寨共产党盟友（红色高棉）的影响较小——后来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从一九七二年九月到一九七三年一月，黎德寿在会谈中一再向我保证，越南战争解决后，柬埔寨境内的战争也就“没有理由”继续下去了。^①可是河内不愿正式承担义务，只肯私下达成谅解，越南战争解决后它将为恢复柬埔寨的和平“作出积极贡献”。由于我们争了几个月还没有结果，于是尼克松无可奈何地得出结论，我们要想多得一些东西，只能把越南战争继续打下去。越南停战协定本来是可以接受的，要是我们因为柬埔寨问题而拖下去，国内显然是不会支持这样做的。几年来国会一直试图把我们在柬埔寨的卷入和援助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我们不把越南停战协定签下来，国会肯定要全部切断在柬埔寨以及越南的作战经费。另一方面，根据我国驻金边大使馆以及我们的军事专家们的意见，假如没有北越人助战，柬埔寨共产党人是不能取胜的，而巴黎协定明文禁止北越人助战。

我们采取了另外两个步骤来保护我们的立场。第一，我们说服柬埔寨总统朗诺再一次（三年来至少已有五次）呼吁在柬埔寨实现停火，并宣布单方面停止进攻性的军事行动。第二，在草签巴黎协定之前，我向黎德寿递交了一项声明，内称：

假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之前在那里进行了危及现存局面的进攻性军事行动，那是违反协定第二十条（乙）款的精神和违反协定赖以为基础的设想的。

用明确的话来说，如果红色高棉拒绝朗诺所宣布的停火，美国就要继续给柬埔寨政府以军事支援。黎德寿表示他理解这一点。

巴黎协定尽管包含一些模棱两可之处，但毕竟还是反映了一九七二年几次大战役以来在越南的力量对比状况。任何和平解决都取决于力量对比状况的保持，越南的情况也不例外。河内的长远目标是统治整个印度支那，对此我们不抱丝毫幻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之交，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我曾一再提醒过尼克松这一点。^② 不过我也明白，我国人民不会容忍把战争再延长一段时间以争取军事上出现转机。一九七二年八月间，南越总统阮文绍曾对我说，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他估计到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时北越将比一九七二年三月时削弱，那时我们的情况就会大为改善。可是我们的政治专家们全都认为，新选出的国会将从一九七三年一月起切断战争经费，首当其冲的将是政府所提出的对付河内一九七二年春季攻势所需军费的追加拨款要求。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目的不光是在“争取一段体面的时间”的巧言掩饰下在最后崩溃之前抽出身来。我们所希望的是达成体面的解决。我方所有谈判人员都痛苦地认识到这项协定所包含的风险。但我们所争取到的条款毕竟还是比大多数人认为能够得到的好得多。到了一九七二年，批评我们的人断言河内的条件是非要推翻我们的盟友西贡阮文绍政府不可。而我们却成功地顶住了。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南越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我们认为，对河内采取奖

赏和惩罚两手正确结合的办法，可使我们有一个合理的机会来保持印度支那的不稳定的平衡。通过一项协定来获得这种机会，当然要比通过继续一场看不到结局的战争好一些，何况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国会又几乎肯定要切断战争的经费呢。

把奖赏和惩罚两手正确地结合起来的想法是否现实，这个问题我留待第八章里谈。当时我们认为是现实的，并且有理由那样认为。这里只须指出我们的意图在于使巴黎协定行得通。当我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七日离开华盛顿动身去亚洲时就是抱着这种态度。那次亚洲之行历时十一天，我访问了直到前不久还是我们的敌国北越的首都，以及我们两个老朋友泰国和老挝的首都，还去了我们的一个新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我准备河内之行时，完全没有象那次秘密访问中国时所怀有的、由于耐心的准备而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喜悦之情，也没有我第一次莫斯科之行那种超级大国外交折冲所固有的演戏似的劲头，更缺乏我多次出访欧洲各国首都前常有的马到成功的乐观心情，或者与东京打交道时那种超越烦琐礼节的志同道合之感。在四年时间里我阅读了一切有关北越人的材料。北越人既孤芳自赏又凶狠好斗，既勇敢又傲慢。到底是一些什么气质驱使这个民族去统治相邻的、天赋与自己差不多的其他民族呢？是什么使得罗马称霸城邦世界，普鲁士在德意志崛起，英国雄视欧洲呢？毫无疑问这里涉及到许多物质的因素。但是物质因素还必需由无形的信念和献身精神来推动。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这两者在河内那里都大量存在。

越南人经历过中国几百年统治而未丧失自己的文化特性，这真是不简单。他们经得住法国的占领，在这期间不断增强这样的信念，即他们负有继承法兰西在印度支那所建立的帝国的使命。他们缺乏邻国老挝人的仁善之心，也不象柬埔寨人那样谦和。他们

不靠博得人家的好感、而靠专心致志来达到统治他人的目的。他们死死盯住自己的目标，完全不顾形势的优劣，也不按照常规权衡一下力量对比看是否有成功的可能。反正准备为国捐躯的越南人总比外国人多，所以越南人的民族主义要使入侵者和邻国人都触霉头。

除了狂热以外，更厉害的是越南人还有一股目空一切的自信劲儿和蔑视外国的一切的情绪。他们就是抱着这种冷眼看世界的优越感玩弄别国人，就连支持他们的外国人也不放过。十多年来他们硬是想使自己的首都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我们认为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硬说这就是真理。凡是对河内有利的，他们就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性。河内就象手持手术刀的外科医生那样，一刀一刀地剝割美国的心窝，扎刺我们的要害之处、我们民族的负罪心理、我们追求最后答案的心情、我们的理想主义，甚至连它的同情者的价值标准也不放过。对于同情者，它也如同对敌人一样冷酷地加以欺骗。我们倒霉就倒霉在落到了心理如此乖张的领导人的手心里。

我们在印度支那快要熬到头了，可是河内的邻国却没有这个福分。与河内毗邻的地理位置注定那些国家要永远遭殃。我们为战争的结束而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它们却忧心忡忡，生怕我们在和平与撤退之间画一个等号，它们的自由也就完蛋了。我们越飞越靠近那个伪装受害者却大肆侵略别人的无情寡义国家的边界的时候，在华盛顿时的那种欣慰心情逐渐被那些仰赖我们支持的人们的忧愁所驱散。

访问曼谷

从地中海沿着印度洋北岸划一条弧线，就把中东、印度次大陆

和整个东南亚都划到里面。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在这广大地区里只有泰国幸免沦为殖民地。它的诀窍是小心翼翼地、不动声色地在互相争夺的列强之间纵横捭阖。不错，它处于英法两国殖民势力范围交接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欧洲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国。然而这样的位置往往导致瓜分而不是独立。

无论如何，机会从来不会自动地转化为现实。泰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独立，一靠它的领导人善于利用本国的地理位置在列强争夺的夹缝中保全一定的独立，二靠它的文化同一性使它相对地不易被邻国所颠覆。但更主要的是靠它的兼有竹子的柔性和韧性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日本大举南进囊括了东南亚的时候，泰国支持了日本；而当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时它又转到盟国这边来。它倒来倒去，做得很识时务，很通情达理，令人觉得这不是反复无常，而是有民族自信心的人们顺应自然的决定。泰国人材辈出，好象是需要执行什么政策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样的领导人应运而生的。而条件一发生变化，它就撤换领导人，但从来不使他身败名裂。每次都有合适的人物出来收拾残局，这些人物都决心维护泰国的独立。我的朋友新加坡杰出的总理李光耀常说，当与我们有交情的泰国领导人被撤换时，我们就要密切注意，很可能政策要大变，尽管从正式声明里看不出来。

虽然泰国同远方的帝国打交道时可以应付裕如，但它却自知难以对付近邻的侵略者。泰国坚定不移地认为必须阻止河内征服整个印度支那，因为这对泰国的生存是一种致命的威胁。一些身居远邦异国的糊涂虫把河内统治者当成受外国侵略的无辜受害者，以为越南战争结束后他们就会与邻国和平相处。泰国领导人却不作这种迷梦，他们的国家从不靠幻想而生存。在他们看来，河内在南越取得胜利后，自然而然地就会导致柬埔寨和老挝沦于共产党

统治。这将使泰国大受压力，特别是对其东北省份，因为这个地区只是在过去一百年内才为泰国占有，而在文化上却接近于老挝。泰国单独一家无力对付力量强大、纪律统一、意志坚决的越南。所以尽管它向来不肯轻易冒风险，却在一九六二年让肯尼迪总统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泰国以抗衡北越对老挝的压力。泰军还与美军在越南并肩作战。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泰国为越南战争提供空军基地。泰国和老挝以湄公河为界，每当北越和巴特寮军进逼湄公河岸时，泰国就派志愿人员（有时甚至出动正规军）支援老挝中立政府。

曼谷领导人显然是运用泰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的策略，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绝不甘愿打输一场战争。但他们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明明是大敌当前，而我们国内的歧见却闹得不可开交。起初他们还以为是一些不成熟的外国人莫名其妙地闹别扭而不予以重视。不料《五角大楼文件》把泰国一步一步地参加印度支那战争的内情全都抖搂了出来，处事惟谨的曼谷领导人着了慌，下面乱成一团。

泰国领导人当然不会对巴黎协定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想不通为什么堂堂一个超级大国要去迁就一个地区小恶霸。只要有可能保证南越继续保持中立，保证泰国的紧邻老挝和柬埔寨实现中立，泰国领导人也就赞成。但他们同北越打交道有极丰富的经验，不相信那里人的心地完美无缺，因此他们并没有把河内暂时的软弱（人们很希望这种情况能长期保持）误认为它已弃恶从善。他们认定河内迟早必将再度走上霸权主义道路，因此力图把这股祸水从泰王国的边境上引开。于是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美国，看我们是否愿意协助保持印度支那境内的力量平衡，而当年正是由于这种平衡遭到破坏才导致我们介入的。

我到曼谷时感到有种种预兆，对此我并不觉得奇怪。当时的泰国总理是他依·吉滴卡宗元帅，他是泰国典型的精明政治家。他藏

而不露，常装出沉思的样子，以便争取时间考虑问题。美国人爱急躁，有时逼他表态，他就用这个办法应付。他依的政策建立在泰国对美国的依赖之上，所以当美国国会一九七三年六月通过禁止美国继续在印度支那地面或空中采取军事行动的法案之后，他就下台了。泰国经常采取这种近于幕后的行动来表示它将顺应新的形势。

我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九日见到他依时，他并没有表现出对这样的结局有所预感。他依旧坚持十几年来所奉行的战略，主要想得到对以下两个问题的答案：如果北越违反协定，美国怎么办？美国打算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泰国留驻多少军力以协助保持这个地区的力量平衡？我回答说，我们对河内的野心有最清醒的估计，如果它大规模破坏协定，我们是不会置之不理的。不过我希望我这次河内之行将鼓励它走向和平建设的道路。

至于将来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问题，其实我本人也说不准，因为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国内政治。因此我只好打马虎眼。我说，越南实现停火后，鉴于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总要撤回一部分军队嘛。不过还得留下相当多的兵力，否则就无异于招引越南来进攻。话说得这样含糊其词，我自己也是不得已的，因为论理这些问题也叫人为难，只有将来的实践才能回答。后来事实证明泰国人的担心比我所作的保证更有根据，这使东南亚各国人民大为恐惧。

柬埔寨的困境

越南问题的解决方式无疑使柬埔寨变成了一个孤儿。关于它的条款最欠约束力，而它国内的共产党分子又最凶狠。非共产党的柬埔寨人尽管以善于逆来顺受著称，对共产党作战却比其他印度支那人英勇得多，而所获得的外援又最少。

一九七三年时我仍然抱着希望，我们能够不抛弃那些依赖我们的人的条件下结束战争。我决心要再作一次努力来谈判柬埔寨境内的停火问题。为了为赴河内和北京进行会谈作准备，我在曼谷会见了我们驻柬埔寨的大使埃默里·斯旺克。我的行程没有包括金边，因为斯皮罗·阿格纽即将去那里而且还要访问西贡。他以副总统之尊去访问南越政府，这是对阮文绍总统面子的一种小小的照顾，为的是争取他签署巴黎协定。阮文绍恨死了我，我即使跑到西贡也不会有任何成果。另外，我又不能去两个印度支那国家的首都访问而偏偏不去西贡。所以我只好不去金边，而在曼谷讨论柬埔寨的未来问题。这种做法竟是日后事态发展的预兆。

斯旺克大使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绝对不是一个鹰派。他真心实意和不折不扣地遵守国会规定的限制。眼见一个勇敢的民族慢慢地被扼杀，我不免感到痛心，而他却没有这种感情。在严肃认真的个人当中，象我们两人之间有点不同意见，这也是正常的。不过我还是钦佩他精通业务，为人诚实能干。虽然斯旺克不相信军事解决的办法行得通，却也不对我们敌人的居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确信红色高棉决心夺取全面胜利而不顾什么巴黎协定或朗诺单方面宣布的停火。而且他们得到河内的支援。他告诉我们有四万二千北越军队还留在柬埔寨，现在这已分明违反巴黎协定第二十条。^⑤其中大部分（三万五千人）用来维持河内通向南越的补给系统，这也违反协定中关于不得在印度支那各国保留基地和进行渗透的条款。其余七千名作战部队，半数用于支援红色高棉。^④与之对比，美国在柬埔寨的人员军职、文职的都算在内不到二百名，他们的行动全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这个问题留待第八章讨论）。北越军完全没有要撤退的迹象；也许这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这种状态保持下去，那就构成河内最严重地背弃其义务。

关于当时流亡在北京的柬埔寨前中立领袖诺罗敦·西哈努克

亲王，斯旺克的评价是此人已无足轻重了；在金边已没有人追随他；共产党方面和政府领导人方面都不信任他。斯旺克表示希望能授权他对朗诺说，在我近期访问北京时，无论我本人或我的任何助手都不同西哈努克打交道。

以后就可以看出，斯旺克在西哈努克问题上采取了比我稍微强硬的路线。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斯旺克在金边有其需要，另一方面柬埔寨这两派亦势不两立。斯旺克告诉我说，朗诺准备同任何人谈判，包括河内、红色高棉及北京，但就是不同西哈努克谈。西哈努克对朗诺的态度也是如此。这两个人只要能够揪住自己的死对头都情愿同归于尽。

柬埔寨西北部宏伟的吴哥窟遗址长期以来对历史学者是一个谜。创造这些珍品的灿烂文明哪里去了？曾经使周围许多国家瞠乎其后的文明为什么竟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今还没有人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想难道是柬埔寨人偶尔会自杀病大发作？西哈努克和朗诺不就是那样吗？他们两人曾经毕生共事无隙，现在却为区区一点分歧而反目，互不妥协，非要拚个你死我活不可。他们宁可把国家拱手让给两人都畏惧和蔑视的柬埔寨的宿敌或者本国的一伙狂徒。朗诺政府其实是没有西哈努克的西哈努克政府。西哈努克被废黜前，朗诺是他的首相和国防大臣。朗诺曾受贿让北越建立供应线进入庇护区。西哈努克曾经邀请我们轰炸那些庇护区，并曾缺席判处红色高棉领导人死刑。可是到了一九七三年，这两个王公贵族都想与仇恨他们的红色高棉以及企图统治他们的北越人拉关系。这样不计后果、不讲理智的个人怨恨真是少见。这两个领袖人物只要肯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旧嫌，他们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扮演崇高的角色，把人民从浩劫中解救出来。但他们不这样做，于是就把他们自己以及柬埔寨推向深渊。

正是这种盲目的仇怨在一九七三年我们同西哈努克打交道时

成为主要障碍。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我曾经对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说，我们准备同中国方面合作，以让西哈努克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方式来结束柬埔寨境内的战争。^⑤ 不过我坚持说，为了让西哈努克能在柬埔寨国内争夺政权的各派之间重新发挥他向来所起的平衡作用，就必须有可供平衡的几派存在才行。但只要西哈努克还担任红色高棉这一派名义上的领导人，而这一派又下死决心要夺取全面胜利，于是在战争继续下去的情况下西哈努克根本不能有所作为，而在红色高棉胜利的情况下他就必须完全听命于人家。虽然我们并不坚持非要朗诺留任不可，可是让朗诺所代表的非共产党力量以某种形式保存下来，毕竟对西哈努克自己有利。否则西哈努克就会变成可有可无的傀儡，只能起到使共产党控制的柬埔寨合法化的作用，事后一定会被抛弃。（后来他果然落得这样的下场。）

斯旺克和我对是否应该用军事行动来导致停火的问题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两人都认为停火是必要的。斯旺克觉得如果把美国的军事压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就比较有可能达成停火。我是愿意试验一下这种假设的。但如果这个办法不奏效，那么我就认为军事压力还是有必要。经验告诉我，同印度支那的共产党人谈判，只有使他们吃到苦头才能打破僵局。那时这还只是一种理论。朗诺单方面停火的声明刚刚摆到桌面上。红色高棉拒绝了，但斯旺克和我仍抱着希望，也许他们还没有完全亮出他们的牌。我们当时偏于乐观，以为通过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能性尚未枯竭。

斯旺克也象朗诺一样比较倾向于同河内谈判。我对此有所怀疑；我觉得北京是比较好的中间人。朗诺的选择在短期内可能比较便当，但从战略上看好处就较小了。河内想把柬埔寨变成它的卫星国。它的目的在于控制柬埔寨，重新打开通到南方的补给线，并且造成它最后统治印度支那已不可避免的印象，借以破坏南越

的士气。中国则更关心柬埔寨的独立。北京不愿看到金边沦为河内的卫星国。它宁愿东南亚各国保持独立，不愿看到北越在这个地区居于支配地位，因为北越在历史上敌视中国，现在又投靠莫斯科。中国这方面的考虑正好与我们一致，对于南越的生存也极关重要。我于是考虑通过北京进行谈判（这意味着必须让驻在那里的西哈努克扮演一个角色）。但那时还没有必要马上作出决定。我即将赴河内和北京，到时便可以看出一个究竟来。

访问万象

多年来我一直阅读发自万象的战报。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我把事件的规模和出事地点的关系想象了一番：电头“万象”使人联想到一个处于敌军围困中的大都会。其实万象是一个安静而炎热、尘土飞扬的小城镇。居民秉性温良，举止和蔼。万象的生活步调平缓，风俗纯和。老挝只希望别人不要去干涉它的事务，而这恰恰是它那冷酷的北越邻国不肯答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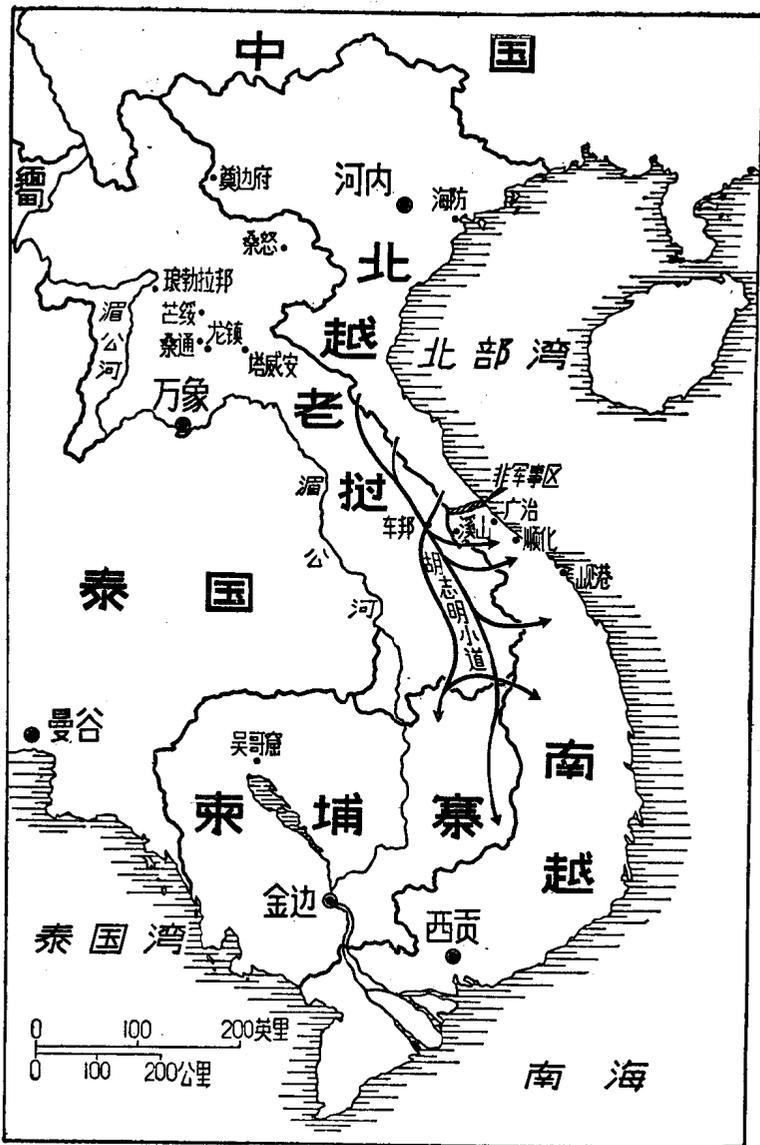
湄公河是老挝和泰国之间的边界，老挝的首都万象就座落在湄公河岸上。一个国家的首都设在国土的边缘上，城界也就是另一国家的边界，这真是少见的例子。就好象老挝人被其北越邻人吓怕了似的，想逃离他们吓人的阴影越远越好，好象挨着泰国就使老挝的生存有了保证似的。

自从五十年代末以来，老挝成了自己地理位置的受害者。沿越南的北纬十七度线划出的非军事区阻挡北越大规模地向南越直接渗透，而这样做并没有明显地违反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按照某种被北越歪曲了的逻辑，假道另一主权国家的领土绕过这个非军事区似乎就合法一些了。殊不知老挝的中立地位也是受到同一个日内瓦协议的庄严保证的。所谓胡志明小道（其实是一整套

交通网)是在老挝南部的密林中开辟出来的。就象它在柬埔寨的所作所为一样,河内干脆占领邻国的这部分领土,把当地居民赶出去。也如同在柬埔寨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主张帮助老挝维护独立的美国人,被指控为企图把战争“扩大”到一个和平国家里,其实这个战争的根子早已由于北越非法侵占老挝领土而埋在那里了。北越人不以侵占老挝南半部为满足,一九六一年他们在老挝的东北角武装了一个叫做巴特寮的共产党宗派,并且派进来六千名作战部队。

河内不断加紧追求霸权的步伐。美国的政策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五十年代时反共情绪高涨,那时美国支持万象的亲西方政府,该政府宣称它控制全部国土。河内抛出了一种策略,后来一再施展这种故伎,就是要求建立以中立主义者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的联合政府。富马事实上是一位真诚的民族主义者。肯尼迪政府接受了这个方案,但它又必须在一九六二年向泰国派驻美国海军陆战队,用以遏制河内完成征服整个老挝的行动。河内对待这项协议的态度恶劣透顶;它在不顾明文规定的义务方面完全可谓打破现代世界记录。

在一九六二年日内瓦会议上,按照河内的要求,老挝获得中立的首相和中立的政府;所有外国军队必须通过国际监督下的口岸撤出去。但是不顾这一切,甚至也不顾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承认梭发那·富马这一事实,河内悍然把处于它的共产党仆从巴特寮单独控制下的老挝东北两个省份据为己有。胡志明小道所在地区仍然被北越军队占领着。在外国军队撤出方面,六百六十六名美国顾问通过国际检查站撤出了;而六千名北越部队中只有四十人(不多不少的四十人)露面被遣送回国——说不定这是每星期轮换的名额,也可能这些人是回河内度探亲假的军官。北越人自己甚至不屑于伪装成遵守日内瓦协议的样子,同时却声嘶力竭地



一九七三年的东南亚

向世界控诉美国的干涉罪行。在老挝境内的北越人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增加。到了一九七三年在老挝已有六万北越军队，他们直逼万象并且占领了与越南接壤的整个边区。

梭发那·富马首相和他的同僚们于二月九日会见了我们。他们对巴黎协定既抱着希望又有顾虑，这是不奇怪的。巴黎协定签字还不到半个月就有了问题。

在老挝也如同在柬埔寨一样，北越人没有要按照第二十条规定撤军的任何迹象。相反，上个星期北越又新开来一师军队进驻老挝南部。

河内对资产阶级的法律观念极端蔑视，它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去设法掩人耳目，没有必要装出承认在协定上签了字就要承担义务的样子。黎德寿在巴黎时向我提出书面保证说，协定签字十五天内老挝将实现停火。期限快到了，而执行协定方面一点动静也没有。河内突然说停火须等签订一项政治协议。这种说法毫无法律根据，而且显然违反书面谅解。接着河内又施展它擅长的一种恶劣手法。它不再把梭发那·富马作为中立主义派的领袖；它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中立主义”派，这个派连它最忠诚的追随者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河内的仆从还坚持说，他们决不签署没有写入谴责美国干涉字样的文件，从而企图把河内的歪曲解释硬塞进宣告终止冲突的法律文书里，以便断绝今后诉诸美国的武力以维护协定的后路。

梭发那·富马决心不接受这样的条款。他曾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愿意接受美国和泰国的援助，但他绝不同意让老挝在国际政坛斗争中沦亡。他秉性温和，举止文雅，在他身上体现了老挝人民的美德。老挝民族不是通过孔武精神而是通过优雅的生活情致对历史作了贡献。它无论如何也敌不过人口七倍于它的对手。老挝天天处在河内的军事和

政治讹诈之下。它与所有同河内打过实际交道的国家一样，对河内不抱丝毫幻想，而我们国内的和平运动中许多人却把北越说成是什么受美国蛮横无理压力之害的温和的民族主义国家。

富马打算继续在险恶复杂的情况下搞平衡。他准备把和平谈判进行下去，准备不顾风险谈出新的安排。他不怨天尤人，他只要求我们不要把美国这一砝码从天平上挪走。

二月九日晚上他设宴招待美国代表团，地点就在万象近郊他那简朴的别墅里。这里象是法国一个次要部长的官邸，并无首相府通常有的华丽派头。宴会快结束时，富马起立祝酒。他讲得很在理，感人至深，完全说出了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希望和担心。他们但求别人不要对他们横加干涉，并且希望我们搭救他们。他说道：

基辛格博士和各位朋友们，欢迎你们在我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来到老挝。拯救老挝生存的任务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是能够担当重任的。我们指望你们使我们的邻国理解，我们只不过是希望和平。我们是很小的国家，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危险。我们指望你们使他们理解，老挝人民在传统上和宗教上都是爱好和平的。我们仅仅希望保持我们的主权和独立。我们但求人家让我们在古老王国剩下的这一小片国土上和平地生活下去。我们这个古老王国曾经有一千七百万人口，现在只有三百万了。

要是能对北越人保持压力，使他们懂得违反协定的严重后果，也许他们就会遵守协定。老挝有权过和平生活。美国花了那么大力气，不应该眼巴巴地看着北越终于在印度支那建立霸权。而这正是胡志明的目的，就是要由河内取代法国统治印度支那。

所以我们只能指望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帮助我们继续生存下去。但愿你们答应这个要求，这是我们的希望和梦寐以求的。

真是感人肺腑的愿望！他要求一个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国家去向老挝的邻国传达它的和平意愿，而按照对方的思想方法，这反而会更加挑动其侵略欲。而且他还希望我们永远愿意去保卫遥

远地方人民的自由。

也许由于富马这番话比谈判桌上的正式发言使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以上希望难以实现，而且我们自己也难以承担这种性质的责任，因此我的答辞无法满足东道主的厚望。我讲我自己那一套，好象空泛的保证足以减轻精神上的痛苦似的。不过我还是讲到了我们的老挝东道主所关心的主要点：

亲王殿下，我非常欣赏你发自肺腑之言。你把一个很重的责任加诸于我。四年来我荣幸地担任现在这种职务，我们经历了巨大的困难，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正值新的一届政府开始任职，我们绝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更何况我们在这次大选当中恰恰是在美国要不要维护自己的信念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辩论。

第二天上午，我从万象机场动身去河内前发表谈话，公开要求严格履行巴黎协定，在老挝早日实现停火。

在我写作本书时，老挝已沦于共产党统治之下。四万多越南军队作为占领军留驻那里。富马受到软禁。一万到三万政治犯在劳动营里接受“再教育”。过去靠我们的帮助对北越人作战的孟（苗）族被有计划地消灭，有些人是被用毒气屠杀的。几十万老挝人逃亡到泰国。

一九七三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使我更坚定地认为，美国在维护东南亚弱小国家独立问题上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们对恃强凌弱行为作坚决斗争方面扪心无愧，虽然我们后来给自己规定了力所不能及的目标。但是直到今天我一回想起梭发那·富马可怜巴巴的祈求，我仍不禁内疚，因为美国未能满足他的希望，给予坚定不移的支持以抵抗一个贪婪敌人。

令人惶惑的河内之行

二月十日，飞机在河内着陆时，我好象登上了月球一般。十多年来，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十字军东征行动竟变成了一场恶梦。善于冷静地操纵这类事的河内统治者大大钻了美国当局优柔寡断的空子。经常有来自美国的反战人士前来这个号称革命正义楷模的麦加* 朝圣。河内成功地宣传自己是受到野蛮的外国人欺凌的无辜而和平的国家。经过它派去巴黎的谈判代表把那些谎言进一步发挥，竟使人误以为美国历届政府都不大关心和平，以致坐失良机。河内深知最重要的战场之一就在美国人民的心中，他们在这方面成果辉煌。人们对这些狂热分子不能不佩服。他们早年献身共产主义，为自己的信仰历尽艰难，英勇斗争，勇往直前，斗争对象先是日本人，接着是法国人，最后是美国人。他们既用真刀真枪，又通过心理战把所有的敌人拖得精疲力尽。

虽然我们迫使那些狂热分子与我们达成了不很牢靠的妥协，但我实在不敢相信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承担一种尚未见最后分晓的后果。我一九七三年二月河内之行的目的就是：如果那里存在着不赞成继续战争而主张和平建设的倾向，我们就加以鼓励，运用美国将报以善意的许诺把和平状态稳定下来。如果这些希望落空，那么我们就提出将导致严重后果的警告。

属于总统专机队的波音七〇七座机徐徐降落在河内以北约五十英里的内排军用机场。这天上午天空灰蒙蒙有些薄雾。机场四周平坦荒凉，B-52型飞机轰炸后的痕迹历历在目，建筑物大部被毁，跑道上弹坑累累，不过已经基本上填平。我们的飞机颠颠簸簸

* 麦加，伊斯兰教徒的朝圣地，在沙特阿拉伯西部。——译者

地停了下来。

黎德寿给了我几乎是亲热的欢迎。在将近四年的巴黎秘密会谈中，这位通常面孔阴森森的职业革命家与我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他一定恨我，因为我代表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竭力不让北越称霸全印度支那，而它认为这是它的天然权利。作为职业的列宁主义者，他蔑视我所提出的妥协的资产阶级价值标准。有时我也很气愤他企图操纵我国的舆论和伤害我们的自尊心。他在会议室内外放肆的欺骗手法简直令人怒火中烧。然而黎德寿的机灵、敏锐和铁的纪律性却使我佩服。这些年来他与我谈判，从未有不稳重的表现，从来没有犯错误。他也绝少失礼，只有一次，那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他被似乎即将取得胜利的前景冲昏头脑而放肆起来。⑥他费尽心机软磨硬抗了三年。一九七二年因屡遭失败不得不同意解决问题时，他的态度灵活，行动迅速。

至于黎德寿对我的真实看法如何，恐须等到河内也通过一项新闻自由的法案后才能知晓。不过到了谈判的后期，他觉得保持亲切的外表是有好处的。他在军用机场向我打招呼时面带友好的微笑，几乎象是某次年代久远的战役的老兵重逢似的。他拉着我的手走向跑道旁一个窗子被炸掉的简陋小棚屋里。喝茶寒暄过后，大家登上一架苏制安-24型轻运输机，飞二十分钟来到更靠近河内一点的嘉林国际机场。这个机场也是我在多年听取军情简报过程中所熟悉的地方。（由于嘉林机场跑道不够长，波音七〇七型飞机不能在此降落。）

嘉林机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B-52飞机的炸弹命中了它的主跑道。指挥塔只剩下门面的一堵墙没有倒塌，仰头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其后的天空。我们受到了另一些官员的迎接，坐上苏制伏尔加牌小轿车，车队直开城里。后来才知道这些几乎是我在此次访问中所看到的仅有的几部小汽车。

上述两个机场都在红河之北。河内位于红河之南，看起来象是一个昏然入睡的法国外省的城镇。过河只能走浮桥；至于那座常被人引为美国空军无效轰炸佐证的著名保尔·杜梅(亦称红河)大铁桥，终于在上次圣诞节大轰炸下坍塌了。

红河北边被我们轰炸得遍地是弹坑，就象月球表面照片上所显示的景象那样。可是我们来到河内市区一看，却是一片和平气象。我们马上就明白，原来同所谓我们的圣诞节大轰炸惨无人道的传闻相反，河内市区实际上未遭破坏，几星期后来此采访的新闻记者也惊奇地证实了这一点。^⑦沿途所见，唯一遭到破坏的建筑物乃是法国总代表处，它是在几个月前正当我们在巴黎会谈期间被误炸的，当时弄得我们向我们的谈判对手或向法国东道主人都不好交待。在河内完全看不到西贡那种嘈杂热闹景象。从另一星球来的人绝对想不到这两个城市的居民竟属于同一个民族，也不会猜出是从哪一个京城派出的军队侵扰四邻之国，震惊了全世界。这也证明，不能光凭物质力量，还得靠信仰和纪律才能取胜。

河内的建筑物属于法国南部地方的风格，但已经陈旧不堪。很明显，城里自从独立二十多年以来没有建造过什么新房子。宽阔的林荫道路上都是骑自行车的人。偶尔可以见到一辆苏制卡车，根本见不到私人小轿车。街道上并不拥挤，当局还没有让头年疏散的居民全部迁回来。老百姓面部表情严肃，神态茫然，与英雄人民的形象多么不相称啊！从这些平凡的男男女女脸上看不出是什么东西驱使他们如此顽强地作战和忍受痛苦。人们望着我们的车队，毫不显出感兴趣的样子，虽然出现这样长的车队一定说明某种重大事情正在发生。

车子开进河内市区时，我有一种奇特的超脱感觉。我来这里好象是长途旅行到达了尽头，却又没有明确的目标似的。自从谈判形势急转直下以来，黎德寿和北越政治局亟盼我访问他们的首

都。他们的动机如何难以捉摸。不可能是急于想获得与中国同等地位吧。在我秘密访问北京后，正是这种动机使勃列日涅夫急不可耐地要在莫斯科接待我。可是河内领导人太矜持了，他们不会这样干的。他们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内心不安全感。莫非他们想麻痹我们，以便随后发动新的征服行动？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这种行动必然遭到反击。从我们这方面来看，我们必须表现出我们已经探索了实现和解的一切机会，以后如果发生变故，需要采取别的手段维护巴黎协定时，我们在国内才好说话。河内毕生斗争，弄得精疲力尽，难道甘愿就此罢手，而开始着手解决本国的民生问题？黎德寿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也正想探一下这方面的虚实。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选择是受到限制的。我来河内访问，部分目的是为了向国内显示我们决心恢复全国和解，这件事与北越人无关。我们希望用坚持严格实施巴黎协定的方式，使河内领导人明白恢复军事行动是不行的。但是我的心情有点沉重，因为我明知这些人不会为言辞所动。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就要受到考验。那时我们就应该拿出勇气来。另一方面，我必须设法诱导他们致力于和平事业。但是我的面前有两个未知数：河内一向不把经济建设放在很高位置，现在它肯改弦更张吗？美国国会能支持我们吗？

我懂得，或者不如说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在这个缺乏各种现代生活设施的城市里处于一种奇怪的不利地位。美国曾经被越南搞得伤透脑筋，但它毕竟只是地球上小小的一个角落，而我们对全球的安全至少负有一部分责任。至于河内领导人，他们却可以只顾一头，就是把他们史诗般的事业进行到底。他们只要重新挑起战争或者扰乱我们国内的安宁，就足以给我们造成损害，而这将大大超过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好处。他们却不能做任何对我们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他们太过于以自我

为中心，而不习惯于把外交政策放在一个国际体系范围内来考虑；他们太骄横，而不相信别人具有善意；他们野心太大，而不肯以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思想来限制自己的目标。因此，车子开进河内的一路上，我颇为不安地意识到，此行如能避免失败，那就是最好的结果，而最高的希望仅仅是越南快些从我国的意识中消失掉。

我下榻于河内市中心的一座雅致的二层楼结构的宾馆，这里过去是法国东京总督的官邸。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住在统一饭店，这个旧得不象样子的旅馆位于马路斜对过，墙壁上到处乱涂乱写，大部分是俄文，乃是各种苏联援越人员所作的文化贡献。旅馆的服务毫不照顾客人起码的舒适，根本的原因是这里把所有外国人都看成是潜在的间谍，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早早把他们打发走。

黎德寿把我送到房间便客气地告辞去准备我与范文同总理的第一次会见。由于时间还有些富裕，我和同事们决定出去走走，这可弄得北越接待人员以及我们自己的特工保卫人员很狼狈。北越人那一套烦琐作风这下不灵了。由于事先没有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上面没有留下指示，门卫临时干着急，不敢阻拦我们出去。我们顺着街道踽踽，由于车辆稀少，市里显得陈旧而宁静，熙熙攘攘的人群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河内市中心有两个小湖。我们沿着湖边走。我们是二十年来在河内自由行走的首批美国官员，而在数百码之遥另一些美国人作为战争俘虏仍然受扣押折磨。*路上行人向我们投射过来的眼光不露明显的表情。他们既不表示敌意也不表示友好，好象我们这些怪客根本与他们无关似的。在一幢建筑物前有一幅大地图，它表明河内统治者所喜欢的是那块被看作是南方的“解放区”的地方。地图多少标得对河内有利一些，倒也不能说不准确。我不知道北越人民对此作何感想；他们二十年牺

* 一月二十七日签订的巴黎协定规定，在六十天内分批释放全部美国战俘，与此同时美军全部撤出南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到三月二十七日才结束。

性所得实在少得可怜。

我们散步回到宾馆，这回死板地执行制度的北越人员对我们刚才的擅自行动进行了报复。门卫要每个人出示证件才让进去。这对我的同事们不成问题，因为在机场时已发给他们证件。不幸的是并没有人发给我证件。在任何极权主义的共产党国家里，官府的规则都不容人稍息；在河内更是毫不通融。结果我被拒诸门外。北越的门卫从未听说过鄙人的尊姓大名。这不过说明河内报纸的要人消息栏办得不怎么样，可我却倒了霉；我作出了不悦的表情，我的谦卑克制精神是众所周知的。来了一位军官，但他也不敢轻易违反制度。就这样争论了二十分钟，最后还是请示到黎德寿那里，才使我免于睡在大街上。我的一个工作人员事后就此事质问北越礼宾官员。对方很窘，推说对代表团团长向来都不发证件，还说这表示给予特别礼遇！显然从来还不曾有过代表团团长走出去散步的事例。他们后来给我发了一个证儿，这回我随身带着它，再不敢有所疏忽。

我的住处布置得很考究，但也有不少毛病。卧室大极了，天花板下挂着许多吊灯。糟糕的是每盏电灯都有单独的开关，分别安在室内不同的地方。睡觉前我得一一寻找这些开关，有时还找不到；更成问题的是，没有一个开关是从床上够得着的，因此我关完灯后只好摸黑走上床。而要钻进被窝里也极不容易。我发现每天晚上床铺弄得整整齐齐，我的睡衣摆在上面，我阅读中的一本书（亨利·费尔利撰写的关于肯尼迪担任总统时期的论述）端端正正地放在枕头上。唯一的障碍是那顶蚊帐罩住整个床，下摆塞得那么严实，不掀起褥子莫想上床，而一掀开就要破坏全部铺设，并且准保会把一大群蚊子放进帐内。

盥洗室里只有洗澡盆能放滚烫的热水，盆里却没有堵水的塞子，洗脸盆只能放冰冷的凉水。其实东道主作了一切努力来接待

我们。北越是个小国，物质条件有限，要供养偌大的军事机器，负担重不堪言，更何况美国采取了周密的部署破坏了它的经济。然而我还是十分恼火，总是怀疑我的东道主又在搞心理战的鬼把戏——特别是因为每天清早五点半钟我就被吵醒，原来是市民在我卧室窗前的广场上奉命做早操。

我要求留出一些时间供游览，特别是去参观文化设施，我初次访问一个国家时都是这样做的。黎德寿欣然奉陪参观。他从中也得益匪浅，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我们首先参观了河内的历史博物馆。里头的历史文物大部分是法国人收集的，经过北越人整理，展示了古代反对中国人或四邻小国的战争，以及大迁徙和反叛的历史。每件展品都标有出土地点。黎德寿对陈列品大感兴趣，主要因为它们的出土地点使他回忆起附近的监狱。他作为游击队领导人曾被法国人关在那些地方。这位老革命家更感兴趣的显然是当年自己为建立新文化的斗争史，而不是单纯的怀古。他给我详细对比了各地监狱单独禁闭室的优缺点，还教我如何化装越南农民，这当然对我毫无用处。

第二天我参观了一个艺术馆。我不得不说，看过之后大为失望。这个有才能的民族似乎在不断斗争的历史中已把自己的元气消耗殆尽，好象没有时间或精力去修葺文事似的。

范 文 同

双方认真一谈起来，很快就发现彼此积怨甚深，只因不能够把对方搞垮，无奈只好暂时罢手，但是互不信任，也不抱真正的希望。双方都懂得应该尽力克制自己，但是谁也不能忘怀往事，河内更难压下自己的情感。强作欢颜十分费劲，彼此都很别扭；往往一言不合马上会勾引起心头的猜疑和怨恨。

河内的领导人很快就显示他们的蛮横态度毫未收敛，而正是这种态度多年来使我们忍受不了。这回我的会谈对手是范文同，他担任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将近二十年。对方具体的人虽然换了，但他们那一套作风并没有变，不是妄自尊大就是虚情假意。

范文同引起我的注意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那时他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采访，他发表了一篇精辟的谈话，解释为什么河内能够坚信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范文同辩称双方力量的悬殊只是表面现象；北越人准备世代代战斗下去；美国在物质上的优势只能在有限的一段时间起作用。他们拖也可以把我们拖垮。⑧结果证明范文同言中了，美国的军事战略帮了他不少忙。这种军事战略的声势浩大到足以损害我们的国际地位，可又因不能放手大干而难决胜负。

在其后的年代里，态度强硬、语言尖刻的范文同一直潜随着我们的意识，有时潜随着我们的良心。他时时发表一些模棱两可的谈话，有时引起公众翘首期待，有时给官方的希望泼一瓢冷水。一九七二年初，他痛斥主张妥协的论调，说这统统是“强盗逻辑”；一九七二年稍后时候双方达成了妥协，他向一个美国记者发表谈话对此极尽曲解之能事，导致谈判破裂。⑨在谈判的最后阶段，河内以范文同的名义向尼克松总统发来了最重要的信件。

范文同身材矮瘦，但很机警，目光炯炯有神，好象随时准备拆穿对方的诡计似的，同时意味着决不轻信大资本家的话。他站在现称主席府的那座大厦的台阶上迎接我。当年的法国殖民大员就是从这里统治着整个印度支那，并且在他们的十分好学的越南臣民的心目中确立了这样的思想，即今后印度支那的疆界应永远与法兰西帝国的疆界相吻合。早在法国人来到以前，越南扩张主义已经是其邻国的心腹之患，经过一段殖民统治，反而得到了新的推动并且合法化了。我们走进一个很大的接待厅，围成一个半圆形

坐下来，开始寒暄——一如中国的做法。同中国一样，在这种场合可以讲一些含蓄的话来活跃气氛。

会见开始时相当轻松愉快，范文同和我都表示迫切希望建立一种新关系，并将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可是这位总理话锋一转，气氛顿变；巴黎协定签字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发出战争可能再起的不祥暗示。他断言，如果新建立的关系不发展成为互利的坚实基础，那么刚刚签字的巴黎协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稳定的局面，一段喘息时间而已。”可是他立即把这些话修饰得缓和一些，说河内并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作为一个笃信列宁主义的人，他欣然同意我适才所作的有点不切题的回答，即我们应该把双方的新关系建立在现有事实的基础上。范文同说着说着又回到他先对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谈话的主调上来：“我们越南人生于斯，长于斯，我们将永远在这个地区呆下去。你们远处大洋彼岸。这个事实咱们不是也应该考虑在内吗？”换句话说，他是问我们准备什么时候放弃南越？我针对北越处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地位而答道：“这正好说明尽管发生了近年的事件，我们对贵国的独立并不构成长期的威胁。”范文同也与黎德寿一样，绝不肯白白被别人占了便宜，那怕是一个哲学上的论争，他也绝不肯放过回敬的机会。他再次话中带刺地表示了河内不可改变的决心：“我们倒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范文同寥寥数语就打破了我那一线朦胧希望，我原先还希望他能成为另一位周恩来，同我们化敌为友。但他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伙伴，正如越南不是中国一样。范文同代表一个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取胜的民族。周恩来领导的是具有优秀文化的泱泱大国。范文同的力量来自于他为实现自己国家的野心而专心致志到狂热地步的劲头。周恩来具有典型的中国气质，他坚信中国的一举一动对全世界都要发挥道义上的影响。范文同是由革命英雄的材料塑造的。周恩来也是革命英雄，但他是由伟大领导人的材

料塑造的。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范文同当时企图麻痹我们，以便河内能够完成对印度支那的征服而不遭到美国的反对。周恩来的指导思想是认为中国的安全——至少在当前面临苏联威胁的情况下——有赖于美国坚定地承担保持全球均势的义务。对于范文同来说，同我打交道只不过是革命斗争中的策略运用。他准备同美国改善关系，如果这样做可以使他在印度支那为所欲为的话，否则就要恢复斗争。这是刚才他在双方说风趣话时暗示的。在河内看来，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从美国增强力量和信心中获得任何利益。周恩来的目标至少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在战略上与我们的目标相符合。他的战略要求具有我们觉得值得去保卫的共同利益。周恩来不但丝毫没有破坏美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信心的意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设法在这两方面暗暗助一臂之力。

初步交锋一个回合之后，范文同和我以及双方人员进入正式会议室。室内摆着笨重的家具，窗帘拉开着，双方面对面在桌子两边坐定，立刻又唇枪舌剑地干起来。北越这位总理讲了一段正式欢迎我的客气话，表示希望会谈能取得良好的结果。我致答辞说：

显然我们双方在意识形态上是互不相同的，对此无庸加以掩饰，但是我们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已证明，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彼此建立良好关系和合作。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来看，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强大越南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丝毫不相抵触。我们两国之所以陷入战争，部分原因是彼此有错误的看法。我们认为这场战争是印度支那以外的某个中央机构指挥的。你们大概也从贵国历史中吸收了某些不大正确的教训。但是不管我们目前在什么条件下行动，我们在印度支那所关心的是维护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和主权。据我们的理解，这一点并不违反贵方的利益。

范文同对于我要他维护的那种声誉并不太热情。维护印度支那任何其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从来就不曾是北越人的一个目

标；过去不是，将来更不会。此外，他当然不接受我们把南越当作一个主权国家的观点。但他在这两个问题上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克制态度。不过他断难放过我暗指北越人也犯了错误的话。他针对这一点说道：

我觉得，对于前不久我们双方在这方面发生的事情——基辛格博士说这是一场误会——我们已经多次表示过看法。就我们来说，我认为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换句话说，有错误看法的完全是我们方面了。不过跟先前一样，乌云很快又过去了。范文同接下去说：

那些是过去的情况，已成为往事，为了现在和将来，我们应该从中得出某些结论。我们应该按照我们刚才在外面谈话时所提到的、而在这个屋里又继续提到的那种精神，化战争为和平，……按照协定的规定，化对峙为和解，……在双方都同意的基础上，并象基辛格博士刚才所说的，朝着长远的目标，建立一种新的、扎扎实实的关系。就我们来说，我们将坚决遵循这个方向，即执行已签订的协定，执行协定的全部条款。

不幸的是，范文同这些漂亮话并未见诸于他的国家的行动。我们的议程包括三项：（一）遵守巴黎协定；（二）关系正常化；（三）重建经济。一接触到第一项议程，我们就明白河内无意把巴黎协定作为它所遵守的第一个协定。

巴黎协定规定停火于一月二十七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二十四时起生效。违反停火的报告立即纷至沓来，因为双方都竭力在停火生效前几个小时抢占尽可能多的地盘，有的地方激战几天都停不下来。起初那几天双方都违反了协定的精神和文字。西贡当时实力还比较强，争夺结果，它扩大了地盘，夺过来的村子比丢失的多。然而从那以后，北越在粗暴违反自己刚刚签署的庄严义务方面大显身手。

国际监察机构马上遭到了共产党方面的阻挠。河内不肯指定

口岸，而按照协定军事装备只许通过这些口岸在国际监督下运入南越。河内似乎以为，拒绝遵守关于国际监督的规定也就可以规避另一条款中关于军事装备只许在一对一基础上替换的限制。在公然违反协定的情况下，河内通过现已不受美国轰炸的胡志明小道大量运输补给品，其速度大大超过战争时期。这是不祥的兆头。

至于协定的政治条款，西贡方面并不急于按照协定的规定建立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河内方面则阻挠任何关于在这个委员会监督下举行普选的讨论，因为它知道自己在普选中将失败。但是，越南的两造都不遵守各自的政治义务，毋庸置疑，河内几乎立即开始向南方偷偷运送军事装备及人员。事实证明这些行动起了决定性作用，并且早于河内的辩护士以后所列举的所谓西贡破坏巴黎协定的一切事件。

为了提供这方面的佐证，我带来了巴黎协定签字半个月以来北越违反协定的材料汇编。这个汇编清楚地说明河内根本不受它刚刚签署的协定中的任何条款的约束。我们掌握它两百次严重破坏军事条款的确凿证据。最严重的事例是二月六日那一天有一百七十五辆卡车闯越非军事区，以及二百二十三辆坦克经由老挝和柬埔寨开进南越。军事车辆闯越非军事区的行动违反了第十五条（甲）款*的规定。双方足足费了两个月时间才敲定这一条的文字，其中禁止一切军事性的通过，平民通过非军事区则须经西贡同意。北越还违反了第七条，其中明确规定新的军事装备只许在一对一替换基础上通过早先指定的口岸在国际监督下运进南越。坦克通过老挝和柬埔寨则违反第二十条，其中规定一切外国军队撤出老挝和柬埔寨，不得利用这两国的领土去侵犯其他国家。当那些坦克到达南越时，则又违反禁止把新的作战物资运进那里的第七条。

* 原文有误，应为十五条（乙）款，其中规定：“越南北方和南方将尊重临时军事分界线两侧的非军事区。”——译者

范文同和黎德寿丝毫未感到不好意思。他们采取我在巴黎会谈中早已领教过的那种强词夺理的态度胡搅蛮缠。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法律教授如何教学生狡辩术：如果人家控告你的主顾偷一只黑锅，可答：“我的主顾什么也没有偷。但不管怎么说，他偷的不是一个锅，而那个锅也不是黑的。”范文同叫黎德寿答复这个问题，而黎德寿采取的正是这个故事所讲的办法。他说：并没有违反协定。而且不管怎么说，闯越非军事区的卡车装载的是民用物资。这当然也是违反协定的，因为其中有一条规定民用交通须经西贡的同意。再说，如果河内只要宣称所运进的物资全是民用的就可逃避国际监督，那么禁止运进新的作战物资的第七条岂非形同虚设？至于那些坦克，黎德寿和范文同有气无力地进行了抵赖，但答应去查一查。后来他们说，协定签字时也许那些坦克已在路上。当然，这种解释同禁止那些坦克进入南越完全是两码事。副外长阮基石曾同我方的威廉·沙利文大使在巴黎谈判专项的议定书，他竟异想天开地宣称，也许因为人民的需求非常迫切，所以坦克也被调去帮助运输民用物资了。

河内对其控制区内的不到二百万南越居民生活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但是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它丝毫不曾表现过这种关怀。我心中顿起疑云，莫非人家在考验我们？如果我们不及早在偷运武器和渗透人员的问题上逼他们摊牌，那么一旦河内准备停当，战祸就将重起。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头来只不过为自己军队的撤出换来短暂的喘息时间而已。

双方关于战争中被俘或失踪的美国军人和飞行员问题的讨论也使我们很失望。我们已知至少有八十个美国军人被生俘后不知去向。我们掌握这些人落地被俘获前的无线电通话记录或者共产党方面发表的照片和姓名。可是协定生效后交给我们的战俘名单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死了吗？是怎么死

的？难道他们失踪了？他们已经被俘，怎么可能失踪？我提请对方特别注意十九个人的例子，他们被俘后的照片曾经在共产党方面的报刊上发表过。范文同不置可否地回答说，交给我们的名单是齐全的。他未试图解释名单与实际何以有出入。他说，过去的经验表明，由于印度支那的地形条件，需要很长时间，也许需要一年，才能收到补充材料。可是他没有说明地形与战俘失踪何关。对方从未向我们交待共方报刊登过照片的那些战俘何在，更没有说明那些我们从无线电通话中确知已安全降落地面的飞行员的下落。

为了平抑气氛，黎德寿提出，为了对我表示欢迎，愿意提前释放二十名战俘，具体人任由我从战俘名单上挑选。我感谢他们提前放人的厚意，但拒绝挑选名单。我没有理由在那些如此长期受苦的人们当中挑选。（被俘时间最早的人总是最先获释的。）这个诺言河内还是遵守了，第一批释放的战俘数目增加了二十人。

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北越人表现最顽固（也极恶劣）。巴黎协定第二十条明文规定：“各外国”应停止在柬埔寨和老挝的一切军事活动，从这两个国家全部撤出其军队。^⑩另外在一份书面谅解中，黎德寿和我两人同意北越和美国的军队都属于本条所说的“外国”军队。如果文字还有任何意义的话，北越就必须立即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并停止利用这两国的领土作为基地、作为庇护所或者进行渗透。

我与范文同谈不多久就看得很清楚，北越人意欲使第二十条完全失去意义。他们采取的态度是，明明必须无条件执行的撤军，不仅要等到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实现停火，而且还要等到这两个国家达成政治解决。河内要等到同这两国的新政府谈判后才撤军。既然共产党方面的政治要求是让巴特寮在老挝占优势和让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取得胜利，于是要北越撤军（如果它肯撤的话），就要等

到这样做已经变得毫无意义、问题已经按照对共产党方面有利的条件解决之后。河内等于是建议自己同自己谈判，充其量也只是同它的柬、老附庸谈判如何实施它与我们达成的条款。在老挝或柬埔寨实现政治解决——黎德寿在巴黎时实际上拒绝讨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能够作为履行协定条款的先决条件，因为条款里没有这样的规定嘛，而且鉴于这些条款的明显的重要性，是没有附加条件的。

河内这种蛮不讲理的解释对柬埔寨是特别不祥的预兆。在老挝，至少已在进行停火谈判，而且我们得到河内的承诺，且不论其价值如何，要在十五天内谈出结果来。可是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却拒绝同非共产党方面的任何代表谈判；对于朗诺单方面宣布停火，他们的回答是发动了一次新的军事攻势。我们是在对柬埔寨问题还没有达成正式协议的情况下冒着风险在越南媾和的，这是由于美国国会不容许仅仅因为柬埔寨的缘故而再事任何拖延，还由于我们的专家都认为红色高棉单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取胜。假如红色高棉不能获得北越作战上和后勤上的支援（这正是协定所禁止的），那么也许有可能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性解决。但如果北越军队违反巴黎协定留驻柬埔寨，那几乎肯定地将使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红色高棉。更严重的是，我方几乎所有的调研报告——最新的一份报告是英国反游击战专家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于一月底提出的——都说，假如共产党接管柬埔寨，敌方开辟另一个前线，建立通过西哈努克港的海上供应线，南越生存的机会就要丧失殆尽。

我们现在从西哈努克的回忆录中才知道，事实上，红色高棉认为巴黎协定出卖了他们，因而他们要求北越军队撤出柬埔寨。^④可是北越军队违反第二十条的规定赖着不走，他们这样做既违反他们的敌人、也违反他们自己盟友的愿望，而他们在同我们谈判时却利用他们盟友的名义招摇撞骗。

无需说，我对范文同作了尖锐的回答。我用挖苦的语调说，看到河内对其盟友的主权关怀得如此无微不至，真是令人不胜钦佩。可是河内说它不能按照自己不到半个月前所同意的规定，作出单方面的决定把它过去单方面派进去的军队撤出来，这是十分奇怪的。河内的军队不是这两国的俘虏。它当初既然可以不经这两国的合法政府的同意就把自己的军队开进去，现在当然也可以自行决定把这些军队撤出来。

不能说我的论点使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经验告诉我们，河内并不总是坚持原来的论点；它毕竟放弃了关于南越的一个类似的论点。这次我们逼对方作出的唯一的“让步”，乃是黎德寿答应将运用他的“影响”在老挝尽快实现停火——这是他们第三回卖给我们这样的货色了。老挝停火终于在二月二十二日达成，但这是借助于对北越部队在老挝的集结地区再次用美国的 B-52 型飞机轰炸后才取得的，不料这却招惹舆论和国会的猛烈抨击，说我们又在“扩大”战争了。尽管达成了停火，但河内并没有从老挝撤军。

然而北越人的拖延战术却使柬埔寨惨遭长期的磨难。范文同和黎德寿宣称越南与柬埔寨的局势没有牵连——这又是一个弥天大谎；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对朗诺所宣布的事实上的停火表示态度。他们拒绝朗诺要同河内或者红色高棉谈判的建议；他们坚持他们一九七〇年的立场，即要求推翻柬埔寨政府。他们采取越南问题上拖延谈判的故伎，坚持在任何谈判开始之前必须解散金边的政治结构，在这之后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事实上，河内甚至不屑于伪装要在柬埔寨建立联合政府的样子，而干脆要求让共产党接管政权。黎德寿随便说了一句，建议我去找西哈努克谈，但很奇怪的是他对西哈努克的地位以至于其行踪都含糊其辞，强烈地暗示红色高棉是柬埔寨未来的决定性因素。黎德寿（他显然是政

治局里主管印度支那各国事务的人)用极轻蔑的语气谈到西哈努克。他嘲笑西哈努克最近在河内访问时的表现以及那位亲王讲究奢侈的生活作风。他请我们看一部关于西哈努克访问柬埔寨共产党控制区的宣传电影片子,意思很清楚,西哈努克是得到红色高棉默许才能去那里的。黎德寿似乎认为西哈努克的主要用途是打击朗诺政府的士气和拆它的台。

黎德寿对红色高棉的顺从性作了错误的估计,因为它拒绝象巴特寮那样甘当河内的工具。但是也许黎德寿愿意付出让红色高棉暂时自主的代价,因为红色高棉如果胜利,西贡政府马上就会受到打击,不能长久经受柬埔寨赤化的后果而不垮台。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河内也自有一招杀手锏来对付红色高棉闹独立,如果它对后者失去控制的话。红色高棉在一九七五年获胜后不到四年,北越就出兵侵占共产党统治的柬埔寨,手段之恶劣不减于它六十年代中期对付西哈努克的中立柬埔寨以及七十年代对付朗诺的柬埔寨所使用的。

我们那时准备接受在柬埔寨成立由西哈努克起平衡作用的真正的联合政府。河内要求的是让西哈努克在其中作为过渡性挂名首脑的共产党政府。河内袭用它在南越问题上的手法,认为我们在谈判过程中应作的贡献就是去推翻我们自己的盟友。由于共产党方面在柬埔寨问题上一直拒绝事实上的或通过谈判安排的停火,拒绝任何真正的谈判,还由于红色高棉发动了新的军事攻势,使我们不得不在二月间恢复对柬埔寨境内的轰炸。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力量的均衡,使共产党方面不能指望取得军事解决,从而逼出一个妥协来。可是由于国会在一九七三年六月禁止美国继续在印度支那作战,我们这一努力便落空了。(关于一九七三年我们为结束柬埔寨战争的外交活动将在第八章里详细论述。)

在老挝问题的政治解决方面,北越领导人的态度仍然令人捉

摸不定。范文同一度谈到停火后九十天内当可解决。令人惊异的是，他这番话随即被黎德寿否定了。黎德寿私下找我谈话说，从此以后有关柬埔寨和老挝问题由他单独和我谈，因为他的总理不熟悉这方面的曲折之处。结果，老挝的政治解决一直拖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才实现。新成立的联合政府勉强维持了两年，终于在一九七五年的大失败中被搞掉。河内如同一九六二年那次一样，连表面文章也不屑于做，根本不兑现撤军的承诺。即使在河内自己对巴黎协定所作的那种荒谬解释得到满足后，四、五万北越军队仍然赖在老挝不走。

经济援助

只有在一件事上范文同准备遵守巴黎协定，而这件事需要我们单方面拿出东西来，那就是美国的经济援助。他把事情弄得几乎是河内拿了我们的钱还算是对我们大大照顾。但是河内乐于照顾我们的程度还没有达到肯于稍加改变它那蛮横的谈判方式的地步。它认为美国理应给予它援助，这是它的权利。如果我们提醒它说，提供援助要看河内是否遵守巴黎协定的其他各项条款，就会被它恼怒地斥为干涉北越的内政或者提出不可接受的政治条件。

本来是美国自愿给的东西，北越居然说这是它应得的“权利”！这种事情至少表明两种社会互不理解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同时也说明北越蛮不讲理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美国方面来说，给予经济援助之议出自一种矛盾的思想，既掺杂有理想主义的成份，也带有对历史作唯物主义解释的意思，而按照后一点，政治决策是受经济动因驱使的。世界各大国中间，大概没有一个象美国那样，掌握着偌大的力量却如此不善于运用。我们越来越认为战争是“不自然的”，会打断我们对和平、繁荣和自由的追求。没有别的国

家象美国那样，把敌国打败之后自认为有责任去帮助它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就把这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中心内容。在越南，我们以为用这个办法可以诱使一个未被打败的敌人接受妥协的条件。我们相信据我们看来是积极的目标，但是与此相反，困难在于我们碰到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不屈不挠的革命狂热以及宁要取得胜利而不要发展经济、决心不惜一切物质代价非要获胜不可的对手。

多年来我们对印度支那的政策就贯串着这些成份。一九六五年四月，我们刚增兵南越不久，林顿·约翰逊总统就向河内提交了一份战后经济复兴计划。我们不知道北越是否从这个建议里看到了我们的决心在减退的端倪（结果取得了与当初愿望适得其反的效果），或者认为我们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根本不理解革命者的气节。总之，我们的建议未被接过去。

尼克松政府对河内的动机有不同的看法，但它觉得这类人道主义的建议不失为平息国内不满意见的一种办法，因此过不多久它也袭用上届政府的做法。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尼克松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一篇语气和解的演讲，又一次表示愿意向北越及其他印度支那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然而并没有收到比约翰逊更好的效果。我们并未灰心，一九七一年夏天我与黎德寿秘密谈判时，我们又提出一项援助计划。黎德寿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未露出感兴趣的任何迹象。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尼克松公开重申此议，作为一个全面建议的一部分。次日，我向新闻界吹风时说明我们准备拿出几十亿美元来援助包括北越在内的印度支那各国的重建。一九七二年二月九日发表的总统外交政策报告中讲得更具体：“我们准备结合全面的协议承担一项金额达七十五亿美元的大规模重建计划，北越在其中的份额可达二十五亿美元。”我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那次谈到“和平已在望”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

了这个主题。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记者招待会上我又谈了这个问题，尼克松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也谈了这一点。

这时河内对这个建议的兴趣急剧增加起来。它不会承认它准备为了经济上的原因而结束战争。可是一旦它出于军事的需要决定停火时，它就准备（如果不是急于的话）从我们那里最大限度地榨取援助。它采取的典型做法是，向我们索取赔款而不是接受我们的援助。河内索取援款的胃口也很大，一点也不客气；黎德寿干脆要求我们把准备给予整个印度支那的七十五亿美元金额统统给河内。河内的这两条我们一个也不接受。我们之所以愿意提供援助，是由于先后两届政府都有此许诺，更主要的是，我们觉得为了促使对方遵守协定这是一种有用的奖励品。不过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援助是美国的传统原则的体现，是一种自愿的行为，而绝不是有什么“义务”要给河内赔款。这样讲也许显得有点咬文嚼字，但这事关系到我们的荣誉。经过几星期令人厌烦的讨价还价，我们终于把河内的要价削减到三十二亿五千万美元。我们说这是一个指标，还须进一步讨论并须经国会批准。

相关的文件是巴黎协定和美国总统的一项咨文。巴黎协定第二十一条全文如下：

美国希望本协议定将开辟一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和解的时代。美国将按其传统政策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整个印度支那医治战争创伤和战后重建工作作出贡献。

我们作出这项承诺时预计战争即将结束，随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和解的时代。而且我向黎德寿一再强调指出，任何援助都取决于国会的批准以及河内履行巴黎协定。

我们提供援助的意图，甚至其金额都是众所周知并多次载入了公共记录的。当时加以保密的是尼克松致范文同总理的一份关于实施第二十一条的程序的电文。为了着重表明援助是自愿的，

并且有别于协定包含的正式义务，黎德寿和我同意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日即协定签字后三天致送这项电文，以交换拘押在老挝的美国战俘的名单。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北越方面未交出拘押在老挝的美国战俘名单，我们当即指示我们在巴黎的代表且慢致送那份电文。这个办法立即产生了效果：在老挝的美俘名单于二月一日下午送来了；我们遵照协议同时向北越方面送交尼克松致范文同的电文。

尼克松这份电文是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和我起草的，内中提出了讨论经济援助的程序。在我访问河内期间要对原则作全面讨论，以致导致成立一个联合经济委员会，其任务是拟定一个详细的援助规划。（联合经济委员会于三月十五日在巴黎实际开始讨论。）尼克松电文中提到“初步”的金额是“三十二亿五千万美元左右”，分五年实施，两国可对此进行修订和进行详细的讨论。（粮食方面的援助包括在总金额里。）尼克松的电文强调，联合经济委员会议定的一切事项均须呈报国会，一如我们同任何其他外国政府议定的外援计划都要经过这层手续那样。另有单独一段文字强调指出：“据谅解，总统致总理照会中提及的联合经济委员会的一切建议应由各方遵照本国宪法规定加以实施。”

在一月份的时候，黎德寿十分放肆，竟狂妄到企图教训我把哪些内容写入我国总统的电文里才是适当的。他硬说总统的电文里不应该包括上述的限制语；并说我国的义务必须是无条件的。我指出，不管河内的决策程序如何便当，我国的立法程序是必须遵守的。我们“进行了妥协”，把须经国会批准等语写在另一张纸上，与正文同时发出并具有同等重要性。黎德寿似乎对此感到满意。这使河内可以公布信件而把另纸载明的条件扣住不发表。它后来正是这样干的，这使它向不明真相的人又一次揭露我们言行不一致。

北越政治局头头们十分自信地以为，可以借助我们国内的压力迫使我们步步失利。根据十多年来的经验，这个估计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于是他们进而想甩掉另一条重要的限制，而这一条限制我在同他们谈判时也曾十分认真而明确地强调过的。我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就协议问题向新闻界吹风时着重说明，只有在协定“实施得差不多”以后我们才同北越讨论援助的问题。

后来的情况是，战争一结束，政府所受到的要求向河内作让步的强大压力也随之而减轻了；许多人过去积极主张以提供经济援助的办法来结束战争，到了国会内要投票表决时，他们反而对此毫不热情了。公众舆论总的来说宁要取胜而不赞成妥协，也不倾向于向一个残暴的政府提供援助，经过归来的战俘的揭发，这个政府的残暴性已暴露无遗。因此尼克松蛮有把握地指示我在河内向对方重申，是否提供援助取决于能否严格遵守巴黎协定，特别要提到必须从柬埔寨撤军。北越方面不能期望我们有别的什么做法。战争不结束就谈不上“战后”时期的开始，当然提供战后重建援助的时刻也就不会来临。

范文同拒绝这个论点，这也是不出所料的。可是他发表了惊人的意见，说要求河内遵守它所签署的协定就等于是附加了“政治条件”。他并说美国的援助应是“无条件”的。换句话说，应该让河内自由地使用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实现它征服印度支那的长期野心。这是违反那个协定的，而恰恰是那个协定，使我们承担了提供那些资金的义务。

然而引起北越人大光其火的还是我国宪法中关于法案必须送呈国会批准的规定。我来河内时带了厚厚一套文件，准备向那些北越人宣讲我国的宪法程序。这套文件共有五十七页单行打字纸，包括美国行政和立法两部门处理预算案的程序简介、美国所参加的双边和多边援助计划的各种范本、与此事有关的全部立法条文

(包括国会规定限制向河内提供援助的条文)、对越南援助计划可能包括的各种项目的简介以及重要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对一般的对外援助表示越来越增长的怀疑的言论摘编,等等。我把这些文件递交给范文同。范把文件往旁边一放,假装闹不清这些立法程序(其实在战争期间他曾巧妙地利用美国国会的意见来反对过政府)。他还怀疑有什么圈套。他说:

首先,我要表示我的怀疑。……我想坦白而直率地同你谈谈。大家知道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花费了大量金钱。据说用了差不多两千亿美元,而且可以说是在国会并不完全同意这场战争的情况下干的。战争进行的时候,拨款那么容易(众人笑),而现在到了咱们要解决一种非常正当的问题时,……你们就认为有困难了。

他一再表示不相信立法方面有何障碍,认为这不过是我们企图规避我们的“义务”的借口。他说: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钻法律问题的牛角尖。我觉得很难理解。当然,要是没有诚意,总可以拿法律问题作借口嘛。

我必须说,我还从来不曾象这一次那样地卖力维护国会的特权。后来国会里有些人骂我不尊重国会的立法特权,其实他们应该表扬我才是。如所预期的那样,双方终于同意成立联合经济委员会来研究如何发展双方的经济关系以及商订一项援助计划以便我们向国会提出。

双方就河内与华盛顿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未作出结论;还谈了关于在巴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使巴黎协定得到国际认可的问题。河内当时还不准备同我们建立任何正常的关系,连互设不具有完全外交地位的联络处也不干。我们提出了几种方案,他们统统拒绝了。(有意思的是,我们所设想的一种方案几天后被中国方面接受了。)原来河内妄自尊大,以为让几个美国外交官去河内加入到一些西欧国家——也许包括苏联在

内——外交官的行列里过被流放式的毫无舒适可言的生活，就足以吊我们的胃口，我们就会孜孜以求。在国际会议问题上，河内竭力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参加，如果反不掉就设法把他的参加减少到最低程度。我们终于安排他扮演一种荣誉角色，既维护了他的尊严，又照顾了北越拘泥于国家主权的观点。

在最后一天的宴会席上，范文同对我这次访问及其结果表示“高兴”。现在已经事过境迁，我重温这部分记录时不明白是什么使他高兴。当时我自己的情绪有些消沉，不过还没有放弃希望。

经过十年残酷战争之后，大概不可能抱更大的期望了。河内和华盛顿互相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他们所受的创伤是有形的，而我们的创伤是心理上的，也许更难于医治。我们的东道主遵守礼节，但毕竟事情才过去不久，很难期望他们立时改变态度。显然他们在用过去进行战争的办法对待执行协定，那就是：搞一些小动作来测验我们的容忍程度，初步违反一下关键条款，以便试探一下看在什么地方可以建立新的力量平衡。而在我们这方面，尽管我们疑虑重重，但还是真心诚意地想作最大努力发展和平局面；由于过去的痛苦经验，不能轻易地再陷入一次新的对抗。人们对未来抱着一线希望，河内激于民族主义，为了在它的两个共产党施主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周旋获得较大的余地，它可能会寻求与华盛顿改善关系。范文同索取经济援助的执拗劲头也许是一种迹象，表明河内的统治者考虑选择建设自己国家而不去征服邻国的道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准备予以合作。但是我凭经验还是消除不了怀疑；我离开河内时不是抱着乐观心情而是暗下决心。我们乘车再次经过那个浮桥到嘉林机场，坐上那架苏制运输机飞往内排机场，总统的座机已等在那里。我们登上座机，松了一口气。河内湿乎乎的天气，极度匮乏的生活，到处都感觉得到的猜疑，这几点加起来使它成为我所访问过的气氛最使人压抑的国都。北越领导人那

种疑神疑鬼、躲躲闪闪的态度，妨碍开展真正的对话，我同任何其他共产党国家领导人会谈都不曾这样费劲过。我慎重地向尼克松作了报告，对巴黎协定的前途作出了我的清醒的估计：

他们可以有两种基本的选择，对此我向他们（也向中国人）作了坦率的陈述。一种选择是：他们可以把越南停战协定拿来当进攻性武器使用，不断破坏协定，步步进逼西贡，使我们面临几种困难的抉择。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们就会执行释放我们的战俘的规定，等到我们完成撤军之后，才撕下自己的假面具。他们将利用拖延谈判或明目张胆地破坏协定的办法叫他们的部队赖在老挝和柬埔寨；然后很快就发起新的进攻。他们估计我们缺乏国内的支持或意志来进行反击。

他们可以采取的另一种选择是：基本上遵守协定，采取渐进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将欢迎同我们建立一种比较建设性的关系，寻求我们的经济援助，集中力量搞建设，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将向其他印度支那国家内部的盟友采取政治的和心理的手段追求自己的目标。简言之，至少在几年以内他们将遵循比较和平的途径，让历史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意志。

北越人自然要宣布他们决心采取第二种选择，但这不足为信。从我同他们的会谈中我不能判断，蒙受了重大损失以及与自己的盟友隔离之后，现在有了获得援助的希望，他们是否准备求得一段喘息时间？对他们来说，理想的做法是同时采取两种选择，一方面破坏协定以追求自己的目标，一方面同我们改善关系以争取经济援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向他们讲清楚，两条道路只能选其一。这就是我此行的首要目标。我强调指出，第一条道路意味着重新与我们对抗，请他们休想一方面要我们的援助，一方面又想把印度支那吞下肚。^{*}反之，如果他们表现克制的态度并且恪守他们的义务，那么我们准备同他们搞关系正常化，象我们正在与北京所作的那样。而且我们将不干涉印度支那的政治自决，不论这种自决以何种方式体现。

要想成功地把船驶过这段航程，在最好的条件下也是难乎其难的。这需要我们举国团结一致，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有目标有纪

^{*} 这一句话暴露了温斯顿·洛德是这份报告的起草人之一。没有其他人能够出此妙语，妙就妙在它勾划出一个丑恶的形象。洛德另有一句针对河内谈判代表的趣话：“春水一条汉，独木不成林。”

律的美国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有能够在巴黎协定所包含的风险和奖励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水门事件很快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政府。

① 我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致黎德寿的一封信件中引证了他在几次秘密会谈中向我所作各项保证的原话如下：

——“越南战争和柬埔寨问题紧密关联；越南战争解决后，柬埔寨境内的战争也没有理由继续下去了”（九月二十七日）；

——“越南问题一旦解决，柬埔寨问题肯定也将得到解决，越南战争的结束将发生很大的影响，也许将导致柬埔寨境内的战争立即停下来”（十月八日）；

——“我们双方可以有这样的谅解，即：越南民主共和国将遵守以下原则：一切外国军队，包括它自己的军队，必须结束在柬埔寨境内的军事行动，从柬埔寨撤走，不得再进入”（九月二十六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将在柬埔寨遵循它在南越和老挝所遵循的同样原则，即：它今后不把部队、武器和作战物资运入柬埔寨”（十月十一日）。

② 参见《白宫岁月》第一四三二——一四三五页。

③ 巴黎协定第二十条的有关部分如下：

（甲）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各方必须彻底尊重一九五四年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和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所承认的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即这些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各方必须尊重柬埔寨和老挝的中立。

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各方保证不利用柬埔寨的领土和老挝的领土去侵犯彼此和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乙）各外国停止在柬埔寨和老挝的一切军事活动，从这两个国家全部撤出，并不再重新派遣军队、军事顾问、军事人员和输入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

④ 一九七三年初的时候，北越人向红色高棉提供军事顾问、一些作战援助（特别在操纵重炮和火箭发射器方面）、后勤行政支援、运输及其他后勤援助、军事装备和补给等。参见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丹尼斯·杜林一九七三年六月六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证词，载第九十三届国会一九七三年第一会期内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证词集《美国在柬埔寨的政策和计划》第八十五页。国防部的这篇证词曾遭到那些怀疑北越援助红色高棉的规模的其他证人所嘲笑。但西哈努克亲王不久前发表的回忆录不容置疑地证实国防部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参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著：《战争和希望：为柬埔寨申诉》（纽约：潘西恩图书公司，一九八〇年版）第一四——一五页、二十页、二十四——二十七页、七十一——七十二页。

⑤ 参见《白宫岁月》第一四一四——一四一五页。

⑥ 同上，第一一六九——一一七四页。

⑦ 参见马丁·赫茨著：《权威的报界与一九七二年的圣诞节轰炸：关于越南的想象与事实》（华盛顿：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一九八〇年版）第五十四——六十页所收集的材料来源。另见冈特·莱维著：《陷入越南的美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四一三——四一四页。另见《白宫岁月》第一四五四——一四五五页。

⑧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文章：《河内总理发表意见：美国有一部分人察觉到一种变化》，载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纽约时报》。另见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战线的后面：河内》（纽约：哈泼和罗图书公司，一九六七年版）第十八章。

⑨ 参见《白宫岁月》第一一〇九、一三八一页。

⑩ 参见注⑨。

⑪ 参见西哈努克著：《战争和希望》第二十一——二十三、六十四——六十五页。红色高棉一九七八年发表的一份文件也证实了这一点。见民主柬埔寨黑皮书：《越南侵略和吞并柬埔寨行为的事实和证据》（金边，一九七八年九月版）第五章第二部分（乙）。

第三章

中国：又前进了一步*

重访北京

我们坐飞机离开河内后直奔香港作四十八小时的停留和休息。我每次离开一个共产党国家(中国除外)时都有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人们从色彩单调乏味、沉闷划一、毫不照顾个人不同性格的环境中突然挣脱出来，紧绷着的神经顿时舒展，这时的感觉痛快极了。我在上文说过，河内算得上是最阴森森的城市了。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尽情纵欲的香港，它那丰富多采的物质享受把人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反映得淋漓尽致。

中国方面利用我在香港停留的机会十分巧妙地作了一次善意的姿态。这件事同时还说明，要想比具有三千年殷勤待客经验的中国人考虑得更周到是不可能的。香港是中国大陆上处于英国管辖的一块飞地，我们小心谨慎，未把在此地停留一事告诉中国方面。我们仍拟按照前几次访华的做法，去上海接中国所派的领航员登机。这意味着我们要绕道多飞行好长一段路程。

中国方面很有风度，情报也十分灵通。他们根本不提我们在香港停留之事，只是建议我们来广州接领航员登机，这对我们方便得

* 本章略有删节。——译者

多了。还怕我们不解此意，中国驻香港的高级代表（名义是新华社社长）用行动来表示，这块英国皇家殖民地发生的一切都瞒不过北京的耳目。他向我们的领事馆打听我离开香港的时间以便去机场为我们送行。他确实这样做了。

我们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下午飞抵北京，这是我对这个中央王国的第五次访问。那时我对北京已经很熟悉了。显然是由于越南战争已告结束，所以这次对我们的欢迎显得大为热烈。如今中国方面不必感到那么拘束了，而他们以前为了与战斗中的北越盟友表示同仇敌忾不得不如此。我们的东道主站在舷梯前面鼓掌欢迎我们下飞机。我们马上被送上汽车沿着北京宽广的马路往我们下榻的国宾馆急驶。车子通过宾馆大门时卫兵向我们立正敬礼，这还是第一次这样做。从那以后，每到有卫兵站岗的地方，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都向我们行军礼。

抵达宾馆不久，中国总理周恩来就前来向我们每个人问寒问暖，问我们有什么需要没有。中国人不象日本人那样穷讲仪式，但他们的礼节却细致周到，毫无逊色。对这种寒暄应该回答说“没有什么需要了。”这表示中国人招待十分周到，没有什么疏忽的地方。假如非要说点什么不可，最好是提点中国人自己根本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我的一位女秘书却毫无必要地回答了中国总理的话，她说想吃一顿北京烤鸭——这在我们历次访华时都是必有的日程安排。结果当然使她感到受宠若惊。可是从此以后我在职期间几次访华都吃不到北京烤鸭了——这是一个小小的教训：中国人不需要人家指点他们去做不言而喻的事！

这个小小的礼宾插曲无关宏旨，不必赘述，总之中国方面对我们真是优礼有加，无微不至。这一回举行文娱晚会时，他们饶了我们，没叫我们看革命样板戏。这种戏十分枯燥乏味，为了免受其苦，只好悄然打盹儿。（但为了避免出洋相，必须在最后一幕演完、

灯光大亮之前醒过来。据人家告诉我，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为图舒服而解开裤腰带打盹儿。结果睡过了头，掌声大作才把他惊醒。他一面提裤子一面又要鼓掌，弄得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这一次晚会的节目包括古典音乐，有西方的也有中国的，由文化革命后新近恢复的北京市管弦乐队*演奏。这支乐队企图——恕我采用这个字眼——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就连象我这样对中国的一切都钦佩的人，听了经过文化革命浩劫的中国乐师们企图演奏的田园交响乐，也实在无法表示恭维。说真的，有时候我简直闹不清楚他们到底演奏些什么，从哪个方向看乐谱的。不过重要的是这件事情的象征性意义：周恩来想要实现现代化，就是说想要挣脱中国直到不久前还受到的束缚，要中国不但采用西方的技术而且要理解孕育这种技术的西方文化。（但他这样做为时过早了一些。一年以后，革命样板戏又卷土重来；周恩来已经沉痾不起；现代化和对西方开放的呼声沉寂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毛泽东逝世。）

周恩来同往常一样机智敏锐，威严而灵活，富有幽默感。他对我表示热烈欢迎。从他面部表情的变化便知他不需要靠译员的帮助。（但他仍坚持要有一道中文翻译，这使他额外占些便宜，可把我的话听两遍，比我多一倍的时间来思考如何回答对方。）他对国际形势了如指掌。自从我与周在十九个月前结识以来，两人渐渐互相熟悉了，我对他不无倾慕之情。

（我在第一次会谈开场时说道）我想总理能看得出来，我一到您的跟前就感到特别拘束。

周恩来：为什么？

基辛格：因为我看到您对报界说过，敝人是唯一同您讲了半个小时的话而什么也未能讲出来的人。

* 应为中央乐团。——译者

周恩来：我记得我说的是一个半小时吧。

这类风趣对话表明，越南和平协定签字以后，中国可以无所顾忌地加快同我们接近的步子了。中美关系热乎起来这件事，当然与苏联的军事态势并非无关。沿中国边界部署的苏联部队已在一九六九年的二十一个师、一九七一年的三十三师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四十五个师。共同的危险使人们不再去计较细枝末节的事情；使中美关系向前推进一步显然是可取的，可借以显示我们对中国的领土完整是关心的。我在此行之前双方交涉过程中建议这次会谈的议程为：“关系正常化、当前世界形势；越南战争结束后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未来政策。”就是这样的议程，周还嫌不够广泛。他回话说，“双方感到兴趣的其他问题也可以讨论嘛。”不久以后就明白，所谓其他问题原来是：在双方首都互设外交代表机构问题。

自从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冲突第一次使我们警觉到同北京恢复接触的可取性以来，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程。为了物色一个双方都信任的中间人，足足花了一年半还多的时间。我们起先以为北京喜欢通过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途径；于是我们选择了罗马尼亚。谁知中国人十分不放心苏联对东欧各国共产党渗透的情况。结果他们给我们的重要信息是通过巴基斯坦传递过来的。巴基斯坦是世界上唯一同美国结盟也同中国结盟的国家。

一九七一年七月我秘密访问北京时，双方重建了直接联系，并决定总统将访问中国。那时双方还都十分拘谨，不交换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一九七一年十月我第二次访华时，在为尼克松的访问作准备的名义下周周恩来同我开始深入交谈世界大事。你说怪不怪，双方居然能够共同进行外交政策分析，特别是考虑到那时北京在美国眼里还根本没有法律地位呢。在法律上，华盛顿当时还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为中国政府；我们同台湾缔结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军事力量还驻扎在那里，而人民共和国认为台湾是它

的领土。但是北京不顾这种对它的合法地位的冒犯而同我们打交道，以便抗衡苏联对它北部边境的威胁。在尼克松一九七二年二月访华结束时发表的上海公报中，我们和中国方面就一项精心拟订的措词达成协议，既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又把问题留待将来解决。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暂时从属于上海公报所称的反对其他国家在亚洲称霸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国家够格儿做这种恶行，那就是苏联。讲得明白一些，就是中国和美国同意有必要执行并行不悖的政策维持世界的均势。

尼克松的历史性访问一年之后，一九七三年二月的这次访问是在有利的形势下进行的。如今我们已经卸掉了越南战争的包袱，而且尼克松刚刚以压倒的优势再次当选总统，因此中国方面觉得可以放心与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打四年的交道。台湾问题不会拖住我们太久。我指出——正如我们在上海公报中所表明的——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为支持我们在那里的行动而部署的军事力量也将撤走。周说中国“目前”无意用武力解放台湾。于是双方决定把这件事就这样完全搁在一边，转而谈全球性——对周来说就是苏联——问题。双方讨论问题时的坦率程度就连亲密的盟友之间也是少有的。

对于周来说，中国与苏联的矛盾是消除不了的，也是中国独家的力量对付不了的。谈到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党总是说它那个意识形态能够结束国际冲突，其实呢，反而闹得不可开交。那些建立在所谓不可能有错的真理基础之上的体系，其内部只能容许有一家的权威性的解释；要是另有一家出来宣称它才代表真正的正统，那就非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可。莫斯科和北京之争已经达到了这一步，所争的无非是由谁来当那个“堂主”来指引世界各地共产党和激进党的政治方向。双方的冲突已达到了这种地步，只有一家向另一家甘拜下风才能罢休，而这是不

可能的；再不然就得一家打败另一家，在北京看来这正是莫斯科的意图。

另一方面，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冲突还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范畴，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这两个辽阔的大陆国家的共同边界从西伯利亚冻土地带到中亚细亚荒漠划出一个大弧形，长达四千英里。这条边界线蜿蜒经过历史上曾经征服过这两国的民族——匈奴、蒙古人、哈萨克人——的发源地，把广大地区割裂分属两国而毫不顾及种族和语言的关系。沿线两侧的人们往往操同一民族语言，既不同于俄罗斯语也有别于汉语，从而更扩大了这两个政权的不安全感以及潜在的敌对意识。在这个分界甚不明确的广大地带，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还是一个新东西；历史上随着角逐集团的野心和势力的消长，边界一直变动不居。中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被沙皇所吞并，现在由克里姆林宫的新统治者所管辖。这些新统治者拒绝了其前辈的全部遗产，而唯独没有拒绝他们征服所得的领土。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中俄两国互相猜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个人之间相互不服气交织在一起，使得固有的敌对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

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能够忽视人口方面的现实情况。数达十亿的中国人挤压着一条边界线，而这条边界线是他们的政府官方表示不予承认的——中国的中学教科书里说西伯利亚的大片地区是属于中国的。边界另一边荒凉的西伯利亚境内只有区区三千万俄国居民。由于这里条件极端恶劣，苏联各族人民不愿来此定居，所以历史上一直是强迫那些服苦役的流犯去那里开拓殖民地的。一九七四年我经过东京、大阪、汉城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访问。我到那里一看，大吃一惊，原来不是一个熙熙攘攘的亚洲城市，而

* 即海参崴。——译者

是一个欧洲式的省城；实际上它的地理位置离檀香山较近，离列宁格勒反而更远；而离北京比离莫斯科更近得多了。我才理解苏联领导人面对着中国感到前途不妙、无可奈何的心理，何以发展到了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

同样的道理，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能够无视战略上的现实情况。苏联自从一九六九年以来沿中国边境大量增兵，还拥有大规模毁灭力的先进武库作后盾，这绝不表明它有和解的意图。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乃是地缘政治上长期争夺所致。

任何谈判都改变不了苏联在军事上所占的优势，这种局面将持续几十年；同样也改变不了中国在人口方面的优势，而这种情况将永远持续下去。假定达成了协议，即使苏军逐步撤退了，他们随时还能够在几周之内卷土重来。另一方面，中国即使在边界问题上暂时作了“妥协”，也难保苏中两国在亚洲的力量悬殊情况到了下一代不会渐渐拉平，最后发生转化；从那时起西伯利亚的前途就要越来越依靠北京的善意了，可是没有一个中国政府能够保证永远这样呀。当然，要是美国外交上搞得不好，或者我们显得自己无能，那就有可能驱使中国和苏联搞在一起。但无论它们的共处采取何种格局，也不大可能叫人看起来是自然的或者成为永久的——不过这种格局持续的时间可能长到足以给我们带来严重的损害。

中国领导人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善于分析国际形势的行家之一，他们对这些现实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看不出有同苏联妥协而不受其害的任何可能性。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中国国策的最起码目标必须防止任何别的大国同苏联搞在一起；如果能够游说这样的国家把自己的力量加到中国方面来，那就更好了。根据他们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不能排除别人踩着中国的身上解决彼此分歧的可能性；一九七一年我秘密访华时，周恩来的确曾

经具体提到过这种可能性，即欧洲、苏联、日本以及我们也许会联合起来再次对中国进行瓜分。但他表示：第一不怕，第二有信心能够打败这一切野心。这种态度很说明问题。中国求得安全的办法是：宣扬它威武不屈的气概，制造一种大致准确的印象，即它将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自己的荣誉和领土完整。它似乎认为，哪怕作最小的让步，都可能使自己顺着—个斜坡越滑越远，因此必须把这当作是向国家生存的公开挑战那样，坚决顶住。中国认为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就必须孤立苏联，把尽可能多的力量团结在自己—边——这就意味着与美国迅速接近。

中国领导人专心致志的态度使得我们同北京打开关系顺利得多了；却也使我们此后的关系复杂化了。并行不悖地致力于遏制苏联这一战略目标，并不排除双方采取不同的方式、策略以至于观点。对中国来说，意识形态上的不可动摇性乃是对内实行控制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对付外部压力的一种武器；对外政策和国内的需要，这两方面是一致的。可是我们呢，刚刚摆脱了把我们自己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的越南战争——在战争中美国领导人的和平诚意成了国内的关键问题——因此不容许我们显得又跟别人寻衅的样子。尼克松政府决心冒必要的军事风险来阻挡苏联的扩张。然而只有在我们证明自己为防止对峙已作了一切诚实的努力以后，我们这种政策才能在国内以及在我们的欧洲及日本等盟国那里通过。我们也不能放弃哪怕十分渺茫的希望，即一九七二年实现的美苏关系稳定化，将逐渐导致一个以军备达到平衡、双方行为克制为特点的、比较积极的时代。我们绝不可忘记，那些拥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武器的国家负有在这个地球上共处的道德上的义务。因此美国的策略必须更多样、弹性更大些，而不能象中国那样采取正面进攻的态势——这就是毛泽东在此后的一次谈话中所挖苦的“打太极拳”的意思。

另外，中美双方对待国际关系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中国的态度符合欧洲政治艺术的伟大古典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冷静而不感情用事地估计保持均势的需要，而不受意识形态或感情冲动的影响。他们是善于搞平衡的大师，又是精于进行对比的艺术家。他们深谙均势之道，懂得各种力量处于经常变动状态，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只有一个原则是决不动摇的，那就是：不能容许任何国家的力量哪怕在一个短暂时间内超过能够纠合起来与之对抗的力量组合，因为自己的独立和个性在这短暂疏忽时间内就可能永远断送掉了。中国决不肯冒险把自己的生存押在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强国的善意上面；它必须采取行动来对付潜在的危险，它认为听任一个假想敌建立起无比的力量就是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

美国则既缺乏这种观念上的素养、也没有这种历史上的背景来采取如此冷静的政策。美国的外交政策思想由许多不同的因素所构成，迄今这些因素全都与只考虑国家利益和强权关系的观点格格不入。美国人民醉心于理想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支持诸如使世界得以安全地推行民主、保障人权这一类伟大目标。按照美国的实用主义，“乱子”出来时要根据其“是非曲直”来对付，换句话说就是要等到出了事才说——这与中国人的态度截然相反。美国人历来的传统是把国际冲突等同于法律上的纠纷，主张提交法律机构解决。中国人认为这种观点太幼稚，他们把国际法看为全球均势的反映而不是其根源。由于美国历来不易受到外敌入侵，所以我们很不习惯于搞均势的观念，不习惯于由此种观念所派生出来的思想，即：必须在祸患初起时及早对付（那时事态的危险性还不很明显），以免积成巨流费大力气也未必制止得了。我们这些在尼克松政府里任职的人觉得，要教育美国人民理解搞均势的必要性实非易事。此中的含意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是扶弱抑强，哪怕

争斗的双方是共产党国家，我们对它们的国内政策都不赞同也罢。这意味着我们应该防止苏联侵略中国，在此种事件发生时则应加以制止。

然而，即使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公众实现这种理智上的飞跃，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和观点仍然大相径庭，必须进行细致的协商，防止发生不必要的刺激。莫斯科在意识形态方面与美国为敌已有很长的历史；每一本列宁主义教科书都咒骂我们。但苏维埃的理论思想并未硬性地具体规定打倒我们的日程；这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美国与中国都是苏联的心腹之患，但美国是比较长远之患。一九七三年时美国在军事上仍然比苏联强大，就可动员的力量而言，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仍将保持对苏联的优势。

所以美国拥有中国所没有的一点活动余地。苏联与我们对抗时，只要我们让它充分了解我们的决心，它就很可能知难而退；它也不大敢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假如苏联把眼光只限于自己国土以内，那对美国就不会形成不可制止的威胁。对我们构成危险的是，苏联军备增长的速度将推动它的全球冒险主义而侵略别国。我们与中国人不同，我们能够不靠别人援助而独力抗衡苏联的军事力量和阻挡苏联的冒险。凭我们在生产能力上所占的优势，加上我们盟国的，可以比苏联生产更多的东西。而且只要我们明乎自己的利益所在——根据近年的情况，这一点颇为重要——我们是拥有遏制侵略行动的手段的。因此美国可以选择拖一段时间的办法，看看在苏联受到坚决拦阻的情况下以及在它处理自己的内部矛盾时，苏联的制度会发生什么变化。

北京可就享受不到这种有利条件；它受到的威胁更加迫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它最险恶的时机是在它平息了内部动乱、经济开始稳步增长的时候。这将使苏联面临这样的前景：经过一段可以明确预测的时期，中国将成为无法对付的障碍，特别是在它联合

其他与莫斯科为敌的国家的情况下更其如此。每当中国的力量显得很顺利发展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就会急不可耐地企图对它来一个先发制人的打击，除非中国准备对苏联作重大让步。苏联无需等到自己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增长，它现在就有能力进攻中国，哪怕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西方较量的程度（指一九七三年而言）。中国领导人可以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他们也只好硬充好汉；他们宣称莫斯科不过是“声东击西”。拿这个论点与人讨价还价是很高明的。但是他们何等地精明，岂能低估自己的险情；他们的行动就与自己的论点不一致。（不过他们也并不十分坚持这个论点就是了。）于是不论我们同苏联谈判的动机是什么，也不论我们把道理讲得如何透彻，北京总是说推迟与苏联摊牌不利。在它看来这种摊牌是不可避免的，但光靠它自己又无力真正地抵挡，除非它准备落得个从此一蹶不振的下场。

美国与莫斯科交往，这对北京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一定的风险。就算中国人对尼克松以及作为他的代表的我个人有一定的信任，但他们对我们的后继人不放心，不知他们将来会如何利用我们在这两个共产党国都之间获得的行动自由。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严肃的搞均势的政治家会轻易地把本国的安全押在对个人的信任之上。站在中国的立场，美苏关系越坏，中国越没有必要担心发生美苏勾结起来共同主宰世界的那种战略性灾难，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也就越强。

越南战争结束之后，这些理论性的设想与北京的利害极有关联。只要克里姆林宫还在提供武器给河内同美国进行恶战，莫斯科和华盛顿接近的可能性就受到内在的限制。而且美国会不时在印度支那采取某些激烈行动，迫使苏联不得不作出反应，哪怕只是放慢它同我们之间的外交活动也罢。周恩来是一位外交巨擘，越南战争限制了我们的选择余地，这正中他的下怀。反过来说，越南

战争结束后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局面：美国的选择余地将增加；实际上要比北京的余地大。我们同莫斯科以及同北京的关系比它们两家之间更密切——对于一个几百年来实行“以夷制夷”策略十分得心应手的国家来说，这种情况使它够恼火就是了。

周氏何等聪明，岂能把中国的困境暴露于人前。他懂得，如果美国与中国能对世界形势作出并行不悖的分析，以后两家就会自动地采取适当的行动，反之如果双方作不出那种分析，那么口头上的保证也就毫无意义了。于是周氏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对形势交换意见。日常关系十分密切的国家之间也不可能象我们双方那样谈得如此深、如此坦率，而正是这种开诚相见态度才是我们弥合不同观点的最可靠保证。

周氏用提问的方式拐弯抹角地谈出了他所关切的事情：在亚洲我们是否也打算强调遏制方针？还是企图通过让两个共产党大国斗得两败俱伤来获得自己的安全？如今越南战争已经结束，我们是否准备对苏联扩张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是西方打算有意安抚苏联，企图“把苏联这股祸水东引”——即鼓励或者至少默许它威胁中国？

说实话，周氏的困境与他所讲到的略有不同。抱着理想主义的美国人，甚至那些狂热的反共分子，都不至于如此不近人情地故意挑动中国和苏联火并。另一方面，象尼克松这样的美国领导人，他们虽然基本接受搞均势的方针，却不一定能贯彻他们的信念，即：为美国自己的切身利益计，必须防止中国遭到肢解或者屈辱——即使中国不是我们的盟国，不久前还是一个敌国，而且看不出它将来有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可能也罢。

就尼克松和我两人而言，对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将始终服从于美国国家利益这一坚定的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些利益包括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假如苏联打垮中国的企图得逞，对世界均势的灾

难性打击绝不会小于苏联征服欧洲的后果。一旦看清了美国无力防止在亚洲的重大侵略事件，日本就会开始与我们疏远。面对着今后可以放手集中全部力量对付西线的苏联这个巨物，欧洲将丧失自信，它的各种中立主义倾向就会急剧抬头。东南亚也将随这股大流走；中东、南亚、非洲以至美洲的激进势力将得势。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希望鼓励苏联进攻中国。依我看来，我们除了帮助中国抵抗之外别无他途。

但是我也知道，在七十年代初期这种主张还不为美国大多数公众和领导层的舆论所熟悉和赞同。因此关键在于必须首先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有形联系。

我向周恩来阐明了这些考虑，那是我向外国领导人把我们的外交政策介绍得最坦率、最全面的一次。我向这位中国总理强调指出，尼克松和我都不对苏联的动机抱有幻想，希望中国方面不要因为我们的战略有时需要作一些策略上的动作而产生误解。我说道：

有两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其一是（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如果确实如此，倒也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如今情况似乎更多地朝着第二种可能性发展，那就是苏联决定采取比较灵活的战略以达到下列目的：通过散布和平幻想来麻痹西欧；利用美国的技术来克服苏联军事实力和经济能力之间的不平衡；通过制造缓和空气的办法来阻挠美国维持其军事实力；把不受这种缓和政策所欺骗的敌人孤立起来。

“譬如中国？”周氏插问。

“我尽量说得婉转一些，”我回答并继续说下去。

那么我们的战略又如何呢？……我们认为现在看来对苏联意图的第二种解释可能最符合实际情况。首先我要非常坦率地讲，正如你们从自己的情报必然得知那样，我们由于越南战争在国内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所以在很多场合下我们只好进行迂回而避免正面对峙。如今越南战争已经结束，特别是如果这种解决方式不至于给美国经常带来冲突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外交政策的根本问题上来。总理先生您一定也注意到了，就在最近一段

时期,对于苏联的直接挑战我们一律作出了最强烈反应。……

什么是我们的战略呢?首先,我们必须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果,才能团结我国人民,树立我们能够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的信誉。第二,我们必须在不致使美国丢面子的条件下结束越南战争。第三,我们要改进我国的军事系统,特别是在战略力量方面。……第四,我们终归要设法使苏联暴露它的挑衅者真面目。第五,我们有必要使我国人民对某些新鲜主张习惯起来。

所谓“新鲜主张”就是:为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必须在总体上维护全球均势,在具体上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我们可能还必须对挑战进行反击,即使在法律上我们没有义务非这样做不可。

与此同时,我在阐述美国政策时也设法说明,中国和美国应根据各自的处境采取不同的策略执行并行不悖的战略。我已经说过,美国无意不分青红皂白地对苏联实行一味对抗的政策,如同中国所必然乐于看到的那样。我们没有必要使自己成为供北京打的一张牌。应该使中国相信,它可以指望得到美国的支持来对付苏联对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直接压力和威胁;但是不要让它牵着我们的鼻子进行不必要的摊牌。这种策略执行起来当然很复杂,但是无论我们是接近莫斯科还是接近北京,总比让它们两家互相接近对我们更有利——不过万一发生苏联进犯中国事件时则另当别论。

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自己也不要受引诱,去打中国这张牌。如果我们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是为了去刺激苏联,那就会招致双重危险:一方面可能惹起苏联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这种灾难正是我们努力要避免的;另一方面北京可能感到寒心,它会觉得我们现在固然加强同它之间的关系来对付苏联的蛮横态度,将来同样也可能松弛这种关系来迎合苏联的和解态度。这样一来就把中国从天平上的砝码变成讨价还价的物品——这是完全违背我们争取与中国接近的初衷的。

我着重说明，尽管中国方面对此有保留意见，我们方面还是要设法与莫斯科谈判，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共同利益的。不过我们事先会向北京打招呼；我们将认真考虑中国的意见；我们绝不搞针对中国的协定。我说我们准备同苏联搞以下三类协定：一、有助于缓和象柏林这样的危险地点的紧张局势的协定，我们认为这样做总的对我们有利；二、象不久以前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这符合双方也符合大家的利益；三、在技术上有用处但对双方都不具重大政治意义的协定，譬如文化、科学交流及贸易方面的协定（不过这些协定都须经严格的战略控制以及遵守一定的政治条件）。

这位中国总理不放过任何漏洞，他插话说：“但也可以讲这是与苏联企图麻痹西欧、使之丧失斗志的政策一致嘛。”

“我承认，”我回答说：“双方都在对某些趋势赌博。苏联相信它能使西欧丧失斗志，麻痹我们。我们则相信这种政策可使我们赢得行动自由，而这种行动自由正是我们在那些最可能受到进攻或压力的地方进行抵抗所需要的。”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他要我们带头组织一个反苏同盟，从日本到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西欧连成一条线。这种设想是正确的，但光是号召是实现不了的。尼克松和我都同感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这三国的重要性——但是此后五年的情况显示，美国国内很少人支持从世界均势的观点来看待关键的盟国。（国会于一九七四年通过了一项法案，对我们的土耳其盟友实行武器禁运。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也因国会的反对和公众的漠不关心而难以为继。伊朗则因美国新政府袖手旁观、无计可施而垮掉了。）对欧洲和日本还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因为它们在有关全球均势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大听得进中国的以及美国的忠告。可是美国的保守派一定会发现这位中共总理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倒与他们的看法有颇大的共同点。他对同苏联谈判的意见表示鄙夷。在他看

来，苏联的扩张主义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同它谈判只能导致混乱。不管美国如何动作，中国认为自己有责任揭露苏联的动机，从而提供联合抗苏的构想。

这篇文章要做下去不容易啊，特别是因为周恩来一语道破了我们政策的模棱两可之处。一方面我们必须表现灵活性，以防美国被本国的公众或盟国指责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而陷于瘫痪。另一方面，周恩来说的也对，缓和可能麻痹西方，使苏联可以抽出手来全力对付中国，并且破坏大家的斗志。那么究竟哪一个危险大一些呢？这个问题无论在我们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中或者在我们国内的辩论中都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不久以后水门事件掀起的轩然大波冲击了一切。

纵论天下大势

周恩来和我从相似的前提、不同的处境和平行的战略出发，纵谈了世界形势。这位老革命家一心一意要遏制苏联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持增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团结和实力，而不问那几个主要国家代表何种意识形态。

例如，在我首次访华后的十九个月里，周恩来对日本的想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已经记述过，当初他把日本描绘为可能参与瓜分中国的潜在的侵略国。他曾指控我们蓄意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他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曾攻击日美安全条约。^①到了一九七三年二月，尽管周恩来口头上依旧讲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实际上已渐渐把日本看为盟友。（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时，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这个行动曾受到我们鼓励。）如今周恩来承认日本与美国的关系抑制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使日本获得不可缺少的安全感。他提请我注意北京已停止

了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攻击；的确，中国现在反而敦促美国与日本保持最密切的合作。毛主席后来还好意地劝告我要照顾日本的自尊心，访问北京时不可不在东京也停留一下。我们已经决定这样做。到我离职时我访问东京的次数超过了其他任何主要国家的首都。

双方对西欧形势的见解完全相同；会谈主要环绕如何遏制苏联的问题。由于我研究欧洲问题达二十年之久并且认识许多欧洲领导人，所以周恩来就欧洲的政治、政策和人物向我提了不少问题。最近有一些欧洲领导人应邀访问北京时感到愕然的是，东道主给他们上课，大讲欧洲统一、大西洋团结和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务的重要性。在那以后我常常半开玩笑地称中国是我们北约中较好的盟友。

周恩来对均势问题深有研究，但他对欧洲各国的态度难以理解，因为现在的情况与他所记得的二十年代的情况大相径庭。他不懂为什么欧洲那么不愿意把自己的经济力量化为军事实力，为什么它本来有力量保卫自己却非要依赖一个远方盟国不可。很明显，如果中国拥有与欧洲相当的经济力量，它是绝不肯依赖别人的。由于周恩来判定欧洲虽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是军事实力不济，心理上不稳定，于是他敦促我们要分清事情的轻重。他力劝我们切勿让大西洋两岸的贸易纠葛妨碍抗苏的防务合作。他提意见说，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应该明智一些，要分清形式和实质，分清正确的独立主张和不可靠的顺从态度。他说我们有必要对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另眼相待；法国闹独立性可能使我们恼火，但是我们切勿忘记法国执行的外交政策是欧洲最强硬的，这无疑增进了西方的安全。周恩来强调，无论法国的做法有时多么令人不快，但我们决不应该忘记，一个强大的法国还能牵制德国不被莫斯科拉过去。原来周恩来与西德的几个盟国有同样的看法，认为维利·勃兰特总理的东方政策（指他同苏联、东德、波兰等东方国家签订条

约)包含很大的风险,因为这种政策起初表现为和解的姿态,逐渐可能转化成为自行其是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这种情况可能使欧洲沮丧。

周恩来十分看重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其人。他抓住希思这一话题大谈起来,表示中国往往比较喜欢保守派领导人而不喜欢社会党领导人;他认为保守派不大容易上苏联的当,在加强防务方面也较少遇到国内的压力。周恩来对欧洲特别不放心,怀疑它想把莫斯科这股“祸水”东引。中国方面显然希望美国防止这种危险。但他们讳莫如深的是,如果他们真的怀疑我们也暗藏这种祸心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能满足他们的希望?

双方一旦明确了在遏制苏联势力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之后,对印度支那就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了。周恩来心里明白,如果巴黎协定遭到破坏,便有可能出现两种不利的情况。战争重起,将使中国左右为难。一种情况是为了北越的缘故使中美关系陷于风险中,但它又十分不信任北越。另一种情况对北京更不利,那就是:河内不战而胜,实现其对印度支那的霸权,使美国成为纸老虎而在国际上名誉扫地,从此一个强大的越南将在中国南部边境上崛起,这个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华情绪,它的军事装备完全仰赖苏联供应。

现实的情况是,美中双方在印度支那具有近乎平行的利益。一个统一的、在印度支那占支配地位的共产党越南对中国真可谓是一个战略上的恶梦,不过中国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苦衷,不好明白吐露此中的真情罢了。由此可知周恩来关于要严格实施巴黎协定的表白是真诚的,因为如果协定实施得好,将使河内无法实现其霸权,同时将有老挝、柬埔寨和南越这三个独立国家对它起缓冲作用。很有意思的是,周恩来所一贯主张的停火方案与我们实际争取到的大同小异,这种方案不可避免地有着允许南越政府存在下

去的心照不宣的含意。与我们国内许多反对派相反，他从未压我们推翻阮文绍和建立听命河内的傀儡政权。

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周恩来一上来便采取他所喜用的手法表白他未与河内串通一气。这种手法曾在一九七二年历次危机中都使用过。他否认对这两国的情况有何特殊的了解——鉴于中国方面为了同美国领导人会谈所作准备工作的深入细致程度，以及他们同印度支那的历史关系，这是说不通的。不过他可以用这种借口进行搪塞，而无需道出他与河内的分歧。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所强调的意见倒很切合实际。在老挝问题上，周恩来希望老挝王国政府与巴特寮的谈判取得成功，产生一个真正中立的联合政府；中国欢迎早日实现停火。他高度评价老挝国王沙旺·瓦达纳（称他是“一位诚实的爱国者”）——可是这位国王却不是河内所喜欢的人——并且支持中立主义首相梭发那·富马的合法地位。换言之，中国赞同我们对老挝的主张，即：成立一个独立于河内的中立与和平的非共党政权。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所进行的一项极不寻常的工程曾使我们感到神秘莫测。在这方面周恩来也稍稍揭开了帷幕的一角。中国士兵近十年来在老挝北部中老边界附近穿过深山密林修筑一条公路。多达二万名的中国士兵在中国的高射炮部队掩护下在另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上参加这项工程。富马常对我们说这条路是违反老挝意志修的；中国人则宣称这是根据先前的一项协定施工的。我一直不清楚法律上谁是谁非。富马拒绝公开表态说明这条路是未经授权而施工的；他到底是害怕呢，还是不愿吐露实情，那就不得而知了。北京不肯把老挝批准修路的证据拿出来；我们也无法知道到底是因为它不愿意我们过问它在自己边界附近的活动呢，还是因为根本不存在明确的证据。

但是不管怎么说，到了一九七三年二月的时候，关于中国人在

老挝修公路问题，我们更感兴趣的已是它的战略用途，而不是它的法律地位。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闪烁其词。在越南战争的大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以为这条路是为了向河内所控制的巴特寮运送补给而修的。我们曾数度作出计划——但从未付诸实行——要轰炸这条路。后来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从来没有补给物资顺这条路运送下来过，而且这条路位于向前推进的北越军队的侧翼。我假借向周恩来转告泰国担心这条路是针对它的方式提出我的理论。他答称中国愿意与曼谷建立良好关系，筑路工程将继续下去，但这条路修到离泰国边境很远的地方就会停下来。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修这条路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遏制、并在必要时威胁河内了。原来在整个越南战争年代里，北京一直在老挝境内在挺进的北越军的侧翼建立自己的立足点，以便抗衡它那个所谓的盟国统治整个印度支那的企图！

我们进入柬埔寨问题的讨论时，中国同河内的裂痕就更明显了。中国的官方立场与河内的相似：那就是支持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名义领导人的共产党暴乱。但相似处到此为止。河内待西哈努克如同共产党红色高棉所勉强收容的附庸；周恩来却待这位亲王为上宾。因此周恩来并未——而且也的确不可能——象范文同和黎德寿那样蛮横地要求我们推翻金边的朗诺政府。周恩来对柬埔寨局势了若指掌，岂能不懂得，要让西哈努克起平衡作用就必须让可供平衡的两派对立势力继续存在才行。周恩来讲出下面一番话是很自然的：

我并不是说他（指朗诺）所代表的力量不算数。……我们理解我们各自的方针。因为柬埔寨目前完全赤化是做不到的。如果硬要这样做，结果将造成更大的问题。

一位以革命发源地自许的国家的领导人，竟称共产党完全控制一个国家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岂非咄咄怪事？但这很有道理。如

果共产党完全控制柬埔寨，就会使西哈努克起不到作用，就会破坏西贡的士气，就等于把印度支那拱手让给河内。

从周恩来的态度看来，我们还有可能达成一项实际的协议。达成协议后如果朗诺所代表的力量还能够存在下来，那就有东西可谈了。如果满足了我们的先决条件——即：不能把从前依靠过我们的人交给共产党统治——西哈努克就有可能作为两个对立势力之间的联结人和平衡者发挥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我建议让朗诺政府的一名代表与西哈努克的首相宾努立即会晤，就联合政府的构成问题进行谈判。我说我们并不坚持非让朗诺本人参加这个政府不可，只要他所领导的力量有代表参加就行了。

周恩来回答说，柬埔寨的问题很复杂。他说这不单纯是一场内战；外部力量（意指北越人）插手很深。西哈努克所领导的义军方面也有许多派，具有不同的观点（指有的人——红色高棉——拒绝任何妥协）。义军方面并非每一派都同意让西哈努克扮演居间的角色（意指红色高棉顶多只准备利用他当挂名领导人）。不过周恩来答应把我们的想法转告有关方面，主要是西哈努克，“我们要用自己（中国）的话去说”——意思是在转达我们的主张（仅仅几天以前这个主张已被河内领导人所拒绝）时，他将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同意。周恩来答应在与有关方面协商后再同我们联系。这是中国第一次表示想在印度支那和平谈判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因为中国在柬埔寨的利益很凑巧地与我们的利益相一致，甚至比我们更加迫切。我们之所以要求河内遵守巴黎协定，主要是因为这涉及我们在世界上的信誉。对中国来说，这涉及它的国家安全，涉及在它的南部边境上将崛起一个武装精良的强国，该国拥有五千万人口和一批与苏联结盟的头脑狂热的领导人。从这个意义上看，柬埔寨是在印度支那起关键作用的国家；它如果垮掉，南越也就完蛋，从此河内的霸业就完成

了。因此周恩来所主要关心的，倒不是红色高棉的胜利，而更多的是如何设计一种结构来确保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他懂得我们面临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使柬埔寨各派从互相仇恨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以免兄弟阋墙之斗同归于尽，断送自己国家生存的一切希望。

周恩来说，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个目标。问题是如何加以实现。我乘机提醒周恩来，取得一种体面的结果何以对美国十分重要，也符合共同的利益，其理由并且超越印度支那的范围。我说：

美国仓促地撤出东南亚将酿成一场灾难。……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内最艰巨的任务，就是设法维持美国对世界均势所负的责任，也就是维持美国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政策。所以，假如美国执行的是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分子张目的政策，那就不好了。

周恩来对此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他在此后几个月里所采取的行动似乎表示他同意上面所讲的。

互设联络处问题

随着我们的政策与中国的政策开始朝着平行方向发展，双方现有的联系途径显得很不方便、很不够用了。由于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为美国还承认台湾），我们一直通过两个途径进行联系。日常事务大都在巴黎办理。北京驻巴黎的大使黄镇是一位前将军，参加过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我同他秘密会晤很多次，与他很熟。他的对手是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阿瑟·沃森。在尼克松当政时，至少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与几个主要外国政府之间特别机密的信息都是通过白宫直接掌握的特别的“后门渠道”传递的。我们同中国联系的后门渠道是通过设在纽约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该团自一九七一年以来一直由杰出的黄华领

导(后来他擢升为外交部长)。

起初,北京坚持说巴黎渠道好一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渠道只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大概它不愿意让我们在不给予外交承认的情况下获得有个中国大使馆的好处。不久以后,鉴于加快联系的必要性和进行坦率讨论的重要性,双方把“紧急情况”的定义越来越扩而大之。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三年五月,我曾数十次秘密去纽约同黄华面对面会谈,地点通常是在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位于曼哈顿中区的一所“保密房舍”——其实这里是一套很不象样子的公寓房间,房间四周镶着镜子,这就说明它是为不怎么高尚的用途而设的。

这种销魂密窟怎么适宜搞外交?另外,如果我们共同的战略估计是正确的话,那么北京和华盛顿就有必要用戏剧性的方式来显示两国确实在互相靠拢。从北京的观点来看——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也一样,但须正确加以理解——这种公开姿态发出的信号是:谁要是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美国决不会漠然置之。

一九七三年二月我来到北京时,并没有带来使看得见的接触增加的明确计划。我本来打算建议采取某些气派不大的步骤,譬如在中国设立美国贸易代表处;当时我们仍以为,只要台湾代表还在华盛顿,北京就不愿在那里开设任何办事处。不料周恩来决心向前跨一大步,使我们两国建立事实上的外交关系。他遵循这个中央王国的优良传统,使这个建议显得是由我提出来似的。这使我不胜荣幸之至,也使我对办成这件事发生了利害关系。但还只能勉强地这样讲。

当我们谈到双边关系时,我提及设立一个永久接触点的好处。周恩来装成略感兴趣的样子。他问我有没有什么点子。他对领事机构不感兴趣,嫌它太技术性了。贸易代表处的任何变种也打不动他的心。他显然想强调政治关系而非贸易关系。于是我把本来

是为河内准备、不料到了那里却被毫不客气地拒绝的关于互设联络处的想法端了出来。在范文同的眼里，我们还不够格儿与河内互设常设机构和接受它的经常性烦扰呢。周恩来一听就有门儿了。其实我并没有讲得很具体，也不敢贸然提出我们在华盛顿给对方以互惠。我一心以为只要什么地方驻有台湾的代表，北京的使节必然不会去。

周恩来说他将“考虑”我所提关于设联络处的“建议”。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我正式提过这种建议没有。第二天他就“接受”了，而且还巧妙地多做了一点文章。他说中国一定要得到互惠；中国也应在华盛顿设立一个联络处。他预备立即讨论有关的技术事项——这就暴露了他对我们这项“建议”考虑得比我们自己还多。据一位观察家的评语，周所设想的联络处“虽无大使馆之名，却有大使馆之实”。^②联络处的官员享有外交特权；他们可以使用密码通讯。双方联络处主任享有大使待遇，可以办理两国政府之间的一切交涉。联络处不列入正式的外交团，不过这反而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使它们享受特别优待而不致于违反既定的礼宾规格。

原先设想是联络处主任由中级职业外交官担任。尼克松和我经过考虑，决定委派我国最得力的大使和最有声望的社会名流之一的戴维·布鲁斯。他将体现我们对这个职务所寄予的重要性；我们对他完全信任，让他预闻绝密的情报。他不需介意无日常事务可处理。一般人可能以为，日常事务越多就表示工作越重要呢。他具有必要的智慧和经验足以保证联络处完成其主要任务：使两国首都的不同观点之间保持最大程度的和谐，应该考虑到中美两国信奉互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经历过截然相反的历史，如今却由共同的需要而联结在一起。

周恩来相应地把黄镇从巴黎调回委以斯任。我非常喜欢这位热情而机敏的人，他的业余爱好是绘画。象所有的中国外交官一样，

他严守纪律。然而他总是善于在按照上峰指示行事之余传达一些耐人寻味的意思。特别是在越南停战谈判进入最复杂的阶段时，他极出色地传达了中国方面未见减弱的善意，同时又不影响他的政府与性情暴躁的河内盟友的关系。哪怕后来由于双方国内的压力使得我们经历了一些困难时期，他也有办法在双方关系中注入信任感。双方各自把最优秀的人选派驻对方的京城，显示了它们对发展双方关系十分重视。

双方对维持世界均势的共同关切态度要求彼此之间建立经常而密切的政治接触，可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却妨碍双方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使这个难题迎刃而解的办法了。双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必须等到对台湾问题达成协议之后，这条原则仍然不变。但实际情形是，后来双方终于（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交时，只不过把各自联络处门口铜牌上的字改写成“大使馆”罢了。于是在短短两年内，双方由没有什么把握地通过中间人传递条子的状态，一跃而建立了大多数与北京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比不上的那种密切的政治关系。

会见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生前被笼罩在神秘气氛中，备受人民崇拜，就象他所取而代之的皇帝那样。他住在昔日的皇宫“紫禁城”宫墙里一处简朴的房子里。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对他的每句话奉若神明。他们对他的一些极平常的话似乎都能领悟出一定的道理来，连周恩来总理也总是说，一切重大事情都要由毛拍板。他有时同我会谈中间停下来，说是需要去请示主席。当他回转身来发表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论时，极可能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奉毛的具体指示而讲的，并且反映了毛的思想。周氏的意图究竟是想借

以表示他与主席不一样呢，还是想加重自己说话的份量，对此我一直不十分清楚。

在那些日子里北京到处挂着毛的画像；他的题字充斥于告示牌和公共建筑物的墙上；在他所创建的这个国度里，他的个人权威无所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称，物质因素和历史力量起决定性作用，可是在这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度里竟然如此突出个人，岂非咄咄怪事。这位出身清寒、后来擢升为世界几乎四分之一人口的统治者的伟大人物好象不相信那个他借助其名义而取得胜利的意识形态能维持久远似的。他敢于向鬼神挑战，却企求在亿万黎民百姓的顶礼膜拜中获得永生。那些亿万黎民百姓熬过多少征服者的蹂躏，经受数不清的强迫改造，毕竟能够以坚韧不拔的意志、讲求实际的精神和在在皆有的人性克服这一切。

毛意识到对他的颂扬不会长久；阿谀奉承之辈最不可靠。秦始皇曾在中国进行革命改革二十年，死后渐为人所遗忘，这就是妄想更改中国自然节奏的人们的命运。毛泽东大概是担心自己也落得个秦始皇的下场，结果他把本来竭力想避免的事情反而加快实现了。他本来企图让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场永久的革命，结果却唤醒了中国人历来对连续性的向往。中国人民是靠坚韧而不是靠狂热、是靠稳步前进而不是靠短促冲刺而生存下来的。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文化，明白事理和遵守纪律。他们的最伟大的领袖发现自己迟早要融合于这个由一个一个人结合起来的永恒群体之中。中国的芸芸众生宁愿忍受痛苦而不肯改变他们的本性。他们虽然表达不出这个意思，但是他们懂得只有能够把历史的壮举化解为人民能够实现的目标的人物才是真正伟大的。中国人民很有才能，同时也不轻信别人；他们很想有所建树，但是也知道一个人的直观知识不管多渊博，也无法解答历史的一切难题。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民心中所深切悼念的不是这位领导中国革命后一再掀起动乱的史诗般的巨人，而是他那位为了生活秩序不致中断而鞠躬尽瘁、但名望不如他响亮的学生周恩来。

然而在一九七三年二月的时候，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存在任何疑问。毛凌驾于一切人之上。他难得会见外国人；会见的对象几乎无例外地是外国的元首或共产党首脑。尼克松首次访问北京时我作为总统的幕僚曾见过毛一次。那次召见的通知来得很突然，因为从未预定正式接见的的时间。部分的理由是因为这位主席当时健康已欠佳，难以预定他的身体状况什么时候适宜会客。也可能是故意如此布置，因为轻易不露面可增加神秘性，令人可望不可及更能提高威严。其实毛根本不需要这一套来加深人们心目中对他的印象。我参加尼克松与他的会见时，深为他那几乎发出有形力量的权威所震慑。他会客时成为全场中心；除了戴高乐以外，我没有见过任何别的人能比得上他。

二月十七日这次召见我时，我正在国宾馆同周恩来会谈，已经是晚上十一时。因为周喜欢工作到深夜，我们几乎每天晚饭后总要会谈一次。当时双方正在国宾馆里谈着，这是因为按照周的习惯，不管我们两人在礼宾级别上相差多么大，每次我拜会他之后他总要来回拜我。我们的会谈对手们平时很庄重，却因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小姐的突然出现而活跃了起来。王小姐据说是毛的亲戚，她的样子极象一只容易受惊的小鹿。她办事时不动声色，几乎使人感觉不到她在场。

她把一张字条递到周的面前。周继续就苏联的动机谈了一分钟，然后宣布：“我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毛主席邀请你和他见面。你可以偕你的同事洛德先生一起去。”这样很干脆地把我的其他随行人员排除在外了。这也给温斯顿·洛德一个机会第一次出现在

与毛合影的照片上；一九七二年尼克松与毛会晤时，他担任记录也在场，但是我们要求中国方面不把他的名字写入公报，并且把他从照片上剪掉，以免触犯国务院方面，因为它的官员一个也未获参加。

去见毛的人都要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车辆。而且中国方面从来不让美国的保卫人员随同前往。我们上上周那辆一九三九年型号的十分陈旧的座车，从国宾馆沿宽阔的马路驶往市中心。这时是深夜，街道上已经行人绝迹。车子快到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时向左一拐，穿过与宽广的马路平行的长长的红色宫墙，进入一座由红漆圆柱支撑的传统中国式的大门。车行约一英里，两旁高墙后面有一些朴实的宅院；接着沿湖岸走，湖对面有几处苏联官府式的建筑。毛的住处很简朴，象一个中层官员的住宅似的。我们的车子一直开到门廊下面，那里看不到有何特别的警卫措施。进去后穿过一个小客厅和一条宽宽的过道，便看到毛在摆成半圆形、蒙着褐色罩布的沙发前面伫立。屋里放满了书；毛跟前的地上，小茶几上，靠墙的书架上，到处都是。

毛说了几句风趣话，中国摄影师大照其相。我们后来才得知，次日《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往往是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态的可靠晴雨计。一九七三年二月这一回，《人民日报》用通栏标题报道了我们的会见，还在头版刊登了两张照片；这是友好的绿灯。

这次会见的用意是为了强调美中友好关系要在毛还健在时确定下来。毛很快就表明这一点。当我们朝着沙发走去，摄影师还在屋里照相时，他说道：“我看来还不错吧，”（他猜透了我的思想，我当时的确觉得他的气色比一年前会见尼克松时好一些。）“可是上帝给我发请柬罗。”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无神论国家的领袖、唯物辩证法大师居然谈起上帝来了，但不知怎么倒不使人觉得突兀。除了上帝老子，谁敢中断这位主席的伟业？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毛很随便而合乎实际地谈到他的统治行将告终的问题，暗

示必须把需要他亲自过问的事情赶紧办完的意思。

正如他一年前与尼克松会晤时那样，毛接着谈笑风生地与我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用自然而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重大问题。他的言论看起来很随便，可是他的下属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奉为指示。毛拐弯抹角地用一句话把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了。他说，哈里·杜鲁门和林登·约翰逊这两位前总统相继在两个月前去世了；随着他们的去世，美国旧的对华政策和旧的对越南政策也就被埋葬了。毛开玩笑地向我挑战说：“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双方是敌人啊。”他笑起来了。

“是两个从前的敌人，”我回答道。

毛对此犹不满足：“现在我们把我们双方的关系称为友好关系，”他坚持说。

毛紧接着赋予这句普普通通的话以重要的意义。他强调中国治国之道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要手腕占人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相互信任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说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坚持说。“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故意随便放在什么地方，考验我们一下，”他开玩笑说。但他却没有说明我们可以把这个考验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又何从知道中国人不会趁机占便宜。毛的意思是说，冒小风小险没有什么意思。他谈得来劲儿，索兴对大规模情报活动有没有用也表示怀疑起来。他确实认为情报部门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它们知道政治领导人需要的是何时，报告就“如同雪片似的”飞来了。但在真正关键的问题上，它们就不灵了。他说，中国的情报部门事先不知道林彪搞阴谋**，也不知道我想访华。他猜想我们的情报机关也给

* 苏格拉底(公元前四六三——三九九年)，古代希腊哲学家。——译者

** 林彪是毛的前国防部长和指定的接班人，据说一九七一年九月他在反毛的阴谋败露后逃往苏联途中飞机坠毁丧生。

我们带来类似的问题吧。

一句话，大的目标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政策，玩弄策略是不行的。我们两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顾意识形态分歧的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在这方面，双方必须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同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表示赞同地提到尼克松一九七二年时对他所讲的，中美两国互相接近是出于各自的需要。毛把这层意思发挥了一下，达到有些不近人情的地步。他说，有时我们不妨互相骂几句，反而会增强国内对我们合作的支持——只要双方不要假戏真演就行了。他是这样说的：

只要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我们。……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时我们要说这类话。不说不行呀。

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父，曾经为了保持学说的纯洁性一再折腾他的人民，现在竟然不厌其烦地表明，中国的每堵墙上刷写的标语口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外交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之上。意识形态的口号掩盖着均势的考虑。预料各方将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各方都有义务不使那些原则妨碍国家利益攸关的大事——这简直可以说是现代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古典定义。“我认为我们双方都应该保持自己的原则，”我回答说，谈得投机起来了。“而且如果我们双方用同样语言说话，反而会造成混乱。”

我们就是用这种近乎诙谐的话语来谈论世界形势的，一直谈到清晨一点半钟。据毛看来，苏联的威胁很现实而且与日俱增。他警告我们不要上假缓和的当，以免放松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斗争

* 马基雅维里（一四六九——一五二七年），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

——译者

和造成西方各国人民思想混乱。美国和欧洲应当抵制“祸水东引”的诱惑。这是要不得的战略，因为到头来西方自己也会被这股祸水淹没的。美中两国应该合作。这就要求用机构的形式把双方的关系确定下来。在双方首都互设联络处这一个决定很好。他敦促扩大交往以至于扩大贸易，称目前的水平低得“可怜”。

在毛看来，美国如能在世界事务中起带头作用就最符合共同利益。言下之意是要求建立一个反苏联盟。北京谴责美国的联盟体系是帝国主义伎俩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从它现在的观点看来这种联盟已经成为国际安全的柱石。美国在海外派驻军队一事被谴责了几十年，现在被称为很有用，只要这些军队部署得当。这位主席也批评我们在亚洲的军事部署，但只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种部署反映不出有何战略计划；兵力分布得“太散了”。如同周恩来所作的那样，毛也强调美国与西欧、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他要我们加强防务，注意根本的（苏联）威胁，而不要同我们的盟国为短期的问题争吵。他号召工业化的民主国家应该加强团结：

至于你们和欧洲及日本，我们希望你们互相合作。在一些事情上有点争吵也无妨，但是必需在根本问题上实行合作。

尽管这位主席主要谈的是外交政策，然而他却摆脱不了在他晚年时北京内部问题对他的缠扰。在中国历史上，这类问题往往好象随着自己的势头发展。毛一再向我提示说他受到激进派的压力。但是他说得很隐晦，我这个不机灵的西方脑袋瓜未能立即体会他的意思。“你们知道中国很穷，”毛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女人太多。”

毛不放心我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几分钟之后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有所指的，但还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后来，温斯顿·洛德的妻子贝特给我作了注释：当时中

国的局势远不是表面上看的那样稳定；女人——指毛的妻子、激进派的头子江青——在中国兴风作浪，对现行政策发出挑战。

然而，个别的人物倒不是中国国内问题的症结所在。毛在其最后那些日子里面临如何使中国现代化这个几百年的难题。在历史上，中国更多地是靠自己榜样的力量和优越的文化来确立高人一等的地位，而不象欧洲政治史的特有现象那样靠显示赤裸裸的武力来达到这个目的。的确，中国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亚洲占据支配地位，所以它对自己所处那个地区的均势或主权平等这类概念缺乏直接的经验。（十分了不起的是，当外部世界不能提供其他出路时，中国对这类概念能够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它一向认为其他国家与它之间是某种形式的进贡和纳贡的关系，而不是什么互相形成平衡的关系。中国至尊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中国皇帝遭到藩国进贡时，往往认为有必要把比贡品更贵重的礼物赐给对方。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看到西方的蛮夷依仗其技术力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央王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受到极大的震动。面对同样的挑战，日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实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它竟能保持自己的特性，真是一个奇迹）。中国却不肯拿自己的文化来冒险，因为它正是仗着自己的文化夸称上国的。现代技术是可以普遍应用的：它所要求的标准化程度带来划一的结果。同别国的人不分上下，这是中国人断难接受的思想。所以说技术和现代化对中国的威胁比对任何国家都大，因为中国根本的东西、它那唯我独尊的思想遭到了挑战。

中国执拗地拒绝走日本的道路；它固步自封，同时运用其高超的外交手腕和自信心与那些可恨（又可怕）的洋鬼子周旋。而事实上中国的遭遇比起欧洲殖民主义者势力所及的任何国家都要好一点。中国在那些互相争夺、贪婪成性的列强之间纵横捭阖，居然保

全了比同样处境的任何国家都多的独立余地。

毛的革命反映了中国历史上这种同样的矛盾心理。奇特的是它既革中国旧价值标准的命、又对它们加以肯定。毛主义力图克服中国的旧事物，但它又象传统的儒家一样把社会看作是一种伦理的和教育的工具，只是注入了这位湖南乡下农民的儿子所规定的、与儒家截然对立的学说。毛在一九六六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除了中国以外哪个国家能把一个流血的政治大动乱冠以“文化”二字呢？——其目的恰恰是为了铲除现代社会中不符合中国特性的东西，为了打击西方的影响和官僚主义化，以免中国堕落和被纳入世界普遍的文化之中。

到了一九七三年二月我们会晤时，这位年迈的主席已经意识到，他最近那次宏伟的设想虽然戏剧性地表示了他的国家的独立性，但与此同时却注定它从此陷于衰弱。他如今已懂得——那怕只是暂时地认为——中国如果继续与外部世界隔绝，就必然丧失影响，陷入严重的危险之中。他不无感伤地表示，中国还要派人去国外留学。他把文化大革命停了下来，悲哀地说，中国人民“非常顽固和保守。”他说，他们应该学学外语。这是以另一种方法强调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在晚会上演奏贝多芬音乐的象征意义所在。他重复说，他要派更多中国人去外国留学。他自己也在学习英语。而且还必须努力简化汉字，以使中国人能更好地掌握外国的东西。

但是这位年迈的主席太老了，已经无法把另一场革命进行到底，而这场革命所要反对的是共产党本能的东西，是他的人民的传统，是他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在与我进行谈话后不到一年，他推翻了自己那天深夜在书房里所谈的见解，或者至少是让别人这样干。周恩来下台了。过了不到一年，周的继任者邓小平被推翻了，而推翻邓的那股势力正是毛在一九七三年时似乎在抗拒的。这么

一来，现代化又一次被推迟了，而毛曾经承认现代化是很有必要的一个方面。究竟是毛鼓励了那些日后被叫做四人帮的人呢，还是那帮人钻了毛日益老朽的空子？大概两种情况都有一点。可见毛临死的时候还被他自己那个革命以至于中国历史的难题和矛盾所缠绕。

我和毛会见之后，其他一切都不在话下了。次日我同周恩来会谈中共商了互设联络处的若干细则；我向他通报了我们准备对欧洲和中东采取的新的外交主动步骤。周恩来同意释放两名美国飞行员，这两人的飞机在越南战争期间误入了中国领空。还有一个名叫约翰·唐奈的美国人被中国方面监禁，他在一九五〇年的一次收集情报的行动中被俘，判处无期徒刑。唐奈已经减刑，本来预定一九七三年底释放。可是周暗示只要我们提出他家庭有困难就可以提前释放他。不到一个月，唐奈的老母生病，我们把这件事通知了周恩来。唐奈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日获释，于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敌对时期遗留下来的关于人员问题的最后一笔老账也就勾销了。

结 语

我这次亚洲之行乃是摆脱越南战争的包袱后第一次出国访问。河内之行的结果凶多吉少；北京之行却表明，一旦我们下功夫搞创造性的外交就会收到积极效果。我们同莫斯科及北京都改进了关系，尽管它们两家都希望我们的态度不要那么模棱两可——而我们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取得成功的。我从远东回国途中在飞机上草拟的向尼克松的报告中写道：

只要我们善于同这两个首都周旋，就可以继续既干茅台又喝伏特加酒。在北京继续与苏联持敌对态度的情况下，它除了借重我们的力量之外没有别

的真正选择（尽管它近来向日本和西欧拉关系以资保险）。莫斯科在欧洲和经济等问题上也有求于我们。

但这毕竟是一个难度较大的搞平衡的做法，今后会使我们面临越来越棘手的局面。……如果我们退出世界事务，降低我们的防务，或者在国际游戏中被动地应付，那么我们对于北京抗衡莫斯科便无何用处。毛和周敦促美国更放手地干——希望我们在各处反击苏联的图谋，同我们的盟国保持紧密联系，维持我们的防卫态势。如果中国人判定我们采纳了国会内、社会上以及报界的清淡客的主张而向内收缩，那么我们肯定会看到北京将急剧改变其态度。当然，您和我都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私下作了保证，并且公开宣布我们将坚持在国际上扮演负责的角色。

确保美国国内团结一致、充满信心地发挥上述的全球作用，这是我们在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内施政的首要目标——有时也是使我们很伤脑筋的事。在第二届任期内我们希望使第一任期的斗争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意义。我们觉得北京之行标志着向我们所要建设的更美好的未来迈进了一大步。可是到头来这成了我们最后一次办成的正常的外交活动，从此以后我们就陷入水门事件拔不出来了。

① 见《白官岁月》第七五〇页和第一〇八九——一〇九〇页。

② 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纽约：哈泼和罗图书公司，一九八〇年版），第三七二页。

第四章

即将爆发的水门事件

猛然的醒悟

人们都希望有一段医治创伤的时期，但这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具体地说来，这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中旬的一个周末。

四月十三日星期五晚上，绝大多数成员是民主党人的华盛顿联邦市俱乐部采取了一种友好的姿态，授予我这个尼克松政府的高级代表和一位老资格的共和党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以该俱乐部的公共服务奖。华盛顿联邦市俱乐部是六十年代初期为了抗议大都会俱乐部（这是一家声望地位很高、有些保守色彩的俱乐部）的吸收会员政策而成立的。肯尼迪政府的领导成员和一些同情的新闻记者退出了大都会俱乐部，在横过几条马路的谢拉顿—卡尔顿旅馆里成立了一个新俱乐部。不幸的是，虽然俱乐部的创始人充满了理想，它的财政状况却很不相称。这个俱乐部只有一间大餐厅、一个酒吧间和一个小阳台，阳台夹在那些高大、单调的办公楼中间。

尼克松政府觉得这两个俱乐部都没有多大用处。尼克松政府的主要成员对这两家俱乐部都不信任，他们认为联邦市俱乐部太自由化，而大都会俱乐部又太保守。这件事本身正好说明他们同首都各界人士和政治生活隔绝到了什么程度——而这种隔绝加速

了他们的垮台。

那天晚上来了不少名流。华盛顿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到场向我们这两名共和党的要人致意。尼克松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却被排除在外，而这一政府是刚刚以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最大的多数票重新当选的。我和库珀参议员向与会者呼吁加强全国团结。我讲话的主题是：希望在越南战争结束以后，我国的外交政策能够把肯尼迪政府的奔放的理想主义（我曾短期在该政府里工作过，但官卑职小）同尼克松政府的冷静地强调国家利益的作法结合起来。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震惊地认识到，我们难免会犯错误。同时，我们也痛苦地看到，我们不再是纯洁无辜的——即使我们过去曾经是如此。我们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迟地认识到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认识到这一点本身说明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但危险的是，我们在吸取这一教训时走过了头；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并不是万能的，但我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我们什么也不行。

现在我们面前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进行一场严肃、深刻的大辩论：美国向何处去？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胸无大志，就只能受制于人，而不能管理自己。十多年前，我心目中的政府的形象是高大的，尽管现在人们偶尔指责那个时代人们过于轻率乐观，甚至有些自命不凡。当然，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集中地体现了美国人的观念：问题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而不是搪塞的口实；衡量一个人不仅要看他是否成功，更要看他是否发奋；要胸怀大志而不要苟且偷安。最重要的是，当时执政的政府和反对党都把自己看成是在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而不是在进行一场无休止的、不可调和的争斗。

我们所处的时代必将以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载入史册。在这样一个时代，全世界仍然需要我们的理想和目标的指导，就此而言，六十年代初期的精神要比今天有些人所持的态度更正确些。

我们在二十年代是孤立主义者，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和我们太不相配。我们现在则面临着退出世界的危险，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不相配。其结果是一样的，后果也将是差不多的。所以，现在是我们结束这场内战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应当乐观，但又要有一点悲剧感；我们应当充满理想，但又要卑谦而讲求现实。我们已经饱受争辩之苦。我们最需要的是参议员库珀所谈到的团结，因为这是我们摒弃过去、掌握未来的必要前提。

听众对我的讲话反应很热烈。场内充满了友好、和解和乐观的气氛。

次日，四月十四日星期六，我才突然清醒过来。我仍然沉浸在昨晚的和解气氛和听众的友好反应之中。这时，伦纳德·加门特到我在白宫的办公室来见我。他告诉我的情况使一切都成为泡影。

尼克松曾把几个自由派共和党人拉到他的圈子里，一半是为了增加一些保护性色彩，一半也是因为这些人确实迎合他内心比较温和、比较敏感的一面。伦·加门特就是其中之一。有些“自由派”同他们的保守派对手——例如发言稿起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一样，以为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尼克松，但加门特是很敏锐的，不会作出这种感情用事的错误判断。事实上，真正的尼克松并不存在。在他一个人身上有几种对立的个性在互相争占上风：一种个性是追求理想，考虑周到，慷慨大方；另一种则是报复心强，气量狭小，感情冲动。尼克松善于思考，有哲学头脑，清心寡欲；另一方面，他却又性情暴躁、激动和乖僻。有时，一种性格占了上风；过些时候，另外一种性格又占了上风；偶尔，这几种性格同时有所表现。人们很难掌握在哪一次会议上哪一种尼克松的性格占上风。在没有弄清楚尼克松是否经过仔细考虑，就去执行他的一时冲动的指示，那是不明智的。实际上，正是由于那些头脑比较简单的白宫顾问没有能够抓住尼克松复杂性格的要求，才使水门事件酿成这样大的声势。奇怪的是，在危机时期，尼克松善于思索和分析的特性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平安无事的时刻，他个性中那些阴暗面的情感却暴露无遗。

加门特在纽约时就认识尼克松，那时他们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加门特才华横溢。他精通艺术，犹如他精通法律一样——他自己就很爱吹单簧管。尼克松政府大大增加了对人文科学研究的联邦拨款，完全归功于他一个人。他为人正直，这使得他在政府高层激烈的勾心斗角中显得无能；但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他代表总统道德标准的作用，他的朋友们把他当作知己。他的头衔是总统特别顾问。这个头衔虽大，却没有具体的职责范围。他不能经常见到总统，也没有具体的日常工作安排。

一个人在白宫的影响多大，一般不能根据他的职务的名称来判断。许多头脑简单的新手就是听说可以经常见到总统而被吸引到白宫来工作的。但是，一个人对于总统的决定所能起的影响取决于他被授予的实质性权力，而不是单纯地取决于他能否出入于椭圆形办公室。不管总统的意图如何，他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因此，他需要处理的问题必然堆积如山，使他伤透脑筋。和他的日程无关的谈话，无论多么动人有益，很快成了他的负担。如果顾问同行政官员的意见一致，就根本不必浪费时间去讲。如果他持不同意见，甚至想说服总统，他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争取行政官员的支持，以使他提出的办法能付诸实施。据我了解，毫无例外，没有明确职责范围的顾问最后总是被处理日常工作的官员推到一边。其他的白宫助理不喜欢别人干涉他们所管的事。要让负责总统活动日程的官员安排同总统见面，愈来愈不容易。

加门特通过他的无私行动和别人对他的尊敬，把这些内在的缺陷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他一出头露面往往就成了一种征兆，说明尼克松遇到了一些烦恼，需要一个坚强的帮手。近几天，他同尼克松在一起的时间明显增加，但他们之间谈了什么，则无从了解。四月十四日加门特到我的办公室来，就是为了说明内情。

他一屁股坐在靠墙的蓝色沙发上，装出一付漫不经心的样子。

对面是俯瞰白宫前院草坪和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几扇落地大窗户。我坐在办公桌旁的一张安乐椅里，同沙发成直角。加门特说话从来不拐弯抹角。他一开口，就问了一个叫你没法客观回答的问题：“你是不是糊涂了？”

加门特没等回答，接着便不耐烦地讲了一件突如其来、有如晴天霹雳的消息：在几天之内，我呼吁全国和解的号召就会被看成是一个求饶的请愿，而被一场远远超过越南动乱的大危机所淹没。尼克松的死对头们将得到他们所寻求的武器。一股不信任的巨流即将迎面扑来。我呼吁既要有理想、又要清醒地看到国家利益所在的呼声将会变得空洞无力，甚至是虚伪轻蔑。最近选举的成果很可能逆转，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场生死搏斗。

水门事件就要爆炸了。它的后果远远超过闯入水门公寓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这件事本身。还有几起得到白宫批准的为各种不同目的进行的闯入事件，其中有些至今真相不明。此外，还搞过一个计划，准备劫持那些可能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组织示威的涉嫌领导人，用飞机把他们送到中美洲去。还准备利用妓女来败坏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名声，并对他们进行讹诈。加门特说：“这桩缺德事”牵涉面很广，他自己只知道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政府中最高级人士的合作，这种事情根本就搞不下去。加门特认为，总统特别顾问查理·柯尔森很可能就是在背后“出鬼点子”的人。但是，这种错事的规模之大使人很难想像，总统助理 H·R·（鲍勃）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新闻界给他们起了个外号，管他们叫“德国佬”）会毫不知情。这里就有个问题：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同柯尔森合不来是众所周知的，如果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卷了进去，总统竟会完全蒙在鼓里，那是几乎不可想像的。

在加门特看来，不管谁是罪魁，只有彻底地动一次手术，全部

承认错误，才能避免一场大灾难。但是，如果总统也牵连进去了，哪怕是间接的，那就不会采取透露全部实情的做法。这样，尼克松多年来结下的那帮仇人就会利用不断揭出来的丑闻幸灾乐祸地大作文章，把现政府搞得头破血流。加门特确信，必须从政府机构开刀，在体制和人员上进行改组。尼克松本人必须领导这场改革，大刀阔斧地革除弊病，率领美国人民从头干起。

我听得目瞪口呆。在白宫内部，有的人对总统那些近乎儿戏的想法唯命是从，不惜干那些只有令人讨厌的反战激进分子才搞得出的最庸俗的勾当，并且危及我们的社会团结和我们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四年来，我经受住了越南战争造成的痛苦动乱，希望看到美国能团结一致，最终致力于建设事业。可是，现在这种毫无意义的蠢事使我们的被十年动乱伤了元气的社会再次陷于分裂。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游泳者，刚刚游过险浪，眼看就要安全抵达对岸，不料又被一股更大的激流卷回莫测的大海。

当我考虑到这一切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时，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一个国家采取行动的能力是由它的力量、声望和坚持原则这些无形的综合因素所决定的。要掌握并谨慎地、有选择地发挥这些因素的力量，就得有权威，并且要有公众信任的支持。但是，如果加门特的看法是对的话，总统的政治和道义权威就要不可挽回地受到削弱。盼望一个充满生气的新时代到来的美梦就必然破灭。甚至保存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例如，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也会变得极其困难。我们面临着真正的危险。如果侵略者看不到美国的权威，就很可能蠢蠢欲动。有些地区的和平全靠美国承担的义务支撑着，这样一来，这些地区的微弱平衡就会变得更不稳定。我们调解冲突或鼓舞朋友的能力就会遭到削弱。我们的对外政策有停滞不前的危险，我们将不得不打一场殊死的后卫战，以防止全面崩溃。

到底是什么触发了事态的急转直下？一九七二年六月闯入水门大厦的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去北京途中。我当时没有怎么注意我所读到的一些零星报道。我无法想象尼克松这样一位有政治经验的总统竟会允许白宫牵扯到这样一件毫无意义的事件中去。我当时以为，这最多也不过是一批低能的小人物自己干的无聊把戏而已。

自那以后的几个月里，在我参加的白宫会议上从未议论过水门事件。当时公众心目中（包括我自己），一提到水门事件就具体地联系到六月十七日的闯入事件。白宫的各位高级助理既是同一事业中的合伙人，又是争夺总统关注和欢心的对手。而后者往往占主导地位——至少在尼克松主政白宫时倾向于如此。每一位高级助理都极力维护他自己那一块地盘，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某些专门的管辖范围。

因此，在尼克松的白宫里，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几乎是隔绝的。尼克松的各位助理之间的关系就象关在邻近牢房里的犯人一样。他们可能听到活动规模的一鳞半爪，但是挨得近并不意味着请他们参与，或让他们得知内情。实际上，处理国内问题时我被排除在外，而负责处理对内政策的埃利希曼则被排除在外交政策的讨论之外。霍尔德曼两方面都参与，但他总是只管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事情。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开大型会议，外交和内政顾问都参加，但这些会主要是处理公共关系问题，会上从来不讨论敏感的问题。

由于总统本人的个性，再加上反战分子发动的猛烈的有时甚至是违法的攻击，造成了一种四面受敌的气氛。对这一点，我当然是了解的。我也了解到尼克松性格的阴暗面，但是，在一九七二年的夏天，我根本不相信白宫可能同水门事件有牵连。我当时是相信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对外所作的声明的。他说这是一

桩“三流的偷窃事件”，同白宫人员毫无牵扯。每天早晨的例行公务会议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只有下级工作人员偶尔谈到水门事件。他们抱怨报界的报道有失公正。主持会议的霍尔德曼赞同他们的看法，这就更给人以并未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的印象。

一九七二年夏天，有一次我问霍尔德曼，水门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接着便调转了话题。另一次我曾同约翰·埃利希曼谈到了水门事件。一九七三年一月下旬的一天，我偶尔碰到了约瑟夫·卡利法诺，同他在街上闲聊了几分钟。他在约翰逊总统手下工作过，是我的老朋友，但政治上是我的对立面。我沾沾自喜地说，我看不出民主党人怎样从他们的选举惨败中恢复元气。卡利法诺说，水门事件将帮助民主党人东山再起。以为法官不受公众情绪的影响，那就错了。由于报界对水门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在即将对水门窃贼进行的审判中，法官非常可能寻根究底，揭出更多的内幕情况。我把他的看法转告埃利希曼。埃利希曼对于报界对我比较友好，而不喜欢“德国佬”总是耿耿于怀。每当我稍一过问他负责的国内事务，他总是对我傲慢无礼。他轻蔑地哼了一声：“想得倒美！他们要是指望这个，再过三十年也上不了台。”

现在回过头来看得很清楚，一九七三年初就已经有些迹象本应当引起我的警觉。这就是尼克松本人的表现。我发现很难使尼克松集中精力来考虑外交政策问题，这种情况简直到了使我不安的程度。过去，即使在平安无事的时期，他也专心致志于外交政策，给终于使他厌烦了的管理政府的工作增加一点生气。而现在，要他批阅备忘录都很困难。备忘录退回时上面没有密密麻麻的边批，这说明他没有仔细看过。至少有一次，尼克松在批阅一份开列选择方案的文件时，在所有的选择方格里都打了钩，其结果等于没批。

我认为，他的精神不集中反映了他在取得成功后那种典型的忧闷心情。我同他认识以后发现，在没有紧张事务的情况下，他总是感到懒散，而不是心情愉快。尼克松采取最放任的行动是在平静的时候，而不是在对危机做出反应时。看来，在安定的时候他就会失去平衡，似乎只有在紧张的情况下才能保持镇定。

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我记得只有一次同尼克松的谈话直接涉及到水门事件。一九七三年四月初，当参议员萨姆·欧文的参议院总统竞选活动特别调查委员会（水门事件委员会）开始调查时，我们正在圣克利门蒂。一天下午，总统把我叫到办公室去，问我霍尔德曼是否应该出面作证。我回答说，那无异于承认有罪，只有那些直接了解闯入事件的人才应该出面。后来证明，我的回答过于天真了。尼克松并没有表示，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我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主张。他毫无表情地让我把我的意见再对霍尔德曼讲一遍。这个极端含混的建议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过了好几个星期也没搞懂。霍尔德曼同样毫无反应地听了我的看法，然后要我把这些看法再同埃利希曼谈一下。埃利希曼听了之后耸了耸肩，他那付不耐烦的神气简直可以同我对政治事务的一无所知媲美，但也不一定总是这样。

现在水门事件就要爆炸了，我推测了一下尼克松可能作的几种选择。我对加门特提出的办法表示怀疑。让尼克松带头发起一场改革运动来清理他的政府，那是不可设想的。这种办法能否行得通，也很难讲。在总统任期的第五年进行大规模清洗，也会使人对这位在任总统的判断力产生严重怀疑，因为他没能及早发现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我还觉得，加门特作出的诊断和他提出的治疗方法是互相排斥的。任何熟悉尼克松办事方法的人都知道，他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参谋长来执行他的任何计划；要是他所信任的人不稍施加一点压力，他就会拖延下去；他通常能够在遭到攻击

时保持冷静，但总是需要心腹们的支持。换句话说，只有霍尔德曼才能使尼克松解除霍尔德曼的职务，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如果霍尔德曼卷入了这件事，那怕是间接的，那就没有任何别的人能够克服总统的心理障碍，使这一计划付诸实行。根据加门特的分析来看，政府将面临长期的混乱，而看不到出路何在。

假如这种情况属实，依我看来，我的责任就是把那些没有受到这场灾祸影响的人们团结起来，对付面临的严重考验。我要求加门特允许我把这一情况通知白宫内部的几个作风正派、诚实可靠、有助于我们保持公众信任的人，加门特同意了。我立即决定星期天晚上开会，这是他们几人第一次都有空的时间。

同时，我在四月十四日星期六晚上出席了驻白宫记者举行的每年一次的晚宴。贵宾本应是总统和内阁成员。我用“本应是”这个词，是因为在一届政府内，通常到一定时期总统就会因为每天受到新闻界人士的纠缠而对他们感到厌烦，不再愿意见他们。尼克松上任不久就产生了这种情绪。宪法也没有规定他非得到场主要来听这些人的不顺耳的挖苦话。总统的出席次数越来越少。尼克松利用他的缺席来表明他不理会那些专门采访他的记者——结果是更加剧了总统和新闻界之间的相互间的敌意和猜疑。

但这一次尼克松决定参加晚宴。整个晚上，宴会进行得一直很好。至少我记得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件，尽管气氛中有一股不满的情绪。晚宴结束以后，几家报纸在旅馆房间里举行了招待会，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这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打电话的是总统，他的声音很激动。尼克松经常突然打来一个电话，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再把电话挂上。但他今天晚上提出的问题却很离奇，即使是深夜打来的电话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会显得离奇的。他问道：“你是否同意我们应该在白宫周围筑起一道防线？”

今天，我们从关于水门事件的大量材料中得知，在那些日子

里，尼克松、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前司法部长、竞选活动经理约翰·米歇尔频繁开会碰头。但我对此并不了解。我倒是希望我当时能对显然心神不定的总统提出一点有益或建议性的意见。但是，很少有顾问胆敢告诉总统他们不懂他在讲些什么，或者指出他提出的问题有点不着边际。我那天晚上也没有抖起这份胆量。我没有表态，只含糊地讲了几句。但尼克松把我的话理解为赞同，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好吧。”他说，“我们将在白宫周围筑起一道防线。”他没有解释这个莫明其妙的比喻指的是什么，就一下子把电话挂断了。要不是几小时之前我同加门特谈了一次话，我根本就不明白是什么促使总统变得如此激动。

加门特的话触动了我。当四月十五日星期天那天约翰·埃利希曼因事来见我时，我把加门特的忧虑告诉了他。埃利希曼若无其事地回答，“加门特是一个过敏的核子反应堆。别理他。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叫约翰·米歇尔承认他自己有责任。”好一个米歇尔！难道他真的应为水门闯入事件承担主要责任吗？还是把他挑出来充当替罪羊呢？我心里自问这个问题，可又找不到答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米歇尔卷进去了，这桩丑事就不可收拾了。约翰·米歇尔一向忠心耿耿，要是他当初至少不是相信他在执行总统的意图，他绝对不会那样去干的。不管怎么说，无论你相信谁的假设，加门特的也好，埃利希曼的也好（加门特认为，科尔森是罪魁祸首，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是帮凶；而埃利希曼现在显然要把责任推到米歇尔身上），水门事件一定会震动全国。如果说尼克松的那帮干将完全是自行其是，干下了这样一件严重影响总统前途的事情，是绝对不能令人信服的，至少对我们这些了解白宫活动的人来说是如此。

因此，除非能够毫不含糊地证明总统与此并无瓜葛，我们不久将面临一场政府机构的大危机。总统显然已受到严重的打击。后

果是难以想象的，无论如何，尼克松将不得不改变他的管理体制。他将无法再通过白宫助理来掌握政府，刁难或绕过正常的官僚机构。在选举后的政府改组中，他把心腹的政治助理们一一安插到关键部门中，以监视那些有名无实的内阁成员；而现在这些政治助理即使不丢掉他们的职务，也会失去他们的影响。白宫的主导地位将日益受到挑战。必须尽快建立一种较少依赖于最高层个人作决定的政府形式。无论现行的制度在渡过越南战争那一时期显得多么必要，它的道义、心理和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了。

我同乔治·舒尔茨和阿瑟·伯恩斯在白宫舒尔茨的办公室里碰头，那是在同一个星期天（四月十五日）的晚上。舒尔茨当时兼任财政部长和负责经济政策的总统助理。伯恩斯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但他的影响要比他的职衔大得多。尼克松政府后期发生的灾祸使人忽略了这一事实，即该政府拥有不少品格高尚、才华出众的人士。

舒尔茨刚入阁时任劳工部长，然后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有了制订政策的职能时被调到该办公室，一九七二年夏继约翰·康纳利任财政部长。我在公务生活中接触过的所有人中，舒尔茨是我最敬重和爱戴的一个。舒尔茨善于分析问题，沉着冷静，为人无私。他作风正派，有判断能力，但不夸夸其谈。而他的一些同事没有可靠的本事，则企图以夸夸其谈取胜。他从不谋求私利。由于他不威胁其它任何人的特权，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他表现杰出，他在所参加的每一个委员会里都成为最有影响的成员。每一次会议结束时，人们通常要求他作总结，这使他成为一个有影响的角色，虽然这不是他自己所追求的。假如我能在国家危急的时刻挑选一个美国人委之以国家的命运，我将挑选乔治·舒尔茨。

人们很容易低估阿瑟·伯恩斯。当他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考虑问题时，他看来象是一个思路不太清楚、偏于抽象的学究。事实

上，他也确实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三十年书。不细心的人偶尔会误认为他的慢条斯理的说话方式反映了他的思路迟钝。但是，伯恩斯具有一种迅速抓住任何问题核心的独特能力。他才华过人，意志异常坚定，是华盛顿政府内部的明争暗斗中最精明的一个人。在整个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政府期间，他抽烟斗思考时，从不忘记研究和了解政府的活动情况。他耐心地争取别人支持他的主张。据我的观察，他在斗争中很少打输过。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我们这些经常被他胜过一筹的人对他的高尚品德、献身精神和敏锐的才智的敬佩。

我把加门特的消息告诉我的两位同事后，他们一开始都不相信。但我们都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不知道这场即将暴露的丑闻规模有多大。我们商定一听到有什么情况，就互相通气。我们将互相介绍同总统谈话时涉及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内容，以便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向总统提供一致的意见。我们将共同制订政策，提出倡议，以使美国人民即使在一场政治危机中也能保持对他们政府的信任。不管怎样，现政府还有将近四年的任期；我们当时认为，我们肩负着尽最大可能挽回国家政府道义力量的重任，尽管这种想法看来有点冒昧。

越南战争的后遗症

我必须停下来介绍一下水门事件的背景，再把它的发展讲下去。在关于水门事件（这是家庭手工业式的作案）的大量材料中，大多数都把这一事件看成是理查德·尼克松个人心理失常的结果，似乎事件发生的周围环境没有起一点作用。事实上，如果不把尼克松被逼出来的个人性格考虑进去，水门事件的发生确实是不可想像的。但是，还有一层更深刻的背景。历史学家如果忽视了

越南战争对美国政治、精神和团结所造成的破坏，就难以正确理解水门事件。

美国是在肯尼迪政府期间被理想主义和使命感所驱使、以异乎寻常的积极性介入越南的。一万六千名顾问被派往越南。人们认为，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侵略反映了铁板一块的中苏集团所指挥的同一意识形态的锐利势头。约翰逊政府加重了它承担的义务，派了五十多万美军到东南亚险恶的丛林中去作战。它认为，这是为了对付莫斯科和北京直接指挥的革命战争理论的一场试验。但实践证明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河内基本上是独立自主地行事的，虽然没有两个共产党大国的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它不可能这么干。

约翰逊政府在印度支那遭到的挫败为人们后来的大肆攻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靶子。情况后来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使我们卷入印度支那的许多决策人如此不讲道德，以致客观上同那些搞垮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总统的反对派串通一气。但是，他们当初的看法并没有完全错。之所以造成这种印象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河内的统治者决不是那些轻信的同情者所想象的善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是冷酷、残暴的革命者，决心要称霸整个印度支那。北越的胜利对东南亚的自由和民族独立必将产生严重影响，特别对那些根基不稳的政府尤其如此（十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受到大肆攻击的多米诺理论——该地区的所有非共产党政府同意这一理论——到头来证明还是正确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国如此大规模地介入越南是否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的确值得怀疑。但是，美国力量一旦投入，只有争取胜利才是合理和正确的目标。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一方面相信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又受到各种制约，陷于两者之间而不能自拔。他们承担的义务之大足以危及我们的全球地位，但在履行这些义务

时他们却又缩手缩脚，使之无法实现。他们使我们陷入印度支那，目标是为了挫败一场全球性的阴谋，然后又怕引起一场全球冲突而没有坚持谋求军事解决——这种害怕和原来的估计一样，可能都被夸大了。因为节制有度而打败仗不会得到表扬，失败并不能安抚国内外的反对派。

但是，也必须指出，由于这项任务如此新奇，事业又是如此不熟悉，即使失败了，人们也应当同情，而不是嗤之以鼻。把我们卷入越南的那些人并非轻举妄动或冷酷无情。他们把美国的威信用来冒险，超过了局部问题的战略意义，他们所冒的风险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本意。然而，他们的目的却并不是不光彩的。后来的事件发展证实了下列观点是有道理的：美国在侵略面前软弱无能必将招致更大的灾难性后果。印度支那的非共产党政府最终垮台后出现的全球性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美国的稳定作用失去信心。美国的软弱使苏联冒险主义更加猖獗；一段时期以来，军事力量似乎成了一场政治冲突的决定因素。印度支那人民自一九七五年以来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大规模屠杀、集中营、政治迫害和船民——这一切现已做出了最后的判断，说明在印度支那冲突中，究竟什么是不道德行为——是我们对极权主义的抵抗，还是我们抛弃了自己的朋友。

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松政府就职时，人们已对五十多万美国人和近十万盟军陷入的作法是否明智开始产生了怀疑。部队已派到印度支那，三万五千名美国人已被打死。我们并不怀疑美国应从印度支那脱身。早在就职以前，我们就已决定要尽快撤回美国部队。* 尼克松政府也看到，北京和莫斯科并没有协调它们的政策，相反，却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困难在于，怎样既执行这一决策，同时又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维护我们的国家荣誉。

我们对荣誉的定义并不过分：我们将撤回，但是我们不能推翻一个盟国政府。我们准备接受在南越实施真正自由的政治进程的结果，即使这意味着取代我们所拥护的人物和制度。我们所不愿意做的是接受河内实际上要求的无条件投降，我们不能同强加于人的共产政权合作，辜负我们人民所作的牺牲，背弃那些相信我们前任的保证的人们，从而，使全世界丧失对美国的信任。

但是自由的政治进程正是河内决意要阻止的。它的那些顽固、狂热的领导人苦战了大半辈子，并不想通过他们在国内从未实行过的选举程序来决定最后的结局。他们是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游击战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方法是耗尽对手的力量。他们只相信力量的平衡——首先是军事、其次是心理、政治的力量平衡。他们在印度支那英勇顽强地奋战，为的是挫败我们的军事战略，瓦解我们部队的士气，并打败我们的南越盟友。在谈判中，他们对核心的要求寸步不让：美国必须无条件撤出印度支那；在撤退时我们必须推翻同我们结盟的政府。只是到了军事上打得精疲力尽时，他们才修改这些谈判条件。

这时，美国的全国团结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由于两任总统都采取了自我限制的战略——约翰逊因害怕冲突扩大，尼克松则希望争取一些活动余地以体面地脱身——战争必然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测。为了达到保持美国全球作用这一抽象、无法证明的目标，仍然在要求公众作出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体面地撤退的进程必然会在公众中引起混乱。服役的重担落到青年人身上。他们中许多人发现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打这场糟糕透顶的战争同他们

* 我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号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主张，文章是在我被任命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之前写的。我批评了约翰逊政府的战略，并提出了一项双管齐下的解决办法：美国和北越就军事问题举行谈判（互相撤军，停火，遣返战俘），同时，南越各政党自己解决它们之间的政治问题。①

的理想是不相容的。历史上第一次，普通人每天晚上都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战争的丑恶。各种行业数以千计的正直、爱国的美国人奋起抗议这场使无数人丧命的战争。但同时，一系列民意测验又表明，绝大多数美国公众不愿看到美国遭到一场彻底、丢人的失败。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无法解决、而且日益加深的僵持局面。

在这场僵局中，两种人的态度证明是起关键作用的：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势力集团和人数很少的美国国内土生土长的激进派运动。

美国的领导集团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战胜了孤立主义，在整个战后时期使美国积极地介入了世界事务。但是，越南战争却使她们深深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他们确实在六十年代用暧昧的手段使美国卷入了这场没有明确目标的战争。当战争遇到挫折时，他们就失去了信心。在四十年代末期，由于目的明确，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外交政策倡议。但是在印度支那冲突中就缺乏这种明确的目的。马歇尔计划、希腊—土耳其援助计划、大西洋联盟、日本的重建——所有这些都是和我们国内的经验一致的。这些经援计划看来证明新政的前提是正确的：只有弥合愿望和经济现实两者间的差距，才能恢复政治稳定。我们的盟国牢记着纳粹时代的教训，战争的威胁来自跨过国际承认的边界线发动的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这种政策在战后的欧洲和日本成效显著。那里的政治体制有着悠久的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经济混乱一旦被克服，恢复政治生活的活力立刻产生了效果，由于军事威胁只能来自公开的侵略，因而安全的程度可以根据明确的实力水平来衡量。

但是在印度支那，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在这里，正规军队并没有跨过明确划定的边界进行大规模袭击，敌对力量是通过没有道路的丛林渗透过来的。出于某种对法律的奇怪的屈从，河内基本

上没有侵犯根据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划定的南、北越之间沿十七度线设立的非军事区的边界。为了弥补这种罕见的遵从法律义务所造成的损失，北越于是绕过非军事区，在希望超脱的国家里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供应线，修筑了横贯老挝的胡志明小道，在柬埔寨建立了庇护所。更奇怪的事态发展是，国内许多反战分子居然也接受了这种逻辑。每当我们对这些悍然违反国际法、并威胁我军安全的行径作出反应、试图阻截这些支援侵略扩张活动的完全非法的供应线时，我们反被指控破坏柬埔寨和老挝的中立。这就是国内关于越南战争争议最激烈的问题的焦点。

越南的政治形势也同样与我们事先的想法不符。这场战争所涉及的并不是支持某一个政府，而是涉及到任何一个非共产党政治结构是否合法。许多美国人倾向于按我们自己的宪法程序来判断我们所维护的政府。而我们的宪法程序同在一个历史经历完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内爆发的内战很难扯到一起去。在西方，民族先于国家而存在，实际上，民族导致了国家的产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情况正好相反；国家试图成为民族感的集中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成了民族特性的唯一体现；政治竞争成了夺取全部权力的斗争；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中并没有忠实的反对党这种概念，而缺了这种概念，民主就不可能繁荣。相反，倘若试图把立宪政府强加于人，只能使仅有的一点社会团结受到破坏。

印度支那的情况正是这样。当越南在一九五四年勉强分治以后，南越在为组织一个国家而奋斗。而同时，河内组织和指挥的游击队袭击活动——对此人们已毫无怀疑——却在破坏脆弱的社会结构。南越领导人主要是依靠一九六三年美国人支持的政变才上了台，外部力量发动的不断升级的侵略使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个政权最优秀的官员不断遭到共产党游击队的暗杀；南越的经济遭到破坏。这些挑战加在一起所造成的后果几乎是无法应付的。

而当西贡当局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它的遥远的盟国美国又对它施加了无情的压力，要求它进行改革。南越几乎奇迹般地承受住了多方的压力，甚至还壮大了力量——这要归功于南越人民的顽强精神，也反映了他们为避免落入河内残暴的极权统治而准备付出多大代价。

然而，事件的进程必然不符合最初提出干涉主张的自由派美国领导人的期望。由于他们坚持无明确目标的战略，或者说，他们卷入了一场本身就无法打赢的冲突，他们丧失了自信心并迷失了方向。他们先是放弃了胜利，接着甚至丧失了可能通过严肃的谈判达成合理妥协的信念。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在战后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想法本身就是很成问题的。

这种道义上的崩溃对我国和世界上依靠我们的国家来说并非一件小事。那些使美国卷入印度支那的人们出来争辩要结束战争，这反映了他们的现实感。但由于他们拒不承认——这主要出于一种内疚感——为达成谈判解决，需要全国团结一致支持一项最低的谈判方案，这就使脱身越南变成了一场梦魇。任何谈判对手，特别是河内的那些死硬的革命者，只要知道它的对手由于受到国内愈来愈大的压力而无法坚持其立场，就根本不会作出让步。最后，就连那些一向支持我们对外政策的人也接受了这种鬼话，即解决问题的障碍并不是侵略者的顽固不化，而是我们的政府目光短浅，假如没有别的更糟糕的原因。老的对外决策势力集团就这样抛弃了它的光荣职责——为公众议论我们的国际责任提供公正的判断、长远的观点和深思熟虑的分析。

由于这种退让，使所谓的和平运动受到了人数相当少的激进分子的左右，而他们得到的公众支持几乎等于零。对这些最激烈的心怀不满的核心分子来说，越南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美国所承担的某一项具体义务是否明智，而是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是否正

确，甚至整个美国社会是否健康。他们把这场战争看成是一个邪恶、腐朽、穷兵黩武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症状。他们把越共当作一种进步的运动，把北越看成是一个受欺侮的英雄的革命国家。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印度支那（假如不是整个第三世界）未来的潮流。他们对我们入侵柬埔寨感到愤慨，并不是因为所谓把战争扩展到庇护区（而北越正是从这些庇护区出发，在五年间杀害了数以千计的越南人和美国人的），而是因为害怕这会导致战争的胜利。对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前途表示关切，被轻蔑地斥之为继续进行一场目的更为阴险得多的战争的一种明显的借口。同样，我们对美国全球信誉下降以及由此对国际安全所造成的影响的担忧，被激进分子解释成把印度支那人民当成卒子，为美国的什么全面战略计划服务。为此，美国世界地位的下降竟被看成是有助于世界和平而受到欢迎。

这些激进分子人数虽少，但越来越尖刻。对他们来说，河内的胜利并非憾事，而在道义上是可取的。不应当通过谈判使这一胜利减色，而实际上应当通过我们的投降使之更加锋芒毕露。美国在这场遥远的战争中所遭受的耻辱被看成是美国在领导战后世界中倒行逆施而应得的一场公正的教训。他们将以此作为一种实用的工具来诋毁整个美国体制——商业界、劳工界、学术界、报界、国会。在他们眼中，这个体制是阻碍历史前进的障碍。因此，他们显出一种神气活现的道义优越感。然而，他们使用的那些污言秽语都表明，他们的目的是见不得人的。

在约翰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反战派所使用的方式、手法和语言堕落到如此卑劣的地步，以致对我们公众生活的影响至今犹存。休伯特·汉弗莱为人热情，慷慨，但在一九六八年总统竞选中，对他的攻击是如此刻薄无情，使他后来一回忆起来就忍不住要流泪。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倾向都因尼克松当选而加剧。尼克松也许是唯一能从越南脱身而不致遭到保守派抨击的领导人。但是尼克松卷入两党之争的历史使大部分负责的民主党人对他恨之入骨。这样，反战的激进派同许多虽然对激进主义一般并无同情心但痛恨尼克松的人结合起来。不满情绪日益尖刻，那些讲究文明谈吐和公民责任的人也未能使这种情绪缓和下来。后面这种人急于赎罪的心情使战争拖长了。但回过头来看，这种罪名或是完全夸大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它也彻底粉碎了现有的决定外交政策的势力集团。它的成员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一方面，他们不敢支持国家的政策，另一方面，激进的反对派又不肯容纳他们。激进派念念不忘他们的过去，不论他们如何洗刷自己，非要惩罚他们不可。

事态的进展就这样使人们对尼克松政府继承下来的担子的复杂性失去了任何同情。为了做到撤退时既要有一定速度，以安抚公众的关切，同时又不能太快，以促使河内谈判；为了既要在会议上表现出灵活性，同时又要表明决心，我们的国家荣誉不允许我们跨越一定的限度，就需要执行坚定的战略，并得到公众的谅解。持久的国内压力，不论其动机如何，使这一任务变成了一场折磨。到尼克松第一任政府结束时，已经几乎没有人能心平气和地讨论越南问题。为了越南战争的争执，人们在国会和报纸上互相攻讦、谩骂。在校园内和大街上，示威游行和骚乱频繁发生。

国内这场丑恶的争斗对国家来说是一场悲剧。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以“赞成”还是“反对”这场战争来划线——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尼克松决心结束我们的介入，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他所拒绝作的，是对成百万依靠我们的人们撒手不管，把他们置于共产党的血腥暴政之下。他认为一败涂地将使国内新孤立主义倾向抬头，打击美国人民的士气，使他们害怕承担国

际义务。他确信，美国如果这样削弱下去，会使依赖我们的盟友灰心丧气，而使我们的对手有恃无恐，进行新的冒险。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一九七五年的惨败不仅导致了印度支那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而且随后使美国饱受凌辱——从安哥拉到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富汗，使苏联在全球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地缘政治攻势，使局势动荡不稳、危机四伏。

我不打算在这里再次重复人们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在关于越南战争的辩论中提出的各种论点。当然，我自己当时也是辩论的一方。这些论点的理智和道义方面的是非曲直有待于其他人在今后从长议论。不管各种对立的主张如何，到一九七二年，这场辩论已激化为指责对方动机不纯的攻击，毒化了一个民主社会赖以生存的公众对话。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反战批评派声称只有他们才热爱和平，而把其它一切考虑统统斥之为替杀人狂寻找遁词。这种对信任感的有计划的破坏使我们无法就真正重要的国家问题展开辩论。

七十年代初期，美国最需要了解的是新的现实的复杂性。但是，人们却告诉它，现实只有两种：非黑即白。美国需要增强自己的使命感，但批评者却说世界上一切挫折都是美国自己的领导人的罪恶企图造成的。关于越南的辩论破坏了我们国家走向成熟的过程，它代表了一种逃避现实而怀旧的倾向。它制造了一种幻想，美国的毛病是由于它丧失了道义的纯洁性，只要恢复简单的原则，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就能克服。不管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我们的命运都不是那么顺当的。一个只顾自己的美国为混乱敞开了大门，加剧了内部的分歧。

尼克松作出的反应使这一切进一步激化了。尼克松深信，有人心怀敌意，在搞阴谋反对他。他制订了一项大胆的美国撤军的政策。而在他当选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反对派敢提出这样

大胆的政策。^②尼克松认为那些民主党的头面人物手段卑鄙，并为此感到十分恼火。是这些人把美国拖进了战争，而现在为了减轻他们的罪过(或者为了保全他们的前途)，他们却坚持攻击一位努力使我们脱身的总统。他感到惊奇的是，那些人对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命运漠不关心，但却打着道义上优越的旗号。使他感到最难以忍受的——这种情绪是有道理的——是激进派不惜违背法律，采取施加压力和破坏的办法；其中最恶劣的行径包括气象地下组织的恐怖活动，对大学研究设施扔炸弹，纵火，大规模盗窃政府的机密文件，未经授权泄露高度机密的军事行动和谈判立场，鼓动抗拒征兵和开小差。

以水门事件为名使用非法律手段是没有理由的。一位总统不能以反对派的过火行动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他有义务开阔人们的视野，树立道德标准，并在他和反对派之间搭起一道桥梁。尼克松没有这样做的气魄。但是，如果我们忽视尼克松的敌人的用心恶毒、自命不凡、有时甚至是粗野蛮横，那就无法了解这一时期的情况。

实际上，总统和他对手之间的相互仇视使对立情绪加深了。如果水门事件的教训之一是总统滥用权力，那么另一个教训是，要使一个民主国家能发挥作用，反对派必须表现克制，自己要讲文明和分寸，尊重国家的价值准则，并应懂得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我们的制度和动机只能使国家丧失管理自己的能力。

水门事件升级

那个戏剧性的周末使我第一次认识到水门事件的严重性。两天之后，四月十七日星期二，尼克松在白宫举行国宴招待意大利总理朱里奥·安德雷奥蒂。弗兰克·西纳特拉在宴会上表演了节目。和我同桌的一位客人告诉我，晚宴前几小时(实际时间是下午

四时二十二分)总统跑到新闻发布室,透露一个月以前他已下令对水门闯入事件进行新的调查。调查在“查清真相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同他以前的命令相反,现已允许白宫人员到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出席作证。但是,违法的白宫工作人员将不享有不受起诉的豁免权。尼克松和他的政治助手们显然认为这一宣布对外交政策不会有什么影响,因此他们事先事后都没有通知我。听到消息的人是一个坚定的尼克松支持者。他认为尼克松的声明宣告了水门事件的结束。罪犯显然已被发现,这个问题现在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去处理了。

但是,根据伦·加门特和我谈的情况,我怀疑问题不会那么简单。实际上,白宫声明的主要意义在于尼克松展开了一场同白宫顾问约翰·迪恩的殊死斗争。尼克松担心迪恩可能要背叛他,便先下手为强,不给他豁免权,企图使他无法为了保全自己而同检察官作交易。

晚宴的气氛热烈、轻松。白宫就像“泰坦尼克号”轮船*一样,船上一部分已开始漏水,但其他人都不知道、或者没有表现出知道这场危险。乐队在继续演奏。这次宴会碰巧是尼克松任职期间所举行的最后一次“正常的”晚宴。宴会结束以后,我和西纳特拉一起参加了一次小型招待会。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也参加了。

在招待会上我又接到了总统的一个电话。他问我对他的讲话反应如何。我想这又是尼克松要我给他打气,便赞扬了他在国宴上作的祝酒辞。但尼克松想的不是这个。他想了解我对水门事件的宣布有什么反应。我说,由于我不知道什么人卷入了,也不知道宣告的意图是什么,因此我无法判断它的重要性。尼克松回答说,

*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凌晨,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豪华的英国四万六千吨客轮“泰坦尼克号”在首航美国途中,于距纽芬兰九十五海里处触冰山沉没,旅客死一千五百十三人。——译者

不给予豁免权可以把那些乱咬别人企图推脱自己责任的“小子们吓得老老实实”。他感到我有些犹豫，便突如其来地问了一句，他是否应解除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职务。他说，他不得不问这个问题，心里难过极了。我惊讶得不知说些什么好。加门特作这样的猜测是一回事，如果尼克松自己也持这种主张，那他一定是处于极端危急的境地。我回答说，由于我了解情况不够，因此无法回答。但是，我根据一条从不违背的行事原则，提出了一项忠告：到头来不得不做的事应当马上就做，以制止事态的不断恶化。

我刚放下电话，阿格纽走进屋来。他问我对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声明有什么看法。我也告诉他我无法估计它的影响。阿格纽说话的口气有些轻蔑、冷漠，他说，尼克松要是认为他可以不解雇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职务，那是自欺欺人，他能保住自己就很幸运了。

阿格纽的尖刻评论从一个方面戏剧性地说明了现政府中唯一通过全国选举当选的两名官员之间几乎必然要产生的那种矛盾关系。一开始，副总统总是被捧为总统的伙伴。新任的行政首长宣布他将避免他所有前任把副总统贬为——用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话说——“备用装备”的作法，答应让副总统在制订政策和执行政策方面发挥较重要的作用。但这些语言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成了空话，这使得副总统越来越失望。他的日益明显的不满引起了一种恶性循环，使总统更加不安和冷淡。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一个人得具有超人的自我克制才能同另一个最盼望自己死的人平安相处，而具有那样自我克制的人根本当不了总统。

制度上还有一个严重障碍，使副总统无法承担主要责任。副总统是行政部门中唯一总统不能免职的官员。分配给他一项正规的任任务，首先得确定他会长期甘心情愿地服贴顺从才行。在政策上有分歧意见时，总统要副总统控制的部门贯彻他的指示的能力

就会受到削弱。因此，副总统经常干些五花八门的杂差，而且有明确的限期。这使他无法制订自己明确、连贯的政策主张，也无法建立自己的地盘。（纳尔逊·洛克菲勒任副总统时，经常开玩笑说，他读报纸的丧事版很起劲，看看什么时候他可能奉命率领美国代表团到国外去参加葬礼。）

当然，副总统参加决定最重大国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但是一个人处在顾问地位，既没有手下人的帮助，又不能跟踪事态的发展，就很难会有什么作为。副总统要么支持已经形成的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加强那种认为他是无关紧要的偏见；要么他对一致意见提出异议，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掌握具体的细节，很容易使别人感到讨厌。有一两次阿格纽反对尼克松的意见，结果下一次会议就根本没让他参加，虽然总统采纳了他的意见。尼克松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清楚究竟是谁说了算。

不仅如此，总统这样做受到了白宫手下人的支持。这些人全靠和总统离得近才有权势。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这种关系，防范一切外来者。他们的本事就是忠心效劳；而同总统接触多很容易培植这种态度，他们同白宫共患难的经历也往往使这种态度成了一种习惯。总统和他的助手受到同样的反对派和记者的包围；他们得对付同样纠缠不休的官僚机构；他们受到同样的压力集团的刁难。因此，他们必然有着共同的利益，要采取共同的立场来对付一切忠于他人、乃至另有野心的人。

虽然内阁成员也时常成为这种态度的攻击对象，但他们至少可以感到自慰的是，他们有权处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总统因为人手不够或者争论太大而不愿过问的。而且，内阁官员有他们自己的庞大的官僚班子，这一班子多少总还忠于他们。副总统可没有这种保护网，他很自然地成了白宫人员的热情的受害者。他如果一味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就有可能削弱实现他自己最大野心的

前景——即在竞选连任时得到总统的支持。

尼克松和阿格纽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些准则的证明。两个人的性格使潜在的紧张更加突出了。尼克松为人孤僻，一向疑心很大。他一开始就认为阿格纽是个政治庸人。尼克松总怕别人超过他，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选中了阿格纽。后来，他发现可以拿阿格纽当枪使，攻击他自己不便直接出面攻击的人，或者发泄他内心存在但不敢公开发泄的怨气。他从来没有考虑让阿格纽当他的接班人。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阿格纽是他防备暗杀的保险单。

阿格纽则非常骄傲。他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但对此不动声色地忍受着。我的秘密中国之行事先没有通知他，对此他深为不满。我发现他聪明过人，比他表面的形象精明得多。但是，他的挫折使他趋于内向。那天晚上我们的印象是，阿格纽对白宫里那些和他作对的人眼看就要威风扫地的前景毫无怜惜之情。在整个水门事件的开始阶段，阿格纽引人注目地置身事外。当他自己开始倒霉时，包括尼克松在内的整个白宫也同样不理睬他。

上述结局在四月十七日当时看来还是很荒唐的。但是阿格纽对总统遇到的困境保持冷冰冰毫不介入的态度就预示着大祸即将来临。一个渴望竞选下届总统的副总统说话决不会这样尖刻，除非他深信尼克松在一九七六年竞选提名的过程中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征求意见的另一个人是布赖斯·哈洛。哈洛曾在艾森豪威尔的班子里工作过，在尼克松进入白宫的开始阶段负责同国会的关系，一九七〇年辞职，退居在野。哈洛是俄克拉荷马人，说话慢条斯理，温文尔雅，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哈洛在华盛顿住过多年，观察那里的处世之道。他有时是观察者，有时又是参与者。我一直深信不疑，如果尼克松更信任哈洛或者和他类似的人，水门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哈洛不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他为人极为

谨慎。他知道在华盛顿的交易能做到多大程度。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要使民主制度得以兴旺，有些限度是不能超越的。他对总统职位、它的权力、威望和所承担的重任有深刻的认识。他对总统的一片忠心是同他的为人正直、对我们制度的尊敬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分不开的。由于布赖斯奉行这样的哲学，他被那些年轻的积极追随者推到一边。这些人在并不紧要时不择手段地显耀自己，而当他们的前程一旦受到威胁时却又胆小如鼠。

我把我所了解到的情况简要地告诉了哈洛，并问他如何看已经发生的事情。“某个该死的傻瓜，”哈洛不紧不慢地说，“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把他所听到的情况原封不动地全透出去了。”哈洛感到惊异的是，这种事情怎么会变得不可避免。“如果不是这样，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程序太没有规律，气氛又太不正常。现在清理一下可能对国家有好处，而且会使尼克松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因此，连哈洛也没有想到尼克松本身的总统职位会受到威胁。毫无疑问，这部分地是因为，总统的毁灭和行政权威的垮台前景太可怕，难以设想。他同加门特一样，认为可以从水门事件下手，清除不良分子，纯洁政府。

“德国人”：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

新闻界倾向于把 H·R·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描绘成两个普鲁士操练教官，凶神恶煞似地执行椭圆形办公室的森严的命令。对比之下，我得到的评价一般比他们好。人们相信，这是他们——正如俗话所说——“存心给我安排的”。要我唱“白脸”，他们唱“黑脸”：我回答新闻记者打来的电话；我在晚宴上同国会、学术界和新闻界的许多知名的反对派人士接触，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我的朋友；我能听取对立意见。至于同我谈话的人认为我同他

们的对话是意见一致的表现，还是我故意用模棱两可的话来骗他们，我现在已想不起来了，很可能他们认为两者兼而有之。人们对我在白宫内的人事关系有一种习惯看法，把每一个人的作用都看得太简单了。比如，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并不是一伙；在某些方面，他们是对头。总的来说，埃利希曼的观点比较自由化，他对实质性问题确有兴趣。他倡议或支持一些人道、进步的国内政策。在内部讨论时，他表示赞成削减军事开支，把资源省下来用于社会发展项目，但我认为他主张的削减已超过了谨慎的限度。有几次我不得不找尼克松反对他的干预。入侵柬埔寨以后爆发的学生抗议运动使埃利希曼受到震动。他有三个不满二十岁的孩子卷入了校园里的动乱，他们经受的痛苦使他深感不安。但是在白宫，只有得到总统的青睐才能呆得下去。而尼克松只喜欢那种俯首贴耳听命于上司的人。尼克松总是喋喋不休地议论报界在搞阴谋，权势集团对他有敌意，乔治镇这个地方风尚浮夸。谁要是对他讲的话提出异议，就会被排挤出内部的小圈子。

埃利希曼并非生来就讲话生硬，喜欢对抗。每一个总统助手都想迎合总统的脾气，从而增加自己的影响。但埃利希曼搞得过份了。总统的有些想法他认为非得付诸行动不可。作为负责尼克松国内事务的官员，他总站在激烈交锋的第一线。埃利希曼在对付日益扩大的抗议示威、大规模的文件泄密以及持不同意见者挺而从事非法活动时，有时手段过于激烈，过于骄横，这使他后来大倒其霉。

埃利希曼对我既有一种同志般的好感，又有强烈的嫉妒心。他虽然不接受我的观点，但尊重这些观点。然而，他除非是超人，才不会对新闻界褒我贬他感到愤懑。总统对我的一些社会活动和态度能够容忍，认为这是我的天生不足。但他和尼克松共事时间太长，总统不能容忍他的社会活动和态度越轨。一方面，他倾向于

搞调和，但又不允许他去搞，同时，还要保存自己的政治生命，最后，他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出于好心才去做的样子。他摆出了一付目空一切的神气。圈外人以为这是他傲慢的表现，但实际上是反映了他的矛盾心理。

使他感到几分慰藉的是，在某些方面他占了我的上风；他装得比我班子里从东部名牌大学里新招来的人更警惕尼克松对手的活动；他搞某些泄密调查，以对我的同事进行怀疑。但这些大都是些小动作，并非真要把我搞垮。埃利希曼和我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尽管偶尔有些紧张，我尊重他的友好态度和精干的办事能力。他羡慕、同时也妒忌我的显赫地位。

霍尔德曼的性格是比较坚强的。他和尼克松共事了十年，完全了解他的主人复杂的性格和癖好。虽然他秉性是保守的，但他骨子里对政策并不感兴趣。他对尼克松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使尼克松的情绪保持平静，使总统给外界留下一个稳重、冷静、镇定自若的印象。

霍尔德曼深信现实是通过人的形象反映出来的。因此，当尼克松固执地认为他所有的困难都是因为公共关系没有搞好造成的，而公共关系基本上是个技术性问题时，霍尔德曼不仅接受，而且时常鼓励尼克松的这种看法。尼克松一直未能消除这样的错觉，即：他同约翰·F·肯尼迪的声望不相上下，只是由于他的新闻班子工作不力，他才没有受到应得的赞扬。（他忘记了在他执政第一年以后进行的民意测验中，对他的肯定评价一直高于他那位殉职的前任。）霍尔德曼往往把政策和程序、实质和外表混淆起来。总统和他的办公厅主任之间的时间大部分都用于商量如何操纵报界。这一企图注定是枉费心机的，因为他们俩人都拒绝采取最明显、也是唯一可行的战略：同那些他们又恨又怕、暗中妒忌的新闻界代表持续进行严肃、诚实的对话。

鉴于尼克松和霍尔德曼似乎完全懂得建立个人接触和信用非常重要，他们的这种作法就更令人奇怪了。椭圆形办公室通过霍尔德曼向倒霉的白宫工作人员发出了一大堆备忘录，指示他们对付新闻界应采取的“方针”，要惩罚那些带刺的新闻记者，通常是不让他们会见官员（但我们对这些备忘录大部分是置之不理）。这项方针有时是讥讽政治对手，更多的情况下，是称颂我们领袖的卓越品格。由于我是乔治镇派的成员，（实际上我来华盛顿之前从未见过它的成员，）他们认为我同报界有特殊关系，所以发给我的这类备忘录特别多。

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尼克松班子里的其他成员不能象我一样，努力同华盛顿的新闻界保持良好关系。不敢同报界接触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倒是很少指责我有这个弱点。虽然我在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之前从未举行过一次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但是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得很得体，结果，白宫内部就以为我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有什么专长。我的同事们认为这也许是因为我是来自东部名牌大学并在六十年代初期曾同肯尼迪政府多少有点关系的缘故。（这里必须说明，肯尼迪的白宫倒并不认为我擅长于此，我总是离新闻界人士远远的。）不管怎样，他们总是鼓励我同新闻界搞好关系，但当我同新闻界的关系比他们搞得好的时，他们又有意见。

后来，人们指责霍尔德曼把尼克松孤立起来，对他施加了有害的影响。这是不公正的。尼克松是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的。他不愿会见生人。他不能对与他持异议的人直接下命令。当他真的见到一个圈外人时，他会装作同意他的谈话对手讲的每一句话，以避免造成关系紧张。霍尔德曼搞了一套浮华的礼宾仪式来抵消这些弱点。同总统的接触受到了限制，因为总统对哪怕是很有约的约会安排也总是不断埋怨。总统会见外界人士时总有一位白宫人员

在场，以落实总统作出的许诺（有时也得准备变卦，不兑现这些许诺）。日常公务尽可能通过备忘录处理，因为尼克松通过书面，而不是通过面对面的谈话，才更能表明他的真正观点。

同时，尼克松时常把他所信任的白宫助手当作避雷针，以消除自己的精神紧张。这时，人们就得一连几个小时地坐着听尼克松天南海北地闲扯，不时地往炉火里扔一根木柴，心里不断祷告，最好发生一次危机，可以使自己得到解脱。如果一位心无戒意的助手偶尔走进来，那就赶紧让他把自己顶替下来。但是，没有人计算过霍尔德曼在这方面究竟花了多长时间，也没有人听得象他那样虔诚。如果说霍尔德曼最后垮台是因为他过分死板地执行了总统的意旨，那末我还有这样的印象：总统在感情冲动时发出的许多指示只不过是写在黄拍纸簿上的一些话而已，而霍尔德曼却恭恭敬敬地把它们记下来，好像他一走出椭圆形办公室就要立即付诸执行。

霍尔德曼对政策不感兴趣也有他的好处。你可以肯定他会忠实地把你的观点报告给总统，而不会根据他自己的偏见来歪曲你的观点。实际上，我经常利用他作为一个渠道，反映一些总统不喜欢听的观点，因为尼克松不大可能对他的逆耳之言置之不理。他并未提出这些意见，而只不过是传话人。我这样做也是因为霍尔德曼总是竭力使尼克松考虑那些即使不合他口味的问题。（当然，你首先得使霍尔德曼相信，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将会给总统造成某些损害。）霍尔德曼没有什么个人野心，或者至少可以说，他担任的职务已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正因为他没有更多的要求，他也用不着卷入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

但是，正是这种几乎不讲人情的超然态度埋下了导致尼克松政府最后垮台的种子。霍尔德曼搞国内政治没有深刻的经验；他自任要职，但对使用总统特权的分寸、范围和限度的了解却都远远不

够。他的第二个错误是他为了对付他的总统主顾的变幻无常的脾气而采取的作法。霍尔德曼的严酷无情的纪律在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他要求下属无条件服从，部分原因是为了绕开总统那些显然反复无常的指示。但是保持纪律有两种办法：一是说服动员下属，使他们愿意服从上级的要求。另一种是建立硬性的统治，不给下属人员独立思考的权力，使得无人敢于对上级指示提出异议。霍尔德曼选择了后者。他选择了和他自己完全相仿的男女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男的），这些人过去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他们的忠诚是因为上面有层层领导，他们勤恳地工作，只是为了有机会获得参与重大事件的机会。

但是，过去没有政治背景的人要指导未来是不可靠的。他们掌握了权力便得意洋洋，一想到可能丢权便又惊惶失措。在尼克松蒸蒸日上的时期，他的手下人一个个骄横跋扈。他们为了满足霍尔德曼无止境的要求，对他们自己的下属人员吹胡子瞪眼，甚至对那些从技术上来说根本不归他们领导的常设内阁部门也是一样。霍尔德曼本人没有头脑，再加上他那帮头脑更糊涂的副手，这样，使情况益发糟糕了。

结果，白宫工作人员对总统的态度就像广告公司（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的确是广告公司出身的）对一个性情多变的独家主顾的态度一样。他们也许对某些指示有不同意见；如果他们能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他们就会设法缓和一些过分的要求。但是归根结底，上面还是要看他们是否能有效地执行困难的任务。他们是加速器，而不能起平衡作用。一旦机器开始下滑，他们不能及时把它刹住，反而使它滑得更快，落入深渊。

霍尔德曼同我的关系中也有些摩擦。他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保守的加利福尼亚人，充满着那个阶层的人所具有的典型的情绪、多疑和私下妒忌别人的心理。他很少遇到过、也根本没有必要一

直同我这种背景的人打交道（不过他对我同他所蔑视的权势集团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么密切估计过高）。一九六二年尼克松竞选州长失败以后，他一直同尼克松搞在一起。那时，只有真正志同道合的圈外人才会同尼克松这样没有前途的人呆在一起。他打心眼里相信尼克松的使命。看到洛克菲勒班子里的一个新人，过去一直反对尼克松，而现在却引起公众如此注意，这必然使他感到生气。但他很少表现出嫉妒心。我们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平静，关键在于他并不感到和我有什么竞争。他认为我过于热衷于政策，总觉得有些可笑，但也可以容忍。实际上，任何人对实质性问题表现出超过一般的兴趣，他都认为是过份。我们之间有时发生争执，因为他坚持他有决定什么人可以见总统的特权，而我认为他的作法是愚蠢的；有时他过分强调公共关系，而我认为这样做对政策不利。但实际上，这种分歧比人们预期的办公厅主任和国家安全助理之间的分歧要小得多。

霍尔德曼对我的态度基本上反映了尼克松的态度。每当霍尔德曼刁难我时，我可以肯定他是在执行总统的意图。因为尽管尼克松表面上装作不介入争执，他实际上并不真的介意国务卿罗杰斯和我之间的激烈竞争。一般情况下，霍尔德曼奉命站在我一边，但同时也故意不让争执的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当然，我也不知道背着我对罗杰斯说了些什么。）尼克松还认为，只有在我个人感到不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我的才干；我注意到，他定期地使我对他的目标，他优先考虑的问题，或对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产生一些怀疑。^③

但是到了一九七三年初我一旦决定辞职不干时，这些作法造成的紧张大部分都消失了。因此，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中旬，我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颇有些痛惜之情。尽管我们之间偶尔产生摩擦，我们在那些动乱的年代里毕竟还是同事。我了解他们的希望，

并记得他们对工作是勤勤恳恳的。我熟识并喜欢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我差不多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了解水门事件这个毒瘤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几乎不知不觉地生长起来的。白宫既是一个金鱼缸，又是一个隔离病房；鱼在缸里游，缸的四壁有一面是不透明的。人们能够看到这些鱼，但不一定了解它们；它们自己则什么也看不见。白宫的成员同外界隔绝，他们遵守内部共存的规章，以他们的主观想像了解外部世界。在尼克松主政白宫时，这种情况同现实越来越不一致，直到两个世界之间的不协调突然变得无法容忍。鱼缸崩裂了，里面的人落入敌对气氛之中。

一九七三年四月末，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就这样挣扎着，他们对事态发展的后果还没有数，甚至也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应负多大的责任。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深信，即使他们能保住他们的官方职务，也不能像以前一样起那么大的作用了。总统助理的权力就像驯兽表演中驯兽者的权威一样。他的控制是以不受到挑战为前提的；即使他能经得起第一次攻击，他也丧失了统治的威力，每次指挥都变成一场苦斗；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当水门事件一旦爆发，而人们又认为他们有牵连时，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注定要面临一场无止境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自己受到了糟蹋，现在要向他们的权力挑战。总统很快就会对这种没完没了的争执感到厌倦。他不想对那班抗上的内阁部长们不断重申他的命令。实际上，他原来正是为了给自己省掉那个麻烦，才给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那么大的权力。

随着四月份的结束，我开始有理由相信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尼克松几乎每次和我谈话都隐隐约约地问我他的两位最亲密的助手是否应当辞职。这是个奇怪的问题，因为尼克松从未告诉过我他为什么考虑要和同他相处十年之久的伙伴分手。在水门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尼克松一次也没有告诉过我他

所了解的情况。他在私下采取了同在公开场合一样的态度，说每一次揭发出来的情况他都不知道，随着丑闻的揭露他才不得不来处理，因为他本人不了解其中的内情。

四月二十一日，尼克松从基·比斯凯那里打电话告诉我，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周末去戴维营考虑如何摆脱他们的困境。他们十分苦恼，我是否愿意去看看他们，给他们打打气？我现在同尼克松已相当熟悉，怀疑他除了要给我一些心理上的安慰以外，是否还要我催促他们采取他所希望的作法，特别是他曾不祥地告诉我，他在筹划某些决定性的行动。他说，只是要等待适当的时机。

在其后几天中，我同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谈了几次话。我同情地倾听他们吐诉心中的苦闷，却又无能为力，帮不上什么忙。因为同总统一样，他的最亲密的助手也不愿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只考虑能否保住自己，却没有考虑产生他们目前困境的客观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是否真的了解这一点。后来被称为水门的事件是由一系列临时的决定、零星的谈话以及不同的个人所采取的不协调的行动造成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争相讨好总统，因此把他们在椭圆形办公室内或周围得到的点滴消息严格地对别人保密。

这些零乱事件中有哪些将在调查中被揭发出来，更重要的是，哪些行为是违法的，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心中无数。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掩盖真相”，而认为是一种保护当选政府的手段。他们认为反对派正在破坏国家利益，而这届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不然他们就是比我想像中更巧妙的演员。他们不难接受我那个现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建议：最后早晚要做的事应当立即去做。但是，他们显然并不认为最终有必要辞职，所以眼前没有理由加以考虑。他们似乎认为，只有触犯了刑律才不得不去职。我确信，对他们的留存要有更严格的标准，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太少，因而无法

作出是非判断，此外我也没有资格这样做。只有总统才能作出那样的决定，尽管他千方百计地设法避免。

白宫的瓦解

随着时间的流逝，水门事件使那些企图使政府保持运转的人感到迷惑不解，灰心丧气；同时，使那些直接介入的人变得惊慌失措。我们大家好像是一辆在雾中疾驶而失去控制的车上的乘客，但看到的前景却不同。有些人本来可以把车辆控制住，但由于不了解情况，再加上一种无可奈何的怜悯、效忠和恐怖的复杂心情，使他们不能这样做。那些知道我们面临的巨大危险的人却又不敢刹车，生怕车子一旦刹住，会把他们自己甩下去。

仅仅在十天以前，我还在联邦市俱乐部表达过我的崇高的希望，现在看起来是过于天真了。就在这种气氛中，我登上了纽约沃尔多夫—阿斯多利亚饭店豪华的大舞厅的讲台，在美联社年度午餐会上作我任职四年来的第一次主要公开演讲。演讲的目的是介绍尼克松政府对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新倡议，所谓欧洲年。我的主题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过了一代时间的今天，西方盟国必须明确表达一种新的目标。军事防御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但看来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如果我们要在东西方外交的新时代，在充满经济和能源问题、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新时代保持团结，那末珍视民主价值的国家需要一起来重申它们的共同理想和目标（见第五章）。

对我讲演的反应是友好的，但随后的答问阶段说明公众关心的究竟是些什么问题。听众对我们的新倡议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其它事情：越南停火问题，我个人的计划，以及水门事件。

关于越南问题我还要另谈（见第八章）。至于我个人的计划，

我借此机会暗示我准备离职。但我强调，我觉得有责任留下来，直到当前的国内危机得到克服。

我一向认为，我应在完成一些主要任务以后，当我能在保证延续性的情况下移交我的职务时离去。这清楚地表明，我并非是完全为了个人动机而担任这项职务的，而个人动机总是难以分开的。

在未来的轮廓明朗以前，政府的高级官员目前谈论辞职不是时候。当然，这也取决于总统如何看待一个人的职责。

我有义务留下来，但时间多长我无法猜测，我私下估计还得干几个月。

关于水门事件的问题，则比较难对付。我当时认为，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很可能不得不辞职，或者他们能起的作用难免会大大削弱。但是，我想最大限度地保持推行建设性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性。为此，我必须保护行政部门的权威不受损害。此外，我还对那些长期与我密切共事的同事们感到怜悯。这几种观点都在我的即席回答中反映出来了：

关于这一事件(水门事件)本身，当然，你们大家在报上看到的许多人我都认识；我对他们的了解同你们在报上看到的当然不一样。对发生的事情难免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感觉，因为这场悲剧落到了这么多人身上。不论原因是什么，他们干了、或者据说干了某些事情。所以，姑且不预作判断，至少应当要求人们抱有同情心。

关于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他国家如何评价我国的权威，以及公众对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支持程度有多大。

我毫不怀疑总统将坚持要求公布全部事实，这一点，他已公开声明。但是，当这一条做到后，当人的悲剧结束后，我们的国家还要继续前进。那时，我们应当自问：我们是否经得起无休止的相互攻讦？我们是否应当记住，任何危机都会过去，而美国是长存的；我们大家是否都有义务记住，必须保持对这个国家的信念，国家的希望应当是长存不灭的。

事后证明，无论是宣布新的对外政策方针，还是呼吁公众同

情，选择这一时机都是不恰当的。报界只报道我对水门事件的回答，而对我精心准备的关于欧洲年的发言几乎只字不提。部分的原因是组织工作有毛病。为了减少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的摩擦，尼克松建议我事先不宣布讲话的主题。因此事先没有吹风。结果，只有《纽约时报》对我的讲话作了显著报道，赞扬我要求振兴联盟的呼吁。《华盛顿邮报》首先报道我对水门事件的回答，只是在结尾部分才提到了欧洲年。一些报纸的社论甚至认为我的发言是企图转移对水门事件的注意。

四月十六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坚持必须区别同情和追究责任。它驳斥了这种主张：只有使政府的正常工作同水门丑闻隔绝开来，才能挽回总统在国内外的权威和声望。尼克松应当“公布全部真相”，其它一切，包括欧洲年和全部对外政策，都是次要的：

理查德·尼克松应当信任美国人民，把所有的事实公布于众，只有这样才能使对国家和他本人都至关重要的东西得到恢复。尼克松先生目前的处境非常困难，凡是影响到他的事，没有一件不影响到我们大家。我们相信，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但我们也相信，只有他尽一切努力去赢得对执行总统职务极为重要的公众信任，才能改变这种状况，而赢得这种信任的唯一办法是追查和公布全部真相。……这是他重新获得公众信任、从而恢复总统权威的唯一希望。

同一天的《纽约时报》甚至对寻求同情是否合适提出质疑：

当基辛格先生说到“悲剧落到了这么多”卷入水门事件“的人身上”时，他难道对另外一些人的悲剧真能无动于衷吗？这些人犯了法，但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权力，而是对他们认为不道德的战争提出抗议，然而这些人却无法指望得到本届政府的宽赦。

只有总统坚定地表明我国只有一个司法标准，使最有权势的人同最弱小的人物一样，一视同仁地受到惩罚，并公正无私地执行同情和忍让这些永远

可取的原则，才能最好地维护国内外对我们国家的信念。

这样，水门事件同越南联系到了一起。事实上，越南问题导致了水门事件的产生。

如果报界认为我过于同情我的同事们，白宫里许多人却认为我谈论人的悲剧太过份了，好像这些悲剧已经成了事实。乔治·舒尔茨告诉我，埃利希曼认为，他自己能保住自己的职务，而霍尔德曼的前途却岌岌可危。伦·加门特说，他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了解谁应当对已经被揭露的事实承担责任。至于下一步问题将从何处暴露出来，他几乎无从猜起。

四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周末这两天，我因私事来到纽约，主要是为了见我未来的妻子南希。二十九日星期天下午，我接到尼克松从戴维营打来的电话。他心情沉痛，语不成句。他告诉我，他刚刚要求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也已提出了辞呈。约翰·迪恩已被解职。总统说，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他希望我放弃任何辞职的想法。必须使国家团结一致，渡过危机。

我对尼克松的态度总是矛盾的，既同他保持一定距离，又尊敬他；对他既不信任，又很钦佩。我深信，水门丑闻的根子就在他身上，尽管他不了解事情的全部细节。他定下了调子，促使人们采取了这种态度，使水门事件不可避免。但尼克松还有另外一面，使他成为一个不能小看的人物，并且也说明他为什么能经历种种坎坷而不垮台。他自我约束很严，凭借这一点，他能超脱内心的各种性格之争，掌握方向。我对他这一点很佩服。他像沃尔特·米蒂*一样不自然地梦想使自己变得强硬起来，克服自己真正的温和特性。

* 沃尔特·米蒂是美国作家瑟伯所著《沃尔特·米蒂秘史》一书中的主人公。米蒂是个企图通过梦想逃避现实的典型的平庸之辈，他幻想自己成为赫赫名人，过着神气活现的生活。——译者

他的这些弱点使我很受感动。尽管他在很多问题上优柔寡断，却以罕见的勇气引导我国渡过了一次重大危机。他冒着风险，倡导了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全面和建设性的改革。他对中国实现了戏剧性的突破；他开始同苏联建立了比较积极的联系。他试图使美国摆脱在历史上摇摆于手伸得太长和孤立之间的局面。他深思熟虑，颇为狡猾，但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待人温柔，但有些华而不实；他敢作敢为。这些特性的奇怪的结合在他的心腹中间产生了一种戒备感。他们多少都受到他的操纵，他在中间挑动一个反对另一个。

我很自然地对他讲了些热情鼓励的话，要他不要忘记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在恢复镇定以后，也很自然地又开了一句简短的玩笑，既是请求，又是一种讹诈：“现在埃利希曼马上就要离职了，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管好国家安全事务。”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是什么。我感到迷惑不解，但没有作出反应，以为他的这番话同他发表的许多怪论一样，不一定有什么具体根据。那天晚上，我见到了我的良师老友纳尔逊·洛克菲勒，提到了这件事。尼克松指的是什么呢？“没有什么”，洛克菲勒回答。他虽然很愿意支持美国总统，但很难克服在过去十五年同尼克松的角逐中对他产生的恶感。“他是想吓唬你。”*

第二天是四月三十日星期一。这天上午，霍尔德曼把白宫高级官员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霍尔德曼、埃利希曼、舒尔茨、罗伊·阿什（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还有我。霍尔德曼神态自若地宣布，他和埃利希曼已决定辞职，以使总统能够继续完成他的任务，而我们大家正是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才来到白宫的。

* 第二天上午，事情弄清楚了，尼克松指的是窃听录音带。约翰·埃利希曼对我暗示说，他有一些有关“国家安全”的录音带想交给我。我拒绝接受，并给新任命的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打了个电话，建议由他来保管。

(他们两人都没有提及是尼克松要求他们辞职的。)他说,继续留任的人应当加倍努力工作;我们还有重要的目标需要实现,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我代表其他人回答说,我们深知他们为了工作耗费了多少心血;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并祝他们诸事顺利。

当天晚上,尼克松通过电视发表谈话,以杂乱无章的方式宣布对政府进行大规模清洗。从他的谈话中很难得知,他是否在结束一个时代;人们无法相信这样一个心烦意乱的人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他的讲话是为自己开脱罪责。他的举止无法使人相信他是清白无辜的。他并没有像我们当中某些人曾经希望的那样,冷静地列举已经了解的事实,也没有为记录在案的问题进行强有力的辩护。这篇讲话两头都落空了,与其说它减轻了灾难,倒不如说是确定了灾难的性质。任何观察到尼克松的痛苦和绝望情绪的人都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尼克松已经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

同总统每次发表重要讲话以后一样,我给总统官邸打电话,请他放心。接电话的是他的秘书罗斯·玛丽·伍兹。她的忠心耿耿实在令人感动。霍尔德曼曾经把她撵走,以便他自己能控制外界同总统的一切接触。现在她又回来了,成为尼克松的主要支柱之一。她说,总统的心绪太乱,不能亲自接电话。她将把我的良好祝愿转达给他。

但对我来说,那个夜晚最后是在一种不协调的气氛中结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正在华盛顿筹建联络处。几个星期以前,中国先遣组曾邀请我和其他美国朋友于四月三十日到燕京饭馆吃晚饭。中国人不希望取消这次晚宴。他们只是把时间推迟到十点钟,等总统电视讲话结束以后再开始。

晚宴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当然也少不了为友谊与合作而干杯。我们的中共主人显然不能理解,就因为目前揭露出来的问题,

或者类似的问题，一个国家的中央权力机构就会垮台。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结束这段不正常的时期，使我们能反过来处理美中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主人韩叙大使意味深长地为尼克松总统刚刚勇敢地渡过危机祝酒。他断言，水门事件已宣告结束。

但这一回，精于分析的中国人却弄错了。我们的倒霉日子才刚刚开始。

尼克松政府的改组

尼克松四月三十日晚上惹人注目的讲话加速了政府的瓦解。水门事件已开始使全国着了魔。尼克松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使人感到他既痛心疾首，又在敷衍搪塞，难怪他不象个驾驭危机的总统。他断言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是他所认识的两位最优秀的公职人员，但这同让他们两人离职的决定是难以协调的；他暗示说，他最亲密的同事们以及约翰·米歇尔多少年来都向他隐瞒重大事件，这话在一些人听来是不真实的，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也显得没有说服力。如果尼克松当时不讲那番话，直截了当地宣布政府改组，恐怕倒要好些。

然而，无论讲话的方式如何变化，都已无法改变丑闻的揭发已对美国公众产生的影响，揭发出来的内容包括：闯入水门公寓进行窃听的原原本本的细节；从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里窃取材料；各种掩饰活动；利用政府调查机构刁难政敌；还有一些类似少年恶作剧的事情，例如所谓敌人名单——实际上不过是白宫举行宴会时不得邀请的人的名单，这玩艺儿是历届政府都有的，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尼克松的白宫里那些初出茅庐的二等工作人员，把这一丁点儿鸡毛蒜皮的事儿也搞成了一个全国性丑闻。

几个星期前还稳如泰山的政府，如今一朝瓦解，令人触目惊心。总统就象个恶梦成真、大祸临头、吓得不知所措的人。对灾难的预感是他生活中经常存在的一种潜意识，他越是没有能力说明这种潜意识，就越是为它所缠绕，特别是在他看来万事如意的时候，就越发受它的摆布。而今，本应是他的业绩达到登峰造极之时，灭顶之灾却真的降临了。此刻已是四面楚歌了。如同希腊悲剧中的角色一样，总统在凭着自己的本性行事，从而毁灭自己。我坚信总统确实认为他对事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即主要的是那些背信弃义的部下辜负了他。他实行的惩罚和他的用心也确实不相称。凡是了解他的人都察觉到，他的本性中粗暴的一面不过是出自一种幻觉，在这种幻觉的作用下，他把梦幻中看到的政治家们在危难时使用的残酷手段付诸实施。他觉得他是在仿效他的前辈，从未有意要把粗暴作为他担任总统的主要特征。

尼克松四月三十日讲话之后的数周内，很多朋友向我发出询问，有的抱有希望，有的则惊惶不已，他们想知道尼克松什么时候会发起他特有的猛烈反击。尽管尼克松不时隐晦地提及要反击，可是他从未认真地考虑过这件事。刚刚预料到的灾难已经临头，尼克松似乎只能束手无策地忍受，而且经历灾难的快慢也只有听凭批评家们来定。他迟迟不愿和盘托出全部真情，从而获得解脱——原因可能是他的确不知道底细，也可能是他已把一切都强压到了心底，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他知道从技术上讲已经犯了阻挠司法罪。不过，他也拒不把自己的辩护权委托给一个素谙华盛顿上层政治的律师——无疑，部分地是因为他为自己竟需要这样一个律师的处境感到尴尬。因此，他干脆就消极地忍受着，从来不向任何人吐露他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为自己辩护时，他没精打采地要么支吾搪塞，要么半真半假；对政府工作也敷衍应付，全无他第一届任期中赖以取得成就的那种聚精会神、精力充沛的工作劲头。

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后不到几个星期，尼克松总统任命约翰·康纳利、梅尔文·莱尔德和布赖斯·哈洛在白宫官员中担任高级顾问。这些在华盛顿官场上饱经风霜的人，本来是要他们显露职业家的作风和稳住阵脚，要他们在政府工作中拿出一套全新的、体面的做法。这些人本来也确实能够作出一番重大贡献，只是尼克松已一蹶不振，心灰意冷了。他没有组织起他的政府，而是更深地陷入内心的怨恨和恐惧之中。他把这些杰出的领导人请到白宫以后，却想不出让他们做什么。这些人没有明确的任务，也就于事无补。不出几个月，他们统统都辞职了。

越来越孤独的尼克松此刻最需要的莫过于一位看门人，在他和他现在更不愿意亲自处理的矛盾之间起缓冲作用。他决定启用亚历山大·黑格接替霍尔德曼任办公厅主任就说明了这一点。

四年多来，艾尔·黑格和我一直是同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当尼克松总统要我当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我觉得事关重要的是要在我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有一位军事助理，这位助理要向白宫而不是向五角大楼直接负责。在这之前，曾经有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名联络官起这个作用，我就提议继续保持这种建制，只是这位联络官一定又会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五角大楼提交上来的立场性文件。当时越南战争正要结束，我要找的是个属于我的人员编制内而又让军方信得过的军官，他应能解释军方的观点且又不受军方观念的束缚，同时，又能将白宫的想法反映给国防部门。

这是一项微妙的工作。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认为，我以前是教授，最合我心意的人选莫过于一名在世界名牌大学里拿过高等学位的军官了。由于我在这类大学中任过教，我并不把这些学位所标志的才能看得那么高，不管怎么说，我对这种情况可算是相当熟悉的。我要物色的是个较为粗率的人，一个有实战经验、因而对作战计划的实际复杂性比较熟悉的人。弗

里茨·克雷默这位老顾问提出了小亚历山大·M·黑格的名字，黑格当时是西点军校的上校。我的一些朋友，如乔·卡利法诺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积极推荐黑格。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期间，黑格曾在他们两人手下为五角大楼工作过。由于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赞成这个人选，我同黑格见了一次面以后就把这个职位给了他。

黑格很快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人。他对我的种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以约束，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一群桀骜不驯的天才之中实现了团结和秩序。当年年底我就正式任命他为我的副手。在尼克松第一届任期的整个过程中，黑格一直充当我的伙伴，他临危不惧，果敢善断，精干练达于官僚内讷，孜孜不倦于肩头重任。

确实，没有一套残酷手腕，谁也不能幸免于白宫里杂乱无章、互相倾轧的政治斗争，尤其不能幸免于尼克松的白宫政治。我不能不注意到，黑格无情地把那些引起我注意的潜在对手排挤到一边。他毫不反对限制职员们同我的直接接触，或至少不反对使他成为与外部世界联系上的主要中间人，甚至我为了节省出时间、集中考虑大事而部分地鼓励这种作法时，他也不在意。与此同时，我敢说，他也并非不愿意在我的部下面前充好人，象是在调和与我和我严以律人、有些异乎寻常的天性。他煞费苦心地和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尔后又和尼克松建立起私人交情。我毫不怀疑，他们肯定认为他比我更忠于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怀疑黑格是否一向都抗得住尼克松的这一说法，即说我是个需要由更稳重的人降服住的神经质的天才；或者他是否反对那个主张，即他能帮助我的主子起到降服我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和我的上司合伙来镇压我。

其实，这不过是在说我承认黑格厉害。办公厅主任所用的一个诀窍就是下达一个业已软化到家的暴戾的上司发出的令人不快

的命令；我本人就是用这个权术处理我和尼克松的关系的。别人把我看作白宫里的好人时，我也从未竭力反对过。从这种意义上讲，黑格使我作法自毙了。

至于黑格同尼克松及其部下的关系，从白宫的心理状态上讲，究竟他是为了使我有目的地行使职权而把个人偏见压到最低限度，还是鼓励这些偏见以施展个人野心，这二者之间的分界线是不容易划清的；也许这条分界线在黑格的心目里有时也含混不清。在一九七二年越南谈判激烈争吵的最后阶段里以及当着我逐渐在公众面前显露头角的时候，黑格越发靠向了尼克松，使得我和尼克松的关系难以相处。这部分地是因为黑格有自己的真诚信念（他很可能赞同纯军事的战争结局）；部分地是为了应付在忠实于他的顶头上司（我）和向他的总司令（即总统）尽职之间出现的矛盾。这在我和黑格的关系上引起了一时的极度恶化，以及数次气氛紧张的长途电话交锋。然而，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最终我对于黑格的正直、胆略、精明强干和爱国主义精神还是很敬佩的。

尼克松任第二届总统之初，黑格要求重返军界，继续他的陆军生涯，尼克松和我勉强地同意了。无论多么显贵的文职工作，做得太久只会毁掉他日后的前程。他被任命为陆军副参谋长，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青云直上，从上校跃升到四星将军的高位。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日晚，罗斯·玛丽·伍兹给我打来电话。她告诉我说尼克松想让黑格担任一、两个星期的办公厅主任。尼克松担心我会因过去的一个下级现在在技术上成为我的上级而不满。她希望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同我谈起这件事时，我不要使他难堪；还让我记住，由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尼克松还在大伤脑筋，他需要别人助他一臂之力云云。当然——她说——她是瞒着上司自己主动打的电话。（十有八九是尼克松站在她身旁给她提词。）

这是典型的尼克松做法：害怕对抗，办事绕弯子，对我可能作出什么反应了如指掌，并企图用荒谬的、哑谜猜字式的方式来软化我的反应，使他渡过第一道难关。凡是熟悉尼克松的人都知道，他需要的办公厅主任不可能只当一、两个星期就够了。在水门事件中，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个办公厅主任。我以前经常看到、有时也加入这一类的小把戏：给苦药丸般的决定裹上糖衣，即先提出原则，尔后让人们对该措施加以默许，而措施本身就暗含着让人默许的意思。

同往常一样，尼克松对我的心理估计是正确的。过去的下级现在成为自己的上级，总不是那么痛快的。特别是黑格对国家安全事务感兴趣，这就形成了潜在的实质性的竞争。然而，我也意识到，当时的局势早已不是一般的官僚规章或是什么白宫内的权位之争了。要想避免全国性的大灾难，政府里，特别是白宫这个中心里必须要恢复团结统一。尼克松在他第一届任期中始终都依赖霍尔德曼；要是没有一位强有力的办公厅主任为他分担管理官僚机构的日常工作，把他的决定付诸实施，他显然无法办公。由于“水门事件”，再找一个人地两生的人担任办公厅主任已不可能了。无论如何，没有谁比黑格更有资格了。他熟知尼克松的脾气秉性、工作作风和心理需要。于是，我准备在这件事上作出最好的姿态，让人人轻松地迎接这大势所趋之事。

谙于世故的黑格第二天早晨就来找我。他说：如果我不赞成，他就不接受这个任命；再说，横竖不过一、两个星期的事。这和罗斯·伍兹最初的建议一样，全都是胡说八道。黑格对职务的责任心如此之强，不管我的反应如何，他都不会拒绝总统的请求。一旦他在白宫里立住了脚，是不可能数日之后就离开的，况且，需要他到这里来的那种情况也不可能迅速转变。总之，黑格是唯一可行的人选。我十分坚定地对黑格说，即使这可能会断送他在军队

里的前途，他也必须接受任命。他回答说，当他在越南巡逻的时候，他可能失去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而且是自己的生命；他无权置他的总司令于危难之中而不顾。他这样说会令人感到惭愧，但他是正确的。

做好这番准备措施以后，尼克松才给我打电话（他这时还未准备好和我直接对峙）。聪慧无比的尼克松为任命黑格提出了一条辩驳不倒的理由：启用黑格，目的是为了增加我的影响，矛头是针对阿格纽的。总统说：黑格的重要作用是制止阿格纽“到处插手。噢，不过阿格纽是插不了手的——我们根本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一位总统居然需要一个大权在握的办公厅主任来控制一个手下只有少数工作人员、受命无几的、根本无法“插手”什么的副总统，这真是令人越想越糊涂。尼克松强调，无论怎样，我都不必担心，我在对外决策方面仍将起主要作用，他说：“我们俩今后管这事。我非得找个人——这事挺怪——找个能处置这事的，这样你和我就能干别的啦，明白吗？”我回答说，在实际中，各种职能都会自动按部就班的。当我告诉尼克松我已经劝黑格接受任命时，他似乎大大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黑格当上了白宫办公厅主任。这是全国的幸运。他以他的力量和纪律性，保住了政府机构内部的团结统一，并协助政府渡过水门危机，免于分崩离析。他给一位在绝望中挣扎的总统提供了心理镇定剂。他做到这一步，并不是靠百依百顺地听从尼克松的所有偏见；他保证了尼克松的意向和命令都能经过一个政府机构的审查，而这个政府机构本身是有能力就有关国家利益的问题向总统提出成熟的建议的。

黑格的第一个行动是废除主观武断的程序。他心里清楚，再也不能照本宣科地——正如人们从来不愿这样——执行根据总统说一不二的旨意作出的决定了。他作出重大努力来扩大参与制订

政策的人员范围。5月18日，他向内阁残余成员的会议报告说，内阁成员的地位已得到提高，白宫工作人员的影响已经降低。白宫人员的调整开始了。而且还需要作出一番真诚的努力，来改善同国会的关系。

不错，这些措施中有些是迫于水门事件的形势而采取的。然而，黑格确实使一种不明确的必要性有了实质内容，使人心涣散的政府有了方向。当时，虽然任何内部调整都不大能赶上似乎无穷无尽的披露、危机和调查迫使政府解体的速度，但是黑格在国家处于走投无路的形势下出色地、体面地为国家尽到了职责。

在后来的十五个月里，黑格和我融洽无比地一道工作。这当然不排除偶尔地因为计较地位而引起的小口角——比如，尼克松一九七四年访问莫斯科期间，曾因在克里姆林宫里我俩谁的卧室离总统的更近一点发生过争论——可这些不过是区区小事。黑格处理国内事务，我负责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凡是我向尼克松提出的重大建议，都和黑格商量，他通常也向我通报那些可能影响外交政策的国内重大事态发展，特别是水门事件。和其他官员一起，我们竭力要稳住国家航船，尽管这时的船长正被慢慢地推下驾驶台。诸如乔治·舒尔茨、阿瑟·伯恩斯、威廉·西蒙、伦纳德·加门特、詹姆斯·施莱辛格和安妮·阿姆斯特朗等等，他们视国家悲剧为履行己任之召唤，用实际行动肯定了我们国家继续往开、压倒一切的价值观念，为国家履行了崇高的职责。

录音带和窃听

人们简直象生活在火山口上；我们这些力图使政府继续运转的人可又不知道火山什么时候会再次爆发。和黑格，或者加门特，或者诸位律师的每次会晤结束时，几乎都要出现这样一个疑问：统

统都暴露出来了吗？回答总是：无人知晓。其他的无名职员是如何利用法外的或是别的不正当的活动，以证实自己的忠心，这也无从猜测。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各种揭露势如潮涌，似乎看不到尽头。

披露出来的事情中最令人吃惊的是，尼克松从一九七一年初开始就用磁带把他所有的对话录下来了。这是黑格接替为办公厅主任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得知的。他告诫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谈任何事都要当心，那里装有一个只要有声音就会启动的录音系统。

看来，只有霍尔德曼及操纵这一系统的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知道这个录音装置，连埃利希曼似乎也被蒙在鼓里。这个念头的产生是在尼克松发现了约翰逊总统在白宫安装了一套录音系统的时候。当时他下令把它拆掉了，可后来，当他发现自己的周围不断泄密，还有人四处张扬说他是政府里的坏蛋时，他又变得比较赞成安装录音系统这个办法了。（然而他忘记了约翰逊的录音系统是总统从办公桌那里控制的，那样是可以在一次对话之前、之中以及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之后进行删选的。）有迹象表明，在肯尼迪时期，也曾安装过录音系统。^④

尼克松的录音带原打算存放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里，供日后的研究人员参考用。霍尔德曼曾写道，尼克松的动机是保护自己，免受那些参加过问题的讨论、但日后又可能否认参与此事的同僚们的影响。这种保险的代价是高的。如果说入侵柬埔寨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显然既是个客观上的因由，又是被监视的对象。尼克松的目的是不让我在有我参与作出的决定中充当“好人”。^⑤显然，尼克松没有料到他自己的对话方式、浪漫的幻想和现实在他胸中交织的程度竟能置他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这危险与其说是法律性的，不如说是历史性的。多年来的即席讲话记录手稿，或是被断章取义了的冗长的对话，变成如

此无情、如此只字不落的记录，在它面前，即使一个不如尼克松那么复杂的人，怕也殊难不遇到麻烦；而在那些可能解释记录的真实意义的目击证人隐退之后，尤其如此。由于录音系统是声音启动的，就连它的创始人也无法控制。这点恰恰颇有讽刺意味地象征着白宫人员基本上失去了控制的情绪：他们过份相信机械的工作程序，一味地死扣硬搬，交给他们搞出记录的工作，就未免做得过分。这种态度最终必然会毁掉尼克松正以极大的热忱树立起来的形象。

任何熟悉尼克松谈话方式的人都会确信尼克松正坐在定时炸弹上。他谈话时漫无边际、藏头掩尾、间或感情冲动的特点，必定会使历史学家们感到吃惊和引起他们的误解。他那种转弯抹角的工作作风，简直不是一个局外人所能判断的。谈话中，什么是他打出来试探对方的，什么是他要人严肃对待的，根本无法辨明；一个局外人也无从分辨出哪个是必须照办的命令，哪个是不必理会的感情冲动——这后者还许是故意叫人不睬的呢。

假使尼克松正常地沿任了总统，他会怎样利用这些录音带呢？我说不好。我怀疑是否真有人着手考虑过将七年之久的对话誊写成交文，更不必说组织了；我有位朋友是精神病医生，他有一次对我说，他把他的病人的话都录下来过，但后来发现“听一个小时的录音要花一个小时”，以后再也不录了。而对于那些孜孜不倦的听者所进行的历史研究说来，这些录音带的价值也大可怀疑。一切不了解内情的人客观上将如何理解录制下来的那些见解和感叹，那些同高尚的声明混杂在一起的有失检点的奇谈怪论，那些同当时讨论的主题几乎毫无关系而仅仅反映了尼克松青年时代的偏见的意见呢？特别是这一切又是房间里面唯一了解录音系统的存在、因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随心所欲地制造戏剧性场面的人安排的。要想懂得每句对话的含意，就需要理解对话的内容，理解尼克

松多变的情绪和刚愎的权术。除去这些，那就只剩下漫无边际的沉思冥想了一——这些听起来也许会使人着迷，很有兴味，但其大部分却不能当作总统各个行动的基础。

例如，尼克松最喜欢的权术之一是，召集一个会议，而除了个别犯上不服的以外，每个与会者的观点要么尼克松早已事先知道，要么就是他事先一手安排好的。尔后，他便表面上先接受他不同意的立场，再让他的同僚劝说采纳他自己真正的观点，而这些同僚中有些人的表态是经过预先演习的，这样一来，可能坚持不同意的人就完全孤立了。当相反的理由已经明显地说服了总统的时候，再要坚持自己立场的人，就得有坚强的意志。^⑥

如果说总统自己的话不是研究人员可信的材料，那么，与总统对话的人的答对也不能称之为可靠。总统助理必须在使用自己的理智、获得眼前的成功和冒失去总统在他负责范围内的支持的风险之间，掌握平衡。总统的本性都是唯我独尊。然而，尼克松冥思苦想出来的东西却很容易引人同意，因为根据经验，越是他肆口断言的，就越少会付诸实施。无怪乎我们很多内层人物总是鸦雀无声地听取那些要是在抽象的学术辩论中就会被提出异议的观点；有时我们也提供些看法，但那主要是为了当时的种种需要——其中之一就是使大家能够和颜悦色地快点离开那里——而不是为经受日后的盘查。

录音被揭露后，回过头来看，我明白了很多事，既有无辜的，也有经过谋划的。例如，总统和外国领导人谈话的时候，我几乎都在场，做正式记录员。在一九七一年初的一份奇怪的备忘录中，霍尔德曼指示工作人员不要过多注意总统谈话记录中的实质性细节；我们应该集中注意谈话的气氛和个人印象。这是我没有执行的命令之一，至少在确保留存一份完好的记录方面是如此。我觉得硬要总统口授自己的笔记，对他来讲是额外的负担，特别是这样的笔

记非常不可靠，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霍尔德曼。他并没有向我提示总统制备实质性记录时使用的其他方法。

我知道了录音的事之后，就清楚了其他更为迂回曲折的手腕。很多对话在当时还听不出所以然，而现在就真相大白了。从录音中，我可以看到各种场合，有的是别人策划好，故意不让我置身于某些事态之外，有的是别人把我记录在案，表明我支持过一些复杂的计划。比如，尼克松下令对北越进行轰炸和布雷的那一天，在签署有关命令前五分钟，我被召到总统办公楼尼克松的书房里。我在那里遇到了霍尔德曼，他一反前一周所说的一切，列举各条理由，反对发布这项命令。尼克松一声不吭。我为这个决定辩护，并且强调当时再改命令已为时过晚，还指责霍尔德曼干涉实质性问题。尼克松当即默然无声地签署了命令。后来，录音带里所体现的是，霍尔德曼据理反争，我本人直言力谏，尼克松沉默不语。^⑦

水门事件十分清楚地说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每时每刻对每次谈话预作安排。结果总是作茧自缚。即使不发生水门事件，这些录音带也会严重损害尼克松的声誉，这些录音带越是拖延公开，尼克松的癖性越是为人们所忘怀，他的声誉就越是保不住。假如事情是按原计划发展下去的——而且这些录音带是在尼克松死后逐渐公开的话——那么尼克松就会创造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死后自杀。

说来奇怪，我一九七三年首次知道了那个录音装置的存在，但我不敢说在那之后我对总统讲的话就改变了很多。总统当时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特别需要援助，加之我们国家的安全又那么依赖他的作用，所以，尽管我知道我所说的话在讲话内容过时之后很久会被后人听到读到，我却还是以帮助总统、维护国家安全为重的。

我再次注意到录音带，是在六月下旬的一周内，当时，前任白宫律师约翰·迪恩正在全国电视节目上在萨姆·欧文参议员的水

门事件委员会上作证指控尼克松。黑格告诉我说正考虑公布一盘录音带，驳回迪恩的证词。他自己可一点录音带也未听过。那些律师们显然是搞到了一些录音带（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他们以为抓住了迪恩搞严重伪证。我警告黑格说，公布一盘辩白用的录音带，就要暴露整个录音系统，这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人们要求公布所有录音带。一定要等到尼克松准备作出这一步时才能这样做。或许由于我的建议，或许因为律师们发现这些录音带并不象他们最初认为的那样有用，我再也没有听到别人提及这个提议。

我又一次考虑到录音带时，是亚历克斯·巴特菲尔德七月十六日在欧文参议员主持的水门事件委员会作证时通过电视公开透露了存在录音带。布赖斯·哈洛和我就此事闲谈过，他说他夫人听说后兴高采烈地认为，象狐狸一般狡猾的尼克松使他的敌手不知所措了；录音带肯定会证明他是无罪的。哈洛和我不那么肯定。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些录音带可能揭露出什么有关“水门事件”的东西来。然而，就我们所知的情况，就我们所知的趾高气扬的总统和消沉沮丧的总统曾是什么样子，我们就猜测到这些录音带的披露肯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亚历克斯·巴特菲尔德公开揭露那些录音带的当天，我正和纳尔逊·洛克菲勒在他华盛顿的公寓里共进晚餐。他认为这些录音带必须立即销毁。因为对于任何曾经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的人来说，录音都是一种出卖行为。特别是谁也不可能一次听完所有录音带，或者尼克松和他的亲信，或者把录音带最后控制在手的任何人，都可能选择地利用录音带进行讹诈。可是，尼克松当时正患肺炎，住进了医院。他当时并没有征求旁人的意见。待到他出头露面，为时已晚，要求获得录音带的法律程序业已开始了。

事后看来十分明显的是，从那时起，尼克松的总统职务已经保不住了。当初，只要他的高级助手的证词相互矛盾，一旦参议院听

证会结束，由于旷日持久而产生的厌烦情绪，由于无法对不同的说法作出明确的判断，而有可能使这场危机失去势头。但是，对白宫录音系统的揭露，把上述这种可能性一扫而光。人们对秘密录音的做法最初是愤激不已，似乎尼克松犯下了他独有的大错，可又不理会尼克松的前辈同样使用过录音系统这一事实。然而，如果说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录音并非没有先例，这事从未象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地四处张扬过。更重要的是，也从未发生过单凭录音带断定一位总统及其亲信可能受到的刑事制裁。自那时起，水门事件就成了以总统为一方、以国会调查委员会和五月间任命的特别司法部长为另一方为获得录音带控制权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与此同时，尼克松为要独揽这一权力，搬用了宪法上有关分权的原则。

无论这场法律辩论有什么微妙之处，尼克松无可避免地被指控为掩盖犯罪资料，而这场辩论本身就可以使形形色色的指控一劳永逸地站住脚。从这以后，就再也不是各见证人是否相对可信的问题，而是总统竭力隐瞒犯罪证据的问题了。且不管这场官司的结局如何，就其性质而论——其含意是说尼克松有罪情要隐瞒，就彻底破坏了尼克松的道德地位。以美国有史以来第二位的最大多数票赢得的总统职务，尼克松干了六个月就落得名存实亡了。

“管子工”和窃听器

“他知道什么？他什么时候知道的？”霍华德·贝克参议员的这两个问题成了欧文参议员的选择委员会举办的由电视转播的水门事件听证会的一个专用标记了。随着不断扩大的调查和指控，有越来越多的白宫工作人员受到诘问，要求他们就范围越来越广泛的各项决定作出解释。水门公寓的闯入和掩盖手段以及艾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被盗这些事件居然和毫不相干的有

意见分歧的外交政策决定联系起来。轰炸柬埔寨和在智利的秘密行动也被拿来试问，由半真半假的诉讼程序加以追查，以期查明某种哲学和政治观点。我身为出事时期的安全顾问，无可避免地也卷入到这场争论中了。在水门事件灾难的初期，尼克松的敌人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没有将主攻的矛头对准执行外交政策的人，他们这样做是有既得利益可求的。随着尼克松的衰弱，特别是在他下台以后，这场大混乱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就沦为那些从水门事件中汲取精神食粮的人们的攻击目标。这一小撮攻击者，竭其仇恨之能事，有时似乎不知道还有个制订政策的总统，只知道有个国家安全顾问。

柬埔寨和智利问题我当别论。水门公寓的闯入，或是艾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失窃这类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批评家们重点攻击的那些活动领域，正是我为保护国家安全的情报的努力。为保证记录完整无缺，我谨在此加以阐述。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不言而喻，必须负责保守军事和外交机密。一个国家不能严守就有关敏感问题进行交往的机密而失去别国的信任，等于失去进行外交的能力。这样的国家在谈判中将一败涂地，它将得不到极其重要的情报。如果每一试探性接触甚至在摸清对方的反应之前就顷刻变得人人皆知，那么，对于阐明立场来说十分必要的开诚布公的交往就不能进行。外交变成了壕沟战。如果内部考虑泄露出去，就会给外国政府造成可乘之机，而且会阻塞总统的同僚向他直言不讳地提供建议的渠道。

历届政府无疑都有一种把政治上难堪的事同维护国家安全的大事混为一谈的倾向——尼克松政府可能比其他大多数政府更为严重。但是，在公平之道面前，人们不得不承认，当战争尚在进行时就恶毒攻击政府的目标，有系统地以拒绝服从政府法令的方式阻挠政府政策的实施，或是广泛鼓励人们通过有意泄露机密情

报来破坏那些合法的、经过深思熟虑制订出来的政策，这种情况，在美国内战以来的历届政府中，为数还是不多的。

作为安全顾问，我认为帮助政府堵塞泄露机密的漏洞是我的职责。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向朋友也向敌人表明，即使是处于激烈的意见冲突之中，我们也依然能够执行一项严肃的外交政策；表明我们值得信赖，有能力保守住别国的机密。如果失窃的文件象货币媒介一样四处乱飞，我们的政府还视若无睹，那么在国际谈判中，我们的信心和能力就会受到损害。

一九七一年六月，当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时期的七千页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机密档案——即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泄露到新闻界手里时，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严重了。这部分文件中没有任何东西会使尼克松政府难堪。这批文件本来可以用来支持这样的看法，即我们从上届政府手中接过了一副烂摊子，尼克松白宫里的一些人也敦促我们这样利用泄露出来的文件。最初，我还以为是是我们自己人出于此目的，故意泄露出这批文件的。得知这些文件公开发表后，我就从加利福尼亚给黑格打电话，要求严加惩处犯罪分子。

然而，尼克松从一开始就认为把越南战争归咎于他的历届前任是不合适的。他认为，他应该感谢那些为这场战争奋斗了多年的人，感谢那些死难人员的家属；他没有把他们作出的牺牲贬低成一位总统的过失。他的大度作风所受到的报答是，那些曾决定派遣部队的人中有许多人鼓动违抗政府法令，致使解脱他们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当五角大楼文件公布后，尼克松是始终如一的。他拒绝了由一党作出反应的建议。他认为，如果不能制止非法泄露这样大量的机密材料，保密的闸门就会被打开，政府的工作程序就会被打乱，还会损害别国对美国的信任。他这并不是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考虑的。我们当时正处在我秘密访问北京的前夕；

正在同河内举行秘密会谈，当时我们认为——结果证明我们错了——已经接近突破；同时，我们正在探索与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以及进行从柏林解决办法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一系列的敏感谈判。如果其他国家感到我国政府是在疲于应付局面，政府的组织纪律日益涣散，那么所有这些努力都会受到挫折。盗窃并公布五角大楼文件的动机，显然是要发动一场政治战，压我们接受在越南问题上我们认为不体面的条件。

我同意尼克松的观点，并且几乎肯定加强了他的看法。我当时认为，现在依然认为，倘若每届总统都利用他控制公开机密材料的权力，诽谤他的前任总统，或者把保护机密文件当作党派斗争中的权宜之计来对待，我们的政体就要完全失去统一性。我的确深感行政部门应该使人感到它处处在抵制这种对信誉的大肆破坏。我意识到那些企图强令在法庭上公布文件的法律步骤；并没有人就这些步骤和我正式协商，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

在我从报纸上读到消息之前，我丝毫不知道白宫“管子工小队”撬开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一事，艾尔斯伯格是五角大楼文件盗窃案中坦白了的罪犯。这次闯入实在卑鄙、幼稚，而且是自我毁灭；这个事件使以刑事审判炫耀自己公然无视法律、擅自泄密的那个人的计划夭折了。时至今日，我难以理解这次闯入道理何在；因为，如果精神病医生的文件证明艾尔斯伯格神经不正常，那只能对他的辩护有利，对政府的起诉不利。如果说这次闯入从行动上讲是蠢笨的，从道德上讲，它也是不可原谅的；由白宫策划的、行动上丝毫没有体现出执法权威的一场盗窃案，只能是一件丢脸的事。

这个“管子工小队”——顾名思义，它的工作是堵塞漏洞——是属于约翰·埃利希曼办公室的一部分。犹如水门事件的其他几个方面——例如那个敌人名单——一样，“管子工”这个儿童专用

语般的名字，比它涉及的实际行动更使人感到它的不良居心。就此事本身而言，倒也没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不过是派两名工作人员调查泄露机密文件的案子。看来需要采取这一行动的念头，是当尼克松越来越不信任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小埃德加·胡佛的时候在他脑子里形成的。时至一九七一年，尼克松就已经确信，如果派胡佛调查某案，他就会反复无常，忽而无故停止调查来打掉那些使他不痛快的、或是由于个人偏见说点怪话的人；忽而又因私人交往，宽容一些嫌疑犯。尼克松认为，胡佛和艾尔斯伯格的老丈人有交情，这肯定对严肃调查五角大楼文件失窃案有妨碍。特别是，尼克松想，胡佛完全有可能利用他从调查中搞到的一部分情况对总统进行讹诈。尼克松下定决心要在一九七二年大选后尽早除掉胡佛，并不让对方抓到把柄，破坏这件事的进程。*

令人吃惊的不是“管子工”的存在，倒是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两名清白如洗、中产阶级的可又连起码的调查训练也没有接受过的年轻小伙子。埃吉尔·克罗和戴维·扬二人，纯属那些规规矩矩、富有理想主义的美国样板青年。而且从根本上来说，他俩也就是那样的青年。我不太了解克罗，至于戴维·扬，是我和他在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办公室里结识以后，把他带到华盛顿的。他当上了我的私人助理，因为我希望在我身边的是一个我认为富有能力、道德高尚又忠心耿耿的人。只是这一任命并未得出好结果，一则因为扬迎面撞上了不好对付的黑格，黑格是要小心翼翼地保住他和我的直接联系的；二则因为他干这个差事是大才小用了。一九七一年一月，扬从紧挨我的办公室调到白宫情况室，监督研究人员的工作。他当然不满意这个职务；一九七一年七月，他高高兴兴地来到埃利希曼的手下，当时我正在中国秘密访问。回国后，扬的任

* 胡佛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初去世。

职——检查各部门的销密制度(最初确实是这一工作)——已作为既成事实摆在了我的面前。埃利希曼启用扬,并非没有受到白宫工作人员狭隘嫉妒心的影响;埃利希曼也利用一切机会极力表白,说他比我更会使用人材。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很不满意埃利希曼事先既不和我商量、又乘我不在国内之机录用了我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戴维·扬就是从这个职务上钻到“管子工”里边的——也许他的职务的一部分就是干“管子工”,这我从未搞清过。

“我是否知道‘管子工’”这个实质上毫无意义的问题,在水门事件带来的卡夫卡小说式*的气氛中,竟引起了又一场争论。白宫以外的人也许不相信,但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要想估计到别人认为你知道什么情况,是相当难的。我自己当然完全清楚,埃利希曼的职务是负责调查安全措施漏洞的,尽管他千方百计地守住细节,不让我知道,除非有和我的职务发生直接关系的。我并没有发觉,或者说也不想知道有一个调查安全措施漏洞的特别单位,以及该单位中的成员实际上并没有除此以外的任务。我当时只估计到,委派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是专案性的,这组人中包括克罗和扬,尽管他俩很有可能认为我一向知道他们是专职搞调查的。然而,即使我事先就知道这些,我也不会觉得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白宫由一个调查小组来保护其机密资料有什么不合理的。时至今日,我也不认为“管子工小队”——那场破门而入除外——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是非法的和不正当的。**

另一个事件,也是我亲身参与了的,是一九六九年五月到一九七一年二月之间,给一些人士安放了十七枚窃听器一事。我在回忆录第一卷^①中已讲述过窃听的事,这里重新回到这个题目上,是

* 弗朗茨·卡夫卡(一八八三——一九二四),捷克作家,曾写小说抨击官僚、机械、使人变态的现代世界。——译者

** “管子工”事件后来被定期提出来。参看第十八章和第二十四章。

因为这件事在一九七三年暴露了。尼克松在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的前一天晚上讲到的神秘的“国家安全问题”，原来是指的窃听记录，窃听器事先(我不知道)安装在埃利希曼的保险柜里；埃利希曼辞职时，联邦调查局没收了这些记录，而且很快就由此向外界泄露。窃听问题在一九七三年、尔后又在一九七四年酿成一场大争论。有些人把这和水门事件联系起来，试图证明尼克松政府从骨子里就好干非法活动。

在窃听这个问题上，许多人采取了极其伪善的态度。他们制造了一个神话，好象电子监视手段只是尼克松政府的发明。这当然荒唐可笑。窃听的名字听起来可能令人讨厌，可它的普遍程度不亚于电话，它的历史几乎也同电话一样悠久。所有西欧主要民主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使用窃听手段进行调查、搜集情报的规模，只能使尼克松政府的那些活动相形见绌。但这只是因人论事的开始。两个党的总统过去都搞过窃听，似乎比尼克松执政时期更加普遍，采取的防护措施更少，规定的标准也更松，但是尼克松的敌人却抓住尼克松较少的几次事件不放。尼克松就任总统时，执法官员们就是这样说明的，并且也有大量业已发表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富兰克林·罗斯福看来就使用过窃听手段监视过白宫工作人员助理、孤立主义领袖、政敌以及记者的活动；他身后所有各届政府显然都积极地沿用这一传世之术，直至尼克松上台。^⑤更重要的是，在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一年间出于国家安全目的进行的窃听，是明确符合当时生效的行政和法律程序的；只是一九七二年最高法院作出决定之后，搞窃听才需要有法庭许可证。^⑥

毋庸置疑，窃听是令人讨厌的。然而，在战争尚在进行之际，故意擅自公布军事和外交秘密也同样可恶。那些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员，在一九六九年初期就接到过他们的前届总统——特别是艾

森豪威尔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警告：在官僚机构内，正在日益兴起一种危险的做法，即那些不同意国策的人可以通过犯法、泄露机密材料来肆无忌惮地破坏国家政策的执行。我们发现这些警告实际所指的是诸如谈判立场、军事行动和内部争端一类的情报如滔滔流水一般地涌向新闻界手里。新闻界所取的立场是只对出版和广播负责，不对国家负责。政府保守住自身的秘密只是它自己的事——其实这正是政府要努力做到的。

到一九六九年春，尼克松确信，泄露出去的有关军事行动和敏感谈判的情报正在危及美国人的生命。他于四月二十五日的一次会议上与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小埃德加·胡佛进行了磋商，这个会我参加了一部分。胡佛建议安装窃听器，并指出，所有前届政府均使用过这一手段，至少从罗斯福政府开始，就曾出于同类原因或为达到理由少得多的目的进行过窃听。司法部长也肯定了窃听的合法性。尼克松命令针对三种人进行窃听：能够接触到已经泄露了的机密材料的官员；在敏感职位上，又在其保密夹中发现敌对性情报的官员；以及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中发现可能有牵连的人员。后来，尼克松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二日写给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信中勇敢地承担了作出决定的全部责任：

我谨无条件地确认，参与此次调查各方面行动的基辛格国务卿及其他人，是在我的特别指示下行动的，是在执行我的明确命令。

出奇的是，就连这段话也未能平息那些诬告我什么“提议”、什么“指示”、什么“命令”搞窃听的胡言乱语。由于文字记载杂乱无章——只有胡佛才保存记录，他是善于保护自身的大师^①——因而这方面并没有白纸黑字的档案记录。然而这里却用得上一人之常理。怎么能够想象在尼克松政府的官员中，一个因同自由派有瓜葛而普遍不信任的、一个只负责外交政策的、又是初出茅庐的

新手，任职不出三个月，就能担当起约翰·迈克尔和小埃德加·胡佛这样的大人物专权管辖的有关一项执法计划的倡导和组织工作呢？

事实真相要简单得多。我完全同意尼克松的意见，即必须采取某些措施，堵塞漏洞；迈克尔和胡佛推荐了这个计划；尼克松下的命令。我的办公室执行的那部分，是根据尼克松提出的三条标准的第一条——也就是能够接触已被泄露的材料的人——把我们知道的这类人提供给联邦调查局。在处理每个案子时，联邦调查局都向司法部长申请批准，窃听这些人的谈话。联邦调查局不时地将平均一页左右长的总结简报送到我的办公室，内容是调查局认为涉及讨论秘密军事或外交政策事宜的谈话。

根据这一计划，联邦调查局最后给十七位官员和新闻记者装了窃听器。我的办公室没有提供所有这些人的姓名，也并不了解每次窃听的情况。*（如果某人被窃听，但他的谈话没有涉及军事或外交事务，他就不会被写入报告，我和我的办公室里的人也就无从知晓对他窃听的情况。当时没有机会、我也更不愿意花费时间去如饥似渴地读那些记录下来的私人对话。）联邦调查局认为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那些谈话简短报告送往我的、总统的和霍尔德曼的办公室，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一九七〇年五月，第一次窃听一年之后，尼克松命令停止向我的办公室发放该报告；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任何这类报告。自那以后，霍尔德曼显然是唯一收到报告的人，直至一九七一年二月整个计划被打断。

* 自始至终，送到我办公室的报告里，只含有十七个窃听器中六个的窃听情况。有三人的姓名是霍尔德曼的办公室、而不是我的办公室提供的。联邦调查局备忘录（根据黑格上校或我本人“要求”建立的）上罗列的名单里，有四、五个人的姓名（其中包括三名我的工作人）实际上是在四月二十五日的会议上胡佛特意硬塞给尼克松的；其余的姓名是在侦察过程中出现的，是联邦调查局提请我们注意的。另外四人的姓名看来出自尼克松之口。

就报告的内容而论，我在回忆录第一卷中已有讲述，此处没有更多的东西可添加：

……我同意采取我没有理由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合法的而又为大家所认可的做法，何况照人们对我们所说的，那些前任政府是以更大的魄力和更少的保障措施来采取这一行动的。这样做的动机（我亦明确地抱有这种动机）就是，防止（从未被发现的）个人危害美国和南越人的生命，这些人泄露交托给他们的军事情报，以破坏经过虔诚的考虑才决定下来的、我们认为从法律和国家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合理的政策。我现在相信，从那以后，对国家安全窃听采取更为严格的保护措施，这甚至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但这些丝毫没有改变我的这一看法：这些人是不道德的，他们辜负了对他们的信任，试图破坏国家的政策并且不惜牺牲美国人的生命。^⑩

回过头来看，对我来说同样清楚的是，虽然各民主国家广泛使用电子监测手段，但是对自己的同事进行窃听却是个特别令人痛心而又不合人情的问题。我对这种事从来没有感到舒服过；这是我担任公职期间最使我左右为难的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径直寻找其他方法解决这个难题，就是，将那些有私自泄露情报嫌疑的人调离开他们原来的职务。毫无疑问，尼克松和他的内层亲信们琢磨过这样一种看法，即那位哈佛大学出身的、洛克菲勒财团的朋友的同僚中，有些是值得怀疑的泄密者。而且，联邦调查局的一些官员们也借此机会来证实他们对某些案子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他们对我的工作人员经过安全检查获得通过持保留态度，他们的这种保留曾是被置之不理的。出于这些原因，我完全有可能在解除我对这一计划的矛盾心理时不自觉地走另一个极端。然而，就我所知，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我唯一的动机是在一场复杂的战争尚在进行之际保护机密情报免遭擅自泄露。我没有理由指责司法部长认为这一计划是合法、合理的说法。尽管如此，我谨对由法庭决定修改过的法律程序给任何个人可能带来的痛苦，表示歉意。

说完这番话之后，我感到有权重申：某些人明知我在履行职责和宽恕他们之间左右为难，但却在法律诉讼上和文字上对我进行刁难，对此我表示不满。我甚至曾经警告过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正受到我的上级的怀疑，并且提醒过他们在受审查。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谨感谢被窃听过但依旧是或后来成为我的亲密朋友的那些人，他们对当时的做法、动机以及特定情况表示理解，并由此平息了他们自身的痛楚。

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水门事件时期，我最关心的并不是报纸上每天大肆宣扬的调查情况，而是维持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信誉。我们悲剧般地又退回到第一届政府时期国内分裂的状态。虽然这次全国性的创伤不是出自海外危机——越南——它依旧会深刻影响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我们可以提出也确实提出了外交倡议；对于威胁我国安全的事我们可以提出也确实提出了严厉警告。但是，实施这些倡议和警告所需要的权威，却在那只有受害者、没有胜利者的炼狱中开始消逝，其原因所在，并非执行外交政策的人所能及。

水门事件对执行外交政策在实际上造成多大损失，一时还看不清楚。很多传统的批评家出于爱国之心和对事件的恐惧感，暂时停止了攻击。作为个人，我过的是令人陶醉的生活；我成了人们支持的中心对象，而对于一个非选举上台的官员来说，这种支持之大，是前所未闻的。好象公众和国会都本能地感受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因而设立起一个代理中心，以它集中起全国的目标。但是，这个真正权威的替身是微薄的，它逐渐消散了。

低级庸俗的揭露又有了卑鄙无耻的仇视作配合。一位记者——他和尼克松有交往，但并不以此出名——打电话给我，说他

为他的朋友中冒出很多“嗜血成性的家伙”而大吃一惊；这些人能够想到的好象都是“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好象他们都是杀红了眼的角斗士。”威廉·萨菲尔讲道，大约在一九七三年的这个时候，有位著名的编辑向他一再强调，“放血”是绝对必要的。^③

权威正在衰弱的征兆满目皆是。到了一九七三年五月十日，我们开始接到报告说，中国官员正在私下询问尼克松的权威被损坏到了什么程度。看来他们认为，美国国内的“有组织的集团”决心抛弃总统的外交政策，正在组织反总统的阵营。

苏联方面向我提出了同样的疑问，我从五月四日到五月九日呆在那里，为勃列日涅夫六月访美作准备。最初，苏联领导人看来只把水门事件当作暂时的现象。但是随后揭露出来的情况日益增多，调查搞起来无休无止，人们开始看到使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断绝联系的努力。五月上旬，勃列日涅夫还告诉我他打算带夫人和孩子来美国。到了六月十二日、他到达美国之前不到一周，我们突然获悉他夫人不能前来：“医生们坚决反对她前来。至于我女儿和儿子，他们也有各自非常充足的理由，使他们不能在目前进行这样的旅行。”勃列日涅夫还取消了在休斯敦的停留，对此未加任何解释，也未征求我们的意见。当同一封信解释到勃列日涅夫不顾他的医生的诊断，坚持要和尼克松去圣克利门蒂时，“水门事件”是苏联人考虑问题时的关键因素这种印象，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是因为

如果有人估计我不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的建议是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国内事件有关的话，总统先生，这绝对不是真的。这种理解是没有基础的。总统非常清楚，在与他的关系上，我们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遵循了一条始终如一的路线，我们以及我个人对他的敬意不曾减弱一丝一毫。

这一明显的焦虑的征候，可以同样正确地解释为苏联咄咄逼人地企图提醒总统注意到他自己的地位已被削弱。无论从哪个方面解

释，如果认为总统需要确保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个人继续向他表示敬意的话，那就太低三下四了。

这种对行政权威的侵蚀，不仅对敌人产生影响，而且也损害了我们同朋友的关系。西德大使伯恩特·冯·斯塔登告诉我说，西德报纸讽刺挖苦地刊载维利·勃兰特总理五月初对美国的访问，无疑是该次访问和那个宣布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的讲话巧合在一起所招致的。我六月八日会晤法国外交部长米歇尔·若贝尔时，他暗示说，欧洲年的目的在于缓和我国国内的局势；我迫不得已地提醒他，这一切在水门事件之前就计划好了（因为若贝尔完全清楚我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和乔治·蓬皮杜总统谈话的内容）。当我六月三十日和盟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的代表们在圣克利门蒂（他们正在美国旅行）会晤时，又提起了这个话题；七月二十四日又和意大利大使说起此事；七月，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以及英国内阁大臣伯克·特伦德访美时，也谈及此事——这些谈话总是彬彬有礼的，有时甚至是同情怜悯的。可是，一个大国的政策是靠敬重、而不是靠怜悯来维持的。

八月四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一个才华出众、见识过的人，一位美国的挚友——中断了一次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从渥太华飞抵纽约，与我在肯尼迪机场私下会晤。他的唯一目的是利用这个机会，判断“水门事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他近乎绝望地说：“你们是整个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靠山，可是由于正义的愤怒，这个靠山有点摇摇欲坠了。”他担心的是，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旦尼克松被推翻，尼克松所代表的强硬外交政策也会被断送。到了一九七六年，一位新总统上台会把自己的当选视为对新孤立主义反战立场的支持。他说：千万不能发生这种情况。“我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犹如过去每每体现出来的，李光耀是有先见之明的。友好国

家当时需要、现在依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以保证它们的安全；就连敌人也会因有可以预料的、始终一致的美国而感到舒服得多。尽管我有不祥的预感，但我有义务安抚我的新加坡老朋友。我说，我们将会保持美国的力量和目标；我们肯定能渡过这场危机，正如我们曾经克服了许多其他危机一样。我强调，我们的后来者无论是谁，都会保持一个强大的美国。不知道善于观察的李光耀是否相信了我，我颇为怀疑。我太尴尬了，无法再问他。

一九七四年年中，《华盛顿邮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查默斯·罗伯茨在《外交》季刊上富有卓识地写道：

外交政策的制订要靠有所作为和有所不为。它受情绪波动和意见差别的影响，受对各种力量和弱点的判断的影响，受一国政府对另一国政府的意向的估价及其本身采取行动的能力大小的影响，受制于一位国家领导人如何认识另一个对立或友好的领导人在本国的政治声望及其对国家实力和政策的影响。^④

这段话正中时势。水门事件日甚一日地在限制着我们的行动自由。我们正在丧失使我们的诺言得到别人信任的能力，因为我们的行动再也无法保证会得到国会的批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对抗，因为我们担心在国内这种疑神疑鬼的气氛中无法坚持对抗。（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结束之际，我们曾进入戒备状态。当时就有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问我，那样作是不是出于对“水门事件”的考虑而玩弄的花招。）失去了胡萝卜和大棒，我们只能怀着焦躁不安的受挫的心情，眼看着先是河内、后是莫斯科利用我们的困窘处境。

好也罢、坏也罢，使外交政策成为一体这个任务愈加落在我的肩上。白宫里现在的气氛已同尼克松的第一届总统任期时截然不同了。霍尔德曼时代的那些风华正茂、信心十足、认为一切都可以通过计划实现、任何问题都会在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面前迎刃

而解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走了。只有罗纳德·齐格勒还未走，任新闻办公室的主任，还在以他的忠诚和献身精神执行那绝难完成的任务。无论怎样，白宫工作人员从此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来发号施令，也没有投身于伟大事业的那种自信心。白宫的高级官员们在逐项处理事务时，不得不根据执行情况、职责信念、以及在万般艰难的形势下——最坏的情况莫过于无法确定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感召自己以国家利益为重，并以此确定他们的权限。

在每次记者招待会上都有人问我水门事件对外交政策有什么影响。我始终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关联。尽管人人知道这并非真情，但只有表现出政策不为这类事件所左右，我们才有可能挽救时局。一个大国不会因其国内有困难而得到别人的宽容。我们要想战胜灾难，就只有表现出自信心，继续强调我们终究会克服国外和国内的障碍，保护国家利益。

可是，我自己却甚感凶多吉少。一九七三年五月，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这个国家似乎有一种“想要自杀的情绪”；这必然会损害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四、五年来点点滴滴积攒起来的资本，如今却被大手大脚地浪费掉了。”七月，我也曾对另一个朋友交过心：“过去十五年发生任何危机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国家有什么危险。但是，现在我认为，我们可能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后来我还说过这样的话：

对任何工作来说，伟大与平凡只有细微的区别。你无法讲清这一区别。我们干了两年才取得成绩，当时谁也不理解我们的工作。有了成绩，就必须乘胜前进。如果工作走下坡路，情况也是如此。两年当中，你毫无察觉，然后你就开始看出苗头了。我可以到国会山去，对他们说，先生们，危险来了。要再这样下去，你们非得打一场中东战争不可。

虽说自我怜悯于事无补，可是这些看法基本上符合当时的情况。我不可能到国会去提出警告，因为如果有人要我提出不同的

行动方案，那我是办不到的。参议院的听证会如同演戏一般，从程序上讲也不公平；当时既没有质问的机会，事先也不了解指控的内容。可听证会揭露出来的腐败现象却是货真价实的。不论我多么自恃公允，问题的实质的确在政府本身而不在那些揭露它的人。水门事件一朝败露，就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尼克松的许多老牌反对派十分清楚国家威望受到的影响，因此非常担心。但是除了减轻力图使这条遇难的船继续航行的少数当权者的任务外，他们也无计可施。

这样一来，我这个外国出生的美国人，最终竟取得了使我国外交政策保持一致、使美国公众感到放心的特殊地位。这种状况同人的才智毫无关系，这完全是一个国家为了保存自己的本能所造成的。在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内，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并成为他们眼中的好人。对此，我没有泼过冷水。但是，现在这种责任过分重大、过分使人畏惧，谁也不会有意识地去追求。那些看来是移交给我的职责，必须用来促使人民感受到，美国在继续保持其力量和决心，特别是还在继续积极卷入国际事务，还要使人们确信，纵然我们身处重重考验之中，我们依然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不会主动选择这个角色的，也没有这方面的欲望，这点使我自己也吃惊，尽管我竭力不流露出来。然而所有大灾难的幸存者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即各尽所能，为国家目标作出贡献，我自己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国家目标的实现，要求我们必须有一种争建丰功伟绩的外交作风；要求我们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自信心，以此迫使潜在的敌人在挑战面前退缩。这其中肯定有追慕虚荣的成份，但其大部分是通过虔诚的考虑作出的理智的决定。我们需要用一种看得见的、必要时是戏剧性的手法来表明，美国不但能经得住痛苦的折磨，而且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尼克松接受事态现状时，对自己所处的困境是有所估计的，他之所以能心甘情愿地这样

做，要归功于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爱国主义的精神。

然而，度过这一时期在政治上的先决条件是，作出的决定必须能反映出总统还在发挥作用。可是他再也没有处理错综复杂的政务的活动余地或是必须的人员了；而他在第一届政府中，就是靠这些来掌管各项事务的。他和我都被剥夺得只剩最基本的权力了。他依靠更加传统化的程序执政了。而我则是在努力保全全国在外交政策上的统一意志。录音系统中断后，我俩之间的漫谈立刻显得更为深沉，而且说来也很怪，也不象从前那样焦躁不安和情绪激动了；最坏的情况发生以后，剩下的只有原则了。

我日益致力于取得国会两党一致的支持。尽管在印度支那、苏联犹太移民等某些容易引起头痛的问题上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一致支持，但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还是比其它任何方面都保持了更多的一致性。在可能把正义和非正义的事物都席卷一空的海啸面前，国会领袖似乎也感到惊恐了。

我保全外交政策肯定使尼克松的一些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敌人感到良心上轻松了。我不得不这样做。况且，归根结底，一旦白宫工作人员四分五裂，对着尼克松群起而攻之，他的命运就是在劫难逃了。出于这种情况，为国家履行职责就是通过树立起团结统一和有所追求的表面，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信誉。身临绝崖峭壁之缘，当务之急唯有一事：争取活动余地。

就这样，援助我们受挫的总统的重任，一部分落在我的肩上，一部分落在黑格的肩上，以及我俩各自手下的工作人员的肩上。总统不屈不挠的精神莫不令人肃然起敬；总统蒙受的痛苦，唤起了人们不寻常的温存之心。使尼克松最痛苦的惩罚是：他知道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他自作自受。但是，即使在他走极端的时候，在外交政策领域内，他还是按照高尚的目标采取行动的。他这么做似乎是受着良心的驱使，纵然不能挽救他的总统职务，也必须挽救这个

国家。

① 亨利·A·基辛格著：《越南问题谈判》，《外交》季刊四七，第二号（一九六九年一月），第二一——二三四页。

② 见《白宫岁月》第二五四——二五六页。

③ 例如，见威廉·萨菲尔著：《垮台之前：水门事件之前的白宫内幕》（纽约州花园城：道布尔戴公司，一九七五年版），第三部分，第五章。

④ 约翰逊总统的录音系统，见比尔·古利与玛利·埃伦里斯合著：《打破掩饰》（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一九八〇年版），第七七——八五页。肯尼迪总统的录音系统，见小威廉·巴克利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华盛顿明星新闻报》上的文章：《对总统录音带的看法》；理查德·尼克松著：《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赛特与邓拉普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五〇一页；维克托·拉斯基著：《并不是从水门开始的》（纽约：戴尔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第三五七页。

⑤ H·R·霍尔德曼与约瑟夫·迪蒙纳合著：《权力的目的》（纽约：纽约泰晤士图书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六册。

⑥ 例如，见一九七一年老挝行动的计划，《白宫岁月》第九九四——一〇〇一页。

⑦ 同上，第一一八五——一一八六页。

⑧ 同上，第二五二——二五三页。

⑨ 见罗伯特·达利克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九三二——一九四五》（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二四——二二六，二八九——二九〇、三一一、三三四——三三六页；萨菲尔著：《垮台之前》第一六六页；拉斯基著：《并不是从水门开始的》第一六一——一七二、一九五——二二一页，以及在尾注中列出的材料；美国众议院、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对政府情报活动的研究《最后报告第三册：有关情报活动及美国国民的权利的工作人员补充详细报告》，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九十四届国会第二次会议，《联邦调查局未经许可可进行电子侦查》第二七一——三五一页。

⑩ 见威廉·B·萨克斯比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的证词，《有关亨利·A·基辛格博士在窃听若干政府官员及记者的行动中的作用的听证会》，一九七四年九月第九十四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八——五九页。

⑪ 特别见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的证词，同上书，第二二四——二四一页。

⑫ 见《白宫岁月》第二五三页。

⑬ 见《垮台之前》第三六四页。

⑭ 见查默斯·M·罗伯特的文章《瘫痪了的总统的外交政策》，《外交》季刊五二第四号（一九七四年七月），第六七五页。

第五章

欧洲年

欧洲年的由来

象白宫一样，爱丽舍宫既是法国国家元首的官邸，又是他的办公室。去爱丽舍宫，要先经过座落在狭窄而繁华的奥诺雷大街上的宏伟的宫门，然后穿过石子路的庭院——这使得爱丽舍宫的外观越发显得美观大方、质朴无华。进入爱丽舍宫，在宽敞的楼梯顶端，有一个接待贵宾的楼梯平台。用大国总统的标准来衡量，法国总统的房间并不算大，但室内装饰却十分考究，有各种式样的挂毯和富有法国地方特色的陈设。室外有一座幽静整洁的花园。越过园墙，可以看见香榭丽舍大街两旁树木的树梢。它是处在繁华的大城市之中的世外桃源。

恬适的环境，同这位体态肥胖、眉毛粗重、坐在装饰华丽的办公桌后面的人的品行是相称的。乔治·蓬皮杜是位了不起的人物，我曾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初会见过他。在一九六九年接任戴高乐总统职务之前，他在戴高乐将军任内担任了六年总理。一九六八年巴黎大部分地区学生闹学潮，当时他突然引咎辞职。当戴高乐还在世时，蓬皮杜从几乎销声匿迹的地位又重返政治舞台，继续保持他对戴高乐主义多数派的控制，并改变了法国外交政策的风格(如果不是改变了它的实质的话)，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当戴高乐于一九六九年四月辞去总统职务时，我曾写信告诉尼克松，法国总统的地位比表面的样子还要虚弱。总统的权力取决于总统对议会多数派的控制。但是，由于议会选举遵循的是与总统选举不同的程序，因此，长期维持对议会多数的控制是困难的。每当议会选举产生了不是总统所在党的或不受总统控制的多数派，它就有权提出自己的总理候选人，这样权力平衡就会转到总理一边。法国战后政治的传统格局——议会的不稳定性——会因此而重现。戴高乐曾试图将法国的过去拒之于门外。然而，门却没有锁上。

从理论上讲，我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实践证明，这一分析起码还不成熟。从戴高乐执政时起，法国每届议会都由总统控制。蓬皮杜执政时，他对法国政治生活的控制不亚于戴高乐。蓬皮杜尽管不象戴高乐那么风度翩翩，但是他的政治风度比戴高乐毫不逊色。他目光锐利，能审时度势（但决不是愤世嫉俗），头脑冷静，多谋善断，从而弥补了国际经验的不足。他当过教授和银行家。他熟谙文学，也通晓时事。他虽然没有他的前任（还有法国外交部某些上层人物）的那种反美偏见，但也抱有法国知识界的看法，即从长期观点看，美国太幼稚，太笨拙，太反复无常，因此不能担负欧洲命运的重任。但是，他却非常清醒地知道，美国的强大力量不容忽视；法国的力量太弱，不能单枪匹马地干。

一九七〇年初，蓬皮杜和他的夫人正在美国的芝加哥访问时，有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法国向利比亚出售武器，这使蓬皮杜十分恼怒。尽管这一事件并未使他改变他那彬彬有礼、和善可亲的外交风度，但是在他心上却罩上了一层冷漠乃至忿懣的阴影，这层阴影从不曾完全消除。在他抱病卧床的最后一年，他发过一次大脾气，当时他骨癌病痛（除少数几个亲信，他向谁也没说过）使他的自我克制到了极限。我认为，他是一位最富有远见、最明智的领导人，

不管他对美国驾驭世界事务的能力有多大疑虑，他总是按原则办事，使民主国家更有价值，更有力量，更有决心。

在尼克松首任总统期间，美法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尼克松和蓬皮杜都毫不感情用事地认识到力量平衡的重要性。他们都以怀疑的态度看待苏联行动的背后动机。蓬皮杜对潜在的德国民族主义抱有戒心；尼克松对勃兰特心怀疑虑——但在行动上，两人的态度是一致的。蓬皮杜很欣赏尼克松的果敢行动；他率先宣布亲自参加戴高乐的葬礼，从而确定了其他国家也仿效的礼宾规格；他出人意料地出席了一九七〇年三月在纽约为蓬皮杜举行的晚宴，以表示他不同意那次矛头指向蓬皮杜的游行示威。尼克松感激蓬皮杜为我在巴黎与北越人秘密会谈所作的周密安排和提供的各种具体帮助。尼克松钦佩蓬皮杜掌握世界事务的能力。基于对戴高乐的仰慕，他对蓬皮杜处事的戴高乐主义气质一点不感到别扭。他认为，法国强大（即使暂时有困难）对整个西方世界都是个福音。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八日，我拜会了蓬皮杜。当时我来巴黎准备同北越人举行最后一轮谈判，我向他通报了尚未向自己政府部门谈过的情况，这种做法回想起来甚至连我也感到吃惊。他从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也没有因为帮助了我的巴黎之行而伸手要任何特别的好处。他对我讲法语，我自信我听懂了。我回答用英语，然后由出色的译员康斯坦丁·安德罗尼科夫为蓬皮杜翻译成法语，他的英语语音无疑比我的语音强。

当时正是越南谈判最困难的阶段之一，也是到那时为止我的社会生活最不顺利的时期之一。在十月份我们好不容易快要达成协议的时候，黎德寿又节外生枝，设置了重重障碍。他似乎在打赌：如果他把谈判继续拖延下去，美国国内的压力会迫使我们解散西贡政府，把胜利和盘托给河内。

蓬皮杜以他特有的彬彬有礼的态度倾听我的陈述，听我讲完

后，他语调平和地说：“讲得很详尽。依我看，你们一定能取胜。”蓬皮杜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美越双方都在一项协议上签了字，谁也不得反悔。不管用什么方式，战争必定会很快结束。我们最感痛心的，就是打了十年仗，末了还要吃一阵苦头。蓬皮杜为了强调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或许出于好奇心，或许为了砥励我，他向我提出另一个问题：“战争结束后，你们政策的核心是什么？”说来也怪，当听到有人问及不再受印度支那这个恶魔纠缠的未来，并要我在这种四分五裂的氛围中展望一个以建设为宗旨的世道，这时我的心情反倒感到坦荡宽慰起来。

我告诉他，战争结束后，我们打算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北大西洋的关系方面。二十年来，欧洲和北美洲一直没能认真地制定它们更大的共同目标。召开一次由北大西洋组织领导人参加的有充分准备的最高级会议，或许能达到这个目的。蓬皮杜以长者般的口吻表示赞同。

过了几天，蓬皮杜以他的行动表明，他讲的不是客套话，也不是为了振作我的低落情绪。他异乎寻常地公开表示，他支持进行一次新的北大西洋对话。在接见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时，蓬皮杜说，他主张在即将到来的一九七三年内举行“最高级”协商，阐明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特别是政治关系。他期待同大西洋两岸的同事们会晤，确定并重申美国、欧洲共同体和日本在新时期的共同目标。同近几年来被忽视的这些政治和哲学大问题相比，金融和贸易问题是次要的。^①这是一个远见卓识的论断。从法国和美国后来发生的争论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命运不济的欧洲年竟是在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办公室里诞生的。

百孔千疮的北大西洋关系

到一九七三年初，人们普遍有一种看法，即北大西洋关系应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因为许多战线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英国、爱尔兰、丹麦被接纳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新成员，加入了于一九五八年创建该共同体的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行列。新的欧洲九国如今致力于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联合。欧洲联合的扩大和加强，标志着作为一九四五年以后这一时期特点的美国在西方的突出地位的终结。除了两个超级大国，西欧的经济力量和潜在的军事力量现在比世界任何地区都要强大。实现了联合，欧洲必然表明自己的一致性。对于精神上刚从越南创伤中解脱出来的美国来说，我们希望欧洲分担我们的义务；欧洲毕竟是自由世界中在历史、文化、道德标准等方面与我们共同点最多的地区。

然而，我并不象有些人那么乐观，认为这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两大党的杰出人物想当然地认为，一个联合的欧洲会减轻我们在全球的经济重担，同时在政治上会继续追随我们。他们脑子里只记得四十年代末在经济援助和军事安全方面完全依赖美国的软弱无能的欧洲；但他们却忘记了这样一个欧洲：它发明了主权论；它几个世纪的治国方法锤炼了民族主义哲学；它不肯顾全大局舍弃局部利益，是导致本世纪两次灾难性世界大战的主因。

尽管一九四五年以后情况变化颇大，但是我历来怀疑：欧洲联合难道为的是分担我们的负担吗？它一旦有了实现自己观点的手段还能满足于充当配角吗？欧洲之所以在西方事务中愿意在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主要是想实现它自己特定的目标。这些无

疑会与美国的目标协同一致；在大多数问题上，欧洲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确实是并行不悖的。但是这种关系将不同于马歇尔计划的“黄金时代”，那时美国有爱管闲事、爱用资财处理问题的癖好。一旦欧洲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在政治上联合一致，北大西洋合作便不可能是美国说了算，不可能主要商讨美国的意向了。平等的主权国家必须目标一致；伙伴关系只能诱导不能强制。这从理论上讲是容易的；但它需要北大西洋两岸进行痛苦的调整，需要耐心，需要敏感。

戴高乐首先看出了美国态度方面存在的矛盾：一方面提倡欧洲联合，另一方面又缅怀过去，希望美国继续充当头头。毋庸置疑，戴高乐表明这一看法，使用了最能刺痛我们的心方式。他不仅含蓄地表示，应当让欧洲放手寻求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表示，这些利益十之八九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实际上，欧洲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看法。所以，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在欧洲联合以及防御合作的性质上同戴高乐的辩论发展成尖锐的对抗是不足为怪的。一九六三年，戴高乐否决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理由是英国充当美国的“特洛伊木马”。一九六六年他让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防御司令部，迫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撤离巴黎。林登·约翰逊询问美国的军人公墓是否也要搬走，这表明他的自尊心也受到粗暴的凌辱。

蓬皮杜对待欧洲的态度比戴高乐老练圆滑。对欧洲联合，他比戴高乐接受得快；他也不象戴高乐那么固执地坚持欧洲只能是个松散的国家联合组织。但是，欧洲必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特有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与戴高乐一样强硬。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在确定努力实现政治上的全面联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之后，蓬皮杜用既有合作也有挑战的语言表明了他对美国的态度。他说：

我们同这个伟大的国家，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我们有八个国家与它在北大西洋联盟中结了盟）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建立一个背离这种关系的欧洲的想法是荒诞的。但是，正是这种关系的严密性，需要欧洲申明它对美国要保持个性。由于美军不可缺少的支援，西欧才得以从军队的蹂躏下解放。它用美援重建家园，把其安全倚托于与美国的联盟。它迄今一直把美元作为金融储备的主要部分。因此，西欧不应该也不能够割断同美国的联系。然而，它也应当直言不讳地申明，它是作为一个新的实体存在的。

尼克松政府对于接受让欧洲放手执行它自己的政策的主张并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同意蓬皮杜的看法，即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但是多年来却没有为基本原则下过定义，也没要求哪个美国领导人正视欧洲闹独立性的现实。戴高乐一直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者，而不是预言家。北大西洋两岸谁也没认真地考虑过对西方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需要多大的一致性？我们能经受住多大的分歧？

欧洲和美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不光是调整联盟内决策的程序问题，还有反映自四十年代联盟成立以来世界形势主要变化的实质性问题。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欧洲防御。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美国的核武器对苏联占压倒优势。因此欧洲的防御主要靠美国的核威慑。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没有用军事术语阐明它所谓的大规模报复论；实际上它的意思是，如果欧洲受到攻击，美国将用战略核武器对付苏联。只要苏联的战略力量是脆弱的——简言之，只要在一场普通的核战争中，“胜利”仍具有某种军事意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机构就毋需为勇敢地对付苏联传统的优势和各成员国地理上与苏联邻近所形成的长期威胁而付出昂贵的代价。我们的盟友担心的，不是一致赞同的战略，而是美国可能不愿这么做。它们的历史使它们有担心的理由；危难中舍弃盟友的事在欧洲近期历史上并不少见。欧洲提出的方案是，美国也应当有重兵驻在欧洲，尽管一致赞同的战略是，

苏联的进攻将触发来自美国的核报复。其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如若苏联发动进攻，包围了美国和盟国的地面部队，就会迫使美国近乎自动地进行核报复。

由于美国在国外驻军得不到欧洲盟国起码的支持，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美国的盟国纷纷在中部战线加强了地面力量。但结果是，各国把乱七八糟的军队部署在属于占领时期的地区，既没有标准化武器，也没有规定给养消耗的比例。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效率低的表现，而是反映了心理现状。因为谁也没有想、也没有指望欧洲军队在战争中取胜。欧洲军队被看作是“绊网”或“核门槛”——这是使美国有可能进行核报复的委婉说法。

作为这种战略基础的美国核优势到五十年代末开始发生变化，这时苏联已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有几年，苏联的核军备建设进展缓慢，导弹威力也不怎么大。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苏联人清醒地看到战略劣势造成的不利后果，于是他们制订了一个弥补差距的大胆计划。到一九七一年，苏联的导弹总数已赶上了美国。苏联人同我们达到力量均势以后，没有象约翰逊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就此止步，他们变本加厉地干下去，使导弹数量超过了我们（尽管我们在轰炸机方面保持很大的优势）。一九七二年五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次达成协议，冻结了导弹的数量，这时他们便转而大力改进导弹的质量。

于是，到一九七三年，以美国核优势为基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需要刻不容缓地加以修订。我们本可以把核弹头数量上的明显优势维持一个时期（或许可以维持十年），因为我们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方面至少领先五年。但这只能推迟摊牌的时间，却不能避免摊牌。北大西洋联盟迫切需要重新制定军事策略，美国最初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和平时期作出的核报复保证将开始丧失其信誉。随着战略均势的接近，苏联的欧洲地

面部队所处的有利历史地位就变得对我们更加危险；特别是鉴于苏联大力发展各种其它类型的武器（其中包括一支首次能够进行全球干涉的海军）。

但是，由于美国国内对越南战争反应强烈，使得认真分析和有效反应的工作迟迟不能进行。必要的新式武器的研制被斥之为挥霍浪费，铤而走险。这是表现在军事工业方面的一种愚昧无知的变态心理。当时的口号是：“重新安排国家事务的轻重缓急”。这是削减防务预算的一种委婉说法。幸运的是，我们避开了国会的斧头，使驻欧美军未遭削减，一九七一年，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否定了曼斯菲尔德修正案，按照这个提案，驻欧美军的半数要撤走。^②数年后指责尼克松政府太“软弱”的人，在七十年代初政府奋力抗争的时候，不是销声匿迹，就是站在对立面。实际损失比统计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由于国会和舆论的反对，一些设想和计划一直拿不出来，这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用于地区防卫的部队遭到的打击更大，因为这与那些一心要削减我们驻外部队的人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

欧洲比美国更不愿意正视这个已经变化了的现实世界。我们的不少盟友仍然把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看作对美国在欧洲承担义务的象征性酬谢；他们根本没制订过切实可行的地区防卫计划。他们害怕自己的国土被摧毁；他们不愿离开已经熟悉了的美核庇护所，尽管这个庇护所的根基由于技术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不牢靠了。他们不愿考虑隐约呈现的战略均势问题，就象我们不愿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一样。他们用惯了这一不变的老套套，即自己少出力我们多出力。同曾经提到的英联邦的情况一样，北大西洋联盟依旧被因循守旧的思想紧紧地束缚着。

经济关系同样也搞得很紧张，在这方面连一个正式的协商机构也没有，这与组织齐备的北大西洋公约协调机构形成鲜明的对

照。随着欧洲共同体经济力量的增强，它与美国竞争的能力也增强了。它特有的共同对外关税对美国产品开始发生影响。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一方面，复苏的欧洲对美国大部分出口商品兼收并蓄；另一方面，它的安排偏袒国内而排斥国外企业，使共同市场的成员国有利可图。然而，当美国人发现自己正在同战后曾支持过的国家进行激烈的经济竞争时，确实感到有些震惊。

我们的经济部门天天向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报告欧洲共同体刚露头的独立性所带来的影响。有人抱怨说，欧洲国家仍与昔日的殖民地保持着优惠贸易协定，限制美国进入这些市场。欧洲共同体以及共同体以外的欧洲国家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越来越大的特殊关系网。在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上，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欧洲国家对美国一九七一年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采取突然袭击的策略大为不满。不少人抱怨说，美国放弃已经修订过的金本位制，就是因为不愿自己受到挟制，而搞通货膨胀输出来制裁盟国。

七十年代初，西方赖以实现二十年繁荣的自由金融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竞争性贬值、货币危机、保护主义竞争的严峻考验。面对眼前的考验，西方世界竟束手无策，连一个对发展中国家、国际商品市场、特别是西方的命根子——石油的共同方针也定不下来。正如蓬皮杜在十二月里那次富有预见性的谈话中对詹姆斯·赖斯顿所说的，不能从技术方面找答案；要搞几个政治决议，使纠纷服从于我们在政治和道义上达到团结这个压倒一切的大目标。

欧洲国家对美国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反应，暴露出政治目标上存在的分歧。这不是没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在我们的全部政策中，缓和政策似乎一开始就最能反映欧洲人的意愿乃至所承受的压力。从尼克松入主白宫时起，他就被我们的盟友看成坚定的冷战勇士，他的好战本性需要用欧洲人的智慧来加以驯服。西欧领

导人在公众面前摆出在不肯让步的美国和咄咄逼人的苏联之间充当和事佬的架式。麦克米伦、威尔逊、戴高乐、勃兰特相继访问莫斯科，签署赞成缓和的声明，一时成为欧洲外交活动的主流。在尼克松任总统的头两年，每次与西欧政治家会晤，都要向我们巧妙地暗示（必要时索性一本正经地讨论）缓和紧张局势是当务之急，否则，那种会晤就是不完善的。

至此，我们采纳了盟国的建议，我们的缓和政策于一九七二年开始奏效。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奉行缓和政策，理由之一是：必须隔断苏联与北越盟国的联系；为制定坚实的外交政策和对付来自国会和舆论界的新孤立主义和反对加强防卫的巨大压力争取活动地盘。不过我们还有一个关系到北大西洋联盟趋向的目的。我们不希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被看成是实现和平共处的绊脚石。我们不希望欧洲单方面对莫斯科采取主动行动。我们向他们表明，若要竞相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的话，美国能跑在他们的前面。这一招很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随着我们加强对莫斯科的政策，欧洲人要求妥协让步的压力也相应缩小了，在西欧各国几乎再也听不见七嘴八舌地议论联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苏美关系的改善，某些曾主张和解的政治家开始看到苏美共管的苗头，这是人们一直忧心的事，即戴高乐最害怕的“超级雅尔塔”瓜分世界。

我们认为欧洲人这种疑虑是毫无道理的，有时还是令人气愤的，这种担心从另一方面表明，北大西洋国家都迷失了方向。其实，我们所以这么倾心于这个主动行动，原因主要在心理和道义方面。我们坚定地认为，民主国家不能光是管理他们继承下来的东西。他们能维持至今，靠的是取信于民，笃行不倦，使他们得以越过历史的盛衰兴败。一代新人对四十年代北大西洋联盟诞生时的危难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创立了他们的政治制度的人的远见卓识。在美国，起到启蒙作用的是六十年代关于越南战争的令人厌恶的

辩论。在欧洲，起到启蒙作用的是令人生厌的福利国家。西方传统的理想主义和自信经过很长时间才在为民造福的重大活动中表现出来。每一项重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梦想。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欧洲年，撷取了民主国家的理想主义传统。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么做会有怎样的结果。

探索阶段

新年伊始，就有点不景气。除了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外，我们的欧洲盟友都不同程度地反对越南战争中煞费苦心的最后一举——圣诞节轰炸。欧洲大部分宣传机构都听信了当时盛行的谣言：我们在大规模残杀平民百姓。欧洲许多国家领导人冷嘲热讽，其势汹汹。

对此，尼克松气得浑身发抖。作为一个大西洋联盟虔诚的信徒（一九四七年他是赫脱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为众议院审议了重建欧洲的计划，为马歇尔计划奠定了基础），他简直无法理解，在这个关键的敏感时刻，我们的盟友竟能翻脸攻击我们。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即圣诞节轰炸后一个月，巴黎协定签字后一周，尼克松对希思说：“你干的事，别人不会看不见；而别人干的事，你也不会看不见。盟友攻击你，令人费解。”二月十五日，尼克松又向当时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谈了这件事。尽管这件事使尼克松很恼火，但却没有影响他履行在大西洋关系上采取主动行动的诺言。事实上，当摄影记者还呆在会见厅时，尼克松便向古德帕斯特再次表示，他打算把一九七三年定为“欧洲年”。

欧洲共同体的创始人让·莫内是一位一往无前、胸襟坦荡、临危不惧的人物。还在欧洲战后动荡的日子里，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的民族—国家的传统结束了；百废待兴的欧洲需要一种

伟大的思想来引导，即欧洲联合。莫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虽然他自己并不代表任何国家。历史上的壮举，往往是从朴素的概念演变过来的。办一个企业，人多势众，很难搞好。莫内对欧洲联合的建树在于：他提出了两点表面看极为朴素的见解：第一，对主权津津乐道的各欧洲国家不加推动不可能跃入具有欧洲联合意义的未来。第二，如若美国不怕联合的欧洲会对它反目的话，它完全可以提供这种推动力。

最难能可贵的，是莫内提出，通过非官方组织推动各国政府。一九五五年，莫内创建了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他知人善任，邀集了一大批社会名流，无论哪个党派掌权，这些人都具有影响力。但仅此组织还难于使莫内的努力超过从事正义事业的不计其数的国际研究组织。给予该行动委员会以推动力、使莫内真正有力量的，则是别人望尘莫及的他那接近美国要人的本事和影响他们乃至使他们着迷的能力。莫内选中美国来充当推动欧洲联合的鬼使神差。此举表明他对美国人的心理摸得很透，因为他的计划颇投合美国人的预想：废除民族—国家传统；对问题采取重实际的态度；强调经济福利对促进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联合的欧洲在承担美国的负担方面发挥作用。

有这么大影响力的人，未必一定会获得鼎鼎大名。莫内是道地的法国人，他身材瘦小，举止有点书生气，唯独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露出内在的热情。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并不引人注目。他有一句名言：“人都有野心。问题在于是有野心去做了不起的人，还是有野心去干了不起的事。”莫内就是这句名言的化身。他显然雄心勃勃地要干一番了不起的事业；他不尚空谈，不追求功名。他的影响反映出他不声不响的埋头工作。在让人们放心的预言家中，莫内是最少见的；在推翻现行秩序而又不得罪维持现行机构的人的革命家中，莫内是最非同凡响的。

在对事物的见解方面，几乎看不出莫内与另一位法国名人戴高乐有太大的差别。和戴高乐一样，莫内认为，欧洲只有强大起来才能有其影响；欧洲只有具备独立行动的能力，合作才有意义。和戴高乐不同的是，莫内强调：联合的欧洲一定要与美国合作而不要作对。不过这个差别令人难以捉摸，因为莫内和戴高乐两人谁也说得不准欧洲将如何使用联合后产生的力量。莫内不反对欧洲在利益不一致时坚持自己的利益；戴高乐不反对在利益一致时进行合作——在五十年代末柏林危机和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便是见证。

我常想，要是莫内和戴高乐在一起谈话会是什么样子。“你这个傻瓜”，我想象中的莫内说，“难道你没看见，你吓唬美国人不是毫无意义的吗？我可以让美国人乖乖地把东西送来，你却要设法去夺。我们用我们的力量和联合究竟干了些什么，只有历史才能裁决。”

“你这个空想家，”我假设的戴高乐答道，“难道你不懂馈赠的东西没意思吗？只有我们夺来的东西我们才能使用。”

两个人的话可能都对。没有莫内，就不会有欧洲的联合；没有戴高乐，就不会有欧洲的一致性——结果产生了这个怪现象：欧洲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烈的国家，对欧洲共同体的创立做出了独一无二的最大贡献。

一九七三年一月，我到巴黎最后签署越南协定，我见到了莫内，他当时已八十四岁，身体羸弱。莫内总喜欢检查他的朋友和弟子们是否达到了他所规定的难以达到的新目标。如果没有达到，他那永远熠熠发光的蓝眼睛就会严峻起来。如果发现了懒散怠惰，莫内就会动员他的大批强大朋友，尤其是在美国的朋友——碰到这种情况，没有一个官员会泰然处之。

这一次，无须施加压力。他坚信，他的作法有助于至少再进行

一次创造性的努力；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莫内认为，美国和欧洲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观点必须更接近；而这正是我们搞欧洲年的打算。他敦促尼克松访问欧洲，出席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会议，在一个关于共同目标的集体宣言上签字。美国应当开始把欧洲看作是一个政治单位，不管它是否已把其机构完全联合在一起。换言之，美国应当完成从执行马歇尔计划开始的欧洲联合过程，不管欧洲人是否完全愿意接受。

当我向尼克松汇报莫内的观点时，他表示可以接受；但对莫内让我们立即开始把西欧作为一个单位来对待的建议，他却踌躇不定。当我汇报到莫内让我们向欧洲共同体施加压力的建议时，尼克松插话问道：“基辛格，这行得通吗？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最后，尼克松同他的前任一样，也无法躲过莫内无情的逻辑。不过，尽管莫内的观点很明智，他的影响却取决于美国人是否坚持对欧洲组织机构的看法和欧洲领导人是否把大西洋关系当作头等大事。在一九七三年，这两种人都不够多。尼克松和我都希望欧洲共同体兴旺，但是我们认为，它的兴旺与否应取决于欧洲人，而不应依靠美国人来施加压力；其实，我们并不想知道政治结合怎样实现，何时实现，只要它寻求一致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对我们。而这恰恰正是发展壮大的欧洲联合的概念。那些对欧洲联合表现最积极的欧洲领导人开始发觉大西洋团结和欧洲一致之间出现了矛盾。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实现欧洲联合比健全大西洋组织机构更为费力。实际上，一些领导人认为，重新强调大西洋的团结，背离了他们先建立一个联合的欧洲的主张；与莫内的观点相反，他们不相信我们能够合二为一。

这些倾向几乎都由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第一位与尼克松讨论欧洲年的人——体现了出来。我们选择英国作为第一个进行这种协商的国家是很自然的；这是依然被称之为“特殊关系”的

实质。几十年来，美国历届政府与伦敦的行动步调都是一致的，尤其是在大西洋联盟问题上。英国人为此顽强奋斗过。他们保持大国地位的方式，是美国将来制定政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遇事不同他们商量，似乎是情理不容的。我们的英国同行既能干又自信，他们希望表明这样一种看法，即他们把几百年的经验传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恩赐。他们这么估计并不完全错。

然而，这种格局正是希思决心要改变的。他主张在欧洲充当主角，而不主张在华盛顿充当有名无实的配角。而且他认为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希思是通过保守党议员选举而不是通过传统的方式——保守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自己的俱乐部或其它地方私下会晤达成非正式的一致意见——取得党的领导权的第一位保守党首相。他的背景与他当选的情况一样非同凡响。他出身于下层中产阶级，他领导的党从方针上（如果不再从成份上）说仍是以上等阶层为主的。他有英国等级制度给予非上等阶层出身的人那种不安全感。有些人为了弥补出身的缺陷，乔装打扮，故意模仿门第高贵的人的言行举止和温文尔雅。

希思显然选择了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他给人的印象是，从本质上说，他是热心肠的。年轻时，他喜欢说笑，擅长交际；但是，他以铁一般的纪律锻炼自己。他取得功名，不是靠品格，而是靠行动。他不追求个人的魅力，尽管他一度有过相当大的这种个人魅力；他主张以高度的智慧取胜，以某种超然的精神取胜。他具备人的各种美德。他表情冷漠；他难得表现出的几次热情，也是勉强为之，且与政治活动决然无关。他的品格和冷漠的个性，必然会妨碍这种“特殊关系”的发展，即便他的主观信念并不想这么做。

希思的心理好多方面与尼克松相象。然而，希思比尼克松更具有广泛的爱好。希思不象尼克松那样常常把自己本性中热情慷

慨的一面完全掩盖起来，而是使之升华，变成对音乐和航海的热忱。因此，希思很少表现出尼克松那种郁郁寡欢，虽然两人性情都很孤僻。他与同他步调不一致的人外出时，即使感到不快，也能做到近乎坦荡，尼克松却总有如临敌境之感。希思比尼克松更有男子汉的气魄，品格的各方面配合得更合适。说来奇怪，这使他变得有点富于幻想，甚至想入非非。他不象尼克松那样灵活，也不象尼克松那样敏感。作为理论家，他比尼克松能言善辩；但作为政治家，他又不如尼克松那么随和通融。

心理特征方面的相似之处，足以使根本分歧难以弥合。尼克松同希思的关系尤如一个失恋的男子，对方对他说，恢复情谊是可以的，但他却总忘不了被抛弃的滋味。尼克松当初非常钦佩希思，希思一九七〇年意外获胜使他非常高兴。他指望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但结果却成了泡影。

在英国所有的政治领导人中，希思对美国的关系，甚至对每个美国人，表现得最冷淡。就我个人而言，对希思非常喜欢和钦佩；在许多方面，我同他的交情比同英国任何其他政治领导人都要深。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成为我们遇到过的最难对付的英国政府首脑。不知是因为对导致一九五六年（当时希思是保守党主席）苏伊士冒险行动失败的美国压力耿耿于怀（他确实不时地提到此事），还是因为对欧洲的看法与戴高乐雷同，致使希思对我们冷若冰霜，毫无“特殊关系”可言。战后期间，英美两国亲密磋商，互相协作，如今却变成公事公办的外交往来。我敦促英国大使打电话建立尼克松切望的个人关系。希思对这样的电话却不屑一顾，他惟恐象他的前任麦克米伦那样被法国斥之为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十年前，希思代表英国政府参加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谈判，当时遭到戴高乐的断然拒绝，部分原因至少是因为麦克米伦与肯尼迪总统在拿骚达成核合作协议的原故。

希思的政策有一种执拗、乃至蛮干的味道：他追求的不光是改变外交格局，而且要改变英国人的态度。大多数英国人的心是与美国和英联邦息息相通的。在他们看来，欧洲不是发源于英伦三岛，而是发源于英吉利海峡彼岸。纵观历史，战祸几乎都发生在欧洲，而最近几年都来自大洋彼岸。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加入欧洲充其量不过是为了适应需要而不得不这样做的事。但希思认为不仅英国的前途有赖于欧洲，尚且必须这么做。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矛盾现象：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欧洲其它国家领导人纷纷主动与我们改善关系——联邦德国的勃兰特为了平衡对东方的态度；蓬皮杜为了结束曾使他的前任感到不安的孤立地位——而希思却背道而驰。他与我们的关系过去一直很好，但是很少超过基本限度——从欧洲方面说，这妨碍了与我们的密切协作，他应当努力与我们密切协作，与我们的密切协作反过来对他也是有好处的。

总统和首相一九七三年二月初的会晤使这种令人不快的关系显得格外突出。为了表示特殊的尊重，尼克松第二天邀请希思及其随行人员到戴维营，这样他们可以在一种轻松的、无拘无束的亲切气氛中继续会谈。然而，两位领导人都不善于闲谈；他们都喜欢坐在会议桌两边面对面地会谈。在去戴维营途中——大约还差一半路程——由于大雾突然笼罩了总统的休养地，总统的直升飞机被迫着陆。后一半路程由汽车代步。英国内阁大臣伯克·特伦德和我坐在后面的车上猜想两位首脑究竟在谈些什么。我们感受到顾问们常有的那种忐忑不安：要么被首脑撇在一边，要么去执行首脑忘记转告他们的决定。而尤其使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在既没有议程、又没有任何正式助手在场的情况下，两位缄默寡言的人坐在同一辆轿车里怎么交谈呢？事后，我们从未听说过他们谈话的内容，只听尼克松说过一句含义隐晦的话：“难办。”

我们总算到了戴维营，转入了议事日程。会晤饶有兴味，不过没有谈出结果。尼克松把希思当作志同道合的伙伴。他对希思的看法不能说是错误的。而希思呢，他认为振兴大西洋关系根本不算什么大事。他同意尼克松对国际事务的分析，并补充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临到要做结论时，希思的话变得晦涩难懂起来。他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他的话需要认真思考。希思深刻地分析了东南亚和中东局势；他严厉地批评了澳大利亚新任左派总理高夫·惠特拉姆。惠特拉姆对美国圣诞节轰炸自始至终持批评态度，这使尼克松对他特别反感。但是，当我们的话题转到大西洋关系上时，彼此观点的吻合又变得复杂化了。

尼克松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阐述得相当精辟：孤立主义情绪浓厚的美国和内向的、保护主义的欧洲共同体存在着发生严重冲突的危险。公众舆论和核武器的实际情况要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努力来缓和这种紧张关系。然而，除非我们首先确定一套共同的目标，否则这样做就会使联盟瓦解。尼克松敦促英国和美国组织调查组，协调它们之间的目标和战略。他建议召开一次所有工业民主国家领导人参加的最高级会议，作为促进自由世界人民合作的新的象征。

希思在下诊断方面贡献之大，或者在开药方时用词之含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赞同尼克松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他也认为，在大西洋关系中，采取新行动是必要的。但是，他主张欧洲的组织机构在取得进一步进展以前，建立伙伴关系的事先搁一搁。他没有提尼克松关于成立联合调查组的建议。我们天真地认为，有融洽的“特殊关系”，建立新组织似乎没多大必要了。彼此你来我往（包括伯克·特伦德和我每两个月会晤一次）次数十分频繁，致使人们觉得，在现有的组织机构中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

希思不愿建立伙伴关系，并不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是出于哲

理。他没有去掉现有的协商机构，这个机构对了解我们的想法很有用处。但他不愿给这个机构增加任务。他希望欧洲作为一个单位，向我们的问题提供答案；他决心避免英美之间的任何勾结。希思的这种态度当时还不很明朗，因为他的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以及他在外交部的同僚仍遵循着合作的老习惯，竭力掩饰首相的拖后腿态度。而我们则把缄默当成同意（特别是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具体问题需要马上解决），并指望在加强大西洋团结这一共同任务的过程中得到英国的支持。与希思的会晤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结束了——尽管我们当时并不了解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多么渺小。

我们认为，在政策方面与希思的观点是协调的（在国际问题上，我们的观点确实是融洽的），但在个人关系方面感到有些别扭。而我们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关系恰好相反。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他——尼克松不象我那么喜欢他——但他的政策使我们两人都感到担心。我在《白宫岁月》一书中没有谈到他，因为我惟恐我对他爱恨参半的矛盾心理会造成误解。然而现在我该说说他了。

我第一次见到勃兰特是在五十年代，他当时是处于战备状态中的柏林市市长，正勇敢地捍卫着柏林人民的自由。他性格坦率，倔强，和蔼，开朗，同时却对一出他扮演主角的戏剧持出奇的冷漠态度。他致力于他的人民的自由事业，但令人纳闷的是，他却不愿过问那些危害本国人民的问题。他给我的印象是，若不是命运使他置身于这些特定的障碍之中，他几乎肯定不会主动地去越过这些障碍的。部分原因是，勃兰特虽然心直口快，但是他似乎喜欢谈论时务，而不喜欢谈论大道理。即便在当时，他身上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出色地完成了命运赋予他的使命，另一方面，又不是心甘情愿这么做。他说的话一般都比较平常；而他干的

却体现了时代的重大课题(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

勃兰特经历了十年苏联的折磨。这势必使他不得不考虑如何消除这种令人不安的折磨。在建造柏林墙的痛苦时期,美国无动于衷,这似乎使他坚信,德国的统一、或者至少是缓和德国的分裂局面,完全依仗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实现不了的。德国的民族主义加强了他这个实用主义的结论。起初可以说是不知不觉的,然而到后来,他劲头越来越大,他开始追求德国的民族利益,并制定了一个新方针:摒弃阿登纳的强烈反苏主义;决心努力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和猜疑,以期苏联缩小分裂的德国两半部之间的障碍。

这个原本是切合实际的想法,因为勃兰特生性容易冲动、却变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心理学家说过,犯人有时表现出非常好的品德以取悦狱卒,以此改善他们的境遇;仇恨和莫名其妙的敬意相间并存。勃兰特从忍耐到和解,从抵制共产主义到倡导缓和紧张局势,到奉行有时近乎民族中立主义的政策乃至基本原则,他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包含这种因素。勃兰特的热诚敏感的个性对他改变和超越德国的战后政策所起的象征性作用是非常合适的。谁能忘记这位德国总理在访问波兰时主动向犹太居民区死难者屈身静默这种历史性的动人情景呢?然而,当勃兰特一旦完成了赋予他的打破旧框框的使命以后,他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维持他释放出来的能量。他实际上成了它们的俘虏,沉湎于一片赞美声中,而没有以相称的意识或长远的方针来节制自己。

一九七三年,勃兰特在政治上明显地受压,他闷闷不乐。起初,我把他这种长时间寡欢少语归因于情绪低落;后来,我想到,他业已完成了大任,实际上他已没有什么话要说了,而自己又不承认已做不出更大的贡献。他具有杰出的才能,体现在希望建立一个更为人道的世界之中。但是,他那容易冲动的天性使他不能驾驭

自己的成就。他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结果使他自己变得不切实际（在某些方面变得危险）。从那以后，他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取得突破时的欢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更加果敢而大胆地为把民族主义同反对任何对抗的忍让结合起来的东西方政策辩护。

勃兰特的历史功绩就是找到一个与分治的德国共处的办法，战后整个时期，他的波恩前任一直拒绝接受这种办法。根据所谓的哈尔斯坦主义，波恩坚决同任何承认东德共产党政权的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根据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他谋求同东德建立联系，放弃德国对现已并入波兰和苏联的东部领土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勃兰特忍痛做出承认德国分治的决定，这是一种勇于正视现实的行为。因为，苏联不垮台，德国就实现不了统一，而这是波恩力所不及的事。美国赞同和支持的正是东方政策的这一部分，尽管我们支持的条件是必须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保护柏林的协议。

然而，在勃兰特的政策中一直存在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持保留态度的一面，特别是由勃兰特的政治密友巴尔阐明以后，我们就更不能不持保留态度了。因为勃兰特提出东方政策的目的是接受德国分治。相反，他把东方政策作为实现德国统一的一种手段，即与东方建立良好的关系，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变成吸引东欧国家的磁石。第一阶段，改善一千七百万东德人的生活；加强旅游和交往；增加与东欧和苏联的贸易。随着关系逐渐密切，欧洲东西方之间的分界线就会渐渐消失。

我们心中的疑团是，实际上分界线的哪一边是磁石呢？我们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世界会——起先是潜移默化地——取得更强的地位。对其他西方盟国来说，搞缓和委实不易。因为缓和会助长贪图安逸，会与心理疗法混为一谈，会放弃与苏联互惠的立场。但对波恩来说，由于苏联实际上把一千七百万德国人作

为人质，因此所有这些危险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了。我们担心西德是否能始终如一地同时对付两方的压力。危险不在于退出北约，没有哪一届德国政府愿意放弃这个免遭直接进攻的保护伞。我们所关切的是：有一种回避欧洲以外的争论的倾向，甚至不惜损害安全上的根本利益；有人在悄悄地脱离西方政策（西欧具体防务政策除外）；对苏联的挑战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这些挑战旨在削弱西方有效的反应。有一次，我对一位同事说，我担心出现这样的情况：“德国总理顶不住苏联的敌对行动。如若发生这种情况，那将会是非常危险的局面。”至今还没有哪位德国总理顶不住苏联的敌对行动，但是提到勃兰特本人的冒险生涯就近乎于此了。

勃兰特在西方联盟的主要伙伴也对勃兰特政策的这种趋向感到不安。蓬皮杜、希思、尼克松谈话的一个主要题目就是，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早晚会使德国潜在的民族主义露头，不管他本人如何不想这样做。一个放任自流的、强大的德国，不管意识形态如何，试图在东西方之间玩弄花招，这是对欧洲平衡的重大挑战。因为，德国支持哪一方，哪一方就会处于优势地位。为了制止（或许为了挫败）这一企图，勃兰特的各位同僚（其中包括尼克松）都打算对德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即各自奉行积极的缓和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政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原来限定的范围。它招致了竞相访问莫斯科，加深了盟国之间彼此的猜疑。至于勃兰特，他卸任之后成了鼓吹走依靠北约保障安全路线的积极代言人，但他的实际意图是为了实现欧洲中立主义——起码在涉及欧洲以外的方面是如此。

勃兰特多愁善感，而他进行秘密谈判的主要助手巴尔则老谋深算。我第一次见到巴尔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巴尔相貌平平，但思维极为敏捷，精力充沛。巴尔给人的印象是，即便处于较低的地位，他也能取得他一定要得到的东西。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主要靠

他出谋划策。波恩与苏联、波兰、东德签定协定，达成关于柏林问题的四国协议，是与他的才干和谈判的才能分不开的。

尼克松和我起初有些犹豫，我们随后默然同意了东方政策。若是美国公开反对，这个政策非夭折不可。在美国白宫和西德总理府之间进行的秘密会谈中，巴尔一直是我的对手。巴尔和我们都明白，我们是从不同的、甚至相抵触的前提出发的，但是我们却找到了体现各自利益的共同语言。局外人或许要争论谁控制谁的问题；认真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则懂得，只有双方都为各自的目的尽责，共同的政策方能经久长存。

无论如何不能说巴尔不愿意看到对莫斯科采取因人而异的态度——这是东方政策固有的性质——会出现的局面。他一心谋求的正是这样的局面。他从中找到了实现德国统一的钥匙。这不是如有些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因为他是亲苏派。相反，他是个老牌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虽然他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毕竟还想当个军官，而由于遭到了拒绝，他的心灵受到很深的创伤。象俾斯麦一样，他企图利用德国所处的中心地位来实现德国的目标。巴尔对他的聪明才智充满信心，认为他可以避免重蹈以往德国的覆辙。

巴尔正是用这种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欧洲年的。我一月份在华盛顿首次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四月初在发表欧洲年讲话之前又征求了他的意见。象大多数政治领导人一样，巴尔总是利用各种事态发展提出自己的独到之见。在措词审慎的答复中，他讲了一通大西洋关系如何重要的老话。他说，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要依仗美国的军事保护；不允许经济问题上存在威胁这种关系的分歧。但是巴尔又说，安全问题近几年来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战后的整个时期里，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对于欧洲安全一直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战略核力量失去了可信性，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更

不用说整个欧洲，将肯作出经济上的牺牲，来建立能够遏制苏联入侵的常规防御力量。从这些老生常谈出发，巴尔得出一个革命性的结论：苏美均势将使得两个超级大国努力防止核战争。他们在这一点上利害是一致的，因而有可能放弃各自对盟国承担的义务。倘若欧洲不能再依靠美国的战略优势，倘若欧洲将不（或从欧洲内部政情考虑不能）作出努力保护自己，欧洲，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不得不为了谋求安全而与东方缓和紧张关系。中欧的军事力量应当削减而不应当增加；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应当加强。按照这种观点，缓和紧张局势是安全政策中可供选择的一种办法，而不是它的副产品。

因此巴尔反对我们新方针的主要宗旨；对于在联盟内部加强政治协调的观点，他根本听不进去，因为大西洋集团会破坏他搞缓和所需要的灵活性。至少应当让每个欧洲国家自由地奉行自己的东西方关系方针。巴尔从来没有说明，由于西方软弱而处于优势地位的苏联为什么要利用巴尔同美国单方面进行裁军比赛来削弱美国的影响。并且，这个主张有更深一层的含意，即欧洲脱离美国，使它在对苏关系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某种情况下是符合欧洲的利益。欧洲运用苏联“有差别缓和”战略，让民主国家互相厮杀，使欧洲脱离美国，这就是巴尔的用心。

如果巴尔的分析是正确的，核均势就会削弱美国的保护作用，欧洲常规武器的劣势就要从“政治上”找出路——这是同苏联媾和的体面说法。这种做法会堂而皇之地被说成是为了加强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关系。但是，若东西方经济关系加强了，西欧势必越发依赖莫斯科。这样，克里姆林宫在东西方贸易中就会多一个施加压力的砝码。因为对某些西方国家来说，东西方贸易正在成为克服经济萧条的重要手段。

美国同至少是它的某些欧洲盟国在观点方面存在着迄今看来

难以弥合的分歧，在欧洲年中开始表面化。欧洲联盟赖以牢固存在二十年的那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要么正在消失，要么正在变成主张对莫斯科搞绥靖的借口，他们在这方面的心情，同要求改变西方伙伴关系的方针显得一样迫切。拿希思来说，我们没有摸透他的心思，把他的缄默认为是性格而不是思想问题。对勃兰特，我们对他的心思摸得又太透了。不过，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一种潜在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危险。我们的结论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危险，我们应当加强欧洲联盟的联系——这是我们搞欧洲年的出发点。

如今需要再次同法国讨论从我于十二月同蓬皮杜会晤以来的事态发展。三月二十九日，我会见了法国新任驻华盛顿大使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共同讨论了行动方针。

科斯久什科说不上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他有出身于法国名牌院校的那种地道派头，对这些名牌学校毕业的学生，贝当有句名言：“他们无所不通，实则一无所通。”科斯久什科才华横溢，工于心计，沉着冷静。在他看来，执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外交政策，就是按法国远在三百年前形成的观念行事。他很快了解到我们无意重新挑起六十年代的争端。我们不反对欧洲自治；我们不想在戴高乐生前最关心的民族一致性问题上引起纠葛。我对他说，我们不反对欧洲奉行自己政策的权利。我们谋求的是各自观点的协调，不是不准有不同看法的法规。基于此，我们欢迎蓬皮杜十二月对赖斯顿谈过的关于召开一次盟国领导人最高级会议的设想。作为第一步，我建议蓬皮杜和尼克松先举行会晤。我着重指出了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西方世界是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政策好呢，还是象希腊人那样让外部世界欺负好呢？

科斯久什科说，他准备返回巴黎接受指示。在他返回之前，蓬皮杜的党在四年一度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随后的内阁改组中，蓬皮杜撤掉了能言善辩的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换上了寡言

庄重的米歇尔·若贝尔。这种更迭当时看似乎是大有希望的。若贝尔是蓬皮杜在许多问题上的得力助手，他在爱丽舍宫担任与我相同的角色，我们在白宫对他的了解是良好的。科斯久什科四月初返回华盛顿，告知法国同意法美首脑会晤。我们的欧洲年总方针没有遇到阻力。

象往常一样，尼克松—蓬皮杜首脑会议在选择地点时出了麻烦，暴露了法国人惯有的那种令人难受的自傲。法国总统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三月访问了美国，尼克松欠蓬皮杜一次回访。但是，巴黎表示不能接受尼克松访问欧洲时顺便访问法国。我们也不能单为访问法国去欧洲而得罪其他盟友。我们象往常一样不得不在大西洋上找一个岛屿作为会晤地点。一九七一年在亚速尔群岛；一九七三年在冰岛（一九七五年在马提尼克岛）。照此下去，法美关系何时会因为找不到两国领导人会晤的合适岛屿而变坏，就不难预计了。

四月十三日，我把准备在四月二十三日发表的欧洲年讲话提纲交给了科斯久什科。巴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我们把缄默当成同意。

最后还要同意大利磋商，每次磋商双方总是喜忧参半。意大利领导人希望与那些版图大小相仿的欧洲国家平起平坐。但他们又不愿因为按美国意图行事而引起国内危机，更不愿因此搞坏同其他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关系。他们只愿干不会引起瓜葛的事；我们决定只磋商，不承担义务。

四月十七日，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给了我们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前我写信给尼克松说：“对于他（安德雷奥蒂）和他的欧洲朋友为我们承担责任，大概只能指望达到他在国内的地位和意大利温和的政治力量许可的程度。”这句话中的限定条件比论断更重要。它们的实际意思是，不能指望罗马会帮什么忙。因为安德雷奥蒂在国内的处境并

不佳，他在欧洲共同体内的影响因此也微乎其微。他的教授风度掩盖了政治上的机敏，他对外交的兴趣，比我认识的他的任何前任都大。但他最害怕在千头万绪的问题中又加进外交政策。况且，意大利总理只是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不是最高行政长官；他不能随便向外交部长下指示。这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基督教民主党组织内地位的高低，而不取决于在政府内等级的高低。

安德雷奥蒂的精力在活动余地极小的范围内处理混乱不堪的政治体制时用光了。十年来，意大利的政治一直受“向左翼开放”派的控制，这一派是美国在六十年代初参与搞的，目的是要把左翼社会党人拉入政府以作为对付共产党人的一种假设的屏障。从全国来说，社会党人与基督教民主党人实行了联合，但是他们却在省一级与共产党人实行联合。因此制定一个长期一贯的纲领是办不到的。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停止那些加剧危机的活动。

安德雷奥蒂想摆脱组织上的僵局，他把社会民主党人（一部分拒绝和共产党人共事的社会党人）和自由企业自由党人撮合在一起，组成行动联盟。然而，这个组织尽管在思想上比“向左翼开放”派一致，但是议会表决却对它不利。它在议会中的多数极其微薄，尤其是，基督教民主党不是一个党而是各个派的联合，左翼主要是因为宗教信仰而从共产党分裂出来的，右翼主要是因为对民族灾难记忆犹新而从法西斯党分裂出来的。意大利当时的处境是：要么以议会的不稳定换取思想的稳定；要么以思想的（最后导致局势的）混乱换取议会的稳定。

不出所料，安德雷奥蒂和尼克松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没有涉及欧洲年，而涉及意大利国内错综复杂的政局。在意大利，围绕国家统一，各派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活动从城邦转到罗马的政治舞台上。安德雷奥蒂情不自禁地道出了意大利一直存在的幻想：意大利因与中东邻近可为解决中东问题出一把力。但是，虽然我所认

识的意大利领导人都提出过这种主张，却没有一个的行动表明他似乎真的相信。

在关于大西洋政策的新倡议问题上，安德雷奥蒂只是泛泛地表示他的好意和支持。我们可以指望得到善意的谅解，但意大利政府却不肯在新倡议中带头。

写到这里，我感到惊讶的是，没有记录表明事前曾就态度问题与日本进行任何磋商，尽管我们在倡议中计划把日本包括在内。要是我们当时首先这么做，这显然就是我们的新倡议付诸实施的一次胜利。把囊括日本的倡议随随便便称之为“欧洲年”而显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官僚势力生性只顾自己的表现。日本确实是工业民主国家扩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这么说是根据的；如果把日本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应该受到批评*。然而，尽管日本在解决经济纠纷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日本对自由世界感到头疼的防务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明显地主要在欧洲）并不那么关心。

多亏日本政治家们圆滑干练的外交手腕，岔开了谈判人不合时宜的热望，使他感到语塞，否则，定会导致非常尴尬的局面。日本领导人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正面回绝对方的要求。他们是尽可能地拖长谈判的时间，直至对方无可奈何地罢手为止。由于日本从未打算参加欧洲年，所以没有把未同日本磋商的事算到诸如我的中国秘密之行和一九七一年夏放弃改革的金本位制这些所谓“尼克松冲击”事件中去。日本感到宽慰的是，它没有被要求在它要回避的问题上表态。此后，日本就站在一边，看着心意难测的西方人为了改善友谊而分道扬镳。

我们的磋商活动于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九日结束。伯克·特伦

* 果然，我四月二十三日的演说有几部分因过于忽视日本的作用而遭到了批评。④

德来华盛顿进行定期的会晤，我把我关于大西洋倡议的讲话预发
稿给了他。他好象没什么意见，伦敦也没提出任何批评性意见。

几年来，我们的盟友一直要求我们把大西洋关系放在更重要的
位置上。他们对我们的作法没有作出明确的响应，也许我们本
来应当从中意识到，他们将会使我们的希望落空。但是，由于我们
已经意识到欧洲人的迟疑，因此我们把这种迟疑看作是制定共
同目标而进行一次重大努力的另一个理由。我们认为，要想达到
思想一致，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出一个正式的建议。

“欧洲年”演说

在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四年里，我从来没有在重大问
题上公开发表过正式讲话。作“欧洲年”演说，这是我第一次这样
做。时间是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地点是纽约的沃尔多夫—
阿斯托里亚饭店，听众是参加一年一度年会的美联社编辑。尼克
松和我都不希望出现争论。我们认为，我们在大西洋伙伴关系方
面正进入一个创造性时期。

我在讲话中首先强调指出，我们宣布一九七三年为欧洲年不
是因为欧洲原先不那么重要，而是因为新的情况正在对自由国家
提出挑战：

把一九七三年作为欧洲年，因为一代人以前的决策所形成的时代行将结
束。那些政策的成功，产生了新的现实情况，需要采取新的方针：

——西欧的复兴已成定局，它在争取实现经济统一方面取得历史性胜利
也已成定局。

——东西方军事战略平衡已经从美国的优势转到接近均势，因此我们对
共同安全的需要须有新的理解。

——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性增加了。日本成了一大力量中心。在许多方
面，解决“大西洋”的问题必须有日本才行。

——我们正处于紧张关系缓和的时期。但是，随着二十年来四分五裂局面的逐渐消失，在民族同一性和民族竞争问题上出现了新的要求。

——一代人以前未预见到的问题出现了，需要新型的合作行动。确保工业国能源供应的问题就是一例。

这些因素使西方的心理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对西方政治家的政治才能提出了最严重的挑战。在欧洲，一代新人对战争以及战争造成的动乱没有切身体会，他们把安全当成理所当然的事。但是他们不愿为使和平成为可能的团结和维持和平所需要的努力承担义务。美国在全球承担了几十年的义务，在东南亚战争中屡受挫折，这使美国人产生并加重了不愿在以美国承担义务为主的基础上继续在全球承担义务的情绪。

这一年的下半年，官方认为——甚至公众大概也认为——总统去欧洲势在必行，我感到此行大局已定，可以搞个计划了。我说，到年底总统启程去欧洲时，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应制定出一个“新大西洋宪章”，或一个共同目的宣言。我们面对的同样的议程——防务、贸易、东西方关系——要求我们协调国家方针。在谈到观点上的分歧时，我当时说了一段不久就感到后悔的话：

外交是经常讨论的内容，但基本上是在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进行的。美国有全球性的利益和职责。我们的欧洲盟国有区域性的利益。这些利害关系不一定非发生冲突；但是，在这个新时代，这些利害关系却不会自动协调一致。

我的讲话的宗旨是阐明美国准备为重新振兴大西洋联盟贡献力量，以及我们对欧洲有什么期望。（在阿拉伯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度抬高油价的几个月之前）我着重把能源作为合作的主要话题：

我们将继续支持欧洲团结。在伙伴关系的原则基础上，我们将作出让步以进一步加强欧洲的团结。我们希望以对等的精神对待美国。

我们决不放弃我们对盟国的庄严义务。我们将维持我们的武装力量，决不单方面从欧洲撤军。反之，我们也希望每个盟国为共同防务合理地承担部份共同工作。

我们将在符合共同利益进行具体谈判的基础上，继续与我们的对手缓和

紧张关系。我们欢迎我们的朋友参加建设性的东西方对话。

我们决不会有意识地损害我们的欧洲或亚洲朋友的利益。反之，我们也希望他们的政策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利益和职责。

我们准备本着合作的精神处理我们共同面临的新问题。例如，能源引起的能否确保供应的问题，石油收入对国际货币稳定性的影响问题，共同政治和战略利益的性质问题，以及石油消费国对石油生产国的长远关系等疑难问题。这可能会成为竞争的领域；但它应当是合作的领域。

我们原来把这篇讲话作为呼吁工业民主国家开创一个创造性新时期的号召。在国内，我们希望克服越南战争留下的自我毁灭后遗症。在国外，我们希望引导我们的盟友以新眼光看待未来，克服令人不悦的经济和其他纠纷。但是发表演说的时间——比原计划时间早了一个多月——却很糟糕。

在国内，水门事件影响了我们的倡议的进展。离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辞职时间只差一周。如本书第四章所述，《华盛顿邮报》连篇累牍地报道水门事件，它报道的大部分新闻不是我的欧洲年讲话，而是我在水门事件辩论期间要求同情某些被指控的人的讲话。诚然，《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明星报》发表了几篇强烈支持欧洲年倡议的社论；但是，《华盛顿邮报》对倡议是否将不受水门事件的影响提出了疑问。它说：“除非总统自己做出补救行动，向全世界表示他的执政能力没有受到损害，否则危害将继续存在下去。”④《华盛顿邮报》的话证明是对的，甚至连同情欧洲年思想的人对名声扫地的尼克松政府恢复西方精神团结的主张也表现出可以理解的厌恶。

我们盟友的反应象先前磋商中那样模棱两可。没有人出来赶浪头，这种情景同马歇尔计划那令人难忘的日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时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带头组织欧洲国家积极响应。法国内阁四月二十六日举行会议以后，一位法国发言人对我的讲话表示有“兴趣”，并说，我们的建议值得好好研究，法国将“本着一

贯的精神，即在尊重我们独立的前提下忠于联盟关系的精神”来进行研究。这句话可以有各种意思。

当天，我提醒法国大使，我们的建议反映了蓬皮杜去年十二月的意见。我在三月和四月对科斯久什科—莫里泽详细介绍过建议的内容。科斯久什科未加否认。他支支吾吾地说，我的讲话中限定欧洲发挥“区域性作用”的含义不好接受。我回答说：“如果欧洲想发挥全球性作用，我们不反对。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任何这种愿望。”接着科斯久什科打开窗子说亮话。他说，对这么庞大的议程，欧洲很难作出一致的反应。就在那一年，欧洲共同体首次探索实现政治团结的可能性时，我们正在强迫欧洲完成一件重大的任务。这种说法恐怕太过份了。促进大西洋团结的尝试可能会使探索实现欧洲共同体的努力受挫。

四月二十四日，英国外交部发表了热情的评论，说我作了“一次显然十分重要的讲话，用意是积极的”，但是又说，英国准备“与我们的欧洲盟友一道仔细研究”。外交大臣霍姆——我们对他的人品和他对与美国关系的热诚是尊敬的——四月二十七日也发表了友好的然而态度不甚明朗的评论：

基辛格博士的讲话，以及美国国务卿最近的讲话，中心意思是，新的扩大的欧洲和美国之间应当继续保持信任与合作。他主张这种合作的范围应当扩大到包括日本和加拿大。我同意他的看法。因为，尽管这会使谈判变得越发复杂，但是对于在安全的气氛中确保繁荣也是不可少的。

西德政府欢迎我支持欧洲团结的观点，但是回避作出进一步的反应，理由是维利·勃兰特总理一周之内将对美国进行一次酝酿已久的访问，准备会晤尼克松。意大利表示赞同，只是对于日本的参加提出疑议——除此之外，勃兰特总理的访美之行就可成行了。欧洲的小国准备过几周等欧洲共同体部长会议开过以后再表态。可以理解的是，日本对于为什么要让它参加大西洋宪章感到

莫明其妙。由于日本外相正要来欧洲访问，因此用不着立即表态了。外相抵达巴黎后，含糊糊地说，他支持制定新大西洋宪章的计划，认为这个设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给日本作出反应留下了很大的余地；这话甚至连日本是否参加也说不上。日本不想由于态度过于鲜明而使自己陷入窘境。

因此，这样的结论就很难避免了：我们的主要伙伴都在托词拖延对美国涉及它们的一项重大倡议作出反应。这一点在勃兰特五月一日抵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时看得更清楚了。很遗憾，尼克松碰到的关于欧洲年的第一个欧洲对话者竟是这位欧洲政治家，他的政策使尼克松最感不安，他的秉性与尼克松自己的秉性最格格不入。尼克松的态度在勃兰特来访之前他对美籍匈牙利小说家汉斯·哈比给他的来信的反应中可以看得最清楚。哈比指责勃兰特故意破坏西方联盟，说他这么做是因为存在反美的偏见。白宫当时的办公程序是：给总统的涉及外交政策的信件，先要交到我的办公室，我往往要加一个信件摘要或信件节略说明。五月十五日，我将哈比的信件和信件节略说明送交给尼克松。尼克松退回时上面有一句批语：“基，这封信的看法很有见解，其分析令人不安。我认为，他的话几乎道出了事实真相。”

勃兰特以审慎回敬尼克松的审慎。他的审慎是对的，但正是从他审慎的举止可以看出，要克服他对美国总统近乎厌恶的疑虑，要有很大的自我克制力。然而，美国国内的动乱使彼此间的疑虑相形见绌。在两位领导人会晤的前一天晚上，尼克松宣布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的决定。在十五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后尼克松自己辞职之前，这个决定比任何其他决定都更使尼克松受到震动。尼克松在勃兰特访问期间没有表现出任何伤感，毅力着实惊人。

相反，尼克松竭力克制着，与勃兰特总理进行了认真的对话。熟悉他的人不难发现，在勃兰特说话的时候，尼克松心不在焉。如

果仔细观察，就会察觉出尼克松眼神呆滞，抑郁，脸色苍白。随着水门事件的发展，尼克松内心深处的痛苦折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尼克松想得很远，这越来越多地耗费掉他的精力。他表现出的沮丧情绪仅此而已。他对水门事件的唯一反应就是陷入沉思；就象一个儿童在黑暗中大声说话替自己壮胆一样，他表示坚信，我们的内部争端将不会影响我们的外交政策。他那丰富的阅历使他不抱任何幻想，但他也知道，他没有别的话好说。

我不知道勃兰特是否明了尼克松的不快；他不能不有所感觉。不然如何解释勃兰特言谈举止的变化呢？变化是细微的，但它却无可挽回地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勃兰特变得不那么谦恭有礼了；他一反常态，变得爽直明快了。既没有往常那种温厚可亲，也没有以前那种谈话时的长时间停顿——尼克松对他这一点一直感到很烦。仅仅在两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挽救了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授命我为柏林与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谈判撑腰。然而，这一次，勃兰特却无意报答我们。他谈议程时那种匆匆忙忙的样子表明他在耍手腕——什么问题也不解决。

勃兰特假装欢迎我们的倡议，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好话，而如何履行他所赞成的东西，他却不提具体的建议。他认为大西洋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全面对话有好处，但他却不拿出实现全面对话的办法来，他也不真心认为迫切需要对所有问题同时展开讨论。勃兰特断言，在某一个问题上谈不拢，不应影响在其他问题上的进展。这样，他一只手给的东西，又用另一只手收了回去。他说无需在广泛的议程上费力，这话几乎等于说我们的建议一文不值，因为有争议的问题应该逐一讨论，对此谁也没有提出过异议。

勃兰特表示希望，讨论经济问题的人应当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但他却闭口不谈需要取得的政治目标的性质以及明确表达这些政

治目标的手段。他欢迎尼克松总统访问欧洲。他提议，在北约组织范围内召开一次大型首脑会议，总统同盟国政府首脑会面。但是，勃兰特这么做又等于筑起一道篱笆。因为召开一次北约首脑会议——姑且不说可能遭到法国的反对——按照程序就不可能讨论美国与欧洲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因为欧洲共同体的某些成员并不属于北约组织，而北约组织成员国也并不都属于欧洲共同体。

为了解决新扩大的欧洲共同体面临的问题，勃兰特建议，尼克松总统访问布鲁塞尔期间与共同体国家外长会晤一次。但是，当着北约组织政府首脑在布鲁塞尔逗留期间，要求尼克松总统会晤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外长，几乎是办不到的。单从身份不同这一点来看，这样的聚会也不可能作出什么决议。勃兰特闭口不提我们关于起草大西洋宪章的建议。而且在当天晚上的国宴上，他利用祝酒的机会，还在对他那格外苍白无力的答词进行修饰。他说，对于即令他同意讨论的有限的几个问题，他也不能下断语：

我们（系指访问过美国的欧洲国家政府首脑）中间谁都不可能仅仅再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同你会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已经是欧洲共同体的代表了。

因此，我来这里，不是作为欧洲的唯一发言人，而是作为欧洲的一位代言人。

我们本来会欣然同意把这句话看作是处理欧洲共同体与美国关系的一种意见。但问题是，在酝酿欧洲团结时期应当使其具有实实在在的含义。基于欧洲尚未建立任何政治机构，因此不存在与欧洲接触的焦点。其实，勃兰特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如果每位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都只是欧洲的代言人却不能代表欧洲；而代表欧洲的人又是无权谈判的公务人员，那末，有权谈判的人又是谁呢？

德国方面向报界发布新闻的方式，把勃兰特来华盛顿的谜解开了。我们惊愕地获悉，德国报界大事张扬，说联合声明中关于

“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提法是对美国企图支配的间接抵制——这一点我们从来也没想到过。公报中删去“大西洋宪章”几个字，被说成是一次胜利，好象能否规避美国把自己的命运同欧洲正式系在一起的要求，是对政治家才干的一次考验似的。向报界吹风的人亦忍不住把水门事件看作是压榨美国的一个机会。德国一家大报《法兰克福汇报》评论说：“勃兰特的胜利”

还在于，鉴于水门事件造成的震动，尼克松需要重申美国总统行动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世界意义。勃兰特出席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的招待会，正好被尼克松利用，使他同意做出让步。

因此，德国新任驻美国大使伯恩特·冯·施塔登（他后来成了我们信得过的好友）一出师就很不利。他几周以前就到了，但是按照外交惯例，大使在递交国书前不能行使职权。国务院礼宾司通常要拖几周，把几个新到任的大使凑在一起引见给总统。冯·施塔登是在勃兰特抵达华盛顿那天被准许单独递交国书的。这种破格的礼遇，目的是让他也能参加会谈。如今，在勃兰特总理离开华盛顿以后，我们的不快（水门事件激起的神经紧张不可能使这种不快软化）一古脑儿都撒在他头上。冯·施塔登总是那么心平气和，他向我们担保，无论勃兰特总理还是谢尔外长都没有向报界作过这种暗示。冯·施塔登为人正派，是不会撒谎的。因此，我们猜测，某位接近最高领导层的人——大概是官方发言人——向报界吹了风。当德国各大报纸报道这个内容雷同的消息时，他们准是得到了某个官员的指点。

欧洲国家对尼克松总统五月三日发表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态度冷淡，也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这是尼克松在任期间发表的第四个外交年度报告。美国总统全面汇报一年来的外交活动，这还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创举。报告有意采用概述的方法，以重大事件为佐证，而不是分门别类地罗列事实。这样做，为的是让国会、公众、

宣传工具和外国领导人深入了解我们的想法——这样做很必要，因为我们总是撇开官场秘密地搞。对于喜欢按既定方针办事而又不经常参与制定方针的官员来说，这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简明扼要的指导性文件了。我们间或用这个外交政策报告表明或者暗示政策方面的重要变化。每年，我这个班子的主要成员——温斯顿·洛德、彼德·W·罗德曼、威廉·G·海兰、理查德·T·肯尼迪、马歇尔·赖特等人集中几周的时间写作，我们希望文章说理透彻，有启发性，引人入胜。我是总编辑。为此，我总要花上整整两周的时间，其他什么事也不干。

尽管我们可以努力，但却永远达不到我们的主要目标：利用外交政策报告在公众中触发一次认真的讨论。部分原因是宣传工具总想标新立异；报告涉及的概念和目标过于抽象，没有新闻价值。另一个原因是报告冗长（第一个报告一六〇页，第四个报告二三四页），即便是对报告最不抱成见的新闻工作者通读一遍也感到很吃力。也许我们从没有就这个报告向报界恰当地吹过风——尽管作为主要发言人我极不愿意这么想。不知道什么缘故，美国宣传工具对报告中关于印度支那的一章普遍很重视（这使报告的作者和他们的家属感到懊丧，因为为了起草这个报告，他们有几周不能在一起团聚）。鉴于当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越南问题，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仔细研究报告会察觉出我们对中国和苏联的政策有重要的变化。不过，外国使馆的官员以及富有远见的新闻工作者和专栏作家却认真地阅读了报告的其他部分，因为他们懂得，从报告中可以极好地了解最高领导层在想些什么。

一九七三年，我们认为我们找到了冲淡对越南问题注意力的方法：我们把发表报告的日期推迟到报纸头版基本不再有越南消息的时候。五月三日，尼克松本人在电台发表了第四个报告，*这种办法是足智多谋的威廉·萨菲尔一九六八年为尼克松竞选时发

明的。萨菲尔认为电台是牢靠的手段，既可以给人以办事周到的名声，又不致于在实质问题上引起纠纷。

尼克松在报告中强调美国对大西洋联盟的义务，并大声疾呼对共同目标要有一种新的献身精神：

由于南北紧张关系的缓和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的一些盟友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将继续保持对欧洲承担的义务，还是准备搞新的力量平衡（在这种新的力量平衡中，旧的联盟关系冲淡了，敌友之间的界线不见了）？

但是美国决不会干任何损害欧洲安全或我们盟国利益的事。不过，我们团结的最牢靠的办法不在于口头上做出保证，而在于对一致目标和共同政策的认识。因为联盟在防卫和缓和问题上争论了差不多十年——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现在争论该结束了。我们应当加强团结，为今后十年共同制定一条路线。

我们只有这一次使报刊没有谈越南，尽管并没有按我们原来打算的那种办法。这一回，由于三天前发生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的事，我们完全被由此引起的轩然大波淹没了。

欧洲政府首脑仍不愿对尼克松重振伙伴关系的努力作出反应。他们躲在专家们的背后，而专家们则搞拖延战术。这给宣传工具开了方便之门，报界与政府下级官员串通一气，鼓动欧洲公众抵制美国的“讹诈”与高压策略。德国报纸仍在庆祝勃兰特从访美最后公报中删掉了“大西洋宪章”这个词。法国报纸的反应也好不了多少。法国报界告诫人们警惕把各种问题互相联系起来企图，说看到了对欧洲自治的威胁；说欢迎对话，但似乎又执意要抽掉对话的全部内容。有影响的《世界报》五月一日发表社论说：

尼克松总统建议举行关于美、欧、日之间关系的全球性谈判，他却忽略了

* 这也是最后一份报告，因为我于一九七三年九月担任国务卿后，便没有时间编写经认真推敲的文件了。这对官僚主义的本性是个很好的评判，也是件可惜的事，因为我仍认为，有关基本目标和哲理的明智报告对于公众、官员和外国了解总统的政策是很重要的。

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现有的组织机构没有任何一个能包括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

欧洲是象巴黎迄今主张的那样通过与美国作对发掘自己的个性好呢？还是象波恩主张的那样通过继续追随美国发掘自己的个性好呢？这还要再看一看。

我在欧洲年讲话中关于欧洲区域性作用的提法，几次三番地受到非难和攻击，却没有谁愿意指出，我这话是在表明我们为之惋惜的一种情况，是在指出一个欧洲以前和今后的行动已很突出地表明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整个战后时期，欧洲一直推卸自己在海外的义务，而丝毫没有表示愿意承担新的义务。英国不顾我们的疑虑断然从波斯湾撤军。我们很难说服我们的盟友加强他们的北约防务。打开窗子说亮话可能并不是上策，但欧洲在措词上找岔子的做法既虚伪又狡诈。这一年尚未过去，欧洲不少国家又把中东战争期间以及后来伊朗和阿富汗的十年危机时期说过的话搬出来，以此作为回避美国呼吁采取联合行动的手段。

真正抓住美国政府意图的看来只有英国报纸。伦敦《泰晤士报》认为，尼克松的报告的观点全面而深刻，应当作为了解美国思想的基本文件”。至于欧洲，这家报纸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他把贸易和防务混为一谈，但是他并没有说，美国对欧洲承担义务的条件是让欧洲共同体改变贸易政策，或让苏联作出政治让步。这一点显然是正确的。

但是，就连这家富有同情心的报纸也避免不了说出这样的话：西德人“象所有其他人一样，对尼克松总统的国内灾难将会如何影响他的外交政策摸不准。”

保守的《每日电讯报》认为总统报告中关于欧洲和大西洋联盟一节有“最尖锐和分析得最透彻的段落”：

现阶段的辩论……颇有些象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应当做点什么事，然后等着别人去做或提出来。当有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同时发生（有些并行不悖，

有些显然相互冲突)的时候,采取上述态度可能是难免的。但是政治家的责任是思想先行。欧洲领导人,切记。

我们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实质。采取纯粹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连技术性的问题也难以解决。特别是,这种态度无助于砥砺自西方最后几次伟大创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若贝尔领着我们跳舞

到了五月,欧洲表现出的冷淡态度本应使我们推迟提出我们的倡议。归根结底,从任何现实角度分析,加强大西洋关系,我们的盟友将得到的好处至少与我们一样多。但是“水门事件”使我们变得固执而不够谨慎了。尼克松知道,那些指责他提出欧洲年是转移方向的人会说,欧洲年搞不成是因为他在国内碰到了困难。尼克松自称他的权力没有受到影响——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保持剩余的权力——因此他横下一条心准备干到底。况且,他对加强大西洋关系坚信不疑;这是他一定要留给接班人的东西。这样,水门事件成了形成僵局的主要原因和加强大西洋关系的障碍。我们硬着头皮坚持下去,结果竟达到如此可笑的地步,我们重申要加强我们对大西洋的义务,其心情好象比欧洲接受这种义务的心情还要迫切。

我下一站是到伦敦为我们那令人难以捉摸的目标奔波。五月十日,我到伦敦,向英国领导人通报了我刚在苏联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的情况(参阅第七章)。白厅对情况了解得最清楚不过,而态度也最暧昧不过。所有的大臣和官员态度含而不露,巧妙地把会谈引到程序上去,避而不谈我们建议的实质。只要不牵涉首脑会议,只要英国对任何具体协议不承担坚定的义务,他们对于开展联合协商是很积极的。

各种各样的良计妙策都出来了。希思建议成立一个四国协调

小组(法国、英国、西德和美国),由北约组织正式指定或举行非正式的会晤。我们接受了。英国外交部常务首席部长丹尼斯·格林希尔说:还可以给这个协调小组配备几个特设小组处理具体问题。我们同意了。还有人建议召开一次北约组织副部长会议。这个主意也通过了。唯一的麻烦是,英国的每项建议都是要我们去征得其他盟国的同意,既不确切提出要讨论的问题,也不提倘若其他盟国不参加,英国怎么办。在组织欧洲各国对我们的倡议作出反应方面,不能指望英国带头,正如实际情况所表明的,如果由我们提出英国的建议,法国表示反对,也不能指望英国支持自己的建议。

英国人仰承法国人的鼻息,这一点从希思在大西洋关系中对欧洲人的重视程度上看得最清楚。英国官员抱着既急切又困惑的心情摸法国人的想法。当我告诉他们我准备一周以后会见若贝尔和蓬皮杜时,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好象伦敦和巴黎之间的电话线路出了毛病似的。尽管我们对情况摸得还很不透,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英国会表示善意和出主意,但到头来还得跟着法国跑。

因此,巴黎最后成了打开欧洲年的钥匙。五月十七日,我同钥匙匠米歇尔·若贝尔首次会面。他刚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一个月以前,他同我一样,是法国总统的助理。若贝尔给我的印象是缄默寡言,不喜欢出头露面,工作有能力,富有协作精神。我与黎德寿在巴黎的秘密会晤是由他负责法国方面的技术安排的,他工作做得十分得体。在尼克松首任总统期间,法国和美国关系中一出现棘手问题时,我们总喜欢向他求教解决的办法。他总是有求必应。

由于这个缘故,也由于尼克松首任期间培植起来的密切关系,我们根本未想过与法国闹对立。在欧洲年的问题上,我们早就准备事先与法国领导人达成谅解;实际上我们也很愿意这么做。我们坚信,法国对国家利益的冷静看法会导致同我们得出一样的结论:西方的团结是欧洲安全与自由的关键。

实际情况表明，这种看法完全错了。到年底，我们与法国发生了同样严重的对抗（我们曾为此批评过我们的前任）。直到如今，我还不十分清楚发生这种对抗的原因。我们准备在程序上依从法国；我们认为，我们是按照蓬皮杜原先的想法做的。我们并不介意法国是否会利用我们的倡议去加强它在欧洲的作用。我们巴不得看到法国政治家们实现蒙内特的遗愿。在我看来，我们感到不悦的主要原因是，正当蓬皮杜身体衰弱，尼克松在国内政治快垮台的时候，米歇尔·若贝尔却步步高升。

若贝尔和我共同工作了大约四周，合作得很融洽，至少是他使我这么认为的。他甚至提出帮助起草新“大西洋宪章”。实际上，一九七四年六月在布鲁塞尔最后签署的联合声明的主要部分是在若贝尔的主持下由办事认真的法国驻北大西洋理事会大使弗朗索瓦·德罗斯起草的。但此时由于若贝尔玩弄种种花招儿，声明变得毫无意义了。几个月来，他用各种非凡的手段，阻挠我们政策的实施。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看法，即我结识的外交部长中，在才干方面还没有谁超过若贝尔，能与他媲美的也寥寥无几。尽管这似乎有点说不通，通过我们的争吵，我加倍喜欢他了。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带有辛辣味的友谊。他是个有教养的、和蔼可亲的人。同他交换意见是一种享受。他体态羸瘦，有一张敏感的脸，眼睛炯炯有神，是一个有大才的人，一个凶猛的辩论家。在修辞仍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国度，他那警句般的语言常常是入木三分的。

米歇尔·若贝尔既不缺乏才能，也不缺乏分析能力，他缺乏的是比例意识。我不认为他从一开始就试图与美国抗衡。他最初的目标是戴高乐第五共和国法国外交的传统目标：至少创造这样一种局面，即法国在主宰时局。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若贝尔对我说：让他乖乖地接受美国的建议是办不到的。法国需要“某种活动的余地”。他并不介意记者杜撰美国和法国对立的新闻，实际上这

会促进意见取得一致：

世界会发生各种突然事件，事件会有发展和反复——这有助于你们计划的实施，因为这会突出计划的重要性。否则，计划就太平庸了；人们就会失去兴趣，所以我们应当保持一种对话困难的局面。

若贝尔给我的印象是，为了得到一个与我们的目标一致的结果，他不仅愿意与我们合作，而且愿意领头干。他唯一的要求是让他当主角，我们不要利用欧洲年在欧洲共同体内孤立法国。他问我们是否已经准备了一个大西洋宣言草案。我说我们没有准备大西洋宣言草案，他好象有怀疑。其实，在与我们的主要盟友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我们是不乐意动笔的，怕他们联合起来找岔子使宣言计划夭折。若贝尔要我们尽快给他一份宣言草案。他说，如果他同意，他将把我们的草案交给欧洲国家。但我们不应当试图运用我们毋庸置疑的影响在共同体内压法国，或利用大西洋伙伴关系拖延欧洲同一体的形成。

鉴于英国和德国希望与法国保持步调一致，要我承认巴黎的领导作用并无困难。我欣然接受了，并且强调说，我们决不会在欧洲组织机构内干孤立法国的事。这样，在欧洲年的头几周，我们对欧洲共同体保持了冷漠态度——这是应法国的要求！诡计多端的若贝尔给我们出了一个比勃兰特所出的更大的难题：我们必须绕过欧洲共同体组织机构，让法国通过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求得意见的一致，以此表明我们对欧洲团结的真诚。主动权从我们手中溜掉了。

把一个国家的代表权让给另一个主权国家，这总是一种过失。不久便真相大白了。若贝尔很会伺机行事，不管他事先有无准备。他竭力利用我们对他一度支持过的欧洲共同体的冷漠，纠集欧洲共同体部长和官员——他们是一批很难对付的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而他自己则成了他们的代言人。美国的一项倡议使若贝

尔得以去追求实现戴高乐派的旧梦：在反美的基础上发展欧洲。

若贝尔是从一开始就大耍花招儿，还是由于机遇使他逐渐采取了背离自己本意的立场，这我说不准。我倒倾向于后一种看法。原因之一是法国从由于若贝尔耍手腕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对抗中捞不到任何好处。当事到临头、欧洲国家被迫在美国和法国中间作出取舍时，对我们的依赖性使它们无疑要取美舍法。但是还没达到这一步，蓬皮杜便去世了，若贝尔相继离开了外交部。在这十年余下的时间里，法美之间的口角犹如一缕轻烟消散了。

若贝尔之所以脱离同我们合作的道路，大概是因为法美冲突宣传太过份的结果。若贝尔活象意大利剧作家皮兰德娄剧本中的人物，他最后真的变成了他开始扮演的那种人。我第一次同他会晤时，他认为我对戴高乐赞誉得过份了。他说，戴高乐主义被人说得天花乱坠，失去了生气。但到他卸任之时，他竟使戴高乐主义达到了连戴高乐将军本人也难以想象的程度。戴高乐更象一名历史学家，他决不会让任何口角留下个人的印迹，也决不会超越使全球均势受到破坏的界限。若贝尔一开始就站到了对立面，为后来的合作奠定心理基础——至少他是这样表白的——他如此陶醉于合作，以至于再也找不到合作的语言了。他忘掉了纠纷本身不是目的，纠纷的价值在于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阶段，纵令对手之间也是如此。我怀疑——我知道蓬皮杜的一些亲随也有类似的看法——若贝尔所以达到得意忘形的程度，是因为有一个旁人摸不透的想法：如果他能够被法国公众看作是法国民族主义坚强的卫士，他就可能成为病入膏肓的总统的接班人。

若贝尔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掩饰感情奔放的天性，这使局面越发僵化了。搞外交，要用和解的方式，把政策上的分歧同个人的憎恶区别开。考究的礼宾仪式表明，一个外交官，无论同他的对手有多大的分歧，也要以事业、原则、利益为重，决不能怀有个人恩怨。

若贝尔却不愿这样做。一旦发生对立，他便立即将对立变成个人攻击。虽然我与他私下会晤的气氛一向是愉快和亲切的，但是在天庭广众面前他从不放过使用最尖刻的语言的机会。他也不用尖刻话攻击美国人。一九七四年二月在华盛顿召开能源委员会会议时，他攻击当时德国财政部长施密特，语言之恶毒是任何有理性的法国人所不容的。

若贝尔才干超群，要不是因为他刚露头角蓬皮杜总统就病倒了，他本来是可以飞黄腾达的。蓬皮杜为人审慎，认真，稳重。我相信，要是精神健旺，他决不会让大权旁落的。而若贝尔，在蓬皮杜总统无力过问国事的时候，一反不肯抛头露面的常态，突然产生了向上爬的念头。他象一颗流星，光华夺目，在外交天际倏然而过，很快又黯然消失*。这真是一件颇为遗憾的事。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七日我们第一次会晤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发生冲突。我们谈的大部分是蓬皮杜总统和尼克松总统行将在冰岛会晤时如何共同提出欧洲年的问题。若贝尔说他同意这个目标。他建议要做耐心艰苦的工作并表示愿意合作。他认为，我第二天同蓬皮杜总统的会谈会有成果。

会谈果然取得了成果。五月十八日我在爱丽舍宫会晤蓬皮杜总统。蓬皮杜是第一个认真讨论欧洲年实质的欧洲领导人。他没有在程序上兜圈子，而是直入本题。他说，他准备对我四月的讲话发表一些意见。他不同意对我关于欧洲区域作用的总的反应。如果我宣称欧洲无权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但我并没这么做——这一点却被新闻界的大多数批评家们忽略了。我只是说明一个客观事实罢了。蓬皮杜接着说，欧洲代表二等力量（这种说法比我的提法大大进了一步），“多少是实情”。他也同意

* 他于一九八一年回到政界，在密特朗总统手下任外贸部长。

这种看法，即大西洋国家面临着一大堆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同时解决。比如，没有统一的政治和军事战略，便无法克服经济纠纷。他希望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与尼克松全盘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

蓬皮杜深知，特别是搞东西方缓和必须在总的目标上求得某种一致。他最担心的是尼克松对苏联人的姿态做得太过份。他尤其不放心的是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议，此协议定于六月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签署，我们一直定期向蓬皮杜通报协议的进展情况（见第七章）。

我认为，蓬皮杜错误地把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议解释为超级大国之间放弃核战争，从而把欧洲和中国置于全面战争的压力之下。尼克松的政策同我的不一样吗？我们仍在奉行各个力量中心之间的平衡政策，还是正同苏联站在一起反对中国？我们对苏联“隐蔽”推进（即不使用武力，只作为一种“进步潮流”）持什么样的态度？换言之，如果共产党控制的力量控制了第三世界的主要国家，甚至进而控制了欧洲议会，我们怎么办？

这些问题提得很深刻，很有远见，指出了今后十年的主要问题。美国缓和战略的基础是，争取国内温和派的支持，避免给盟国以国际紧张局势根源的印象，给予苏联寻求合情合理的和解的机会，但这本身决不是目的。如果苏联继续推行扩张主义，我们决心给以坚决的回击。我们的政策是为此创造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但是蓬皮杜确实看到了缓和政策的弱点：缓和会使策略与战略、理论与现实相混淆。如果象蓬皮杜那样观察敏锐的领导人也觉得摸不着头脑，就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风险：为了表明我们对和平所承担的义务，我们可能使一贯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人失去斗志。为了消除所谓北约组织是和平障碍的论调，我们也可能使北约组织看不清自己面临的危险。这一切，很可能进一步推动蓬皮杜所说的“进步潮流”——在一九七三年的地平线上这还只是一股小小的湍

流。

在总统职权正常的情况下，美国是否能够做办不到的事，只有天晓得。显然，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我们不仅可以做到，而且，从长计议，我们还可以加强西方的团结。在水门事件的恶劣气氛中，尼克松以温和政策扩大地盘的希望正在破灭。处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冒双重的风险：苏联人隐蔽的进攻会迷惑公众；联合起来进行抵抗的努力可能得不到支持。

蓬皮杜确实提过美国人最不愿回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自由国家，我们是反对变革的现实，还是反对变革的方法？我们谋求的只是阻止苏联人以不正当的手段（不管“不正当”的含义是什么）进行的扩张吗？我们维持地缘政治的平衡（即令做法会引起非议——甚至象蓬皮杜所说的，对它的攻击以“进步潮流”的面目出现）是利害攸关的事吗？

美国人素来相信国际法规，一向不愿意从力量平衡的角度看问题，这使他们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我们反对的只是变革的方法，不是变革的事实。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当不分青红皂白地维持各种现状。正义与稳定必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两者确实实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国际均势方面出现了某些变化，可能危及我国的安全，不管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必须坚决抵制。一百年来，英国不惜一战，也决不允许安特卫普港落到一个大国手里。制海权是英国生存的前提，在靠英国生命线这么近的地方建立牢固的海军基地，这被认为是水火不相容的事。作为类似传统的产物，蓬皮杜问：美国的忍耐比较而言是否有限度？他的问题使我有口难开。从理智上说，我同意他的看法。自由世界人民的安全有赖于美国是否能够树立一种民族利益的概念，而这种民族利益不管遇到什么样伪装的挑战，也一定要保卫。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这同美国对外政策的老框框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

不能明确回答他的问题。

尼克松总统当政时期的对外政策在哲学上的侧重点是，树立这样一种民族利益观念，教育美国人民认识其复杂性。遗憾的是，越南战争搅乱了权限，水门事件几乎使辩论无声无息了。由于某些与美国外交政策不相干的原因，我们失去了阐明我们基本观点的能力；这观点是：美国有义务保卫自由世界人民的安全，如果它要想维护自己安全的话；在最初阶段抵抗对均势的挑战，向来是有分歧的事。因为，如果等挑战明朗化时，抵抗所付出的代价就太高了；在核子时代，挑战可能变得有节制性。

一个国家和它的领导人必须在以下两者中间做出抉择：为证明在道义上靠得住而去冒巨大的风险和根据没有证实的假想去对付那些可以对付的挑战。我喜欢选择后者。日益减少的人力、物力、财力，确实使我们舍此没有其他现实的路可走。但是，这样做有个难题，即为此做出牺牲是否必要？这是无法证明的。如果法国对希特勒一九三六年重新占领莱茵兰奋起抵抗——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爆发的事件，那法国可以用微小的代价取胜。但是，这样的话，哲学家们对于希特勒是一个被误解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一个一心要统治世界的疯子就还会有争论。四年以后，希特勒是何许人，尽人皆知；而这一认识是以几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政治家的天职是克服本国的经验和自己观点之间的差距。如果远远地走在本国人民的前面，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如果因袭陈规，会失去驾驭事态发展的能力。衡量政治家是否伟大，主要看有没有远见和魄力，而不是看有没有分析能力。他必须站得高，看得远，当大多数同胞还看不清前面的目标时，他敢于朝着目标前进。能够超越分歧的政治家是伟大的，但不是每一个面对分歧的人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他甚至可能是个蠢人。

因此，在发生水门事件的那一年和印支战争十年以后，我和蓬皮杜的谈话多半是以教授而不是以外交官的身份进行的。我说，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世界力量均势。某些变革，无论怎么伪装——即使以“进步潮流”的面目出现，我们也断乎不能接受。所以，他错误地认为尼克松选择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总的说来，我们不喜欢选择，但如果非要我们选择，我们就要说：

选择最强的，欺负最弱的，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如果苏联企图使中国变得软弱无力，欧洲将会成为芬兰，美国将会完全孤立。因此，不希望并且不准许苏联摧毁中国，这是与我们自己的利益一致的……怎么能支持中国呢？今天这种观点对美国舆论来说是不可设想的。我们需要几年的时间来与中国建立联系，而这使得以下的看法变得似乎有道理，即对中国的进攻，就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这是我们精心制订的政策。

至于“苏联伪装的进攻”，我说我们将做出最大的努力，阻止西方不断削弱其警惕性，因为苏联伪装进攻只有在西方警惕性削弱时才会发生。这就是我们希望赋与大西洋关系以新的道德含义、希望为共同的目标和准则创立新义务的理由。尼克松正是本着这个精神前来雷克雅未克的。

但是，甚至在我说这些宽心话的时候，我也感到忧心忡忡。陷于“水门事件”的美国十之八九不能赢得国内的支持，使这些宽心话听来有效；美国即令恢复了团结，竞相向苏联靠拢的欧洲也不见得听得进去。然而，承认这一点，会使所有危险的趋势发展得更快。有时，人们只能以信仰对付逆流，求助上帝制止发生最坏的情况。

蓬皮杜对此表示谅解。他知道我们所面临的种种障碍。可是，现在留给他的时间太短了，病魔使他无暇考虑更多的事。因此他的反应侧重于策略方面。他去冰岛就为了干一件“积极的事”。他准备“认真地讨论”一个新的文件，使盟国得以重申他们的团结

和长远目标。他说：“我们必须相互交谈，这样欧洲人就不会有这样的印象，以为什么事情都是受美国支配的。”听了这番话，加之交谈了一个月毫无成果，我开始觉得，我们终于到了进行我们原来设想的那样一次重要的欧美对话的时候了。

雷克雅未克冷冰冰的人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尼克松和蓬皮杜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了首脑会议，但却没能实现这些希望。我们到那里去真心实意地希望能有一个突破，这一点从美国国内的辩论看得很清楚。例如，美国的经济机构坚信，他们实行浮动的货币体制的目标在一九七一年的亚速尔会议上几乎已无法达到。当时蓬皮杜和尼克松已经解决了由于美国废除有限的黄金兑换率而引起的货币危机。^⑤ 尽管尼克松当时向蓬皮杜保证要保卫美元——意思是实现固定兑换率——但是一九七三年三月美国却没有这么做，或没有能力这么做，从而造成实行浮动兑换率。这是美国财政部一贯主张的，也是法国人一向极力反对的。

当我们着手准备另一次法美首脑会议时，我的朋友乔治·舒尔茨担心我们会为某种眼前利益而出卖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这种成果在经济学家眼里就是拟议中的大西洋宪章。在我们行将回国之前，他郑重其事但很有克制地向尼克松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基本点是，尼克松不应当因为法国含含糊糊地答应给予政治上的合作而在币制改革问题上从美国的立场后退。对财政部来说，应当采取这种立场；但政治领导人则必须摒弃这种立场。我在这里提及此事，只是想指出富有讽刺意味的一点，即我们自己朋友的忧虑并不是我们欧洲批评家的忧虑。

尼克松和我一方面受制于美国官场的优柔寡断，一方面受到

美国某些盟友的怀疑，只好本着我同蓬皮杜谈话的精神行动。若贝尔要我寄给他一个“秘密的”、即非正式的文本——如果这种事在高级外交官之间可行的话。他说，蓬皮杜和他将研究我们的观点，以便为首脑会议做准备，并做出积极的反应。不管这是若贝尔设计的另一个狡猾的圈套，还是故意捉弄人，使我们看上去有求于他，我认为做出反应总没有坏处；法国迟早要研究我们的观点。五月二十六日，我通过我们的大使约翰·欧文转去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扼要地阐明了我们的观点。文件的名称是《尼克松总统和蓬皮杜总统冰岛会谈拟议的成果》。下面这个重要段落表明了我们起草“大西洋宪章”的想法：

在尼克松总统今年年底访问欧洲时，我们希望达成一项谅解，作为草拟大西洋关系准则工作的开始。这些准则可以包含在以北大西洋联盟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签署的宣言形式发表的文件里。但至于这些准则采取什么准确的形式、叫什么名字，我们并无定见……

但是，我们希望在议题上达成某种谅解，例如：

- 大西洋国家遵循的准则和分享的广泛利益的声明；
- 确定七十年代战略条件下的共同安全利益和目标；
- 对东西方关系和对与第三地区关系的基本方针；
- 在环境、能源供应、技术交流等共同的问题方面的合作原则；
- 对经济关系包括贸易谈判和改革国际货币体制工作的基本方针；

在冰岛会晤之前，我们没有时间等待法国的答复。

在会晤间歇期间，希思和蓬皮杜秘密会晤过一次。这次会晤又一次突出表明了欧洲人的守口如瓶。会谈的大部分情况两人都没向我们透露，尽管他们谈话的主题是美国提出的。法国人干脆什么也不告诉我们——似乎他们与英国人的协商同我们无关。希思给我们写了一封语调友善、内容空泛的信，把蓬皮杜已经对我们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法国总统将抱着“积极的态度”去冰岛。说完这句话以后，希思便摆出了一付在一场家庭吵架中的一个身受

其害的旁观者的样子。

尽管我们对这次秘密会晤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公开的征兆是掩盖不住的。蓬皮杜和勃兰特早先同意的尽早召开大西洋国家首脑会议的设想被抛到九霄云外。希思和蓬皮杜如今拒绝规定具体时间，除非经过双边和多边协商以后认为有必要举行高级会晤。这显然是在兜圈子：由于协商的结果取决于有关政府的意志，而那些不愿举行首脑会议的人本身却有拒不合作的大权。实际上，希思和蓬皮杜以拒不规定具体时间来制造麻烦，以拖延举行首脑会议。他们使利用首脑会议乃至总统欧洲之行作为促进谈判的最后期限的任何努力都归于失败。两位领导人唯恐仍有任何误解，于是让报界从他们的助手那里获悉：他们认为一九七三年底以前结束协商是不可能的。

但是，尼克松穷于应付水门事件，而我正准备与越南进行另一轮谈判，所以我们都尚未认识到欧洲年可能变成对抗行动。由于我们不愿看到水门事件造成的越来越坏的影响，迫于蓄意混淆这个问题的种种行为，出于正义而不是冷静的思考，我们不能不慎而又慎地寻求我们所需要的答案。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开拓创造性新时代（这个梦想使我们熬过了越南战争带来的极度痛苦），现在要么为时已晚，要么为时尚早。

在实现我们冰岛之行的意图之前，我们首先得会晤这块石多山秃的冻土地带的领导人。在这块硬邦邦的土地上，夏天几乎全是白昼，冬天全是黑夜，可敬可佩的冰岛人从贫瘠的土地和严酷的大海谋求生计。按照外交惯例，尼克松、国务卿罗杰斯和我拜会了冰岛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感谢他们的款待。我们感到冰岛政府领导人是彬彬有礼的，但对法美首脑会谈兴趣不大。他们最关心的是由于鳕鱼之争即将与英国进行的战争。

这是个涉及沿海水域领土所有权的问题。冰岛宣称拥有在冰

岛与英国之间的水域、捕鱼的专有权，言外之意是要保卫和取得深海的矿物资源。不管从法律上来说冰岛的立场有多少道理，这个小国意欲通过威胁要关闭北约在冰岛的空军基地和必要时甚至不惜与英国一战来强化这一立场。英国的多艘拖网渔船和一艘军舰已经遭到冰岛快艇的攻击。这些快艇操纵巧妙灵活，弥补了火力的不足。冰岛的部长们一再发出军事行动升级的严重威胁，尽管尼克松和罗杰斯规劝他们不要把事情做绝。

我感到愕然。一个仅有二十万人口的岛国由于鳕鱼问题竟然扬言要与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世界大国开战；一个超级大国认为必须：（一）表态；（二）遏制弱者而不是强者。尼克松和罗杰斯说了不少安抚的话，而冰岛部长们却执意要做以往任何时候都等于自杀的事。我想起了一百年前俾斯麦说过的一句话：弱者由于蛮干变强；强者由于克制变弱。雷克雅未克市政厅这块区区弹丸之地——一边是苦苦央求的超级大国，一边是声称要与面积比自己大二百五十倍的国家开战并扬言要退出北约（没有北约它就会孤立无助）的气势汹汹的小国——说明当今世界弱者是何等的跋扈。

五月三十日晚上，我拜会了若贝尔，商谈两位首脑会晤前举行例行预备会议的事。如同一九七一年在亚速尔群岛一样，法国人租用的是岛上最好的旅馆——一处大别墅，晚上十时左右，若贝尔和我在这里会晤。在每年的那个时候，冰岛全天都是白昼。出于某种原因，若贝尔主张会议改在更靠南一点的地区举行。厚厚的帷幕造成了他此时所习惯的黑夜，并且使用了电灯。若贝尔开门见山，直入主题，这与两周前蓬皮杜表示的使人振奋的善意截然相反。果然，这次会晤竟成了对美国发牢骚的会。如果蓬皮杜象对我所说的那样，他来冰岛是为了取得某些“积极”的东西的话，那末他显然是要留待同尼克松直接会晤时再取得了。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若贝尔的话必定反映出蓬皮杜的观点，即便这种尖酸刻薄的谈话方式无疑是他自己独有的，而且也很难说清他对蓬皮杜思想的影响力有多大。照若贝尔的说法，我们倡议所选择的时机首先着眼于美苏关系而不是大西洋国家的关系。他认为美国这样做是想在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之前把最多的牌抓到自己手里。我们希望以所有大西洋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自己利益的发言人的身份同勃列日涅夫对话。若贝尔至少强烈地暗示，在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举行首脑会议之前法国按兵不动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且我们不能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利用大西洋国家的合作来强求别人做出让步。

他并不满足这种别出心裁的反常论调，还进而说：如果接受我关于我们倡议草拟大西洋宣言的动机不是为了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说法，那么目的准是要在即将举行的贸易谈判中对欧洲施加压力。纵令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们的倡议仍然会损害法国的利益。因为这会招致共同体程序的混乱。如果我们打算通过北约做工作，欧洲年可能变成迫使法国重新参加北约的一种手段；如果欧洲共同体作为我们的助手，实际结果会被说成是美国企图拉拢其他成员国，从而削弱（如果不是更坏的话）法国领导层的作用。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崭新的组织，把所有现有机构并入某个超大西洋团体？

照若贝尔的说法，法国不赞成召开欧美最高级会议，他声称我们曾敦促勃兰特在访问华盛顿时提出召开欧美最高级会议的建议。（实际上，这个建议是蓬皮杜接见赖斯顿时提出来的，而勃兰特表示附议使我们颇感意外。）唯一的目的是孤立或削弱法国。我们准备何时实施他认定放在我屁股兜里的宣言草案？他何时能够看到这个草案？他不相信压根儿就不存在这样的草案。若贝尔惟恐我们有干点好事的想法，他又说，美国的货币政策在全世

界造成混乱。要么美国对自己干的事全然无知，要么我们是处心积虑地企图通过使世界充斥不能兑换的不值钱的美元来取得金融控制权。我们坚持重新估计战略是一种遁词，以掩盖这样的事实，即在核均势的条件下，我们不想为了保卫欧洲而冒真正的风险。

若贝尔把欧洲年变成一场角力比赛。他所谈及的每一个突发事件都成了对我们意图的攻击，或成了搞拖延战术的理由。他把近乎妄想狂的动机推诿到我们身上。这使我们失去了解释的意义：如果我们果真是若贝尔所指责的那样，他是不会放心的。

我有些厌倦地重复了我们的传统立场。我们所谋求的是西方国家重新致力于道德的和政治的目标的一致，而不是谋求与苏联领导人会晤或行将进行的贸易谈判的讨价还价的筹码。我们坚信，如果不这样做，民主国家就会丧失方向和结合的意识。至于程序问题，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法国的合作，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进行下去的。如果蓬皮杜仔细地研究我们的观点并附带研究为解决经济问题提出的各种建议的话，经济问题是会得到很好的解决的。我们将本着一年半以前亚速尔会议的精神处理这个问题。防务上的僵局起因于技术问题，而不是我们有什么偏爱或企图所致。在欧洲防务问题上，我们需要有明智的理论，免得现在可以清楚看到的突发事件有朝一日会酿成他也害怕的选择：要么自杀，要么屈服。

若贝尔一反常态，突然由脾气暴躁变得温情脉脉起来。他表示，他谈的是蓬皮杜的意见，而他自己的意见则是宽宏大度的。（这是总统密友们的故伎，目的是使他们在谈判时不搞通融，不把问题变成人格上的冲突。我有时也使用这种办法。）他表示，尼克松明天上午向蓬皮杜谈的意见将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若贝尔并没有向我们说明尼克松怎样的意见才能消除根深蒂固的疑虑。对这次谈话最好的解释是，若贝尔把尼克松当成了一个将要接受严师考

核的研究生。

我心情沉重地返回旅馆。显然，这次两国政府领导人会晤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将很难避免出现僵局。然而，在大厅里等着吹风的白宫记者团却不这么想。他们提出各种刻薄的问题刺激我，好象我们为了躲避水门事件的锋芒准备发动政变似的。这次会晤有必要吗？我们不是已经同意大西洋宣言的提纲、把雷克雅未克变成尼克松恢复名誉、缓和国会意见听取会批评的场所了吗？一句话，在总统受到围攻的时候，我们难道想打出国家利益的旗号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吗？

次日上午，尼克松前往作为同蓬皮杜会晤地点的博物馆。另外还分别安排了两个会议：两国外长及其助手讨论对外政策；两国经济部长及其随员讨论经济问题。这使得尼克松借口排除了罗杰斯，蓬皮杜借口排除了德斯坦。根据尼克松的要求，我作为记录员参加了两总统会谈。这种作法使若贝尔感到忿懑。他被“提拔”为外交部长，现在却发现自己被降到次要的地位。蓬皮杜的病使他变得容易激怒，他让法国一位发言人透露，他们的总统没有助手的协助也可以对话——这样说并不公道，特别是因为我参加亚速尔会议充当的也是记录员的角色。

水门事件耗费了尼克松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不象往常那么镇静自若。我自上次见到蓬皮杜到现在只有两周的时间，他的变化也很惊人——或许以前爱丽舍宫庄重威严的气氛掩盖了这一点。由于服用可的松，他的身体变得虚胖。虽然他依旧那么彬彬有礼，但是要保持彬彬有礼看来需要费很大的气力。他那孤僻的样子一看便知是癌症患者，他进行的秘而不宣的战斗，使得现在讨论问题显得不很得体。毋庸置疑，他的病使法国的政策变得越发富有刺激性了。当死神在向他招手的时候，要他合作发起一项旷日持久的新倡议，未免太苛刻了。在正常的时候，蓬皮杜定然会

对他认为的我们的急躁病和我们对老于世故的欧洲人了解不够起平衡作用。他也一定会同我们一道为我们的未来制定更远的规划。但是眼下，在将来由谁接班的问题上，蓬皮杜放心不下——多数政府首脑生性需要在心理上认定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人——这使他对法国越发持怀疑态度，使他不愿另辟新径。因为换人很可能导致难以预测的或许是危害匪浅的结果。在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他回到了曾经熏陶过他的戴高乐主义的正统观念上。他不想同他的前任的干将们对垒，当他还感到前途无量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因此，雷克雅未克会晤双方各有各的打算。尼克松尽管处境艰难，但仍认为自己是有职有权的美国总统，他刚上任就制定了一个长远规划。蓬皮杜在眼前的事（对此他了如指掌）和将来的事（对此他害怕知道）两者之间举棋不定。对话最后失败就失败在这种没有共同尺度上面。

尼克松知道若贝尔要挑衅，发表了最精采的讲话。在对戴高乐表示崇敬之后，他侃侃阐述了美国倡议的理论基础。他以审慎的口吻驳斥了若贝尔昨晚的发言，为了避开正面对抗，他巧妙地把若贝尔的观点推诿到没有披露姓名的法国记者的身上。他说：

首先，我们向欧洲提出倡议的时机与俄国首脑会议或美国的政治制度毫无关系。我们之所以宣布一九七三年为欧洲年，是因为我认为，在与俄国搞所谓缓和的这一年（这是欧洲显示实力的一年）里，如果欧洲在政治上开始分裂，我们将面临极大的危险。所以坚持说美国可以同俄国人和中国人坐下来谈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就降低了我们对我们真正朋友的重视和关注。当我同俄国人会晤时，对于他们的打算，我并不抱比你们更多的幻想。但我并不抱怨。

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时机，我就要看到一场朝莫斯科的赛跑——西方和欧洲各国竞相去莫斯科，进行谈判和交易。诚然，各国应当有自己的行动自由，但是也应当有砥砺我们大家的哲学基础。否则，克里姆林宫那些精明强

干的领导人就会一个个把我们吃掉。他们不能一古脑儿吞掉我们，但是他们可以一个个吃掉我们。因此，我们保持大西洋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首先在最高一级，希思、勃兰特、蓬皮杜和美国四巨头就我们向何处去进行非常坦率的讨论……

我没有关于未来的蓝图，未来必须靠我们大家来实现。尽管我在法国报纸上看到了种种议论，但是我决不想强迫法国回到北约或法国认为回去没有好处的其他组织……

尽管讲话稿有些复杂的句法，但这是一篇开诚布公的恰如其份的讲话。美国存在着新孤立主义危险；欧洲存在狭隘主义危险。由于技术的发展，必须制订新的防务方针，这不是美国政策的偏爱，而是承认现实。苏联人肯定企图在欧洲制造这样一种印象：我们和他们准备安排共管世界的方案。必须采取措施，消除欧洲防务不能分开和政治自治的矛盾心理。六月八日，若贝尔再次指责我们搞欧洲年抱有利己的动机，我当时对他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更大的私利。八年里，如果欧洲由于脱离我们感到软弱无能的话，那末双方都会受到损失。”这个预言实际上已经彻底实现了。

蓬皮杜的回答冠冕堂皇，自相矛盾，淹没了问题的实质。他首先分析了国际形势。分析很尖锐，但不象往常那么中肯。他故意不想说清楚，他无论谈哪方面的问题，听起来总让人感到如堕五里雾中。他说，美国已经承认了军事均势，因而也就承认了外交均势。然而，“不拿出大笔的钱，你又有什么办法呢？”美国企图“用协商和条约……”来约束苏联，固定现状。但是，不管有没有缓和，苏联人现在四处伸手。现在存在薄弱环节，例如南斯拉夫，因为铁托年事已高。所有这些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美国与中国的新关系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周恩来和毛泽东死后这种关系还能存在下去吗？其次是日本的兴起，它夹在中苏美三国之间，处境困难，“它曾暂时说过，它将同美国在一起。”

在这种捉摸不定的氛围里，蓬皮杜对欧洲的前景并不乐观。他

不认为一九七三年的特点是“欧洲的崛起”，因此我们同大西洋彼岸的对话没有一个态度鲜明的伙伴。他看到的只是欧洲将成为能够解决经济问题的强大的商业力量。在英国，希思是唯一的欧洲人；蓬皮杜还未同其他任何人会晤过。蓬皮杜与尼克松一样对西德不放心。蓬皮杜说，西德“开始谈论它有两种选择自由，宣称它属于西方，而有人正迫使德国讨论转向东方的具体问题”。不一会他又接着说：“德国企图脚踩两只船。”意大利人也有顾虑——同意美国提出的任何建议，但不同意没有他们参加的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事先搞的任何安排。荷兰也是如此。至于欧洲共同体，正在穷于对付胡萝卜和小麦的价格问题。“情况是清楚的，但却很糟。体制不完善，但眼下却没人愿意脱离它。”

蓬皮杜这一番话是大实话。不过蓬皮杜并没有拿出解决难题的办法，也看不到共同的前途。他的观点归根结底就是认为召开什么会议也无济于事。他以嘲讽的口吻说道，只有美国人可以乞灵于欧洲年，对法国来说，年年都是欧洲年。但欧洲现在没落了。另一方面，大西洋宣言的概念也颇模糊：

有谁说过什么吗？如果说过大西洋联盟，那必须由大西洋理事会产生。联盟是美国加一个国家吗？是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吗？这是困难的，因为欧洲共同体不是政治实体，只是经济实体。

蓬皮杜言之有理。北约和共同体成员国有一部分是重叠的。两个机构的职能是不同的。然而，这并不是蓬皮杜的问题的实质。如果大西洋宣言由北约（它毕竟包括除爱尔兰以外的所有有关国家）发表，那么这个组织就会带有政治性，而法国只希望它带有军事性。但如果它出现在欧洲共同体里，美国就要参与该组织的决策活动，这样法国想拔尖的野心就不能得逞了。法国既不希望约制它在联盟里的独立性，也不希望克制它对欧洲领导权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任何加强大西洋团结的想法都是定然会碰壁的。

蓬皮杜在程序上讲得头头是道，但政治家的责任是解决难题，不是出难题。蓬皮杜的一席话要么等于出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难题，要么等于蓄意破坏为民主国家增强方向意识的重大倡议——使民主国家在策略问题上消耗精力，从而渐渐产生会造成国内体制削弱、国外危险增加的无能为力的意识。

尼克松勉强结束了上午的会议，建议由英、法、德、美四国政府首脑的心腹人物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工作小组。希思早在五月曾向我们提出过这种想法；这出于戴高乐一九五八年提出的“五人执政内阁”的设想；我们在五月二十六日给若贝尔的备忘录里也包含了这一点。蓬皮杜起初接受这个想法也不是违心的，因为它反映了法国提出的一个长远建议。至少我们在午餐结束前本着这个意思澄清了某些含义不明的话。

当蓬皮杜出席下午的会议时，他的态度好了一些，这或许是若贝尔开导的结果。可以想见，尽管我们未必会误解他，但是起初却确实误解了。据说蓬皮杜的本意是四大国在双边基础上进行磋商。法国不参加任何讨论大西洋宣言的新会议。法国只在已定的会议或双边的会议上参加磋商。如果我想同时会晤英德两国代表，蓬皮杜并不反对，尽管法国不参加。（蓬皮杜很清楚，这是谈不成的，因为希思和勃兰特都不同意进行这样的磋商。）蓬皮杜所做的唯一“让步”是，四国副外长可以会晤，作为北大西洋理事会的一部分，条件是其他会议（当然是法国有否决权的会议）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为了使他的让步更迷人，他建议，在本周我与黎德寿进行另一轮谈判时，若贝尔和我可以在巴黎会晤，蓬皮杜也愿意在本月末派若贝尔去美国——这是消磨另外四周的时光和使我们在其他会议上无法提出不受欢迎的建议的好办法。

蓬皮杜实际在用程序问题吓唬我们。如果四大国进行双边磋商，那末就要同时进行同一课题的六场谈判（如果意大利参加，就

要同时进行八场)。这样就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为与一方谈的事必须通报其他几方,这样极有可能造成混乱、误解和危害。如果谈判没有中心点,没有任何具体建议,一定会发生混乱,如果我们向现在的会议提出建议草案——这是唯一合情合理的态度——我们就会被指责为纠集欧洲国家反对法国,企图以美国的文件控制北约。

在我们提出欧洲年的时候,我们指望引起欧洲的一致反应,并在几个月之内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万万没有料到,六周时间过去了,还没有对话的人,没有会议场所,没有文件草稿。

后来进行的讨论同样没有结果。蓬皮杜猛烈地抨击了我们的货币政策;但是同亚速尔会议相比,他没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建议。他这么做可能是明智的。双方的分歧太大,国家元首的指示也难以弥合。在黄金可兑性(法国的观点)和不可兑性(美国的观点)两者之间显然没有折衷的立场。

全体部长参加的最后一轮会谈预示要出现僵局。尼克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再次表示他对戴高乐的崇敬。他对他的前任不了解这位伟大的领导人感到惋惜;他说他决心克服现存的任何疑虑。他坚决主张,他的政府成员要在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对待法国。

尼克松没有完全懂得,对戴高乐的颂扬更容易使蓬皮杜恼火。政府首脑一般都喜欢把自己与其前任分开,不喜欢看成前任的追随者。戴高乐毕竟解除过蓬皮杜总理的职务,而也正因为蓬皮杜的突然辞职,才使他没有被人忘却。

无论如何,蓬皮杜觉得没有答谢的义务。他酸溜溜地答道:“尼克松总统和我争相赞扬戴高乐主义,但是既没有胜者也没有败者”——这是自认为取胜的一方惯用的说法。他惟恐有人抱有取得成果的想法。于是又补充说:“我们并没有想决定任何事情。”蓬

皮杜很聪明，但却没领悟出业已取得的成果，

我们了解了彼此内心的想法，我们在所有的办法上都没达成一致意见，但我们在总的利益上是一致的。我们一致认为，指导法国和美国的不仅是感情的传统，而是重大利益的一致性。我坚信，这次会议尽管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它为未来播下了一粒种子。有些事情想想挺有趣，但做起来就不那么有趣了。

蓬皮杜并没有向我们说明播下了一粒什么种子。然而，毋庸置疑，播这粒种子并不是很有趣的事。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开花结果。

几乎紧接着又发生了一场争论。代表团还没有离开冰岛，法国的一位发言人在向记者介绍背景情况时说，以后的磋商将是双边的。这话贬低了副外长会议的意义，表露出对大西洋宣言的疑虑。我们自己的吹风会必然要对着干。由我亲自澄清我们与蓬皮杜迥然不同的公开声明的含义也无助于减弱人们的火气。

几天以后的情况才使人们看清：只有法国吹风会的主持人才真正了解蓬皮杜，这一点我们若在会议开始时知道就好了。衣冠楚楚的法国外交部常务部长乔弗里·德·库赛尔（一个老牌的戴高乐主义分子）对从冰岛返回巴黎的约翰·欧文大使重申，法国对欧洲共同体的义务妨碍了四大国的磋商。法国对其伙伴的这一微妙的表示我们听了觉得很新鲜；法国几年来一直只参加四大国财长会议，坚决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财长参加。尽管如此，法国的伙伴仍不能参加欧洲年的外交活动。在六月五日欧洲共同体外长举行的会议上，若贝尔反对共同体与尼克松总统举行首脑会议，原因是，所有的欧洲人云集到尼克松周围不体面。若贝尔在会上还指责我们向记者介绍雷克雅未克会议的情况态度过于乐观，并阻止任命特别委员会为大西洋对话准备提出欧洲的主张，断然反对任何形式的大西洋宣言。

在这种情况下，我于六月八日在巴黎同若贝尔的会晤变成了

一场决斗。如果一个有限制的组织不行，所有共同体成员国的会议不体面，那么还能开什么样的会议呢？若贝尔重申了他的观点，即我们出于国内原因才搞欧洲年，坚持主张双边磋商——这似乎是他急于表明的雷克雅未克会议取得的一个成果。他再次提出了他一再提出的要求：我们必须拿出我们压根儿就没有的大西洋宪章草案。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文件拿给他看，方能举行双边会谈。

可惜的是，由于我们对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的感情考虑过于谨慎，我们尚未草拟任何文件。我们一直等待磋商，以免造成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印象。我建议，四国一道草拟一个文件，每个国家在第一稿中各草拟一部分——先后在双边的基础上互相交换意见。这种程序虽然显得过于笨拙，可是为了使法国人放心，必须这么做。

开始，若贝尔表现出同情的样子。法国将撰写欧洲政治演变一节。后来，他在会上又表示，每个国家——法国、英国、西德、美国——都应草拟一个完整的文本。但是这项工作尚未着手进行，若贝尔又表示希望先看看我们的文本。看来，除非我们给他看些东西，否则我们将无法取得进展。于是我表示同意。月底他访问美国时给他一个草稿。他表示他也将搞出一个草稿，或许是对我们的草稿的反应。尽管我感到难以接受，但还是钻进了他设置的新圈套。因为一旦我把草稿给了若贝尔，我就要受他的摆布。倘若我把草稿给其他盟国看，他就会指责我们合伙整他。倘若我等待他的回答，他就会伙同他的盟友损害我们的立场，对我们的草稿百般挑剔，或阻止起草工作正常进行。

第二天，当我在巴黎同约瑟夫·伦斯会晤时，我发现我们的立场被歪曲了。伦斯当时刚担任北约的秘书长，他在许多方面反映出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荷兰一个稳健的、

保守的、强烈亲北约的内阁中任外交部长。我们把伦斯看成是美国坚定的朋友，北约团结的勇敢捍卫者。一九六九年，在他非常得志的时候，他来到华盛顿，煞有介事地劝我们应再给荷兰航空公司一些着陆权。当时美国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在国务院一次午餐会上讲到他说：“荷美关系有三百年的历史了，约瑟夫·伦斯在那个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担任外交部长。”

但没过几年，他在国内变成了一个不合时代的人物。荷兰政界明显地向左摆；北约的安全不那么强调了；半中立主义的道德精神抬头了。伦斯坚持认为西方代表了应当维护的绝对标准，因此在荷兰这种社会结构中他是没有地位的。当他调任北约离开荷兰政界时，他失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他的同僚也被解职。在布鲁塞尔，他那容易激动的性格受到现代潮流冷静派的耻笑，同时也受到了我们的敬慕和爱戴，因为我们深知，一个对民主国家的团结在道义上的重要性充满坚定信念的坚强人物填补秘书长这个关键位置是多么重要啊。

伦斯具备作为第一个欧洲领导人明确欢迎我们的倡议的特性。可惜，他不代表任何国家的政府。他所代言的组织也不是法国所喜欢的组织。伦斯对我说，他已写信给联盟所有国家的外长，赞扬我们的倡议，要北约在磋商时给予很好的配合。他准备利用北约常任代表们周末午餐会的机会制造舆论，甚至着手草拟文件。他要求给予指导。但法国从中阻挠。由于若贝尔要弄种种手腕，我们不能同愿意帮忙的人对话（担心被指控企图孤立法国），而只能同不愿合作的人对话。

我准备再做一次努力，在这之前，我还不打算否定若贝尔或蓬皮杜。因此我回避了劝告。我对伦斯说，我想等与若贝尔交换文件草稿本以后再谈北约的组织机构问题。我说，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倘若法国反对欧洲年，那末欧洲年就完蛋了。伦斯同

意我的意见，尽管默许并不是他的长处。他不喜欢玩弄权术；在前进的道路上碰到障碍时，他通常的做法是铲平障碍，继续前进。他提醒说，有些小国很难对付。他的话是对的。但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对以下两种情况做出选择：要么惹得小国不高兴，要么使法国起来公开反对。而法国的拖延战术至少会得到英国道义上的支持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默许。

等待若贝尔

直到一九七三年六月底，我们还是止步不前。在我们倡导两个月之后，谁也没提出欧洲年到底应包括哪些具体含义。没有工作计划，没有供讨论的讲坛，甚至连欧洲方面的正式答复也没有。我在等待若贝尔。为他的访问已准备好了两份草案，这都是我约定的：一份是国务院准备的，文本有点长，提出了我们的目的，以妥协的笔调写成，棱角多已磨去；另外一份是我手下的人准备的，比较简洁，可能会引起争议。

比利时外交部政治司司长艾蒂安·达维尼翁六月二十七日来华盛顿访问。他身为欧洲制度的坚强捍卫者，显示出一个人的机警和献身精神能够在联合的欧洲的体制内取得远远超过其国家实力的影响。他在到圣克利门蒂访问我之前拜访了副国务卿威廉·波特和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斯图塞尔。达维尼翁从欧洲共同体的观点出发，捎来了类似伦斯带来的口信。他担心我们与法国的双边交易会损害欧洲共同体其他八国促使法国妥协的能力。重新确定共同体与美国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大多数争议都会发生在共同体的权限方面，而不是在北约内部。据达维尼翁讲，若贝尔在共同体会议上正在阻止会议取得进展，他有两种论调：在他与美国进一步磋商期间，不要作出任何决定；无论如何也

不要仓促从事，因为现状还未到十分不利的程度，正如法国所作的那样，同意与华盛顿保持友好关系是没有必要的。这样，一切都取决于若贝尔，他要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到圣克利门蒂来见我。

外交上的重要时刻多出现于不一致的背景下。西部白宫由两排相互平行的一层楼的活动房屋组成，中间是一条水泥走道。东边一排有一个会议室、一个接待区、工作人员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和一个小餐厅。西边一排面临大洋，包括四个办公室，每个办公室有一个秘书间。判断白宫顾问相对重要性的一个最好办法就是看其与总统办公室接近的程度。根据这种判断，白宫顾问按等级次序是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我。整座建筑是在霍尔德曼冷酷无情的申斥的压力下从一九六九年四月到七月花了三个月时间建好的，以供尼克松避暑用。（由于尼克松坚持决不休假，他在圣克利门蒂的逗留只是将白宫的工作移到了西海岸。）每个主要办公室都有一个小院，设有电话装置，在小院里可以俯视总统的高尔夫球场，球场下面就是太平洋。

就在我的小区内，在加利福尼亚和煦的阳光下，我与若贝尔又重新开始争论起来，但还保持着合股企业中合伙人的门面。若贝尔曾博览过法国军事史，他迷恋于立即进攻的意义。他一开始就请我们不要通报他的欧洲共同体伙伴的情况——可能是指达维尼翁的访问。若贝尔什么也没有带来，没有草案，没有建议的程序，也没有进一步讨论的论坛。事实上，他强烈地暗示，他来此的主要目的是听取刚刚结束的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晤的情况通报。这是我们会谈的大部分内容。当我们终于回到欧洲年问题上来时，若贝尔拐弯抹角地说出他之所以长途跋涉来圣克利门蒂是为了拿到我们的大西洋宣言草案——这在电子通讯时代实在是一种浪费时间的办法。为了表示诚意，我将我们的两种草案都给了他——一般说来，这是一个不高明的手法，因为这会使对方选择对

其最有利的东西，并可了解我们的内部分歧。若贝尔不肯在那儿阅读。他要“阅读和研究”——或者是他要“研究和阅读”。除了取得进展外，他差不多什么事都愿意干。如果他同意我们的草案，事情就好办了；这样我们就可进行多边讨论会。他没有讲到如果他不同意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为若贝尔在洛杉矶举行的惹祸的晚宴，是他这次访问的最好的缩影。我邀请了政界、商界和娱乐行业的一些令人尊敬的代表参加。在若贝尔起身用法语答谢我的祝酒词之前，一切都进展顺利。我的朋友丹尼·凯耶，一位不熟悉外交礼节的演员和难以预料的天才，插进来探讨起语言的选择；他注意到若贝尔英文讲得十分出色。法国外长是否能讲大多数客人都懂得的语言呢？若贝尔冷冷地答道，他讲法语是为了方便陪同他来访的人员。丹尼·凯耶提出通过翻译解决这一问题。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可能由于若贝尔在外交宴会上从未遇到过丹尼·凯耶这样的人，他默认了。他用相当漂亮的英语发表了祝酒词，丹尼·凯耶声若洪钟，用一种毫无条理、模棱两可的法语将此翻译了出来——这种语言久已淘汰，它讲究语调的抑扬顿挫，出口象连珠炮，令人发狂，这样，那些没有听过这种话的人要花好几分钟才领悟出翻译过来的意思。若贝尔看起来并不感到逗乐。另一方面，这并不完全是包含在生活中的模仿技巧；我们的对话开始进入丹尼·凯耶的风雅而含糊其词的连珠炮之中。

我们在等待若贝尔的答复或相应草案时，努力展开了横越大西洋的对话——这一次是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是没有任何关于欧洲年的问题被证明是容易处理的。

由于维利·勃兰特又出任总理，尼克松与其秘密交流就通过埃贡·巴尔。我曾在年初与巴尔讨论过我们的方案；他在四月初的一份备忘录中曾表示过支持；我们会再与他接触是十分自然的。

我在圣克利门蒂会晤过若贝尔后，曾邀请巴尔来华盛顿。在勉强接受邀请后，他未作任何解释就取消了此行。我于六月三十日再次发出邀请。在此期间，若贝尔千方百计地将水搅浑，他告诉德国外交部长沃尔特·谢尔，说我认为巴尔是我在欧洲年问题上的对话者，这样就保证了德国在内部争议中的特权。

七月二日，尼克松致电勃兰特通报与若贝尔会谈的情况（这一步是必要的，这样不至于使波恩只是了解法国的方案）。他邀请勃兰特派一名代表到华盛顿来进行美德双边会谈，这样，在尼克松秋天访问欧洲时，大西洋宣言就可达成。他让勃兰特自己去确定代表。

勃兰特于七月七日冷冰冰地作了答复。他对尼克松秋天欧洲之行的暗示未作反应；他简直是无视这次访问。他同意就大西洋宣言举行双边会谈，他有节制地称大西洋宣言为“有关逐步发展美利坚合众国与联合的欧洲的一些总的原则”。显然，欧洲年并未陷入由于德国的过于热情而形成的危险。

勃兰特在信中指定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去进行双边探讨。不是巴尔在官僚政治的斗争中输掉了一局，就是勃兰特自己不愿显示出他个人与欧洲年太密切。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

带着轻松、从容不迫的态度，瓦尔特·谢尔在七月十二日抵达华盛顿。他那平易近人、友好的神态给人的印象是他在故作姿态，但这是大错特错。调和的态度和第一流情报结合起来了。他巧妙地推行东方政策，但从不涉及他对西方联合的义务问题。他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这表现在他身为自由民主党领袖的技能，他将这个党从中间稍微偏左转向中间稍微偏右，这种微妙的变化使得自由民主党成为德国政策的摆轮，对其施加了远远超过该党人数的影响。谢尔身为民主的虔诚信徒，他在我们时代的哲学争论中所处的立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据我的印象，他认为自己国家最明智

的道路就是实现对他的党在国内政策中最为紧迫的那种程度的策略自由。谢尔十分了解与美国的关系对于德国的安全及其外交的重要性。他带来了一份宣言草案的提纲。这是内容最为丰富的草案，是与我们的基本态度最为一致的草案。我向谢尔极力主张将其定为正式文件。他答应在两、三周之内办妥。我们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份文件。由于法国的压力以及数周后对话破裂，这份文件也成了牺牲品。

谢尔在实质问题上的帮助并未扩大到程序上。他希望总统去访问，但象勃兰特的希望一样不能表露。他能对日程提出的唯一暗示，就是访问应在欧洲安全会议结束前一些时间内举行。由于会议上周才筹备，肯定得要好几年时间，这就给着手计划未造成巨大压力。谢尔重复了迄今已众所周知的程序上的困境，即在北约集合政府首脑比较容易，但在北约讨论经济问题或欧美关系却十分困难，而在欧洲共同体的体制内讨论这些问题是可能的，尽管要在没有政府首脑出席的情况下来讨论。

谢尔的解决方法是应当有两个宣言，一个是关于北约范围内的问题，另一个适用于欧洲共同体的一些问题。但在努力时，旧的纠缠又来了。法国将不赞成共同体政府首脑与美国总统会晤。谢尔建议总统可以在布鲁塞尔会晤欧洲委员会主席（一名文官）、欧洲共同体主席（按轮流任职的规定，下六个月丹麦首相为主席）以及具有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资格的九国外长。有一种荒谬的主张认为，政府首脑在北约会议上会首先保证西方安全，而拒绝在同一城市与总统讨论经济和政治问题，还会将这些问题授权外长们讨论。我指出了另外一件荒唐事：我们所有的盟国差不多都极力主张我们在欧洲安全会议结束时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举行最高级会谈。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愿与美国总统进行最高级会谈呢？什么东西使得与勃列日涅夫的会晤变得如此容易呢？谢尔不会去推

动。我们推迟到起草结果出来之后再作决定。

若贝尔强加给我们的笨拙的程序引起了它本身的混乱。文件的各种草案就象春天空气中的花粉那样多。除了我们看到的德国提纲外，一叠薄薄的荷兰草案提交到了北约，若贝尔曾答应将法国的草案单独送给我们，单给若贝尔看过的美国草案就有两种。

要说出谁真正地看到或批准了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发现很难相信德国的提纲在准备时没有同任何人协商。但是，让若贝尔研究美国的草案，并且允许谢尔无视我们的地位去填写他的提纲，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我决定将两种美国草案送交谢尔。我们走得更远，还将草案在七月八日发往伦敦。我知道这会使得若贝尔更加反对我，因为我曾对他讲过要等待他的反应。但我们的草案在若贝尔手中已有十天，我们在法国的敦促下所同意的双边进程已引起其必然结果，不我们对别人讲的话向我们的主要伙伴通报是不可能的。

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我对若贝尔的另一种策略发制得太晚。若贝尔在七月初访问了伦敦，并且当场询问英国领导人对美国草案（在他们收到之前）的看法。当英国领导人老实地否认知道美国草案时，他指责他们与我们互相勾结反对法国；他声称，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会不将这类文件给我们最老的盟国看。诡计多端的若贝尔由此达到了两个目的。如果我们将文件给了伦敦，他确立了同等的地位；如果我们没有给，正当再也无可回避作出决定时，他就会使英美关系恶化。他达到了后一个目的。虽然直到希思和我都卸任后我才了解若贝尔访问的细节，但很明显，一九七三年七月，在谈判的高潮中，白厅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因而对我们的态度甚至比希思政府前一阶段更为冷淡。

七月十六日，又有一脚插了进来。法国驻华盛顿代办把若贝尔的一封信交给了我，这封信否决了我们的两个草案。他认为国

务院的文件没有我手下人所准备的文件“内容丰富”，但在在他看来也“更为谨慎”。此外，由于它很枯燥，也不合格。若贝尔将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他现在不想挑起争论，因为争论是令人讨厌的。但是为了“友谊”，他劝我以更现实的文件进行我所期待的双边会谈。但他不会提出一个文本来转达这种可以接受的“现实主义感”。他担心这样作会使我难堪；他写道，经考虑后，他觉得最好是保持沉默。换言之，我们可以提交文件，但是却不给我们提供所期望的事的线索。我们也不要去打听我们的建议为什么会被否决。在此期间，若贝尔利用我们的草案削弱了我们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这是一场十分老练而毫无意义的外交表演，因为若贝尔的胜利没有给他和他的国家带来什么益处，而是把法国与美国的关系当作了筹码。

但是这使得我们的倡导受到了挫折。七月二十三日，欧洲共同体外交部长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在欧洲年的讲话发表三个月后，经过数周的双边磋商，他们终于聚一起来谈论实质性问题了。我们的盟友又一次用程序问题来回避，但是所涉及的事比拖延还要多。原来的决定是共同体的政治司司长（外交部的高级文官）应在九月中旬之前为外长们起草一些原则。在共同体慎重考虑后，部长理事会主席会将结果通知我们。没有提到尼克松对欧洲访问。

又过了几天之后，我们才开始明白哥本哈根所发生的一切，这次会议不仅将欧洲年暂时搁置了两个多月，并对总统的访问予以冷淡（这是大西洋关系中前所未有的两个事件），而且将欧洲与美国的对话变成了敌对的举动。在坚持要我们不与欧洲共同体协商后，若贝尔利用我们的冷淡使共同体接受了一种与二十多年来密切协商的方式截然不同的程序。大西洋国家，特别是大国，在许多非正式的接触中交换看法，这曾成为一种惯例，其茂盛之生命力就

在于自发性。现在的情况是，欧洲国家决定不与我们协商就着手制订一项有关大西洋关系的文件。我们看不到草案；我们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在共同体外长制订好文件数月之后，然后由丹麦外长提交给我们，他将在这年的余下时间里担任主席。他将被授以提交草案的权力，记下我们的评论，然后向其他外长汇报，这些外长将在下个月的会议上考虑我们的观点。在他们就适当的答复达成一致意见后，然后又重复同样的过程。在丹麦外长不露面期间，其他任何外长都不得对我们谈起作为美国的倡议哪些方面已开始进行，即使非正式地也不行。

希思在七月二十五日给尼克松的电报中很明显地表示出新的态度。他强调，九国今后将自己内部分享“他们在与美国双边交流的体制内所获得的”一切情报。换言之，秘密的双边交流——首先由我们的盟国提出，并作为唯一可以接受的程序——已告结束。原来已经交换的情报会被分享。我们突然明白了我在英国政府内就欧洲年问题所指定的联系人内阁大臣伯克·特伦德会那样难以捉摸的原因。他从四月份起就一直回避进行协商，一直拖到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后来，他再也没有权力进行双边磋商了。这一点希思讲得很清楚：

我认为，如果我们自己就目前的方式看起来是服从这一决定，我们将大有希望取得我和你都期待的那种胜利。这样作会增加九国在秋天有次序地作出答复的机会。

在战后整个时期，英国基于在华盛顿的优惠地位，以其“特殊关系”而自鸣得意。但是如果向伦敦通报的所有信息都会自动送往九国，其关系就再也难说是“特殊”的了。欧洲对欧洲年倡议的反应是作出了这样一种程序：与我们会谈者未被授以谈判权，而可与我们谈判者再也无权与我们会谈。

使我们最伤脑筋的是，我们知道若贝尔在这场斗智中占了上

风，他已侥幸取胜，因为我们没有设想过对手的程序。若贝尔冷酷无情地利用了我们安抚法国的努力，以此作为孤立我们的手段。正是由于若贝尔的请求，我们才抵制了许多小国对于正式建议或广泛讨论会的不断要求。在避免孤立法国的名义下，我们以极大的疑虑与法国、英国和德国进行了双边会谈，而没有直接求助于共同市场的机构。为了不至于加重旧有的敏感性，我们没有采纳约瑟夫·伦斯提出的利用北约作为协商论坛的建议。

在等待了欧洲三个月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一目了然。若贝尔利用了小国对四大国专制的不安、西德对在较大的集团内禁止推行东方政策的不快，以及希思显示其欧洲天职的决心拼凑了一个虚无缥缈的联盟。若贝尔在希思的支持下对我们很任性，因为在我们的脑海中从来就未想过这一整套作法会引起对抗的可能性。难怪乎已因水门事件压力而动荡的政府的心情很难平静下来。

其结果是总统对希思的答复异乎寻常的冷淡：

虽然我接受您的观点，即在我们所希望的总的方面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进展，但我必须坦率地告诉您，对于我们所处的形势，我甚表关切。

我原来以为，当我们在一月份的会议上讨论后来成为欧洲年的倡议时，我们已经同意，这是在关键时刻符合共同利益的主要计划。在那次会议上，在随后通过这条渠道进行的多次交流中，以及与您的代表的会谈中，我们的共同基础就是，至少是为了欧洲以及我们的利益重新赋予大西洋关系以生命力，由于强有力的社会影响需要进行特别的努力……

我们并不反对欧洲国家应该彼此协商他们希望怎样与我们对话。为了不希望因程序问题而拖延时间，我们采取了双边的渠道，因为这是欧洲方面特别喜爱的，而且事实上，因为其他渠道看来很不合适。每一次多边会谈的尝试都受到断然拒绝，其中也包括基辛格博士在五月份访问伦敦时贵国政府建议的几次。我们最后接受了双边会谈，因为我们同意您的判断，法国不应受到孤立。但我们对多边渠道的偏爱总是很明显的。我们不断地表示，各种各样的双边会谈以及在现有的多边论坛上的讨论只要一旦可行，就应该多边

齐心协力。如果我们已经尽量维持了私下的双边交流，这主要是欧洲方面的请求，因为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取得进展的最好办法。您说，原来主张我们私下进行双边接触的国家，会利用这种接触谋取好处，我对这种说法感到困惑不解。

同样的观点在尼克松七月三十日给勃兰特的信中讲得更为尖锐，勃兰特成功地提出了流传至今的标准的欧洲论点，即哥本哈根会议代表了对我们的倡议的重大反应。尼克松借此机会讲，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不会访问欧洲，而且，他也不会签署其它政府首脑未签署的文件——这是对他只会见共同体外交部长、而不会见共同体政府首脑的观点的一记耳光。

我必须坦率地向您表示我对欧洲经过慎重考虑后的态度感到吃惊。在我们提出倡议三个月之后，根据欧洲方面的要求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在双边基础上进行了接触，我们现在发现，欧洲国家在九月中旬以前都不愿与我们讨论实质性问题。包括贵国政府在内的许多欧洲政府向我们保证，他们将向我们介绍自己的实质性看法以对我们的观点作出反应，欧洲国家已作出决定，在他们之间经过把我们排斥在外的讨论首先确定共同的立场之前，将不透露这些看法。据我了解，其目的是为了向我们介绍这种共同的想法，然后再请我们以与受指示的欧洲代表打交道的方式进行交流。我必须坦率地告诉您，以创立一种新的大西洋团结精神为目的的、以所有阶段都协调为实质的努力，现在已差不多变成了欧洲与美国的对抗因素，这使我感到惊讶。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应该了解，我们在双边或多边论坛上都不会进一步采取主动，但要等待九月份九国磋商的结果，然后确定是否或如何采取行动……

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就我计划中的欧洲之行，我已得出以下结论：如果没有同加强大西洋关系的需要相称的结果，我将不前往欧洲。我不能考虑我的欧洲同行们认为不可能参加的那些多边讨论会。我并不认为这会为我们的倡议所设想的目的服务，我原以为，当你五月份在这儿时，我们彼此已经同意，由我以及其他政府首脑在欧洲签署没有签署的公报。

谁也无从了解，如果这些信件是由一个未受过心灵创伤的总统发出的话，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我们的盟国知道，水门

事件由于发现白宫的录音设备而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毫无疑问，没有水门事件，就无需这些信件了。事实上，我们的盟国不仅了解我是主要的起草人（大多数情况都是如此），而且知道总统由于国内的原因而无从关注这类问题。无论如何相互指责都太晚了，这在下一一次与英国的协商中就一目了然。

伯克·特伦德爵士在向勃兰特发出信件的当天（七月三十日）抵达华盛顿进行英美双边会谈。根据哥本哈根决定，他没有什么可会谈的。与我明智而又文雅的朋友的会晤是痛苦的。我们彼此都理解，如果这种趋向继续下去，我们在大西洋关系上就处于转折点了。为了欧洲团结的抽象教条，为了在纯理论方面占上风，由一代人精心培育起来的某些成果正在丧失。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英美关系，是在信任和协商这样的无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关系已受到了墨守陈规的形式主义的束缚。旧的体制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特伦德在这种旧体制中生活得太久了，对于自己的使命只能感到不快。他是在英国文官制度纪律条例和他的荣誉感的允许下前来表示他的苦恼的。但是事情超越了他的级别。

当英国又一次在未事先协商和警告的情况下于八月初在北约提出大西洋宣言草案的文本时，英国政府决定改变现有格局的想法就更清楚了。伦敦从未对我们送交的文本作出反应，这一点使其姿态更为惊人。（我们在八月二十七日才收到对文本的否定答复。）英国的草案以其平淡乏味著称。此外，它是独立于共同体、防止综合性的文件。而且，它要通过联盟的“天然时间表”来处理。这意味着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最早时间将在十二月召开的下一一次北约理事会期间，这是尼克松因为要准备国会会议而明确宣布他不能访问欧洲而选定的时间。当我们还沉醉于旧有的格局、抱怨没有协商时，女王陛下政府答复说：

但是，我们已经由于时间的耽搁与九国中的一些小国发生了纠纷，它们

正是由于这些耽搁而了解到我们与白宫的一些讨论……我们认为，只要有可能，我们从一开始就要进行多边讨论……大西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通过纯粹的双边讨论所能达成一致的。行动，相对于言谈，也应是多边的。

与此同时，我们了解到共同体将宣言草案的文本给了日本，并说明欧洲和日本会谈的文件会具体一些，而如果我们参加，文件就应含糊。我们从未听说过这一计划的存在，更谈不上就其内容进行协商。很明显，这是有意冷落，因为这种战术没有必要。日本主要关心的是站在火灾现场之外。日本的外交官随时都在彬彬有礼但故作冷淡地打听他们被邀请参加的异常的欧洲年的情况。但是他们坦率地表示，当认真的努力受到排斥而引起不满时，他们无意于参加欧洲家庭的口角。正是由于这种态度，曾以加强大西洋团结而开始的努力变成了组织一切民主力量反对美国的手段。

虽然官僚主义的惯性和“水门事件”的不快迫使我们继续采取行动，但欧洲年已失去其意义了。

从未有过的年代

一年以后，当尼克松成为四大国中唯一留任的政府首脑时，我们建议中的正式部分，即新大西洋关系宣言，终于达成了——尼克松在六周之后辞职。但到此时，由于一年的口角，宣言在道德和心理上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了。

很明显，历史决不会根据命令而重演。由一位美国人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来激励欧洲的主意是十分不自然地照搬乔治·马歇尔国务卿披露的马歇尔计划；“大西洋宪章”这个词只不过是四十年代罗斯福与丘吉尔著名的谅解的重复。在欧洲国家告诫的激励下，为了将注意力从亚洲转回欧洲；在怀旧思想的吸引下，为了争取历史的主动性，我们与自一九四七年以来已经发生了急剧

变化的形势交织在一起而不可分了。在当时，国务卿马歇尔向那些没有选择余地的国家送去了一件事实上是免费的礼物：复兴欧洲的美国巨额援助。欧洲方面的问题是将自己组织起来以确保获得这笔赠礼。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任务，对政治家不无帮助。一九七三至七四年的大西洋宣言没有带来任何眼前利益；它迫使每个政府应付一大堆棘手而繁杂的议事日程——当选执政的政治领袖一般都希望将这任务留给其继任者。

在我们受创的心灵上有着复杂的心理原因。我们太急于从越南战争的创伤中挣脱出来，因而未能足够地估计欧洲不可能（至少不能以相同的程度）分担美国必须履行的大部分责任。

还有其它重要的障碍，我将在第十六章进行讨论。但是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水门事件要不是这一丑闻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欧洲年计划，欧洲年本来是可以取得很大成功的。在美国举国一致的支持下，一个威望极高而强有力的总统本来可以使自由国家众志成城，实现道义上的团结。他们也会急于与他一道出出风头。随着一九七三年时光的流逝，对立已成为事实。与尼克松交往已变得危险起来；身受创伤的总统也无法将美国国内舆论恢复到使我们的盟国不至于无视的程度。如果尼克松不成为欧洲领导人政治上的不利条件的话，他们这种明显的冷淡是极不可能的。他们越来越怀疑他们与一位日益不得人心的最高行政首脑签署一份庄重的文件要冒的风险。如果能显示出眼前利益，他们是会抓住这种机会的。但是大西洋宣言突出了现代民主领导人的困境：当开始执行一种走下坡路的政策时，政策出成果的时间要比总统的任期还要长。每位欧洲政府首脑如果正好在“水门事件”纠缠尼克松前就与他看法一致，他就得盘算，他是否会分担面临的耻辱，明天要更保险些。我们提出的问题都十分复杂；最好是以视若无睹的态度来掩盖这些问题。

还有，经过差不多十年的观察，我为我们一些盟国对尼克松丧失权力的反应之冷淡而感到悔恨。他是一个将整个社会生活都奉献于加强大西洋联盟的人。他在第一届任期内曾竭尽全力以赢得欧洲领导人的信任。他停止了与法国的讨厌的争吵。他克服了预先就有的倾向性，协助勃兰特挽救东方政策。他多次向希思表明他的崇敬心情。尽管他在一九七一年有些严重的失误，但他作出特别的努力经常与其欧洲同僚协商。但是，所有这些领导人一点也不客气，谁也不愿与一位受到公众有节制的支持而正在行使职责的总统一道冒险，这就是他们所采取的做法。

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该做的也已经做过了，我不得不作出结论，虽然即时的努力已经失败，试一试也是对的。因为我仍然相信我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工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长期以来都是利用同美国的联系来回避国内政治的根本问题。在国际局势紧张时期，有人批评美国的政策是在损害欧洲的安全。当我们接受我们伙伴的劝告缓和与莫斯科的关系时，他们抱怨苏美共同统治。实际上，欧洲要求美国承担其防务，但又希望在其领土上避免真正的军事行动。欧洲政府谋求我们在与苏联的谈判中对每一方面作出详细的保证，但并不准备接受对其单方面主动性的类似限制。这种不协调，如果长此下去，就会因国内暂时压力的驱使，使政策矛盾重重，从而导致西方的团结陷入一盘散沙的境地。更重要的是，策略上的纠缠使民主国家的政治丧失了营养。没有远见，公众就会由于非专家见地以外的技术问题而逐渐堕落。恐惧，而不是目的，成为许多民主国家政策的主宰部分；适应，而不是向命运负责，规定了政治上的谨慎。这类事态的起因需要追溯得很远，并不是仅靠外交政策上的主动性所能解决的。但是，欧洲年所代表的主张有助于抑制这类事态的发展。

事实上，欧洲年大多数实用的建议都实现了。就在尼克松辞

职前，大西洋宣言签署了。在杰拉尔德·福特任总统期间，开始了在广泛的议事日程上的经常协商，而且延续至今。但是，在无比困难的情况下预见鼓舞人心的未来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① 詹姆斯·赖斯顿的文章：《蓬皮杜赞成美欧会谈》，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纽约时报》。

② 《白宫岁月》第九三八—九四九页。

③ 参阅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华盛顿邮报》社论：《基辛格博士和欧洲》。

④ 同上。参照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华盛顿明星新闻》的社论。

⑤ 《白宫岁月》第九四九—九六二页。

第六章

动 乱 中 的 中 东

是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时候了么？

越南和水门事件的创伤造成的国内弱点对我们中东政策的影响最小，这是很奇怪的。中东问题没有酿成国内的重大争议；同其它国家相比，这个地区的国家较少利用我们行政当局正在增加的困窘，因为如果没有对强大的美国的信念，他们将一筹莫展。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依靠美国的强有力的政策，以达到它们全然不同的目的。以色列依靠美国的支持生存。温和的阿拉伯人则指望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影响来取得和平进展。甚至激进的阿拉伯人也需要我们，虽然只是把我们当作借口。他们往往把我们的坏影响夸大到他们认为可以不受水门事件干扰的程度。

尼克松开始第二届总统任期时，怀着坚定的意图，要为中东和平发起一次外交主动行动，尽管他当时还没有制订出一个计划。在他再度当选前两天的一次新闻采访中，尼克松说，在他的第二任期内，中东问题将居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十一月五日，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又作了他个人的估计：预计不久美国将会“十分积极”。^①此外，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公众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中东。一九七三年二月的第一周，专栏作家罗兰德·伊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写道，“来自同美国友好的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使尼克

松和我卷入了中东外交。这一周出版的《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说，许多中东领导人即将对华盛顿进行的访问给予尼克松一个“采取一些新的主动行动的自然的机会”。《巴尔的摩太阳报》强调，这些主动行动是“期待已久的”。《华盛顿邮报》敦促尼克松对中东给以“持久的亲自的关注”，因为越南战争已经结束了，并且警告说，以色列的态度“是目光短浅的，令人无法接受。”^②

然而，有许多理由要求我们谨慎。第一任期已经突出地表明，过急的和平计划是无济于事的，这些计划在党派情绪和我们政府的分裂中搁浅了。以色列定于一九七三年十月底进行大选，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在其前途未卜之时，能作出和平进程中固有的困难决定。我们打算利用我同安瓦尔·萨达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之间的探索性会谈的间歇。为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需要对埃及的目的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在我们政府内部，对中东外交的处理正处在转变之中。在第一届任期内，尼克松最初把中东问题留给国务院处理。这样做部分是为了安抚罗杰斯，部分是由于尼克松认为，从国内观点来看，中东外交只会带来损失，因而他本人力图避开风险。这样，在尼克松第一任期时，我对中东政策的影响远不如在其它领域里的影响那样直接。我可以写备忘录；提出告诫；偶尔还可以拖延。但是，除约旦危机以外，我没有行使过行动上的控制权。直到一九七二年年中以前，白宫的背后渠道系统——绕过国务院同其它政府进行秘密谈判——从未应用于中东问题。虽然我偶尔对这一实际上应是标准的系统感到恼怒，但是事实上，它有利于我所喜爱的战略。一个长期的僵局将使阿拉伯人变得温和起来，并把苏联推到中东外交的边缘。一九七一年后期，尼克松开始把责任转交给我。他担心国务院由于爱搞抽象理论，可能会提出将遭到各方反对的计

划。我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不发生剧变，以免使一九七二年大选复杂化——这实际意味着我将采取拖延办法。由于需要全神贯注于越南谈判的结束阶段，尼克松指示的份量也加重了。我所做的就是建立一个通向萨达特的安全顾问的秘密渠道；甚至在萨达特一九七二年七月把苏联军事人员赶出埃及以后，这一渠道内也没发生多少事情。⑤

事实上，延误的原因更主要是实质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中东危机有许多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部分对不谨慎者都是陷阱，处理它们时要十分小心：阿以冲突；阿拉伯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超级大国的影响和它们之间的角逐，特别是正在增长的苏联的军事作用。这些组成部分的起因各不相同，但它们已相互纠缠在一起了：不同时解决其它问题，要想解决其中某一问题是不可能的。获得美国支持（那时还有苏联的支持）的以色列国的建立激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并导致了战争。以色列凭借武力建立了一个国家，此后它一直未被承认，在遭到排斥和深受邻国仇恨之下生活。一九六七年六月，戈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统治的埃及在苏联故意泄露的假情报的鼓动下，宣布封锁以色列的埃拉特港，并不祥地将其军队开进非军事区西奈，向以色列挺进。在此之后，以色列冲破了停战线。战争在六天之后结束了。以色列占领了埃及、叙利亚以及约旦河西岸的广大地区，阿拉伯人遭到了挫折和耻辱。

以色列从未在公认的边界内生活过。把它的边界确定到未被接受的这个或那个地方，它看不到两者之间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它宣称阿拉伯人好战，它寻求可以想见的最广阔的安全带。阿拉伯国家在理论上反对以色列国的存在，但实际上除非通过某种外交方式，否则他们不能改变现状。他们处在痛苦的矛盾之中。温和的阿拉伯政府，象约旦和（存在矛盾心理的纳赛尔统治下的）埃

及，在摸索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接受在战前（一九六七）边界内的以色列，但在解决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地位之前，将只结束交战状态——另一种形式的停战——而不是以色列要求的完全和平。

而巴勒斯坦问题却由于阿拉伯激进派的态度和以色列对其在西岸的安全需要的看法而陷入僵局。叙利亚拒绝在任何条件下进行谈判；它所反对的是以色列的根本存在，而不是它的边界。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当我从特拉维夫到大马士革作第一次访问时，受控制的叙利亚新闻界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已经从“被占领土”（即以色列）抵达访问。伊拉克则象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那样，狂热地将其份量加在激进派一边。自称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时尚未被阿拉伯国家承认，它号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世俗国家，也就是说，让以色列消失。而以色列越来越把它的安全同它在西岸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在一九六七年战争到一九七三年战争之间的这些年里，这种僵局一直阻碍中东外交的开展。

联合国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二四二号决议就是这种僵局的象征。这个决议提到“在安全的和公认的边界”之内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但是却没有对修饰语作出任何解释。由于这一决议遭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接受它的国家以及以色列又对它作了适合各自偏见的解释，所以，与其说这个决议是解决僵局的手段，毋宁说是僵局的一个反映。那些愿意谈判的阿拉伯领导人把它解释为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前的边界线。以色列则声称它的战前边界没有一条有安全可言；它坚持保留它所占领的每个邻国的一部分领土。为了确保维护它的利益，以色列提出了一个看来合理、但根本行不通的要求：阿拉伯国家同它直接谈判，换句话说，以色列要求把对它的承认作为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阿拉伯人也不示弱，他们要求先接受他们的领土要求，在此之后他们才考虑外交手段。任何一个阿拉伯领导人，不

管其怎样温和，都不可能在耻辱、激进主义和苏联影响时期的气氛下，同意以色列的要求并继续生存下去的。任何一个以色列总理，如果把放弃对被占领土的权利作为进行谈判的代价，他这个总理就一天也当不成。以色列追求一种既能取得领土、又能获得和平的幻想。它的阿拉伯对手们则追逐与此相反的幻想，希望能收复失地，但又不讲和。

还有，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开始时，约旦和埃及正在初步摸索通向谈判的道路。在阿拉伯领导人中，约旦的侯赛因国王最乐于接受以色列作为生活中的现实，并同它进行谈判。但是普遍认为——而他也不做什么事来减少这样的看法——他应该跟随在较少受到责难的某个国家的后面。他已经成为阿拉伯激进分子的敌意的靶子了。因为他在一九六七年拒绝同美国断交，并在一九七〇年驱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人们认为这位亲西方的温和的国王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承受激进分子对缔造和平的进程的攻击。一般明智的看法是：约旦应当是缔造和平的第二个阿拉伯国家。

这样，埃及就成为中东外交的关键。策略上的需要加强了埃及以其国土面积、传统和文化影响以及在一系列阿以战争中作出的牺牲而赢得的东西。埃及是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是该地区的文化中心。它的教师是阿拉伯世界教育制度的骨干；它的大学吸引了整个该地区的学生。可能除中国以外，它的政治组织具有最长的未曾间断的历史。它在阿以冲突中首当其冲。无论在君主制还是共和国时期，它都从事了超出其狭隘国家利益的斗争。许多年轻的埃及人为阿拉伯团结和巴勒斯坦的自决牺牲了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埃及失掉了西奈半岛，并屡冒国家分裂的风险。埃及赢得了讲和的权利。

对我们说来，同埃及迈出第一步具有特别的吸引力。领土问题看来比较容易解决，因为西奈对以色列没有什么战略重要性，也

不象其它领土特别是象西岸那样，刻有过多的历史烙印。

然而，只要纳赛尔当总统，他的矛盾心理就会使埃及无所作为。一方面，他笼统地表示愿意参加和平进程——但他的计划无法实现。他要求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以换取埃及同它处于非交战状态；和平将取决于以色列如何解决同即使在当时也要求摧毁这个犹太国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关系。纳赛尔也不会同以色列直接谈判。更确切地说，我们应当让以色列撤出，作为交换，纳赛尔也应给我们好处，同我们恢复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开罗电台仍是整个中东地区反对美国、实际上也是反对西方的宣传中心。总之，纳赛尔想在反对美国的立场上领导阿拉伯世界；想把他取得的任何让步说成是阿拉伯战斗精神在苏联的武器和外交的支持下强取到的。美国对维护这样的进程不感兴趣。我们所得到的特别利益就是，满足纳赛尔的专横要求以换取恢复外交关系和同以色列的停火；这种外交关系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就必须既有利于埃及，也有利于美国；至于停火，事实上已经存在了。

在这种僵局中，苏联的作用介乎邪恶和混乱之间。它的武器鼓励了阿拉伯的不妥协态度。但这只会增加僵局的危险，而不会消除僵局。莫斯科从来不能在僵局中作选择。只要它片面地支持它的依附者的立场，它就既不会推进谈判的进程，也不能提高自己的作用。因为我们没有支持阿拉伯激进分子计划的动机，这些人正在申斥我们。即令发生我们改变观点的情况，我们也不需要苏联作调解人，而那种情况是未必能发生的。换句话说，莫斯科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割断同阿拉伯的要求之间的联系从而危及它同阿拉伯世界里某些国家的友谊，才能对一种解决办法作出有效的贡献。然而，如果它不这样做，它就担上了支持它不能实现的目标的风险，从而会被目为软弱无能而受到鄙视。莫斯科能够使危机的余火重新烧旺，但一旦燃烧成熊熊大火，它就只有冒大国对抗的危

险，才能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是直到那时为止苏联一直小心翼翼地要避免的。象其它各方一样，苏联使用拖延的手法以争取时间。它当阿拉伯人的律师，但又不能推进他们的事业；它通过供应武器争取时间，但这只能使采取暴力的水平升级而不会改变基本的现实。

面临这个僵局，尼克松政府意见不一。国务院正力促实现外交解决，以减少阿拉伯对美国的不满。它提出了以色列回到以前边界的罗杰斯计划。但是，它从未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当叙利亚反对任何条件、而埃及拒绝在没有叙利亚或巴勒斯坦人——他们都决心消灭以色列——参加的情况下讲和的时候，如何说服以色列放弃全部被其征服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外交主动行动往往加剧而不是减少紧张。我们的建议可能要失败，从而加强苏联和激进派的地位。尼克松认为我们过分忙于印度支那的事情而不能使白宫充分支持他认为一开始就不现实的建议。只有使各方最低条件相一致，谈判才能成功。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内，双方只讲各自的最高纲领——以色列不愿放弃所有改变了的边界，阿拉伯人则要求全部撤退，而不愿对和平，或就此而言，对安全承担重大义务。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八日，纳赛尔去世了。他的继承人安瓦尔·萨达特很少为人所知，他被大大地低估了。我们的专家普遍认为，他是个过渡性人物，不久将会被人们更为了解的、接近莫斯科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总书记阿里·萨布里接替。早先，萨达特也没有明确地把他自己同纳赛尔的路线分离开来。他开始运用复杂的策略，以加强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使埃及逐渐采取更现实、更民族主义的姿态。一方面，他比其前任更迫切更具体地谈论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又使用纳赛尔反西方的言辞。一九七一年五月，他清洗了阿里·萨布里及其党羽；同月，他与苏联签署了一项为期二十年的友好条约。我们在华盛顿

对他的目的感到困惑，他为了掩盖其真正意图而对莫斯科进行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哄骗活动也使我们感到不解。

为了打破僵局，国务院试图采取新的主动行动。一九七一年三月，它提出了沿苏伊士运河军队作有限脱离接触的建议。但是失败了，因为萨达特坚持，脱离接触应当是一致同意的全部撤离的第一阶段。以色列人也不示弱，他们要求埃及军队从苏伊士运河进行对等的后撤，建议作为对以色列从无可争议的埃及领土上撤离的回报，埃及的武装力量就得更深入地后撤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到一九七二年，还没有取得什么外交进展。苏联人正加紧搞一个能马上实现的全面解决办法，以色列人坚持要求进行直接谈判，埃及人要求分阶段的全面解决，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拒绝进行任何谈判——美国国务院则寻求临时的苏伊士运河脱离接触协定，而白宫的行动则表明，好象国务院是个外国主权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混乱正适合于我所认为的美国唯一现实的可选择的战略。在激进派的压力下向以色列强加一种解决办法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那只会加强这样一种信念：对付美国的办法最好是敲诈勒索。在阿拉伯世界内部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我们需要加强温和派的力量，在同西方有联系的政府和苏联的追随者之间，我们需要加强前者的力量。因此，只要纳赛尔（或在那种情况下是萨达特）以苏联进攻部队的存在为后盾发表反西方的言辞，那末，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反对向埃及作任何妥协。同时，只要莫斯科的立场同阿拉伯的纲领是一致的，我就看不出同苏联共同行动有什么意义。我深信，不论是埃及还是其他国家，迟早会认识到，依靠苏联的支持和激进的言辞，只会使自己的愿望受挫。到那时，它也许会愿意消除苏联的军事存在——“驱逐”是我在受到许多批评的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六日情况介绍会上使用的字眼——以及愿意考虑可以达到的而不是空想的目标。在那以

后，美国采取重大主动行动的时刻便会到来，如果有必要，将敦促我们的以色列朋友采取新的解决办法。

在尼克松第一任期中，他从来没有在两种战略中作正式抉择。这两种战略一是我提出的阻止激进派的压力，一是国务院的用进行妥协的解决办法来减轻激进派的压力的观点。尼克松倾向于我的分析，但他并不是以做出决定来体现这一点，而是干脆让国务院的主动行动去走那条无济于事的道路。我同尼克松的关系从来都是相处不易的。不管怎么说，同其它大多数问题比起来，在中东问题上，我们的关系更为复杂。尼克松深信，对犹太人的选票他没有什么要表示感激的。不管他做什么，他增加不了犹太人对他的支持。而他极力想做的事是在他任期内的某个时候强加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他的许多书面的和口头的评论都证明了这一深藏于内心的态度。一九七二年十月，我递交给尼克松一份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的备忘录。备忘录敦促同埃及进行秘密接触以利用萨达特驱逐苏联人这件事，以及向阿拉伯立场靠拢（同埃及的秘密接触已经准备就绪，莱尔德不知道）。尼克松将这份备忘录送回给我，并附言：“基，我倾向于莱尔德的观点。美国的犹太人在苏联签证问题上的行为清楚地表明，他们把犹太人的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我们不能这样干。”

尼克松经常表示这个意见，但他未必这样去做。我在此提及这些，是因为不谈它们将会歪曲历史记载，同时也还由于它们说明了总统和他的顾问之间存在的那种共生关系。由于尼克松和我对国家利益持有相似的概念，他和我从对待以色列的不同的感情出发，在政策和战略上走到一起来了。尼克松出身于被赶出家园的加利福尼亚较下层的中产阶级，他具有这个阶级的许多偏见。他认为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结合紧密的集团；他们是明显的自由派；他们把以色列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总的说，他

们比其他少数民族集团更同情苏联；他们对宣传工具的控制使他们成为危险的敌手；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将不得被迫走向和平解决，并且不能允许其危害我们同阿拉伯的关系。

所有这些都没有妨碍他同许多犹太人有着亲切的个人关系，也没有妨碍在他的政府中把犹太人提升到几个关键职位。确实，当他同和他一样有着局外人经历的一群人的代表在一起时，他有时看起来感到十分自在。^④他的偏见会突然在一些反映他当时情绪的命令中爆发出来，他的合作者很明白不能去执行这些命令，以后他也不再提这些命令。我没有记录我是如何经常地被告知要中断对以色列的所有援助，以作为对国会中一些任性的犹太人议员的行动的报复。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似乎具有一种激怒尼克松的特殊能力。迟至尼克松辞职的前三天，他还颁布了这样一项命令。黑格和我决定起草一项指示，但保留它由新总统来签署——或否决（福特采取了后者）。他同样经常做的是，把共产主义者的一些在道德方面的违法行为转达给犹太领导人，好象犹太人在共产主义的邪恶中需要特别的指导。

然而结果是，在每次危机中，尼克松几乎比除哈里·杜鲁门以外的所有总统都更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他钦佩以色列的勇气。他尊敬以色列领导人顽强地保卫他们国家的利益。他认为，他们的军事才能是民主国家的一份财富。尽管他相信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加强了反西方的激进分子的力量，但是他十分精明，知道反过来的情况是不成立的：同激进力量一起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更可能推进苏联而不是西方的利益。而在危机中——不管他如何估计谁最终有错误——尼克松从来没有忘记他优先考虑的重点。他知道，除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行动没有受到压力的讹诈，否则我们是不能有效地进行斡旋的。最后——通过不同的方式——尼克松得出了与我相同的结论：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向人们表明

苏联和激进分子是不能实现阿拉伯目标的；除非阿拉伯温和派至少愿意作出真正的妥协来讲和，否则不可能取得进展。

从感情上讲，我的出发点同尼克松的完全不一样。我现在不是按我的宗教教义办事，但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家庭中有十三个人死在纳粹集中营里。我对以可能失去控制的善意的政策去鼓励另一场大屠杀毫无兴趣。大多数以色列领导人是我的私人朋友。然而，象尼克松一样，我不得不使我感情上的偏爱服从于我对国家利益的认识。确实，考虑到对我的信仰的历史性的怀疑，我有特别的义务这样做。这并不总是很容易的；有时证明是很痛苦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以色列的安全只有同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不是同一些个人的感情紧密相连，才能得到维护。于是在这个基础上，未必是一对的两个人——来自南加利福尼亚的恶毒攻击共产主义的人和从纳粹德国来的难民——终于携起手来去打破中东外交的僵局。

一九七一年末和一九七二年的三个情况使中东外交中总统和安全顾问之间的合作关系开始形成，这种关系已然存在于我们国家政策的其它领域。首先，如我已说明的，是尼克松希望在选举年避免在中东问题上爆发国内争论。因此，在一九七一年末他要我同以色列和苏联就中东问题进行秘密接触，以便在总统选举过程中使事情拖下去。这种拖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当时忙于同北京和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以及河内的春季反攻。

第二个事件是一九七二年五月的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即使在缓和的高潮，苏联也由于它鼓励冲突的倾向而受到了公正的批评。但是总的说来，一九七二年它在中东的影响趋于克制；至少它正在减少向埃及交付武器，在关于中东和平的外交交往中，它也只做出了一些姿态。萨达特不断抱怨苏联拖延武器供应。^⑥高潮是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同意了最后公报中

的一段话。这段话说得如此平缓，以至人们所能得到的唯一解释是，莫斯科正在把中东问题搁置起来。葛罗米柯还同意指导中东谈判的一套“一般工作原则”，表现出经过长时间会谈后已经精疲力竭了。这套原则代表了对我们的观点作出的使人困惑不解的让步（例如，有一项看来同意对边界作有利于以色列的改变的条款）。⑥

的确，莫斯科一九七二年年中没有在中东问题上捣乱有其自身的原因。它急需购买美国粮食。它大概权衡过，越南战争之外再加上一个中东危机或许会毁掉脆弱的东西方关系。它永远不会让它的追随者们由于他们使紧张局势超过一定的限度而去打一场一定会输掉的战争。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苏联人愿意为缓和付出某些代价。

不论怎样，这是安瓦尔·萨达特的理解。它导致了这一时期的第三个对后来事态发展有影响的事件：把苏联部队从埃及驱逐出去。对萨达特说来，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公报是他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苏联同美国这一明显的勾结对埃及说来如“猛烈的震动”，萨达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他在当时的一次演讲中说，他决不甘心眼看中东在苏联政策的重点中仅占第四或第五位。⑦于是，他采取了后来成为他的标志的一个大胆举动，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八日他要求苏联军事人员在一周之内从埃及撤走。这一行动具有双重目的：它消除了埃及进攻以色列的障碍，因为萨达特深信——也许他是对的——在发起军事行动时，他的苏联顾问决不会同他合作。与此同时，这一行动也使得埃及有可能对美国作出外交姿态。在这个月结束之前，萨达特已重新恢复了通向白宫的直接渠道。背后渠道系统现在用于中东了。

一九七二年秋，开罗和白宫试图在我和萨达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之间安排一次秘密会见。日期定在十月下

旬。但由于越南谈判占去了我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会见推迟了。

尽管有这些耽搁，到尼克松第一任期的后期，我们正接近实现我们所选择的战略。苏联的军事存在正在从埃及消除，萨达特在向我们靠拢。虽然我们还不能看清他的全部意图，但很明显，这个意图不同于他的激进的前任的讹诈。苏联领导人被搞得慌乱了，对如何恢复他们正在衰落的影响不知所措。他们暂时限于做些老生常谈的官样文章，表现出他们越来越与此无关。时间对我们有利。没有我们的合作，什么事也做不成；那些依靠苏联支持的人一定会越来越醒悟。使美国的作用增大和更加平衡的路子正在打开。

准备伊斯梅尔来访：外交小步舞

在中东，表面现象很少和现实吻合。一九七三年初的实际形势没有迹象表明战略转移已准备就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一九七二年九月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杀害以色列运动员之后，以色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作为报复。暴力的循环升级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以加强他们反对以色列的共同战线。一九七三年一月下旬，十八个阿拉伯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开罗开会，成立了阿拉伯联合防务委员会，任命埃及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元帅为约旦、叙利亚和埃及前线的总司令。在约旦的认可之下，阿拉伯部长们还同意“恢复”约旦前线的活动。（这一点的意思极不清楚，因为约旦人同时宣布，他们坚持不允许突击队返回约旦进行反对以色列活动的政策。这两项决定的结果是相互抵消——这在阿拉伯外长会议上屡见不鲜的。）^④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一日，埃及总理阿齐兹·西德基博士宣布，埃及正在废弃一些国内计划以腾出资金来“同以色列战斗”，还将制订一个“战争预算”。由于先前埃及发出的威胁没有兑现，我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一点，特别是由于我们得到的情报估计也无法断定埃及确有一个现实的军事选择。实际上，在阿拉伯世界萨达特一直受到攻击，说他的政策无所作为——这表明有关各方没有一方懂得他的复杂的计谋。

因为萨达特正在使用人们无法揣摸的异乎寻常的策略走向战争：如果一个领导人极其经常和夸张地宣布他的真正意图，是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萨达特最初宣布一九七一年为“做出决定的一年”，我们相信了他。事实上，我们对印度进攻巴基斯坦之所以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原因之一就是阻止埃及激起类似的野心。不知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萨达特在那一年或一九七二年都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从开罗继续发出不祥的威胁，但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们的估计是，萨达特如果有军事选择的话，也是极少的，而以色列的军事优势看起来则是无可争议的。萨达特就是发动全面的军事进攻也不能逃脱困境，因为这场进攻注定会失败。虽然估计认为萨达特有能力进行有限的进攻，但似乎没有需要这样做的合乎情理的军事目的。这种进攻也必将遭到失败；因此它的唯一作用就是激起国际上的关切和施加压力以促成谈判。它的失败只会使外交僵局更加严重。即使谈判有所进展，预计其它复杂问题将接踵而至：以仅仅沿苏伊士运河脱离军事接触为基础的停火是不会在埃及得到支持的；然而完全的和平看起来是被排除了，因为以色列决不会接受以一九六七年边界为基础的全面解决，而其它阿拉伯国家也将抵制埃及的任何单独解决。这样一来的结果，埃及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等待美国采取外交主动行动。

但是，萨达特并不受我们估计的约束。正当我们为新的外交行动作准备之际，他却在寻求打破僵局的军事办法。

当尼克松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时，他把我越来越深地推到中东谈判中去，但是他也没有取消他曾经授予国务院的权限。每当他会见中东领导人时，他总是回避表示明确的立场，而是建议这位领导人同我进行探索性的会谈——这是捱过一个时辰的了不起的办法，虽然它冒引起混乱的风险。由于尼克松没有收回他早些时候授予罗杰斯的谈判权力，于是正在逐步形成三个平行的外交途径：一条是旨在达成沿苏伊士运河临时脱离接触的正式的国务院途径；另一条是我同哈菲兹·伊斯梅尔的秘密渠道，我已通过该渠道同意，当最后安排我们的秘密会晤时就尚不明确的埃及建议着手工作；再一条是我同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特别渠道，探讨苏美解决中东问题的联合途径的可能性。为了表明表面上的一致性，在我同哈菲兹·伊斯梅尔的会晤中弄清埃及人脑子里在想什么之前，我力图拖延第二任期时的国务院的任何新的主动行动并敷衍苏联的建议。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我是唯一知道这三条途径的人，国务院还莫名其妙地蒙在鼓里。不管有没有水门事件，这样的行政管理办法决不可能支撑到另一个任期结束。

如同中东外交中常见的那种情况，最先行动的是国务院。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间，它为全面解决提出的各种计划使得双方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建议。国务院现在决定重新探索达成沿苏伊士运河实现临时脱离接触的协定，使用的是第一任期内明显失败了的方法：在开始处理问题之前不同任何一方充分探讨其可行性。

为了证明在多轨道体系中两者能够进行比赛，国务院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仅仅在总统就职后两天——没有得到白宫的批准就向我们在开罗的“利益代表处”*的负责人小约瑟夫·N·格林发出指示（当然，我不可能知道罗杰斯当时是否已私下同

尼克松讨论过)。国务院不受萨达特一九七二年九月公开拒绝一个类似的临时运河协议的影响，现在要格林提出一个实质上是一样的建议，把它说成是“目前提供真正进展前景的所能见到的唯一建议”。

埃及照例拒绝了这个办法，因为萨达特想等待伊斯梅尔和我会谈的结果。一月二十七日，伊斯梅尔告诉格林，埃及对临时解决办法不感兴趣，尽管埃及可能准备讨论一个“全面”进程的“开始阶段”。这在一九七一年曾是一个无需考虑的意见，因为那时如果以色列愿意同意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它就不需要取得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当伊斯梅尔讲这些时，他历数了埃及对美国单方面支持以色列的不满。一方面，埃及想在它认为对阿拉伯人公平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让其它国家否决这一点；另一方面，它又不单独媾和。伊斯梅尔没有向格林解释他如何建议使这两个立场一致起来。要能知道他脑子里到底怎样想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这个古怪的政府程序使他处在同两个美国代表打交道的地位，两者中谁也不知道另一方的办法是什么。

伊斯梅尔对这两条渠道是怎样有价值就怎样利用。在秘密渠道中，他力图给我们施加一点微妙的压力，提醒我们他二月初将开始同苏联进行早经安排的会谈——向我们暗示，如果规定会晤日期，埃及可能要采取不可挽回的步骤。我答复说，在越南谈判结束之前，我们之间进行秘密会晤是不可能的，但我希望“通过这条秘密渠道征求埃及方面初步的看法。”伊斯梅尔没有上这个钩。他通

* 当正式外交关系破裂后，有时允许保留一个小的外交使团，技术上作为某个第三国使馆的一部分，该馆受权照管在所在国没有正式代表的那个国家的利益。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三年在开罗有一个在西班牙使馆保护下的小的“美国利益代表处”——实际上工作人员都是美国外交官。一个利益代表处的工作人员通常是（但不总是）不变的，其级别也低一点。但代表处能有助于同所在国的政府进行联系，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进行谈判。

知我，他二月初访问伦敦，在那里进行会晤将是十分方便的。遗憾的是我正计划去河内和北京；我找不出借口按建议的时间去伦敦。我接受埃及的建议，先进行工作人员一级会谈，为我们的会晤作准备。我派了一位使者去开罗向伊斯梅尔解释我们的官场生活。我所能进行的秘密访问是有限的，特别是在许多会谈中我的作用已众所周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记者已经开始紧紧跟踪我的活动。*如果我公开去伦敦，英国政府将不得不介入，同时还得编造一个故事，使我们的官僚机构不至于插手进去。

毫无疑问，埃及人在他们绵延数千年的历史中目睹了外国文化中的许多奇特之处，使他们感到惊奇的东西甚少。事实上，当某些事情十分复杂并且有点曲折时，埃及人倒立即觉得它们是正当的。伊斯梅尔以很大的决心投入工作，经过几次交往，我们最后定下一个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程序，不可思议地把有关的各个官僚机构都包括进来：伊斯梅尔将于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应国务院邀请对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受到尼克松的接见并同国务院的官员进行会晤。然后，在正式访问结束之后，他将去纽约，从那儿再去郊区的秘密会晤地点——为此目的租用的一个私人住宅——在那里，他同我将举行两天的会谈，私下里全面回顾埃美关系。

所以，在开罗的十分惊讶的杰里·格林通过正常渠道突然得到指示，要他邀请哈菲兹·伊斯梅尔访问华盛顿。五年来保持的不过分亲密的接触现在突然变成如此公开炫耀的拥抱，对这个事实，国务院只能把它归咎于白宫莫名其妙的摇摆。至于伊斯梅尔，他将从根本上了解我们的双轨系统，因为无论是我还是我手下的人员，都不参加国务院的会谈，而国务院甚至也不知道我同伊斯梅尔之间的秘密会晤。这并不是表示目的一致性的最好办法。但是

* 一九七二年四月莫斯科的秘密之行以后，我再没有执行过任何国外秘密使命。

它至少向埃及人表明我们即使不怎么花力气，也可能成为地中海东部的人。

开罗不仅在我们官僚机构中而且也在争夺地中海霸权的超级大国对手中活动。为加强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埃及的资本，哈菲兹·伊斯梅尔同当时的国防部长阿里元帅于一九七三年二月访问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现自己处于不自在的境地。苏联领导人认识到，由于一九七二年莫斯科举行首脑会议时他们对埃及关心的问题满不在乎，他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他们又知道，如果他们敦促达成不能为以色列所接受的解决办法，这只会表明他们无能（于是有利于我们的战略），如果他们想以军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只会带来阿拉伯的失败。（从他们对我们作的嘲讽评论来看，他们对阿拉伯战斗力的估计是非常低的。）

敏感不是苏联的长处。他们——也许是无意地——把爆炸性的佐料混合在一起，以此来应付困难处境。苏联人似乎不断告诉伊斯梅尔，他们反对临时解决；他们的推理无疑是：在我们的主持下，任何协定都会削弱苏联的影响。但是当客观上紧张局势加剧时，他们看起来也曾警告过不要发生可能导致苏联同美国打仗的冲突。这似乎暗示，只要不迈这一步，埃及可以自由地考虑自己的利益——这就使得同以色列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可能性继续存在。后来，苏联领导人很快同意进行一笔在中东问题上谈判过的交易中最大的一揽子武器交易。在这个奇怪的折衷政策——默许一个有限的而不是全力以赴的进攻——中，苏联可能看到了最保险的拖延办法；事实上，它引诱发生一场它无力制止的爆炸。它鼓励发生一场危机，它认为它能够作为阿拉伯利益的代言人出现而对这场危机加以利用。但它无力左右已经形成的局面。到头来，苏联的努力使它自己在埃及丧失了一切，证明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西方才使用无济于事的折衷办法。

二月十八日勃列日涅夫通过背后渠道致尼克松的信件把伊斯梅尔访问莫斯科的情况告知了我们。据这封信讲，可能会进行分阶段解决，但这必须“在一个整体（一揽子）计划范围内进行，以使解决方案中的各个因素得到协调和平衡……”，而且，“不能脱离以色列和与冲突有关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协定，单独达成以色列—埃及的解决办法。”勃列日涅夫最后写道，“从同伊斯梅尔的会谈中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如果现在还不能朝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方向取得任何进展，阿拉伯人可能转而使用其它手段来解决问题……”苏联人把开关拨向冲突，他们在警告我们他们鼓励的是什么事情时，表现出特有的傲慢。

简言之，苏联人在战争威胁下正在提出一个强硬的必定会导致僵局或冲突的阿拉伯计划。莫斯科既反对临时解决也反对单独的以一埃解决，它客观上鼓励爆炸性的局势。克里姆林宫可能算计过，发生危机会迫使美国卷入。但是聪明过顶在外交中是很少不吃亏的。莫斯科的窘境是，它只有鼓励其阿拉伯追随者作出让步才能为解决办法作出贡献。但它又不愿意这样做，而是鼓励闹起来，但又担心闹的后果，这使得它自己最终不得不在旁观者的位置上。

伊斯梅尔在华盛顿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当哈菲兹·伊斯梅尔到达华盛顿进行访问时，我们对埃及的真正想法的了解少得可怜。我们认为这些秘密接触是有希望的迹象。但这要同埃及经常与莫斯科磋商以及埃及充满好战的宣传放在一起来看。赶走苏联的力量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能排除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萨达特希望能够自由地采取军事主动行动。我们知道，萨达特奉行的是稍微宽厚一点的

纳赛尔战略：让我们提出一个阿拉伯最大限度的妥协计划，然后该计划可能遭到受苏联很大影响的巴勒斯坦人的否决。很难弄清楚萨达特到底想干什么；也许他还未完全下定决心。

因为同其他各方一样，萨达特也处在同样的困境里——也许由于他更富于幻想，所以处在这困境中更有一种挫折感。他知道，老一套的阿拉伯领土收复主义计划已经失败，但如果偏离这个计划而又不能使以色列作出接受它的保证，那就有可能使他在阿拉伯世界中陷于孤立。确实，从以色列公开的声明来看，解决办法将要求埃及让出一些领土，而萨达特永远不会接受这一点。他非常精明，知道实现和平需要阿拉伯作出让步；但在一九六七年失败后感到受挫和羞辱的情况下，作出这些让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那时他对临时解决办法很冷淡。伊斯梅尔现在来到华盛顿是为了从这些困境中讨论出办法来。

尼克松准备让美国在外交上参与进去，现在以探索性的方式，而在以色列十月份大选后则完全地参加进去。但是如果我们使人们产生幻想，以为我们能拿出一个一揽子方案或以为整个过程可以完全扔给我们管，那我们就不能取得进展。我们不能同意把和平强加于人。在拟出的“谈话要点”中（尼克松已圈阅过），我敦请尼克松对伊斯梅尔明确下面这些限度：

然而，我（尼克松）在越南的政策也表明，我们不背叛自己的朋友。一个大国不是靠背叛朋友来增强自己力量的。我们能强迫以色列所做的事是极为有限的……

埃及不应存有任何幻想。在可以想象到的任何解决办法中，埃及都不能达到它的最高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解决办法，埃及收复任何东西的前途甚微。这并不是我们搞的；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就是如此。埃及和以色列都得作出困难的决定。

换句话说，我们准备力促以色列作出让步，但这也要求埃及方面表现出灵活性。我的备忘录在任何情况下都引起尼克松的矛盾

心理。在备忘录中，我讲述了三个选择：第一，“退后一点，让双方进一步考虑他们的立场”；第二，寻求达成一个临时协议；第三，私下作出努力，以达成全面解决的一般原则的协议。

尼克松对第一个选择根本不予考虑——退后——在该词后面页边的空白处，他预言，不积极活动，就会导致战争；

基——绝对不行。在我见到她(果尔达·梅厄)之前，必须让伊扎克·拉宾(大使)非常明确地知道这一点。我在两次大选中把这件事耽搁了，今年我决心动起来。——我根本不同意。这件事正准备搞起来。

尼克松对第二个选择(临时协定)没加评论。他喜欢第三个选择：旨在全面解决的秘密会谈。他写道：“宁可选择这个行动途径。同时，表面上继续保持公开的途径——但不要让它干涉私下的途径。”换句话说，这是第一任期时的典型格式：公开的谈判掩护私下的谈判。然而这并不适合于动荡的中东。至于如何搞出一个开辟“公开途径”的绝招，让国务院提出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与全面解决不相容的临时部分解决办法来代替全面解决，尼克松没有给我暗示。

尼克松旁注批示的激烈程度表明他是多么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向前进。在我的备忘录的结尾，他附了另一个条子：

基，你知道，我坚定地同以色列站在一起的立场一直是比以色列的生存更为广泛的问题为基础的，这些问题现在有力地表明要采取行动以取得一个解决办法。我们现在是以色列在世界上唯一的重要朋友。我还得看他们做出一点让步——我承认约旦和埃及方面还未做出足够的让步。现在是动起来的时候了——应该非常坚定地告诉他们这一点……

现在是放弃怂恿以色列的不妥协立场的时候了。过去我们的行动使他们以为，不管他们怎么不讲道理，我们都会站在他们一边。

在这种气氛下，哈菲兹·伊斯梅尔第一次接触到美国政府中的许多层次。在四十八小时内，他将会见同他泛泛而谈的总统，会见推动达成一个没有白宫支持的临时协议的国务院以及尼克松的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者在没有国务院参加的情况下将同他进行秘密会见，讨论全面解决的原则。伊斯梅尔在这纷繁的头绪中，十分镇定自若。他身材修长挺直，头发稀疏灰白，仍有军人的风度以及受过教育的埃及人自然具有的尊严。四千年来，埃及人民目睹急切的外国人的刀光剑影，但他们凭着和解而坚定的精神、灵活而又有无限复原力的特点，取得周旋的余地。接踵而至的征服者带来了种族构成上的变化，一种原型的埃及人生存下来了。他的脸刻在雕像和庙宇上，这是一个民族到达最接近于取得永恒的地步——表情既温柔又超凡、姿态既谦恭又容忍、目光既具凡人所有的特点但又凝视着超越人类目光所及的无限遥远的地方。

哈菲兹·伊斯梅尔就是这个类型。一九七三年我曾两次见到他；十月战争之后，在一次萨达特的定期的人事更换中，他靠边站了。他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而当时埃及在战争之前的立场也不允许他灵活。他以非常和解的姿态介绍了萨达特的最高方案，致使他看起来比实际上更灵活些。他非常谦恭，以至模糊了萨达特的详尽阐述摊牌条件的基本战略。伊斯梅尔没有取得突破，我们原以为这是他的目的，但他巧妙地达到了萨达特的不作危机警告而保持僵局的目的是。

伊斯梅尔的第一次会见是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时二十分同尼克松的会见。同伊斯梅尔面对面交谈时，尼克松按照他的习惯，比他在旁注批示中更简略些。伊斯梅尔把萨达特的信递交给总统，信中客气的语言包含着支持全面解决的威胁：“情况现在有助于作出进一步努力以取得一个全面公正的解决”；不然，“我们地区的形势已恶化到几乎要爆炸的程度”。尼克松对过去没取得进展表示遗憾，但他说，“重要的事情”是“看我们现在站在什么地方来探讨发生某些变化的可能性。”

伊斯梅尔的介绍同他的总统的信中的内容是一致的。他明言，

三十个月的停火本身并不是目的，因为它的实际结果是进一步巩固了以色列的征服。的确，应该结束停火的局面了，要么以走向和平的方式，要么以再回到战争的办法。有两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以色列占领埃及的领土和巴勒斯坦这个核心问题。如果以色列同意从埃及领土上撤走，开罗准备讨论安全保证和结束交战状态；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最终和平将要求有一个能为巴勒斯坦人所接受的解决办法。关于叙利亚什么也没讲。

尼克松总是对详细的谈判感到不自在，他利用我同伊斯梅尔已经安排好的秘密谈判为理由，避免作明确的回答。实际上，他提出的计划同他给我写的旁注批条总有些不一样。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似乎还是赞成搞一个临时苏伊士运河解决办法的。他说他理解埃及担心临时解决可能会固定化。然而，它有可行的有利性，所以伊斯梅尔应同我一起来探讨这是否能作为进一步行动的桥梁。尼克松说，我们赞成一个永久的解决，他保证他将为此目的竭尽全力。但他认为不可能一下子在所有方面解决整个中东问题。这也应由伊斯梅尔和我来探讨，虽然我们的探讨是在最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伊斯梅尔和我得到的任务是同时达成一个临时和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进行一次探讨性的和一次最后的谈话。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两天，我们两人去纽约郊外进行会谈。给了我们一座很漂亮的位于中产阶级的市郊森林区的房子，专为会谈使用。我们在餐厅的桌子上进行正式会谈，在起居间非正式交谈，第二天我们共进午餐。*

* 陪同伊斯梅尔的有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的穆罕默德·哈菲兹·加奈姆博士，伊斯梅尔办公室主任阿卜杜勒·海地·马赫鲁夫博士以及两名助手艾哈迈德·马海尔·赛义德和伊哈布·赛义德·瓦赫巴。我带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哈罗德·桑德斯和彼得·罗德曼，以及邦尼·安德鲁斯作记录。

到这时我国政府中的一致性已经瓦解到只有伊斯梅尔才知道该政府各个部分的想法的地步。国务院甚至不知道我同埃及人举行会谈。伊斯梅尔同罗杰斯的谈话也没有及时通知我；只是过了许久，才有一份报告送到白宫来。

开始进行复杂的谈判犹如开始着手安排一桩婚姻。双方参加者知道，当他们发现彼此的真正特征时，就会扔掉所有的礼节。双方都还不能预言到什么时候需要才能转变为接受；什么时候希望取得进展的抽象愿望至少会留下少许的理解；哪个分歧由于得到了克服将会激起还尚未被发现的可共同感以及哪个分歧将会导致出现注定要永远危害关系的僵局。未来被仁慈地蒙上了一层面纱，如果双方知道前面是什么，他们就可能不会做他们现在正试图做的事了。

我几乎总是在教育自己的过程中度过新的第一轮谈判。我几乎从不提出建议，而是力图理解我的对话者的立场中难以捉摸的东西以及估计可能做出的让步的范围和限度。我作出很大的努力，使对方对我们的基本态度有个清楚的了解。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以为靠诡计就能在谈判中取胜；只有书呆子才相信使人困惑会有好处。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世界里，只有所有的参加者都认为协议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个协议才能得到维护。他们都必须感觉到他们是取得这个结果的参与者。外交的艺术不在于比对方更精明，而是让对方相信彼此间有共同的利益，或是认识到如果僵局继续下去将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这次情况就是如此。一开始，我向伊斯梅尔解释我们政府的奇怪的行事办法。我们是双渠道系统，埃及直接同白宫接触时使用了这个系统。只有双方都完全光明正大，这个办法才能奏效。如果开罗力图利用一个渠道来反对另一个渠道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它肯定会使我们难堪，但这只会以给它自己造成僵局为代价。

这是个策略问题。更深的挑战是建立信任的基础。我请伊斯梅尔“坦率地告诉我，你的看法和感觉如何。”在制订建议之前，我们得找到一个概念：

除非我们确切知道我们想完成什么，除非我们对什么东西切实可行有一些了解，否则，画地图或做其它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不然，我们只会是买三个月的好感，随后便是极大的不信任。你必须理解，你同白宫打交道时，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宁愿老实地对你讲，有些事我们干不了，而不愿讲我们可以做某些事，而事后我们又不兑现……

当哈菲兹·伊斯梅尔和我在纽约郊区会见时，我们远没有达到这种信任程度。实际上，他此行更多地是为了提出一个客气的、其条件是我们无法满足的最后通牒，而不是来讨论调解并进而讨论让步的。伊斯梅尔向我讲述了他同尼克松的谈话，他现在认为一九七三年内必须要有个解决办法；至少，他希望九月他能就基本原则达成一个协议。他从来没有解释他如何理解这一点以及如果到时达不成协议会出现什么情况。伊斯梅尔拒绝搞临时协议——苏伊士运河脱离接触——除非这个协议作为今后短时间内分阶段执行的一致同意的全面计划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协议就无关紧要了。首先，在做其它事情之前，以色列得同意回到一九六七年它同所有邻国之间的边界上，也许在西岸还留些调整的余地。只有在此基础上，埃及才参加谈判的进程，而且只讨论安全的安排，这可以包括，例如出于威信和公道的原因，应在国际边界的两侧建立非军事区；国际监督组可在西奈的顶端如沙姆沙伊赫等战略要地行使职权。作为交换，埃及将结束同以色列的交战状态——但是还不建立“完全和平”。它将向以色列船只开放国际航道，结束敌对宣传和停止对同以色列做生意的外国公司的抵制；但它不同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开放边界。此种程度的“完全和平”或“正常化”还要等到同包括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其它

各方达成一个全面的解决时才能实现。

同样的完全撤军的原则连同安全措施也必须应用于戈兰高地。伊斯梅尔在西岸问题上态度更灵活些：可以同侯赛因国王或某些未明确讲明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会谈。埃及将接受各方同意的任何结果，甚至是同要求沿约旦河建立以色列军事前哨基地的所谓阿隆计划相一致的结果。然而，为避免误解，有两点需要说明：阿拉伯人控制东耶路撒冷是必不可少的，不可谈判的。此外，如果约旦通过谈判取得解决，在应该由谁最终管理西岸问题上，埃及将保留表示意见的权利——这暗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影响正在增长。这对侯赛因和以色列来说都是不祥之兆，意味着侯赛因可能被用来从以色列那里获取领土，但却不能保留这些领土。而对以色列来说，同侯赛因谈判就变成了同它的死敌、仍然致力于摧毁它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入对抗的代价。表现出灵活性的唯一一点暗示是伊斯梅尔的一次讲话，他说，埃及不坚持必须同时完成所有这些谈判。开罗准备达成一项以色列—埃及协议，作为第一部分。但除非叙利亚和约旦的谈判已经准备就绪，否则埃及不签字。只有当这些谈判实际上已经完成时，它才建立完全的和平。

这种观点看得长远但片面，同导致产生僵局的态度没有本质的不同。为回到战前边界要付出的代价不是和平而是结束交战状态，这很难同业已存在的停火加以区别。只有当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在一个极为模糊不清的过程中安定下来以后，正式的和平才会到来。这实际上使最难对付的两方对整个过程中拥有否决权。

我希望进一步的探讨能揭示第一次交换意见时尚不明显的前景。于是我要求澄清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一个实质性的建议：埃及是否准备把主权和安全问题分开？如果以色列接受埃及对一九六七年边界的主权，埃及是否允许以色列的防御工事继续留在它的土地上？伊斯梅尔不明确表态，显然对我事先感到得意的一个

想法并没有感到不知所措。⑩同伊斯梅尔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他们没有给我们可以感到乐观的理由。对埃—以单独协议的暗示,是以一些不可接受的条件为前提的,与其说它是为谈判而作出认真努力,倒不如说它是要我们卷入进去。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搞清楚萨达特的想法。伊斯梅尔和我同意几个月后再进行会晤。

与此同时,我们研究了侯赛因国王和梅厄总理的要价。

侯 赛 因

我们同长期的盟友侯赛因国王的两次谈话与我们同伊斯梅尔的会晤是同等重要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二月六日举行的。

国王管理的这个国家的边界是人为武断地划分的。与其说它反映了历史的或地理需要的结果,倒不如说它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和英国建立的势力范围。约旦是作为叙利亚、伊拉克——两者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发源地——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缓冲国而建立起来的。叙利亚以法国为其委任统治国,伊拉克以英国为其保护国,巴勒斯坦则以英国为其委任统治国。约旦被抛入一片前途无望的沙漠之中,被远处的大国设想为天平上的砝码并对之加以摆布。侯赛因和他的祖父阿卜杜拉成功地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最初的蔑视和帝国主义的充满自信的控制那里赢得了独立和尊严。这是约旦仅有的两位君主的智慧的见证。他们的这些成就是在民族主义运动的矛头指向欧洲殖民国家、同时也指向统治的君主国之时取得的。哈希姆王朝的国王被迫采取不牢靠的平衡行动,他们需要外来的支持以反对激进分子的压力,特别是在这些人越来越多地得到其它阿拉伯国家以及正在增长的苏联力量的支持的时候。但他们并不象外国代理人那样行事。相反,

他们力争取得并且成功地表明要有一种既维护阿拉伯的特征、同时又肯定同西方的友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力图表现出可以通过温和的办法来实现阿拉伯的意愿。

以色列国的建立给约旦增加了新的特殊的不稳定性，使得它的统治者宣称约旦对约旦河西岸拥有主权；这样，他们继承了巴勒斯坦人的感情，这就保证其进入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主要舞台。虽然哈希姆王朝的君主们对新出现的犹太国并不比他们的阿拉伯兄弟感到更高兴一些，但他们认识到不可能摧毁它，并第一个探讨了与之共处的可能性。为此而进行的努力使阿卜杜拉国王在一九五一年的一次暗杀中丧生。在随后的十五年间，侯赛因同他的阿拉伯同事一起拒绝承认以色列，但总是不安地意识到，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激进分子力图把他搞下台，这一点就象他们要摧毁以色列那样肯定，也许这是走向那个目标的第一步。在依靠西方支持的同时，他也警觉地维护自己的独立；一九五六年他撵走了训练并在某些方面指挥他的军队的英国军官。但是在一九五八年伊拉克革命后，激进浪潮威胁要吞噬中东时，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登陆，英国军队进驻约旦几个星期。

将近十年后，在一九六七年，约旦被吞没在六天战争之中。尽管纳赛尔对待王国的态度清高而傲慢，侯赛因仍然按其阿拉伯团结的需要的高度理解行事，参加了纳赛尔已经败北的战争。结果是约旦被赶出了西岸和耶路撒冷老城。这样一来，约旦参加和平进程只是使它业已不稳定的存在更加复杂了。因为侯赛因困在他的阿拉伯兄弟的感情和他自己的现实主义之中，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激进分子多次企图谋杀他；他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是最愿意讲和的阿拉伯领导人，但以色列在其征服的所有领土中，最不愿意放弃的恰恰是约旦的那一部分，因为它与自身的传统联系得最为密切。以色列对直接谈判提出的基本要求实际上侯赛因都

答应了，但这并没有加速问题的解决。所以约旦孤悬于敌对力量之间。它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却遭到当时支配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分子的攻击。一九七〇年，它被迫镇压要在约旦领土上建立国中之国的巴勒斯坦游击队，但是在这样做时，它仍然保留了阿拉伯的禀性。它对以色列不满，但不想让新的冲突吞没这个地区，那可能会摧毁哈希姆王朝统治的本质——温和——遗留下来的东西。

侯赛因精明地应付这一挑战，表明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对于传说中的侯赛因彬彬有礼的言行，不了解的人以为是顺从，其实是避免同各竞争力量亲近的一个绝好办法。他遭受以色列的顽固不化、西方的拥抱、埃及的霸权欲望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革命狂热的危害。他我行我素。侯赛因没有为一九六七年的蒙耻而责怪美国。他没有效法其它几个阿拉伯国家同我们断绝关系，但他继续坚持要取得一个公正对待阿拉伯事业的解决办法——即使这是那些力图将他搞下台的人的事业。

在埃及赶走苏联人员后他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侯赛因对这件事不象大家普遍感到的那样得意。他怀疑——正如后来证明是对的——萨达特的一个意图是摆脱不愿支持采取军事行动的苏联。侯赛因认为，与此同时，苏联的受挫可能在其政策中产生三个危险的后果。苏联人将增加他们对埃及的武器援助，以保护他们在开罗留下的阵地。第二，他们将坚持一个要求全面解决的僵硬立场，使埃及旨在单独安排的任何诱惑都难以得逞——这就解释了为何一九七二年秋天葛罗米柯那样反对临时协定。第三，他们将继续向叙利亚运送武器，以阻止它效仿埃及，并把它变为苏联政策在这个地区的新矛头。

侯赛因的悲观预测不仅限于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他还提出警告，苏联在波斯湾地区有野心，它是用大批苏联武器武装起

来的伊拉克为代表的，它反对该地区所有的温和政府，即使巴格达政权同苏联继续存在着分歧。他表示愿意派约旦军队帮助稳定海湾下部的阿拉伯酋长国。我们的官僚机构自鸣得意地对支持这一政策涉及的微小援助金额争论不休；是白宫下了一道命令才打破了这个官僚主义的僵局。

侯赛因反复表示他愿意同以色列讲和。但是，尽管是秘密接触，他却面临一个困境。他是阿拉伯温和派命运的象征。他处在既无能力支撑一场同以色列的战争、但又不愿意同激进分子为伍的境地。他准备争取一个甚至是慷慨的外交解决办法。但只要侯赛因是孤家寡人，以色列就看不出谈判会有什么好处。在它看来，归还任何已占领的领土都不如现状安全。拥有历史遗产的西岸将会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使用暴力的争端。全国宗教党坚决反对归还任何西岸领土，而联合政府没有该党便无法执政。

我们要侯赛因提出一个适于谈判的计划。他答应两周后从佛罗里达度假回华盛顿时同我们一起研究这个计划。

二月六日同侯赛因的会晤是我第一次直接了解、后来被证实了的中东和平进程的悲剧：萨达特和侯赛因个人之间互不信任。萨达特压根儿不喜欢侯赛因，或者就此而言，不喜欢王权。在他的复杂外交的这一初期阶段，萨达特需要，或者说他认为需要巴勒斯坦人，以便使他的阿拉伯资格光彩夺目。同侯赛因一起支持谈判可能会疏远阿拉伯激进分子，特别是叙利亚。而如若保留军事选择，叙利亚的支持又是至关重要的。于是，萨达特避免同侯赛因亲近，从而阻止出现一个唯一可能就西岸问题同以色列谈判成功的发言人。另一方面，侯赛因对埃及极不信任，担心萨达特同纳赛尔一样反复无常，会伤害约旦。遗憾的是，这两位温和的领导人没有相互给以可能加速中东外交的那种支持；他最后走进了死胡同，唯一的出路就是战争。

我不能说我当时对所有这些相反的倾向都象后来那样清楚。但二月二十七日国王回到华盛顿时，无需很敏感就能发现他对埃及的态度极不信任。我向他通报了同伊斯梅尔的会晤情况。侯赛因和他的主要顾问、后来任总理的扎伊德·里法伊认为埃及的这些建议里没有任何新东西，而这些建议是多年来埃及外交的主要内容；他们建议我们让开罗说话，更精确地讲明其真意所在。然而，我们的约旦朋友认为关键是把苏联人排除在这个进程之外。因此，我们从两位由于互相怀疑而不能联合在一起的阿拉伯领导人那里得到了采取不同方法的两个暗示。萨达特利用巴勒斯坦人以取得对约旦行动的否决权，而侯赛因则以我们担心苏联不会让步来减慢埃及单独媾和的步子。

当时在阿拉伯领导人中只有侯赛因一人准备把和平条款具体化。他交给我一份文件，上面详细阐明了几星期前他曾向尼克松和我讲述过的那些内容。约旦将直接同以色列就西岸问题进行谈判。只要交还加沙地带，边界将作一些变更。假若约旦主权得到恢复，沿约旦河可以有以色列的军事前沿基地，或者甚至以色列的居民点，但它们必须是约旦领土上的飞地；他不能同意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谷。国王苦笑着说，这些建议都已直接向以色列提出过，但均遭拒绝。现在需要的是美国的建议，而不是约旦的另一个建议。他说，也许在这地区爆炸之前留给和平进程的时间还有两三年。这是他的一个错误估计。不幸的是，这是关键的一点，因为它使我们更加坚定地愿意等待十月三十日以色列大选的结果。

果尔达·梅厄

我们的下一位来访者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没有侯赛因的那种紧迫感。在三月一日同尼克松的一次约见中，她宣布，“我们

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并且坚持认为僵局很安全，因为阿拉伯人没有军事选择。果尔达·梅厄是一个有独创性的人。她精明、质朴、实在。她感到她是她的人民之母。对她说来，每一寸以色列领土都是她的孩子们用鲜血浇灌的。人的本性她见得太多了，以至她不依靠象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这样摸不着而且又可以撤销的保证。她深知承认他们的存在是所有其它国家安全问题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果尔达·梅厄作为一个年轻的先驱者来到以色列。归还领土的主意几乎使她感到切肤之痛。作为交换，她要求对安全作出坚定的保证。很难想象什么样的保证才可能被她认为比实际占领更为安全。她善于提出把我们置于防守地位的问题或延缓以色列作出困难抉择的需要。一九七三年，她在“直接谈判”的旗帜下进行战斗，这个要求使人们看清甚至是温和的阿拉伯人的立场是何其荒谬，这些人坚持要求以色列放弃占领，但又拒绝坐下来在谈判桌上讨论撤军。她要求我们两国间协调立场，这个建议听起来颇似有理，但其实际的结果是授予她以对我们的策略的否决权。

在会见尼克松时，梅厄夫人以夸奖为武器开始直接进攻，尼克松是相当经不住夸的。她感谢尼克松使世界革命化了，以及第一次在人们心中带来了我们正在接近战争终了的希望。尼克松对这个评价并未准备表示异议，但谨慎地补充道：“我们对仍旧存在的危险是抱现实态度的。这里许多人说，既然世界太平，我们就可以减少军备，把钱用到少数民族居住区上。但是，在我们的对手真正改变以前，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军备”。梅厄夫人同意这种推理。她告诉尼克松，她曾经警告她的社会党伙伴维利·勃兰特，不要变得象孩子那般天真和诚实，或丧失警惕。尼克松深信，任何怀疑勃兰特的人都是知己，他主动并且有点离题地说道：“在国际事务中，我的原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基于同我的上司共事四

年多的经验补充说道：“还加百分之十。”

会见转入实际问题。梅厄有两个目标：赢得时间，因为保持现状的时间越长，以色列就越能巩固它所占领的领土；争取尼克松同意给以色列新的一揽子军援。

至于谈判，梅厄的态度很简单。她认为以色列在军事上坚不可摧，严格说来，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变动。由于美国人天生不甘寂寞，她愿意进行谈判，虽然不承诺要谈出一个结果来。她感到约旦问题胜券在握，因为已经有直接接触了（任何公正的观察家都不会说这已经加速了解决问题的进程）。至于埃及，她准备达成一个沿苏伊士运河脱离接触的临时协定，作为走向最终解决的第一步。但她不同意在谈判开始之前规定最后边界，她说，埃及人正在找人帮助它，使它能白占便宜得到一切。开头，开罗试了试苏联人，现在正在试美国：“埃及的问题是，还没有开始他们就想结束。”她同意我们奇怪的双轨步骤：除就临时协定进行公开谈判外，只要不断把情况通知以色列，她还准备要我继续私下同哈菲兹·伊斯梅尔探讨全面解决的一些一般原则。这态度很公正，虽然它没有给人以乐观的真正理由，因为它对任何选择都未置可否。

向以色列交付武器这个经常性的问题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我们同以色列的武器关系中的一个弱点是每隔一两年就要延期一次。每次新的交货不可避免地成为阿拉伯反感的焦点，在我们政府内部也引起对事情的轻重缓急的争论。通常是，由于国内压力加强了战略需要，结果就通过一项新的武器一揽子计划的有利决定，给阿拉伯世界愤怒的新爆发火上加油。

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三月一日，在梅厄夫人的敦促下，尼克松原则同意提供飞机的新时间表，还包括在以色列进行联合生产的一些计划。我们力图以不作正式宣布的方式来减少在阿拉伯世界的反响。但是，美国和以色列有那么多领导人在国内问题上

的立场与此相关；不到两个星期，这个决定就被泄露出去。^⑩由于这件事紧接着伊斯梅尔的访问，在开罗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应。

我们的任务很微妙。我们一方面得暗示埃及就现实的计划进行直接谈判，另一方面也得暗示以色列作出比它自己预想要大一些的让步。但如果我们使阿拉伯产生奢望，尔后又不能实现，我们将会招致强烈的反美后果。如果我们过分压以色列，它可能在它还占上风的时候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我们还得挡住苏联纠缠不休地要求达成一项苏美直接协定，强加一些比伊斯梅尔提出的更难于实现的条件（见第七章）。我从未看出同莫斯科做交易有什么意义，除非苏联人愿意象他们要我们敦促以色列那样去敦促阿拉伯人。三月五日我向英国外交部的托马斯·布赖姆洛爵士通报伊斯梅尔的访问时，表示了我的怀疑。

以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作为开始的苏美在中东的双边交易将做两件事：它可能制造另一次中东战争，而由于有共同的苏美立场，它可能诱惑苏联人干预这场战争。第三，取得一个解决办法之后，很明显，边界问题解决之后的下一个回合就是在巴勒斯坦前途问题上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之间的争议……显然，（从我同伊斯梅尔的会谈看来，）和平解决最终取决于巴勒斯坦人——他们最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动力。

所以，结果同越南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越南，问题的解决使我们得以脱身；但在中东，问题的解决将把我们拖进去，以保护我们已强加的东西。

我确信，如果要取得进展，我们就必须减少苏联的作用。

他们不愿意比阿拉伯人软，而他们有很大的动力要更强硬些，这样，使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的责任就落到了我们或萨达特的身上。因为下一个回合是在整个地区里的激进分子和温和派之间进行的。

如果我们提出一个详细的文件，我们就典押给所有各方，对一个进程和一项解决办法承担责任。

由于这些原因，在提出一个详细计划——所有的人都自愿地给我们提供计划——的问题上，我特别谨慎。如果不能搞清楚一个人的意图就作出保证，这是最糟糕的外交态度。我们必须仔细

地探明地形，以免触发布满我们四周的饵雷。

同伊斯梅尔第二次秘密会晤

穿行于那个布雷区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因为紧接着同哈菲兹·伊斯梅尔的二月会谈后，中东又一次经历了它定期发生的暴力事件。美国外交官小克利奥·A·诺埃尔大使和乔治·柯蒂斯·穆尔副馆长被黑九月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扣作人质，三月二日在喀土穆惨遭杀害；利比亚的喷气式飞机三月二十一日在地中海上空向美国侦察机开火；黎巴嫩边界上的袭击和报复行动又重新加剧。

与此同时，我们同埃及的关系日趋紧张。伊斯梅尔回去后，最初他让人传话过来，说他对在这里受到的接待至感愉快；他同我的秘密会谈的全面和坦率程度都超过他的预料。他希望下次会谈更具体些。伊斯梅尔甚至同意研究我的“把主权和安全分开”的建议，并力图使两者平衡。如果埃及对西奈的主权得到恢复，可能会做出满足以色列要求的实际的安全安排。三月九日，我答复伊斯梅尔，说我将同以色列人会谈，“以了解他们的立场，因为这可能与你所说的计划中的协定的一般原则有关。”

但气氛很快变了。埃及发现自己在喀土穆谋杀中采取什么立场十分为难。它对杀害这些人很反感，又需要维持激进分子对当时业已进行的战争计划（我们对之毫无所知）的支持，还希望把我们卷入和平进程。它受到这几种心情的折磨。细想自己的困境，埃及愈加烦躁不安。开罗的一位埃及高级官员告诫我们说，他们政府里的一些人反对为和平作出的努力，还说报界透露我们卖给以色列喷气式飞机“使事情变得对我们更不容易了。”三月二十日，伊斯梅尔对我三月九日给他的信作了答复，警告说我们正在提

供给以色列的精良军事装备可能会使秘密谈判破产。我三月二十三日的复函对伊斯梅尔的指责未加评论，只说我期待听取上次会谈时伊斯梅尔答应过的详细反应。

与此同时，为使掌管对话中美国这一端的那些人的事情更难办，埃及人做出了他们自己的贡献。鉴于阿拉伯外交的性质，他们可能无法有别的做法。在阿拉伯世界的激情气氛中，“保守秘密”有特殊的含意。由于阿拉伯领导人既感到同他们兄弟间的团结情谊，同时又感到受很强烈的个人主义的牵制，他们之中谁也不会相信萨达特所说的什么事也没搞的任何保证——实际上，谁也不会为他的这种保证深感不安。由于以他们自己的癖性来判断他们的同事，阿拉伯领导人深信，尽管表面上大家都在维护阿拉伯事业，但频繁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每位“兄弟”也都力图借此加强自己的地位。在这不和谐的声音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守秘密的最好办法是让自己的伙伴沉没在空谈计划的杂乱谈话之中，最后分不清是史诗还是现实。

于是，三月六日我们了解到埃及官员已将我同伊斯梅尔的秘密会晤向沙特人汇报了。由于外交界是以情报交易为生的，消息传得很快。在开罗的英国官员随即向他们的美国同事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我已通过托马斯·布赖姆洛爵士向英国政府里的最高级人士通报过，白厅尊重我们保密的命令，没有将这一情况传达给其驻开罗的代表。后来萨达特在《新闻周刊》的阿诺德·德·博什格拉夫的采访中提到伊斯梅尔访问华盛顿之前的一些来往。这件事仅在开罗发表的阿拉伯人对这次采访的描述中予以披露——这足以使杰里·格林警觉到某些事情正背着他在进行。

没有什么比绕过外交官更使他们生气的了，特别是当这个人是驻外使馆的馆长，即使是象驻开罗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所谓利益代表处的馆长。惹怒了的外交官有两个选择，如果明智，他只会谨慎

地询问他的上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行政官员向华盛顿弄清情况。但他还可以使用特权；他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报告了解到的情况，这样一来，消息会通过电子计算机化的分发系统传遍整个官僚机构。这将会很快搞出许多材料，使人们想了解秘密的愿望异常强烈起来。这种活动的结局几乎总是不增加已布置给外交官的责任——他可能成为受害者——但减少了华盛顿的选择余地。

无论如何，格林选择了更富有进攻性的途径，或许是在华盛顿的某个人唆使他这样做的。记者采访萨达特一事公开后，格林首先谨慎地询问他的国务卿是否有他（格林）还不知道的秘密渠道；他还询问中央情报局在当地的代表。与中央情报局不老实的鬼话相反，那个老好人为了使外交使团安宁，实际上被迫承认已有过秘密交往，虽然他没有讲具体内容。格林不是一个低劣的官场暗斗者，他在定期发给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不带感情色彩地报告了沙特人讲的关于我同伊斯梅尔会谈的情况——于是广为传播开了——当时一位沙特官员向他提供了这一情况。说公道话，格林不是处在令人羡慕的境地。有错的不是他，而是我们的体制。现在没有有关部门的参加，就中东问题进行谈判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在四月九日，我向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J·西斯科通报了我同伊斯梅尔的接触，四月十三日尼克松会见西斯科，为了安抚，邀请了国务院人员参加；西斯科的副手，小艾尔弗雷德·L·（罗伊）艾瑟顿参加了一个月以后我同伊斯梅尔之间的会晤。显然，双轨体系在中东搞不下去了。

这一时期萨达特一直在火上加油而不承担任何后果，因为谁也不把他的战争威胁当回事儿。三月二十三日，我们听说萨达特想为开放运河做些“准备活动”。三月二十六日萨达特在宣布为准备同以色列“全面对抗”的举动中改组了他的内阁。在《新闻周刊》上发表的德·博什格拉夫的采访中，萨达特宣布“惊人之举的时刻已

到”；重新战斗“势在必行。”^⑩ 没有人相信他拥有实现他的威胁的手段。看起来，那指的是突击队袭击和恢复炮击。

四月七日，哈菲兹·伊斯梅尔写给我一封信，说开罗是在两种假设的情况下行动的：

(一) 白宫实际上已经决定直接参与中东问题……

(二) 由于向以色列试探的结果，美国方面感到有足够的令人鼓舞的迹象使埃美对话产生益处。换言之，以色列已向美方表明它愿意在最近几个月内朝全面解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埃及要求在它全面计划的基础上取得全面解决作出保证，以此作为进入第二轮谈判的要价。接受这一点将会产生许多失望。四月十一日我作答复时表示欢迎第二次会晤，但没有明确表态。至于伊斯梅尔的“假设”，我建议可以进行伊斯梅尔称之为“协定项目”、或一般原则的讨论，作为苏伊士运河协定和全面协定之间的桥梁。但是我在最后边界上避免讲得具体。我再次要求严守秘密，对在阿拉伯世界流行的解释提出质疑，并且又作出保证“美方认识到埃及对过去经验的关注。然而，如果它想重复过去的格式，它将不再使用这些渠道。”

但是萨达特坚定地朝冲突走去。令人不安的消息报道说，阿拉伯的武器正在运往这个地区。利比亚和沙特的飞机运到埃及，摩洛哥和其他地方的军队调往叙利亚。然而，我们仍旧认为这是心理战而不是在认真准备战争。四月二十日，中央情报局报来它的估计，认为萨达特可能已经开始更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谈话，但情报局认为，他尚未到达做出决策的地步。在列举了一些阿拉伯国家采取的各种军事步骤后，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计划在某一具体时间里采取任何具体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萨达特在一九七二年夏天已经决定要进行战争了。决定他掷骰子的不是谈判中的即刻困境，而是谈判各方真正立场之

间的客观僵局。萨达特非常精明，他知道他不可能一下子收回他丢失的所有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他将不得不做出一些重大让步。但是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建议进行分阶段谈判——后来称之为“逐步解决”办法——他将失去叙利亚和苏联的支持，他正是靠这些支持发出威胁，而若没有这些威胁，谈判永远开始不了。如果他暗示搞单独的和平，他将丧失参加谈判的任何手段。

萨达特决定通过战争斩钉截铁地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他表面上做出外交姿态，但其速度使问题无法具体化，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他把期限定得很短，使人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探讨。萨达特使用外交和军事准备两手，施放了一层烟幕，在烟幕的后面制造大家都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埃叙进攻以色列。但是，只有萨达特一人知道他策划的这个外交革命。我们已力图使他重定方向，但还没有认识到，萨达特认为有必要先进行一场战争，然后他才能采取决定性的步骤，通过做一些真正的互让，来加速和平的进程。因为在六天战争失败之后阿拉伯人深感耻辱的情绪下，作出让步会被归咎于军事上的软弱，而不会被看成是政治家的风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同伊斯梅尔的第二次会晤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尽管我当时还不认识这一点。萨达特深知，他正在建立的阿拉伯团结十分脆弱，因而不相信他可以使他的军事计划拖延好几个月。他熟知阿拉伯领导人之间互相猜疑，因而对通过长期的谈判仍然可以保持军事选择这一点不抱任何幻想。如果一九七三年年中我能够保证他在不讲和的情况下就可以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他会接受这一点——尽管象他后来告诉我的那样，由于这对埃及的荣誉没有多少好处，他不会十分愿意。但是在他临时组织起来的联合的任何时间限度里，要实现这一点如果不是完全办不到，也是相当困难的。他知道这一点。

所以哈菲兹·伊斯梅尔和我又一次会晤了。那是一九七三年

五月二十日，在法国巴黎和夏尔特尔之间一座有几百历史乡的农舍里。美国房东以最富有的人那种昂贵的简朴风格将房子整修过了，屋顶上的大梁保留了乡土气的精雅，此外还有一个大花园和瀑布，更增添了田园意境。我们在楼上进行正式会谈，午餐后，我同伊斯梅尔在春天的阳光下在花园漫步。在四周美丽的景色里，我们进行了外交家称之为“有益的”——即最终没有结果的——会谈。困难是伊斯梅尔不愿背弃他原先的计划，他一定知道这个计划永远不可能一次兜售给以色列。对我要埃及拿出点新东西以开始谈判进程的建议，伊斯梅尔装着生气的样子。但是无需多费脑筋就知道，埃及的立场——实际上埃及自一九七一年二月以来一直建议而又始终被拒绝了的东西——不会给我们以任何手段来同认为没有必要开始谈判进程的以色列开始新的谈判进程（实际上，在我同伊斯梅尔的会见之前，果尔达·梅厄已经违背了原先达成的谅解。现在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她对同时进行全面和临时解决的途径是否明智表示怀疑）。我表示我不同意埃及向沙特人通报中的那些比较刺耳的部分，在我看来，这些部分含有我们原来会谈时并没有的对抗的口气。伊斯梅尔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暗示这反映了阿拉伯人心理上的需要。

我还提出了一个方案，以便把临时解决同全面解决联系起来。但是很明显，埃及既不会冒遭到孤立的风险去搞临时解决，也不会进行全面解决所要求的长期谈判。伊斯梅尔对我将主权和安全分开的计划仍然持冷淡态度。他将其称之为“削弱了的主权”，但是表示他将同萨达特进行讨论，然后再告诉我。但此后我再也没从他那里听到任何消息。

找到这个会晤地点的那位美国官员向我报告说，自我离开以后，伊斯梅尔明显地情绪不高，闷闷不乐，一人长时间独自坐在花园里，两手撑着头，凝视房子后面的瀑布。他的手下人员没去打搅

他，后来他的女儿走过去，好象要让他高兴起来。他后来告诉这个美国人，不管和平努力如何历经沧桑，他希望同我保持联系。他说，即使发生武装冲突，我们的关系也是重要的。

因为伊斯梅尔知道萨达特已下定决心要打一场战争。只有美国保证我们在短时间内能实现阿拉伯的计划才会使他不这样做。而这是不可能的。伊斯梅尔虽是一个军人，但充满了埃及人的不寻常的仁慈，他对理智告诉他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情十分担心。中东正在走向战争。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但他知道。

①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九日《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五日加纳特·D·霍纳对尼克松的采访；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五日亨利·特里惠特采访罗杰斯。

② 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埃文斯和诺瓦克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一九七三年二月三日《纽约时报》社论；一九七三年二月六日《巴尔的摩太阳报》社论；一九七三年二月八日《华盛顿邮报》社论。

③ 见《白宫岁月》第三十章。

④ 欲认真推敲此题，请阅威廉·萨法尔著：《垮台之前：水门事件前之白宫内幕》（纽约花园城：道布尔戴公司，一九七五年版）第八部分第三章，《尼克松与犹太人》。

⑤ 安瓦尔·萨达特著：《寻求个性：自传》（纽约：哈泼和罗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版）第二二〇页以后诸页。

⑥ 见《白宫岁月》第一二四六——一二四八页和一九九三——一九九四页注释③和注释④。

⑦ 萨达特著：《寻求个性》第二二八——二三一页；《白宫岁月》第一二九五——一二九七页。

⑧ 见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二月一日《纽约时报》。

⑨ 一九七二年我也曾向以色列人试探过这个想法。见《白宫岁月》第一二九〇页。

⑩ 见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四日《纽约时报》上威廉·比彻文章：《以色列人将在美国购买更多的喷气式飞机，总数达四十八架。》

⑪ 萨达特接受阿诺德·德·博什格拉夫采访时说，“现在战斗已不可避免。”见一九七三年四月九日《新闻周刊》第四四——四六页。

第七章

缓和：从扎维多沃到圣克利门蒂*

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两人辞职四天之后，我乘飞机前往莫斯科。无疑，苏联人对于我们政治舞台上的这一转折感到愕然；但是，即使最灵敏的地震监测器要测到即将发生的地震规模也为时尚早。一九七三年春，在苏美关系中双方都没有紧张气氛。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第二次首脑会议预定于六月份在美国举行，我在苏联的几天时间——五月四日至五月九日——就是为此作准备的。此次访苏，使我对离开谈判桌的勃列日涅夫得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今天，当我思忖在美苏之间究竟能否稳定地共处的问题时，感到很有兴味。

我们一行抵达莫斯科后，便乘车离开伏努科沃第二机场，但并非去首都西郊列宁山上那些暮气沉沉的宾馆，而是去莫斯科东北约九十英里的扎维多沃，这儿是供政治局委员狩猎的场地，相当于美国的戴维营。我们的车队以接近一百英里的时速一辆紧随着另一辆行驶，保安车辆在车队中穿插。这反映苏方不是进行周密的心理战，便是由于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中所描写的自杀癖好所驱使。如果领头的汽车突然停车，美国代表团和苏联陪同便不可能活命。

这次行程尽管危机四伏，但却算是一种极大的荣誉。西方领

* 本章略有删节。——译者

领导人从未被邀请到扎维多沃去过；我听说，到那里去过的外国人只有铁托和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从这种情况来看，这种尽管笨手笨脚但非常愉快的同志式的友谊气氛是很明显的。而当时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方主人当然是尽力表示，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对他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一反常态地显得殷勤好客，有时候叫人难以忍受。我们的会晤轻松愉快，最低限度地榨取一点额外的好处，这是苏联外交的通常特点。

这是不是克里姆林宫在准备发动一场地缘政治攻势的同时用以麻痹我们的花招？或者尼克松的坚定立场使苏联人清醒起来，安于一个阶段的克制，而从经济关系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更加强了他们的克制？他们是不是把缓和仅仅当作是一种策略上的花招？或者美苏关系是否真有长期稳定的可能？一九七二年的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会不会是个转折点？或者它永远注定只不过是瞬息即逝的欣慰？

我们永远不可能搞清这些问题，大概苏联领导人也永远不可能搞清。一年来，无论尼克松反对苏联扩张的能力，还是他以现实主义态度进行谈判的权力，均因水门事件而遭到损害。我们既丢失了大棒，也丢失了胡萝卜。我们在东西方关系上的政策注定要失败，究竟是因为苏联制度富有生命力呢，还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概念存在着固有的含糊不清？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会长期争论下去。当美国的行政首脑权力崩溃时，这就成了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对于我们的心情来说，幸运的是，我们抵达扎维多沃时，那种前景尚不明朗。

美国代表团下榻的别墅，是由东德建造的，模仿瑞士的度假小舍，但那种在共产主义世界象征着地位的呆钝排场，却与其外表殊不相称。别墅的外表略有阿尔卑斯山小屋色彩，但内部却极其奢华。代表团中的几名低级成员被安置在一幢象宿舍一样的旧建筑

里，就在我下榻处的斜对面，中间相隔一块宽阔的草坪。他们高高兴兴地分散到好几套房间里去了，这些房间原来是政治局委员们专用的，后来在旁边又增建了一幢更为现代化的新楼。

院内最大的一幢住所是属于勃列日涅夫的。这是一幢两层的度假小楼，建筑式样与我所住的那幢相同，但规模更大。楼下有若干间摆满了家具陈设的宽敞的接待室，一间餐厅和一间电影放映室。楼上有一间宽敞的起居室、一间书房和一间卧室。楼上的每个房间都有飞檐遮阴的阳台。与勃列日涅夫那幢别墅成直角、并且上下两层均有长廊与之相联的是一座体育馆，馆内设备齐全，还有一个世界标准的游泳池。

我们抵达后不久，勃列日涅夫便来到我的住处，兴高采烈地欢迎我们。少顷，他邀请我们一行前往他的别墅共进晚餐。入席前，勃列日涅夫象个暴发户一样，洋洋自得地炫耀他的别墅。他问我，这样一幢别墅在美国要花多少钱。我漫不经心地胡猜，错估为四十万美元。勃列日涅夫的脸色沉了下来。我的同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比较善于揣摩心理：他纠正说是二百万美元——这大概要接近事实得多。勃列日涅夫乐不可支，继续领我们参观别墅。他以一种孩子气的自得神态向我们出示他获得列宁和平奖时各地共产党领袖的贺电和剪报。发奖的是由他委派的人，而送贺电的则是事业和政治上的生存都捏在他的手里的人，但这位几乎掌握绝对权力的苏联共产党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夸耀，似乎丝毫不觉有任何不当之处。

勃列日涅夫参加了苏方的几乎所有谈判；只有非常技术性的题目，如欧安会等，才留给外长葛罗米柯去举行。勃列日涅夫的笑话似乎同上一年一样取之不尽，而且由于一种新的密切关系而更富有趣味，这种密切关系大概超出了他的本意。他的饮酒习惯不那么克制了；他的笑话中有一个据说是俄罗斯民间故事，带有朦胧的

反犹太人性质——也许是想表明我已被擢升为一位同样反犹太的名誉人士。

时间表同以往一样莫明其妙。尽管勃列日涅夫没有明显的其他活动，但没有给我们作出安排或事先提出要商讨什么题目。会谈时间是随便安排的，几乎没有事先通知。除了签订防止核战争协议（我将在后文叙述）外，没有详细的议事日程。有两次，当我们的谈话没有达到勃列日涅夫的希望——关于中东问题，以及对核武器协议的某些争执——时，他便在自己的别墅里生气，不愿安排再次会谈。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多勃雷宁竭力缓和紧张气氛，他解释说，他的主子需要重新镇静下来，使勃列日涅夫显得是一位需要精心培育温和感情的人。当我坚持原来的立场——仅仅是没有提出新的想法——时，勃列日涅夫突然又现实主义起来，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他的玩闹失败以后，他便会尽力着手恢复一种感情奔放的亲善气氛。

我们一行——赫尔·索南费尔特、菲利普·奥迪恩、威廉·海兰、彼得·罗德曼和理查德·坎贝尔——面临着一个老问题，就是如何互相交谈而不被克格勃录下音来永远归入他们的档案库。说来也奇怪，在政治局的狩猎场，我们感到比在莫斯科常去的国宾馆稍为安全一些。我们认为，在自己高级领导人的度假胜地，克格勃搞起窃听来不大可能象在专门为外宾安排的下榻之地那样活跃。我们当然带来了所谓的窃听干扰器。这是一种盒式录音机，能发出一种不连贯的嘈杂声，据说可以淹没我们的讲话声音，不让热心的窃听者听见。我不知道它管不管用，我不愿意想象我的情绪会白白地屈从于那架可恨的噪音制造器。克格勃的技术和我们的清醒神智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不管怎样，我们一行偶尔也不使用干扰器，而是选定一处我们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勃列日涅夫书房外面的阳台上，在会议中间的间歇时间，我们大伙儿就去那个地

方。我们认为勃列日涅夫不会轻率得让苏联秘密警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

从轻松愉快、谨慎警觉和随意谈判等形形色色的表现中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勃列日涅夫对他将要去美国访问能否成功没有把握。美国甚至对其敌手也有一种特殊的、几乎带有魔力的素质，这是我国的一个荣耀。勃列日涅夫可以是一个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党的总书记，是向以我们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进攻的领袖。但是，他的主要关注似乎是，在他的宣传工具不停地称为资本主义堡垒的国家，他会不会受到平等的对待。

共产主义的政府形式还没有成熟，它也许加强了俄罗斯对美国存在已久的矛盾心理。从不懈地坚持其地位又怀疑其地位会不会得到承认、吹嘘其实力又没有把握其实力会不会得到承认的现象中就反映了这种矛盾心理。无论勃列日涅夫这一派的分析家们会怎样告诉他美苏两国的军事力量已日趋平衡，但在勃列日涅夫看来，美国似乎还是他年青时所了解到的样子——具有优越的技术，惊人的工农业能力，是一个效率高得出奇的国家，而相比之下，苏联则象一个笨手笨脚的巨人。

我经常公开宣布，我们是平等相待，但勃列日涅夫总是听不够——这种态度在北京是不可想象的，北京的领导人认为，不管数字如何表明他们的物质力量有限，但他们在文化上是优越的。勃列日涅夫没完没了地要求得到保证，他在美国将受到有礼貌的接待，不向他举行充满敌意的示威，他将有机会同“普通”老百姓见面。这是难办的差使，而且各种不同的要求也不一定互相一致。他谈到要把家属带去，也谈到他计划作一些顺访——谈话时总带着畏惧、惊异和把握不定的心情。无疑，他与我一起在政治局狩猎场度过的五天中所作的姿态给我们确立了一个效仿的标准。

我承认，尽管我认识到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家有着在欺侮别人

中寻求安慰和在支配别人中寻求安全的历史，但我还是被这种不安全之感打动了。在这次访问期间，由于勃列日涅夫的脆弱才使我们有一次富有人情味的接触，但以后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接触。他会突然出现，把我拉到点缀着湖泊、牧场和巨大森林的绵延起伏的原野去游览。有一天，他坐着黑色卡迪莱克牌轿车来叫我，这是前一年尼克松访苏时多勃雷宁建议赠送给勃列日涅夫的合适的国家礼品。（勃列日涅夫酷爱汽车，每到一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便收集各国的汽车作为纪念品；他的各位驻外大使也恬不知耻地建议给他送汽车。）我们坐着勃列日涅夫驾驶的汽车沿着蜿蜒的乡村狭窄道路飞速前进。汽车速度快得使人提心吊胆地祈祷，要是有位警察干涉一下多好，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便在乡村有交通警察的话，谁又敢阻拦总书记呢？就这样，汽车一直开到一个船泊停靠处。勃列日涅夫匆匆地把我拉到一只水翼艇上——真是大慈大悲，这艘艇可不是由他驾驶的——尽管如此，它却似乎决心打破总书记开汽车把我送到那里的速度纪录。不断的颠簸把我弄得头晕目眩，我没能记住这次游览的确切情况。另一天早晨，勃列日涅夫强拉着我的漂亮的秘书邦尼·安德鲁斯，把她带去乘艇游览。据她说，她回来时也同样惊魂不定，但没有半点伤害。

一天下午，我回到别墅时发现一套猎装，这是东道主自我抵达后便为我订购好了的。那是一套橄榄绿色、看上去象军服一样的漂亮服装，还有一双我将来不可能再使用的高统靴。勃列日涅夫穿着同样的装束，接我上了吉普车。我注意到，吉普车是由一名猎场管理员驾驶的，真是谢天谢地。由于我厌恶以杀生取乐，因此我对勃列日涅夫说，我将以顾问的身份作陪。他说已经选定了几只野猪供我射猎。我回答说，凭我的枪法，野猪的死因一定是猪的心脏病突发。

说笑了一阵以后，勃列日涅夫还是拉着我一起到了狩猎场。

同时，葛罗米柯带着索南费尔特朝另一个方向而去。在寂静的丛林深处，在一棵树的半腰建了一个平台，台上有一张粗糙的板凳和一个射击的孔眼。身穿绿色服装的林场工作人员正在地上分头布饵，勃列日涅夫、译员维克托·苏科德烈夫、猎场管理员和我在台上守候被诱来的野猪。周围死一般地沉静，只能听见勃列日涅夫的声音，他低声叙述狩猎的趣闻：他讲到有一次野猪袭击他的吉普车时他如何临危不惧，讲到一头野牛如何吃饱了布在地上作诱饵的谷物和马铃薯后，心满意足地睡倒在狩猎台的阶下，使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被困在台上，直到搜索人员前来把他救出来。

勃列日涅夫滔滔不绝地讲了大约一个小时。暮色四合，一群野猪朝诱饵走过来。虽然它们觅食的欲望已使它们抛弃了一切戒备之心，但它们从容而小心翼翼的行动打动了我。勃列日涅夫在沉着地选择他的猎物时，我却在深思贪婪之害。但我刚刚产生的这一想法却被丛林中走来的一头十分壮大的野猪推翻了。任何人一望便很容易得知为什么这头野猪能如此壮大。它一点也不贪婪；它在研究那些诱饵。每前进一步都要检查一下地面。它仔细地察看每一棵树后面的情况，小心翼翼地前进。它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壮大，显然是从不作不必要的冒险。然而它的谨慎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关注。他只放一枪便把这头野猪打倒了。只是因为勃列日涅夫的欢呼雀跃，才使我未能去多想聪明过度所带来的祸害。

若不是勃列日涅夫喜好狩猎的本性驱使他要我们一同转移到丛林更深处的另一个台上，这次狩猎还能触发我对粗浅哲理的何种其他贡献，那就不好说了。此时，夜幕开始降临。这群野猪真幸运，勃列日涅夫远距离发射，两次都没有击中。

勃列日涅夫和我在第二个狩猎台上呆了几个小时，有人把吉普车上的冻肉、黑面包和啤酒送上来。我们在户外环境中一起用餐

的时候，勃列日涅夫那种既傲慢自负又忐忑不安、时而杀气腾腾时而老成持重的性格暴露得淋漓尽致。谈及中国的时候，他凶相毕露。他首先讲述了他一个弟弟的经历。在赫鲁晓夫召回所有苏联顾问之前，他的弟弟曾以工程师的身份在中国工作。他发现中国人奸诈、自大、没有人性。他们斗垮高级领导人的手法，显示他们的同类相残本性（这番话出自一个在斯大林搞清洗时代冒起来的人之口，实在令人惊奇）；他们事实上也许是野蛮人。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核武库。苏联不能无动于衷；一定要采取点行动。至于什么样的行动，他没有说。

勃列日涅夫显然是在希望得到暗示：美国能默许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我没有给予鼓励，只是不动声色地回答说，中国的壮大正是使和平解决争端更有必要的问题之一。勃列日涅夫对这种崇高的理论轻蔑地不予置理，而是回到他原来一心想谈的话题。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对每一个人都是威胁。美国给它的任何援助都将导致战争。我故意把话岔开，提醒他说，我们与北京连外交关系也没有；我警告说，历史证明美国不会坐视中国遭到袭击。但是苏联领导人不甘心让这个问题就此了结。翌日，多勃雷宁把我拉到一旁强调说，狩猎时谈话提及中国的一部分不可当作社交话看待。勃列日涅夫的话字字都出自内心。

勃列日涅夫突然从恶狠狠变得充满感情，这反映了民族和他个人性格的两重性。他谈起他在乌克兰的青年时代以及他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他父亲从那次残杀中领略到，和平是最崇高的目标；他一生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个论调。勃列日涅夫同意，我们已经到达不应再为军事英雄建立纪念碑的历史时刻。公众的纪念碑应为和平的缔造者而立，而不应为战将竖立。他父亲曾经希望在乌克兰的最高点竖立这样一个纪念碑（除非我的地理知识有错，否则乌克兰的地势实在不高）。勃列日涅夫希望在他在职之年

带来一种形势，使美苏之间发生战争成为不可想象的事。

勃列日涅夫回忆他在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升迁、他在一九三六年的突然晋升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冲击。在他动身去那次战争中服役之前，他的夫人和他保证，无论间隔多久，两人都决不互相猜疑；战争只延续了四年。他动人肺腑地叙述了他们久别后的重新团聚，以及两人如何恪守诺言和信用。他跟我谈起，在战争时期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为了参加在红场举行的胜利阅兵，他要找一身制服是何等困难，后来他找到了，但他那身华丽的礼服却被一整天的滂沱大雨糟塌了。他叙述这件事时温文尔雅，一点没有几分钟之前那种明显的大吹大擂的劲头。他现在所谈的主题是和平。他说起话来嗓音含糊、时断时续，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位被一生的斗争耗尽了颇多精力的老人。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勃列日涅夫呢？是那个谈及中国时语带威胁的领导人，还是那个缕述他对和平的热诚的老人呢？也许两者都是真的。他所谈的和平，只是苏联霸权静止的一面呢，还是接受和平共处所必须履行的责任呢？还是那句话，答案几乎可以肯定是两者皆然。哪一方面占上风，这取决于时势和机会。西方是否有能力同时和有效地应付苏联政策中这两种交替出现的趋向，将决定是和平还是战争。布尔什维克相信物质和军事因素的优势；作为年迈的领导人，冷酷无情制度的苛求使他心力交瘁。象所有苏联领导人一样，勃列日涅夫会忍不住乘机改变世界力量的均衡；我们绝不能卸下常备不懈的责任。但在这种抑制因素下，鉴于不可能永远压制人类的要求，某些领导人很有可能出面探求真正和平共处的条件。西方政策必须兼顾这两种可能性：毫不妥协地抵抗扩张主义和敢于接受莫斯科认真改变方向。

我这样说是充分意识到勃列日涅夫政权从捷克斯洛伐克到阿富汗的残暴行径。很有可能是克格勃建议勃列日涅夫提出这些基

本话题,以表示一点人情味儿,以伪装有和平的真诚愿望。但我有必要说句公道话,我所认识的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不能使人相信他们有和平的真诚愿望。也许是勃列日涅夫善于表演艺术。但我怀疑是否如此。勃列日涅夫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当然要为争取他的思想意识的胜利而献身;作为一个相信客观因素的人,他没有理由不利用由于我们国内分裂而提供给他越来越大的优越实力地位。无论当时和现在,我们的首要职责是要防止这种诱惑增涨。但是在勃列日涅夫身上显然也有着俄国和俄罗斯民族的气质,这个民族已经饱经风霜、渴望摆脱痛苦,然而无论命运还是他们的统治者的野心都未能允许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天傍晚在狩猎台上的温和气氛是短暂的。一回到扎维多沃后,我们便再次投入谈判和筹备勃列日涅夫访美的例行公事中。这些工作,再加上其他事项,不久便淹没了这次独一无二、十分短暂的人性闪现,而且在我在职期间再也没有出现过。

缓和:何谓缓和?

过去十年来,同苏联的谈判已经饱经沧桑。我们开始任职时,各方面都不断敦促我们执行缓和政策。三年后人们高度称颂我们执行的这一政策是转折点,而后来,人们又把目前的一切困境都归咎于它。与其把缓和说成是认真分析的课题,还不如说是我国国内争论的晴雨表。无论如何对于政治家来说,外交政策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系列的现实。而尼克松第一届任职期间的现实是严峻的。我们不得不在国内对坚定的外交政策的各项方针进行的恶毒攻击中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接着,由于水门事件而使总统无能为力。缓和不是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而是掌握这些情况的必要条件。只有懂得这一事实,才能着手探讨缓和的问题。

回顾过去的十年，美国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上自我毁灭性的国内动乱所引起的后果正在归咎于缓和。越南战争使美国眼看着外国卷入而退缩，这样就给苏联扩张主义以可乘之机；而水门事件削弱了政府抵抗苏联压力的权力。在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决策者不得不同转向国内的公众舆论以及有计划地削减了防务计划和缩小了政府行动范围的国会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企求对抗便是招引垮台。我们这些负责国家外交政策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是在走钢丝。

那场悲剧的参与者都得了健忘症。自由派理所当然地不愿意为他们在七十年代所做的两大事业的后果承担责任。保守派则小题大作，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一届政府在水门事件上垮台了，也因为其中有许多人更感兴趣的是在国内对共产主义进行思想意识上的讨伐，而不是在遥远的异国乡土（外交政策问题实际上是在那里决定的）上进行地缘政治竞争。许多保守党人使传统的孤立主义复活，维护美国伦理的纯洁不受策略和权宜之需的感染。而有一些“新保守派”——他们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从自由派一边转到了保守派一边——热衷于看风使舵，不肯想一想他们自己对于国际抑制政策的崩溃所起的作用。他们忘记了他们曾经猛烈抨击外交政策太好战，而在五年之后，他们又把同样的外交政策斥之为战略撤退*。尼克松政府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抵御这种抨击，捍卫了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信用，这在后来指责尼克松（而不是他的对手）削弱了美国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信用的修正主义分析中却没有突出出来。^②几年来，我们因抵制印度支那的共产党人接管政权而遭到了来自左翼的恶毒攻击，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完

* 举例说，著名的、现属于新保守派的杂志《评论》一九七〇年批评了尼克松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分导多弹头导弹试验和对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漫不经心。它激烈地反对尼克松的越南政策，一度差点要欢迎美国失败。^①

全是因为我们担心美国信誉的崩溃会造成全球性的后果。现在我们忽然又得防御这一批人中已加入右翼的那部分人的攻击，以努力使我们的国家在我们所预料到的并加以反对的风浪中掌握航向。

因此，回顾一下什么是缓和，什么不是缓和，具有重要的意义。

尼克松以名符其实的终生反共的声望就任总统。他鄙视那些指责美国搞冷战、并且似乎相信可以通过艰苦地施行亲善政策来改造苏联制度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尼克松对苏联的动机深感怀疑；他坚信谈判要从实力地位出发；总之，他是个典型的冷战英雄。然而，在执政了四个喧嚣的年头之后，正是此人一反常态与苏联人谈判起二十五年内东西方关系的最广泛的议事日程了，这与一般知识分子对和事佬的概念大相径庭。不久以后，人们便用他原先在竞选中所使用的言辞“对共产主义软弱”来责备他自己了。

这种自相矛盾的怪事与其说是真的，还不如说是表面现象。我们并不把缓和和紧张局势看作是对苏联的让步。我们有自己的理由。我们并没有放弃思想意识斗争，而仅仅是努力从国家利益出发来控制这种斗争，尽管这是难以做到的事。缓和也不是没有成果。我们同苏联(和中国)改善关系无疑孤立了河内。一九七二年，莫斯科默许了在北越港口布雷，以及对河内和海防的轰炸；那年年底，河内只好满足于它几年来一直轻蔑地反对的条件。在欧洲，人们得知美国也可以同苏联谈话，便制止住了把所有紧张局势都归咎于美国以及在中立主义中寻求安全的诱惑。后来，缓和还帮助我们在中东带来了一场外交革命。

我还认为，实际情况同批评家们的指责恰恰相反：缓和帮助了、而不是损害了美国的防务。甚至在美国人知道“缓和”这个词之前，国会就从尼克松第一届任期的防务预算中削减了四百亿美元；连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这种一心支持美国实力的人也公

开宣扬稍稍削减防务预算,保持“谨慎的防务姿态”。^③第一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签字之后,我国的国防预算增加了,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通过了战略武器的生产(MX 导弹、B-1 轰炸机、巡航导弹、三叉戟潜艇以及更加先进的弹头),这些武器在十年后成为我国防务计划的支柱,而在我国与莫斯科的关系缓和之前,这些武器的生产在国会中还遭到了阻碍。

缓和并没有妨碍抗击苏联的扩张;相反,它为抗击苏联的扩张培养了唯一可能的心理基础。对于苏联的冒险行动,无论是它直接干的,还是通过其代理人干的,如在西恩富戈斯、约旦、苏伊士运河沿岸和印一巴战争中,尼克松知道如何划清界线,加以反对。他做得冷静、刚毅、更加可信,因为国民都懂得,我们并非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凶猛残暴。如果越南战争对我们有所教益的话,那就是:只有美国人民信服别无其他抉择,才能维持军事对抗。

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上任不久就会发现,他的回旋余地是很小的。美国和苏联在思想意识上是仇敌。缓和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但核时代又迫使我们共处。唇枪舌剑的交锋也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这次大战的爆发是因为民主国家未能懂得一个极权主义侵略者的图谋,愚蠢地企图对它采取绥靖政策,允许它取得军事上的优势。这种情况决不应再发生了,无论建立充足的防务会造成何等沉重的负担。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当时尽管存在军事上的平衡,而欧洲还是沦入了一场无人想要的战争,经受了一场无人能想到的灾难。决定受军事策划的驱使;外交受恐吓和故作姿态的驱使。领导人铸成治世之才中的大错:他们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

这样,美国总统便有双重责任:一方面他必须抗击苏联扩张主

义。同时他又必须对全球性对抗的巨大风险心中有数。他的政策必须兼顾威慑和共处，既要遏制，又要力争缓和紧张局势。假如和平的愿望变成不顾一切地避免冲突，假如主持正义的人们轻视力量，在纯洁的道义中寻求庇护，世人对战争的恐惧就会被强者用作进行讹诈的武器；和平国家，不论大小，都只能听凭最残忍的国家任意摆布。但是，假如我们撇开战略去追求思想意识上的冲突，假如对抗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就会丧失盟友之间的团结，最终丧失我们人民的信心。这就是尼克松政府对缓和的理解。

尼克松政府试图制订这样一种外交政策：既不耽于出自义愤的声讨膺惩，又不流于逃避现实的孤立主义，而是把两者纳入对国家利益的谨慎分析之中。美国的目标是要维持力量均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富有建设性的未来。^④我们正进入这样一个阶段：美国要在比我们从前所遇到的复杂得多的条件下、比我们以往所预测的长得多的时间内担当起历久不渝和成熟的领导责任。

以核武器和经济实力占压倒优势为基础的美国主宰世界的时期于六十年代末宣告结束。苏联的核武库不可避免地接近了同美国相等的水平。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实力必然促使它们寻求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有更大的权力和参与更多的事务。美国将不得不学会以类似其他国家在历史上执行外交政策的前提来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基础。我国经济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每十年下降10%：一九五〇年为52%，一九六〇年下降至40%，一九七〇年降至30%左右（在我写此段文章的时候降至22%）。这意味着，假如世界其他各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或者某个敌对的大国或大国集团取得了北京所告诫的霸权，那么美国的力量同其对手的力量相比就相形见绌了。我们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已不再是鹤立于鸡群，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世界力量的均衡，因为一旦失去均衡，对我们不利，就很可能无法挽回。

我们不可能等待威胁变得势不可挡之后才着手对付，我们就只好用概念来代替力量。我们需要有在作出估计而无法证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内在力量。

如何避免核战争而又不屈服于核讹诈，如何防止和平的愿望变成姑息养奸，如何保卫自由而又维持安宁——这是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问题在于——不，应当说悲剧在于——对于既要遏制又要共处，既要维持力量均衡又要探索更加明确的未来这种双重概念，没有自动的一致意见。美国在历史上一向自以为无需关心全球均衡，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绰绰有余的力量使得它可以坐观成败。两种不同的学派形成了。自由派把外交政策当作精神病学的一个分科；而保守派把它看作神学的一脉。自由派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他们强调信任的美德以及单方面作出善意的姿态。保守派则把外交政策看作是善良与邪恶之间的永恒斗争——一种毋庸折中、只能以胜利告终的冲突——的翻版。威胁政策同自由派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单凭感情抽象地呼吁和平的作法是矛盾的；而共处政策则同宗教祷词式的右翼反共论调格格不入。美国的唯心主义观念驱使两派从不同的方向向我们挑战。自由派的主流对任何与力量均衡有关的事情都感到厌恶；直至二十世纪初期，美国认为自己超越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之上。我们将以一致的道德原则或国际法准则来组织人类。相反，对我们理想的纯洁性的关注促使保守派对共产主义进行隔离；与魔鬼只能不共戴天。自由派担忧对抗的危险；保守派则担忧害怕这种危险。

一九七三年十月八日，我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海洋研究所特里斯会议上所发表的讲话中试图阐明我国对苏政策的复杂性的观念：

本届政府对苏联制度从来不抱任何幻想。我们历来坚持认为，技术领域

里的进展(如贸易),必须跟随——并反映——更趋稳定的国际关系的进展。我们保持了坚强的军事平衡和灵活的防务态势,作为稳定的支柱。我们坚持认为裁军必须是相互的。我们不是凭气氛判断与苏关系中的活动,而是凭具体问题解决得如何,以及有没有负责的国际举动。

对于我们来说,共处有着非常精确的含义:

——我们将反对任何国家攫取全球性或地区性支配地位的企图。

——我们将反对利用缓和政策削弱我们的盟友的任何企图。

——假如紧张局势的缓和和被利用来掩盖加剧国际上有争端地区的冲突,我们将作出反映。

苏联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无视这些原则,就不可能不危及它同美国的全部关系。

美国国内先是在越南问题上掀起了一场风波,紧接着又在水门事件上掀起了另一场风波。在这样一段痛苦的时期,我们想要同时抗击扩张主义并敞开让历史选择发展道路的大门——实际上就是把保守派的分析和战略与自由派的策略结合起来——的努力证明是太好高骛远了。保守派至少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想同共产主义有任何来往,不论其策略动机是什么。他们把与莫斯科的谈判看作是在道义上解除美国的武装。他们反对我们的这种主张:假如我们不考虑全世界人民对和平的向往,我们就会在国际上孤立自己,就会在曾促使美国在越南问题上两极分化的同样一些问题上使我们的国家分裂。

自由派的立场则更为复杂。他们从内心深处反对遏制政策中包含的力量均衡理论。但是,对于他们如此长期地支持的、现在又被可恨的冷战英雄尼克松提出来的缓和,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尼克松偷偷地抓住他们的某些把柄,当他忍不住用他们自己的某些话来奚落他们时,他们就更垂头丧气了。使用夸张法的倾向(在这种敏感的问题上是没有必要的)驱使自由派批评家们首先攻击缓和只不过是力量均衡的另一种翻版,攻击缓和和搞得还不够,攻击

它是一种策略——几乎是一种冷战的策略——而不是真正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

但是，自由派不久便放弃了这一尴尬立场。然而，这一立场的好处在于攻击了我们的政策的前提，不管这种前提是好是坏。一九七三年初，自由派批评家忽然改变了他们的攻击方向。就在那个朦胧的阶段——尼克松为隐约呈现的灾祸提心吊胆，而他的对手还仍然对他表面上的坚不可摧感到棘手——许多自由派分子开始朝着这位出类拔萃的操纵者认为不可想象的方向运动。他们采取了他在向中间迈进时空出来的立场。忽然一下子又是这些曾经长期支持缓和的自由派分子开始感到缓和有思想意识缺陷。尼克松“过分兜售”了缓和、他在同克里姆林宫相处的愿望中忘记了人权、政府对于同共产主义打交道的道德问题麻木不仁等等论调开始流行。这些论调出自保守派之口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十分担心分界线变得不清楚会消磨掉西方进行抗击的意志。然而，这些论调出自那些一贯反对提高防务开支、诋毁在遥远的地区抗击苏联扩张（这正是我们致力于遏制政策的实质内容）的人之口，就不那么光彩了。

结果是一种危险的矛盾。一方面，从越南战争得出的教训据说是，我们在道义上无权去忙于遥远的事情。另一方面，政府现在又被指责为麻木不仁，没有坚持要所有其他的社会进行内部改良，不管它们是朋友还是敌人。正当我们被迫要从遥远的各洲撤退美国力量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教义，主张从政治上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至于苏联，自由派批评家们没有解释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在水门事件引起对防务预算和行政权力的攻击热潮中所造成的同克里姆林宫的对抗。

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对苏政策被立场不同的批评家们丑化了。我们是作为处理敌对国家之间的关系来构想这种政策的，而我们

的批评家们却指责这种政策近乎建立友谊。在每一次危机中，总有人叫喊缓和未能防止危机。我们衡量我们的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在减少危机的同时，我们是否有能力甚至在危机中达到战略目标——一九七三年的中东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莫斯科发生重大内部变革之前，东西方政策不可能根本消除危机。假如胡萝卜和大棒都抛弃了，那就更是如此，这从一九七三年以来政府的谨慎所遭到的攻击中就可以看出。更何况我们的批评家们提出的办法只不过是针刺熊，只能不断招惹危机而没有策略上的灵活性。苏联的每一个隐秘莫测的动机都被紧紧抓住，似乎是一个新发现。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对我们不会怀有好心。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依靠坚定、巧妙和有明确抱负的政策——这种政策可以在今后很长时期更好地继续得到公众和盟友的支持——而不是仅仅依靠漫不经心地重弹好斗口号的老调来更有效地击败这个超级大国的图谋。

无疑，苏联领导人希望使民主国家——在共产主义赞助的前线组织以及西方自己对世界事务乐观解释的唆使下——相信，导致紧张局势出现表面上缓和的原因不是我们的常备不懈，而是苏联的目的有了根本的改变。克里姆林宫里的狠心人物推测，越来越多的西方领导人将会调整国内的立场，以适应缓和紧张局势的需要，为此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把一切危机都归罪于美国，以此来躲避对抗的祸害。那种危险是现实的。但是，相反的道路甚至更加危险。公众认为，不必要的对抗会分裂每个国家、分裂我们的同盟，会导致不惜一切代价地乞求和平。没有哪个自重的民主领导人把常备不懈同和平对立起来而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同盟如果成为和平的障碍，就会瓦解。无疑，假如缓和不包括遏制战略，那是危险的。但是，假如遏制政策同和平的观念联在一起，就不可能持久。补救的办法不是躲避努力给共处政策释明意

义；而是要给共处政策赋予能够反映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目标的内容。

对我们的政策深文周纳的批评是说，我们由于强调国家利益而违背了美国的理想主义和民族天性。根据这一论点，美国人必须对总的价值标准加以肯定，否则他们就会缺乏战胜苏联挑战的决心和耐力。换句话说，美国不仅要在地缘政治上反对苏联的蚕食，而且必须致力于在道义上反对共产主义，否则它的政策就会建立在流沙的基础上。^⑥ 尽管我同情这种观点，但是政治家必须把普遍的定理同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对于一场持久的斗争来说，对共产主义的讨伐很难有持久力。思想意识上的成见有可能变成不愿同表面上看来是边际性的挑战进行对抗，把这种挑战说成是不屑一顾，因为它们看来不可能导致最终的摊牌。这种情况先是发生在安哥拉和越南问题上（在巴黎协议之后），后来又发生在波斯湾。在苏联越来越胆大妄为、激进势力越来越抬头的时代，美国若不能对付地缘政治的挑战，必将危及全球的均衡，就同不能维持军事上的均势一样。对思想意识的过份强调将会造成典型的美国脆弱性：关于赎罪的教义会使我们出奇地接受苏联的和平攻势，这种攻势似乎意味着苏联的目的已经改变了。我们的道德信念必须使我们武装起来，正视同持久争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模式两可现象，否则就会使我们麻痹大意。

政治家们不论执行何种政策，总是把宝押在他们对未来的估计上。显然，美国和苏联都指望自己主宰历史。就在一九七三年最高级会谈的前夕，我在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分析了勃列日涅夫的动机。当时尼克松在某些话的下面划上了线（此处用楷体），从中可以窥见他的态度的端倪：

象战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一样，勃列日涅夫把美国看作既是对手、致命的威胁，又是榜样、援助的来源和生存的伙伴。这些互相矛盾的心理状态使

得勃列日涅夫对待我们的政策的动机好恶相克。另一方面，他无疑想作为给俄国带来和平和较美好生活的领导人而名垂青史。这就要求对我们采取融洽和合作的政策。然而，他始终是一位虔诚的共产党人，他把政治视作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想让苏联成为胜利者。他经常努力拉我们加入类似共管的安排——最突出的是他的关于不发动核侵略的条约——以便既维护和平，又破坏我们的联盟和其他联合。

勃列日涅夫几乎一定会在政治局的辩论中继续捍卫他的缓和政策。其依据是，苏联同我们这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冲突，而在这场冲突中，苏联最终将获得好处。勃列日涅夫的赌注是，这些政策将获得越来越大的势头并将展示出无穷的生命力，它们的影响不会破坏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权力和合法地位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相反，我们的目标恰恰是要从远景上达到这些效果。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关键在于，在等待西方被长时期的缓和及展开经济竞争的诱惑捆住手脚的过程中，苏联是否能够把自己的集团纠集在一起。在东欧意见不合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机缘并不比勃列日涅夫的逊色。

总之，我不同意我们的批评家们所说的苏联从和平竞赛中比民主国家得益更多的论调。这是一种悲观失望的论调，与我所认为的实际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要不得的历史性的悲观主义，完全缺乏对美国人民的信赖。尼克松绝对不会有这种悲观主义。在举世周知的一九五九年莫斯科“厨房辩论”中，赫鲁晓夫吹嘘他将要把埋葬我们，尼克松对此嗤之以鼻——尼克松是正确的。二十年来，没有任何变化可以表明在力量和组织上都处于劣势的共产主义世界在漫长的竞争中会超过西方。假如苏联在军事力量上超过了西方，那并非缓和之故，而是由于民主国家未能做显然是必须做的事。那种认为美国人民不能够理解复杂的挑战以及为迎接这种挑战所需的复杂战略，认为美国不能兼顾威慑政策和共处政策，因此必须把其政策建立在残暴的基础上的主张，反映出对民主缺乏信心。

假如西方注意遏制政策，我相信它能够赢得历史性的胜利。苏

联经济制度的弱点触目惊心；它在思想意识上的引人之处已经黯然失色；它的政治基础和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已岌岌可危。在这个国家的六十年历史中，它从来没有合法的、正规的继承领导权。实际上领导人只变动过三次：在共产党的四位总书记中，有两人（列宁和斯大林）是在职时逝世的，第三位（赫鲁晓夫）在一次类似政变的程序中被取代了，第四位（勃列日涅夫）尽管在一九七三年初就已经老态龙钟，但他却还在巩固他的权力。这个制度未能认真对待工业化必然产生的大量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要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不然的话，这个制度就把统治集团变成一个只谋私利的“新阶级”，必然带来不景气，这样就把这些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的政治愿望扼杀在摇篮里。此外，苏联还得应付一个已隐约可见的现实，即非俄罗斯民族的人口逐年增加，很快就要变成多数，这将带来非常严重的调节问题。

苏联经济越来越难对付的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一九七二年，它的增长率估计为百分之一·五，与人口增长率大约相等；这就是不景气的化身。全面规划似乎阻碍了经济规模与增长成正比例的发展。所有刺激的效果都适得其反。工厂的管理人员少报他们的潜在产量，以免生产过程中出现他们控制不了的情况而影响生产速度，妨碍他们完成任务，使自己脱不了身。计划人员不作市场调查，没有衡量消费者（甚至工业消费者）的喜好的标准。在这样一种心中无数的状况下，他们生产的商品既无人需要，质量又低。靠发号施令是不能使质量得到保证的；于是每个管理人员就倾向于尽量不依靠苏维埃制度的其他部门来完成他的指标。（一位东欧的计划人员有一次告诉我，如果生产机车的指标用重量来表达的话，他的国家生产世界上最重的机车；如果用数目字来表达的话，它们是最轻的、最劣等的——不论从那一方面来说，都是采取最便当的方法。）

管理人员没有自主权利，不得不在官僚主义的合法范围内行事：囤积居奇或偷偷地寻找可靠的货源。结果就形成一种荒谬滑稽的局面：完全的计划经济却需要黑市、即秘密的自由市场才能发挥作用。但是这只能扩大共产主义经济的典型弱点：长时期的短缺同长时期的过剩同时并存。⑥

假如坚定的西方政策防止了莫斯科把国内的紧张局势转变为国际危机，那么，莫斯科就很有可能对自己夸下的主宰历史的海口感到幻想破灭。我依然相信，长时期的和平将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多元主义——各自由国家的人民充满经济活力，可以发挥技术革新的才智和创造性。

尼克松政府对东西方关系所采取的实事求是的地缘政治做法，虽然在国内不那么容易掌握，但实际上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尽管不介意利用西方把外交与良好的个人关系同等看待的先入之见，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如何处理富有感情的外交政策。凡是对他们一味采取“谅解”的态度、把外交政策当作似乎是个人关系一样的西方领导人，从来不会有所作为。苏联领导人都是心狠手辣的人。他们在一种无情地清除弱小和安分守己者的制度中占了上风。只有一种巨大的权力欲——或是一种近于狂热的思想意识信念——才能趋使他们投入只有少数人取得胜利、而失败者要遭到灭顶之灾的事业。个人的善意——西方外交的幻想——是不能打动他们的心的。他们的思想意识强调物质因素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以及力量的客观平衡。苏联制度的特点就是权力斗争，在这种权力斗争中，除了强调客观条件需要采取调和政策之外，他们是不会维护对外部世界采取的调和政策的。

这就是为什么不感情用事的现实主义者似乎更能得到莫斯科的青睐（莫斯科的思想意识抵制认为人类可以改变预先注定的历

史进程的主张)。尼克松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不把共处政策与心理疗法混为一谈、不把和平与良好的个人关系混为一谈的领导人是很少的。尼克松的个人不安全之感使他怀疑他是否能对任何人有魅力——尤其是对执拗的苏联领导人。他知道，只有示以相当的风险，使侵略成为看来是不可追求的东西，别无其他办法；他竭力保持力量均衡。但是，即使在他力图使扩张主义显得太危险的同时，他也不怕探索鼓励的措施，以给苏联人进行合作的机会。时间久了以后，随着其他因素发挥作用，建立稳固的和平就可能成为一种信念，而不仅仅是出于某种必要。这位前共产主义仇敌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在莫斯科会晤，探讨了共处的界线。

我认为，尼克松总统正常执政一定会使遏制政策和共处政策双管齐下。尼克松会向保守派显示，缓和是开展思想意识斗争、而不是躲避思想意识斗争的一种手段。他也可以汇集大部分温和分子来支持他的解决具体问题的政策，以此来驾驭自由派的压力。然后，他会利用他所显示的对和平所承担的义务来引导各盟国的自由人民支持一种新的防务方法。

但是，尼克松在其第二届任期之初已不是一位正常的总统。所受的损害是几乎不可弥补的。自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至一九七四年海参崴最高级会谈期间，美苏之间实现稳定而长期共处的机会是战后以来最好的。苏联在中东遭受重大挫折，并且接受了这个挫折；我们之间的冲突虽然确实存在，但得到了控制。我们通过一批协议奠定了广泛的基础。我们汇集了各种鼓励和惩罚的措施，似乎缓和了苏联的行为。检验坚定性与灵活性微妙结合的充分可能性的条件从来没有这么好。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要是美国在那一段令人伤感的时期没有毁灭它的权威的话会有什么作为。国会对地位削弱了的总统的

攻击既剥夺了他进行遏制的手段，又剥夺了他鼓励苏联采取温和态度的措施，使得抵抗无能为力，同时又驱使我们进行对抗，但又没有策略或手段来作对抗的后盾。我们对待东西方关系的国内基础遭到腐蚀。关于犹太人移民的辩论导致了削减一九七二年同苏联的贸易协议，我们在这场辩论中丢失了胡萝卜。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受到限制，致使印度支那遭到毁灭的命运，摧残了总统作为总司令的权力，阻碍了对关键盟友的军事援助，而且几乎使我们的情报机构遭到灭顶之灾，结果，大棒也变得不灵了。总统的权力被削弱，四分五裂的美国抛弃在国外的职责，苏联不可能坐失由此提供的良机。到一九七五年，苏联冒险主义重新抬头，而且由于有了空前现代化武器的全副装备而更加危险。

部分地出于我国内部软弱和苏联威力的原因，对于我们的许多盟友来说，缓和成了保守派所担心的事情：逃避力量均衡的现实，以虚代实。在由于石油价格暴涨而引起经济衰退的时期，好多个欧洲国家把东西方贸易当作救生船，而不是当作深谋远虑的外交政策的工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做给国内的人看的，看起来他们好象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调解人”一样。

就这样，美国因国内的分裂而蒙受了巨大的牺牲。这个过程是从辩论对苏贸易同人权之间的关系开始的。

粮食和移民

外交政策中没有一个问题象东西方贸易那样发生了这么大幅度的立场转变。从尼克松政府于一九六九年上台时起，自由派的批评就迫使我们放宽了对贸易的种种冷战限制条件。^①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还不到六个月，一些主要刊物、学术界人士和国

会中的多数派民主党人（以及共和党自由派）就攻击我们的联系论，即把放宽贸易限制同苏联对外政策的作为联系起来。由于美苏关系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动荡不定，所以我们没有提供任何对苏联出口的特许证。有人对我们说，这种做法是危险的、无效的；我们正在干对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主义强硬派有利的事；同苏联人进行贸易不利于他们，而有利于我们；贸易能促进和平；贸易能加速共产党政权的自由化；而且不管怎么说，要是我们不同苏联进行贸易，那么，我们的盟友也会同它进行贸易。某些保守的实业家在辩论中站在自由派一方，认为把贸易同对外政策利益联系起来的做法是一种想以他们的资财实现他们没有直接利益的目标的非法企图。

尼克松政府坚持其方针。我们于一九七一年五月取得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第一个突破以及柏林谈判于同年八月谈成之后稍微放宽了些限制条件。只是在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之后，我们才同意逐步改善两国关系——仍然时时注意将我们的对策与苏联在对外事务方面能克制到什么程度联系起来。我们只就具体项目逐项提供信贷，从来不根据一个笼统的计划来提供信贷。苏联人必须懂得，一旦出现外交政策方面的挑战，我们相对灵活的做法就立即取消。

后来，公众的基调变了，有时出现了这样一种论调，说尼克松政府竟天真幼稚地想依靠经济刺激来缓和苏联的作为。从尼克松坚决奉行军事遏制政策的决心以及在他第一届任期内所奉行的紧缩东西方贸易政策来看，以上那种说法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我们确实认为，予以谨慎控制的贸易能加强一种建立在均势基础上的共处。在我们看来，经济上的联系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只有在苏联人被剥夺了选择冒险做法的机会的情况下才能奏效。由于我们在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制止了苏联的侵犯行动，所以我们准

备理智和审慎地而不是通过采用将近四年来我们一直予以驳斥的那些办法来试探共处的可能性。

首先在美苏粮食交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九七二年，苏联人利用我们的自由市场，以优惠条件买了价值将近十亿美元的粮食，几乎买走了我们的全部可供出售的粮食，可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件事。^⑥后来清楚了，问题的真正根由不在政府方面，它没有急于要出售粮食，虽然尼克松决非没有看见在选举年做一笔粮食交易可以捞到政治上的好处这一点。苏联人之所以能突然采取这个行动，主要是由于他们相当准确地估计到各粮食公司都会想方设法在粮食销售上互相保密。因此，苏联人（准确地）料到，如果他们到处去订购粮食，那么，这些公司出于赚钱的考虑，在签订合同之前，不会让人知道苏联到底购买了多少粮食。

由于没有政府的监测系统，苏联人的任务减轻了；这一事件使市场经济与外交政策目标相联系的困难引人注目了。任何买主都能进入这个市场，对他们的唯一限制是他们的支付能力。因此，为达到外交政策的目标，不管情况如何，政府都必须有能力对市场进行干预，以支持销售，直到满足其政治条件为止。发放许可证的制度或其他类似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制度对许多企业家——包括一些自认为激烈反共的人在内——来说是最令人讨厌的。

一九七三年初，我们得知苏联的收成可能又一次减产，就竭力迫使苏联人把购买粮食合同延长若干年，作为对我们帮助的一种酬谢。白宫坚持要签订一项为期五年的协定，规定允许采购的最高限额，以便使我国农场主能够制订出计划，同时使我国市场免遭破坏，并使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杠杆作用得以扩大。但这只有在我们推迟粮食出售直到我们的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农场主们对这一长期协定的目标十分满意，但对于为达到这一目标而推迟眼前的销售很不热心。他们得到了很有计谋

的、热情而不知疲倦的农业部长厄尔·巴茨的支持。他作为大学校长，曾经在最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舞台上受过锻炼。当我要求巴茨研究一下他是否拥有法律上的权力来推迟出售（即下达命令要求一切粮食销售都要向农业部报告）时，他回避作出明确回答。几周后，在五月三日，我提醒他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所关心的是：我们不应该让苏联人悄悄地把今年的一大部分粮食囤积起来，而让美国国内的消费者和我们国际上其他买主出高价来购买剩下的粮食。

但巴茨无意正视农民的愤怒情绪。最好还是去责备外交界那些彬彬有礼的工作人员吧！为此，他建议让我去诱使苏联人限制购买量。这是个绝妙的建议；他建议我们不要使用我国的农业实力去对付苏联人，而去要求苏联人为我们做件好事——即购买少于市场条件许可的数量。在当今世界，这种办法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起作用：我暗示苏联人，要是他们自己不限限制购买量，那么我们就要找别的办法来限制出售了。巴茨的建议是不让外交政策的准则去干预苏联购买粮食的一种绝妙的办法。

自由派与企业家组成的赞成贸易的联合势力逐渐地被另一帮保守派和自由派所压倒。他们竭力想把东西方贸易作为对改变苏联移民政策的一种抵押品。他们接受了我们的联系原则，但却对这种原则赋予了最极端的含义——这就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来的打算。贸易上的让步现在已不再同苏联的外交政策相联系（同外交政策相联系的让步是我们所赞同的），而是同苏联国内的作法相联系了。因此东西方贸易在美国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有时严重地动摇着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而又没有提出处理由此而产生的紧张局势的策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付这种挑战的手段是自由派从尼克松政府初期开始就一直迫使我们采取的一种措施，即给苏联人以最惠国地位。

当然,最惠国地位是一种误称,它并不提供特别的优惠,它只是向受惠国提供同我国有正常商业关系的所有外国(一百多个)所享受的那种关税待遇而已。换句话说,最惠国待遇结束了对受惠国的歧视,它允许在保证商业条件的情况下发展正常的贸易,它对我国与外国的商人都是有益的。即使苏联享受了最惠国待遇,它对美国的出口也不会得到迅速而巨大的增长。最惠国地位对苏联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这只是出于一种象征性的、而不是商业性的原因,这表明在经济领域里出现了平等。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们结束了关于苏联借贷债务的谈判(这一债务已冻结了二十五年)。商业部长彼得·彼得逊以他的手腕和才能进行了这场谈判。这为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订这一贸易协定廓清了道路,而最惠国地位则是这一协定的关键部分。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即当水门事件即将爆发的时候,尼克松把这一协定提交给国会。正当他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他挑起了一场辩论,从而使此后的美苏关系蒙上了阴影。

令人伤脑筋的是,我们的批评者所选择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们有种种理由可以自豪的事情,即犹太人从苏联移居国外的问题。早在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内我们就决定通过我们所保留的、经阿纳托利·多勃雷宁通向苏联领导人的这条渠道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加宣扬地进行着,指望苏联人假如没有受到公开挑战,便能在他们国内的管辖范围内更容易地改变他们的做法。从一九六九年开始,我向多勃雷宁提出:我们将注意到苏联真心尊重我国人民对苏联移民问题所表示的道义上的关心这一事实。这种努力是低调的,然而却是坚持不懈的。我们寻求的是行动,而不是口头上的赞成。不知是由于我们交涉的结果,还是出于没有向我们透露的它自己方面的原因,莫斯科改变了它的移民政策。在一九六八年,只有四百名犹太人被准许移居国外,而在一九七三年,移民人数增加

到了将近三万五千人。

此外，我定期提出遭受刁难的人员名单：一些由于安全条例的某些专门事项或由于同苏联当局不合而被禁止移居国外的人。我对多勃雷宁说，假如苏联人听从我们人道主义的呼吁，我国政府就不会去利用那些被释放者的宣传价值。多勃雷宁接受了这些名单，但不加评论。而我们注意到，我们所提名单中的大多数受刁难者都被允许离境了。如有一次，多勃雷宁正式交给我们一些统计表，概述了苏联处理受刁难事件的情况。

至于为什么苏联在莫斯科首脑会议之后马上就中断了这一进程，这个问题就不得不留待公布苏联的档案或发表苏联领导人的回忆录来解答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通过了一项政府法令，对移民强征巨额“出境税”。从理论上讲，征收这种税收是为了偿还苏联为这些移民们提供的教育费用。这样做的实际后果是，移民外流的速度放慢了。从全面改善美苏关系及苏联人由于放宽移民政策而赢得的好感来看，这一决定似乎是令人费解的。

多勃雷宁对此所作的解释是最不通情达理的。他说，这种一般性的决定是一些中级官员作出的，然后由一位本身是技术员的有关部长机械地批准的。苏联的制度并非这样工作，特别是在一个具有外交政策敏感性的问题上。我猜想，出境税可能是对萨达特驱逐苏联军队出埃及的一种恐慌的反应。苏联领导人由于担心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竭力想以某种方式来修补他们的声誉（因为大多数犹太移民定居在以色列）。我把多勃雷宁蹩脚的解释当作是克里姆林宫正在重新考虑这一问题的一种表示。他们正在寻找一只替罪羊和一种脱身之计。

那时，猛虎出笼了。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勇不可当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对贸易法提出了一项修正案，禁止给限制移民的任

何共产主义国家以最惠国地位。杰克逊反对苏联暴政由来已久，他对苏联人的军事增长大胆地提出过警告，而这样做在当时是极不时髦的。在尼克松首届任职期间，在为争取足够的防务预算、体面地撤出越南和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的斗争中，他曾同政府密切合作过。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自己同一个前盟友发生了对抗，而且关系越来越紧张。促使这种冲突变得不可思议和令人痛心的是，在很多问题上，我感到同杰克逊相处比同许多新的盟友更合得来，这些新盟友以不同的哲学眼光对杰克逊的修正案提出了疑问。

直到关系紧张以前，杰克逊的努力和我们的努力是互为补充的。但对他来说，他的修正案渐渐地自行终止了。即使这一修正案被通过，它也绝不能起到杠杆的作用。苏联人绝不可能由于资本主义的立法机关的一个行动而改变自己的政策，他们倒是更有可能采取相反的行动。杰克逊的这一修正案不仅远不能达到鼓励移民的目的，反而在事实上以大批移民减少而告终了。

但进行一种合乎情理的对话在时间上并不适宜。杰克逊突然在一贯反对他的防务及外交政策观点的自由派中找到了支持者。《纽约时报》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曾指责过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应把贸易同苏联外交政策行动相联系的主张是残暴的建议。这家报纸后来突然发现了利用这种联系对于实现从内部改变苏联社会的重要性。《时代》周刊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的一篇社论中开始有了转变，并对联系的主张作了自己的解释：

俄国对本国人民中许多人的公民权利的粗暴压制，向犹太人强征人头税以阻挠他们离开苏联，而且扬言要采取更严格的限制；鼓动别国没收美国的财产，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旨在激怒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危及今后苏美经济关系的发展。

另一家长期以来鼓吹发展东西方贸易的报纸《华盛顿邮报》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却把苏联在一些做法上出现的某些得来之

易的、心照不宣的变化说成是一种实际并不存在的苏联的正式保证：

国会山关于使贸易和移民联系起来的强烈意见为总统提供了他所需的现实根据，使他可以告诉俄国人：为履行他作出的关于关税平等的诺言，他们就应该履行他们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的保证。

一九七三年晚些时候，这场辩论象其他许多辩论一样，也被水门事件搞混了。《纽约时报》九月三日声称，在水门事件与苏联警察国家压迫不同政见者之间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当然，水门事件由于揭发了尼克松—勃列日涅夫结盟来镇压两国的反对派一事而帮了盛行一时的妄想狂的忙：

政府宣布，财政部长舒尔茨很快将率一高级代表团去莫斯科以恢复讨论扩大苏—美贸易问题。苏联的压迫显然几乎没有使白宫感到不安，正如水门事件并没有给克里姆林宫带来多大烦恼一样。全世界现在都已看到，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之间有着一种反对各自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事实上的联盟。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日，俄亥俄州众议员查尔斯·瓦尼克向众议院提出了一项类似杰克逊提出过的修正案，他得到了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唐纳德·弗雷泽和纽约州的众议员本杰明·罗森塔尔等人的支持，他们都是东西方贸易的顽固维护者，并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和亚拉巴马州的众议员约翰·布坎南一起访问了苏联。他们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发表了一份关于《紧张与缓和》的报告，这一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迄今为止最没有特色的。结论说：

我们认为，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尤其是改善贸易关系——对我们两国及对世界和平事业都是有益的。但是总统和苏联人必须明白，当在苏联的犹太人和其他一些人无论受到什么形式的干扰和阻挠而无法行使他们移居国外的权利时，我们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是不能继续下去的。⑥

一方面，我们正不得不去做我们早已大部完成了的事情：鼓励苏联人移居国外。另一方面，越来越明显的是，这一压力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目的，那就是把一般性地批评所谓尼克松在道义上缺乏

敏感扩大到包括外交在内的新的政策领域，而在这些领域里，尼克松的能力至今并未受到挑战。这里并不排除存在轻率，因为当杰克逊先生准备承担同苏联对抗的后果时，他的许多支持者，正如他们被很快证实的那样，并不准备承担这种后果。假如由于给莫斯科下诱饵而导致了苏联冒险主义的增长，那么，有哪些人权运动战士会来支持我们抵御这种冒险主义的决心呢？许多口头上的强硬派在两年的时间内曾有机会来回答苏联—古巴干涉安哥拉的事件所提出的问题。然而自由派—保守派联盟（这一联盟由于在人权问题上的主张相对抗而遭到了破坏）的大多数成员回避对国际安全构成明目张胆的威胁的问题。

在开始掀起反对苏联移民政策这一运动时，幸亏我们所面临的对我国外交政策支柱之一的挑战还不明显，我们是靠实力来对付这一挑战的，以作为我们取消新强加的出境税的一种努力。而杰克逊的修正案的威胁无疑有助于使苏联领导人认为在方针上起了变化。三月三十日，多勃雷宁带了一份声明来见我，这份声明上注着：“密件，送总统。”毫不奇怪，声明称移民政策完全属苏联国家管辖权限，声明抱怨就移民问题发动的一场“吵闹运动”，并指责这场“吵闹运动”是“人为的，不怀好意的。”整个谈话过程是艰难的，但谈话的结局倒并不错：出境税正被取消。苏联的照会称这项新的法律一直是可实行也可不实行的，只有在国家安全出现“非正常”的情况下才会实行。因此，现在只征收那些“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法律公布前就要征收的正常的和微不足道的税收……”

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件通常是不向国会通报的；因此除非苏联人作出例外，否则这个照会在对付杰克逊方面帮不了我们的忙，何况强调这一法律的任意选择性并不排除将来突然规定严加控制的可能，因此我请求允许把这封信通报国会，我远远超出外交惯例，询问了我能否把此信内容通知以色列，我还要求作出更明确的

保证，而不只是一项关于不使用自由选择权，特别是一项事实上停止征税的声明。

苏联人在四月十日作了回答，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了他们对美苏关系何等重视。他们授权我们把勃列日涅夫的信件作为一项正式声明通报国会。至于向以色列通报的问题，莫斯科强调指出，以色列没有资格来讨论苏联的移民政策问题，特别是通过美国来讨论这一问题。而下面一番话不过是一种漂亮的词藻而已：“如何使用我们的信件以及向谁通报信件的内容，这是由总统来决定的事情。”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拟出了一项有关苏联立场、包括不再征税的规定在内的正式声明。我让多勃雷宁过目，以便提交国会。多勃雷宁在四月十六日同意了我的声明。（全文见注⑩）

苏联一正式同意取消出境税，我就告诉多勃雷宁，在执行一九七二年美苏贸易协定方面已不再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事实证明，我是大错特错了。

因为总统的地位日益衰弱而改变了原先作出的一切承诺。在尼克松四月十八日邀请包括参议员杰克逊在内的国会领导人到白宫去以便向他们通报苏联这一照会时，他原来是指望庆祝这一伟大成就的；在美国的压力下，苏联废除了国内法律，并对此作了书面保证——保证我们能向国会通报。尼克松为提供最惠国地位排除了这一重大障碍，而且证明在人权问题上进行悄悄外交是有益的。他也许是这样认为的。

那天，尼克松的感情遭到了挫伤。前一天，他已意识到水门事件可能会牵涉到他的政府的高级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并不想寻求某种合作，而是想找机会表明它的独立性。聚集在白宫罗斯福房间里的立法者们很有礼貌地聆听着，谁也不认为苏联这种政策上的失败是可能的。然而，要避免产生下列印象是困难的，即在他们中间有少数要在一九七四年出来再次竞选的人只愿意提

出问题，而不愿去解决问题。他们被勇不可当的杰克逊联合在一起，对尼克松所遭受的又一次打击袖手旁观。他们冷冰冰地说，苏联人做得不够，苏联人本来不仅应该对出境税问题作出保证，还应该保证签发最低数额的出境签证；他们不仅应该对犹太人、还应该对所有各民族人放宽移民政策。

这个要求令人吃惊。任何人，即使是对苏联制度模糊不清的人都会懂得，要满足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苏联不可能公开保证提出一个限定的数额来，否则就会有无数的苏联公民急于要求外迁。假如苏联对所有民族都作出那样让步的话，说实在的，苏联的制度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就难说了。然而在美国占优势的公众情绪是没有一个立法者会不过问这一要求，而冒在对苏联移民问题上被指责为态度“软弱”的风险。假如国会的压力导致出现僵局，人们又会一直谴责政府未能以足够的精力和信心去实现国会所要求的目标。因此，杰克逊的同僚们保持沉默，而让我们去清理这种混乱局面。这是我们第一次暴露在后来成为水门事件的主题及余波面前：即国会下了一道指令，要采取一种难以实现、并且削弱我们在国外声誉的行动，而又不向我们提供手段去对付由此而造成的紧张局势所带来的后果。

毫无疑问，共产主义国家为增加贸易是准备付出某些代价的。确实，这一理论与我们自己的有关态度是有距离的。但是在我们看来，在国际行为方面（外国在这方面都有确定的利益和法定的立场）较之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在历史上和意识形态上被内部安全问题纠缠不清的国家）的内部事务上取得让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对苏联来说，为了回答一个外国对它公开正面的攻击而改变其国内的作为，将被它的近于妄想狂的统治者视为对他们权势的一种直接损害。这种做法可能会遭到更加拚命的抵制，因为苏联已由于我们私下的外交而放宽了移民政策。

遗憾的是，杰克逊参议员和尼克松政府都专心于同一个目标：增加从苏联外移的人数。分歧在于策略方面。政府对公开的压力能否成功表示怀疑。杰克逊则坚持认为别的办法都不会奏效。有时很难避免得出这种印象：他对象征性的对抗的兴趣同他对事情结局的兴趣一样大。为了实现他当总统的野心，他还竭力吁请一个犹太人选区的帮助——对一个有幸出身在美国本土的公民、一个有名望的人来说，他的这一举动并不是不值得的。

地位已变得虚弱的尼克松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杰克逊的修正案本来是为维护犹太人移民的现有水平而发起的，这一修正案甚至在苏联人取消限制后仍在推行，以实现增加各族的移民数额。由于误解了杰克逊的攻击，尼克松和我对此都无能为力。我们曾认为，他最终将会在能够达到的那些目标上同我们达成某些一致意见，而事实上他抬高了他的要求。

民族的谦恭和团结一致精神的瓦解使争论者们谁也不听谁的意见。政府对此不满，认为这不是对国会的最好态度。我们的批评家触及了我们的痛处，这不是进行认真对话的理想前提。使我感到可怕的是，在水门事件这种情况下，在莫斯科已作了实质性让步的问题上再同它进行对抗是非常冒险的行为。我们达到目的的手段是软弱无力的，我们将在没有公众支持的情况下来处理由此而引起的危机。杰克逊认为，水门事件为他提供了坚持他整个计划的机会，而且一旦他着手干他的事业，他的选区就会对他倍加鼓励。在他的旗帜下聚集着许多人，他们竭力装着对抗的样子，但并不准备去迎接对抗。一九七三年十月八日，我在国际海洋研究所特里斯会议上发表一篇讲话，努力地，几乎是拚命地指出了下列危险：

我们绝不会容忍对基本自由权利的压制，我们将推行人权原则和运用我们的影响去促进正义。但问题产生了，并使这一努力受到了限制。在不刺激

苏联领导在加剧国际紧张的外交政策方面恢复老习惯的情况下，我们又施加多大的压力呢？我们是否准备去对付由于回到冷战局面而带来的危机和防务预算的增加呢？这能鼓励东欧和苏联充分移民或提高那里人民的福利或使他们怀有自由的希望吗？缓和究竟是促进了压迫——还是刺激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种开放性及产生了对这种开放性的要求呢？……

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容易的答案。政府可能低估了我们所取得的让步余地。但是参加一场公平的辩论的人必须承认，这些都是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影响到我们大家的命运。

这是全然无用的。围绕杰克逊修正案展开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四年（我将在第二十二章里详细说明以后同杰克逊进行谈判的情况）。国会逐渐放松了对苏联行为的强制，但没有向我们提供手段以通过增加防务的形式去实现这一修正案（虽然杰克逊本人一直处在为争取一个强大的防务而斗争的最前线）。这是一个更大的模式——越南战争创伤的产物和水门事件的侵蚀——的一部分，它打消了对莫斯科推行一项有效政策所需的刺激和惩罚。

导弹和空想

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是两个集团之间的不可缺少的联系人，这两个集团都是批评我们对苏关系的，一个是忙于人权问题的自由派，另一个是担心同苏联人进行任何谈判的保守派。尼克松曾经是一位伟大的战术家，但他从未想到过，作为一个有名的冷战武士，他最终也会遭到来自他长期在共和党人右翼经营的基地的攻击。但在一九七二年，当他以莫斯科首脑会议及一系列协议而使这一年最终成为谈判年时，他以前的朋友们先是感到为难，后来便感到幻想破灭。有些人从对我的指责中找到了安慰，而另一些人则开始了一场游击战，特别攻击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这个问题几乎是一场空想，它几乎是一种政治手腕，而且在水门事件年代产生

了麻烦的后果。当外国冒险行为正在增长的时候，保守派却四分五裂，从而使国会更加自由化了。

在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有一个革命因素，它反映在苏联和美国的一项协议中。该协议永久地限制双方部署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不得超过两处，相距为一千三百公里，导弹不得超过二百枚。两个大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意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相互的弱点上，但并不是这种前所未有的特点带来了尖刻的批评。引来抨击的是少数人甚至在协定正在谈判时就认为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是那个为期五年的临时协定。该协定确保双方各自的攻击型导弹力量（陆基或海基导弹）冻结在一九七二年年中的水平上。在这五年内曾指望能接着谈判一项长期协定。^①

这项临时协定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战略武库或我们的部队计划。从协定签订之时起，它就是以前十多年来所发展起来的战略关系的写照。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以很快的速度扩大了导弹部队。到一九七一年，苏联在洲际导弹的数量上已同我们相等。到一九七二年首脑会议时，苏联的洲际导弹已超过了我们。然而我们在弹头的总数上仍保持着很大的优势。事实上，这一优势在协定的五年内还将增长。我们已经在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的运载工具来装备我们的导弹，而苏联人还没有对这种系统进行试验。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使苏联人作出了牺牲，假如它能使什么人作出牺牲的话。他们每年生产二百枚新的发射器。他们不得不拆除二百一十枚老式的洲际弹道导弹才能降到双方同意的最高限额。我们早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就停止生产了。我们没有制订新的导弹计划，而且越南战争时期的国会也不会批准这样的计划。对我们来说，牺牲只是理论上的，我们可能受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制约的唯一领域是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顾

固地反对生产更多的当时已有的潜艇发射的海神式导弹和运载这些导弹的潜水艇。他们倾向于等待更强大的三叉戟潜水艇和导弹，而这些至少要到一九八七年或者临时协定期满之后才能准备就绪。^⑩况且，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没有把战略轰炸机计算在内，也没有限制这种轰炸机的数量，而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大占优势的。这一阶段的会谈也没有把我们部署在欧洲和太平洋及它们周围的前沿基地的飞机及运输机、或法国和联合王国(或中国)的核武器计算在内，也没有加以限制。简言之，假如真有不平衡的话，那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没有造成这种不平衡，它反映了十年来所作出的自我限制的决定。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确实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时间，以便能修订这些决定。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并没有使我们放弃制订一项进攻性武器的计划。假如我们要尽力赶上去的话，那么冻结确实很重要。继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之后，我们又大力使我们的战略部队现代化。

但是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观察我们国内这场辩论的人是绝对不会了解这一点的。他也许会认为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在导弹的不均衡方面向苏联人“作了让步”。他也许会作出推论说，这一条约不是缩小了导弹方面的差距，而是使这一差距变成正当的事情了。他也许不会注意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我们自觉选择的力量水平以及在条约有效期内我们又无法改变的这种水平，在被确认为那项协定的一部分时，就突然变成为“危险”的了。

这场辩论本来首先应该围绕我们怎样才能作好战斗准备这一问题来进行，而不是在蒙昧主义的迷雾中反复无常地来回折腾。数量上不平衡的根源在于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理论。按照这一理论，我们的导弹究竟要比苏联多还是少，这并不重要，只要有足够的导弹去毁灭苏联大批的公民和工厂就行了。*同样，苏联只要拥有足够的导弹去毁灭美国的人口

和工业中心，也就被认为具有威慑美国的能力了。战略从而变成了一种经济分析：只要我们在苏联的核打击下保存住足够的武器以便对从理论上推算的大破坏进行报复，那么威慑力量就会保持下去。根据这一推理，我们所需的战略力量被认为可以极大地避免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假如有足够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弹头能保存下来以造成“难以接受的”损失的话，那么，我们的一部分力量，如洲际弹道导弹的弱点就无关紧要了。

当美国占绝对战略优势的时候，一种依赖核报复的理论就发展起来了。在力量均衡的时代，任何一位总统甘愿为保护遥远的国家而让美国人民去冒风险的想法必然会使他失去信任。这种主张忽视了或极大地低估了对不得不下达命令的领导人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遏制作用。在一场危机中，导弹发射计划只给一位总统两种选择：要么投降，要么去毁灭亿万人民（在不可避免的报复行动中，先是苏联公民、然后是我们自己的公民被毁灭）。即使在我们占优势的时代，这一战略在道义上也是成问题的。在进入战略平衡的时代，这种战略有形成一种要么自杀、要么投降的公式的危险。这一切都取决于苏联领导人对于我们的意图是否害怕得不敢冒险。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不顾一切后果的外交下才会出现，因为通过这种外交，那种认为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发动一场大动乱——即使这场动乱将毁灭我们的人民和城市中心也在所不惜——的理论就会变得有道理了。这种态度同我国人民的信念极不相符，而且极有可能在我们的盟友中间引起恐慌或产生绥靖情绪。

*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一九六五年把“确保摧毁”的要求解释为能摧毁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苏联人口和三分之二的苏联工业。三年之后，这一要求降低了。在一九六八年，这一要求被解释为摧毁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苏联人口和一半的苏联工业。^⑬

质言之，不必把苏联在战略武器方面的优势当作关注改变军事平衡的理由。即使美苏在战略武器方面存在均势，这也意味着在整个战后时期以西方安全作为基础的一些设想上出现了一种革命性变化。在核时代的最初二十五年内，保持军事平衡是较为正当的要求。苏联在欧亚大陆的地面部队方面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然而，它在军事上能达到的目标一般只限于摩托化地面运载工具所能进得去的地区，即欧洲的邻近地区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中国。另一方面，非洲、中东的大部分、甚至东南亚是在大规模的苏联军事干涉范围以外的。而且即使是那些在理论上可以被苏联地面部队占领的地区也受到下列三种因素的保护：

⊙第一，美国压倒优势的战略力量足以解除苏联的武装，或者至少把它的反击能力削弱到可以容忍的地步；

⊙第二，美国在所谓的战区核力量方面占据着极大的优势，这些力量部署在苏联周围的每个地方；

⊙第三，在欧洲，美国及其盟国部署了强大的地面力量，对苏联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地面上的一场攻击将会触发美国方面的核报复。

毫不奇怪，战后头二十年中发生的重大危机，不论发生在柏林、朝鲜、中东，还是在古巴，都最终被压制下去了。因为看来把这些危机再向外推移一点所花的代价对莫斯科来说毕竟太大了。

从六十年代开始，军事上的均势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开始时几乎觉察不出来，因为我们的优势太大了。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化的势头越来越大。到了七十年代，已经可以预见到，当苏联人发展他们自己的多弹头时，他们更大型的导弹（用技术上的术语来说，他们的更大的投掷重量）必然会最终改变为更多的具有超级爆炸力的弹头。到那时，我们不仅将失去我们的“反击”能力（我们摧毁他们的陆基导弹的能力），我们的陆基导弹也将变成极易遭

受攻击的目标。整个战后时期的战略均势将会改变：我们要进行一场核交锋的威胁将成为一句空话。假如危机不再造成担心升级为全面战争的恐惧心理，那么危机将更有可能发生。对那些处在低于全面核交火的武装力量水平上的盟国来说，危机将会成倍数地增加。

迫切地改变战略均势本来会促使重新估价这样的一种战略：即使为保护欧洲和其他某些地区，也须依赖全面核战争的威胁。这本来应该导致作出巨大的努力来加强当地的和地区性的常规力量，但不幸的是，在七十年代初，正当最迫切地需要重新考虑老的一套理论时，由于在越南问题上的国内争执而未能这样做。防务预算是反战压力的焦点，而不是深思熟虑地进行分析的焦点。

人们大声疾呼反对新式武器，认为这些武器是多余的，是一种军事精神病的征兆，是一种浪费和危险。参议院仅以一票多数通过了反弹道导弹计划，然而这一计划在拨款过程中被削弱了。C-5A 运输机不断地遭到挑战（这种运输机在后来一九七三年的中东战争中曾拯救过一个盟国）。即使是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我们所拥有的用以抵销苏联在七十年代的数量优势的唯一新式战略系统——也未幸免。一九七〇年，四十名参议员联名签署了一项呼吁书，要求停试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一九七三年，三叉戟潜艇和导弹——那时唯一已准备投产的战略进攻计划——以一票的多数而未被取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最起劲反对军备竞赛的人拒绝采取灵活的军事手段。他们仍然死抱住那些最残忍的核打击目标战略，因为根据核时代的一种奇特的理论，大规模地毁灭公民只需最少量的战略力量。

在这种气氛下，维持即使是从六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武器库也把尼克松政府在越南战争结束时所具有的能量耗尽了。为新的计划（无论核计划或常规计划）取得资金是极其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

关于冻结进攻性武器谈判的建议是由五角大楼本身提出来的，该建议包含在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一九七〇年十月的一份备忘录中。这一事实后来不久就被遗忘了。在七十年代初的那种情况下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在国会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加强我国的军事态势和调整确保摧毁的理论，这样才有可能使灾难性的选择少些。*

简言之，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并非是狡猾的苏联谈判者从我们这里压榨出来的，它所反映出来的状况正是由于我们早先作出的决定和国内的动乱而强加给自己的状况。因此，我们有能力改变这些状况，而政府着手所做的也正是要改变这一状况。政府利用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辩论来重提补充拨款的要求，以加强我们的战略力量——B-1 战略轰炸机，三叉戟潜艇和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更精确的导弹弹头——所有这一切都可望在临时协定到期（一九七七年）以后投入生产。那时，我们将能够在军备竞赛中与苏联人相匹敌，或者能够在新一轮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谈判中讨价还价。

但是，当尼克松的第二届任期开始时，他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权势开始衰落了，而这两种权势都是他同时推行军事平衡和牵强附会的武器控制政策所必需的。国会中的自由派抵制增加防务预算。这不是他们所指望的“和平红利”（在大约一九七五年以前，国会中还没有出现支持大量地增加防务预算的空气），而保守派对武器控制这一含糊不清的概念是不满的。过去的盟友变成了敌人，

* 由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所写的一九七〇——七三年的尼克松外交政策报告一再呼吁改变打击目标，但是直至詹姆斯·施莱辛格作为国防部长进行管理为止，见效甚少。然而荒谬的是，我们对付反击战略的能力的削弱，使得牵强附会的打击目标战略甚至变成了一种冒险的、针锋相对的选择。根据这一选择，一旦这样做了，就不会有合乎伦理的中止的余地。

水门事件毒化了气氛。

事实是，争论各方都有自己的目的。本来，杰克逊和政府如果作为同盟者而不是作为敌手，是能够为国家服务得更好一些的。尼克松政府在一场冷酷无情的国会和宣传机器的攻击面前保住了我们的防务预算，这是很大的功劳。十年之后制订的每一项战略计划（与那些被卡特政府取消了的计划一起）都滥觞于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时期。

但是杰克逊和他的朋友们的担心并没有错，他们担心关于武器控制的理论事实上会加强一些国会议员——主要的舆论制造者，甚至是政府官员不愿坚决对付无情的苏联军事扩张的情绪。武器控制在六十年代成为一种时髦以后，新的武器系统就不仅要排斥自由派的传统的反对意见——认为这些武器系统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已拥有“过多的核武器摧毁”能力），还要克服新增加的反对意见——认为这些武器系统危及了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前途。不错，许多新计划有可能在国会通过，但这不是根据这些计划本身的价值，而是把它们当作一种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包括我在内的各个政府发言人争辩说，这些武器系统是必需的，因为可以在谈判中用它们来进行交易。不管这种说法的策略价值如何，其用意是为了降低进行这些新计划的势头。五角大楼感到难以为这些确认为可以进行讨论的项目鼓起热情，或者说汇集难得的资金。不久，苏联故意玩弄起权术来，从反弹道导弹到巡航导弹，它都竭力系统地利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阻止我们军事和技术上的发展。它加强宣传国会反对新武器的压力，竭力给我国国内的辩论火上加油。

所谓美国新武器削弱了武器控制前景的理论得到了蔓延，尽管所有事实都证明恰恰相反。在一九六七年，即在我们有一项反弹道导弹计划之前，林登·约翰逊总统曾在葛拉斯堡罗向苏联总

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建议双方放弃反弹道导弹。柯西金轻蔑地驳斥说，这是他从未听到过的一种最可笑的想法。到一九七〇年，即尼克松政府在国会为争取生产反弹道导弹而进行的斗争中以一票多数而获胜以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苏联谈判者就拒绝讨论别的任何题目。只是由于我们在谈判中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我们才得以确保对武器的限制应包括既对进攻性武器、又对防御性武器的限制。（相反，卡特政府放弃 B-1 战略轰炸机、推迟 MX 导弹及减缓三叉戟计划并没有加速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或改善其条款。）

就象所有的内战一样，尼克松政府及其保守派批评者之间的冲突是痛苦的。同住一个房屋必然会引起不和，而这种不和则归之于互不信任。对动机的怀疑开始压倒了对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尼克松和我一样，大体上是同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一致的。至于在苏联移民问题上，我们与他不一致的地方基本上是在策略方面：政府认为，假如我们表明对武器控制也感到关切，那么我们就最有可能在国内取得对一种强大的防务的支持。而杰克逊则相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最终将通过制造一种和平已经到来的错误印象而使国会逐渐取消对我们军事计划的支持。

双方本应把力量联合起来以支持一项强大的防务计划和现实的控制武器建议，然而杰克逊在尼克松的传统的自由派反对者的怂恿下坚持摊牌。这些自由派抓住了这场内部争论的机会，但他们那种新出现的在人权问题上的战斗性却没有把他们的压力转到削减军事预算方面来。一九七三年三月八日，尼克松抑郁地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

今天早晨我同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和米尔顿·扬共进早餐。他们两位向来是我们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特别是在有关防务问题上。他们说，就参议院而论，我们在防务问题上将会遇到真正的麻烦。甚至参议员麦克莱伦也

谈到了削减我们的北约部队的问题。他说，他这样说并不是由于他要这样做，而是由于他需要采取这一立场以避免参议院将要强行通过的甚至更大规模的削减。除了参议员杰克逊和约翰·托尔以外，参议院在这些问题上简直是不会支持我们的。

在这一情况下，尼克松努力要使人们相信实际上指责他在同苏联人谈判时表现软弱的那些人的态度是不严肃的，他的这种努力自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而要仿效谩骂——象第一届任期内我们曾经在孤家寡人地决心维护美国的荣誉和信用方面所受到的那样——是困难的。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要使意见吻合也是困难的。水门事件使得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更加深了，而没有求得谅解的任何希望。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僵局

在理论上，我们的防务问题应当是经得起仔细推敲和认真选择的，在外界人们看来这是政府的工作程序。其实不然。许多决定是人身攻击、官僚机构的本位利益、部门之间的交易和国会以及公众压力的混合物，因为在讨论中，甚至在与会者的头脑中，对这些因素往往划不清界线。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使人感到惊讶，无论鹰派还是鸽派都不愿意去理解我们日益消失的战略优势的含义。五角大楼正在执行的计划——三叉戟核潜艇、B-1战略轰炸机和改进了的弹头——总的来说增强了我们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是对付苏联突然袭击的安全保障。但是这些计划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难题：当我们不再拥有可靠的反击能力而且常规力量处于劣势的时候，如何对苏联的扩张主义作出反应。国家的政策打算取消这项草案时——它对于平息国内反战运动倒是需要的——国防部却不敢提出常规力量问题。鸽派认为，即使现有的力量也是多余的。他

们不认为核均势同局部劣势混在一起这种严重情况会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的准备工作无法落实。有很多意见既不是来自对我国长远战略的实际分析，也不涉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究竟是不是解决正在出现的安全问题的正确途径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般说来，国防部总是为它自己的计划辩护，尽管这些计划的论据已日益显得陈腐。国防部一方面愿意支持总统的政策（主张再进行一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一方面又唯恐受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二号成员、参议员杰克逊的责难，因为他的支持实质上是要使国会通过军事拨款。国务院以及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在弗雷德·伊克尔继任署长之前）是关心谈判内容的，这些内容至少在一般意义上说是在苏联人表示可以接受之后确定下来的。因此，他们客观上是在反对经过国会严格审查的为数极少的新的战略计划。

在平常时候尼克松对这些压力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很难说。他有压倒一切的权力。他完成过比使强大的国防同军备控制一致起来要困难得多的使命。不过，这个问题不久就被搁置起来了，因为水门事件使他失去了需要用来专心思考以促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时间。在他第一届任期内，我已经很难使尼克松把精力集中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技术问题上。现在，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一辞职，他就（在五月一日）明确告诉我，要我按照自己的判断对各种方案作出选择。我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把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提交给他。不过，这只是多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程序而已，对所推荐的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人选，他几乎不加思索就批准了。

然而，实际结果是，在政府一级就僵住了。总统的助理们可以对总统的决策发挥有力的影响，但是他们自己不能作出决定，尤其是当一些主要部门意见强烈的时候。在尼克松总统的第一届任期

内，在那些急于要避免承担公开争论的责任（如对越南问题）或无人愿意对重大的改变进程的问题（如中国问题）承担责任的部门里，我的影响最大。

在那个时期，我担任着部际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使我能了解到各个部门的看法，鼓励它们进行分析，缩小选择的范围。这样，我可以在秘密谈判中使用这些了解到的材料，知道在哪些问题上可以得到官僚机构的支持；在哪些问题上会遇到困难。各部门也认为，对于谈判的结果，无论成败，他们都有一份责任。

但是，到了一九七三年，他们发现一些重要谈判是背着他们进行的。因此，谈判失败就可以归罪于我，或者会使我成为任何争论的众矢之的。而即使谈判成功了，也肯定会引起争论的。各个部门不管意义如何，总是把它们要达到的目标提到最大限度。如果达不到，它们不负责。为了解决问题，不可避免的妥协总是需要的，在正常的程序中，他们也会要求这样做。但是现在，这样的妥协却成了谈判者缺乏警惕的罪状。总之，我在官僚机构中已经站不住脚了。

我们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作的准备突然带上了神学色彩。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精心设计一种同苏联完全不对称的力量结构。我们的导弹体积小，用途广；苏联的导弹份量重，威力大。苏联人把发展的重点大部分放在高负荷陆基导弹上；我们则向多样化方面发展，包括轰炸机投掷和潜艇发射导弹。苏联在陆基导弹数目和投掷重量上领先；我们则在多弹头方面领先。这就是我们选定的力量结构。在我整个任职期间，五角大楼的无论文职人员还是军事人员都没有提过一条改变我们力量构成的要求。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后，他们要求的则是，在谈判中要取得完全的对等，这在他们自己的单方决定中不仅从未谋求过，而且还阻止过，甚至这项原则一度被对方接受时，他们也从未打算实

现。

也许我们应当提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暂停一年，以便整顿好我们的知识分子班子。但是，由于官僚机构的阻力和担心把推迟会谈归咎于水门事件从而削弱总统的地位，因而不可能这样做。我们希望照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经验去做，边谈判，边使我们思想明确起来。但是难办的是，囿于国内压力，我们无法在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案中作出选择。这两个方案是：要么大规模扩充军备，通过增强反击能力来迫使苏联就范；要么趁着我们在弹头方面还占优势时冻结现状。

国防部的看法截然不同。它愿意在实际上保留我们已经决定要生产的发射器数目（虽然这意味着不相等），但不愿意把这些数目写进协议。它坚持主张，作为一项协议，必须规定武器“总数相等”，或者各种武器系统相等，武器系统包括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这是个象征性的目标，它反映了国内的压力，而不是在政治上和战略上进行分析的结果。^{*}凡是不愿意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的目标，靠谈判是实现不了的。这样的建议实际上是要苏联单方面实行削减，而不牺牲美国的任何一项计划，或者苏联如果不接受这项建议，也不要威胁到美国军事力量的加强。至于如何去完成这样的任务，得由我去伤脑筋了。这使我想起了

* 总数相等的战略意义主要取决于相等的水平。例如：最好是使导弹投掷重量相等。六十年代各方自行决定的结果使苏联导弹的投掷重量比我们大三倍。另一方面，我们的机载导弹弹头重量则可弥补这一差距，而且绰绰有余。要想限制投掷重量，寻求对我们最有利的规定，就要呼吁限制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他们的辩解是没有道理的：轰炸机运载的投掷重量实际上是不适于突然袭击的，因为飞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目标。从未得到解释的是，为什么苏联人会接受我们的规定？既然已经公开了计划，我们又是怎样去说服他们接受的？假定限制相等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投掷重量最高不得超过苏联的水平，而不限制分导式多弹头系统，那么，双方都将发展第一次打击能力。这就违反了军备控制的各项规定，因为，危机发生时，它将刺激各方进行第一次打击。但是，如果我们不扩充到苏联的水平——现在还没有计划或者建议要求这样——，

一个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位将军曾声称他找到了对付（德国）潜艇的妙计：只要把海水加热，使敌人热得难以忍受，不得不浮到水面上来。人们问他，如何去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业绩呢？他回答说：“我已经给你们出了主意，至于技术上的事该看你们的了。”

国务院走的是另一个极端。它建议干脆停止一切分导式多弹头的试验和部署。这就用不着再谈判了，因为这会把苏联完全排除在分导式多弹头领域之外。五角大楼对这项建议反应冷淡，因为这样做会迫使我们放弃正在研制的美国唯一的新式导弹——三叉戟计划。对分导式多弹头的这种限制据说也会引起一大堆如何进行核实的问题（仔细研究证明核实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这是我入阁以来第一次在官僚机构中受到孤立，也是第一次遇到如此荒谬的事情。

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将近七年中，这种秘而不宣的争论一直在进行着，与此同时，国防部也一直在依靠行政决议的手段不断削减我国的力量，虽然它口口声声要求相等。例如，一九七三年，国防部在它发表的五点计划——这项计划既无白宫的方针，也未提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打算让大约一百架B-52轰炸机退役，仅仅生产二百五十架B-1轰炸机来取代其余的B-52，使我们大约二百九十个单位的战略力量的总数下降。这样就使苏

“相等”就仍然是纸上谈兵；只有苏联人才会得到第一次打击能力。这就更加危险，苏联会利用战略上的不稳定来解决常规力量的劣势。如果我们头脑发昏，双方的最高限额都以苏联的水平为准，无疑是易于谈判的，因为这毫无意义；它限制不了苏联的计划，也给了我们自由，虽然我们不大可能利用这种自由。如果在另一个方向上使用相等这概念——让苏联人降到我们的水平上来——则是痴心妄想。他们会要我们给他们些东西作为回报，例如要我们继续接受发射器数量不相等等等。国防部对总数相等的近乎宗教崇拜的态度把这种可能性排除了。否则，我们会有大规模扩充军事力量的危险。在越南战争接近尾声和水门事件刚刚开始的热气中，无论哪一种办法国会都不可能采用。我们万幸保住了已有的东西。

联凭空受益，而我们本来可以在谈判中至少换取点互惠。

看来好象很怪，政府的一个部门竟然可以不经过白宫批准而自行作出引起这样后果的决定。但从技术上看也并不奇怪。白宫在决定从何着手干预预算程序问题上也面临着严重的抉择。我们的国防预算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全部开支都大得多。在早期，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还可以发挥相当大的影响——也只限于在预算总额方面。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如果在细节上进行干预，或者具体说明我们在战略武器谈判的交易中需要保留哪些武器系统，就一定会冒犯国防部和穿军装的人。他们认为，对各行政部门如何分配已经批准的经费提出初步意见是他们的特权，在这方面他们十分敏感。

六十年代，五角大楼对于那些它认为是只会坐在椅子上空想的文职战略家们的干预十分恼火，甚至达到不欢迎高一级审查它的计划的程度。一九七一年，我向国防部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武器的成本会比美国同类武器的成本低得多。这个问题直到五年以后我离开政府时还没研究出个结果。全面审查海军的战略和需要的要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联合参谋长们每次都是采取故意拖延的惯用手法来抵制执行要由国防部以外的官员来审查他们详细计划的原则。直到一九七三年施莱辛格就任国防部长后，我们才得以执行早在一九六九年就提出的对我国战略力量状况的审查。不过这时，苏联战略力量的增长已使我们的选择余地大大缩小了。

尼克松当政初期，我以为成立包括各州和各经济部门在内的国防计划审查委员会就是一大进步。国防部长莱尔德支持这个委员会，因为他想让那些要求增加社会服务经费的人们知道从国防预算中拿走这笔钱的严重后果。我也非常赞成。我想，这样我可以有机会在战略理论和力量水平方面及早发挥影响，否则久而成

习就不好办了。但是后来发现，原来莱尔德更多地是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而不是我所想的目的。莱尔德需要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只是为了避免大量削减预算。直到夏季，白宫才看到这份十月就要最后定稿的预算的概要。到这时，各行政部门之间已经进行过各式各样的交易了。首先要勾去的是那些被认为是过时的武器，部分原因是，取消这些武器就可以加强整个新武器系统的地位。未解决的问题极少，而且通常是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这样也可以使总统满意，因为他总是坚持要最后拍板，不使他的下属在战略上进行认真的审查。于是，作为我们预算程序的一部分，我们继续把那些本应用来当作交易筹码的东西奉送给苏联人——我虽然感到沮丧，但说了也不起作用；预算的周期同谈判的周期简直不协调。

一九七二年十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时的环境几乎使人无法思考问题。苏联人建议把美国的弹道导弹潜艇从前沿基地撤走，相互“遏制”新式战略武器的发展。我国政府既然还拿不出什么主张，又忙于总统选举和越南问题的最后谈判，我们只好把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拿来搪塞；我们建议举行“探索性”会议。其目的正如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给参加会谈的代表团的指示中所说的，是为了使苏联作出反应，订出一份“工作计划”，总之，是为了确保不要发生许多争论性问题。

我们的代表极其谨慎地执行了这些指示，我们自己的内部意见分歧使我们必须如此。理论性的文件推来推去达半年之久，我们的精力都消耗在关于选择方案的近乎学究式的辩论中了，即使我们对这些方案取得一致意见，也同谈判的实际情况毫不相干。

一九七三年初，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日内瓦复会，彼此都提出了最大限度的要求，根本没有去认真地弥合分歧。如何弥合分歧必须等待双方的政府去审查。我不知道苏联领导是怎么考虑的，

如果它们有什么考虑的话。至于我们，在一九七三年二、三月间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核实小组会议*上才弄清楚，任何妨碍我们的分导式多弹头计划的建议都有政治上的界限。国务院倾向于建议暂停分导式多弹头的试验。国防部副部长威廉·克莱门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将军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虽然我们仍然能够用单一弹头来试验我们新式的三叉戟导弹，但是，如果没有分导式多弹头，三叉戟计划就会失去其理论基础，就会被国会枪毙掉。新任国防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在这方面无疑是正确的；按照我们的预算程序，暂停试验就差不多等于从预算中勾销这一武器系统。凡是打算通过谈判来禁止的东西是无法得到拨款的。

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八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总统必须决定是否应当把限制分导式多弹头列入我方的方案，如果列入，我们采取哪种态度——是禁止苏联大型导弹安装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还是在两三年内冻结并且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试验或者其他等等？对于限制苏联多弹头的发展我们又准备付出何种代价？这次讨论完全不着边际，仅仅重申了过去那些纠缠不清的老问题。尼克松的对外政策顾问们并不了解，他的全部精力早就用在解释水门事件上了。而对于投掷重量、武器总数或分数（每个发射器上的弹头数目）等技术性问题的讨论，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总统也是感到厌烦的。他的烦躁的表情，不时地讲些挖苦话，表明他只是希望会议在结束时不要逼他表态，免得在已经使他够伤脑筋的国内问题上又加上对外政策方面的争论。

* 核实小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负责制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计划，由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的代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组成。我担任主席。

尼克松具有一种敏锐的本能，知道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最合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人愿意进行认真的讨论。我们自己的许多想法也大多是探索性的和理论上的。尼克松比谁都懂得，一位总统决不应轻易消耗政治资本，除非确有把握成功。所以，这次会议最后作出的是一项所罗门式的决定：拟出一份新的各局间的共同文件，把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选择方案加以归纳或概括。在政府内部意见如此纷纭的情况下，即使把分歧意见确定下来也不是件简单的事。不发生水门事件，要解决这些分歧也得好几个月，况且现在水门事件已经发生，这个问题势必要推迟到福特总统任期内去解决了。只要不准备给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作出什么规定，尼克松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就我国的战略目标大发议论了。在会议结束时，他夸夸其谈地讲了一通，说我们决不能成为二号国家，我们一定要为保持至少是平等地位作出必要的一切。但是，他并没有提出用以衡量在战略计划上或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是否达到了这一要求的方针。而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华盛顿有分歧，莫斯科也同样有扯皮的事。美国在辩论“不相等”问题，莫斯科也准会有它自己要辩论的问题。但是归根结底，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没有限制住美国的计划，倒是制止了苏联的若干项计划。此外，苏联人尚未进行过分导式多弹头的任何试验，无疑他们原来并不准备就限制这种武器进行认真谈判。

由于勃列日涅夫急于要缔结防止核战争协定（下面将谈到），使这种限制的份量加重了。勃列日涅夫担心，同时就两个问题加紧谈判会耽搁执行他最宝贵的计划项目。有时他甚至企图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加速这项协定的缔结。这反映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初我同多勃雷宁的两次谈话中。多勃雷宁声称，苏联军方认为，在现有的协定还有四年才到期的情况下，看不出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有什么意义。他说，我们一定要了解，靠着苏联的官僚主义程

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展一定是非常缓慢的。勃列日涅夫要想亲自过问，就需要以能缔结一项防止核战争协定为借口。

努力说明这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需要找个借口才能参与苏联官僚机构的决定，不过是把厚颜无耻打扮得漂亮些罢了。一旦开了头，多勃雷宁便滔滔不绝地借题发挥起来，说勃列日涅夫是如何受到性情暴躁的同事们从四面八方对他的攻击，使他不得开交等等。据多勃雷宁说，苏联国防部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没多大用处。他说，国防部总是把最无想象力和最无事业心的将军派到谈判代表团来，他带来的指示都是妨碍外交部的倡议的，而外交部要在技术上负责谈判。如果苏联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要这位将军去请示一些新的指令，他总是拒绝，并且争辩说，如果有新的指示，国防部自己会发布的。据说，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在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同多勃雷宁的一次谈话中把国防部的这种态度概括为：“如果你想知道我个人的意见，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想要我的正式意见（作官方表态），标准的回答是没有。”

认为苏联首席谈判代表不是由政治局委派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苏联政府的干部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总爱争吵，这种看法倒是符合美国对克里姆林宫里同“强硬派”英勇作战的“鸽派”的设想。一九七三年，尼古莱·奥加柯夫将军被任命出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他后来成为苏联的参谋长，这个职务不大可能给一个二流人物——虽然我并不怀疑，苏联军人同全世界的将军们一样，对军备控制的种种新奇的理论存有疑虑。

我方谈判小组提出的带有希望的报告，不时给陷于停顿的日内瓦谈判带来活力，我们这个具有美国谈判家们的优良传统的小组不久就从自己的成就中尝到了甜头。三月二十七日，我们这个小组报告了据说是苏联代表团一名成员的暗示，大意为，如果我们同意使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在发射器总数上的不相等继

续下去，那么，苏联人就可能会同意把每方装有分导式多弹头的一种型号的陆基导弹限制为三百到五百枚。这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一项不令人感兴趣的建议。这可以使民兵式导弹受攻击的日子晚些到来，可以阻止苏联人在他们的重型导弹上安装分导式多弹头。而且我们从来不打算使我们自己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超过五百五十枚。另一方面，这一建议听起来也没有苏联公开立场中具有的那种复杂和抽象的特点。多勃雷宁从未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而他是苏联人提出那些他们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的渠道。当我向多勃雷宁询问时，他也没有回答。这大概是哪位性急的美国代表把那位苏联代表的复杂的说明中的一句昏话理解为同意，而且一厢情愿地说成是苏联的建议了。这大概不会是第一次。

我们从苏联方面得到的正式建议是一个非常片面的建议，以致使人感到怀疑，任何一个严肃的人怎么可能相信这样的建议竟然是要交付讨论的，更不用说拿来谈判了。很简单，苏联人建议，在执行新协议期间，禁止任何新式战略武器。为了方便起见，他们允许武器现代化继续下去。说也奇怪，苏联把正在试验的每种导弹（我们清楚地知道有四种新型导弹）都说成是使现有的导弹现代化，这真是巧合。既然我们十年来才刚刚开始研制第一种新型战略导弹（三叉戟），那么，这项计划就别想在政府里受到心平气和的分析。

一九七三年四月底，我正在准备去扎维多沃，在四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 and 三十日我连续召开了三次核实小组会议。没有一个人提出新的看法。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们的唯一立场是，各部类和各武器系统的总数要相等，不管我们的力量构成同苏联的有多么不同。多年来，听到的一直是苏联的重型导弹如果装上分导式多弹头是如何如何危险，而现在我们听到的却是，制止苏联安装分导式多弹头“价值不大”。那么，我就要问：“果真如此，

有谁能解释现在进行的谈判究竟为了什么？”克莱门茨对这种立场稍稍作了点修改，他说：苏联的 SS-9 导弹装上分导式多弹头的前景并不那么可怕；制止它“也是合乎需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付出过高的代价”——换句话说，不要以放弃总数相等这个谈判的目标为代价（为此，在没有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时，国防部一直不提出建设计划）。但是，如果对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系统不加限制，那么所有这些基于以减少进攻者取得好处的办法来给第一次打击泼冷水的美妙的军备控制理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在四月二十五日的核实小组会议上讲了我的担心。我说：

同等数量的相同的分导式多弹头武器系统会使进行第一次打击者得到巨大的利益。那不过是摆摆样子，并非真的相等。它会助长第一次打击。数量相等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如果你的弹头数目五倍于导弹，而打击的目标又少于导弹数，那就将鼓励第一次打击。这将成为一种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国防部希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批准全部现有的计划，而国务院与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却准备放弃一切新计划，或者要求以“调查”的名义来一次摸底。要我们在没有自己的方案——在明显地未能取得内部一致之后的确如此——的情况下去进行调查，当然会遭到我的嘲笑。

不知道自己的需要，还去调查什么呢？我倒是宁肯从我们的而不是他们的立场出发。如果我们自己的立场还不如他们的立场对我们有好处，那真是对我国政府的能力的可悲写照。

由于各单位无法取得一致立场，总统又被水门事件缠住动弹不得，所以五月三日下达给我方出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的指示是各部意愿的大杂烩。各个单位（一家不漏）都把自己心爱的计划塞在里面了。建议要求总数相等，运载工具最多不超过二千三百五十枚，这个数字比苏联现有的数量约少二百五十枚，比我们的约多一百五十枚。建议中还包括冻结和禁止进一步试验陆基

导弹分导式多弹头。这就干脆排除了苏联人在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上安装分导式多弹头的可能，而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占它现有总投掷重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对我们自己的任何计划都无大妨碍。换句话说，我们拿四百五十个弹头（装在我们将要放弃的一百五十枚民兵 III 式导弹上的）至少换取苏联五千个弹头（要看它们在每枚陆基导弹上打算装多少弹头而定）。毫不意外，这样的建议很快就湮没在大量的片面性建议之中，这样，各方都可以用这些片面性的建议去取悦于自己的官僚机构——它正在考虑有无实际的必要去作出使人伤脑筋的决定。

一九七三年五月我抵达扎维多沃时，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已陷入僵局。我就总统指示中关于分导式多弹头部分向勃列日涅夫进行了试探，因为这份文件虽然已经送到了日内瓦，但是尚未下达到那里。（五月四日，我去莫斯科途中在哥本哈根机场会见了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干练而稳重的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要他把这一部分抽出来，以便我把它作为总统的一项特别建议交给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性情粗暴但不愚蠢。他不会被这些明显的手法所欺骗。对于排除苏联在它们最好的导弹上装置分导式多弹头的计划，他可能什么也没听进去。我向多勃雷宁暗示了另一项计划——我只是好象“自言自语”地说，苏联答应不在它们的重型导弹上安装分导式多弹头，反过来，美国也保证不研制三千多公里射程的轰炸机发射武器（巡航导弹）。这项计划遇到的麻烦是，五角大楼并不情愿研制或生产这样射程的武器，因为这种武器计划太大，不能使我们的建议对苏联人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多勃雷宁同勃列日涅夫进行了核对，勃列日涅夫表示了某种兴趣，但是他说他必须同军事部门磋商，因此，在我离开扎维多沃以前不能作出决定。后来他再未谈及此事。几乎可以肯定，在苏联完成分导式多弹头试验计

划之前，他不准备讨论对分导式多弹头的任何限制问题。

在六月的首脑会议上，我们又退回到签署一些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总原则”的意见上来。这是外交人员在无法赞同、又不愿承认僵局时惯用的回避手段，用以巧妙地寻找一些使各方都可以保持自己原来立场的方案。四月六日在日内瓦，苏联人提出了一项草案，在总原则的幌子下，重复了他们单方面的立场。我们未予置理，既不用他们的草案来谈判，也未提出替代方案。四月二十七日，多勃雷宁交给我一份日内瓦协议草案的摘要，仍然充斥有利于苏联的内容。例如，它强烈暗示，我们驻欧飞机应包括在总数内。这样势必迫使我们要么削减战略武器的数量（以弥补驻欧飞机），要么撤出一部分参加北约防务的空军力量。这对我们的北约盟友来说，从战略角度上，从他们不愿意被人把他们的安全问题作为没有他们参加的谈判的主题的角度上，都是件使人伤脑筋的事。与此同时，苏联人塞进了一项实际上是要我们结束同英国的核合作的条款。他们使临时协议中的数目永久化，这样苏联无需作出任何补偿的让步就使发射器的不相等固定化了。我们不赞成执行这一计划。

我们的反建议草案是不会被历史学家当作范本载入史册的。我们的草案企图采取中立态度，把各方的选择方案都摆上。它巧妙地满足了苏联人要按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使用的同一方案把我们的前沿基地系统包括进来的愿望：保证不会有通过第三国进行包围的事。这就暗示着，我们部署在欧洲的能打到苏联的武器的数目不会有很大增长；不过也不要求把现有武器计入总数。我们的草案中取消了永久冻结临时协议中的不相等数量的建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排除前沿基地系统而进行多年斗争之后，现在似乎不经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这份谈判文件上就已经在前沿基地系统问题上达到目的了。）

于是一份根本不能成为外交史或军备控制史上里程碑的“总原则”声明问世了。这份文件把“同等安全”视若神圣原则。它可以有各种解释：不管海外基地状况如何的相等总数和相同分导式多弹头系统；以不相等的总数换取不相等的分导式多弹头系统；或者各方政府可能设想出来的其他什么方案。稍微具体一些的条款是，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应当包括对“质量上的”发展的限制；这是要求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对分导式多弹头作出某种限制——因为尚不具体——的委婉说法。最具体的规定是，双方将谋求在一九七四年底以前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葛罗米柯对此表示担心，他怕到时候实现不了（哪怕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会损害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定出一个期限是制止我国政府内部和在日内瓦无限期拖延的唯一途径。（就在限期快到时，我们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签署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

进行这次秘密勾当的人中，无论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没有一个接触到了重要的现实。在七十年代，我们将失去残存的反击能力（摧毁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的能力）。八十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的陆基导弹将变成最易遭受攻击的，具体时间将取决于苏联人在陆基导弹发射器上安装多弹头和改进其精确度的速度。如果各方拥有等量的装有分导式多弹头的运载工具，如果存在着“自由配置”（这是五角大楼的又一神圣原则，允许各方决定自己力量的配置），那么，可以肯定，苏联人在他们的陆基导弹上安装的分导式多弹头会比我们的多得多，因为他们的陆基导弹比较大，可以安装的弹头要多于我们在民兵式导弹上装有的三个弹头。其结果必将使苏联拥有不可抵挡的能力来摧毁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美国无论怎样加强其他种类的战略武器都无济于事。我们唯一的新计划就是三叉戟核潜艇，但是它不会增加我们的反击能力，因为潜艇发射导弹系统总的来说还没有精确到

能够命中导弹库的程度，而且存在着同时发射的技术问题。

即使弹头总数相等，苏联人迟早都会把他们日益提高的反击能力同传统的常规武器的优势结合起来，以改变地缘政治上的均势。一九七三年六月首脑会议开过后两周，苏联人就在他们的SS-17洲际弹道导弹上进行了第一次分导式多弹头试验，SS-17是用以取代已过时的SS-11的新型导弹。战略上的变化现在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三日，我写信给比尔·克莱门茨，坚持认为，远程巡航导弹的研制要继续下去。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取消这种武器，既有预算上的原因，也是为了防止以它为借口砍掉空军心爱的新型轰炸机——B-1。（后来的事件证明，这些行政部门的细心盘算并非总是目光短浅所致，而正如俗语所说，是久经世故的结果。卡特政府取消了B-1轰炸机，它确曾极力主张，有了用现有的B-52轰炸机携带的巡航式导弹，就不需要B-1了。）我向克莱门茨争辩说：“远程轰炸机发射的巡航导弹计划是有战略意义的，对我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地位有好处。”克莱门茨极为赞成，巡航导弹计划被保住了。*

这样，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双方又都在发展新式武器——我们是巡航导弹、三叉戟潜艇和B-1轰炸机；苏联是四种新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和分导式多弹头系统。在美国，我们的内部分歧妨碍了明确阐明根据重要的政治原因确定的战略和军备控制理论，其结果，每个问题都变成了哲理性的或者技术性的了。直到一九七五年，国会才开始认真看待苏联的威胁。战略上的恐惧感正在增长，八十年代，苏联人也许会利用反击能力（或者只是其战略武库的扩大）同局部优势相结合所提供的“窗口”，来

* 一九七三年虽然保住了远程巡航导弹，但是两年后我还是没有逃脱所谓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不重视这种导弹的攻击。

利用或者制造危机，坚持要实现有利于它自己的地缘政治上的变化。如何把防务同军备控制联系起来，如何在谈判互相限制的同时保持住我们的实力，仍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之一。

防止核战争协定

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与贸易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辩论同时进行的还有另外一场谈判，这就是导致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外交活动。从策略上说，进行这场谈判是相当微妙的。苏联耍了危险的花招，想诱使我们放弃使用核武器，但被我们巧妙地挫败了，因为自由世界的防御毕竟还是依靠核武器的。另一方面，这充分说明了在外交上同苏联打交道是很需要些耐力的，当整个事情过去之后，我们虽然避免了危险，但几乎没有取得什么积极的结果。

苏联的外交没有休止的时候。他们提出一项议案作为和缓紧张气氛的重要贡献；只要我们接受了，那就是“改善气氛”。但是往往一个协议刚刚达成，克里姆林宫接着又提出另外一个议案，而且是以其特有的固执，每次都提出所谓不接受他们的议案便是破坏气氛的同样论据，以求得协议的实现。

这些协议的由来是难以捉摸的。它们可能代表一种深奥的战略设想，可能是出于习惯和惰性，也可能代表了政治局中一个派别进行某种秘密活动的旗号。不管他们的直接动机是什么，一旦他们提出倡议，就会以近似疯狂的劲头来寻求通过。从一九七二年起，我们就领教了苏联这种高压手段。一九七二年四月，我秘密访问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把我引到一边，提出一个他高兴地称之为“和平炸弹”的建议，即关于美苏互不使用核武器条约。^④这时正值北越春季攻势的高潮，当时尼克松政府几乎就要决定，如果河内的

军事进攻得逞，就取消最高级会谈。我们还下定决心，在此后的几天之内如果这一攻势没有被阻止，就恢复对北越的轰炸。既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依靠美国的核保护，苏联在这样一个阶段提出不使用核武器，真是厚颜无耻之极。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占优势的情况下，这样的行动将使我们的盟国感到沮丧，并使中国深感不安，中国将会把它看成是美苏勾结的一个可怕的征兆。

另一方面，我们适时地选择了时机，以避免遭到生硬的拒绝。我们的战略是，通过把莫斯科与河内分开的办法获得放手结束越南战争的权力。因此，我们不惜再次放出与苏联利害攸关的诱饵，以便在我们对越南增加压力时，苏联不致掉过头来反对我们。我们由此开始运用一种微妙的策略：既要设法给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一些希望，让他们感到提案有可能取得某些进展，同时又不不要使我们对他们的提案毫不走样地承担任何义务。我们第一步是拖延时间，我把提案搁置一边，实际上是把它推迟到最高级会谈去讨论。

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尼克松下令恢复全面轰炸北越和在港口布雷之后，我们正在为取消最高级会谈作准备，五月十日多勃雷宁若无其事地问我，正在美国访问的苏联贸易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是否会受到总统的接见。不用说，我们第二天就安排帕托利切夫会见了尼克松。后来当记者们焦急地催逼帕托利切夫发表公开声明时，他惊异地瞪大眼睛，避而不谈最高级会谈是否仍然举行的问题。他面带笑容地问道：“你们有什么怀疑吗？”仿佛对苏联一个盟国的轰炸和在港口布雷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

但是，苏联从来都不错过提出他们提案的时机。就在第二天（五月十二日），多勃雷宁拿出了他的提案。他温和地说，为了准备勃列日涅夫同尼克松会谈，他的上司交给他一份协定草案的要点，只要方便就可以签署。草案的第一段规定美国和苏联彼此不使用

核武器。第二段断然说，双方“应防止”出现因第三国的行动而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局势。这份草案是强硬的。它要求我们放弃北大西洋公约的军事战略，同时宣布成立一个实际上的美苏军事联盟，以便孤立中国或其他有核抱负的国家，并把我们的意志强加在他们头上。

多勃雷宁交来的这份草案，虽然是专横的，但却提出了一个策略问题。尼克松同我一样，都希望把会谈进行下去，以便再给苏联增加一点刺激，在我们粉碎河内的主要攻势时，使苏联能够保持沉默。可是我们接受苏联的草案又不可能不冒严重的风险。因此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复杂的击剑比赛，在这场比赛中，我们以花式步法力图避开典型的苏联冲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迟早总得采取一个明确的立场。

在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期间，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勃列日涅夫在协定问题上对尼克松进行了抨击。尼克松和我都认为，对这个协定尼克松应当不表示什么意见，但同时又表现出似乎有点兴趣——作这样一种姿态，尼克松是一个老手。如果勃列日涅夫逼得紧了，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对案，这个对案强调了我们一贯的思想，即和平最终还是要依靠超级大国对自己行为的克制。我们避开了苏联关于在战争中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建议，而用一项在和平时期放弃使用武力威胁的条款来代替它。我们也不承担协调美苏针对第三国行动的义务，而只是表示尽最大努力保证第三国的行动不导致美苏之间的核战争。勃列日涅夫未加评论地收下了这份文件；然而葛罗米柯对此却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不会不意识到我们是在拖延时间。尼克松泰然自若地建议，两个草案之间的任何分歧都可以交给多勃雷宁和我去处理，这就使他自己摆脱了尴尬局面。至于如何去调和这些不可调和的分歧，他没有向感到莫名其妙的苏联人解释。而我，却知道尼克松在大选前不想再过问

此事了。

但是苏联却有着不同的时间安排。七月二十一日多勃雷宁返回华盛顿后，就出面执行我们各自的上司交给他和我的任务。他说，很遗憾，美方的草案行不通。他拿出了莫斯科帮助起草的一份新的草案。这份新草案保留了双方不使用核武器的内容（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承担的义务），但却增加了一条，大意是，协定的任何内容都不影响现在对第三方承担的义务，或集体防御的权力。这一点似乎是照顾了我们的盟国，但是却更加突出了没有结盟的国家容易受到攻击这一点，比如中国，它的领土完整对国际的平衡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仍然需要时间来结束越南战争。为了拖延时间，我对多勃雷宁提出了三个假设性的问题。苏联新的草案如果被接受了，美国是否有权使用核武器保卫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双方是否有权使用核武器保卫传统的朋友，而对这些朋友我们并没有承担正式条约规定的义务（比如，在中东）？双方是否有权使用核武器保卫一个不结盟的大国（这个大国一旦丧失了独立就可能影响全球的平衡）？我举印度为例，可是苏联领导人一定毫不怀疑，我们实际上指的是中国。

我没有期望正式的答复。当然，我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是因为我以为如果苏联不愿答复，那么这个日益令人感到尴尬的协定就会被埋葬掉。使我吃惊的是，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收到了苏联的书面答复，他们恬不知耻地亮出了他们的意图。下面是对我三个问题的答复：拟议中的协定并不排除在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和华沙条约国家卷入战争时使用核武器；然而必须限于在盟国领土上使用；禁止对美国 and 苏联的领土使用核武器。任何一方都不得在中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更不得在一个重要的第三国诸如印度遭到常规武器攻击时使用核武器。

对于美苏共管，很难再草拟一个比这更加露骨、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定义了。这个拟议中的条约将保护超级大国甚至在欧洲战争中也不受核武器的破坏，而同时却肯定会使各方的盟国遭到蹂躏。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助长欧洲的中立主义或贬低联盟的价值了。至关重要的中东防御将不得不依靠常规武器，而在常规武器方面我们则处于劣势，在远距离战场的增援能力方面更是如此。所有其他国家只好听天由命了。例如，中国将会受到摆脱了美国核武器反应的苏联军队的攻击。按照对条约的这种解释，我们的联盟将四分五裂，友好国家对我们的信任将会崩溃。

这样一些主张不可能不受到我们的反对。尽管我们希望赢得时间，但我还是在同一天（九月七日）就作了答复，以打消他们对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抱有的任何怀疑。我交给了多勃雷宁一份文件，重申了我们愿意探讨在国际行为中实行克制的普遍原则。但是，同时我们也强调了我们不准备逾越这个限度：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避免任何带有由我们两国共管含义的提法。——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两国间的协议不应带有任何这样的含义，即只排除我们两国之间的核战争，而仍保留针对第三国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在我们集中精力防止核战争的同时，不应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仿佛以常规手段发动的战争是合法的。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以往的协议，不论是结盟的或者是承担其他类型义务的，只要是旨在保卫和平和安全的，都应当由于我们两国之间有关具体防止核战争的新协议而得到加强。

我们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我们同英国政府进行的磋商。夏季，我们曾把苏联建议的要点向我们主要的欧洲盟国以及中国作了介绍。一九七二年七月底，我们利用英国内阁大臣伯克·特伦德爵士例行访问华盛顿之机，给他看了苏联七月二十一日草案。我们征询英方的意见，并且表示我们只同伦敦进行合作。八月十日，英国外交部派了苏联问题专家托马斯·布赖姆洛

爵士和一个顾问小组来华盛顿详细研究苏联的方案。

伦敦选派的人再好也没有了。布赖姆洛成了谈判中必不可少的一员。他真诚而又镇静。这位地道的文职人员和善的外表无法完全掩饰他的深邃的智慧。他是一位造诣很深的苏联问题学者。他对苏联的目的有冷静的估价。他认为，大战的威胁是苏联的主要恐惧之一；任何减少苏联在这方面的关切，都将削弱对它的威慑。据他认为，苏联人想要减少他们对自己前途把握不定的程度，而去寻求扩大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联合抑制力量。我们的方针是必须挫败他们这种企图。

布赖姆洛和我们一样，认为苏联现在的这个草案是不能接受的。我提出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方针，想把苏联的立场改变成一个在政治上要实行克制的原则声明，这个声明要求禁止使用武力威胁，不管是使用核武器还是使用常规武器。布赖姆洛同意这个意见并且建议采取拖延办法。因为他的办法恰好符合我们正在做的一切，所以很容易地就被接受了。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放慢与苏联的交往，定下某个新的期限（如最高级会谈），从而引起苏联的焦虑，使之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勃列日涅夫的建议，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得到苏联的默许。所以，我们借口需要结束越南战争，而把步子放慢了。

耐心不是勃列日涅夫的长处。他利用一切机会企图加快谈判的进程。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我访问莫斯科时，他坚持要我对苏联草案文本逐行指出我的反对意见，企图诱使我参加起草会议。但是这样就会使苏联的草案成为基础文本，而我们对苏联草案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原则上反对的。我应付他的办法是，不厌其烦地重复我在九月七日向多勃雷宁表示过的立场：不要两国共管；不要带有美苏只寻求保护美苏两国领土的含义；不要暗示常规战争是可以接受的而核战争是不可接受的。勃列日涅夫对我们竟然对苏

联的动机有这样不好的怀疑佯装迷惑不解。他口气和缓地争辩说，如果苏联放弃使用核武器，美国可以“加倍”地确信，苏联也不会使用常规武器去进攻美国及其盟国。（当然，这就很自然地把中国和中东排除在保护之外了。）勃列日涅夫为了使这个有地区限制的保证更有力量，就求助于苏联的法规说：“那样一种前景是完全违背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宣言的。”如果我们把一份协议交给北大西洋理事会（更不要说交给中国了），而这份协议是基于我们对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所作保证的信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那是难以想象的。

我提议，就象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时的做法一样，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要有一个总的原则宣言，然后再草拟一个比较正式的协定。勃列日涅夫不赞成。他在葛罗米柯的提示下知道，这些原则只能重申一九七二年最高级会谈已经签署的那些内容；而且起草这些原则将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那时美国可能会提出，这些原则已经包括了协定的全部内容。争论这个问题用了几个小时，而这正中我的下怀。最后，我同意再草拟一份草案，我答应十月上旬葛罗米柯到华盛顿访问时，就将这份草案交给他。这样我们才在没有发生危机的情况下离开了莫斯科。

葛罗米柯到达华盛顿之后，我于十月二日把草案交给了他，这份草案没有提到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而谈到了在国际行为中实行克制的一系列政治条件，必须遵守这些条件，然后才能考虑不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葛罗米柯是一个起草条约的老手，他一眼就看穿了我作了些什么。他抱怨我们没有按原来交换意见的“精神”去做。他注意到，苏联原来的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建议“丝毫也没有”保留下来。

为了施加压力，葛罗米柯告诉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三年对美国的回访将根据核武器条约的进展情况而决定。但是这一招

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将于一九七三年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因此为了把莫斯科与越南分开而举行最高级会谈已不再是重要的了。

然而，在越南谈判的最后阶段，我们不想再增加新的争端了。所以我重又采取拖延的战术。我以尼克松作挡箭牌，利用作为总统助手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诡称在核武器方面不象在其他方面，我没有多大的发言权。由于总统竞选，在十一月以前我不可能从尼克松那里得到指示。到那时，我将重新草拟一个修改稿。我看葛罗米柯未必相信我的话。毕竟，尼克松在莫斯科回避谈论核武器条约，而把此事委派给了我同多勃雷宁和(或)葛罗米柯来谈。现在我提出了相反的论点。而葛罗米柯手中已没有什么牌好打了，所以他只好默认，苏联人在不可改变的事实面前通常都是如此。

在越南谈判处于最后极度痛苦的时刻，连克里姆林宫的顽固决策者们也了解我们没有时间处理核武器草案问题了。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多勃雷宁对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施加某些不太高明的压力。十二月，他建议两个日期，即一九七三年的六月或者十一月，并且暗示，在没有搞出核武器条约的情况下，莫斯科倾向于十一月。如果全面考虑一下，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个策略是有缺陷的，因为我们也倾向于十一月。我们要结束欧洲年，并且要进一步改善同北京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理睬他这个明显的暗示。

到一九七三年二月末，签订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我们开始进行三角外交。宣布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联络处之后，我刚刚从中国回来，苏联临时代办尤利·沃龙佐夫就要求约见尼克松，递交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日期为二月二十一日，是对尼克松感谢苏联政治局对结束越南战争良好祝愿的一封信的回答。尼克松在信中列出我们准备讨论的一系列问题，很谨慎地避免提到核协定问题。这封信扼要地谈到我们愿意考虑多勃雷宁以

“建设性的精神”向我提出的任何问题。（这可以是指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中东问题。）这虽然无关紧要，但也够勃列日涅夫重新忙一阵子的了。

勃列日涅夫的信首先解决了最高级会谈问题。这封信运用了一个手法，说五月太早（这个日期从未讨论过），要把访问“推迟”到曾经考虑过的最早的日期，即六月份。尼克松列举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欧洲安全、欧洲共同均衡裁军等问题作为主要的议题。勃列日涅夫列出核协定和中东问题作为他的优先讨论的议题。他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表现出某些兴趣，但是对欧洲裁军问题根本不感兴趣。每当克里姆林宫想要有所前进的时候，多勃雷宁总是在他某次例行回国述职后突然出现在华盛顿，而且恰好是在我准备休假之前把我逮住（否则这个假期将为我们赢得十几天的时间）。

但是讨价还价的地位变了。一旦苏联人确定了最高级会谈的日期，时间就对他们不利了。我们对核协定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而勃列日涅夫却把这个问题作为他优先讨论的议题之一。如果苏联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访问有所表示的话，那他们就必须向我们靠拢。一九七三年四月初，多勃雷宁对确定最高级会谈的确切日期还在漫不经心地玩弄着花招，但当我指出，除非我们很快达成协议，否则就不可能进行技术性安排，最高级会谈最终将不得不推迟到十一月份时，他们就突然停止了玩弄花招。不久，我就被邀请到扎维多沃去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明确地确定了最高级会谈的日期是六月十八日。

如果有决定胜负的时刻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到了这种时刻了。我们终于巧妙地回避了对核协定承担任何义务。既然越南战争已经结束，最高级会谈的日期也已确定，那么我们或许应当放弃讨论核协定问题。但是要采取拖延战术就必定意味着我们要进行某种

谈判；放弃谈判，虽然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对的，但在当时看来似乎太过份了。

一九七三年三月五日，我向布赖姆洛总结了苏联的动机和我们的目的：

苏联的动机很明显：想造成缓和的印象，造成两个大国共管的印象，并且给苏联进行讹诈的相对自由，与此同时苏联不择手段地继续增强他们的战略力量。他们也可能把真正缓和的方案放在许多选择的最后……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只在形式上满足他们，而不涉及任何实质内容。

我问布赖姆洛，既然越南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已与苏联就最高级会谈达成了协议，我们是否应当中止整个核协定的谈判。布赖姆洛仍然有些疑虑，但是他承认，我们似乎专心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东和欧安会问题；我们长期的目标是保持“一种较少的竞争关系来把苏联拢络住，如果让他们滚蛋，我们就不会达到这个目的。”

当然，尼克松和我对会谈负有最终的责任。布赖姆洛的任务毕竟不是制订美国的政策，而是协助我们使政策沿着最稳妥的方向得以贯彻。一旦战略问题解决了，布赖姆洛就运用其敏锐的头脑，使苏联的不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变为在外交上不使用武力威胁的协议。呈现在眼前的就象一个俄国的不倒翁玩具一样，一个套一个，越往里面的越小。经过对条款的层层斟酌删削，避免核战争便成为一个目标而不是一项义务了。反过来，又使这个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一方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去反对另一方、反对另一方的盟国或第三方。因此，只有在外交上不使用战争威胁才能不使用核武器，如果这个条件不实现，协定的基本前提也就不存在了。这样一来，防止核战争协定实际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它反而使核防御合法化。为使盟国放心，草案仍然强调，这一协定不影响现存的集体（或单独）自卫的义务或权利。

布赖姆洛的角色是英美“特殊关系”的典型例证，甚至当现任首相不是这种关系的倡导者时也是如此。我们不会和任何其他政府如此开诚布公地打交道，如此自由地交换意见，或在实际上允许他们参加我们的讨论。所有的文件美国人都可以看到，有时早一点，有时晚一点，但重大的步骤都是共同采取的。布赖姆洛偶尔也给我们看英国方面的分析材料。实际上大部分草案都是他执笔的。最后的文本更多的是出自英国而不是美国的专家之手。

五月四日当我出发到扎维多沃时，让我向勃列日涅夫推荐一份草案。这份草案与勃列日涅夫原来提出的那一份截然不同。这次谈判是不寻常的，一直持续了几个夜晚，有时交锋十分激烈。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思想就是击败对手使其就范，或者用笨拙的玩笑进行诱骗。我的办法是把问题化为轻松的逗趣，以避免个人摊牌，但在强调指出问题的症结时，我就严肃对待。谈判成为牛和斗牛士之间的一场争斗，所不同的是争斗的结尾：斗牛士尽管大显身手用披风表演得眼花缭乱，但只不过轻微地刺伤了公牛，而牛还在积蓄力量准备新的搏斗。

会谈休息时，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一伙人到别的房间去了，我和我的同事来到勃列日涅夫办公室外面的阳台上。我们自问，正在形成的文本对我们保护中国和其他第三国的能力究竟有帮助还是有损害。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方案作用有限。在会议室里，哈尔·索南费尔特曾设法从桌子对面倒着看勃列日涅夫放在他面前的介绍情况的文件，这是他在华盛顿了解我的活动的常用的方法，现在试图在苏联使用。可是这一次他没有成功。

会谈的第一天，勃列日涅夫首先作了长篇发言，吹捧他的核协定草案是一份“明确而清晰的协定”。他向我担保说，这份协定包括的条款“不会”引起“任何惶恐”。我冷淡地回答道：“我不在这上面打赌。”勃列日涅夫并没有知难而退，他继续无休止地谈论这个

协定对美苏两国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最后才道出中国是他真正的目标，并开始对中国进行一系列的攻击：

至少在这里，在我们这些人中，不应对世界上仍然存在其他核大国这样一个事实漠然置之。因此协定中应当有这样的条款，向他们说明把核战争当儿戏是错误的。

加入反华的美苏联盟并不符合我们对缓和的想法。我在长篇发言方面也不甘示弱，特别是我们的谈判地位每小时都在改善的时候更是如此。

我在回答中只是把拟议中的协定作为美苏两国之间一系列谈判中的一个，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性事件。我争辩说，同时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取得进展会增强其他各项谈判的重要意义，我试图以此阐明“联系”的原则，但说服力不强。一想到如果当时我的说服力更强一些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真是不寒而栗，因为我们国内的讨论情况对于进行严肃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几乎毫无益处。我略微有点挖苦地指出，如果没有尼克松总统同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关系，拟议中的协定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进展，借以暗示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这并不是我们最优先要解决的问题。我谈到有必要通知我们的盟国（当然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勃列日涅夫回答说，他不会去规定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我们的盟国；至于他自己，他不久就要到东德和波兰，但不会向他们通报这件事情。这个建议本身是行不通的，更不要说，他把东德同法国这样的国家等同起来，恐怕巴黎是不会欢迎的。他补充说，实际上，在政治局只有他少数几个同事知道这件事——他这样说也许是为了奉承我，说美国的办法可以适用于苏联。（这使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多勃雷宁经常谈到，如果达不成这个协定，将会削弱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的地位。对于他的同事们不知道的事，如果他没有完成，那是无法责怪他的。）

第一次会议休会了，没有超出总的原则。五月五日，星期六的晚上，勃列日涅夫开了一会儿玩笑之后，我们终于转到了草案的文本。关于使用哪一个文本的问题立刻爆发了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我们赢得了四分之三的胜利，因为决定用我们（更准确地说是布赖姆洛）的文本作为基础。之后，我们大家陷入了纯属枝节问题上的争论。很难设想一些男子汉竟会在这样一些小事上争吵。争论的问题是，应通读全文还是只读有争议的部分，如果读的话，由谁来读。我们赞成集中讨论有争议的几点，避免引进新的问题，特别是避免引进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概念这个问题。最后一致同意通读全文。勃列日涅夫亲自承担了这个很难说是什么荣誉的工作。

讨论远远超出了一个小时，很明显，时间的消逝并没有影响根本的动机。一旦我们的基本观点被接受，勃列日涅夫便想使这一观点转而为他的目的服务。他首先讲了很长一段话，要求增加一项强调协定双边性质的条款。美方草案建议，美苏两国将要“采取行动以便……排除在他们之间和其中任何一方同第三方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勃列日涅夫要去掉“和其中任何一方同第三方之间”这几个字——为向第三方发动核攻击留下十分明显的可乘之隙。最后我们商定把不进行核战争作为一个目标而不作为一项义务，不仅适用于超级大国，而且适用于所有国家，并且使这一目标取决于一系列的政治条件，特别是取决于避免战争威胁这一条件。实质上，这正是布赖姆洛所建议的。

紧接着发生了另一场争论。有一项条款的措辞说，该文件不影响“美苏两国在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中对第三国承担的义务。”我想加上“其他有关的文件”这样一个短语，使该条款更加有力，以便照顾到没有与美国正式结盟的国家，如以色列等（这是强调大家心照不宣的含义，即中国也包括在内）。勃列日涅夫勉强同意了。讨论每一条款都发生了类似的争论。为了不使读者失去耐心，我把

最后协定的全文收进了注释。^⑬

为了不留下任何含糊其辞的地方，六月七日我们为尼克松起草了一封给勃列日涅夫的信，说明我们认为协定包括了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总的义务；协定中不列入不使用核武器，但应列入在外交上不诉诸武力威胁；绝不能利用美苏会谈将任何条件强加给第三国；

我认为，我们提出的目标和某些行动方式适用于我们各自国家今后的政策。我们这样做不是同意禁止使用任何特定的武器，而是为将来消除我们两国之间或其中一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危险，特别是核战争危险创造条件前进了一大步。总之，我们同意，彼此间所承担的义务也适用于我们各方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我们签署协定，特别是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彼此协商，只是我们彼此之间承担义务，决不同意把任何特定的义务或解决办法强加给其他国家。同时，我们不使我们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权利和彼此承担的义务受到损害。

总之，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我们把苏联原来的对彼此无条件地不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变成为一个比较一般的声明，即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但前提是在国际行为中实行克制，特别是避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这也适用于盟国和第三国。另一条款规定，在危及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在诉诸武力威胁之前必须进行协商。如果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冒犯者就是违反协定。整个文件规定的一系列条件限制了苏联人，使他们不能攻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中东，否则就要违反协定。而且文件还使我们有了反对苏联攻击中国的某种法律约束。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华盛顿签署了协定。我们对协定可能产生的错误解释十分不安，因此准备了一份措辞严谨的新闻介绍材料，在公布以前我读给勃列日涅夫听了。它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已很熟悉的一点：协定的目的不是禁止战时使用任何特定的武器，而是以不使用武力或武

力威胁来保卫和平：

每一方都以明确的方式表明它愿意不仅在彼此的关系中，而且在同所有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实行自我克制……换言之，他们一般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必须接受这样的约束和牵制，即：如果他们的行动或政策增加了战争威胁，他们就违反了本协定的宗旨。因此这里不存在两国共管的问题。两个最强的核大国明确地接受了维护和平的总的责任，其方式不是通过干涉或施加压力，而是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因此，这一文件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可以使所有国家安心。

勃列日涅夫抱怨说，我似乎经常强调该协定的消极方面，而不是强调它的积极方面。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意这个介绍材料。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很难由法律文件得到确保。我们是否抵制对受威胁的国家所进行的攻击，与其说取决于对复杂的协定的巧妙解释，还不如说取决于我们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苏联人提出这份文件是为了象征性的原因，我们修改了文件内容，使这种象征性对我们无害或者对西方有利。最初苏联提出的两国共管已演变为对一年前在莫斯科签署的“美苏关系基本原则”的详尽表述。“防止核战争协定”反映了我们的信念：在国际行为中表现克制是控制武器的先决条件；超级大国之间的共处最终将取决于坚持这种行为准则，以此作到不威胁彼此的切身利益。

这样，最后协定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我们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从技术上说，它是我们在外交上取得的一次较好的成就。它表现了起草的手腕（主要归功于布赖姆洛）和谈判的顽强。然而回顾起来，我怀疑花这么大的力量是否值得。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份用途极为有限的文本。成果太微小了；会谈太神秘了；花费的时间太长了；对盟国和中国进行的必要解释也太复杂了，因而难以获得预期的效果。

欧洲人特别敏感。他们知道这项计划已有好几个月了。我亲

自向蓬皮杜、希思和勃兰特通报过几次情况。尽管进行了紧张的协商，但还是难以取得盟国同我们的协调一致。虽然希思、勃兰特和巴尔都给予支持，英国人参加了起草，但蓬皮杜总是谨小慎微，英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出于他们各自的原因，都没有将情况通报给他们的官僚机构。当一九七三年六月这个协定最后在北大西洋理事会上公开时，英国的常驻代表强烈抨击这份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制定的草案，而且还得到了他的德国同事的支持。这简直荒唐到了极点。

对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根据我们对协定的解释，苏联如果向北京施加压力，就必定要违反几乎是协定的每一项条款，包括在采取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之前必须进行协商的要求。杰克逊参议员对美国的对苏政策的其他方面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但在这个问题上却立即认识到它的意义并支持我们。可是北京那些头脑冷静的决策者并不这样看。他们不相信没有强制性的义务能够增强他们的安全；他们认为这份防止核战争的文件可能会引起盲目乐观的思想。

无怪乎防止核战争协定已经变成一纸空文，也许这是件好事。自从这个协定签署以来的十年中，只引用过一次——那是在一九七三年正值中东处于紧张状态的期间，当时我们警告苏联人，他们的单方面干涉将违反协定的条款。可是正如那一次所表明的，核战争的危險要由力量、意志和果敢的外交来消除，而不是靠一纸空文。

勃列日涅夫的美国之行

最高级会谈是冒险的交易。从事政治的人如果没有高度的自负，就不会爬到最高的职位；政治领袖的运气是同他们实现自己目

标的能力紧密相关的。他们感到很难妥协，特别是谈判处在公开的情况下；一般说来，他们没有时间去留意细微末节的差别，而这却是外交成功的要诀。僵局难以打破时，只有采用非常含糊的提法，才有可能达成协议，而这些提法往往因其含糊而引起后来的否认或分歧。

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之间的最高级会谈特别复杂。紧张时期过后，它们可能使人们普遍感到异常的兴奋；而在危机时期，也许又使紧张局势加剧。它们既能使人满怀希望，又能使人非常失望，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但是，如果能正确地理解这些风险，如果准备工作做得周密，也还是有一些可资利用的机会的。同一般的官僚政治相比，苏联的政治体制更难以接受那些向正统观念挑战的思想。反对正统的做法很容易被看成在意识形态上缺乏警惕；随波逐流才是政治生存的前提。苏联领导人对他们西方同行的道义力量和概念结构需要不时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否则他们就有可能被那些对他们的偏见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部下所包围。

正是由于美苏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增强了竞争并时而发生对抗，和平很可能要取决于苏联政治局对美国领导人受到挑战时可能作出的反应能否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一位坚强自信的美国总统应当能够利用偶尔进行的最高级会谈让苏联领导人感觉到他的决心，减少错误估计的危险并保留最终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是多么微小。当然，相反，如果苏联人作出结论认为他的美国对手不老练、不果断或者软弱无力，那就可能使他们胆大妄为从事新的冒险。

从这个观点看，尼克松参加的一九七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最高级会谈是在比较理想的条件下进行的。两周之前，尼克松下令恢复了对北越的轰炸和在港口布雷。尽管如此，莫斯科还是维持

了原来对尼克松的邀请，这就说明克里姆林宫把苏美关系置于它的朋友的一些切身问题之上。而我们则表明，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为我们至关重要的利益而甘冒失去缓和的风险。

基于同样的原因，一九七三年最高级会谈的预兆就很不妙。苏联领导人对力量的对比十分敏感。起初，水门事件使苏联领导人感到困惑不解；他们把它看成是右翼针对缓和的阴谋。当我在扎维多沃时，苏联人说他们希望水门事件很快就会过去；他们可不希望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访问华盛顿时受到美国国内争论这一变幻莫测的潮流的冲击。复杂的苏联体制需要可以预测的对手。他们打交道时，最需要的是位无论是进行威胁或者是履行诺言都能言出必行的总统。一九七三年恰好在这点上出了问题。尽管美国总统受到削弱这一前景是有诱惑力的，但看来有好几个月他们都因把握不定而受到抑制。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们才明目张胆地利用美国国内动荡的形势，支持他们在非洲的代理人。

然而，当水门事件的风波愈演愈烈时，在一九七三年春天出现了几乎是难以察觉的两面下赌注的情况。五月初，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沃仍然对最高级会谈充满了热情。他将要偕夫人和孩子一起访美，他要访问美国几个城市——除了华盛顿以外至少还要访问休斯敦和洛杉矶。可是五月间，他们又通知我方说，勃列日涅夫的医生突然“禁止”他的夫人旅行；至于孩子们的访问则没作任何解释就不了了之了。苏联人甚至曾建议把勃列日涅夫的访问仅限于华盛顿。^{*}当我们对缩减的日程表示惊讶时，苏联人又重新提出

^{*} 由于美国官员对日程的安排，可能促使勃列日涅夫不愿到外地旅行。他们向苏联一个先遣组建议去匹兹堡访问，在那里勃列日涅夫可以见一见美国的钢铁工人（原籍大多是波兰、捷克或塞尔维亚人），并且可以沿着狭窄的通道俯视高炉。苏联人很快就否定了这一方案，这说明他们同莫斯科的联系很迅速，也许是勃列日涅夫访美安排日程的苏联官员很谨慎。一位进入政治局而健在的苏联政治家或许懂得不要离高炉太近，特别是由东欧人管理的高炉。

要在圣克利门蒂停留，同时勃列日涅夫在一份照会中居心叵测地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对人们对尼克松的批评一事是冷淡的（参见第四章）。

与此同时，电视播放的由萨姆·欧文参议员主持的水门事件委员会听证会正在积极地进行。几乎没有一天不揭露一些丑闻。主要证人前白宫顾问约翰·迪恩在参议院小型特别委员会的作证，恰好预定在勃列日涅夫访问的那个星期进行。在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公开宣传美国总统渎职的耻辱——或者也许是不愿同苏联领导人同时出现在众目睽睽的电视节目——使委员会推迟了听证的日期，但仅仅推迟一周。委员会甚至不准备多推迟一天。因此，听证会就在勃列日涅夫离开美国的那天复会，使苏联领导人有了极好的机会亲眼目睹对刚刚与他们会谈的总统的公开起诉。

参议员杰克逊曾经预料到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到达美国之前一周曾公开建议推迟最高级会谈。从理论上来说，他的意见是对的，但实际上经过这么多的准备之后而且是以这样的理由取消访问，将会严重损害美国政府的权威。这将表明，在无法预料的长期调查中，我们将没有进行谈判的能力，因而也无法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一旦我们向苏联人承认了这一点，那就必然波及到其他一切关系。在这样的事实强加于我们之前，我们在国际上就会处于瘫痪状态。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装做我们的权威没有受到损害。为此，我们必须象往常一样地工作；我们不能表现出任何的犹豫，不论我们怎么想，都要表现出有自信心。当然尼克松还有其个人的动机。如果他承认他治理国家的能力已受到损害，必将招致对他作为总统的更多攻击。他不能让自己承认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东西正在日益土崩瓦解。

第二次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谈就在这样不利的情况

下开始举行。所幸的是，所有的谈判都已结束。“防止核战争协定”已在扎维多沃完成。在限制战略武器的原则方面只剩下一个无关紧要的工作，即商定一个完成协定的日期。还有几项关于农业合作、交通运输、海洋学、文化交流的附属协议也已准备就绪只待签字，在这些方面最高级会谈的主要作用就是决定一个最后完成的期限。

既然没有什么内定的议题，一九七三年华盛顿最高级会谈就为两位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探讨彼此的思想的特殊机会。这是施展最高级外交的最好时机，但尼克松却忧心忡忡、心烦意乱。虽然他十分干练地主持了会谈，但不象一年前那样有确定的方向和自信心。至于勃列日涅夫，他的气势汹汹的言谈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他的不安全感。访美对他来说是一件大事，他竭力想给人们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在公开的场合，他总是企图用笨拙的粗鲁举止来掩饰他的弱点。他显然要人们把他看成是比赫鲁晓夫更有人情味、更加开朗的人。在通常情况下，这也许会有感染力，因为在有些方面确实是令人感动的。可是在水门事件的恶劣气氛中，它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了。的确，报界倾向于把这一点看成是勃列日涅夫挽救尼克松的一个招数，而这对双方都无裨益。这样的报道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在当时，勃列日涅夫还不可能充分了解尼克松身陷困境的程度。

勃列日涅夫于六月十六日抵达华盛顿。他有些象疑病症患者，把适应时差换算的需要当成是无法摆脱的东西。他带了两块手表，一块是莫斯科时间，一块是华盛顿时间。他总是记不住莫斯科时间究竟比华盛顿早还是晚。当我们到达圣克利门蒂时，时间往前推进了三个小时，他便放弃了记录时差，但从未停止过抱怨。

尼克松把勃列日涅夫及其一行安顿在戴维营，让他们在最高级会谈开始之前好好休息。比起扎维多沃的别墅来，这些资本主

义美国的小屋要显得土气和矮小得多了，并且不那么讲究。由于那个周末尼克松和我都在比斯坎岛，我便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问他生活是否习惯。甚至通过一道翻译，还可以听出他满怀热情和期待，同时也提心吊胆，唯恐一切会不顺利。他明白表示，如果他能在预定第二天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之前再看一下日程，就会感到放心了。我于六月十七日飞往戴维营去迎接兴致勃勃的勃列日涅夫。他吻了我——这是我们交往中唯一的一次，并马上把他的新玩意儿——一个按预定时间一次放出一支香烟的烟盒拿给我看。勃列日涅夫用各种各样别出心裁的办法来打乱这个烟盒的程序，其中的一个办法是同时随身携带两个袖珍烟盒。

他还有无法消除的疑虑：我们是否在设法避开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我说没有这种可能，要他放心。他是否会遇到游行示威？参议员们是否会尊重他？是否会有干涉苏联内政的企图？我向他表示，相信他有能力应付任何可以预见的情况。他有点烦躁，但总算安定下来了。

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宾的仪式是简朴而给人印象深刻的。预定上午十时三十分在宽阔的南草坪上举行。离预定时间还差几分钟，海军陆战队乐队开始演奏“向总统欢呼”的乐曲，尼克松和夫人从一楼外交接待厅南门廊出来了。尼克松向等在草坪上的显贵们致意，同每次一样，他们包括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使团长、美国驻来访国家的大使和来访国家驻美大使以及其他官员。在又一阵军号声中，勃列日涅夫的小轿车进入西南门，缓缓驶过仪仗队朝总统的方向而来。

这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小轿车在南门廊前停下来，尼克松总统向勃列日涅夫表示欢迎，他们一起登上讲台静听演奏国歌。但是不久就开始出问题了。一支代表各军、兵种，手持彩旗身着礼服的队伍正在等待检阅，可是勃列日涅夫的热情有点过了头，当他

走向士兵时，士兵们唰地一声立正，但他的注意力被打着美、苏国旗的人群吸引住了。他匆匆走了过去，开始象一个在竞选运动中的美国政客一样同人们握手。尼克松有礼貌地轻轻推了一下勃列日涅夫，让他回到了仍然立正等待检阅的仪仗队前面，这样总算使警卫官员和礼宾司长保持了镇静。勃列日涅夫回到讲台上，海军陆战队的乐队从台前列队而过；他和尼克松都各自发表了简短的致词。然后两位领导人走上曲形台阶到南门廊向群众挥手致意，之后进入接待室，在那里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客人并列接待在此集合的要人。勃列日涅夫在这里又一次破坏了预定的日程。接见的行列的移动没有通常那么快，因为勃列日涅夫不愿停止同几位熟人没完没了的交谈。勃列日涅夫对资本主义计划性的蔑视意味着，一个预计半小时（或者到十一时）的接见几乎延长了一倍的时间。随之开始在椭圆形总统办公室的正式会谈。然而意外的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第一次会谈，美方原定由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我和担任记录的哈尔·索南费尔特参加；苏方是安德烈·葛罗米柯外长、多勃雷宁大使和那位出色的苏联翻译维克托·苏科德列夫。（美方的索南费尔特懂俄语）首先，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两人拍照留念。他们两位主角开始会晤时，其余的人本应随后参加进去。可结果我们在内阁会议厅等了一个多小时，始终没有人来传唤我们。

有关会谈的全部记录要等尼克松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没有告诉我会谈的情况。可能勃列日涅夫重复了他在扎维多沃时对我讲的一些话。会谈一定仍然是泛泛地谈论一番，因为多勃雷宁根本没有提到或暗示会谈取得了什么结果，而他无疑是掌握苏科德列夫的会谈记录的。（苏科德列夫虽然答应过把他的记录给我，但却始终没有向我提供过。）

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我们这些人终于进去参加会谈了。尼克松请勃列日涅夫概述他对美苏关系的看法，勃列日涅夫便不客气地长篇大论地讲述了苏美关系的历史，加上翻译时间，持续了将近四十五分钟。他在这次讲话中，把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看成是东西方交往的转折点。勃列日涅夫坚持说，只要双方放弃追求单方面的利益并愿意作出让步，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他说：

因此，在莫斯科所做的和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一切，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和重要性。各位知道，我们俄国人有一句格言——生活永远是最好的老师。我认为，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和两国领导人的生活实践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在和将来我们之间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因此，我深感满意地强调指出，人类的理智使我们两国同时认识到这一点，由此而导致了去年莫斯科会议的成功。我十分坚定地相信，而且将继续相信，在莫斯科所以能够取得成就就是因为深刻地意识到，我们为和平与未来的合作是很重要的。我们去年在莫斯科会晤不是为了比较我们的实力或者进行竞争，而是为了作出重要决定。我知道，这些决定赢得了我国人民和贵国人民的一致支持。

离约翰·迪恩作证的日子只有一周了。至少参加会谈的美国人认为，尼克松要得到美国人民的一致支持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因为他们可怕地意识到今后将发生动乱。会议延续到下午仍没有结束的迹象，由于感到饥饿而越来越影响到美方人员进行严肃思考的能力。既然总统还没有作出回答，会议就无法结束。勃列日涅夫觉察到美方有些坐立不安，因此不断地看他的两块表。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维持身体的节奏，并知道何时同他在莫斯科的同僚联系。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提醒他说，莫斯科的时间比华盛顿早七个小时（就我们听到的这已经是第十次了），但这些话是否会被记住，看来他们没有多大把握。勃列日涅夫不时地中断自己的讲话，问尼克松总统、罗杰斯和我，他的讲话是否使我们感到厌倦。我们由于考虑到一个民族的尊严，所以就强打精神不承认厌倦，可是

随着午后时刻的消逝，我们感到，我们讲这种话的语气已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了。

尼克松开始作出回答了。幸运的是，他讲的比勃列日涅夫简练。他本来就没有准备开长会。我的办公室所提供的介绍情况的备忘录建议他和勃列日涅夫要商定最高级会谈的日程，要让勃列日涅夫放弃两国共管的错误想法。然而尼克松不愿在勃列日涅夫的富于哲理性的讲话面前甘拜下风。他把一九五九年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办公室会见赫鲁晓夫时的气氛同现在作了一个对比。我猜想，他的意思是，这一次不存在对柏林的威胁，当时正是这种威胁才促使向勃列日涅夫的前任发出了访美的邀请。然后尼克松赞扬了自那以后出现的核均势。这是我同他接触中唯一的一次他同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没有通常那股自信劲儿。除非民主国家增强常规力量，否则或迟或早战略均势定会变成我们的战略灾难，苏联将会在干预地区性的冲突中随心所欲地发挥其常规力量的优势。

尼克松很快就恢复了自制力，他强调说美国不参与任何超级大国的共管。“作为讲究实际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有多大，同时作为强大的国家，我们能够而且也应当遵循尊重别国权利的政策。”这样尼克松可以确保勃列日涅夫不致误解“防止核战争协定”的意义，尼克松说，这个协定“承认所有国家的权利，同时也承认我们二人有责任制订可以避免我们两国之间的核对抗和其他形式对抗的办法。”

最后尼克松列出供以后会议讨论的一长申议题：欧洲安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越南、柬埔寨、经济关系等问题。勃列日涅夫爽快地同意了。当尼克松提到越南问题时，勃列日涅夫说：“我听到提出越南问题，我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假如你愿意，我们以后可以讨论。我记得我们在别墅曾经讨论过。”

他指的是一九七二年在离克里姆林宫四十分钟路程的勃列日

涅夫的别墅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轮流发言对尼克松进行指责一事。^⑥ 那次会议蛮横无理而又不切题，因为会议是为了记录在案而不是为了实际效果——这一点在随后的一次交换意见中就看得清楚了。“是的，”尼克松文雅地说，“那是一次晚餐。”勃列日涅夫很会应付这个场面，他说，“我们过得很愉快。”我相信这是他的本意。在地球一个遥远的角落，不冒风险地威胁一个处于困境的意识形态的对手，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愉快呢？

在总统办公室的会谈下午三时三十分结束，饿坏了的美国代表冲向白宫餐厅。不管是比我们晚七个小时还是早七个小时，勃列日涅夫显然是不需要补充食物的。

最高级会谈后来进行得很不顺利，这是同苏联人谈判的典型特点。不作任何解释，会议就被取消，或者我们的苏联同事干脆就不露面了。重新安排会议也是同样地突然和无法预料。这种事不仅在莫斯科发生（在那里毕竟是苏联人控制每个人的行动），在美国也发生了。六月二十日整个一批人马都到了戴维营，要在那里呆两天，勃列日涅夫的房子斜对着总统的住处。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坐在阳台上吵吵嚷嚷地谈着话，已经超过预定开会时间二个小时，从那里完全看得见尼克松总统的住所，可是苏联人甚至都没有派人解释一下推迟会议的原因。突然，如同他们在莫斯科一样，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不知是有预谋还是因为难于适应东部夏令时间，他们再一次选择了午餐时间。我没料到尼克松会那么耐心。他以为苏联人可能看到了他有空闲的时间。他同意会晤讨论欧安会问题。会晤中，主要是勃列日涅夫一个人谈，他谈到西欧有哪些领导人已经同意苏联关于在最高一级结束会议的建议。（其中有许多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闻，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些欧洲领导人拖延在西方最高级会议上同尼克松总统会晤。）

那一周其余的时间用于两国主要领导人进行会谈、举行签字仪式和国宴。有一次会谈专门讨论扩大苏美贸易的前景。勃列日涅夫表示希望苏联从美国购买价值二百亿美元的消费品，这反映了他们很久以前的想法。如果此话当真，那就充分反映了苏联的经济过份偏重于军事生产，而且效率又是那么低。在另一次会议上，约翰·康纳利（现在是开业律师兼总统顾问）到场向两国代表团强调继续开发西伯利亚天然气的重要性，国务卿低声对我说，他希望当他重操律师旧业时，有人会同样关照他。

六月二十一日，在苏联大使馆吃了一顿美餐之后，代表团于六月二十二日乘总统专机飞往圣克利门蒂。一九七二年我作为勃列日涅夫的客人曾乘坐过他那架比我们豪华得多的专机，因此我不知道朴实无华的戴维营和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是否能使我们的苏联客人相信，在无阶级的社会里，人们的地位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比资本主义社会要多。我们在勃列日涅夫的座舱里给他放了一顶牛仔帽和一条挂满玩具手枪和枪套的腰带。他没有理会那顶帽子，但那条皮带却强烈地吸引了他。当我们飞越科罗拉多大峡谷时，勃列日涅夫便模仿据说是他最喜欢的电影明星约翰·韦恩，把六轮手枪从枪套里拔出来，他的表情正适合于这种场合。

在圣克利门蒂，勃列日涅夫坚持要同尼克松住在一个院内。既然尼克松占了唯一的一座舒适的住宅，所以就把勃列日涅夫安置在通常留给尼克松的女儿特里西亚住的一所小房子里；这里只有一间中等的居室和两间装饰着花卉图案的寝室。葛罗米柯被安置在朱莉·艾森豪威尔的更小一点房子里。当然，在圣克利门蒂勃列日涅夫的时差症又犯了，这一次使得他在大约下午六时左右刚一到达便休息了。

结果，这次最高级会谈最有意义的两次会谈是在六月二十三日这最后一整天在圣克利门蒂进行的。这两次会谈他们事先没有

安排，而且没有打招呼就对我们进行了突然袭击。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举行的午间会谈只有我和译员苏科德列夫参加，勃列日涅夫发泄了他对中国人的仇恨。这是扎维多沃的重演。他的怨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但是，勃列日涅夫对仅仅从理论上说明问题并不感兴趣。他的目的显然是解决实际问题。他建议通过总统渠道对中国问题秘密交换意见。他警告说，十年以后中国的核项目可能同苏联一九七三年的水平相等。这是苏联无法接受的，但是他并没有说克里姆林宫对此将采取什么措施。在不远的将来，苏联将向中国提出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勃列日涅夫肯定北京会断然拒绝的，苏联将以此向全世界揭露中国的好战。（后来证明他是对的。）勃列日涅夫还说，他不反对华盛顿和北京建立国家间的关系。但军事上的安排却是另一回事，他说道，“世界各国人民将失去对我们的信任，”他表示了对世界舆论少有的关切。勃列日涅夫坚持说，苏联不打算进攻中国，但是中国同美国作出军事安排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他的语气令人难以捉摸，表现出葛罗米柯的风格。

尼克松冷淡地回答说，他愿意通过总统渠道对“任何问题”进行接触，但他没有谈他本人对中国人的动机和目的的分析 and 评价。我补充说，我们同中国从未讨论过任何军事问题。尼克松和我都没有对未来作出保证。勃列日涅夫突然谈到在巴黎协议签订之后，苏联已停止对北越的军事供应。看来他似乎在暗示我们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他说：“也许有些枪枝，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将敦促他们遵守巴黎协议。”

下午，在游泳池边举行的招待会开始之前，葛罗米柯把我拉到一边。他显然是担心勃列日涅夫的话讲得不够清楚——尽管连勃列日涅夫的死敌也不可能认为他有表达不清楚的缺陷。不论怎样，葛罗米柯外长还是要明白无误地重申（这在六个星期里已是第

三次了),中美两国间的任何军事协议都会导致战争。我说我明白他的意思。至于我们的意图,我没有向他作任何透露。我认为在面对威胁时,作出一揽子保证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深信我们一方面应当小心,不要挑起苏联对中国的攻击,但另一方面,如果发生苏联进攻中国的情况,我们也不能漠不关心。因为这对全球力量对比的影响几乎同苏联进攻西欧得逞时所造成的损失相仿。

第二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在最后一天出现了,但不很引人注目。对联合公报的中东部分,葛罗米柯同我象往常一样老是争论不休。葛罗米柯十分谨慎。毕竟前一次最高级会谈及其联合公报成了导致埃及驱逐苏联顾问的主要原因(参见第六章)。这一次葛罗米柯甚至拒绝在公报里提到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对该决议的不同解释是中东谈判的中心,因为我们拒绝接受苏联对该决议所作的亲阿拉伯解释。一九七二年葛罗米柯曾设法避免在中东问题上表示有任何分歧;一九七三年他仍然坚持这一点。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句子,但是它可以防止前一年突然飞来的横祸,当时一个使人安心的模糊提法被萨达特解释成苏联出卖了阿拉伯利益。(已经商量好的段落落在后面的注释里。)^⑦

但是同葛罗米柯的谈话只是作作样子。他关心的与其说是现在谈判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中东形势发展的整个趋势。五月份在扎维多沃,鉴于苏联对阿拉伯最高方案给予支持,我向勃列日涅夫综述了我们的评价:“让以色列交出领土去换取它已经得到的东西(停火),以避免一场它能够赢得的战争,结果却不得不同最顽固的阿拉伯人(即巴勒斯坦人)谈判,我们很难说服以色列去这样做。”我们当时正计划在以色列十月末大选之后展开一场大的外交攻势,同时实施拖延战术。但是在扎维多沃,勃列日涅夫进行了战争威胁,他暗示,要阻止他的阿拉伯盟国行动,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

他发牢骚说，美国正在指望一种可能不会持续多久的情况：“必须采取某些步骤，否则尼克松总统和我也许会处于一种无法忍受的局面……毕竟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同样，以色列现在所享有的军事优势也不是永久的。”勃列日涅夫没有向我提出任何方案。我认为那含蓄的战争恫吓是吓唬人的，因为在我们看来战争只会导致阿拉伯人的失败，而苏联人无法把他们的保护对象从失败中解救出来。葛罗米柯在扎维多沃把一整套原则交给我，而它们同阿拉伯人的方案是相同的。既然勃列日涅夫在同我的谈话中没有打算从他的方案后退一步，我们便把讨论推迟至六月份的最高级会谈。

现在最高级会谈举行了，奇怪的是，苏联人对讨论中东问题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虽然同葛罗米柯就公报进行了争论，但不论在华盛顿，在空军一号专机，或者在圣克利门蒂都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勃列日涅夫要同尼克松讨论中东问题。

我想我们终于可以丢开严肃的工作松弛一下了。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尼克松在他住处的游泳池周围举行了鸡尾酒会。这是为在水门事件中仍然愿意到圣克利门蒂来的好莱坞人举行的。人不多。勃列日涅夫看来兴致很高。接着，晚上七时，准备在尼克松的小餐厅里举行只有十人的家宴。但是在家宴开始之前，勃列日涅夫突然借口疲劳——又是时差的变化——要求把晚宴的时间提前到六时。尼克松同意了，对那几位冒着挨骂的危险从洛杉矶行程两小时来出席仅仅一小时的招待会的忠实而不辞辛劳的人来说，这顿晚餐确实不怎么样。

晚宴的气氛很快活。勃列日涅夫在这种家庭气氛中感到很随便。尼克松的祝酒词很动人，他谈到两位领导人对全世界儿童的幸福所担负的责任，他们两人一定要从热爱自己孩子的角度来深刻体验这种责任。尼克松讲完话，勃列日涅夫绕过桌子，拥抱了尼

克松。大约七时十五分，苏联人便告辞了。鉴于勃列日涅夫又要面临令人疲倦的时差变化，所以他需要尽量地休息好。他要在第二天早上回华盛顿，到戴维营去休息，然后在六月二十五日从那里动身去巴黎。尼克松回卧室休息去了，过了大约十分钟我也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十点钟我的电话铃响了。特工处通知我勃列日涅夫已经起床，要求立即会见尼克松总统，但总统已经睡了。这是粗暴违反外交礼节的行为。一位外国人在国事访问最后一天的深夜未经事先约会就要求会见总统，也未说明会谈什么问题，这在当时是空前的，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是史无前例的。显然，这是趁尼克松没有准备，碰巧还可以把他的顾问同他分开的一种手法。这种花招在信用方面所付出的代价远比可能得到的实际好处要大。使用狡猾手段取得的让步，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因为这些让步根本无法维持下去，因而他们绝不会成为两个主权国家继续行动的基础。

我告诉特工处通知苏联人，等我见到总统以后再看怎么办。大约十五分钟以后，我唤醒了尼克松。他开始还睡意朦胧，当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以后，他立即警觉起来。他问道：“他们在搞什么名堂？”“谁知道？”我答道，“不搞一次别墅会议恐怕是无法结束最高级会谈的。”尼克松告诉他的侍从马诺洛·桑切斯，在俯视太平洋的小塔楼里他的书房中生起炉火。同时，我找了葛罗米柯，问明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并说明会见时我将在场。原来是勃列日涅夫突然又非常希望讨论中东问题。我冷淡地说，我将通知总统，总统准备好了就通知苏联代表团。

结果，大约在十时四十五分，在勃列日涅夫同尼克松最后一个晚上的会晤时，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他整个访问中最重要的建议：美苏立即就解决中东问题达成协议，协议的基础是以色列全面撤退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以换取结束战时状态而不是换取和平。最后

的和平将取决于随后同巴勒斯坦人的谈判；由大国保证作出安排。这当然是阿拉伯人的一贯立场。勃列日涅夫一定懂得——如果他不懂，那么经验十分丰富的葛罗米柯不可能不知道——在余下的几个小时里，根本不可能把这样的建议讨论完或者达成协议。可是勃列日涅夫没有就此罢休。他说，不要公开宣布。可以搞一笔秘密交易，只有房间里的人知道。他并没有对我们说明，把美苏强加给中东的这样一项革命性的和平计划付诸实施，怎么能够保守秘密。

尼克松在压力面前像以往一样是很镇定的，他回答说，当夜已做不了什么事了。我们也不可能接受在扎维多沃交给我的“总的工作原则”。我将对它加以修改，并在勃列日涅夫六月二十五日离开戴维营之前，把修改稿交给他。但是这位总书记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就像在别墅一样，他又进行恐吓了：

如果原则不明确，我们将很难使军事形势不骤然恶化……没有一个总的原则协议，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够行动……我坚决反对重新开战。但是没有协商一致的原则……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

换句话说，勃列日涅夫在“防止核战争协定”里放弃了使用武力威胁二十四小时之后，实际上又在威胁我们：除非接受他的条件，否则中东就会重新开战。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激动。多勃雷宁后来告诉我，他曾告诉过苏科德列夫，不要把勃列日涅夫的某些更为尖锐的话翻译出来。但是转达过来的一些话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勃列日涅夫要在那个夏季解决中东冲突问题，他提出的条件是阿拉伯人的要求。事实上在以色列进行大选之前四个月，即使想发起一个严肃的和平进程都不可能，并且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实现勃列日涅夫提出的条件。如果在水门事件听证会的高潮中让尼克松勉为其难地解决问题，那就不仅会被指控为背叛盟国而且会被指责为从事转

移视线的活动。勃列日涅夫提出的方案,从其实际情况看,无论如何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当然,勃列日涅夫进行威胁也许不仅是出自信念,而且同时是由于感到沮丧。他一定和我们一样也受到了埃及人的威胁,可能他也同意我们的估计,即这种企图最终一定会招致阿拉伯人的失败。他知道美国的盟友在军事上更为强大,况且美国掌握着从外交上解决问题的主动。他企图利用威胁迫使我们帮他摆脱困境,却又不想付出任何代价。至少他是在想办法把造成僵局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并且在防止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受到进一步削弱方面有所建树。

这些说明并没有冲淡勃列日涅夫极为恶劣的表演。对他公然企图利用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可以想象的尴尬局面,多勃雷宁明显地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要求在美国国内是通不过的,在外交上也是不明智的。这肯定也说明了葛罗米柯为什么采取冷淡回避的态度。我们准备同我们的盟友以色列磋商之后再与莫斯科讨论总的原则。也要就这个问题同埃及进行磋商,我们同埃及的初步会谈已经开始了。我们不愿用我们的地缘政治地位作为代价去换取缓和。勃列日涅夫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半小时,尼克松果断而又极为尊严地结束了会谈,他说他将在上午阅读一下会谈记录;问题并不像勃列日涅夫说的那么简单,他最多只能请我对葛罗米柯在扎维多沃交来的原则提出一份对案,尼克松说:

我明天将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不要讲什么君子协定。我希望你不会空手回去。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结束会谈。如果让我讲以色列应从所有被占领的土地上撤军并将这称之为已经商定的一条原则,那倒是非常容易的。这正是争议的所在;我将同意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原则。这将是我们的计划。中东是最紧迫的地区。

会谈就这样结束了。如同一九七二年在别墅里一样，勃列日涅夫平静下来了。他交给我们一份他在回国途经巴黎时要同蓬皮杜讨论的问题摘要。但是他留下了令人厌恶的印象，当三个多月之后中东战争爆发时，我们仍然不能忘记在尼克松书房里的那次会谈。

最后一天，六月二十四日，云消雾散了——同苏联领导人的会晤总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尼克松住所前的草坪上告别。勃列日涅夫一再向尼克松表示谢意并强调说，他是怀着“友好情谊”离开这里的。他期待明年在苏联欢迎尼克松，并希望到那时情况会有新的进展。尼克松说，“美苏关系的改善不仅有利于我们两个伟大国家间的和平事业，而且有助于建立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能享有和平的时代。”

尼克松陪同勃列日涅夫乘直升飞机到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勃列日涅夫借此机会建议说，如果苏美两国在欧洲裁减军备谈判开始时先象征性地各自裁减一万人，那么也许会推动这一谈判的进行。

这个建议后来没有什么结果。尼克松向勃列日涅夫告别，这是他们作为平等对手的最后一次会晤。而一年以后在莫斯科的下一最高级会谈则是在尼克松辞职前仅一个月时进行的。

小 结

一九七三年的最高级会谈揭示了核时代暧昧的东西方关系。双方都痛切地意识到战争的风险。我现在仍然认为勃列日涅夫当时是真诚地为建立长期的稳定作准备。但是任何苏联领导人都不会脱掉他的哲学外衣和放弃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一个国家的作用最终是由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老化的苏联领导人的

体力和精力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度；在经过了终生奋斗之后，愿冒风险的程度可能已经减弱。但是苏联领导人在力量对比处于有利地位时，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克制的。他们不会因为平庸的顾忌或同西方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而无限期地不去利用取得战略利益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看，一九七三年最高级会谈几乎可以肯定是不会顺利的——不是因为外交政策的原因，而是因为美国国内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混乱。正象多勃雷宁两周以后尖刻地告诉我说的，到访问结束时，苏联代表团看到了水门事件已经压倒了最高级会谈。更严重的是，最高级会谈开始使苏联领导人相信，尼克松的问题也许是无法挽回的了。这还没有促使他们把苏联的老本拿来孤注一掷。但毫无疑问，他们并不想花什么心思去阻止友好国家的冒险——这就肯定地促进了中东战争的爆发。

一觉察出水门事件，外交活动的速度几乎立刻放慢了。勃列日涅夫从美苏会谈第一线脱出身来。既然尼克松总统可能垮台，那就没有必要把总书记的威信牵扯进去。正如关于欧洲年的谈判一样，外交变得日益官僚化和谨小慎微。一九七四年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莫斯科举行的最高级会谈远不如以前两次，这次会谈缺少冲劲和基本宗旨。

尼克松政府的战略首先要求有一位果敢的总统，他愿意增强美国的力量去抵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而且如果苏联人愿意在这个基础上接受共处，他就准备去进行严肃的谈判。可是这两种行动方针均因美国国内的狂热气氛而遭到破坏。许多批评我们的人并没有击中要害。自由主义者指责我们不择手段，而保守派则责难我们过分迁就。他们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我们确实没有别的选择。由于水门事件，我们无法采取对抗性的外交政策，而调和政策也失去了意义。适度是一种美德，但适度毕竟只存在于那些被认为

有选择余地的人当中。在核时代，我深信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项长远的政策。这项政策要么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避免对抗，要么对苏联的扩张不能置之不理。即使在问题似乎还不明朗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反对苏联力量的增长，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增长。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必须准备实行真正的共处。这是空前复杂的挑战，需要敏锐的判断力、决心和忠诚。在七十年代初，这种挑战曾被我们国内的危机所淹没。但挑战仍然存在。美国对此如何反应，将决定一个自由社会能否维护其安全并使自身的价值得到发展。

① 见莫里斯·戈德布卢姆的文章《迄今为止的尼克松》，《评论》杂志（一九七〇年三月）第三十——三十一页；诺曼·波德霍雷茨的文章《关于越南问题的一点意见》，《评论》杂志（一九七一年五月）第九页。

② 见诺曼·波德霍雷茨的文章《当前的危险》，《评论》杂志（一九八〇年三月）第三十一——三十二页。

③ 见诺曼·波德霍雷茨的文章《未来的危险》，《评论》杂志（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三十二页。

④ 见《白宫岁月》第五十九——七十页，第一二八——一三〇页；第一二五二——一二五七页。

⑤ 詹姆斯·伯纳姆著，《为世界而斗争》（纽约州康沃尔：约翰·戴公司，一九四七年出版）；丹尼尔·P·莫伊尼汉的文章《人权政治》，《评论》杂志（一九七七年八月）；诺曼·波德霍雷茨的文章《未来的危险》。

⑥ 为了精确地进行分析，见雷蒙德·阿伦所著，《维护衰落的欧洲》（印第安纳州南本德：雷格纳里—盖特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原著为《我对衰落欧洲的维护》（《文汇》月刊第四十九号，一九七七年九月和十月，第三期和第四期）。

⑦ 《白宫岁月》第一五〇——一五五页。

⑧ 同上，第一二六九——一二七一页。

⑨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的《国会对于苏美关系的展望：紧张与缓和》——一个考察团的访苏报告（一九七三年四月，第九十三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见第十一页）。

⑩ 经多勃雷宁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六日同意的苏联关于出境税的声明全文如下，苏联政府的正式信件

凡愿离开苏联到其他国家永久定居的苏联公民的申请正在受理中，并将根据具体情况，对上述申请逐个地作出决定。作为一项规定，所有这些请求都得到了认可。例如，在一九七二年曾表示愿意去以色列的那些人，申请的人当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点五

的人获得了批准。将来仍将采取类似的态度。(应该指出,一九七二年获准离境去以色列的两千多人事实上并没有使用这种许可证。)

关于离境去国外长期定居的苏联公民要补偿国家的教育经费问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通过的法令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根据这一法令作出的一项决定规定,获准迁居外国的苏联公民可以完全免交上述费用。因此,苏联当局在考虑愿意迁居外国的苏联公民的申请时,有权决定只向这样一些人征收这种情况下的正常国家税收。当局现在正是以这一种权利为指针的。最终,现在和将来都只向那些离开苏联去别国长期定居的人征收这种正常的、微不足道的税收——而这种税收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法令下达前也是征收的。

无需说,正如象在其他国家一样,在苏联,由于国家安全的原因,有些公民被禁止到国外去。这种情况现在有,将来还可能会有。

苏联政府在回答某些补充性问题时,提供了下列说明:

A. 上述声明应被视为一项正式声明。

B. 声明中的那句话,即:“现在和将来都只征收正常的税收——而这种税收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的法令下达前也是征收的。”没有附加时间限制。因此,任何暗示存在这种时间限制的解解释都是不符合苏联政府的立场的。

C. 根据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的法令条款本身及苏联部长会议根据这一法令随后作出的决定,对补偿国家教育经费的要求正在免除。苏联认为,这一情况排除了中止或废除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的法令的必要性。

D. 总统和政府成员可以自由地向国会通报苏联这一正式声明的内容及这些补充解释的要点。

① 为详细地研究限制战略武器第一个条约的这些和那些方面,请见《白宫岁月》,特别是第二十八章。

② 同上,见第一一三〇——一一三一页。

③ 请把麦克纳马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发表的态势声明与克拉克·克里福特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发表的态势声明(见第九十四页)相对比。

④ 见《白宫岁月》第一一五二、一一五一页。

⑤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华盛顿签订的最后文本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下称缔约双方)

以加强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目标为指针,

意识到核战争将会对人类造成浩劫性后果,

从要创造一些条件以减少并最终消除世界任何地方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这一愿望出发,

从它们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的关于维持和平、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和避免战争的义务出发,以及按照缔约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所参加的协定,

从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签署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互关系基本原则出发，

重申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互关系的发展并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它们的利益，

兹协定如下：

第一条

美国和苏联议定，它们的政策的一个目标是消除核战争的危险和使用核武器的危险。

据此，缔约双方议定，它们行事的方式将是为了避免出现能够使它们相互关系危险地恶化的局势，为了避免军事对抗，而且为了消除它们之间以及缔约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和其他国家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

第二条

缔约双方议定，根据第一条并为实现该条中阐明的目标，要从这一前提出发：在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各方将不向对方、对方的盟国以及其他国家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缔约双方议定，它们在制订它们的对外政策时和它们在国际关系领域中采取行动时将以这些考虑为指针。

第三条

缔约双方保证以同本协议的目的一致的方式发展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第四条

如果在任何时候缔约双方之间或缔约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显得牵涉核冲突的危险，或者如果非本协议缔约国之间关系显得牵涉到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或缔约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和其他国家之间核战争的危险，美国和苏联根据本协议条款应立即相互进行紧急磋商，并作出避免这一危险的一切努力。

第五条

各方可以自由地把根据本协议第四条所进行的磋商的进展情况和结果通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秘书长以及盟国或其他国家的政府。

第六条

本协议的任何一条都不得影响或损害：

- A.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
- B. 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包括关于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条款，
- C. 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在条约、协定和其他适当文件中对它的盟国或其他国家承担的义务。

第七条

本协议无限期有效。

第八条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华盛顿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英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

总统

理查德·尼克松

(签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签字)

⑯ 见《白宫岁月》第一二二二——一二二九页；理查德·尼克松著：《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赛特与邓拉普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六一三——六一四页。

⑰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发表的美苏最高级会谈公报中关于中东部分如下：

双方对中东的局势表示深为不安，就如何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法交换了意见。

各方表明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双方同意继续作出努力来促使中东问题尽快解决。这种解决办法应符合那个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同这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相一致，应该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予以应有的考虑。

第八章

印度支那：一叶知秋*

背信弃义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订了“在越南停战和恢复和平协定”，实现了尼克松政府及其反对者所共同抱有的举国一致的渴望。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但对于印度支那的几百万蒙受苦难和坚持斗争的人民来说，深知他们的自由是朝不保夕的。

协定刚刚签订，北越领导人立即显示出：停火只不过是一种策略，一种通向武力接管整个印度支那的歇脚站。巴黎协定墨迹未干，他们就已经开始背弃他们的庄严义务。事实上，他们从来就未曾放弃过战争。一九七三年二月我访问河内时，出于极其诚挚的善意和信任，那时还可能把那些已经出现的明目张胆的违反协定的行为，解释成为十载战争的不由自主的反射作用（详见第二章）。但是，到了三月，这种借口就无法成立了。情况已经清楚：停火只不过是一种稍加掩饰的伪装，以便把人员和武器运入阵地，准备再一次进攻。那些违反协定的行为，并不止是战术性的，而是在彰明较著地采用协定所明确禁止的手段，准备新阶段的战争。

* 本章略有删节。——译者

规模是令人吃惊的。正如我们在五月初向苏联抗议时所列举的，三个月期间通过老挝渗透到南越的部队，为数已达三万。协定规定：作战物资只能用于替换损耗掉的装备，一件换一件，并需要通过一系列国际检查站，才得允许运入。美国始终信守诺言。北越则出动了成千辆卡车，运进了三万多吨军事装备，而没有一辆是通过国际检查站的。他们还千方百计阻挠成立国际检查站。这样一来，在他们的作战物资库存里，又增加了四百辆坦克、三百门重炮，还建立起一个防空设施网。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本来应该负责监督停火的，但其活动却遭到了北越有计划的阻挠。因为，该委员会两名成员（波兰和匈牙利）都是共产党人，他们拒绝证实共产党方面违反协定的行为，从而使得委员会的其他两名成员（加拿大和印尼）的意见，被一笔勾销。

巴黎协定第二十条，要求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全部外国军队。在另一份书面谅解中明确规定：北越部队属于协定条款所指的“外国”之内。第二十条还禁止在印度支那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或通过其领土进行渗透。北越根本无视这两条规定。他们拒绝撤出柬埔寨，尽管——象我们现在已经明白的那样——连柬埔寨共产党人也要求他们撤走。^①河内在老挝的部队，实际上反而加强了。进入老挝的卡车超过了一万八千辆。北越部队在柬埔寨直接参加了战斗行动，并通过老挝和柬埔寨提供后勤支援。^②

南越的行为也并非纯洁无瑕。在开初几个月为争夺地盘的小型交火中，南越除自保外还有点还手余力。对指派参加联合军事委员会的越共联络军官们曾进行过一些骚扰。由于河内不同意举行全国性普选，南越对于成立“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也裹足不前。但是，这些事件都无法和紧接着出现的河内为改变整个印度支那力量对比所进行的无端的、而且最终是决定性的那些活动相提并论。

一九七三年三月签订停战协定还不到两个月，我们就面临着侮辱协定每一重要条款的粗暴挑衅。于是就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应否为执行协定而采取行动？我们是否有权采取行动？

我们在签订停战协定时，也不是那样天真的。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提到过的，我从来不相信河内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巴黎协定所规定的军事平衡，至少它还得再作一次试探。按照我们估计，西贡是有能力对付北越的多数入侵的，特别是如果美国能够在停战协定允许范围之内提供足够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话。但我们也认识到，可能出现推翻协定所规定的军事力量平衡的严重行为，那时就只能靠美国的报复性威胁的压力才能加以防止。因此，我们一直把美国空军视作遏制重新爆发全面战争的主要威慑手段。尼克松总统就是用这点作保证，来劝说南越总统阮文绍接受巴黎协定的。如果河内得以随意渗入印支各国，得以从长达七百英里的边界上随意选择进攻点的话，那么西贡政权就无法生存，这是不言自明的。

显然，和平协定本身并不保证就能实施，有些人怀疑我们有权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有权声明我们将采取这种行动来保卫巴黎协定，他们正是回避了这一点。在国务卿罗杰斯一九七三年四月致参院外委会的备忘录中，阐明了总统在签署巴黎协定之后继续采取空中行动的法定权力。国会图书馆受该委员会委托于一九七三年四月初所作的研究报告中也曾同意说：“无法阻止在越南和老挝重新出现敌对行动，而总统保留有在签署巴黎协定之前他所掌握的进行战争的一切合法权力。”^③但是，自那以后，各种论点都出现了；它们提出，尼克松向阮文绍所作的保证（必要时将采取军事行动以保卫巴黎协定）是不恰当的、不合法的，或者说是不必要的。

论点之一认为：尼克松的保证不够恰当，因为他提出保证的那封信从来就没有公布过，或者说没有经过国会同意。^④这类批评有

许多漏洞。漏洞之一是，许多战后的总统都曾有过类似先例，即通过不公开的函件来表明总统的意图，阐述他对有关国家利益问题的看法。譬如，肯尼迪总统就曾向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作过这种允诺。^⑤ 这些总统的保证显然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但它却阐明了一种意图，受函人得认真考虑。尼克松也从来没有把它致阮文绍的函件当成一种法律义务，作为采取报复威胁的正式根据，或者用它作为论据以反对后来阻止其实施的立法。尼克松（和肯尼迪）为了国家利益而这样作，其合乎宪法是有大量先例为证的。

从十年来的情况看，应当说，尼克松当时如能提请国会正式批准巴黎协定，以作为实施的依据，这会是明智的。现在我的确觉得——尽管当时我并未提出——一九六九年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他本应要求国会授权，以继续进行这场他继承下来的战争。这样，让国会来选择：要么继续执行当时的战略，要么停止我们的介入。尼克松在他第一任期内，为致力停止这场并非由他发动的战争，肩负了过多的责任；而许多当初曾招致卷入这场战争的人，现在又给他捣乱，还有国会不断施加压力，使得我们的战略软弱无力，外交不得灵活。

尼克松之所以一九六九年未这样做，而一九七三年又未加以考虑，是因为他以为，这样做不符合总统的职责。一九六九年他认为，要求国会确认他有权进行一场已经在进行中的战争，是一种放弃职守的行为。一九七三年他又确信，要求一个抱有敌意的国会授权他实施停战协定，意味着坦白承认自己在国会讨论时没有进行抵抗的权力，这将会招来北越的全面进攻。因此，他就着手进行了他认为符合国家利益需要做的事，但这实际上等于是向国会挑战，要国会禁止他这样做。

对于所谓“非法秘密协定”的指控，最直接的驳斥就是，尼克松的保证并非秘密的。他的政策和意图全是公开的。事实上，尼克

松保证的这种公开性，正是促成阮文绍被说服来签署停战协定之关键所在。*尼克松和他的国防部长及其他官员们都曾一再声明，政府打算实施停战协定。声明有时甚至并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如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停战协定条款时的讲话。而国防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一九七三年四月一日的电视答记者问和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对记者的谈话，强调得更为明确。有时强调说：对于我们使用空中力量并不存在任何正式的禁令，如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沙利文的电视谈话；而我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的电视谈话中，又重申了这点。有些讲话语含凶兆，如说我们过去曾经用过武力，今后还可能再次动武。尼克松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曾警告说：“我只想提醒一点：根据我在过去四年的行动，北越人不应当漠视我们对违反协定的行为所表示的关切。”（这类警告在本章后部曾有引述，而在注释中则更为详尽。）^⑥尽管个别的声明提得不那么直截了当，但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三日公布的总统年度对外政策报告中，对于这些声明的总的作用曾作过正确的概括。他说：“这种行动（指大规模违犯协定）将危及那得来不易的印度支那和平，使对抗的危险再度出现……我们已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告诉过河内：我们决不会容忍违反协定的行为。”

新闻宣传界的反应，——特别是对尼克松三月十五日记者招待会上那次几乎毫不掩饰的威胁的反应，都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我们对总统这一意图没有任何保密。请看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八日《华盛顿邮报》社论：

* 尼克松于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四日致函阮文绍，内称：“为此目的，我愿向您重申我过去的保证。协定签字时，我将要十分明确地强调：美国承认您的政府为南越唯一合法政府；我们不承认任何外国军队有权留在南越；要是协定遭到违反，我们将作出强烈反应。”

我们毫不怀疑，只要总统决定，他能够恢复轰炸——即使现在，当 B-52 机群天天都在柬埔寨制造大批死亡的时候，看来谁也不曾去注意过这些。另外，我们也并不怀疑，尼克松总统态度相当“强硬”，足可促使他决定进行轰炸；对此也未闻有人怀疑过。考虑到他曾经大胜麦戈文；考虑到他在处理国事时显然决心避免必须依靠国会或与之合作；考虑到他与莫斯科和北京建立了新关系，我们甚至不会认为，恢复轰炸将会对他为谋取第二任期的内外计划带来严重损害。他只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来推行其越南政策，这使他处于一种令人羡慕的地位。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七日的《纽约时报》也提出了同样的解释：

总统使人毫不怀疑，他认为恢复轰炸和港口布雷是针对北越的一种可行的抉择。最近河内领导人曾用推迟释放美国战俘的办法，来考验总统对维护停战协定的决心；当他们看到政府的坚定性时，他们就恢复了原来协议的进度。眼下的反应，看来也是相同的。

总统决心使用武力，这是人们十分了解的；而在一九七三年初，他这样做的权力也仍未受到破坏。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对国家利益所在的想法问题。我们对实行协定的决心和那些由于战争引起的各种狂热情绪正好针锋相对。有些人一向要求我们撒手不管印度支那的非共产党人，现在他们又企图从战争的结局上找寻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照他们看来，既然签了协定，就该撤下印度支那不管；这同他们过去所主张的片面撤出一样，都是无害的。他们并未把巴黎协定看作是一种体面的妥协，而只看成是实现了他们那个无条件撤离的老处方。他们想硬加上他们那种协定文本。而我们要是照他们那样做了，日后的麻烦要多得多。正如所料，对这种主张我们不能不加以拒绝。在战争中，我们拒绝无条件投降。我们当初之所以必须把战争打到体面地结束为止，正是为了维护协定的各项条款。我们不想把牺牲了五万美国人才取得的東西白白地丢掉，也不想抛弃掉那几百万相信我们会信守诺言而与我们并肩战斗达十载之久的人民。我们确

信：如果把一项庄严的协定当作无条件投降而一走了之，其结果对于国际局势的稳定，对于美国保卫自由人民的决心，都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那么，应当怎样来维护巴黎协定呢？那些批评我们的人喜欢的答案是：“通过外交途径。”但是，这种答案完全不能解决问题。正是通过外交，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产生出这一纸协定，而协定却又遭到破坏。何况外交工作还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我们曾经对河内施加军事压力。有效的外交，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能言善辩，而是取决于对方对得失利害的估计。除此而外的一切论点，都不过是腐儒之见，回避问题而已。

凡是经历过尼克松第一任期内那种激烈斗争的人，都会认为如果再次动武，哪怕为期只有几天，在国内也会招来爆炸性的反应；对此他们无法泰然处之。激进的批评者们当然每天指责我们嗜血好杀，他们满口玄妙的心理学理论，硬说我们偏爱暴力。但这只表明他们内心的混乱，而并非进行理智的分析。在这种新形势下，这些一贯反战者又增添了一些全然不同的伙伴：一些过去支持政府作战、但现在觉得应该住手的知名人士。他们认为我们已尽到责任，可以体面地摆脱了；再要坚持一个体面结局，则无补于国家利益。这一派人的观点的矛盾之处在于，既不赞成用武力威胁，又希望武力威胁能遏制那可能需要动武的局势。我的故友、才华横溢的贤哲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在《新闻周刊》专栏中所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他说：

许多人(其中包括我)由于觉得麦戈文的作法会太丢脸，勉强地支持了总统的越南政策。如果总统再次出动飞机轰炸河内，这些人就会向自己提出一些难以作答的问题了。

据白宫估计，几个月之内，至少在秋天以前，北越不可能派遣主力向南越展开一场胜利的进攻。那么，在这几个月期间，难道南越还学不会自己保卫自己的地盘么？如果说不能，为什么不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是否为了证

明总统的夸夸其谈是当真的，所以我们就只能再次出动飞机轰炸北方？这样做就能奏效吗？去年十二月巴黎协定签订之前，参议院曾经打算拯救河内，这次是否要这样做了？

人们最真诚地希望永远也不要提出这些问题来。矛盾的是，能抱这种希望完全是由于我们的总统被夸夸其谈缠住了身而别无良策，他只能在一且继续出现违反协定的行为时，把威胁言词付诸实践。莫斯科和北京无疑是了解这一点的，它们也无疑会让河内了解这一点。

艾尔索普的高论是最近常听到的。意思是说如果接受援助已达十年之久的南越还无力自卫，那么今后就别再指望它能做到这点了。这就等于把几百万憎恶和恐惧极权主义的越南非共产党人交给极权主义。这种理论今天在欧洲也不适用，北约组织成立已二十四年，但那里仍驻有三十万美军。在停战已达二十年之久的朝鲜，也仍有五万美军。至于在其他一些远比南越更有自卫能力的地区也是同样。我们之所以要继续承担义务，道理同在欧洲和朝鲜一样，怀疑盟国有完全自卫的能力，担心撤掉保护伞会鼓励侵略。

尼克松和我一样，都希望艾尔索普的第二个论点能够成立，即尼克松既然以毫不留情闻名，这就可能有助于遏制粗暴的违反协定的行为。当然我们的声明中是有些吹牛成份的。但要是讹诈不成的话，又该采取甚么政策呢？一纸保证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得以生存下去的协定签订才几个月，难道就让河内帝国主义一口吞掉它们吗？这对那些同美国结盟、依仗美国的国家将会有甚么影响呢？要是我们能够放弃印度支那，难道就不会放弃南朝鲜或任何其他友好国家吗？正是这些考虑迫使尼克松和我得出结论（尽管我们自己并不情愿）：对于河内恶意试探协定究竟有多大的有效性，我们必须给以回击，而别无选择。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答问时曾说过：

有关人士应当自问：美国究竟应当怎么办？如果我们既不能进行威胁，

又不能提供物质刺激；如果人们批评我们试图以武力维护协定，而又极力不许我们提供经济刺激作为维护协定的另一动力，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采取甚么立场呢？我们也会自问：如果这一历尽艰辛、作出大量让步才取得的十分庄严的协定也被干脆置之不理，那么，今后的情况将会怎样呢？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深刻问题是，在一项经过国际会议批准的协定横遭破坏时，我们却视作无足轻重而无所作为。这种协定我们是否应当签署？

美国人民对于我国利益之所在，当然有权持不同看法，但人民绝不会放弃自己的职责。尼克松大胜麦戈文而当选，在民意测验中又稳操胜券，都证明我们的行动是得到支持的。一九六八年越历春节攻势之后，在美国公众舆论中出现了三种明显的多数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当初介入越南就是一个错误，第二种意见要求停止这场卷入，但是更多的人则拒绝和平运动提出的立即无条件撤出的主张。^①我们继承了这场战争，又面临着人民的矛盾心情，而结束战争的难题却要我们来解决。毫无疑问，许多人对战争完全厌倦了，担心会无限期继续下去，但他们也是不情愿打输的。精疲力竭不能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

的确，这就是政治家最感棘手的问题。领导一个民主政府，碰上这样的核心问题，在美国的总统中尼克松不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一位国家领袖依照他的良知和判断行事，究竟能有多大的作为呢？到了甚么程度他才必须屈从于公众的心理，而不管他认为这将给国家和世界和平带来何等的灾难？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地答复。极端的情况是容易处理的。困难出在那些公众意见本身就模棱两可或自相矛盾的含糊领域；或者在那些公众意见根据不足甚至可能招致灾祸；而政治家本人又拿不出足以说服他们的证据来的地方。极权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对于当地人民或世界和平的稳定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个问题正如一切潜在的危险一样，在一九七三年还是无法证明的。但此时此刻（一九八一年）

怀疑这一点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一位总统如果把他的领导和民意测验投票结果等同起来，那么他注定将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而一位总统如果用他的个人判断完全取代其他民选代表的意见，那他就又破坏了民主的精髓。软弱的总统试图用民意作自己行动的挡箭牌，但到头来民意又是不会原谅灾祸的，尽管灾祸就是由这种民意本身招来的。一九三八年慕尼黑会议之后，张伯伦曾是英国最受欢迎的人；绥靖主义恰恰反映了当时舆论的主流。二十个月之后，绥靖主义却成了意志软弱的绰号。坚强的总统有时过份依赖自己的判断，但有的却正因为这种果敢决断而在后来被奉为伟大。尼克松还没来得及在解决越南问题方面证明自己的信念正确，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信念采取行动，命运就已注定要他下台了。

阮文绍访问圣克利门蒂

在我们把注意力全部转向北越违反协定的行为之前，我们必须料理一桩巴黎谈判的遗留公案：我们曾经许诺我们的盟友、南越共和国总统阮文绍访问美国总统。这一许诺是促成停火的一个额外诱饵。阮文绍坚持了几个月，反对那个将要有效地分割他的国家的和平协定。巴黎协定的条款，无论是与我们的反对者或是支持者所能想到的相比，都要更好些。谈判三年，阮文绍曾经同意用这些条款作为建议进行谈判，因为这时北越人似乎不可能接受它们。后来北越人接受了，他又把让步的过失推给我们。他的真意是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把最后一个入侵者赶走为止。美国公众舆论不能容忍这样做，这并非他的过错。

阮文绍同我们斗争，用的是典型越南手法：坚持不让、专心专意，加上两面手法。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一个独立、安全的南越。

我们参加巴黎协定谈判的人，既不玩世不恭，又不天真轻信。我们预见到北越要继续施加压力，但是我们已实现了力量的平衡；而如果还想做得更多，国会肯定会投票决定，要我们无条件退出战争。美国希望，军事僵持局面至少能保证安全，还希望也许有朝一日能导致由越南人自己进行政治对话。

阮文绍是从望远镜的反面一头来看问题的。在他看来，即将来临的不是最终的和平，而是一个直接敌人。停火以后，我们的军队撤到半个地球以外去，而他的人民则继续面临着一支决心要摧毁任何印度支那独立希望的敌军。我们决心要控制河内的野心，对此我们深信不疑；而他的双眼则紧盯着靠不住的将来。他的看法基本上是对的，因为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无法贯彻其决心；而且即使它能贯彻，下届政府也可能从我们认为负责的行为上畏缩后退。阮文绍认为，我是和平协定的设计师，因此对我深怀敌意。而我，尽管同情他的担心，但别无良策。当北越接受了我们经阮文绍默许提出已达三年的和平条款时，美国是不能加以拒绝的。阮文绍为他的人民的自由英勇奋斗，是一位英雄人物，我对他至今仍怀有敬意；他之终归失败，在于那种他本人、他的国家，以及我们都无法控制的客观环境。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日至五日，阮文绍访问了美国。这次访问没有什么可以引为自豪的。尽管在整个战争中他的同胞都和我们并肩作战，但我们却从来没能在美国大陆上接待过他，怕引起群众骚乱。他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关岛、夏威夷和中途岛会见几位美国总统。从来不许他踏上美国大陆。

一九七三年的访问本意是想弥补这一点，表明和平时期的一种新关系，以及我们致力于南越的自由事业。结果却适得其反。战争的结束并非公众骚乱危险的结束。因此，我们决定在圣克利门蒂的西部白宫接见这位盟国领袖。为了他的国家的自由，美国及

其盟国有好几万人、南越有几十万人献出了生命。到达和离开的仪式都只能在警卫森严的总统大院举行。连国宴也被取消，改成了小型家宴。借口是尼克松的餐厅只能容纳十二个人；实际原因是怕组织不起一个有代表性的陪客名单，也怕引起敌对性的游行示威。

为了实现访问华盛顿的诺言，安排了副总统阿格纽在首都任东道主。在阮文绍的飞机抵达前不久，我同阿格纽通过一次电话；从电话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华盛顿的气氛。阿格纽抱怨说：只有一位内阁阁员、劳工部长彼德·布伦南愿意参加欢迎仪式。愿出席副总统举行的宴会者少得实在惊人。多数内阁主要阁员都找了个借口出城去了。简直是桩丢人的事。我在华盛顿时，曾经隆重接待过几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一些专门斥责美国的中立国领导人来访时，高级官员们争先恐后地出席欢迎国宴。但是，这位友好国家的坚强不屈的总统却成了贱民。十年来，那些要把他的人民抛弃给民主的敌人的人把据说他不民主当作一个借口。阮文绍当政时，越南并没有乘船逃跑的难民。人们逃离共产党控制区，大批地涌进他统治的地域；他们用双腿投票赞成他。一些腐儒们把这种逃跑说成是因为我们进行了轰炸；但在轰炸停止之后逃跑仍继续不断，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对共产党暴虐统治的一种反应。阮文绍曾经采取措施使他的政府民主化；甚至在共产党恐怖主义把他的最好的官员作为主要打击对象的时候，他还是照样在做——尽管他的民主化的程度还很不够。所有这些，并未能使那些批评他的人对他更好一些。

当然，用我们的标准看，很难说南越是民主的。批评他粗暴和贪污是有道理的。但是，当那些在西贡的多元政治中，感到牢骚满腹的反对他的人向我们的报界表达他们的不满时，人们并不去同河内作比较。在河内，根本不容许反对派存在，报纸受到控制，禁

止同外国新闻界接触。总之，引起美国对阮文绍的反对情绪的，并不是由于过细地辨析了他的民主程度。他成了在所有民主国家里都存在的那种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混乱局面的牺牲品；这种混乱表现为用双重标准进行判断。当我们向欧洲盟友试探能否结合阮文绍这次美国之行去欧洲访问，或者单独地邀请他前往访问时，人们的反应是尴尬的沉默。他和他的外长从来没有在盟国首都受到过接待，只有谈判地点巴黎是个例外。把阮文绍政府当作非法机构来看待，也就是走向抛弃他的第一步，看来积习已深。与此同时，那个甚至连首都都还没有的共产党临时革命政府的影子内阁的所谓外长阮氏萍女士，在东欧却被捧作英雄接待。

这是一种奇怪现象，这种自我催眠术使得一些正直而严肃的人把他们的愤慨心情指向了他们所谓的保守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在欧洲流行一个口号，叫做“不与左派为敌”。二次大战以后，我们看到，西方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西班牙、葡萄牙、南朝鲜、希腊、伊朗、南越等国政权的不法行为。而对于所谓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第三世界的左倾专制国家、当然还有共产党北越的残暴行为，人们则要克制得多，有时甚至还为之作些辩解。

人们不去过问这些“进步”政府的国内秩序之由来——即由于他们实行专制主义——判断的标准显然只看其人民是否驯顺；而那些保守派政府之所以面临骚乱，纯粹由于他们既没有进行有效镇压的理论，又没有这种机构。人们不去过问这些保守派政府撇开它们的邻国不管，它们有时还演变成民主制（如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而苏联的军事力量，则用一种普教学说的理论作外衣，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世界各地。二次大战以来，在许多激进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也未见有什么进步的记录。我们这个时代里大量的移民，往往是从共产党国家外流，而不是迁到这些国家去。但是，这些年来，人们的蔑视和愤怒总是不相称地指向了西方的一些友

邦，如一九七三年的阮文绍和七十年代末期的伊朗国王。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们的民主原则和安全需要是一致的。但是，现实情况却是我们所认为“正常”的立宪制民主，无论从历史潮流和当今的广大世界看，都还为数不多。这并非偶然。立宪制民主的权威是抽象的：一切服从法律。立宪制要能生效，必须使人们确信，法律反映绝对真理的标准，法律产生于公众普遍接受的政治程序。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或在大多数时候，这些条件并不具备。法律只是当权者的一道指令，并非经由立法程序产生。政治就是决定由谁来掌权发号施令。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利用一种相互尽义务的观念，把其个人权威加诸臣民；十七和十八世纪时，受到习惯限制，国王自称“君权神授”进行统治，其权威也建立在同样的观念之上。但无论上述哪种情况，传统都有一种限制作用。某些勒索要求之未能如愿，并非因为遭到禁止，而是由于还没有先例。十八世纪的欧洲还没有任何统治者能征收个人所得税或是征兵；简单说来，这种独裁主义，在当时还受到相当严格的制约。

奇怪的是，民选政府的出现，反而扩大了当局可以向人民提出要求的范围。从“人民”的本义讲，当然不能搞自我压迫；于是议会或以人民名义进行统治的人作为人民意志的代表，它的要求就是至高无上了。国家的权力随着那些自称代表人民的人声称拥有的权力的扩大而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极权主义是对民主的一种歪曲的模仿，是从反面证明民主是正确的一种事物。而现代独裁主义则是传统的个人统治的残余。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独裁主义能演变成为民主制，而那些现代极权国家则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演变。个人统治有其固有限度；而那些自称代表普遍民意的政府却从来也不会容许这种克制。

但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使得独裁主义政府比起那些极权政府

来非常容易遭受内部颠覆。在那种个人之间相互承担义务的纽带被折断之后，统治者和臣民双方就都陷入了混乱之中。对统治者来说，由于长期单纯依靠武力进行统治而失去了合法性；对臣民们来说，一旦过去的那种服从准则化为乌有，似乎任何指示都成了压制性的了。我们的困境正在于：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里，仍然是个人统治。向立宪政体转变是一个复杂过程；要是操之过急，前景则更可能是极权主义，而不是民主制。

民主制的一个前提是失败者要接受失败，而作为报答，他在下次较量中可能获得胜利的机会。在这点上，取决于存在一个温和的中间派。但当极权主义分子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成功地组织起一场游击战争时，这种演变几乎必然要遭受挫折。这将迫使政府采取镇压行动，从而开始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得政府和反对派双方都同时卷入，而任何形式的温和中间派也就无法存在，从而正中叛乱分子下怀。再者，恐怖主义的主要打击对象，几乎总是那些最有能力、最忠诚的官员，而留下一些腐化分子在位；这些人鉴于其处境危殆，便更加放肆地干着不法行为，以捞取最大的物质补偿。

对于这种历史现象，美国的反应总是认为危难中的政府为求得生存，最好的办法是加速民主改革，同时让出部分权力以扩大拥护者的基本队伍。但是，内战（包括特种类型游击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国内舆论陷于分裂；而首先遭殃的则是民主政治的精髓——妥协。内战的结局几乎总是要么胜利，要么失败，从来没有导致成立联合政府——而联合政府则正是美国喜好的处方。让步被说成是当权者软弱的表现，而不是宽宏大量。这样一来，权威的解体过程加速了，而不是被制止住。至于改革，以在内战爆发之前进行最为合宜；这才能事先主动从治本上着手。当然，要是起义一方得到外国的鼓励、财政支援、武器装备或人员培训，那么，内战之前改革还是不能奏效。妥协的第二个时机，在胜利之后（如林肯在美国曾经

打算做的，或一九七〇年后的尼日利亚那样)。但是，由于西方忌讳武力，加上独裁主义者的无能，通常总是使得这种设想难于试行。至于对内战的所谓“政治解决”办法，尽管人们喜欢高唱由有关各方进行谈判的调子，历史经验却总是证明它无济于事。要想让互相残杀的双方坐到一起来共同管理国家大事，这几乎是毫无希望的。因此，不可能设想内战能以组成联合政府而告终。最多也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使一方得以保存力量，待时机有利再来决战。所以，游击队一方似乎处于节节取胜之时，总是拒绝政治谈判的；有时进行谈判，一般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日后决一雌雄。

美国经常对于依赖我们的盟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进行政治谈判；而这种压力，常常弄得他们士气瓦解。当迫切需要显示权威时，我们常常用劝告去冲淡它。对于一个国内面临着死敌、处境困难的政府，我们的劝告常常把它搞得瘫痪无力。他们知道，这些劝告即便还未带来灾难，也是危险万分，但是，他们却又不加加以拒绝。这就是阮文绍的命运，也是其后伊朗国王的命运。⑥

阮文绍的国家，在条条战线上都遭到攻击。首先是由河内训练和装备的游击队，其次是直接来自北越的侵略大军。这还不够，他们还要受到美国的压力，要它进行大选，并对谈判采取灵活态度。这种要求，一半是出于美国人的信念，一半也是为了安抚美国国内那些永无履足的批评者。阮文绍以惊人的毅力得以驶过这段航程；他一方面同一个死敌作战，另一方面又要安抚一个不谅解他的盟友。他坚持到一九七三年，终于缔结了一项协定，这个协定，使河内放弃了它多年来的政治要求，以换取停火；停火条件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好；但比阮文绍所指望的更不稳定一些。

我对阮文绍个人并没有多少好感。但是，对他在美军撤离之后孤军作战，我深怀敬意。人们很少同情他，更谈不上了解他。但是，这并没有减弱他的自尊心。本来，一个国家元首访问却无群众

欢迎场面，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事；但他却能处之泰然，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在他到达圣克利门蒂时，尼克松发表了一篇有礼貌的致辞，其中提到了南越有进行自卫的能力——这种假想，要是遇到用苏制武器装备的河内发动的进攻，其效验如何，实在很难设想。阮文绍以高雅的姿态，附和这种神话，也不免把南越所处的地位和欧洲的作了对比：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了四分之一世纪，但欧洲仍然要求三十万美军驻扎在那里。

礼仪一过，两位领导人转入私下会谈。其实，可谈之事并不多。阮文绍并没有对我们留给他的任务或对河内的狠毒居心表示为难。他实事求是地叙述了北越违反协定的行为。尼克松私下向他保证——正如他已于三月十五日和其他场合公开保证过的那样——只要需要，他将动用武力来对付明目张胆的侵犯。与此同时，他要求阮文绍表现好点，实施巴黎协定所规定给南越的义务。尼克松劝他说，要是巴黎协定失败，一定要让责任毫不含糊地落到河内身上。阮文绍指出，召开协定所规定的“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的主要障碍在于河内拒绝举行应由该委员会进行监督的大选。美国有些人在战时曾热衷于鼓吹“政治竞赛”，河内在和平时期是决不会进行的。他们在自己统治的国家里，从来不屑于搞大选，现在更不会把一代人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在选举上冒险了。

尼克松和阮文绍的第二天会谈，大都是有关对南越的援助问题。这个题目有点不现实的成份，因为参加谈判的美国人知道，在国会里，支持经济发展援助的人也在迅速消失。自由派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很少承担过义务要保证南越的生存；保守派认为他们支持战争得到体面结束已是尽了他们的义务。两种意见都反映了美国疲于征战的情绪。尼克松同意把西贡提出的援助数提交国会，实际结果要看国会讨论情况而定。在最后公报中阮文绍争取

到写进一条保证说：两个盟国“在美国地面部队撤出南越之后，对共产党可能重新发动的任何侵略，”都将“保持警惕。”此外还说：“如果出现任何威胁协定基础的事态，必将作出适当有力的反应。”这是尼克松再一次公开声明他打算实施协定。

阮文绍的经济要求只得到了含糊的反应，但阮文绍在离开圣克利门蒂时并未感到扫兴。飞机从加利福尼亚一起飞，他就请大家喝香槟酒表示庆祝，表达他同尼克松谈判之后的高兴和宽慰心情。⑥ 尽管他平素多疑成性，而前景又复危机重重——其中包括我们对河内违反协定的行为和对南越的经济援助态度犹豫不决。但阮文绍还是坚信，一旦危机来临，美国必将援助南越。这种信心是美国的其他盟国过去和迄今都共同具有的，这种信心构成了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一笔主要资产，而我们是万万不能把它浪费掉的。

报复行动的流产

曾经有种流行的说法：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保证南越的未来安全。这句话也许是对的；但八个星期的时间总不能说是“过了许久”吧。如果过了几年之后，对我们此时应当采取甚么反应才合适，也许可以辩论一番；但如果才过几个星期，就对违反协定的行为不作反应，这简直就是把巴黎协定当成废纸，并且在拿美国的国际信誉开玩笑。早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我就曾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讲过：

（总统）担心如果我们让自己在老挝和柬埔寨被人一口一口地咬死，那

*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是一个部门之间的协调组织；其任务是在出现危机时协调政策，审查各种应急计划。成立于一九六九年，由我任主席，成员有副国务卿和国防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有关议题所需的专家等。

么在越南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的克制没有受到那些批评者们的任何赞扬……要是越南丢了，你想他们会说些什么呢？他们会把和平协定说成是出卖，而忘掉几个月之前他们才是真正在鼓吹出卖呢。总统坚持拒绝简单地用我们的撤出去换取战俘的方案，为期达四年之久。现在他也不会让越南白白丧失掉。

另外，所有情报估计都证实，河内正是由于害怕美国作出反应，而克制自己未进行大规模敌对行动。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六日的会议上，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施莱辛格曾讲过，停火以来，河内在南方争取民心的工作进展并不太妙，但却改善了它的军事地位。他说：

这使得第三因素——河内如何判断美国在一旦重新爆发大规模敌对行动时将作出的反应——对于河内未来的决策，比起过去任何时候来，都会起更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我们对于违反协定的行为所作的反应不至于破坏整个协定。我们只想对河内猛击一掌，并不愿搞全面战争。据我们判断，一种迅速作出的报复行动可能带来一段持续的间歇，迫使双方进行一些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竞赛。迅速行动还有另一条原因：我已获悉五角大楼打算以比我原设想更快的速度从东南亚撤回我们的空军力量，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那样，由于国防部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它对自己预算的独立决定权，这就意味着我们常常不得不面对许多既成事实。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二月底出现了两次短暂的实力较量，它们都证实了我们的推断。第一次是关于老挝。尽管在我去河内时已经达成协议，老挝停火不日即可生效，但河内在老挝的代理人巴特寮仍然继续在搞富马亲王所称的“总进攻”。停战的第一天，共产党破坏停战就达二十九次。因此富马亲王要求美国派 B-52 飞机轰炸巴特寮地区。总统和我于二月二十二日晚讨论了这个问题。尼克松有些迟疑，因为他怕河内以此为借口拖延释放美国战俘。我争辩说，除非河

内因为其他原因打算同我们摊牌，否则他们是不会拒绝我们一直坚持的释放战俘的要求的。尼克松授权立即派 B-52 出击。四十八小时内老挝的停火就生效了。

二月底的第二次小型对抗倒确实是关于释放美国战俘的问题了（虽然可以肯定和老挝问题并无关系）。二月二十六日那天，河内对于第二天该释放的战俘还未提出名单来。它也没作甚么解释，尽管它曾暗示战俘的释放取决于西贡释放其政治拘留者的情况。我们在谈判中曾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力求避免这样的联系。而这件事几乎又与另一件事同时发生，华盛顿和西贡抗议对方违反停火均势在溪山新建三个萨姆—2 式地对空导弹发射场。

我们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停止撤退美军和在北越港口的扫雷活动。国务卿罗杰斯拒绝出席在巴黎的国际会议。向北越发出了一张简短的通知，仅仅告知它我们的行动。此外，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受命在中午吹风会上宣读一份措词强硬的声明指出，释放美国战俘是北越应无条件履行的义务，不得与其他任何条款相联系。一天以后，我告诉齐格勒，肯定这些压力会见效的（这次谈话中，我也曾清楚表明：打算不久即退出政府）。我说：“再过一年我将不再在这里了，那时他们将要真正给我们出难题了。倒不是因为我不在这里，而是因为他们一年后将强似猛虎了。可是现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战俘如期获释。

但是，这些还只是真正挑战之外的小小骚扰活动。真正的挑战（包括通过老挝、柬埔寨和非军事区进行大规模的人员渗透和运进战争物资）差不多违反了停战协定的每一条款。据施莱辛格估计，照这样速度进行补给，秋天以前河内就将恢复其一九七二年进攻以前在南越的军力。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曾就此事多次召开会议。作为第一步反应，决定向河内发出一些逐步升级的抗议照会，用逐渐增强的调子警告它，我们要采取报复行动。于是，一九七

三年三月四日、六日、十四日和十五日，连续发出照会。其中，十四日的照会警告说：要是河内继续进行渗透，并最后出现军事行动，那么，“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三月八日，我向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发出警告。我强调指出：苏联如继续运去大量军事援助，将被认为是不友好行为；河内如发动新的进攻，“对美苏关系将带来深远后果。”

多勃雷宁的答复也不逊色。苏联毫无错误可言。他说，我的情报要不是不准确，就是过时了。他还居然隐晦地暗示说：苏联军事装备之得以运入北越，可能还应归咎于狡诈的中国人。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事实上，战时一些运送军火的火车通过中国时，其中几百辆坦克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踪了。克里姆林宫确信，当前在北越出现的苏联作战物资是中国人运去的，他们一贯企图破坏美苏紧张关系的缓和。多勃雷宁建议我在拟议中的莫斯科之行（距当时还有八周）成行时，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此事。从这些话显然可以看出，从苏联方面我们不能指望得到甚么协助。我们也曾警告中国人；他们的回答则是含糊的。

三月十三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就此事再度开会。小组的结论是：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绝不能让敌人在年内发动大规模进攻。我们自己要小心翼翼地遵守协议，我们也要向公众揭露他们持续地违反协议的行为。在对新闻界的一切谈话中都不能把敌人的违反协议的行为，当作小事看待。

看来最理想的军事选择是，在第三批战俘释放以后立即恢复轰炸老挝的那些小路。必要时，也可接着轰炸非军事区或非军事区和南越之间的地区。最后的决定由总统采取。

但是，总统这次却是异乎寻常地犹豫不决。对于重大决策，尼克松采取小心翼翼的作法并不是不寻常的。他在考虑采取对策时通常总要反复叙述他所面临的困难处境。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内，这

种动作之后总是得出了果敢的决定。每次连续的谈话，不管看起来多么冗长，总是差不多不知不觉地就使问题更明确起来。尼克松使他的情绪逐步地达到火热的顶点，以便使事态从理智上和心理上都能与最后的决定相吻合。在明确问题方面我一般要比他快些，但他却更擅长于果断地作出决定。他的最后决定总是切中要害，毫不含糊。

但是，一九七三年三月份的尼克松，却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对于违反协定的行为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他犹犹豫豫，完全没有平素所特有的那种专心致志、有点近于狂热地作出决断的作风。那长篇的叙述还会有的，但此次伴之而来的却是找些借口，为无所作为辩护。回顾起来，现在我们明白，到三月份那时，水门事件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二月底，他曾多次同他的白宫律师约翰·迪恩长时间地在密室商谈，筹划如何对付新成立的由参议员萨姆·欧文担任主席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他对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提名帕·格雷任联邦调查局常任局长一事所举行的听证会，也很担心。早在二月二十七日，迪恩就曾经警告尼克松：水门事件的问题也许不可能无限期地捂住盖子。尼克松此时已是心烦意乱。譬如，三月六日他下令周末轰炸胡志明小道一天。首尾相接的军用卡车非法地沿着小道南下，可能是理想的轰炸目标。但三月七日他又下令取消前令。他再次声称，不想给北越以借口拖延释放美国战俘。我怀疑这个理由考虑得是否够充分。格雷在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进行调查的问题上处境困难，他每天都把迪恩和白宫拉扯进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不顾总统用行政特权阻挡，坚决要求迪恩出席听证会。尼克松显然不希望印度支那问题给他日益难办的国内问题火上加油。

三月十四日我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请求接受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关于轰炸的建议。我列举了北越领导人的种种可能动

机。他们也许认为只要有美俘在手，美国就不会用轰炸来答复他们违反协定的行为；他们也可能想试探一下我们忍耐的限度；他们还可能在一旦供应计划完成之后，再次恢复进攻。不论其意图如何，我们应充分利用一切外交途径，同时也免不了要准备好一些军事应变计划。我说：

北越无论在老挝的狭长地带“胡志明小道”，或是在南越北部的第一战区，都已经暴露出来。在这两个地区，他们都是白天活动；运输极其频繁以至道路阻塞难行。他们显然是在利用当前我们停止一切空中行动的形势。因此，在上述两个地区来一次两至三天的重轰炸，定将使他们无论在人员和物资上都蒙受重大损失。

巴黎协定的未来，确实取决于当前强制实施这一协定的行动：

（一场空袭）将清楚表明：我们不会容忍继续违反协定，定将作出坚决反应。正是由于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和十二月作出了两次这类反应，使得北越对他们当时已经决定要采取的行动重加考虑。现在，如果他们认为我们不会作出反应，而我们又确实不作，那么就等于我们在鼓励他们更多地、更明目张胆地去违反协定。而如果我们作出了反应，就会表明：他们假如废弃协定，将要付出何等的代价……当然人们可能要提出指责。但照我看，如果我们不作出反应，协定很可能因我们无反应而遭到破坏。到了那时，责难未必会比此更轻。

为了照顾尼克松对美俘问题的担心，我建议我们在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即第三批战俘释放之后、第四批释放之前，进行轰炸。

依我看，河内对我们的抗议既然用一种越来越蛮横的调子作答，我们要是不想使巴黎协定彻底完蛋，就需要作出强烈的反应。河内用老一套解释来对待协定第二十条：即要它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须待达成政治解决之后。而所谓政治解决，就等于让共产党统治。河内拒不接受我们提出的证实其渗透的文件。它用那典型的口吻，大言不惭地断言：既然按协定成立的检查站没有报告有

军事物资运进，因此那些有关非法武器的证据就不能成立。总之，美国没有资格提出此事。此案应由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来管（当然，在那儿共产党有否决权）。

面临危机时，最大胆的方针往往最安全。照我的经验看，最危险莫过于逐步升级，而敌手则相应地升级，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更高级的暴力行动，陷入无法自拔的僵局。河内不能不考虑，拖延释放美俘将使我们终止实施协定全部条款，包括撤军、扫雷、给予经援的可能性，甚至会招致更剧烈的报复——这回该针对北越本身了。正如我在备忘录中所述的：

本周就可以结束释放第三批战俘的工作。要是等第三批战俘一释放，我们立即采取行动，就会减少拖延释放其他美俘的风险。从现时到释放最后一批战俘还有两周时间。进行轰炸之后，还有时间再作有关最后释放工作的安排，也包括我们相应的最后撤军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将停止撤军作为促使他们释放最后一批战俘的手段。

总统采取了妥协态度。他同意我们的应变计划，但告诉我说：他担心会影响战俘的释放。三月十五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警告了河内。从三月十七日到二十六日，我到墨西哥南部的阿卡普尔科港度假。在这期间，掩盖水门事件的活动开始真正出问题了，闯入埃尔斯伯格诊所进行搜查的小组成员之一霍华德·亨特不断地提出要钱的要求；不过我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我的同事们当时对此还一无所知。还有一桩事加重了尼克松的犹豫不决，驻万象大使麦·戈德利从老挝打电报给白宫，对准备轰炸的时机表示怀疑，因为这可能破坏拟议中的新联合政府的组成（事实上这个政府只是在一年多以后才组成）。富马亲王可能会觉得难于同意这样做。我得悉这一电报后，指示我的新副手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他接替亚历山大·黑格）把戈德利的意见报告总统。我从阿卡普尔科通过保密通讯网电告斯考克罗夫特：

请你立即找总统商谈关于轰炸老挝的问题。我认为，戈德利关于可能扰乱老挝和谈的观点是有益的，但是上周所提出的那些考虑，仍没有改变。我不认为北越会因为我们的新一轮轰炸就改变它在撤退问题上的决定。另一个危险是，他们将推迟释放战俘。我的不同看法是，待到今秋，他们会变得更加残酷无情。

请亲自同总统讨论这一问题，最后由他决定。应让总统得知戈德利的观点。总之不能在周四(三月二十二日)夜晚之前进行轰炸。经过全面考虑，我建议就在那个时刻干。

斯考克罗夫特三月二十日向我报告了我们现在已熟知的总统的矛盾心情。他反复思忖政治上的不利后果而不作决定。三月二十一日，尼克松表示宁愿拖延撤出我们的部队，而不愿进行轰炸。他只有在“感到确能有所助益的情况下”才会下令轰炸，但这个条件是不能只靠一次轰炸就能实现的。

就在这天，迪恩告知尼克松，还有很多人有问题。这些人中有：约翰·米歇尔、查理·柯尔森、杰布·马格鲁德和赫伯特·卡姆巴克等人。他还说总统也面临问题：“在总统职务中正滋生着一种癌症。”我完全不了解总统所受到的这些压力，而在三月二十一日重申了我的立场：

在此刻进行轰炸还有一个主要理由，向河内说清楚，如果我们被迫来保卫协定，那么我们会作出他们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来。要是北越认为，只要战俘到手我们就不会再采取行动的话，今年年底时他们将会发动进攻，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进攻获胜，所有那些曾经反对过总统采取行动的人，会更加振振有词；同时，总统的整个政策基础就会遭到破坏。我认为我们整个对外政策的中心目标之一应当是：在北越重开战火之前，尽量争取更多时间。

同一天，尼克松又在同斯考克罗夫特大事推究我们计划的效用和时机。他还要斯考克罗夫特再次征询我的意见。显然，我的意见是不受欢迎的。尽管如此，三月二十二日我重述了我的看法：

这次行动可能造成重大的、但不是决定性的破坏。如果他们对我们进击不作反应，表明他们软弱；但是，我看不出他们能采取甚么行动……总之，我

的意见基本上类似一九六九年初有关朝鲜局势的意见。进行轰炸还不是十分迫切需要的，但如果现在不作反应，日后必将付出代价。

我提出 EC-121 事件^①，刺疼了尼克松。他恢复了平素的本能，觉得需要表现得至少同他的顾问一样强硬。于是，下令对胡志明小道轰炸一天。这种作法有诸多不利因素：一是时间太短，不易奏效；二是太明目张胆，对方不能置之不理；三是太显得犹豫不决，对河内起不到所要求的心理影响。但是尼克松的命令使我居于下风，结果我建议推迟轰炸，等我从阿卡普尔科回去之后，也就是等最后一批战俘释放之后，再讨论有关事项。

我们继续发出警告。此时我们已得到并不一定再需要的保证：这种报复行动对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不会产生持久的损害。不管究竟有多少价值，多勃雷宁于三月二十三日正式向我们保证说，巴黎协定签字后，莫斯科已停止对越南的武器供应，而且再次争辩说，那些从莫斯科运往河内的武器，可能是在途经中国时被滞留下来的。关于报复行动问题，莫斯科仅仅表示：“希望事态不要朝那个方向发展。”这样温和的表示反对的形式，使我们毫无顾虑了。三月二十九日，尼克松对全国讲话，庆祝最后一批战俘回国，他向北越领导人发出了强硬警告：“他们要是不遵守协定，那么，他们对由此产生的后果就得负责。”

政府的其他发言人都都曾就此题目大作文章。四月三日，国防部长理查森在出席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之前答记者问时，有过如下对话：

问：部长先生，请问我们在何种条件下才会进行轰炸以支持南越？

理查森：这是一个非笼统词句所能答复的问题，我们将要看问题如何发展，但愿其趋势是全面彻底地遵守停战协定。

问：请问我们会不会被迫轰炸北越，或再次用轰炸支持南越军队？

理查森：这当然是我们眼下不能排除的事。

四月二日我向尼克松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再次列举了可能采

取的外交和军事反应。备忘录标题是《供参考》，不要求作出决定。尼克松当时同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在圣克利门蒂。他们正受着欧文委员会的围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威胁说：任何白宫助理人员要是拒绝公开出庭作证，就将被逮捕。尼克松在我的备忘录上只划了一个记号，表示他已经看过了。报告发还回来，完全没有通常那种表明他已经仔细研究过的下划横线，或是边注评语。

与此同时，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在讨论各项计划的过程中发现，北越完全违反了停战协定，在非军事区南部特别是在溪山地区——在该处早已发现过一些活动——和在威胁着古都顺化的阿绍谷地，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地对空导弹联合发射基地，结果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要轰炸三天，以压制防空火力，然后才能进行我们真正关切的事——进攻北越在老挝的庞大补给设施。

这就再一次推迟了我们的日程表。要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进行轰炸，需要通过外交作好准备。河内从它阻止我们轰炸的计谋出发，在答复我们的抗议中暗示：它打算谈判违反协定的问题，这给我们一个双管齐下的机会。它在三月二十七日的答复中，含糊地提到了召开秘密会议，以审查执行协定的问题。三月三十一日的来信中则更为确切地提出，由黎德寿同我举行私下会谈，可以“解决那些在未来实施协定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暗礁。”当然，它既然是河内，就必得把一切违反协定的行为归咎于美国和西贡方面。的确，它甚至否认我们有资格坚持遵守协定的问题。因为，待到我们撤军完毕之后，只有越南各方才能处理这一问题。我们把这些函电告知阮文绍，但一直等到他离开美国之后，我们对河内作出答复。我们不让他怀疑我们的容忍已经接近了极限：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来信中，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违反协定的记录未作出任何说明。这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看得太糊涂了。如果重复这种违反协定的行为，必将使美国政府所谋求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无法实现。

美国方面坚决拒绝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的下述论点：实施巴黎协定第七条（有关渗透问题）只能由南越的双方来负责。签署协定的四方都有责任保证协定得以严格实施。美国方面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继续违反协定第七条负有完全责任。坚决要求它承担全部责任，并停止在违反该条和第二十条的情况下对南越进行人员和物资渗透。美国方面还坚决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根据协定第二十条的规定，无条件地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其武装力量。……美国方面愿在此指出：继续违反协定将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但在我方复信的末尾，在建议同黎德寿会晤时，又发出了一项警告：

为了制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基辛格博士建议与黎德寿特别顾问在巴黎举行会议，时间以在五月第一周内双方合适的时间为宜。

我们此刻的计划是，四月份对北越在老挝的供应基地和胡志明小道，以及非军事区两侧，进行一轮为期三至四天的空袭。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预计于五月份同黎德寿会谈，有利于冲淡国内对轰炸的反应，并使河内行动谨慎一些。

但是，河内一如往常，不为所动。待到四月末，雨季会把道路冲成一片泥沼；到了那时，胡志明小道将会完全被封锁。因此，河内一面拖延时间，一面继续其非法渗透。它花了十天才作答，并于四月十五日接受了开会的建议，时间可在五月十五日以后的任何一天。黎德寿要求时间隔得越久越好，指望我们在谈判举行之前不会进行袭击。他的算盘当然打错了。但不是由于外交，而是由于与水门事件有关的种种原因，他还是得逞了。要不是水门事件，我们肯定在四月份就行动了。

到四月中旬，北越进入南越及其附近隐蔽地区的新部队已达三万五千人，作战人员和补给物资增加的总数要比一九七二年复活节进攻之前的数字还大。对于这样一种欺骗行为，要是遇到通常那个尼克松，早已怒不可遏。但是，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却仍在犹豫不决。四月八日，他派当时的陆军副参谋长黑格赴印度支那作

为期五天的实地考察。要是在过去，这就是要采取强力行动的预兆。可现在大不相同了。当黑格于四月十五日回来汇报时，和河内的来信正是同一天，尼克松却仍旧是那样拖拖拉拉；这种情况将使得我们的打击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雨季一到胡志明小道就不能用了。他要我们再召开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讨论对策。

尼克松简直已经无法集中精力和思绪来处理越南问题了。记录表明，他正因水门事件而不断开会和接电话。譬如，据我们现在所知，四月十四日那天，他正在同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商量，得出结论，必须对老友米切尔施加压力，要他承认“负有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正是四月十五日，我们讨论越南问题那一天，司法部的水门事件调查组长亨利·彼得逊要求尼克松解除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职务。

正如我在几天之后告诉理查森的那样，当时我确信，行事犹豫不决是最大的危险。“我们取得成功的唯一机会，就是不让对方在每个阶段摸准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第二天我们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审议可供选择的对策。这时，除了威胁着南越的沿着胡志明小道南下的补给品运输以外，我们还面临着北越在老挝北部的新进攻。我们建议对此应当用轰炸回击，还要停止扫雷活动。这个决定范围较小，因而立即得以实施。但是他们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对主要战区南越本身的侵犯行径。为了报复北越夺取查尔平原以南的他汶，美国 B-52 轰炸机和战斗机于四月十六日出动轰炸在老挝的目标。四月十七日空袭又继续了一天。国防部长理查森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对在老挝的明目张胆的违反停火行为的一种反应。但对于北越沿胡志明小道向南渗透，穿越非军事区的渗透等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则未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为了继续进行谈判，我们于四月十七日向北越发出了一纸措词尖锐的函件，“怀着义愤和震惊”答复它四月十五日的

来函。我们同意由我同黎德寿进行会晤，并由河内副外长阮基石同助理国务卿帮办沙利文先行会晤作准备。

四月十七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又召开了会议。参谋长们仍坚持说，除非首先摧毁共产党在非军事区以南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否则，他们就无法对老挝南部的胡志明小道进行空袭——而这一段小道则是雨季来临之前唯一在使用中的通道。

因此，军方又一次延长了军事行动的时间，主张连续轰炸整整七天。这是问题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的前三天，我就曾听伦纳德·加门特谈过，水门事件可能会涉及总统本人。此事使我大为震惊，并深感恐惧；因为从现在起，我才清楚地看出：对水门事件提出的质疑有可能触及总统体制的心脏部分，并破坏一切权威。在第四章中，我曾描述过我和其他人当时是怎样作出反应的；但在四月十七日，我看不出如何才能促请尼克松运用他正在下降的威望来支持这次新的长期轰炸；而这一措施才正是形势所迫切需要的，也是由于他的犹豫不决所招致的。因此我向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建议：我们一面等待河内有明确挑衅行为之时再说，一面先继续进行制订计划的工作。小组成员们对于官僚主义遇事含糊其辞，早已心领神会了，他们很懂得这意味着一次重大改变。在此以前，我们的战略一直是要预防重大挑衅活动，而不是等待它发生。（我们估计在大半年内它不会出现。）这次的决定意味着我们无限期地推迟先发制人进行打击的作法。从而使南越早晚必得自行设法对付北越那种丝毫不受阻拦的、疯狂的增援活动。

从河内对我们在老挝空袭的软弱反应看来，这一次真是大大地错过了时机。五年来，那些批评我们的人总有一个信条：强烈的行动会破坏谈判气氛。事实恰好相反。我们总是发现，每当我们对河内违反协定的行为进行打击之后，它总是听话得多。这次也不例外。对于我们轰炸老挝北部以及我们四月十七日的强硬照

会，河内的反应是接受了四月二十日阮基石同沙利文之间的会晤。来信中还出现过由于漫不经心而造成的一起印刷上的错误（或者是某人在打字誊写文件时的错误），大意是说，河内“严格遵守并毫不认真地（原文照录）执行”巴黎协定——在河内的来文中，这确乎是我们能予无条件同意的罕见杰作之一了。

但我们的战略却有些杂乱无章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清楚，原计划中有关军事的那一半，我们不能执行了。既然如此，同黎德寿会谈的意义也就大为不同了。四月二十一日，我向尼克松报告了河内来信的内容。我们就原定四月二十六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以作最后决定的事，进行了磋商。但此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根本没有开过会。无论如何，水门事件已注定了会议的结果。我带着不太好的情绪，清楚地告知尼克松说，我们简直已经无法实施我们的计划了。我告诉他：“若非这一倒霉的国内形势，一周的轰炸就会使得协定生效了。”此外，为了表现我的这些唐突言语是经过仔细琢磨的，我还加上了一句十分不得体的话。我说：“水门事件有一个好处，它把我们对老挝的轰炸推到了报纸的第二十版去了。”尼克松在当时的形势气氛下，立即答复说：“它还把通货膨胀百分之十的事，也推到第二十版了呢。”

待到四月二十三日，问题已经很清楚，总统不打算下令采取任何报复行动了。我告知黑格说：

在目前的气氛下，我看不出能做些甚么；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这里我指的是开始轰炸的事。因为这样会使国会的反对势力都集结在一起……我毫不怀疑，要不是面临目前这种混乱局面，我们是会使他们（指北越）后退的。

到了一九七三年四月底，我们的越南战略已经支离破碎。鉴于越南明目张胆地违反协定，以及归来的美国战俘所讲述的那些可怕情景，向河内提供经济援助这根胡萝卜，已经几乎完全被国会

当然地搞掉了。伯德修正案主张禁止一切直接或间接援助，只有经国会特别授权的项目例外。该修正案以八十八票对三票通过。然后，进行轰炸的那根大棒，由于国内形势无法有所作为也被丢掉了。六月份的国会要通过法律来禁止采取军事报复行动；水门事件的虚弱症已使得一九七三年最初几个月内所作的那些“装点门面”活动完全中止下来。

在这种气氛下，我和黎德寿的下次会晤，就面临着新的情况。我已不是一个这样的美国的谈判代表了，他不久前曾表明过，对于欺诈行为就得加以惩罚，而现在，我手上几乎连一张可打的牌都没有了。

同黎德寿玩猜谜游戏

我动身去巴黎同黎德寿进行谈判，这次谈判从五月十七日持续到六月十三日（当中有时有些间歇），是一系列旷日持久的会谈。其间不时出现不祥之兆，最突出的是在我们去巴黎途中得到的一份情报。内容是北越人转述越共领导人对其战地下属人员的吹风会。报告证实了我们早已获悉的事，河内正在加强军备。它还提到了一次准备中的“总攻势”。吹风者说：总攻势推迟进行，其意图在于，让水门事件把我们的总统体制完全搞瘫痪，搞得我们的南越盟友士气沮丧。它准确地估计到，我们的总统已受创伤，眼下无力对北越的入侵进行报复。

水门事件的调查已经证实上届美国总统选举是骗人的，许多白宫助理人员已提出辞呈……因此，尼克松总统也定将辞职，因为他已没有足够的威信领导美国了。他领导美国政府的权力遭到削弱，这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斗争产生着有利影响，并将迫使美国改变其对印度支那的政策。即使尼克松总统继续任职，他也不敢对北越或南越采取诸如空袭轰炸之类的强硬行动。因

为这将会招来美国国会和美国的强烈反对。

正如在和平谈判年代中所作的那样，河内把它的行动同美国的国内政治作了紧密的配合。它有充分的证据来作出这种精明的判断。从五月初开始，那些过去在众议院总遭到阻止的反战议案现在在国会获得通过。譬如，五月十日，众议院以二一九票对一八八票通过了取消轰炸柬埔寨的费用；五月三十一日，参议院以六十三票对十九票通过了同一决议案。只有三名民主党参议员詹姆士·伊斯兰德、亨利·杰克逊和拉塞尔·郎同十六名共和党人一道投了支持总统的票。二十名共和党人同四十三名民主党人一起，投票支持取消轰炸费用。

政府何以会失去这种在过去四年中一贯得到的国会支持票呢？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因为，“巴黎协定”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和平，意味着我们已摆脱了战争。说得更具体点，总统过去那种通常是行之有效的说法——采取军事措施对保护美国部队是必需的——在现在美军已经撤离的情况下已失去了说服力。尽管如此，尼克松本来可以把问题直接提交给美国人民，说明我们不能放弃那牺牲了五万人才得以维持的事业。以历史上最大的多数票之一重新当选的尼克松本来可以象过去多次那样，得以占上风的。但是水门事件把总统的政治力量消耗殆尽，现在作这种抉择就不可能了。

河内要是也能打入我们各核心部门，他就会发现，我们的各个官僚机构之间意见分歧，相持不下，而地位削弱的总统却无法作出决断。白宫、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施莱辛格都赞成我们应先发制人，采取军事行动，以制止北越的继续渗透。有些中央情报局专家和五角大楼文官主张让南越人负责实施协定；这等于变相地默认协定垮台。因为南越军队全力在搞静态防御。它缺少能阻止北越供应线的远程飞机。国务院想对整个问题撒手不

管，而对要由我来承担主要责任则感到非常高兴。中央情报局内部对于河内究竟想干些甚么，意见有分歧。一派认为北越会迅速行动，以制止当前阮文绍在政治上所取得的进展；另一派认为它正在建设巩固的基地，以备久后进攻。对于一个责任在于协助制订政策、充分权衡利弊的情报部门来讲，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它通常总是反映当前的意见分歧，它只追随而并不制造某种制订政策的倾向。

每当一场危机出现时，总不免有鸽派和鹰派之间的分歧。鸽派总把他们的犹豫不决披上“外交”外衣，寻找证据，争取拖延。而外交要是没有施加影响的手段，总是要导向拖拖拉拉、无所作为。鹰派则要求早日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一般说来，危机初起时，那种消极被动论者总占上风，因为采取行动将招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而消极被动的危险后果则总是要过些时候才能出现，因而是猜测性的。先发制人论者的致命弱点在于无法证明其行动的必要性；而渐进论者则把人变成了事态发展的俘虏。因此，采取两者结合、或者加以混淆的作法，就显得更为合情合理、难以抗拒了。但它不能切实地解决问题，而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折中。用鹰派的政策配上鸽派的作法，结果还是无所作为（如象猪湾事件那种疑难杂症那样）；反之，用鸽派的政策配上鹰派的高调（如伊朗人质问题这一疑难杂症）。对于这次违反巴黎协定的行为，我们采用了鹰派的高调，但却被迫变成了鸽派。我们只发警告而未继之以行动，这还是第一次。

黎德寿平素反应总是傲慢自大、目空一切，这次则采用了点新的策略艺术。他看出了我是在虚张声势，并且让我感到这一点。他从谈判一开始的唇枪舌战中，就再次利用了我们国内的矛盾。请看下述对话：

黎德寿：你们对万象政府军作了空中支援，你们正在违反老挝停战协

定，向巴特寮控制地区发动进攻。对于柬埔寨，你们也加紧进行猛烈的空袭。连美国参众两院都在反对尼克松政府的空袭行动。

基辛格：我想提请特别顾问先生注意，我们三年前讨论过的那条规定还应否继续遵守？你们的估计一直就是错的，这次当然也一样。但此事最好就谈到此，不必多说了。

黎德寿：请让我把话说完。由于参众两院都认为轰炸柬埔寨不合法，因此它们拒绝拨款支付这笔经费。这里我只想指出，这次对柬埔寨加剧轰炸是一种错误行为。不仅我们反对，连美国人民也反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基辛格：美国人民意见如何，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不劳特别顾问先生来过问。而如果他还记得的话，他的估计并非总是正确的。

黎德寿：我究竟是对是错，你心里是明白的。

基辛格：这样耽误时间是不必要的。我们谈谈其他问题吧。

这种对话和前几年的多次对话几乎一字不差。问题在于，这一次黎德寿和我内心深处都晓得他并没有错。这次尼克松变不出甚么戏法了。我们（在柬埔寨）所进行的军事行动遭到国会空前的攻击。我们在泰国和从海上可以进行阻击的部队被急剧地削减了。由于要购置新式武器，预算不足，五角大楼打算重新部署在东南亚的海空力量；对此我正在极力进行斗争，但看来没有成功的希望。

也许我本应中止谈判才对；因为我们原来打算在谈判之前要进行的轰炸已经不进行了。但是，真可惜，国内的分歧使得我们处于破产的境地。我们能作的已经不多，只能靠谈判并且希冀和平压力——也就是靠用吓唬人的办法——能够奏效。正如那些批评者们所要求的那样，我们已退到了只能依靠纯外交办事的地步。这时如果取消谈判而又不能继以军事行动，其结果只能是公开张扬尼克松连私下也不想承认的一件事：他已失去了推行一条贯彻始终的外交政策的权力。把这种惨状对外公开是毫无意义的，只能更加剧内部核心的虚弱并招致外敌的挑衅。

因此，我把同黎德寿之间的猜谜游戏坚持了下来，虽无成就可言，但也未遭受重大挫折。经过三段谈判会议（五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六月六日到九日和六月十二日到十三日），我们回顾了全部协定条款，并试图对其中我们认为尚未实施的部分定出一些实行的期限来。

六月十三日我们通过了联合公报，对某些义务作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但这不过是回避主要问题而已。既然已经没有执行协定的实力了，就没有理由希望新协定可能比现有的协定更会得到遵守，这是很自然的。事实上这个新协定也的确没有得到遵守。这次会谈确实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后果，此事留待下面去谈。但这次谈判的实质是黎德寿厚颜无耻的杰出表演，而我则精心琢磨，奉陪他一两句。

我说：“三百五十辆坦克、三百门远射程炮，还有几个营的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被列为民用物资，不受协定第七条规定的限制。这简直是对国际关系史的一个贡献。”我在第二章中已经讲过，不管我们会怎么看，北越总是异想天开地主张把在国际检查站之外的地点运进南越的一切东西按照定义统称为“民用物资”。黎德寿用以下的话回答我：“你们的情报是错误的。我想指出，你们的情报机构有时把一只大象当作坦克。”我问他：难道你们那些新建起来的输油管是为了输水，以便南越的大象不至于饥渴吗？黎德寿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看错了。当然我想你也懂得，从军事上看，南越临时革命政府必须有些后备，以备军事行动之需。这样一来，要是西贡政府继续其军事行动，有了这些储备才能对付。”

我问他是否将尽力使所有的大象不要走到老挝北部以外的地方去。黎德寿笑着回答说：“只要大象又饥又渴，它们当然会到处找寻食物和饮水的。”我指责河内有计划地违反巴黎协定，他表示否认。我说：“要是那些违反协定的行为还不算是有计划的，那我简

直不愿去想；要是你想有计划干的话，究竟会干出些什么来。要是这些违反协定的行为只是偶然发生的话，那么你若存心去干，又会干出什么来呢？”黎德寿坚持说，这些违反协定的行为只是次要的，因为双方在实施某些“节日或国庆”停火方面，还是做了不少事的（意思是指譬如每年的圣诞节停火）。我讽刺地提起越历春节攻势的事；我说：“一九六八年是例外。那一年出了点小问题，当时并非所有北越部队都接到命令……”

于是，黎德寿又提出，遵守禁止渗透的规定，须取决于实现有效的停火；而河内又不让有效的停火得以实现。最后，他同意在十五天内具体确定三个地点，作为替换物资进出站。但他却从来没有实践过这一诺言。

我们之间的这种唇枪舌剑，当然无助于谈判的成功。需要的是权衡利害和风险。一九七二年，我们达成了在西贡维持一个同我们结盟的政府的目标，那是因为河内无力迫使我们从南越撤军，因为我们在它的港口布雷使它资源枯竭，还因为我们的轰炸使它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而到了一九七三年，我们手上可用来施加压力的东西却一无所有了。我只能依靠在会议桌上运用计谋了。

那些要求我们只靠外交而不用武力的人，请看看我所碰到的情况吧。每当我力图制住黎德寿时，这类情况总是屡见不鲜的。试举一例，黎德寿否认北越扣押了任何南越平民。下面的对话表明，当他感到不用担心我们会作出敌对性反应时，他能厚颜无耻到何种程度。

黎德寿：西贡政权说我们扣押平民，还说为数甚多；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临时革命政府管辖区内不可能有关押这么多囚徒和设立这么多监狱的条件。再者，我们的作法总是捉到之后立即释放。

基辛格：如果你们捉到之后立即释放，那你们何必抓他们？

黎德寿：因为我们没有拘留他们的那些设备，而且粮食也不够吃。

基辛格：那么，又何必烦劳你们去抓他们呢？

黎德寿：他们犯有罪恶，因此必须抓他们。但供给他们粮食确实不那么容易，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监狱来收容他们。供应我方部队的粮食问题就花费了我们不少力气。因此，你方提出这个问题来，只不过是找了个借口拖延释放我方平民而已。

基辛格：特别顾问高见向来令本人惊叹不已。但是，本人素来好学。你们逮捕那些犯有罪恶的人目的是为了释放他们；这在刑法史上怕也算得上首创了。

黎德寿：司法有两种，你们的与我们的截然不同。请看，我们是拘留他们，教育他们，然后就释放。至于你们的司法，则是抓无辜平民，从精神和肉体上折磨他们。因此，两种司法是完全不同的。对此，你是不懂的。

基辛格：不过我们这里还确有几个俘虏，他们是领教过你们的那种司法的。

在美国国内辩论中，人们始终不信北越有帝国主义野心，这些人现在该看清楚这种昭然若揭的情况了。巴黎协定第二十条要求从老挝和柬埔寨撤走一切外国军队。黎德寿向我重复二月间在河内对我提出过的论点来回避这一义务。他说：这一协定条款的实施取决于在这两国达成政治解决。我们在和平谈判中早已驳斥过这一论点，因为在这两个国家里都还看不到甚么政治解决的远景。对于老挝，我们总算达成了一项书面谅解，意思是在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以前取得一种政治解决。事实上，仅达成初步协议就拖到了七月二十九日；而对联合政府的问题，则又是拖到了九月十四日才达成协议的。至于成立这一政府，则更是直到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的事了。所有这些对北越从老挝撤军都没有产生过丝毫的作用。北越五万多大军一直驻扎在老挝，直到一九七五年老挝终于被全面占领、一切独立的迹象被清除净尽。这些北越军队至今大部分仍以占领军的身份驻守在那里。

在柬埔寨问题上，黎德寿做得更有过之。如同对老挝问题那样，他要求在撤军之前先实现政治解决。但他所设想的唯一的政

治解决就是：消灭朗诺，使共产党全胜。谈话之间我一度感到十分恼火，便对黎德寿说：“你的意思是要我们杀掉朗诺，要不就让他自己杀掉自己？”我的话是有所影射的，两年前他确实曾经高高兴兴地对我们说过，愿意帮助我们杀掉阮文绍。^⑩ 他对我的话并无丝毫不安之感，他毫不示弱地说，“是你先问我这个问题的。我不过说说个人看法，提供实际情况罢了！”

换句话说，只有共产党全面接管，才能算作政治解决。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顽固地反对谈判，使之无法进行，对此我将在下节进行阐述。我建议同西哈努克会谈，黎德寿不感兴趣。部分原因想是他们无法使红色高棉参加，另外，也可能他们怕西哈努克受中国影响太深。但是，他想必已经在考虑将来的事了，思忖着高棉盟友何等难以驾驭；因为他为自己准备了一条出路，使河内在红色高棉获胜之后还能够柬埔寨发挥作用。要做到这点，他首先得承认在柬埔寨确实有越南军队。而据他说这些人并不是从北越去的。黎德寿断言，他们是越裔柬埔寨公民，在柬土生土长并在当地入伍。随之而来的解释就是，他们不属于巴黎协定第二十条所指的“外国”军队之列；因而即使在共产党胜利之后，他们也无须撤离。

在柬埔寨问题上，我能获得的至多也只是双方重申协定第二十条，要求遵守外国军队应当撤走的规定，而河内对撤军则继续作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解释。此外，北越同美国双方都在私下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促使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这同河内在签订巴黎协定时所作的保证差不多，那时黎德寿说过，河内对其柬埔寨盟友影响很小。黎德寿还拒绝了我关于双方共同努力促成柬埔寨停火的建议。河内对解决柬埔寨问题所作的“最大努力”就是，在柬埔寨土地上驻军四万、向嗜杀成性的红色高棉提供军火、训练人员、以及给予后勤支援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所作的努力将在下章中详述。

但是一九七三年五、六月间的巴黎谈判也不是毫无作用的。现在回溯起来，我还是确信，它对西贡的士气更形低落，不无些微作用。在和平谈判问题上，我们同西贡的分歧大多是一九七二年那些分歧的再现。同过去一样，西贡知道我们曾向黎德寿建议开会，也表示了同意；它确实从来就未曾反对过开会。（西贡可能以为我们会象原来打算的那样，在会议后对河内违反协定的行为采取一些军事报复措施；但我们从未就这一点向它明确作过任何承诺。）我决心不去重复去年那些引起误解的作法。每次草案都经过同西贡协商。一个南越谈判小组每天晚上到我们驻西贡的大使住宅同我会晤，进行磋商。在谈判的初期阶段，西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没有任何会引起争议的迹象。不久，西贡的作战手法渐渐显露出来。南越谈判小组越来越得不到西贡发来的指示，或者说接到一些不疼不痒可又带有致命性后果的指示。譬如，西贡曾一度建议把新协议逐段予以重新编号；把所有北越应遵守的义务一齐列在前面，紧跟着列上西贡应遵守的义务。这一建议颇为离奇，因为新协议文件的分段编号同巴黎协定的文件是完全一致的——这无足为奇，因为它们是说明如何具体实施巴黎协定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西贡的建议提出去了，并且从中对于越南人是怎样进行盘算的，又有了新的认识。黎德寿对这一建议毫不觉得奇怪。相反地他认为这个主意绝妙，并接受了它；只是建议把次序颠倒一下，把西贡的义务列在前边，河内的列在其后。每当我推敲越南人谈判的推理方法时，我觉得它同一般国际准则和惯例都正好相反；越南双方似乎都认为，谁列在先谁就应当先执行——或者说，至少心理上应当如此。双方都要求对方先执行全部义务，然后才轮到自已来执行义务。

西贡逐渐从小捣乱转到了对具体问题表示反对，有些反对意见无比的琐碎，而且每当我们即将接受它的意见时，它却又改变了

原来的立场。如果说这种作法当时使得我们感到恼火的话，那是因为它不仅仅是恶作剧而已。西贡的担心实际上是很有根据的，尽管提出的方式不甚高明。对它来说，这是一场生死斗争。敌人已经违反了协议的每一条款，但并未受到任何惩罚。美国同河内双方终于继续进行谈判这一事实，使人看来似乎双方的行动都具有同等的道德意义，这样就会削弱西贡的法律地位，还不说对它的士气的影响。它所受的损伤远非丢面子而已。

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关于越共派去参加双方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及常驻各区镇检查站的联络军官的待遇问题。这个问题经常引起摩擦。这些人实际上等于被南越当局软禁。我们建议把这些军官迁出城镇，迁到双方控制区之间的丛林中的军事分界线上。因为这才是他们应当去工作的地方。我们认为把他们迁出人口稠密地区正是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但这却触及了南越的敏感神经；它碰上了这样的现实，这样将把南越清楚地分割为两个控制区，尽管越共控制区很小，但它还是会证明西贡所宣称的无条件的主权是无效的。这正是黎德寿欣然予以接受的原因。

西贡使大家接受了它的论点，即必须考虑它的观点；结果对已达成协议的若干条款作出了一些修改。它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了胜利，关于双边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地址和它要求成为最后文本签署人之一的问题。但是，任何条款的修改都无法改变根本的事实。在会谈间歇时，我曾派国务卿助理帮办沙利文赴西贡会见阮文绍进行磋商；沙利文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

从根本上说，他们开始认识到，如果出现国土分裂，哪怕这意味越共临时革命政府从政治竞争中后退，也将是一个带有相当决定性意义的行动。他们担心，要是再同时出现一个共产党控制下的柬埔寨，那就很可能出现一种军事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所拥有的那块狭长的宝贵世袭遗产便会经常受到设在难以攻破的连绵山岭上的牢固基地的威胁。

阮文绍在六月六日致尼克松信中所说也不无道理。他指出：对于河内违反庄严的协定，不但没有给予惩罚，反而还要再签订一个：

我们是侵略的受害者。共产党侵略者有计划地违反协议。然而，他们并没有受到以前警告过的那种“激烈的报复”，现在他们又要单方面地享受公报所规定的各种实惠了。

问题的要害在于，六月十三日签订的新联合公报还是同原来的协定一样，要靠人们自愿执行。但是由于我们显然采取了消极立场，使得南越士气消沉；加上美国援助日益削减，南越执行协定的意愿也正在受到侵蚀。在美国，厌战情绪和国内危机双管齐下，使执行协定的意愿也正趋于枯竭；这种情况最终导致国会采取行动——通过了法令，禁止美国在印度支那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就好象在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这个决定是在一场辩论之后作出的，而辩论的对象则是世界上最多灾多难的国家——柬埔寨。

柬埔寨：地地道道的伪善

在过去的十年里，没有任何国家象柬埔寨那样的灾难频仍。一九六五年遭到敌人北越人的侵略，并被部分占领；一九六九年美国轰炸；内战连年，继之以获胜一方对自己同胞实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一九七八年北越再次入侵，紧接着就是游击战争的折磨，以迄于今。在差不多二十年期间，既无和平，又无秩序。继河内的不稳定的征服之后，共产党统治者又横征暴敛，饥饿遍地，柬埔寨人能幸免于难者不过原来人口的半数而已。

柬埔寨的命运使得有些人对它的来历患了健忘症，这也许并不奇怪。但是，在人类伪善史上，柬埔寨问题确实具有特殊地位。当时有人怀疑尼克松政府主张援柬以保卫东南亚是否必要，这是

一回事。我能理解这种恐惧心理，当时人们情绪非常激昂，担心美国将重蹈越战的覆辙，陷进柬埔寨泥潭。这代表着一种判断上的分歧，是正常的；我不打算去挑动分歧，使过去的争论死灰复燃。大家都已经取得了教训。但是，在经过一连串的悲剧性事件之后，那些批评者们不是头脑清醒地重新思考对柬共大规模屠杀表示反感，对北越的无休止的侵略表示愤怒，而是把指控的目标从那些共产党暴行身上转移开，指向那些力求拯救柬埔寨、使之免于蒙受那场苦难的人们身上；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种奇谈怪论冲淡了放弃柬埔寨的罪责；其说法大致如下：在美国进攻柬埔寨之前，那儿是和平幸福的国土。这场进攻是毫无道理的，只是由于两位美国领导人的精神变态，一心要把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强加到一个无辜的驯顺民族身上。他们暗中策划，推翻了唯一的政治领袖西哈努克（是他曾经使国家的组织得以维系而未分崩离析）；其后，美国的轰炸把一群进步的革命者红色高棉人变成了发疯的杀人犯。按照这种伪善的高谈阔论，美国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的两次行动应当对柬共的种族灭绝屠杀负主要责任——这些屠杀发生在美国于一九七五年撤出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已达两年之后——对于北越一九七八年的入侵所带来的苦难，也要我们负主要责任。④

这些论点正合那些对尼克松深恶痛绝的人的心意，因为柬埔寨问题不同于越南和老挝问题，对这两个国家的卷入是从自由派的民主党政府继承过来的，而柬埔寨则可以说成纯系出自尼克松的主动。这是一种发昏的谬论，但还得予以驳斥。对于美国人和那些依靠我们的人来说，弄清事态的来龙去脉以及责任何在，是很重要的。

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北越，而其动机则是北越对印度支那的帝国主义野心。关于我们何以先从空中，后从陆地上袭击北越在

柬埔寨的庇护所的原因在这里我就不详谈了，《白宫岁月》一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至于这些战术行动是否得当，留待人们去评说。但问题的要害在于，是北越把柬埔寨拖进了战争。早在一九六五年，北越就占领了柬埔寨的一部份，并在那儿建立起军事基地，杀害美国人和南越人达四年之久；这才引起了美国的反应，而这种反应还只限于北越庇护所所在的狭窄边界地区。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中立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遭到了他自己的政府和国会的废黜。原因就是广大柬埔寨人民群情激愤，不满北越占领军的继续存在，而西哈努克又无力把他们弄走。当柬埔寨的新领袖要求北越撤离时，北越的反应是在柬埔寨东部边界发动了一连串进攻，企图推翻金边新政府；这些都发生在美国和南越“侵入”庇护所之前一个月。“侵入”为期共计八周。一九七〇年四月四日我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向黎德寿建议，立即恢复柬埔寨的中立。正是河内拒绝了这一建议。正是河内拒绝和平谈判，除非谈判是以摧毁柬埔寨的一切非共产党机构为先决条件的。正是河内拒绝了一九七〇年十月、一九七一年五月、一九七一年十月、一九七二年一月、以及从一九七二年十月直至一九七三年一月的一系列停火建议。由河内创建、武装和支持的红色高棉拒绝美国一再建议的把柬埔寨包括在巴黎协定内。它一心要用武力取得胜利。河内一面向柬埔寨提供军援，一面却在这以后又声称，对于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谈判不负任何责任，从而使任何外交解决办法都无法进行。

因此，要说有人制造了柬埔寨的战争，招致了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大屠杀，那就是河内。当然，我们对河内对红色高棉所能施加的影响有时估计过高。柬埔寨共产党难以驾驭，不象驯顺的巴特寮。对于我们的行动是非功过的评论，且留待将来那些对眼下这场辩论没有利害关系也无意重新挑起争论的历史家们去做吧。但

是，决心要打到底的不是别人，正是河内。河内促成了柬埔寨共产党无条件的胜利，并且正确地估计到（如后来事实所证实的那样）：柬埔寨的崩溃会使得南越士气消沉；至于柬埔寨不听它使唤，那完全可以留待日后解决。

在美国，人们误认为在柬埔寨进行的是另一场“战争”，主张我们必须避开。但事实并非如此。和在越南一样，敌人是同一个。北越军队随意穿越边界进退，好象主权的概念根本不存在似的。在他们那边干了多少年也从来没受到过任何惩罚的事，而一九七〇年在我们这儿只有八周就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危机。

对于柬埔寨所蒙受的灾难，美国应负的责任不是由于它作得过多，而是由于它作得过少了。多年来，北越从其某些基地出发杀死大量美国人和南越人。一九七〇年，美国和南越为了破坏这些基地，曾经对该庇护所进行过短暂的进攻，但很快就退出了。对于此事，那些反战的批评者们先是一九七〇年五月上街游行示威，后来又企图通过立法来取得示威所未能获得的东西。从一九七〇年一直到战争结束这段时期，尽管尼克松强烈反对或是进行否决，还是通过了以下的一些法令以限制美国的援柬活动：

①一九七〇年十月七日通过的一九七一年财政年度武装部队拨款授权法案的富布赖特修正案明确规定，南越和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如泰国）的部队不得利用此项法案所拨经费对柬埔寨提供军事支援。南越和其他自由世界武装力量也不得将此项法案所提供的军事补给品转让予柬埔寨。这样，加诸我国援助上的极限也被强加到了东南亚诸盟国身上，似乎我国主要的问题就是要堵塞一切援柬的渠道。法案通过那天，已是我们的“入侵”三个月之后，也正是尼克松提出在整个印度支那停火的建议，但却遭到共产党拒绝的日子。

②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通过的一九七〇年补充援外法案的库

珀一丘奇联合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禁止使用此项费用“派遣美国地面作战部队进入柬埔寨，或用于向柬埔寨提供美国军事顾问。”从而用法律明文正式规定：禁止美国向柬埔寨人提供他们要成为有效作战部队所急需的那种咨询和训练。

◎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通过的替代援外法案及有关援助法案的赛明顿—凯斯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无论何时，在美国设在柬埔寨的政府执行机构里，美国籍文官和雇员的总人数均不得超过两百人。还规定美国雇用的第三国在柬工作人员总数不得超过八十五人。这样就不可能对柬埔寨进行任何有效的军事或非军事援助了。

◎一九七三财政年度第二补充拨款法案（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由尼克松勉强签署成为正式法律）禁止使用此项拨款“对柬埔寨、老挝、北越和南越地面和空中，或对柬埔寨、老挝、北越和南越沿海，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作战活动。”此外，还规定：从八月十五日以后，不论任何法案规定的任何拨款，均不得用于上述目的。这样一来，在印度支那或其附近不论何处，任何美国军事行动都成了非法的。有了这一规定，共产党就完全不必担心其违反协定的行为会遭受报复了。

◎一九七四年财政年度继续拨款法案也同样规定：禁止使用任何经费资助美军“在北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陆地、空中以及沿海”进行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作战活动。这项规定使得前一年的禁令继续有效。

◎一九七三年援外法案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正式通过，成为法律。该法案规定：由任何法律规定所提供的一切经费授权或拨款，均不得用于在老挝、柬埔寨、北越、南越或泰国的外国部队进行军事或准军事作战行动，除非此项作战活动系由受援国政府本身在其国境之内进行。其含义是，盟国政府（如泰国）在受到

来自印度支那的威胁时，不得使用美国装备——亦即不得使用其本国军队的装备——援助那些被认为其存亡与它的安全关系甚大的国家。

此外，国会还规定：对柬埔寨的援助总额不得超过每年二亿五千万到三亿美元。此数目只相当于援越开支的百分之二左右。

这些限制加在一起，不仅阻止了一切美国的有效援助，还使我们东南亚的任何盟国不能援助其邻邦柬埔寨，以免犯下滔天之罪。禁止派遣军事顾问；这一条使美国驻金边大使馆认为，连其武官外出考察也在被禁之列。这样一来，尽管柬埔寨军队人数增多了，但作战能力并无增长。这些限制迫使他们只能依靠火力而不靠机动性。（我们的批评者们先是把这些死硬限制强加到柬埔寨头上；然后又引用它们来指控柬埔寨的军事活动。）这样一来，要阻挡灾难来临只能指望美国空军，但后来连它也被禁止了。

可悲的是柬埔寨被当作了整个越南问题纷争的象征和替身。对尼克松来说，柬埔寨是“最纯粹的尼克松主义”，*其含义是：我们的政策是帮助受援国保卫自己，但不动用美国军队。对反对尼克松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立法手段，既打击了我们过去对柬埔寨的入侵行动，又象征性地击败了尼克松力图通过建设当地部队使之能自己反抗侵略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地作出了那些过去想强加于南越而未能做到的限制，把它强加到柬埔寨头上。它们在南越之所以未见奏效是因为我们在那儿还很强大，尚能防止崩溃；但是，他们在柬埔寨的成功就不仅置柬埔寨、而且也置南越于死地了。这些限制使得外交不可避免地要陷于僵局，因此就正中河内下怀。在河内要搞侵略征服、而红色高棉又要求全面胜利之时，我们要想体面地摆脱掉，其唯一办法只能是，向它们表明实现

*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使用了此短语。

那些目标是不可能的。我们国内的分裂产生了与此相反的效果。由于限制我们援助，使得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期间尚处于襁褓之中的红色高棉部队未遭失败；使得后来我们在与红色高棉和河内打交道时失去了一个施加影响的手段，而这个手段对于促使它们进行政治谈判是极其重要的。那些反战的批评者们使得我们在印度支那的溃败之势已不可避免；但他们后来又转过头来批评我们这些力图阻止共产党接管的人，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的责任归咎于我们。

坐失良机

自从一九五四年柬埔寨独立以来，西哈努克亲王扮演了一个巧妙的、虽然也不无危险的搞平衡的角色。他在压境而来的敌对力量之间纵横捭阖，保住了柬埔寨的和平、中立和安全。作为一个世袭统治者，他依靠人民对他的爱戴之情。他的生活方式是西方式的，但却尽力和共产党邻国打交道，先发制人地对付它们的要求，从而抑制了它们某些最凶恶的野心。一九六二年的老挝解决方案使他确信，美国从长远看是不能阻止河内对印度支那的统治的。为了对付这种不可避免的结局，他采取了疏远美国的作法；对于北越侵犯柬埔寨的领土、主权和中立，他也不予过问。一九六五年以后，他默认了河内在柬埔寨土地上建立庇护所，实际上就是在同南越边界线平行的一块柬埔寨领土上放弃了柬埔寨的主权。

但是西哈努克是欢迎美国致力于阻止共产党的浪潮卷进南越的，尽管他有时不能公开这么说。从一九六八年开始，他私下请求美国进攻共产党的庇护所，希望我们能帮他北越人赶出国土去。一九六九年当尼克松政府接受了他的暗示开始轰炸那个庇护所时，西哈努克在公开场合采取了并不过份巧妙的立场，说是只要不

伤害柬埔寨人，那是一桩美国和北越之间的事情。他还说，在那块柬埔寨当局已经被赶跑的地区内，他确实不了解究竟发生了甚么事情。一九六九年，当我们正在袭击那个庇护所时，他同华盛顿恢复了外交关系，并热情邀请尼克松访问金边。

一九七〇年一月，西哈努克到法国南部去进行他每年一度的医疗。他曾声称归途中将取道莫斯科和北京，去请求两位共产党巨人利用他们的影响请河内减少在柬埔寨的驻军。正当他准备踏上归途时，金边发生了反对北越的骚乱。在离开莫斯科去机场的途中，他得悉自己的国民议会刚刚决定废黜他。他认为自己已经被国内的同事出卖，感到非常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从莫斯科飞往北京。在北京，他受到周恩来的拥抱，并且仍然以柬埔寨统治者的身份受到接待。西哈努克这时痛骂美国推翻了他；一气之下，他决定担任共产党红色高棉的首脑。那时红色高棉还只是个小组织，而且就在不久以前，他还以叛国罪判处它的几名领导人死刑。西哈努克发誓要同在金边的那些同事们血战到底。由于此举，他就丧失了充当国内各派系之间的调停人和起平衡作用的能力。

这时美国由于国会限制而不能采取直截了当的军事解决办法，于是极力想用和平的政治办法来解决柬埔寨问题。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之间，我们至少提过六次停火要求。在越南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打算谈判成立某种由西哈努克参加的柬埔寨政治结构，其中由他来担任一种颇有影响的角色。但是，要使西哈努克重获他那种起平衡作用、仲裁人和中立领导人的地位，那就还需要让朗诺的非共产党力量也存在下去，并且也参加这一结构，尽管不一定是朗诺本人。河内对于这种解决办法和对西哈努克本人都没有兴趣——但中国却感兴趣。早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就曾告诉过我，他既不赞成河内征服老挝、柬埔寨，也不赞成共产党接管这两个国家中任何一个。谈判解决才是正途。他

说：

要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光是河内是不够的，——还有柬埔寨和老挝；它们的问题比较容易些。因为不管发生甚么情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民族资产阶级将要参加新的政府；我们还肯定西哈努克亲王将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老挝国王也将是国家元首。因此，要是能通过谈判解决，这种结局应当是肯定的。

当北越人的进攻威胁着要吞没西贡之际，我们无法采纳这一提示。但到了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时，我告诉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要是柬埔寨能停火，我们打算同西哈努克谈判，而且只要他不充当红色高棉头面人物那种简单角色的话，他还能在停战之后的柬埔寨起主要作用。我告诉乔说：“不管谁，只要他能保持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就跟我们的政策是一致的；我想跟你们的政策也是一致的。”

一九七三年伊始，我们致力于继越南和老挝停火之后实现柬埔寨停火。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签订巴黎协定，这时柬埔寨政府在我们敦促下提出了和平倡议，停止了一切进攻性军事行动，并宣布单方面停火。与此同时，我们也停止了美国的空袭。但是红色高棉拒绝停火，并且还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一月底，我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审阅材料时，突然发现了一线希望。在为我准备二月份出访中国的参考材料中，有一份情况简报。其中分析了红色高棉领导人、河内和北京的几次声明。工作人员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最近的一系列事态发展显然说明了对方不久将要求谈判柬埔寨问题；而且对于朗诺呼吁停止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也会作出虽非直接但却是积极的反应。”

现在回溯起来，这种判断纯属一厢情愿。仔细阅读这些声明之后就会发现，不管西哈努克多么希望和解，他已成了红色高棉掌中人物，身不由己；而且他自己也曾在一九七〇年发表过声明要同柬埔寨政府斗争到底。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三日，西哈努克被赶

下台一周之后，他曾发表过一篇声明，代表了红色高棉官方的一种极端主义立场。他当时要求解散朗诺政府及其议会，成立“民族联合政府”、“民族解放军”以及“民族解放阵线”，其首要任务就是，同越南和老挝共产党站在一起，对“美帝国主义”作战。这是一种由共产党人来全部接管印度支那的响亮号召。

在达成巴黎协定之前那段时期里，西哈努克重申了这一最高纲领，从而使那些后来曾经一度燃起我们希望之火的灵活的迹象，在仔细地透视下，便如一团水蒸汽，在日光照射下，烟消云散了。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西哈努克在对法新社记者的谈话中说：“我们的朋友”（可能指河内和中国）敦促我们的流亡政府不要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他说他愿意同美国谈判，但绝不会同朗诺谈判，也绝不会接受象南越的那种解决方案。他说，不管怎样，最后立场并不取决于他，而取决于那些“在柬埔寨国内进行抵抗作战的柬埔寨人”，那就是指红色高棉。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以西哈努克、他的首相宾努和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的名义发表的四点官方声明毫不妥协地声称：只有在西哈努克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声明的基础之上，即只有由共产党彻底接管，才能解决柬埔寨问题。

西哈努克在一月三十一日接见记者时，表示愿意对美国作出“姿态”。但他又再次强调说他自己只处于次要地位；他说，关于重新审订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GRUNK）*的政策问题，他还没有接到国内抵抗斗争的领导——由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部长乔森潘领导的红色高棉——发来开放绿灯的明确通知。这句话把他依附于共产党的情况，表明得不能再彻底了。

二月二日，红色高棉电台广播了高棉起义领导人乔森潘、胡荣和胡宁等人发表的正式声明。声明对美国 and 朗诺政府进行了令人

* GRUNK 是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法文词首缩略词。请勿与 FUNK 混淆，后者指西哈努克的流亡政治运动，柬埔寨民族团结阵线。

毛骨悚然的辱骂，并坚持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三日的立场，声称“柬埔寨国家和人民不得不继续斗争反抗美国侵略者以及叛徒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以解放全国人民。”声明轻蔑地排除了一切同“美帝”谈判的可能，声称必须“挫败和阻止他们的外交阴谋。”

这篇声明不只是一纸宣传文字。二月二日，红色高棉司令部发布命令，要求继续战斗，排除了一切同柬埔寨政府谈判和妥协的可能，并声称西哈努克不会同美国人或其他任何人进行谈判。总之，在我于一九七三年二月动身去亚洲的时候，柬埔寨共产党人已决心作战到底。

对于那些指责我们应对未能进行谈判负责的自我鞭笞者们，就谈这些吧。

二月末我访问北京时，美国和北京的立场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接近。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讲过的，北京开始认识到，河内主宰印度支那，从意识形态来讲，也许是一场胜利；但从地缘政治讲，却是中国的一场失败。因为它将使中国南邻出现一个亲莫斯科的强国，这个强国对中国还抱有世仇。也许中国对这一点始终是了然的；但正如许多别的国家一样，它不相信美国会接受军事上被人打败，更不用说自己去策划这种失败的事。不管怎样，我们双方都要求有一个独立、中立的柬埔寨，双方都致力于让西哈努克重新登台——关于这一点我们是半信半疑的，但是我们找不到别的能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的力量；而中国人则比较坚定，因为他们认为西哈努克是他们在柬埔寨最可靠的朋友。北京和华盛顿都确信：柬埔寨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组成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而西哈努克之能否起作用，又取决于某些以朗诺政府为代表的非共产党力量之能否继续存在。

周恩来在同我的谈话中提到了这点。他说，如果柬埔寨完全赤化，“其结果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意思是说，那样会使得西

哈努克末日来临，而且使河内得以称霸整个印度支那。我的反应是，建议由西哈努克的首相宾努同朗诺的代表立即会晤。我表示：我们不会坚持要让朗诺本人加入由这种谈判可能产生的任何政府之中，而只要朗诺所代表的势力有代表参加就行。周恩来表示愿把这个建议“以我们的措词”转达给柬埔寨人，意思是在某种程度上他本人是和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的。

情况是混乱的。中国人认为西哈努克是柬埔寨独立的最好保证；但苏联却继续承认朗诺。这样，中苏分歧又被带进了柬埔寨问题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却证明谁的估计都不对。两个共产党主要对手都选错了马，因为它们都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决心，以为美国定会对金边的现存政权支持到底。没有美国对金边政权的这种支持，朗诺也好，西哈努克也好，都无法生存下去。就这样，美国的无所作为使得接受河内后勤支援的红色高棉成了主宰力量，他们暂时利用西哈努克来维持门面，但一旦他们觉得能够自立时，就随时打算抛弃他。

我们的分析认为，要红色高棉同意谈判解决问题，除非打掉他们一切依靠军力取胜的希望。到了七月，情况已经清楚，红色高棉的分析也和我们正好一样。我们获悉，在一九七三年春季，红色高棉领导机构的执行委员会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决策。它决定保留两种基本选择：或者全胜，或者妥协。两种选择如何决定取决于那年晚些时候柬埔寨的军事形势。一旦军事胜利作不到而出现了僵持局面时，红色高棉就用谈判来争取最好的条件。相反，要是军事形势有利，就避开谈判而寻求全面的军事胜利。因此，斗争的焦点在于：我们追求的是平衡，而红色高棉追求的是胜利。

二月底我从亚洲回来时，召开了一系列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我于三月二十八日在该小组会上的讲话概括说明了我的态度。我说：

我们在这里开会已经有四年之久，而且我们都是参加历次会议的过来人。我不想从你们中寻求甚么托辞来为这次全盘失败辩解。要是我们打算放弃，让共产党去全部占领，而我们只想使之显得体面一些，那么我们是有多多种办法作到这点的。但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干这个的。

要是说当时在场的官员中有人赞成让自由的柬埔寨人地面地下台的话，会上并未见他们提出过这一点。参加会议的一个机构，倒确实于二月二十七日向我提供了一份很有见地的形势分析备忘录。它认为，我们的尴尬之处在于，在柬埔寨我们有两个互相联系的目标，一是加强金边现政府，一是获致停火，而看来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获致停火。然而，由于我们不愿在柬埔寨重蹈在越南和老挝的覆辙，便故意在柬埔寨保持低姿态；尽管我们向柬埔寨政府既提供了经援又提供了军援，我们的基本姿态却是，让柬埔寨人自己成功地运用这些援助。此外，由于国会的限制，我们向柬埔寨提供的资金和派出的人员都很有限，还禁止我们派去军事顾问。这样一来，我们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金边政府，我们就无法获得停火；而要是美国不奉行一项积极的政策，金边政府就不可能强而有力；可是国会的限制又恰恰使美国不能实施一项积极的政策。

因此，柬埔寨开始出现紧张，就不足为怪了。在北越人的支援下，红色高棉进行了一场空前残酷的游击战争；把大批难民由农村驱入城市，特别是金边，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社会平衡。它把战争强加到柬埔寨政府军头上。这支军队早先被西哈努克故意弄得很小，而且缺乏效率，以防止有人企图搞军事政变；后来又由于美国国会的限制，得不到有效的训练。自由高棉人受到了身经百战的北越人和土生土长的柬共分子的进攻。他们抵抗得异常英勇；美国的援助计划即使它能进行英勇抵抗，却又限制它不能取胜，因为国会坚持不许它取得决定性胜利。对于这种令人不快的命运，朗

诺表现出豁达大度，泰然处之；他不象阮文绍，而是很乐意接受我们的劝告。但是，他的政府却受到宗派主义、贪污、低效能等邪恶影响，士气也逐渐消沉。

朗诺政府事实上是没有西哈努克的西哈努克政府，其机构和人员都来自那个自从独立以来就统治着柬埔寨的领导集团。正象任何个人集权的社会一样，到处都有贪污——在西哈努克及其家族统治时期和在他的继任者时期一样，都有这种贪污。这部分是由于：在世袭的社会里，私有部门和公有部门一般缺乏明显的界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征税缺乏效力，不得不采用贪污手段来补贴政府开支。情况看来是无法避免的，朗诺越来越依靠他所信任的少数几个人，主要是他的家族，尤其是他的弟弟朗农；而朗农则令人遗憾地大搞贪污和裙带风，简直达到了用任何社会的分析都无法加以解释的程度。国际舆论界开始把朗诺说成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并且处事独断专行；而朗农则是个“尽出坏主意的能手”。这种情况同十年前西贡的情况很相似。当时，在共产党游击战争的冲击下，在美国要求改革的压力下，加上它本身固有的僵化，吴庭艳政府开始解体。吴庭艳的兄弟吴庭儒被指责为罪魁祸首。他们的情况简直是已糟糕到无法解决的地步，结果兄弟俩在美国鼓动的一次政变中双双毙命。

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建议，要想为西哈努克通过谈判回柬埔寨打下基础，我们应当劝朗诺“扩大其政府基础”并且本人辞职。我曾私下向周恩来示意：我们愿意按照这样的方针进行谈判。（但是，和我的某些同事不同，我认为柬埔寨政府的邪恶行为主要是危机的象征，而不是引起危机的根源。）我们曾经打算让朗农来美国军校学习，让朗诺出国就医。在朗诺外出期间由施里玛达任副总统和代总统；施里玛达在一九七〇年政变以前一直是西哈努克的副首相，可能是柬埔寨领导人中最能干的一个。四月初，黑格访

问金边，提出了这一建议。朗诺同意流放其兄弟，并让施里玛达进入政府。我们决定推迟朗诺的出走，以备最终谈判柬埔寨问题时作讨价还价砝码之用。

西哈努克没有帮我们的忙。不可能设想中国人未曾向他示意过，在条件成熟时他还能回国任国家元首。但西哈努克为了使那毫不留情的红色高棉人更愿接受他一些，他象鹦鹉学舌一样，反复坚持说要作战到底。尽管在北京所倾向的那种解决办法中，他本人显然是有利可图的，但他懂得，红色高棉和河内都一定会阻止这种结局。他太软弱了，不能失去这个唯一的靠山——不管他本人内心倾向如何。西哈努克一再重复地说：“国内抵抗力量”（意指红色高棉）反对任何妥协。四月十九日，他在河内声称：

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我们在国内的领导者们决不会接受对金边集团的任何妥协。美国、法国和苏联这些国家指望寻求妥协的解决办法，这纯属空想。四月二十八日他再次强调他本人是无足轻重的。据法新社报导，他曾说过：

人民武装部队的战略战术都是在柬埔寨国内由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乔森潘及其参谋总部制订的，而不是在任何别的地方制订的。

谈到他同美国可能进行的谈判时，西哈努克强化了他的立场。他宣称，即使进行任何正式谈判之前的初步接触，其决定权都在“国内抵抗力量”之手，而不在他手上。

事实很快就证实：西哈努克认定只有红色高棉才操有控制权是正确的。一九七三年三月，西哈努克短期回国，访问柬埔寨“解放区”，此事后来曾经广为报导。当时尽管共产党人在国际上还正在利用他的威望，但在国内已经在试图削弱他的地位了。红色高棉力图确保在国内散发他的讲话时不致加强他的威望。还有报导说，红色高棉正在有计划地把那些亲西哈努克分子清洗出他们的组织，并且发动一场宣传运动来丑化他，以消除他在国内所具有的残余威望。^⑬

关于所谓西哈努克未能恢复在柬埔寨的权力是由于美国反对所致的论点，就谈这些。

这时，我们手上所剩的唯一王牌，就是争取一个军事僵持局面了。要争取到这一点，我们唯一依靠的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想帮助柬埔寨提高军事效能而提供顾问和训练，或是增加美国援助，都已遭到了国会禁止。还出现了一些意在推卸责任的神话，如说我们玉石俱焚的狂轰滥炸引起了平民的巨大伤亡；又说由于我们的惩罚行动，才把红色高棉从普通的游击战士推向了一种由苦行节欲的信念*支配的种族灭绝狂。^⑭但事实则正与此相反。

斯旺克大使常常批评我们的政策，他和他的副手恩德斯向国务院历史司提供了一份文件，列述了一些有关轰炸的事实。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柬埔寨政府单方面停止了军事行动，想以此导致停火；这时美国的战术空军和 B-52 轰炸机的行动也停了下来。只有在红色高棉坚持继续敌对行动，而且只有在应柬埔寨政府请求的条件下，才能恢复轰炸。

一九七三年二月，这些条件都不幸地具备了。红色高棉对待停火呼吁报之以发动一场进攻；北越拒绝撤军并继续向其柬埔寨盟友提供后勤支援，有时还有火箭和炮火支援。这时美国要不作出反应就得眼看着自由高棉陷于崩溃——也许南越也同样。于是美国空军恢复了作战行动。斯旺克和恩德斯在报告中说明了这一情况。（他们表明军事行动是通过正常途径恢复的，而不是象某些有高度想象力的人所说的，是由我二月份在曼谷会见斯旺克时背着国务卿罗杰斯设计的一套秘密程序而恢复的。）^⑮

还有一条指责说，B-52 轰炸行动进行得懒懒散散，全靠美国大使馆所用的那种旧式大比例尺地图进行的。这也同样是一派谎

* 原文“摩尼教”式的(Munichian)；系指古波斯宗教，于公元三、四世纪时盛行于中亚和罗马帝国，认为善恶不两立，主张苦行节欲，抑恶扬善。——译者

言。事实是：轰炸是受第七航空队指挥，根据最新的摄影侦察，有精确的雷达和红外线传感器指挥，并在每次轰炸前后都作了情况侦察。我们的空军行动受到认真的行动规则约束，禁止使用 B-52 袭击距离友军、友邦大小村庄、住宅、纪念建筑物、庙宇、宝塔和其他神圣地址不到一公里远的地区。这些规定得到了遵守。当然，也曾有过悲剧性意外事件（根据斯旺克和恩德斯的报告，严重事件也只有两起）。但是，不管怎样，也不能把它们说成是“对平民进行了有系统的轰炸。”事实上，第七航空队还多次拒绝了东方关于进行袭击的要求；因为根据他们的侦察，这种袭击距平民区太近，他们不愿冒险。

今天，情况已经清楚，妨碍柬埔寨和平的，既非美国人，也非西哈努克，而是共产党红色高棉。从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我曾一再努力想从黎德寿方面得到停火和政治解决的保证，但都没有成功。我们得到的答复都是同样的托辞：河内对红色高棉作出决定的影响力是很微弱的。这话也可能是真的；红色高棉曾激烈谴责河内签署巴黎协定，把这件事看成背叛，这不仅因为它使我们得以把军事打击目标集中指向柬埔寨。红色高棉于执政后不久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承认他们曾抗拒过一切要求停火的压力，因为“要是柬埔寨接受了停火，它可能早已陷于崩溃。”^⑥他们后来阻扰达成协议，因为他们一心想得到全胜。

至于那种把红色高棉的残酷暴行归咎于我们的轰炸的神话，可能出自某些受虐狂病患者的想法，但却经不起认真分析。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推断，而相反却有大量证据证明，结论恰恰相反。早在一九七一或一九七二年，红色高棉就曾经在他们所控制的各个地区内实行过同上述残酷暴行完全一样的极权主义措施；待到一九七五年全国胜利后，他们就照样在金边大干起来，使得全世界为之愕然。他们把农村人口扫地出门；对传统的地方社

会组织、宗教习惯、家庭结构破坏殆尽；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把中产阶级当作建立“新社会”的障碍而加以消灭；共产党警察国家的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一九七五年以后柬埔寨大浩劫的特征；而早在一九七五年之前，所有这些都已在红色高棉控制区内实施多年了。这是一种扎根于狂热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既定政策。

一位曾亲身在柬埔寨工作到最后一刻的法国牧师，对柬埔寨的悲剧作了可能是最好的记载。他说：“这简直是一种把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加以推演，以至于最极端典型的事例。”他断然宣称，起码从一九七二年就已经开始这样干了，这是一种“传统革命措施”。^⑩另一位在一九七二到一九七四年期间曾经采访过几百名在南越的柬埔寨难民的分析专家，对那种改革社会措施的野蛮程度有条理地作了概括：“对于过去的一切都应当加以诅咒，都必须摧毁。”他还指出，这种作法“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一年末就已经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开始了。”^⑪柬埔寨大量难民外流的恐怖局面，并不是美国轰炸所造成的。它是肆无忌惮地实施一种邪恶的意识形态所必然带来的结果。

到了一九七三年夏天，我们最热切想望的事莫过于结束柬埔寨战争。扩大金边政府和加强轰炸都不过是为了促成重开谈判而已。不幸的是，西哈努克的公开讲话仍旧继续恶毒地反对这种前景。四月十三日，在他从“解放区”参观回来以后，他的谈话无疑反映了柬埔寨国内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意见。他在北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他决不接受任何妥协或停火。

关于红色高棉当前政策的这一消息，不可能得到他的中国东道主的欢迎。中国人懂得，红色高棉的全盘胜利将使得他们苦心培育的西哈努克牌归于无效，而会使得河内有把握主宰整个印度支那。中国无疑认为，美国不会让同它结盟的力量遭到全盘失败。因此，战争继续下去将会给北京的外交增加难题，而无补于结局。

至少说，它会推迟对美接近；而对美接近是中国人的主要政策目标，正如我一九七三年二月北京之行所显示的那样。

周恩来力图穿透这重重迷网——开始时有点过于转弯抹角，令我们不易捉摸。他利用西哈努克回到北京之机，说出了中国方面的选择。在四月十一日为西哈努克举行的国宴上，周指责美国继续在柬埔寨“狂轰滥炸”和支持“朗诺卖国集团”。《人民日报》在一篇权威性的社论中补充了周的论点。它说，亲王对“解放区”的访问表明了他是“柬埔寨的合法统治者”。对于周的这种罕见的公开批评，我们感到愤怒，但却忽略了他的讲话的要害：中国大力支持西哈努克担任柬埔寨政府首脑。照周看来，西哈努克这次回到柬埔寨的访问，表明了“西哈努克深受柬埔寨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而这点却正如前面已指出的，正是过去红色高棉所力图否定的。

我们只注意到了明确批评美国的一面——用毛的话说，这叫“放空炮”——而未曾注意到，这是表明北京在巧妙地同河内和红色高棉脱离关系。四月十三日，我们向北京发了一封措词异常尖锐的照会，表示我们对周的讲话“极为失望”。我们指出河内明目张胆地破坏巴黎协定，特别是对第二十条要求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的规定。我们的照会定然引起了中国人的疑惑，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懂得复杂的事物。尽管如此，照会结尾还是申明，我们愿意在互相妥协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谈判。它说：

美方愿意重申：我们将继续为遵守关于越南的协定、停止在柬埔寨的一切军事行动、为寻求可为该国带来真正中立和独立的政治解决而努力。然而，美方深信，有关各方也都有责任努力在这些问题上保持克制。

北京的答复异常迅速，明显地表明我们的话刺痛了它。当时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曾于四月十六日以“个人”身份同我谈过一次话——对于中国外交官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事，除非他打算说一些过后可以公开否认的话。他断言，他不理解我们所表示的极

端失望，中国不过重申以往的立场而已。他敦促美国停止支持朗诺，这种把矛头针对个人而不是组织机构的提法，说明对二月份在北京所谈到的那种前景，即除朗诺外把金边政府的其他人员都包括在联合政府内的建议，留有回旋余地。

我在答复中谈到了这个题目：

关于柬埔寨，我们准备同你们一起，根据贵国总理和我在北京所谈的那些原则，去努力组成某种联合机构。我们并不对某个个人承担义务。我们鼓励西哈努克的代表同其他政治力量的代表之间进行谈判。

看来我们在东南亚的目标与你们并不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我们想阻止的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出现一种由某一单位或某一外部强国所控制的安全体系。我们认为，为达此目的，在该地区各国都各自发展自己的国家特性，互不逾越，实属上策。

在四月二十四日致周恩来的信中，我又重申了这一主张。我说：

关于柬埔寨局势，美方愿重申：美国愿意实现一种容纳各种政治力量，包括西哈努克亲王在内的解决方案。美方打算就此目标与中方进行谈判，时间在布鲁斯大使到达之后，地点在华盛顿或北京均可。

中国人并没有立即答复。但是到了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周在会见新任命的我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把话题转向了柬埔寨。周说：“解决的唯一办法是有关各方充分实施巴黎协定第二十条的全部附属条款。”这就表明中国同意我们的解释，即北越部队应当撤离柬埔寨领土。此外，在另一处周又暗示此点。他说：尽管中美两国看法不同，但都愿意实现柬埔寨的和平、中立和独立——事实上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和平、中立和独立。”这里的含意就只能是，必须撤除北越的基地。周还补充说，中国新任命的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将于五月二十五日动身赴华盛顿。他将被授权就此事继续进行探讨。显然，他的意思是希望在黄镇到达华盛顿时，能得到答复。

与此同时，我正在巴黎同黎德寿进行谈判。他对于柬埔寨中立和独立的解释就是让越南称霸。他要首先达成政治解决，否则就拒绝谈判关于实施协定第二十条的问题。而他又以尊重其盟邦柬埔寨的“主权”为借口，拒绝讨论政治解决问题。河内对于这个它曾于一九六五年和后来又准备在一九七八年再度入侵的国家的独立关心到如此程度，以至黎德寿对于我建议由我们共同向柬埔寨双方呼吁停火也不同意。我同黎德寿的五、六月会谈以无甚结果而告终。正如前面谈到过的那样，黎德寿只同意作些空洞保证，诸如“双方将竭尽全力实现和平解决”之类，此外则寸步不前。时至今日，所谓“竭尽全力”显然不过是啥也不干的委婉说法罢了。因此，要是指望北越人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话，恐怕就只能靠战场了。我们的外交必须致力寻求其他途径。

在我同黎德寿会谈的间歇期间，我向中国人正式建议，继续同周恩来交换意见。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天，是我五十岁生日，我在纽约告诉黄华，照我看来，中美双方利益是一致的。我们都力求防止出现“一个支持外部强国的霸权主义目标”的集团。换言之，我们都不愿意让印度支那处于同苏联结盟的河内的卵翼之下。为实现上述目的，我提出如下建议：

我们可以停止对柬埔寨的轰炸，也可以撤出我们在那儿的规模很小的顾问团。我们还可以安排朗诺来美国就医。反过来，我们希望实现停火——如果需要，为期九十天——以便西哈努克集团能够同朗诺集团其他成员会谈；在这次会谈进行期间，我们将授权布鲁斯大使的工作人员与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会谈。待到几个月内这一过程完成之后，我们不反对西哈努克亲王回到柬埔寨。但这个过程需要持续一些时间，务必使它不要不顾我们各自的需要。

黄华是一位办事彻底的职业外交家，他提了几个要求澄清的问题。我告诉他，这个基本想法已向黎德寿提过。黄华晓得河内不会赞成这种办法，但可能它也无法进行阻止。他提醒我说，周恩

来总理已告诉过布鲁斯大使，西哈努克亲王和红色高棉从原则上都同意与美国会谈。如果黄这番话是以摧毁非共产党部队为前提，它的意义是不大的；但中国人心中必定是另有打算的。毕竟周恩来早在二月份就说过了，出现一个彻底的“赤色”政府，只会使大家的问题都变得复杂化。

而如果北京的政策是对印度支那事态回避不管，那么，黄华肯定会拒绝我的建议。但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拒绝，而是说要把我的话报告北京。

五月二十九日，黄镇第一次来白宫拜访我；我重申了上述建议。他也说将报告政府，他还有针对性地用周恩来对布鲁斯的谈话答复我，即强调应严格实施巴黎协定第二十条。第二天，尼克松利用黄镇来椭圆形办公室作礼节拜访的机会，再次强调了他对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所寄予的重视。

中国人的反应是迅速的。六月四日，即我初次提出建议之后八天，黄华从纽约要求约见我，转递一封信件。信件表示注意到了我们“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初步意见。”它强调有关各方——含意自然包括河内在内——必须尊重柬埔寨的主权。中国不能代表柬埔寨同美国谈判；由我们在适当时机与西哈努克直接会谈是必要的。但是目前中国可以：

将美国的初步设想转告柬方。但鉴于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目前正出访非洲和欧洲，我们不便通过外交途径同他进行联系。为了把意见弄准确，中国方面现在愿将美方的初步设想重述如下……

中国照会采用了罕见的作法，即完全逐字地重述了我对黄华所宣读的建议；照会结尾说：“上述内容如有不够确切之处，希望美方予以校正。”

就这样，中国人自任了中间人的角色，插进到柬埔寨问题的谈判中来。任何熟悉周恩来的人都会确信，要不是这标志着他本人

在这件事上表明了态度，那么，他是不会要求这样仔细地进行校正的；而要不是他认为有成功的希望，他是不会亲自来充任这个中间人的。审慎的中国人绝不会在东南亚事态发展面前冒险，使自己显得无能为力；要是觉得转达这封信会遭拒绝的话，他们是不愿意转达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指定了西哈努克作为我们对话的对象，丝毫也没有提到“国内抵抗运动”，即红色高棉。可是，要是认为中国人事先没有征求过红色高棉的意见而贸然这样出面过问，那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要是柬共已经打算同我们打交道了，那么他们三月间所设想的军事僵持局面必然即将出现；因为当时他们曾经决定，如果到了七月份处于军事胶着状态，就同我们进行谈判。

很清楚，周恩来已表明了中国的态度，赞同一种保留朗诺机构主要成员的妥协解决办法，这是我们双方近乎一年之久的谈判的主旨。这个方案反映了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使得红色高棉无法获致它迄今为止一直强烈要求的全面胜利。停火将把自由柬埔寨的机构保持下来；西哈努克将在美中双方支持下重返柬埔寨，他不仅仅是一个柬共所要求的那种临时空头元首，而且是一个根据各派要求进行妥协而产生的、拥有他固有的那种权力的首脑。

周恩来在说服北京政治局——特别是毛主席本人——接受这项建议时，其论点只能是：眼下红色高棉要想全胜是不可能的，因为华盛顿绝不接受；而且这样只会有利于河内的霸权主义目的。对于红色高棉，他也只有以下面的论点才能说动他们，即只有这个方案才能终止美国轰炸。而红色高棉也只有确信在长期轰炸的情况下，他们在军事上无法取胜时，才会默认这个方案。因此，尽管周本人不会承认，但以下这一点却是事实，即周需要我们在柬埔寨采取军事行动以利于贯彻他的政策；他需要的程度几乎不亚于我们。我们的轰炸是谈判中两个方面都需要的一种讨价还价的筹

码，尽管其中一方还在谴责它。

但是，事态发展不久立即表明，当我们的政策接近瓜熟蒂落之时，国内的形势却使我们的政策无法继续下去。六月初总统已经陷入了绝境。我们现在知道，当时他正在花时间把录音带倒回来听，以研究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谈话，看看它是否会给他带来损害。六月五日在洛杉矶，一个大陪审团开始审理非法闯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师诊所的问题。六月六日，尼克松在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的压力下决定收回成命，把两天前决定拒绝提供的他同迪恩谈话的录音记录交了出来。而到了六月八日，水门窃听器之一麦科得请求法官赛里卡重新审判，理由是政府藏匿了证据，对他的审判犯有伪证罪。

周恩来和我都未能看透当时尼克松的权力已经被水门事件冲蚀到了何等程度，因此我们都兴致勃勃地继续前进。六月十三日我在巴黎会见中国代理外长姬鹏飞时，向他肯定了周准备转达给西哈努克的我们的话的准确性。我强调了西哈努克要回到柬埔寨还得几个月的过渡阶段。关于西哈努克最终出任国家元首一事，我们双方并无分歧。双方互相尊重对方的需要。我答应一旦柬埔寨实现停火之后，我们将如约同西哈努克本人进行商谈。姬同意我们提出的“一定阶段”的过渡期。姬当时说，对于立即实施的唯一障碍是西哈努克出访许多国家；在旅行中通讯问题相当微妙复杂（且不谈他在处理长远问题时那种难以捉摸的脾气）。要是他的欧非之行进行得非常高兴，他可能会把本来寻求的谈判无限期地推迟下去。

第二天（六月十四日）我在华盛顿同黄镇交谈时，内容大体也差不多。我向他简单介绍了同黎德寿谈判的情况。双方都表示急切盼望西哈努克早回北京，而且对他行程的捉摸不定都感到无能为力。黄镇和我开始谈论我即将进行的北京之行。表面上我是去

向周介绍勃列日涅夫即将进行的华盛顿之行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同西哈努克开始接触的机会。

六月十九日我告诉黄镇，停火要是能在我访问中国时（预计在八月六日左右）实现，我愿意届时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商谈政治解决问题。我们已经走到了可能走的极限了。与此同时，西哈努克仍在继续其环球旅行，显然并不了解我和中国人之间的谈话。他显然担心我会同黎德寿一起，越过他来解决柬埔寨问题。六月间某日，他在南斯拉夫访问时，接见了我的一位老对头法拉齐。他在接见这位令人可畏的意大利记者时，表现得要比我去年接见他时好得多。这说明了他的高超技巧。西哈努克强调，河内无权代表高棉起义部队发言。然后，他就重复了共产党的强硬路线，还是照旧巧妙地转述他的盟友的话，而并非其个人意见，“红色高棉绝不会接受停火。他们不会屈服于任何协议。绝不。”

西哈努克还对美国的轰炸恭维了两句。他说：“正是这种轰炸才使得我们此刻不立即进入金边。”但他也提到水门事件，表示他很了解此事，还提到参议院要中止美国军事行动的努力。他说：“尼克松现时处境十分困难。水门丑闻给他帮了倒忙。参议院和国会最终将反对他的经费开支。”谈到关于他同红色高棉之间的关系时，西哈努克幻想不多，但预感不少。他说：“红色高棉一点也不喜欢我。我知道这一点……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我充分了解，一旦我对他们无用时，他们就会象唾弃樱桃核一样的唾弃我。”他说，柬埔寨终归要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他不屑追求名利，无意充当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或日本天皇裕仁式的挂名元首。④

等到我们得知接见谈话内容时，时间已是八月十二日，大局已经确定下来。不管怎样，它不会对我们起多大影响。我们总是相信：西哈努克因在旅途中，实在是无法取得联系；相信周是位审思慎行的人，办事必有把握；要是不稳操胜券，他是不会乐意承担此

事的。

到了六月中旬，这时我们已经意识到，不管好坏如何，我们已经是临近决定阶段了。我们可以设想，实现停火，让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然后由他去同现存各派政治力量打交道，使他自己能有回旋余地以周旋于各派同共产党之间。我们差一点成功了；而所有这些将关系到柬埔寨未来的存亡。但是，我们得不到国内的支持，这就注定了我们的计划只是枉然，柬埔寨国运危殆，而且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周恩来在国内的地位。

国会制止轰炸

事件接踵而来，使得柬埔寨终于被放弃，这里是有许多因素的。在美国国内存在着极度的厌战情绪。有些议员们真诚地相信，他们通过禁止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可以赐该地区人民以大恩大德。但对其他人来说，人道主义的设想恐怕只是次要的了；借此机会对那位宿敌、现已瘫痪的总统算个总帐，那才是主要目的呢。还有些自由主义者，想证明四年来的反战立场是正确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多数派领袖奥尼尔在众院谈话时说，在柬埔寨，连牺牲一个美国飞行员的生命也不值得。^②那些因十年战争前景未卜而深感消沉的保守派，由于他们的老旗手尼克松历尽折磨而士气低落。于是，国会决定要求美国停止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行动，这是美国国内舆论最后分崩离析的一个标志；这样，柬埔寨人民便遭到了被遗弃的命运。

早在四月和五月期间，国会内的反轰炸热潮已开始沸腾。我们的空中行动被斥为“非法”，尽管其合乎宪法是有根有据的。五月份国会的一系列反轰炸表决，在本章前面已有叙述。五月份黎德寿就曾幸灾乐祸地对我大谈国会压力的问题。在我的粗鲁反驳

中；我第一次失去了觉得我们能够处理好国内局势的信心。我在五月十二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过这一点；我觉得，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道理，恐怕只有依靠出现奇迹，才有可能说服我们的国会了。我说：

谁也不会设想，仅仅因为已经写成一纸文书，停火协议就能得到遵守。国会诸公及其他人士务请自问：没有奖励，也无惩罚，一项协议如何能得以维持？

我加紧努力，想赶在国会行动之前促成柬埔寨停火。但就在五月中旬与此差不多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会联系事务的工作人员约翰·莱曼给我送来一份内容深刻的报告，预见到国会为制止轰炸的表决将使我们面临一段困难时期，对此白宫正在竭力加以阻止或推迟。据莱曼讲，水门事件是使这些表决对我们不利的一个因素。但他乐观地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

到了六月，国会的景况更趋黯淡。六月四日，参议院通过了凯斯一丘奇关于中断一切军事行动用款的修正案。莱曼在六月五日的备忘录中告知我，禁止轰炸的议案可能要被推迟到本月底，“过了这个期限，情况就很危险了，虽然并非完全绝望。”我们成功地说服了参议员们等到我和黎德寿会谈结束后再说；会谈如能成功，将会增强我们的地位。

我已别无良策。中断轰炸会毁掉我们唯一讨价还价的筹码，也会毁坏促使中国人卷入的唯一动力。周恩来需要用中止我方轰炸作为条件来说服红色高棉，以换取他们同意让西哈努克和现存政府机构的部分人员入阁的妥协方案。正在紧张进行的谈判是我们的最后一着。要是失败，则柬埔寨和接踵而来的南越、老挝都将覆亡。六月十八日，我向莱尔德呼救。水门事件使他暂时回到政府，任总统国内事务顾问。我告诉他中国人已答应插手帮忙：“除非他们觉得有成功的机会，否则中国人是不会愿意出来表态，说他

们愿意有所作为的。”我表示愿意同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和尊敬的众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乔治·马洪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到了九月一日，不管谈判成功与否，都立即停止轰炸。但要求他们一定保密，因为万一这个期限泄漏出去了，我们用停炸作为外交谈判条件的可能性也就丧失了。红色高棉就会坐等那个期限的来临。莱尔德答应转达我的建议，但不抱乐观。这位操纵国会委员会的能手确信，我们已经达到极限了。据他说：“马洪曾说过：日子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艰难过。”

现在每天都很重要。我们得悉西哈努克将于七月五日回到北京，到时候我们的方案就可以实现了。但是国会却不能容忍任何拖延。六月二十五日正是勃列日涅夫离开美国，约翰·迪恩在参议院开始作证的那一天，众议院就所谓伊格尔顿修正案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表决，内容是关于停止对柬轰炸经费的一项附加条款（该条款业经参议院通过）。这项条款是打算附加到一项关于本财政年度结束后（六月三十日）美国政府活动经费的补充拨款法案之上的；因此总统难于对这项法案使用否决权。这项法案要是通不过，一切政府机构就手中无钱了。我从圣克利门蒂用电话向一些议员呼吁：不管怎样，我们九月一日一定停炸，但务请对此项保证保密，以免使柬埔寨停火的前景中途夭折。我不可能对中国的主动作过于确切的说明，但却对我们在进行谈判作了足够的暗示。

但是九月一日的限期不可能保密。只有在一种公开提出以九月一日为限期的妥协方案中，政府的支持者们才有可能抵挡住要求立即停炸的压力。但这个期限一旦公开，我们的战略即行告吹。红色高棉就会坐待期限到来。到了六月二十五日，我们连这样一点稀微的安慰都得不到了：投票结果势均力敌，二〇四票对二〇四票。众院用呼声表决法*通过了伊格尔顿关于立即停止经费拨款的修正案。

第二天，六月二十六日，国会讨论关于延长现行预算有效期，以待国会通过新拨款的“延长有效期决议案”，其中附进了一些反战的修正案。同样的修正案也被加诸于提高国债最高限额的法案之上。总之，我们的对手不惜停止整个政府的活动，以阉割在印度支那的一切军事行动，切断我们用以维护盟邦自由的唯一手段。

国会决意要强制执行撤军案。该案因政府反对而被搁置已达六年之久。国会此时已无心再听取关于外交复杂性的劝说了。议员们不愿为反对共产党接管一个偏僻的角落印度支那而冒舆论界责备之险。而只有在政府各部门互相信任，从而建立起种种微妙的谅解时，我们的政治制度才能行之有效。但是，越南政策问题上的殊死斗争，再加上水门事件，使得这种信任横遭破坏。辩论中主要考虑的是算老帐，而不是共同的目标。对行政部门的根本苦恼，谁也不管。我们知道公众厌战，而国会却是敌视我们的。但我们始终认为：美国政府不能把多年盟友弃于共产党之手；否则，全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就会丧失，从而使我们在未来付出沉重的代价。

因此，尽管莱尔德六月二十六日已从华盛顿向圣克利门蒂打来电话，指出了黯淡的前景（其含义就是叫我不需要同那些即将提出的修正案进行斗争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继续争取一场体面的停火。前一天迪恩已在电视上露面了。莱尔德把这两天表决的不利情况归咎于迪恩的有害证词。我仍坚定不移；我说：“我们要是停止轰炸，柬埔寨的一切都会土崩瓦解。我看只消两个月事情就成了。你能帮帮忙吗？”但是并未得到真正的帮忙，也没能作到保密。另一件企图把中断拨款限期推迟到九月一日的“妥协方案”也以二十四票之差被击败了。这事真叫我们左右为难。要是政府公开支持这个期限，我们是有可能赢得规定推迟到九月一日的表

* 按呼声大小决定表决结果。——译者

决的；但这样作的代价只能是破坏谈判。因此，莱尔德说，争取拖延的唯一办法——甚至也是支持总统否决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来“同意”一个四十五天的限期。这样就又把我们推回到原来的难题上了。公开宣布一个期限，比之于立即中断，也好不了多少。对于破坏最终的停火，其作用都是一样的。对于这种前景，莱尔德并不十分恼火。他说：“从政治上讲，这样可能对你们还更好些。不管怎样，我不相信柬埔寨最终会得出甚么好结果来。依我看，要是能把这种结局的责任推到那些家伙们身上，倒还更好些。”我倒并不热衷于寻找推卸责任的借口，更关心的还是事态的结局。每当我看见哪怕一点点实现柬埔寨和平的机会都被党派政治的无聊狂纵、被为了清算十多年来的宿仇旧怨而破坏殆尽时，我感到极其厌恶。

六月二十七日，总统否决了带有“柬埔寨附加条款”的第二补充拨款法案。他正确地声明，如果中止轰炸，受害者将不止柬埔寨，“而且还有那些根据谈判协议、政治结盟和信赖军事实力所建立起来的平衡。而正是这种平衡，才使得东南亚和平有保障，也才使我们觉得越南协定可以接受。”众院在六月二十七日的表决中支持了总统的否决。反战派聚集起一个空前的最大多数，二四一票对一七三票；但还差三十五票才能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以压倒总统。但是，众院的失败只是技术性和程序性而已；压路机轮般的碾压是不能长久停滞的。紧接着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反轰炸修正案，作为延长上年度预算（有效期的）决议案的一部分。我们需要通过这项延长预算决议案使政府各部门在六月三十日之后仍能开展工作。议会还把其反轰炸修正案作为提高国债最高限额的一项修正案。我们的失败，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感到灰心的不仅是我们在国会的盟友，也包括我们政府内部。真正支持我们政策的只有黑格。在水门丑闻声中，有胆量敢于为

越南争端而站出来讲话的恐怕为数不多，这是可以理解的。白宫的国会专家们确信，只要总统的否决没有被压倒，他们关于终止军事行动经费的种种法案，就将会接踵而来。莱尔德不断鼓吹一种“妥协方案”，要总统接受八月十五日作为停止轰炸的限期。我告诉莱尔德，这样作毫无意义，只能自取失败。我说：“他们将白白地把一切都抛弃掉。”莱尔德说，如果我们想让政府工作下去，我们别无选择。这时我有些恼火了，我说：

这是我所见到过的国会决议案中最具有报复性的、也是最可鄙的行动的例子。它不仅针对柬埔寨，而且伤害了我们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中国人看到国会柬埔寨问题上都能这样对待我们，那么，他们在别的地方会对我们干出些什么事呢？

六月二十九日，以八月十五日为限期的修正案在参院外委会支持下获得国会通过。但是，为这项延长轰炸期限的决议案，反对派索取一项交换条件：八月十五日以后，禁止在整个印度支那的一切军事行动。莱尔德显然曾经示意共和党少数派领袖杰拉尔德·福特接受这一方案。不管怎样，福特本人打电话给尼克松证实了这一决定。对此，我向尼克松提出了抗议，但他说为时已晚；他已屈服于“多数压力”之下。堂堂尼克松竟然出此下策，若非迪恩的证词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六月三十日，全国各大报纸都欢庆尼克松同意八月十五日中止在柬埔寨的轰炸。《纽约时报》说，这种妥协有助于继续进行“微妙的谈判活动”。这只是幻想；谈判已被戕害了。尼克松后来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八月三日，停止轰炸生效前不久，尼克松致函众院议长卡尔·艾伯特和参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信中说：

这样遗弃朋友将在其他国家产生深刻影响，譬如在泰国。泰国倚靠的就是美国的一贯性和决心。我谨提请国会充分认识其行动将会带来的后果……我特别希望英勇的、苦难深重的柬埔寨人民知道，停止轰炸并不表明美国已自动放弃为争取印度支那持久和平而努力的决心……

我只能希望北越人不要从国会的决议中得出错误结论，以为从此他们就可以在印度支那其他地区随意发动军事进攻了。

但是，这种威胁已成了空洞的大话。在一片赞扬声中，已经制定了规定停止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的法律。在越南，我们手上已没有相应的手段来对付北越的进攻了。至于柬埔寨，新闻界的调子是久已熟知的：朗诺是腐败的，他和共产党相比不过是半斤八两。轰炸是“大屠杀”，因此停止轰炸就是对柬埔寨人民一桩人道主义的行动。至于对印度支那其他各国的后果如何，对于未来世世代代总统的权威、或者说对于美国作为一个可靠盟国的声誉有何影响，人们并不承认会有甚么作用。人们声称，轰炸并不能促进谈判，相反只给朗诺以借口来避开谈判，只能更加激怒红色高棉。所有这些论点都见诸《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它基本上代表了广大舆论界的评论。该文称：

总统声称担心在金边出现“河内控制的政府”，但却不管河内对华盛顿控制的政府有何感想。但是，不管甚么政府坐镇金边，柬埔寨都能被河内利用作供应南越的通道和庇护所。对于这一点，尼克松先生和所有其他人早在一月份就很了然，但他还是签署了越南停火协定——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南越尽管有柬埔寨侧翼的问题，但还能自己对付。现在他却声称停止轰炸就会动摇他在一月份通过谈判争取到的东南亚的“平衡”。这种说法即使可能有道理，却使人怀疑一月份的整个交易究竟能否持久。他的谈话是不顾一切的过份夸大之词。

至于尼克松说停止轰炸会“严重打击美国的国际声誉”，这简直是废话。这是对国际事务的一种陈词滥调；尼克松自己在改善美苏和美中关系上获得重大成就的事实，至少已经证明那种思维方法已经过时。尼克松示意说，如果不继续向倒霉的柬埔寨人头上扔炸弹，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他的“新和平结构”。这种示意若非出自总统有欠考虑，至少也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因为这简直等于承认，他的整个外交政策是一种骗局，——顺便说一下，对这种说法，我们并不同意。②

事实上，这就是认为，共产党胜利倒可能是件好事情；它总可

以导致成立一个中立的政府，导致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但是它完全无视如下的事实：西哈努克此时已毫无讨价还价的资本，而那些为建立联合政府所需的非共产党人士注定要在军事上被摧毁。八月十四日《纽约时报》老调重弹，说轰炸行动阻碍和平，国会的禁令事实上为谈判开辟了道路。

……事实上，柬埔寨冲突双方都需要和平解决。现在既然国会已命令取消美国对朗诺政权的直接军事支持，这种需要就显示出来。来自金边的报导说——尽管华盛顿有人否认——高级官员要求美国安排朗诺出走，而让西哈努克回来。西哈努克为避开访问北京的基辛格而走访北朝鲜；在那儿他曾致电老友曼斯菲尔德，提出如果美国取消对朗诺的一切支持，美国就可以得到“光荣的和平”。

尽管华盛顿竭力把一位在三年前试图搞掉的领袖重新在该国复位为时已晚，也并无体面可言，但是，要是能得到柬埔寨现政府内部的支持，亲王的建议仍不失为现有建议中最好的。西哈努克为争取重新掌权，已经“百分之百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柬共拴在一起；但是，作为一个忠诚的民族主义者，他会反对屈从于任何外国，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华盛顿邮报》八月二十八日也有类似论调。

我们同意，由西哈努克来统治一个中立的柬埔寨是可取的办法。六个月来我们辛辛苦苦，从外交上巧作安排，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军事压力本身就是这种安排的一环；而国会的一纸禁令停止了军事行动，使得柬埔寨回到中立自由的一切可能都化为泡影。这样一来，共产党全面胜利已成定局，西哈努克已形同朗诺，无足轻重；——红色高棉还能容忍他于一时，只不过是为了国际视听。一旦政权全部到手，红色高棉必将迅速抛弃他。所以说，国会在置金边政府于死地的同时，也必将置西哈努克于死地。

谈判告吹

现有的计划按原来的势头继续进行了几个星期，部分原因恐怕是我们的共产党对话人怕有机诈。他们眼见我们这个超级大国自愿放弃所承担的一切义务，对此他们需要时间进行适应。七月六日，金边政府在西哈努克回到北京之时，正式提出愿与“对方”谈判。安排这一步骤是为了配合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为它提供一个外交渠道；因为我们估价，此时中国人应当为他们的主动行动开展活动了。《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尔是一位精明而客观的外事记者，他于七月十一日发表文章，埋怨建议来得太晚。

要是能早在二月提出来，那时正是西哈努克公开作姿态表示愿意在河内或在北京同基辛格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那么，眼下敌对双方可能不是已经达成协议、就至少是接近达成协议了。

马德尔的评论说明了秘密外交的风险和代价。首先，二月份时，西哈努克如在北京同我谈判，可能会被红色高棉否决掉。其次，自年初以来，这类折衷建议已经不止提过一次而是提过多次，但一直遭到拒绝。看来只有待到七月初我们在地面战斗中实现了军事僵持时，它才似乎可行。但是，现在这一折衷建议已经遭到破坏。

西哈努克本人的行动就是最清楚的证明。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斥责我未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对于他那一方的顽固立场，他不是说他愿意这样，而是把它归咎于红色高棉追求全胜。他回到北京后必然已经得知我们关于停炸、谈判以及八月初由他同我会晤的建议了。同样清楚的是，周恩来是赞成这样做的。但是，在国会采取了上述行动之后，西哈努克改变了态度。这显然是因为红色高棉到了此时已经研究过军事形势。（根据前面提到过的报告，红色高棉原计划在夏初就进行这种研究。）他们得出结论，轰炸既然

停止，就根本没有必要作出妥协了。到了七月五日，西哈努克在公开场合中避开了一切愿意谈判的暗示，却转而声称谈判是“无用”的了，“太晚”了。他坦率地宣称：“高棉起义部队决定斗争到底。”

大约与此同时（在七月第一周），苏联也改变了立场。他们一直是承认朗诺的，并且在金边保留着使馆——也许由于他们估计在印度支那，只有在这个国家共产党的胜利还尚未成定局。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都把西哈努克称为“国家元首”了，这是自从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他被废黜以来的第一次。在莫斯科，共产党国家外交官向记者透露说，莫斯科正在改押其赌注。这是一种迹象，它表明，那些冷酷的强权政治贩子已经抓住了美国国会所采取行动的意义；这种人一向是以能估计客观情况而自豪的。②两周之后，苏联大使多勃雷宁通知我，七月一日以后，苏联、中国和北越都已得出结论：谈判已经完结，而红色高棉已是稳操胜券了。

我们怀着一线希望，试图再次通过中国人争取谈判。一九七三年七月六日，黄镇大使应邀来圣克利门蒂我的下榻处。他带来一封信件，其中暗示周恩来变得有些不安，而且正在寻找退路。中国人抱怨在美国报界出现的“谣言”和“猜测”，其中谈到朗诺“集团”同西哈努克可能进行会谈。信件机敏地把走漏消息的责任归诸朗诺政府；尽管“美国官员”近来也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一些透露”。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并没有说这些猜测是错误的；相反，他们对此很表关切，认为这种猜测“对于寻求解决柬埔寨问题极为不利，甚至可能会带来麻烦。”（当然，所谓“透露”可能进行谈判是由于政府竭力试图阻挡住国会的停炸要求才引起的。）

我的答复是重申我们的计划。黄镇证实说，西哈努克现在既已回到北京，北京将如约把我们的“初步设想”告知西哈努克。在美国国会已经把停火协议搞得无足轻重的情况下，周要是还打算把这份以停火为中心内容的建议转告西哈努克，这说明中国人迫

切希望政治解决的程度和我们差不多。黄镇证实，我八月初如能去访问北京，将会受到欢迎。显然，周恩来不会轻易放弃我们的共同计划。至少这反映出中国人一旦作出诺言，他们是极不情愿失约的。

华盛顿的事态突然逆转，在北京引起了紧张；这一点可从中国总理接见以参议员华伦·马格纳森为首的美国国会代表团一事上反映出来。周恩来对我们包括轰炸在内的政策，作了典型的老一套的批评。的确，一致协议的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事后能否声称他诱使华盛顿停止轰炸，是他对和平的贡献。周恩来突然发现，按他的打算应被说成是从美国手中压榨出来的停炸计划，却被这位参议员当着许多人的面轻易地交了出来。马格纳森还用夸张的口吻告知周对轰炸不用着急，要耐心些；它很快会过去的——具体讲，八月十五日；对此周应该感谢美国国会。显然看得出来，这一番话使周感到恼火。为了竭力保持他的谈判筹码，他说只要还在扔炸弹就很难耐心。马格纳森用拖长的语调说，不用着急嘛，美国国会会料理此事的。据布鲁斯向我报告说，“这番话显然使周生气了，”而对此国会代表团却越发困惑不解。在马格纳森继续喃喃自语地讲“我们已制止了轰炸”时，周的不耐烦显然已经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理解周，因为他看到了在他面前出现一场地缘政治的噩梦：一个同苏联结盟的河内统治下的印度支那；它是由于一个迟钝的超级大国不愿给自己的外交一个取胜的机会而造成的。

这种前景使他产生一种更深一层的预感。迄今为止，水门事件还被看作只是美国国内一桩令人不解的内部争吵而已，它对我国的对外政策的影响如何，还不很清楚。但是，现在看来，不仅是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中国可能不得不同一位权力遭到很大削弱、因而他的承诺很不可靠的美国总统打交道。用中国人惯用的话

说，就是一位讲话不算数的总统。而美国要是已经变成这样无能的一个超级大国，这对中国的安全将会有深远影响。的确，这样一来，中国同美国接近所根据的前提，已遭到破坏。要是对于这桩如此违背美国利益的事美国国会都可以强行决定，那么北京还能继续信赖美国么？

周同马格纳森谈话之后，北京的犹豫倍增，这当然是无足为奇的了。七月十一日，布鲁斯为我即将访问中国，递交一份关于柬埔寨的外交估计报告。中国人看来正在往后缩，不愿卷入有关柬埔寨的谈判。布鲁斯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手上已经没有甚么施加影响的手段了。他说：

中国人会含蓄地说，局势将瓜熟蒂落，落到急切等待中的西哈努克之手。但是，他们对于西哈努克能否控制得了红色高棉和其他起义分子，私下也是有疑虑的……同时，他们会盘算：拖延也不会有甚么坏处。

同一天，这阵恶风又带来一种不吉之兆。中国人本来已经同意八月头一个星期在北京接待我；具体日期他们说过由我确定。到了六月底，我建议八月六日，他们甚至已经把这个日期透露给了北京报界。于是我们建议双方于七月十六日宣布此事。七月十一日，我们接到语气呆板的答复，说黄镇已被召回北京——他返回北京一事本身就是一桩出人意料的变化。答复还说，关于宣布我的北京之行一事要等他在北京磋商以后再定。情况显然表明，北京在重新思索问题。

我们决心把这场乐曲演奏到底。我请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拜访中国联络处的副主任韩叙大使，提醒他曾接到过通知，让我们选择八月第一周的某一天。斯考克罗夫特重申，我们倾向于八月六日，并建议于七月十九日或二十三日发表公告。我还请他补充发表一项“半官方性的”意见，表明要是我从北京回来时在柬埔寨问题上两手空空，那么，我基于国家利益而维护一种不动感情的政策

的能力就要受到危害。于是，斯考克罗夫特表示希望中国人能让我们了解“关于柬埔寨局势问题，他究竟能指望从北京带回来点甚么。”

傲慢是软弱的护身符。我对于即将输掉的赌局下的赌注过大了。把中美关系这样明确地同柬埔寨的结局联系起来，只能使中国人更加左右为难，而不会给他们增添施加影响的手段。简单的道理就在于，由于美国的行动，周已失去驾驭局势的力量了。我们已经自己推翻了自己建议的谈判轮廓，因而即使用心最善良的中国领导人，也无法要求红色高棉放弃我们所奉献给它的全面胜利。

七月十六日，西哈努克清楚表明，他了解新的力量对比。在一份准备好的声明中，他向记者们清楚地表明了红色高棉的政策究竟是甚么——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他的声明很明确而且有权威性，全然不同于过去常见的那种即兴而作和捉摸不定的谈话。北京新华社播发了西哈努克的第四十三号《致高棉人民书》。他斥责了一切企图促成谈判的“干预”；说解决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共产党的全胜。第二天西哈努克的蔑视态度却又蒙上了一层绝望色彩。他说，共产党统治他的国家，毁灭了他的一切希望。他在北京接见路透社记者时声称：“金边解放之后，他将洗手不理国事，而让红色高棉去接管管理国家的事务。”^②

七月十八日晚上，谈判方案终于被断送了。韩叙给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送来照会，声称由于诸多人为制造的理由，中国不再愿意向西哈努克转达美国的谈判建议了。中国来照中简单地重复了红色高棉的极端要求；这些要求几个月来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这段时期，中国却仍一直在致力于寻求一项妥协方案。现在他们却倒过来接受了这些要求，完全放弃了过去认为一个完全赤化了的柬埔寨只会使大家的问题都复杂化的立场。照会称：

显然，柬埔寨问题的根子在美国方面；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问题的钥

匙在美国手中，不在任何别人手中。美国要是真正希望解决柬埔寨问题，东方的上述合理要求应当是可以接受的。希望美方能加以认真考虑并付诸行动。

由于中国人还拿不准西方的思维是否弄清了错综复杂的局势，周恩来又发来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就在第二天，七月十九日，又通知我们，我八月六日进行访问是不合“时宜”的。最适宜的日子将是八月十六日。就连我们也能够理解，这个日子是停止轰炸后的第二天，是我们自己强加给我们自己的。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谈判柬埔寨问题，我们只能是哀求者。含义十分清楚，我们在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中，已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了，西哈努克也和我们一样。他们可能对他继续作些口惠，但今后的赌注只能押在红色高棉身上了。中国斡旋已成了往事。

这样一来，那项经过苦心筹划出来的方案也就此告吹。显然，要获致中国来照中所列举的那种“解决办法”，我们用不着谈判了，尤其用不着同中国人谈判。但我们也不能给人们以我们深感恐慌的印象。正如戴高乐在遭到斥责说他过于顽固不化时向丘吉尔说过的那样，“我太软弱了，无法和解。”我们让北京等了将近一周，才发去一纸措词强硬的答复。内称：

对于七月十八日来照的实质问题，美国方面拒绝这种片面的对美国不利的“解决办法”；对此，中国方面不会感到惊奇。这种“解决方案”不符合互谅互让和平等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明显地不给对方留下任何谈判余地，还要进行甚么谈判，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基于上述，美国方面将谈判留待柬埔寨各方自己去进行。

与此同时，斯考克罗夫特又向韩叙宣读了下述口气尖锐的“口头照会”：

本政府遗憾地注意到，在我们新的关系的发展中，中国人第一次说了话没有算数。

中国方面一向表示信守原则，美国方面也同样处事认真。其坚定的原则

之一是，不得背弃人们的信赖。美方相信中国方面将会欢迎美国在其他情况下信守此原则。

同中国人周旋了这一回合之后，我们又等了一天才就中方建议我八月十六日访问北京一事作出答复。我们反过来建议推迟四个星期：从九月十三到十六日，包括十六日在内。对这一日期中国人又找理由避开了。因此我的访问最终被推迟到十一月。

把这种由于我们国内原因而使会谈夭折的责任归诸于中国人而加以责怪，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并非中国人改变了主意，而是我们自己改变了局势，从而破坏了以往谅解的前提。七月十九日我召集最亲密的助手们开会，出席的人有：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拉里·伊格尔贝格、温斯顿·洛德、乔纳森·豪、理查德·索罗门、彼得·罗德曼等；这些人都是制订对北京和解政策的老手，他们不仅协力制订了政策，还十分热衷于执行这项政策。会上，我总结分析如下：

停止轰炸的决定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柬埔寨局势。前此以往，红色高棉需要借助西哈努克以取得其所缺少的合法性。现在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合法性了；他们已发现可以打到胜利。西哈努克对中国人的用处在于可以用他来影响红色高棉，并抵制其他外来影响。中国人对我们的用处在于他们对西哈努克有一定的控制力。西哈努克对我们的用处在于一旦他能回柬埔寨，也许可以保持局势平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也需要朗诺集团——它能对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起牵制作用。国会议员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现在一切都完了。西哈努克不能帮我们拉住红色高棉，中国人也不能帮我们拉住西哈努克了。

八月四日，我对契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谈了这个道理：

由于水门事件，我们遭受了一场灾难。四月初我见到你时，我们正打算轰炸北越一周，然后访问俄国，再同黎德寿会晤。美国国会已经使这一切付诸东流……

中国人自荐任调停人。现在红色高棉得胜，西哈努克输了，中国人也就跟着输了。对中国人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红色高棉需要西哈努克，他们可

以从中操纵。但要是红色高棉不管用何种方式都能取胜的话，那么……

西哈努克越是变得无关紧要，其所唱高调反而越加升级。这表明了前景的黯淡。八月十二日他接见法新社记者，证实了“红色高棉对于已经一劳永逸地决定了的立场，现在毫无松动之意。”谈判不可能进行；起义分子下定决心继续武装抵抗到底，直到把朗诺政府“彻底消灭、万劫不复为止。”八月十五日西哈努克在北朝鲜的平壤重申，永远不会接受要红色高棉同其他集团分享政权的任何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甚么事情好谈了。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我有宿命论的思想。我说：

现在，随着美国停止轰炸，柬埔寨的谈判问题不可避免地要由柬埔寨各方来决定，而不取决于美国了。美国国会的意图要是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让美国在这些活动中不要去起甚么主导作用。

中国副外长乔冠华来美国出席例行的联合国大会，在十月三日的宴会上见面时，我对他谈过。我们仿佛是在一场战斗中基本上同属一方的老兵，由于出了一桩完全意想不到的、毫无意义的事件而败下阵来。乔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现在已经很清楚，当时我们双方谁都不该卷入这个问题中去——这等于承认中国人也难免有错，非常罕见。他声称，柬埔寨并不那么重要，只不过是“次要问题”而已。（以柬埔寨为“次要问题”的衮衮诸公，于此应能看出其高见之渊源。）

对于失败，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的影响尽力缩小。乔竭尽全力想使中国从柬埔寨正发生的事态中摆脱开。显然，他不愿意为这桩我们双方都已经无法施加影响的事付出代价，使之影响到中美关系。他不多谈西哈努克。当我谈到北京同河内在柬埔寨问题上利益并不一致时，他没有反驳，也没有提过别的解决办法。他只说：“让柬埔寨的战火自燃自灭吧！”

当然，事态并没有自燃自灭。国会命令停止轰炸，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想在印度支那圆满完成巴黎协定的前景已经破灭。西哈努克回到了柬埔寨，但只是去接受屈辱，遭到软禁，几个孩子横遭杀戮。独立的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因而无需他起什么平衡作用，从而他再也不能充当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元首了。这时西哈努克向一些人谈到过并且完全证实了一桩我们过去的推断：他本人确实曾经赞成过谈判，但被红色高棉领导人所拒绝。

这种谈判努力也不一定就能够取得成功。的确，回顾起来，重新翻开自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五年期间我们所作谈判努力的记录，就会看到，即使红色高棉当时未能阻止停火协议，也大有可能要加以破坏。但是，事实仍然是，即令谈判失败了，也能取得一段过渡时期，使柬埔寨人民得以少遭受些、甚或免遭那场种族灭绝大难。朋友的未尽职守，加上征服者的凶残，使得这场大难终于加到他们身上。而这次谈判成功的机会本来是很大的，即便不能说保准成功；因为有中国人在积极地并行不悖地同我们一起努力。由于美国国会的阻挡，加上国内的混乱局面，这一机会终于遭到破坏。

说句公道话，美国国内的争论双方，对于那个问题在理解上都有一个大缺陷。那就是，他们都不可能设想到红色高棉那种天生的邪恶性。我们不当因为那场最终的大浩劫而去责难那些力图扼杀朗诺以求终止战争的人们，甚至包括其中激进的一翼。因为，他们不可能设想到一个政府会去屠杀本国的三百万人民。他们只想到没有比继续进行战争更坏的事了。他们甚至准备，即使让共产党去接管，也必须停止战争。

有些赶时髦的批评者，曾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责怪那些力图拯救柬埔寨覆亡的人；这些批评者现在有权请求不受责难，因为他们的用心是良好的。但是，他们也应当正派，不能颠倒是非，反去责怪那些一贯坚持反对共产党接管的人们。你们自己即使不

认错，但是痛定思痛，至少也该扪心自问，难道自诩正确就能免于可怕的惩罚么。

政府看到战争代价如此浩大，因而试图加一把力，以竟全功；但它想只依靠行政力量来作到这一点，可能过份脱离实际了。我们的批评者们，热情高涨，但缺少理智分析；而我们有理智，却缺少举国一致的支持。水门事件使得争取一个合理结局的残存希望也成了泡影。战后以来，美国第一次把一个依靠我们的友好民族弃诸共产党统治者之手。先例一开，类似事件将接踵而来。对于开创这个先例，我们将长期付出代价；尽管现在回顾起来，我们摔倒的那个夏天似乎已经很久远了。争论者们对于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永远也不会达成一致意见；但只要他们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就应该下定决心，绝不要让这种鸿沟在国内重新出现，绝不要再沉溺于从个人动机出发纵情攻击，而应对问题的实质作出理智的分析。由于这种自我放纵，我们损害了世界各地的自由的结构。由于未尽职守，我们已经造成的苦难，要比由于我们承担义务而造成的多得多。

诺贝尔和平奖金

一九七三年夏天以后，我知道柬埔寨的命运是注定失败了；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南越也无可挽救。北越对我们讲话的语气，越来越傲慢无礼。这时，连个表面遵守巴黎协定的样子也不用做了。国会的立法使得我们软弱无力，它不仅置我们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还使我们感到丢脸。我们曾力争从国会手中多得到点经济和军事援助，交给南越和柬埔寨。但是，国会要求停止轰炸的那些理由，又使援助逐步减少。一九七五年春，美国国会正在考虑一项令人好笑的“最后一次赠款”，仿佛要给这两个政府一些慈善施舍似的；只

是由于各种压力纷至沓来，西贡和金边终于崩溃，才使我们免了这次大笑话。一九七三年，我已从骨子里深知，它们的崩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将近十一时，我正在参加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中东问题会议；这时，一位情报室的军官进来向斯考克罗夫特递交了一份美联社新闻公报，宣布黎德寿和我双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此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斯考克罗夫特把公报递给我时，也默无一语。

公报：和平奖金

（美联社挪威奥斯陆讯）为促成越战正式结束，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北越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双双获得一九七三年诺贝尔和平奖。

我把公报扔到了桌上，我连自己是奖金候选人也毫无所悉。同事们读了公报，只感惊奇，而非欣喜。他们向我祝贺，但并非出自真正的热情。因为当时大家都感到心情不安。

这种荣誉是无与伦比的。归根结蒂，一个政治家的最后考验，在于他是否对人类的幸福有所贡献。然而我深知，和平协定要是无力强制执行，印度支那的和平结构是不可能长久的。这项奖励要是针对一项比较更靠得住一点的成就的话，我会高兴得多。这不是假谦虚，我的确认为，如果是针对我后两年在中东问题上的成就，我会感到更自豪些。

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阿萨·利昂尼斯夫人在一份声明中解释说，颁发这项奖金的考虑是世界人民对终止越南战争深感快慰。她说：

巴黎协定给全世界带来了一阵欢欣和希望的浪潮。两位主要谈判人竭尽他们的才智，终于促使和平协定得以达成。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寄望于获奖双方，希能深明其道义责任，而确保巴黎协定得以恪守。

其后不久，我接到了利昂尼斯夫人来电，证实我将和黎德寿平

分奖金(每人二十五万五千瑞典克朗, 约折合六万五千美金)。我被邀请去奥斯陆, 亲自接受挪威奥洛夫五世国王于十二月十日颁发的金质奖章, 并在当时或六个月之内, 作一次诺贝尔演讲。

此事定然让尼克松万分痛苦。他一心向往的莫过于让别人承认他为一位和平缔造者了。事实上, 越南停战的重大决定都是由他作出的, 尽管我在设计和执行作为其基础的战略上也曾作过一些贡献。对于越南和平, 对于我们的其他外交成就——诸如实现了对中苏两国外交关系上的大胆革命——他得奖都是当之无愧的, 只可惜水门事件打破了这场美梦, 他胸怀大志, 惨淡经营, 得臻总统宝座, 而水门一案, 却使得这一切付诸流水。

我立即去到椭圆形大厅谒见了。也正在这天, 莱尔德成了公开谈论可能进行的弹劾程序的第一位高级官员; 莱尔德透露说他曾警告过尼克松, 要是无视最高法院关于交出椭圆形大厅录音磁带的裁决, 就有被弹劾的危险。只有深知尼克松性格的人才能看出在他鼓起精神来向我道贺时的那种隐含紧张和伤痛之情。人们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我, 而他却为此付出了何等的代价! 在一篇正式声明中, 我试图恢复事物的一些本来面目, 其中两度提到了他:

在我的公务生涯中, 这次受奖使我感动最深。这次授奖表明, 人们已经承认总统的外交政策中心宗旨是争取持久和平。

我感激总统, 是他给予了我这种机会, 也是他亲自创造了条件, 才使得越南谈判得以胜利完成。

当我同越南和谈老伙伴黎德寿一起去领奖时, 我深望这个时机标志着越南这场使举世数百万人民蒙受苦难的灾祸永远终结, 或象征永远终结; 也深望它将标志着我们在国内国外开始一个和解的新时期……

但是, 放眼未来, 超脱开这些眼前危机, 任何政府所应致力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创造出一个不再需要这一奖金的世界; 到了那时和平已是公理昭彰, 人所共信, 再也无须颁发奖金来促进了。

在通常情况下，接受诺贝尔奖金本是国家的莫大荣誉。但是，我们国内的分歧太深了。对于许多人来说，如果把接受诺贝尔奖金看作国家的成就，就意味着接受那条他们所切齿反对的道路。至于新闻宣传机构的反应，说得温和点，也只能算是有节制的。十月十七日的《纽约时报》社论讥讽地称它作“诺贝尔战争奖”。十月二十二日的《哈特福德时报》则问“荣誉而无和平吗？”十月二十三日的《里士满时代快报》称之为“不光荣的诺贝尔奖。”十月十七日的《华盛顿邮报》还引用我的老对手乔治·鲍尔的话说：“看来挪威人是有幽默感的。”许多人反对向黎德寿发奖，我也不无同感：一个侵略遍及邻国的国家，仅仅因为停了火，其代表居然得到和平奖。而且，即使在停火之时，它还违反着和平协定的各项条款。虽然如此，我还是本着颁发这一奖金的精神，于十月十六日致电黎德寿，以示友好，并指望能对有关巴黎协定日益恶化这一问题双方所交换的乏味的来往函电注入一点人情味。

谨此祝贺特别顾问先生。我们分享了这一重大荣誉——并非指我们受奖，而是指我们能有机会参与促成终止战争这一历史性事件。

一月二十三日，当我们签署在越南终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时，你曾作过一篇滔滔不绝的演讲。你说那个事件也是我们两人都深感满意的事，我们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完全赞同了你的这番讲话。

我还表示我确信我们两人的工作有待继续完成。我们还须给印度支那人民带来持久和平，还须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建立起和解精神。

这点仍然是我所怀抱的深切信念，也是我真诚的努力目标。

过了十一天，黎德寿才发来复电。对于“和平”、“和解”之类资产阶级情调，他是不为所动的。在这期间，他曾写信给诺贝尔委员会拒受奖金，因为据他说巴黎协定并未得到实施。北越的无礼这又是一件例证；正是由于北越不断违反，巴黎协定已几乎沦为笑柄。十月二十七日，黎德寿以同样基调给我来电，证明他不放过任

何机会——不管这机会可能多么庄严神圣——争取在论战中得分。他说：

……在签署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的仪式上，当我向你奉赠签字用的钢笔作为纪念礼物时，记得我曾告诉过你，现在协定既然已经签订，你应当记住要严格加以实施。当时你答应要这样做。我并没有忘记你的允诺。

很遗憾，迄今为止，关于越南的巴黎协定遭到了严重的违反。在南越，战争并未结束，和平并未真正恢复。因此，我认为，巴黎协定的签字各方还应当严格实施协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使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这正是我的愿望，也正是我愿意为之积极奋斗的事。希望你能如此。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请求利昂尼斯夫人和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把这笔奖金全部捐献作为奖学基金，授予在印度支那战争中阵亡或失踪的美国军人的家属。这笔基金后来就为纪念我的父母，命名为“宝拉和路易斯·基辛格奖学基金”，用于上述目的。（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西贡失陷，我致函利昂尼斯夫人退还和平奖和等值的现款奖金*。但诺贝尔委员会拒绝接受，答复说，事后发生的事件“均不足以降低本委员会对基辛格先生为获致一九七三年生效的停火协定所作的真诚努力的感激之忱。”）

我听说，有些反对越南战争的人，要在我出席授奖仪式时，在奥斯陆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尽管挪威政府始终积极合作，而且也很有礼貌，但当我借口说，北约部长会议使我不得分身，因而改托美国驻挪威大使托马斯·伯恩代为接受奖金时，挪威政府仿佛松了一口气。伯恩大使为了逃避被投掷雪球和回避反美示威者，从后门悄悄溜进了奥斯陆大学礼堂。他在发奖仪式上朗读了我的如下声明：

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和平代表着一种稳定的力量安排。对于理想主义

* 我致利昂尼斯夫人信全文见注②。

者来说，和平则又是如此卓越的目标，以至掩盖了为实现和平而必须寻求种种手段之艰难。但是，在当今的热核技术时代，上述两种观点都不足以保障人类的生存。相反，和平的理想需要切实施行。在所有国家之间，应当用一种责任感和相互忍让精神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应当找到，而且也能够找到一种大家都承认的正义原则；因为，要是找不到，就会爆发更多的“正义”战争……

在越南，那实实在在的战争，今天让位给了还不那么实在的和平。在昔日充满着失望和混乱的地方，今天有了希望，但是还很微弱。在中东，那恢复全面战争的幽灵还在一个脆弱的停火上空回荡。在印度支那、在中东、还有其他地方，还有待使交战各国认清，要用武装冲突取代政治竞赛是枉然的；只有认识到了这点，才能有持久和平……

如果说理想的和平，是我们的共同归依；那么，现实的和平，则应是我们的共同实践。既然如此，请各国的领导人务必注意，你们在战争或是和平问题上的政治选择，也就是选择你们人民的痛苦或是幸福。

正如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认识的那样，和平不能指望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来取得。和平要靠全世界那些有远见卓识又怀抱善意的人们共同努力才能取得。个人成就不足挂齿，因为要想取得持久和平，需要全人类共同去完成。

基于上述认识，本人对荣获此奖，谨向诸位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① 见第二章注①。

② 见第二章注④。

③ 见斯宾塞·里奇的文章：《对于恢复战争不存在法律障碍》，一九七三年四月九日《华盛顿邮报》。

④ 参见诸如麦克乔治·邦迪的文章：《越南、水门事件和总统权力》，《外交季刊》第五十八卷第二期（一九七九—八〇年冬），第三九七—四〇七页。

⑤ 肯尼迪总统向巴基斯坦总统所作私下保证，详见《白宫岁月》第八九五页和第一四八八页注⑦。一九六三年也门危机时，肯尼迪总统致沙特阿拉伯费萨尔王储的信，保证派遣美国军事力量帮助沙特阿拉伯以对抗来自纳赛尔的埃及的威胁，请参见克里斯托弗·J·麦克穆伦著：《一九六三年也门危机的解决：调停的专案研究》（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外交研究所一九八〇年版），第九—十页，第十三页和第二十页。

⑥ 美国保证实施巴黎协定的公开谈话次数很多。其中有：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向全国广播谈话。

协定条款必须认真遵守。我们将履行协定对我们的一切要求；我们也希望对方履行协定对他们的一切要求。我们也希望其他有关国家协助保证协定得以实施，和平得以维持。

基辛格博士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记者招待会谈话：

问：如果和平条约遭到违反，而国际监督委员会又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那时，美国是否将再次派兵进入越南？

基辛格：对于我们并不期望发生的事情，我不想就某些假设的情况进行推断。

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沙利文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全国广播公司电视《金见记者》节目中的谈话：

问：大使先生，今天来自西贡的消息也说：美国已向西贡私下作出正式保证，如果河内严重破坏协定，我们将再度进行军事干预。请问我们作过何种承诺？要是停火失败，我们将做些什么？

沙利文：罗森菲尔德先生，我不想对此进行揣测。我想你已经读到过基辛格博士关于方法问题的谈话吧？其中他谈到协定已经规定对于实施协定的各项要求。对我们不存在任何禁令，但此刻我们将不对有关未来情况的假想性问题进行讨论。

基辛格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上回答记者马文·卡尔布问题时的谈话：

卡尔布：基辛格博士，刚才我想得到解答的是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提出。在最理想的世界中，停火可能得以维持住。而在我们实际生存的世界上，停火则可能维持不住。阮文绍总统今晚在接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时声称，他决不会要求美国空军返回越南。而沙利文大使仅仅在上周还说过——我相信这是他的原话——对于使用空中力量并不存在任何禁令。请问此话确实否？

基辛格：这话在法律上讲是正确的。

卡尔布：从政治上和外交上讲呢？

基辛格：我们有这样做的权利。问题很难抽象地回答。它取决于挑战程度如何，威胁属何种性质，其产生的种种环境等等。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值此和平正在建立之际，由一位美国的负责官员来对美国将要做些什么或将不做些什么开出一张清单，那将是极端不明智的。

就我们此刻所能预见的未来情况而言，即使北越违反协定，它也无力量向南方发动一场势不可挡的进攻。至于一两年以后情况如何，将视当时出现的条件而定。

而就现有情况看，对于大多数的违约行为将由南越人来进行处理。

卡尔布：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是否说在未来一两年内不需要美国军事力量重新介入？

基辛格：马文，我们结束这场战争，并非为了再找借口重新进行。但是此刻要我们对于潜在敌人可以平平安安地干点什么或不干什么来开出一张精确的清单，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记者招待会谈话：

我只想提出这一点，我们已经告知北越人，我们对于这种渗透感到十分关切，并且

我们认为这是违反停火和违反和平协定的行为。我们的这种关切，也曾向其他有关方面表达过。我只想表达如下的看法：根据我在过去四年所采取过的行动，北越人对于我们就某种违约行为所表示的这种关切，不应轻率置之。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波特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大急流城的谈话：

尼克松总统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对于北越把大量装备渗透入南越所感到的关切。这种渗透要是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北越人对我们所表示的关切不要轻率地置之不理。

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对全国的讲话：

在有些方面仍然还有问题。协定条款要求交代全部在印度支那战争的失踪者、关于老挝和柬埔寨的规定条款、关于禁止从北越向南越渗透的条款，都没有得到遵守。我们已经恪守协定，今后仍将继续恪守。我们将坚持要北越遵守协定。而对于北越人要是违反遵守协定将带来何种后果，他们的领导人不应再有任何疑问了。

国防部长理查森一九七三年四月一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会见记者》节目中答记者问：

罗恩·尼森：部长先生，请问您能否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将不再派军队重返印度支那？

理查森：尼森先生，不能，我不能作任何断然保证。显然，未来有种种可能发展，此时我们还无法预见。但是，我们肯定非常希望，这样做毫无必要。

尼森：我要是再问这同一问题，即美国是否将永不轰炸北越和南越，你的回答仍是那些么？

理查森：还是那些。当然，我们所希望和期待的是停火协定能得到遵守。

尼森：尼克松总统曾多次警告北越，要是违反停火对于其后果不应抱有疑问。所谓后果指何事？

理查森：尼森先生，显然这种事情是不应事先一一宣布的……

回顾过去的经验，他们应当懂得，为了实现谈判解决并实现停战，总统是愿意做一切必须做的事的。

国防部长理查森一九七三年四月二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谈话：

问：据今天来自南越的报导，南越阮文绍总统声称，美国同南越政府有过协议，要是遭到进攻，要是北越确实打来了，那么，美国就要重向南越派出飞机并给予空中支援。请问我们是否作过此种承诺？

理查森：这只是指一些非常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而言。对于他所说的话，我不想作任何解释或加以删减。

当然，我们将继续坚持这种主张，即停火协定不仅是一件经过签署的文件而已，它并且是对各方都有利的；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只要有可能，就要尽力保证其实施……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那些我们认为可能导致他们去实行协定的种种考虑能够更有力地坚持下去。

要是说他（总统）根据宪法有权在结束战争时又继续进行战争的话，那么，我们认

为，现在他根据宪法有权采取某些必要的紧急步骤，以保证停火得以实施，这就是一种自然的推理了。

美国一越南政府公报(圣克利门蒂,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

两国总统看到在军事和政治解决南越问题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但同时也关注地看到了违反结束战争协定的行为,从北越南越进行渗透,运入数目可观的人员和武器;他们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将危及协定基础,因此需要作出适当的有力反应。他们表示深信,要想维护停火,要想保证和平解决有望,必须切实地实施协定的一切规定,特别是关于军事力量和军备供应方面的规定。尼克松总统就此事声明:对于违反停战协定规定的行为,美国表示极大的和不断的关注……

国防部长理查森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在出席众议院国防预算小组委员会作证前接见记者时的谈话:

问:部长先生,在甚么情况下,我们可能开始轰炸以支援南越?

理查森:这是一个不能笼统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看事态发展,并希望一切都将向着全面彻底实施停战协定方面发展。

问:但是,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呢,即美国不得不轰炸北越,或者用轰炸来支持南越军队?

理查森:这当然是现时我们不能排除的事情。

基辛格博士一九七三年五月二日记者招待会谈话:

问:您说过,要是北越不响应体面停火的呼吁,那么,它就要冒重新和美国对抗的危险。请问您能否就您(在外交政策报告中的)这一段话的含义稍加阐述?

基辛格:……就对抗而言,我们的意思是必须遵守停战协定。当前我们正致力于同北越人就严格实施协定所需要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完全打算并将竭力确保我方遵守协定,并运用一切可能影响使协定得到严格实施。

但是,美国不能让一项才签署几周的协定在其主要条款方面遭到违反时而不加尽力把它指出来。关于特别措施问题,当然有的已经很清楚,并且正如我在报告中说过,并在公开场合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愿意朝着同北越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前进,并且象其他事态在正常情况下进展那样,使这种进程愈来愈快。

因此,这一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如果协定得不到遵守,那么,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不可能缓和下来。

总统一九七三年五月三日外交政策报告:

我们希望斗争各方能选择通过和平手段和政治竞赛来争取实现其目标,而不要采用过去那种残暴而代价浩大的办法。这得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对于违约行为,我们将保持警惕……

河内有两种基本的选择。其一是利用越南停战协定来推进其在印度支那的目标。那就是继续对南越进行人员和作战物资的渗透,继续保持其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军队,并且通过使用压力或直截了当的进攻来恢复它对我们的友邦的侵略。这条道路将危及那得来不易的印支和平,将要冒和我们重新对抗的危险……第二种选择是北越选择和平手段来实现其目标,让该地区的历史趋势发挥作用。

越南共和国将发现我们是可靠的朋友。我们将继续把它的政府作为南越人民的合法代表对待，同时支持南越各方努力获致和解，缔造其政治前途。我们将在协定条款许可范围内，向他们提供军援替换物资。我们期望我们的朋友遵守停战协定，正如我们不能容忍北越及其盟友违反协定一样。

我们已私下地和公开地告知河内，我们不会容忍违反协定的行为。

基辛格博士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记者招待会谈话：

问：您是否觉得，停战协定的签署已大体上完成了您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工作，或者您认为前面仍旧困难重重，特别是对柬埔寨？

基辛格：印度支那尚待解决的问题仍须作出重大外交努力，我们也打算继续作出这种努力。当然，我们仍然保证严格实施协定，我们将继续关心这一问题。

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致众议院信，反对在印度支那停止轰炸：

全面停止轰炸将取消促使共产党人进行谈判的动力，从而严重地破坏目前为获致柬埔寨停火而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它将会实际上扭转今年一月份开始、并在六月十三日四方在巴黎签署的公报中得到加强的在印度支那实现持久和平的趋势……

共产党如在柬埔寨获胜，将危及经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政治结盟和军事力量三者所构成的脆弱的力量平衡，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取决于这一平衡。我之所以认为越南和平协定可以接受，根据也在于此。

最后，还有更为严重的全球性影响。国会如果强制美国政府容忍共产党人违反巴黎协定和用武力征服柬埔寨，那么，人们就会不仅怀疑我们国家在解决越南问题上所作的保证，而且也会怀疑我们在同其他国家已经达成或正在谋求达成中的其他协议和解决方案中所作的保证。国际上对美国的信任将遭到严重打击——其后果将远远超出印度支那。

基辛格博士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致肯尼迪参议员的信：

美国作为巴黎协定签字国，保证它将增强那些使停火得以实现的条件，并保证支持南越人民有行使自决权这一目标。有鉴于我们的这些保证，我们继续向越南共和国提供为其自卫和经济上能生存下去所需的那些手段……

我们不论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承担了相当多的义务。

(新闻报导)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南越前外长陈文南接见记者时谈话：

陈文南外长声称，尼克松总统已经许诺对于北越的大规模进攻要作出“迅速和有利的反应”。但他补充说，“没有签署任何秘密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邦迪的文章只是对理查森国防部长的警告加以转述，而未全文引用。他在转述时有意歪曲，显然是不正确地声称它们指的是现时在柬埔寨已经进行的轰炸，而不是指如北越恢复进攻，美国可能在越南重新进行干预。参见邦迪所著《越南、水门事件和总统权力》一书四〇〇—四〇一页。

⑦ 戈德弗雷·霍吉逊著：《我们时代的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尼克松》（纽约州花园城：双日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三九七页。

⑧ 参见诸如迈克尔·利丁和威廉·刘易斯合著：《惨败：美国在伊朗的失败》（纽约：阿尔弗莱德·A·诺夫公司，一九八一年版）。

⑨ 参见斯特芬·T·霍斯默、康拉德·凯伦和布里安·M·詹金斯合著：《南越的陷落：越南军政首脑言论集》（圣穆尼卡市：兰德公司 R-2208-OSD [HIST] 号，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出版），第十一—十五页。

⑩ 关于一九六九年 EC-121 事件，详见《白宫岁月》第三一三—三二一页。

⑪ 同上，第一〇三〇—一〇三一页。

⑫ 参见威廉·肖克罗斯著：《次要事件：基辛格、尼克松和柬埔寨的毁灭》（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一九七九年版），该书主题即谈此事。关于该书的错误、讹诈伎俩和引用文件进行欺诈，请参见彼得·W·罗德曼所著：《暗箭：基辛格、肖克罗斯和柬埔寨陷落的責任》（《美国观察家》杂志第十四卷第三期，一九八一年三月出版）。关于罗德曼和肖克罗斯之间的交锋，请参见《美国观察家》，第十四卷第七期（一九八一年七月出版）。

⑬ 见肯尼思·M·奎恩所著：《战争时期的政治变化：一九七〇至一九七四年柬埔寨南部的高棉克拉荷姆革命》，《海军军事学院评论》（一九七六年第八—九号）。

⑭ 参见诸如肖克罗斯著：《次要事件》，第三八九页等。

⑮ 参见上书第二六五页等。

⑯ 参见民主柬埔寨出版的《黑皮书：越南侵略和吞并柬埔寨行径的事实和证据》（一九七八年九月金边版），第五章第二节（C）。

⑰ 参见弗朗索阿·庞肖德著：《柬埔寨：零年》（一九七八年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公司出版），第二一页和第一九二页，并参见该书第 XVI 页和第一三—一三六页。

⑱ 参见奎恩著：《战争时期的政治变化》，第八—九页。肖克罗斯引用过庞肖德和奎恩的书，但从来未引过这些段落。这些段落直接驳斥了他说美国的行动引起了红色高棉的暴行的论点。

⑲ 参见西哈努克著：《我们在柬埔寨可能必须接受的人》（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二日《纽约时报》）。

⑳ 奥尼尔众议员讲话的原文有几个出处：如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众议员罗伯特·贾埃莫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每晚新闻》节目上的谈话；肖克罗斯的《次要事件》第二八五页。国会议员有权在他们的发言在国会记录上正式发表之前加以修改，因此，此段在该记录中并未出现。

㉑ 参见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华盛顿邮报》文章《尼克松的战争否决权》。类似评论尚可见诸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八日《巴尔的摩太阳报》、六月二十六日《纽约邮报》、八月七日《圣路易邮报》和八月十四日《巴尔的摩太阳报》。

㉒ 参见诸如迈克尔·帕克斯的文章《苏联试图结束与西哈努克之间的不和》，载一九七三年七月八日《巴尔的摩太阳报》。

㉓ 参见詹姆斯·普林格尔的文章《西哈努克适应俭朴生活》，载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八日《华盛顿邮报》。

㉔ 我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致诺贝尔和平奖金委员会的阿斯·利昂尼斯夫人的信，原文如下：

亲爱的利昂尼斯夫人：

一九七三年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是我一生中最引为自豪的时刻之一。和千百万其他人一样，我希望巴黎协定将最终给印度支那带来和平。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通过谈判寻求的和平已被武力破坏。

对于诺贝尔基金会惠予褒奖，本人深为铭感。但也出于同样的荣誉感，不得不退回上述奖励。为此，谨退去贵基金会于一九七三年惠赠给本人的诺贝尔金质奖章一枚，诺贝尔奖证书一份。

如您所知，对于随同此奖所发给的奖金，我并没有接受，而是把它捐献作为一项奖学金的基金，以供那些在印度支那牺牲的美军子女之用。还有其他人也作了补充捐献。第一批奖学金不久即将公布。

尽管如此，我觉得自己应当向诺贝尔基金会退回该项奖金。或者，如贵基金会同意，我将以同等数额的款项，捐献给贵基金会认可的一项慈善事业。希望您能将基金会对此事的意见复函给我，以便我能立即据此办理。

本人写去此信，情非得已；遗憾之忱，殊非语言所能表达。但是，那场苦难悲剧，伤害了数百万人，而他们所要求者无非一点生存机会而已。每念及此，我深感舍此别无其他途径可以选择。

您诚挚的

亨利·A·基辛格(签名)

第九章

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倒台

美国和阿连德

说来也许奇怪，我在一本写自己如何处理国务的书里，竟然会感到不得不插进一章，来叙述一九七三年九月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倒台的事。这说明，编造政治神话可以产生多大的威力——因为和当时流传世界各地的反美宣传和美国国内一些歪曲历史的说法相反，我国政府同策划推翻阿连德的活动毫无关系，同那些策划者也毫无牵连。阿连德之所以倒台，是由于他自己的无能 and 固执。在智利发生的一切都有其国内原因，而非美国策动的结果。现代政府的文件浩如烟海，尽管调查者抱着不友好的态度，甚至采用断章取义的做法，也未能从中找到任何依据，可以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参议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原来怀疑美国插了手，但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它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证据”^①。

想要证明一个否定的论点，在逻辑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本章只叙述阿连德统治时期的智利简史，以及美国在此期间的政策，时间从阿连德一九七〇年就任总统开始，到他一九七六年垮台为止。

这段历史记载使人毫不怀疑，在阿连德就任总统后，智利确实并非当时的美国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事实上，阿连德被推翻的

时候，我本人正处于由国家安全顾问改任国务卿新职的过渡阶段（参见第十章）。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出席国会为确认我的新职所举行的听证会及为此而作的准备上面了。

以上这些情况当然影响到我们在处理急如燃眉的智利危机时的紧迫感，但是却同导致智利军事政变的事态毫无关系。事实上，那次政变是智利本国的产物；阿连德是被他自己所纵容的国内势力推翻的，因为他没有能力控制这些势力。

在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的总统选举中，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二点七的绝大多数智利选民投票反对萨尔瓦多·阿连德。但是在有三个候选人的竞选过程中，这些反对票却分散在两位民主派候选人的名下，因此在总数近三百万张的选票中，阿连德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二的选票，以三万九千张选票的极其微弱多数取得了胜利。智利宪法规定，如果没有一位候选人赢得大选选票的百分之五十，那就由智利国会在大选的六个星期以后来选定总统。按照传统，国会通常都是选中获得较多选票的候选人，而不管他同其他候选人所获选票的差额有多小。这一次国会也如此办理了。阿连德尽管开张不吉利，但一上台就对智利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根本改革，其实他并未得到这样的授权。这种情况后来成了他垮台的原因。

本来是一次民主的选举，却差一点造成共产党接管，这在现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一次。这是因为阿连德不是那种会在六年任期届满之后就让他民主选举产生的新人接任的传统式的智利总统。他上台伊始就公然表示要修改智利宪法，压制以至镇压一切反对党和舆论界，使人无法推翻他本人，或者至少是他所领导的政党的统治。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当时令人更为担忧的是他在意识形态上极端仇视美国，并且决心要把他的革命教义传遍拉丁美洲。我已经在《白宫岁月》一书中讲过我们对

阿连德所追求的目标的看法，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这些看法。

阿连德后来杀身成仁，倒使他的政治色彩不那么显目了。他虽然自己标榜为社会党人，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和哲理跟欧洲的社会党人毫无共同之处。阿连德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智利社会党之所以不同于共产党，在于它的纲领更加激进，而其根本理论则同共产党一样不讲民主。他倒很愿意先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然后再进行革命。但是，他后来允诺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和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没有多大不同。社会党纲领的主要原则是：根本取消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惯例。这也就是开宗明义地说，从他以后不会再有民主选举了。^②

以上这些并不只是竞选时的宣传，而是阿连德在他政治生涯中的一贯信仰。早在一九六七年，他就是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以哈瓦那为基地，是一些专搞反美武装斗争和在西半球各地进行暴力革命的左翼团体的统一战线。阿连德不是民主改良主义者，而是我们所知的民主制度的死敌。对于他这样一个自诩坚持原则的人来说，如果含沙射影，说他不忠于自己公开标榜的信念，那是对他的人格的污辱。智利国会批准他出任总统以前，要求他同意“民主保证法规”——实际上是一部协商制定的“人权法案”^{*}——这就已经显示出对他的不信任了。他在上台后向他的革命同僚法国人罗吉斯·德布雷自豪地承认，他只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才同意这个法案的。阿连德告诉德布雷，应当把他对民主自由所作的保证，看作同毛泽东在中国执政后在一个短时期内允许私营企业存在相类似的事情。他对德布雷说，他要在智利实现的真正目标是“全面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它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国家”。^③

尼克松和他的主要顾问们认为阿连德是对美国和西半球安定

* “人权法案” (Bill of Rights)：指一七八九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一次修正案。——译者

的一种挑战。阿连德一定要把美国的企业收归国有，这倒并不是我们的主要担心。确实，我们认为他的政策使私人投资丧失信心，这可能会使智利发展经济的希望落空。而且我们还继承了所谓希肯卢珀修正案，它要求在美国财产被没收而未获公平合理赔偿时停止美国的援助。但是尼克松政府并不完全根据美国企业的金融利益来考虑我国对外政策的利益。一九六九年，我们曾同智利总统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合作，就智利将安纳康达铜业公司中的美国多数股权收归国有问题进行谈判，达成了公平合理的条件。同年，为了避免在秘鲁接收国际石油公司以后停止美国的援助，我们把希肯卢珀修正案加以引伸，几乎达到了极限。尽管秘鲁政府在第三世界中倾向比较激进的派别，我们还是一再寻找根据，避免援引希肯卢珀修正案，最后终于同秘鲁达成了妥协。

阿连德的情况却不一样，他不仅在经济上给我们制造麻烦，在政治上对我们进行攻击，而且在地缘政治上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挑战。智利同秘鲁、阿根廷以及玻利维亚接壤；这几个国家的激进运动都闹得很厉害。作为一个大陆国家，一个好斗的智利，对其他国家进行破坏和支持激进派叛乱活动的能力要比古巴大得多，而古巴所造成的破坏已经够大的了。要是智利按照古巴的方式行事，有朝一日就会有苏联军队和苏联武器在南美洲南部锥形地区出现，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后盾。由于在阿连德当选的当月发现苏联企图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港修建核潜艇基地，这就使得我们更加忧心忡忡了。^④

尼克松政府以前的两届民主党政府都早已作出了同样的判断：阿连德一旦获胜，就将危及我们在西半球的利益。为了防止阿连德在一九六四年的总统选举以及他所领导的政党联盟在一九六八年的国会选举中获胜，这两届民主党政府都曾向智利的基督教

民主党提供过大笔经费。对于这种活动谁也不觉得高兴；两党的历届总统只是认为这种活动必不可少。介乎军事干涉和正式外交活动之间，有一个灰色区域，我们的民主制度不得不在那里同敌对集团互争短长。

共产党和激进势力竭尽全力利用由政党、外围组织、假通讯社和所谓的研究所组成的一整套系统来争取统治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它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些国家中，纪律严明的小团体可以具有与其规模很不相称的能量；对舆论工具的控制也不会像在多元社会里那样受到各种“制约与平衡”机制的约束。如果我们让那些由我们的敌人所资助、管教和培养出来的组织独享外来的支持——其中有不少组织同苏联有直接的联系——那就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要么激进的反西方集团会用恐吓和镇压手段不让人们作任何温和的选择；要么极端保守分子会先发制人，阻止局势向这方面发展，并用镇压手段实行统治——那样一来，即使美国的安全利益要求我们给予支持，他们也早已自绝于这种支持。

智利的社会有着悠久的民主传统，是一个比较先进的社会，我们同前两届民主党政府看法一样，认为那些维护民主原则的集团需要我们的帮助，以反对公开威胁民主原则的集团。由于情况特殊，其中确实涉及重要的利益，而且所有别的办法都已经失败，我们才认为支持智利民主势力是正当的。苏联一点也不怀疑其中涉及国际性的问题。一九七六年底所发生的非同寻常的事件表明，苏联何等重视它在智利国内的追随者。苏联破天荒第一遭用它所关押的一位本国公民（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作交易，来交换一位外国共产党人——智利共产党领袖路易斯·科尔巴兰，他是在阿连德倒台后同该党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捕的*。

* 这次交换是由福特政府出面安排，在瑞士进行的。

我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已经谈到了尼克松政府为防止阿连德当选总统所做的不但为时已晚而且杂乱无章的工作。最初是枉费心机，妄想说服智利国会另挑一位候选人，接着又是不懂门道地随意试探搞军事政变的路子，目的倒并不是为了建立军政权，而是想让主要的民主派候选人同阿连德重新进行一次竞选，使智利人民可以在民主和极权两条道路之间作出明确的抉择。美国的这些活动尚未收效就停止了。^⑤（更确切地说，是美国方面洗手不干了，而智利方面承担的活动则给搞糟了。）

阿连德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就任总统。以后美国就再没有参与策划军事政变。

阿连德当政

有人说阿连德上台后，美国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这种编造的神话与事实大相径庭。我们并没有改变原来的判断，但还是愿意争取同他共处下去。当时有如此众多的其他问题迫切需要我们注意，使得智利在我们优先处理的问题单上越来越往后靠；只是在阿连德进行某种挑衅的时候，我们才不得不加以还击。但是阿连德上任伊始，这种挑衅就开始了。

阿连德一上台，就虚实并用，表示他对于在国内实行民主或者同美国实行妥协都毫无兴趣。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反美是他的毕生信念，他丝毫没有改弦更张之意。新政府刚一建立就通过一系列姿态表明了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阿连德邀请波多黎各独立党的领导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过了几天又举行了切·格瓦拉塑像的揭幕典礼。他宣誓就职才刚刚九天，就同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违背了一九六四年美洲国家组织要求泛美体系各国同古巴断绝关系的决议。他迅速行动，同北朝鲜建立了关系，

并且同正在和美国打仗的越南进行接触。更为不祥的是，阿连德上台不到一个月就赦免了数百名在押的“左派革命运动”成员。这个组织是智利的一个主张通过暴力夺权实行极权统治的恐怖主义组织。此后几个月中有一万到一万五千名无签证的外国人进入智利，他们的使命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社会上广为流传说，他们都是智利邻国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并且在智利国内组成了一个准军事组织的核心。对此从来没有人辟过谣。

就在阿连德上台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确定了对智利的方针。一九七〇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间，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讨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同阿连德妥协；公开对峙；或者摆出冷淡而无可指摘的姿态，把以后美智关系的基调和步伐留给阿连德去决定。

表面看上去可以有这三种选择，其实并没那么多。这种三驾马车式的选择实际上只是典型的官样文章：本来只有一种可行的方案，却用两个虚构的方案加以陪衬。无论尼克松还是阿连德肯定都会拒绝妥协。十年来极力反对纵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尼克松，此时决不会去同一位他认为是秘密共产党人的拉美领导人修好。阿连德也没有露出想走这条路的意思，他的支持者也决不会容忍他这样做。

对峙只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种政策。我们并不打算让阿连德在拉丁美洲博得舍身成仁的殉道者的声名，也并不想给他以口实来加速实现他宣布要搞的独裁统治。

因此，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尼克松多少是出于无奈而决定采取政府各方面人士都赞成的“冷淡而无可指摘”的方针。我在十一月九日发了一个指示，阐述尼克松的决定，并且规定了执行政策的两条杠杠：（一）“避免给阿连德政府借以争取国内外支持、巩固其统治的依据；”（二）“防止一个

敌视美国和西半球其他国家利益的共产党国家在智利巩固地建立起来。”要把这两个目标协调起来并不是容易的事。为了防止一个共产党政权在智利巩固地建立起来，就要求我们不要给阿连德什么特别的帮助，因此就不应再承担任何新的双边经援义务。但与此同时，为了给改善两国关系留一条后路（也许阿连德竟会出乎我们意料地决定把他的路线变得温和起来），人道主义的援助计划还继续进行，而且还保持着履行已定援助项目的通道。

总统决定不再批准任何对智利的新的援助项目，乍听起来好象很严厉，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早在一九六八年约翰逊总统就中止了对智利的捐赠性援助。一九六九年度的四千万美元贷款和一九七〇年度的七千万美元贷款已获得批准。这两笔贷款的支付还在继续。禁止新的援智拨款的决定要到一九七一年秋季才开始生效——差不多还有一年的时间——这样，如果阿连德往后的政策比当时的证据所表明的更有节制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充分的回旋时间。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下旬，经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研究小组*批准，国务院发表了一项正式的政策声明，把今后的美智关系留给智利新政府去决定。

智利新总统已按宪法程序就任。我们不打算对美国与智利关系的状况过早地下结论，但是这自然取决于智利政府对美国 and 泛美体系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我们将密切注意情况的发展，并同美洲国家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进行密切磋商。

对智利关系的这条后路本来完全可以不用去留，因为后来阿连德自己把门紧紧关上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开始对美国在智利的资产开刀，所用的手段使我们除进行抵制之外别无

* 高级研究小组由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组成，由我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担任主席。

他法。他下令接管由美国公司控制的两家企业，罪名是它们剥夺了一些智利人的工作。六天以后，他又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议上宣布对基础工业实行大规模国有化的计划，这项计划先从外国企业开始，但不仅限于外国企业。阿连德的财政部长在向智利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解释这些决定时，把智利经济上的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投资者。

十二月二十一日，阿连德提出了没收全部外资铜矿的宪法修正案。受到这个决定影响的几乎全都是美国的利益，从而推翻了早些时候在我们的支持下智利政府与铜矿公司就政府接管问题商定的协议。即使是在这些不友好的举动发生以后，尼克松总统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四日的电视采访中仍然说：

智利发生的事情不是我们所欢迎的，但是……这是智利人民的决定……。我们所关心的是他们在外交方面对我们的政策。

所以说，我对智利和智利人民都没有丧失希望，我们还要同他们保持联系。

美国在一月份又做出一个姿态；我们赞成泛美开发银行提供总额一千一百五十万美元的两笔贷款，资助智利的两所大学。

三月二十三日，美国驻智利大使爱德华·科里奉命进行斡旋，帮助美国公司和智利政府协商解决征用资产问题。美国公司自己争取同智利政府直接谈判碰壁以后，科里仍然继续进行斡旋。我们的目标是，根据国际法和我们国内立法的要求，确保取得公平合理的赔偿。但是，阿连德提出的一项宪法修正案消除了一切公平解决的前景。这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可以事后追补征收“超额利润税”，这就完全有可能把双方有希望达成协议的赔偿全部抵消。这项修正案于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由阿连德签署而成为法律。实施的结果，使所有的铜矿公司不但丧失全部资产，而且还倒欠智利政府的钱。唯一的例外是一座新开的铜矿，因为实在无法判定它

赚了超额利润。接着，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九日，阿连德又向其他外国债权人开了刀，他宣布智利暂时停止偿付外债。三天后，智利就开始对国际上的主要债权人，包括美国政府和美国的金融机构的大部分债务实行赖账。这就使美国进出口银行在一个月以后根据一般的银行业务惯例，中止支付援智贷款，但是直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为止，该行仍继续为贷款提供担保。

我之所以这样说明事情发展的经过，是因为这可以使人看到，所谓美国无端地对智利发动经济战云云纯属谎言。一个国家，不管有什么样的政府，只要对其外债实行赖账，就没有什么信誉可言了。来自西方借贷机构的资金之所以枯竭，并不是由于美国施加了压力，而是由于阿连德奉行教条式的激进主义。

阿连德的挑战不仅限于经济方面。一九七一年十一至十二月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智利逗留了将近一个月。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联合公报，为双方的“共同斗争”和“两国政府与人民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持共同的观点”而欢呼。阿连德和卡斯特罗共同谴责美国在越南进行“帝国主义干涉”，欢呼“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爆发了危机”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力量逐步大幅度增长。”

与此同时，阿连德向智利的宪制发动进攻。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向国会提出宪制“改革”法案，要求扩大总统的权力，削弱最高法院的独立性，取消智利的参众两院，代之以同总统一起选举产生的一院制人民代表大会——企图在智利国内废除相互制约与平衡的民主政体结构。在一片鼎沸的反对声中，阿连德只得把这个法案收了回去。

阿连德接着就着手扼杀国内的反对派。美国新任驻智利大使纳撒尼尔·戴维斯*——此人不在对我唯唯诺诺一味讨好者之列——形容阿连德的策略是蓄意“饿死反对派。”^⑥他的一个主要

目标是镇压一切反政府的新闻机构。阿连德把新闻纸的供应控制起来，同时又利用政府管制物价的权力，压低反对派报刊的售价——在通货恶性膨胀时期，这一手简直能在经济上置人于死地。就在这个因不断实行国有化而使来自私营部门的资金日益减少的时候，政府又有计划地取消在报刊上登载的官方和公共机构的广告。戴维斯大使还描述了用来对反政府的新闻单位和反对党施加压力的其他手段：

由于通货膨胀盘旋上升，官方每月都下令提高职工工资。同时还根据法律所作的新解释送来补收税款的通知单。官方还借违反防火条例和其他规定等问题，向反对派的报纸和电台找岔。可是左翼分子非法占用智利大学电视台时，当局却不闻不问。反对派的新闻单位还领不到准许进口收音机电子管、电视机显像管及印刷设备的进口许可证和外汇许可证。规模小一点的电台和报社果然就给搞垮了，然后就让各执政党买了下来。

说到反对党，它们很大一部分开支就是用于宣传工具——报纸、电台和刊物——的费用，再加上招贴和竞选费用，此外当然还有工资。因此这些反对党同新闻机构一样容易挨整。

在反对党受到有计划的扼杀的同时，整个国家机器被置于阿连德的党和同它联合执政的党的控制之下。它们通过从外贸经营总额中提成的形式得到津贴。对参加联合政府的各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以优惠条件大量提供政府的运输工具、通讯设施、纸张和印刷设备。古巴和其他共产党国家也给智利各执政党以大量的援助。

阿连德当政的头一年里，智利国内的形势发展就如此之不妙。它促使我们重新研究了我们在智利的隐蔽活动计划。当时并没有考虑做什么工作来促成政变。我们想争取做到的是帮助智利各民主党派顶住阿连德有计划有步骤的镇压。我们的目的是保住各反

* 戴维斯于一九七一年十月接替爱德华·科里，出任美国驻智利大使，直至一九七三年十月。

对党，使它们能在智利宪法规定举行的各种选举中参加竞选，最后到一九七六年参加下届总统选举。

为此目的，第四十号委员会*一致同意向有被消灭危险的各政党和舆论机构提供财政支持：一九七一年批准提供三百八十八万美元，一九七二年批准提供二百五十四万美元。（实际使用的金额略小于这些数字。）想挖苦我们的人可以把这些都说成是给予阿连德的某种形式的经援，因为阿连德通过向我们所援助的新闻机构征收苛捐杂税等形式进行勒索，援款中的绝大部分到头来都进了智利国库。美国援助款项的一小部分是专门拨给“私营部门”的，对象包括小店主和工会。此项专款需经戴维斯大使批准才能使用，后来他却决定不予动用。

在随着水门事件而兴起的“调查热”中，民间的传说把我们以上的行动说成是在智利“造成不稳定”的活动——据说“造成不稳定”这个词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首先使用的。实际上这个词是国会议员迈克尔·J·哈林顿的发明。科尔比也好，其他政府官员也好，都从未使用过这个词。^⑦这个词实在太不确切了。我们当时认为——我相信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智利的民主制度就会毁于一旦。我们力争保住再次举行选举的可能性。正如戴维斯大使文中所说：

一些美国评论家在回顾智利反对党和舆论工具的遭遇时，提出了一种逻辑上错误的论点。他们注意到属于反对派的大多数报刊、电视台和电台都保住了，于是就得出结论说，可见我们本来就用不着帮助它们。其实问题倒在于，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它们是否还保得住。我看是保不住的。一旦这些舆论工具不复存在，民主制度也就不会长久了。^⑧

* 第四十号委员会是一个管理秘密情报活动的部际委员会，成员包括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检察长也间或出席会议。

给智利民主制度“造成不稳定”的并不是我们的行动，而是智利的宪制总统。

一九七二年：智利政治力量加速两极分化

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帮助智利各民主党派顶住冲击，保住自己，除此以外，它并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我们相信，只要不让阿连德置反对党于死地，智利的民主传统和民主程序终究是会胜利的。因此美国的高级领导后来就没怎么太注意智利的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再开会讨论过智利问题。我本人亦未过细研究智利问题。我所主持的高级研究小组只是处理了一些找上门来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是阿连德的政策所造成的经济混乱和智利政治力量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

萨尔瓦多·阿连德是作为以“人民联盟”命名的党派联盟的领袖出任总统的。参加人民联盟的有共产党和阿连德自己的社会党——该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共产党相同，但是在策略方面却没有他们高明；另外还有几个小党，其中大都比前两个党还要激进，并且旗帜鲜明地专搞革命的暴力活动。（这个联盟包括一个很小的民主左翼政党，叫做激进党。到一九七一年，阿连德政治态度暴露得更加明显时，该党发生分裂，有许多领导人在一九七二年初参加了反对派。）这个执政联盟在智利国会内从未占过多数。阿连德想要执政就需要基督教民主党左翼的支持，后者赞成阿连德的许多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却没有放弃恪守基督教原则和民主程序。因此阿连德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局面。如果他采用基督教民主党的方式方法，就会疏远他自己的激进派，因为激进派是一心想以暴力改变现行制度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抵制自己主要伙伴的暴力方针，那么他就有可能丧失基督教民主党左派的支持，会面临国会

拒不通过他的法案的危险。由于阿连德领导无方，墨守信念，过分相信自己手腕高明，因此他从未认真对待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他没有整治那些不安本份的左翼分子。他默许他们用暴力接管基督教民主党的电台和其他单位。对于海军下级军官闹事和乡下农民非法夺取土地的行动，他也未切实加以制止——实际上有人怀疑他还加以鼓励。有大批武器通过古巴大使馆，避开智利军队或警察的管制，运进智利。

阿连德所奉行的政策结果使各民主党派联合了起来。正是阿连德自己使右翼的国民党同基督教民主党人组成了联盟，尽管这并非出自他的本意。当初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联盟，阿连德才得以在一九七〇年的大选中获胜。另一方面，由于阿连德日益激进的政策得不到国会多数的支持，就促使他采取违宪手段，直接占领企业、挖空心思钻空子绕开宪法规定，以及利用陈规旧法来处理本来与之毫不相干的问题。

阿连德当政将近一年时，智利政治力量的两极分化已经发展成相互对峙。众议院对阿连德的心腹内政部长何塞·托亚·冈萨雷斯提出弹劾，理由是他未能制止极端组织愈演愈烈的暴力行动。众院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投票决定托亚停职——这在各个国家机构互相分立、互相平等的政体中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做法。阿连德根本不把国会的决议放在眼里，于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日宣布托亚调任同样重要的国防部长一职。在一月十六日举行的补缺选举中，阿连德政府的两名候选人双双落选，其中一位是竞选参议员，另一位是竞选众议员。这是阿连德政府在竞选活动中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我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日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简要说明了这一挫折的含义：

几乎可以肯定，政府在选举中所遭受的挫折必将加剧近几个月来迅速发展的智利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两极分化。其结果将使反对派增强信心，并使

他们看到相互合作的好处。同时,选举的结果也可能导致阿连德的人民联盟联合政府内部发生分裂。社会党人可能会坚持要求政府放弃迄今所遵循的民主道路,把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强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有需要亦可使用武力。但是人民联盟内的其他两大政党——共产党和激进党以及阿连德本人恐怕会由于惧怕军方而不太愿意这样做。迄今为止,军队一直保持中立、不问政治。但是他们已经表示,只要宪法受到破坏,就一定要坚决回击。

后来的事态发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的预言。阿连德继续设法篡改宪制。一九七三年九月,智利国会和最高法院宣布阿连德政府违反了宪法和法律。总之他们指责智利的宪制总统正在破坏民主程序。

在国内走向极权主义的同时,智利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与美国对抗的方针。当时担任驻法大使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于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指责美国企图通过施加经济压力和支持颠覆活动来推翻阿连德。智利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路易斯·埃雷拉在一月三日就任该组织常设理事会主席时说,美国与拉美各国的关系是一种“在经济、政治、社会以至文化领域中的农奴制。”

智利当时推行的政策后来成了其他国家的激进政府一般都奉行的政策。智利一方面侵犯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对其挑衅的必然反应骂作“帝国主义”。同后来好几个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一样,阿连德似乎以为他有权在推行反美政策的同时拿美国的津贴。他企图使出一个绝招,就是一方面对外债实行赖账、无偿征用美国公司的财产,并争取重新安排还款计划,同时却又同美国的和国际性的贷款机构保持全部原有的援助和信贷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他甚至做到了这一切。

* 一九七二年二月九日,智利同一批美国私人银行达成临时协议,由这些银行再提供三亿美元,帮助智利偿付外债。根据这个协议,智利又获得一笔两亿五千万美元和另一笔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以支付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期间国营部门的债务和智利铜矿公司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应偿付的债务。尽管如此,智利仍拖欠美国进出口银行二千万美元左右,拖欠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农业部一百万美元。

阿连德的行动使我们有必要作出一些决定。其中有许多决定其更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它们体现了美国对智利的方针，而在于它们反映了美国政府内部的力量对比。尽管美国政府在进行内部讨论时可以慷慨激昂，但实际上同具体行动是有一段距离的。我们作出的决定往往口气很硬，但与此相反，我们的实际行动却是相当乐以助人的。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九日我们对阿连德拒付智利债务的反应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阿连德几乎拒绝偿付全部外债，我们的行动就必须同其他债权国协调一致。当时订于一九七二年初在巴黎召开债权国会议——实际上就是西方工业国的会议（俗称巴黎俱乐部）。这回又同过去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美国在会议上的立场与其说是根据全盘战略考虑制订的，还不如说是政府各部门之间互相倾轧勉强达成的结果。这一回闹矛盾的倒不是我的单位和国务院，而是国务院与财政部。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是个厉害角色，这一次又想坚持在经济问题上由他说了算。

康纳利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当时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取得出乎意料的胜利，使尼克松大为震惊。因此他就把康纳利笼络住，因为他认为此人是民主党中可以同他争夺总统宝座的最可怕的对手。美国国内再也没有别的知名人物叫尼克松如此畏惧了。康纳利狂妄自大，正符合尼克松心目中一个领导人应有的举止。他发现自己只有在文件上写批语时才能学康纳利的这种派头，一当着他的面就学不来了。这使康纳利免受尼克松耍弄的权术之害，而尼克松就是凭借权术在手下人中拉一派打一派的。尼克松也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康纳利的坏话——受到尼克松如此照应的人还不多。他还是能与康纳利找到一些共同点的，因为康纳利也同样出身低微，但又从不为此显得惶惶不安。

我看这两个人的不同之处倒不在于谁有惶惶不安之感，而在

于康纳利与尼克松对付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同。他们俩谁也不喜欢有人同自己作难，谁也不是真正十分自信。但是康纳利极力想把对方吓倒，而尼克松的方针是以谋略制胜。对于康纳利来说，如果对方根本不知道自己输了，那样的胜利便是毫无意义的。而对于尼克松来说，最巧妙的胜利莫过于对方吃了亏还不明白究竟是谁使的坏，甚至一下子还不明白自己已经吃了亏。

康纳利不久就认识到，尼克松对他一是不敢作对，二是真心佩服。这使他在总统的各位顾问勾心斗角、互争高低的角逐中占了便宜。他拒绝把文件交由任何白宫官员转呈总统，用这种直截了当的办法一下子就戳穿了那吹得天花乱坠的白宫体制是何等脆弱。我的官运还不错，当时我已经把主管对外经济政策的责任让给了彼得·G·彼得逊，他是主管国际经济事务的与我地位相当的官员。康纳利接着就给彼得逊——此人也是既能干又坚强——上了几课，教了他点人情世故，使他明白了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助理能顶得住一位决心坚持实行自己特权的内阁阁员。康纳利凡遇事要同总统商量，就干脆徒步穿过财政部与白宫中间的马路，坚持要求面见总统。凡是关心的文件，他都要亲自面交总统，而且总是做好准备要求总统立即答复。尼克松从不当面拒绝别人的要求，即使对方不象康纳利这么厉害——其实正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白宫才搞了这么一大套班子，不让人直接找总统。

到了一九七二年一月间，康纳利已完全击败彼得逊，夺得了国际经济政策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并且还准备同国务院较量。他还是沿用老办法，亲自提请尼克松注意研究一份备忘录，上面含蓄地说他在国务院的对手准备重新安排智利的还款期限，这样就会惊动其他的债权国，使他们也同美国一样采取这种示弱的做法。康纳利争辩说，巴黎会议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孤立智利。

这一主张正合尼克松的心意。因为它听起来很强硬，而且证

实了尼克松认为国务院无能透顶的看法；它还有一股反阿连德的冲劲。尼克松并不担心康纳利的主张有一个根本矛盾：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孤立智利，那么我们就必须克服欧洲不愿与智利对抗以及愿意重新安排智利还款期限的情绪。如果我们坚持采取强硬姿态，坚决不让智利延期偿还债务，那末很可能到头来倒是美国自己陷于孤立。

对于这一点，康纳利当然很清楚。他的真实目的是确保由财政部来领导美国代表团，以求“既充分保护我们的经济利益，又对智利保持压力。”尼克松在文件上批示说，任何同意重新安排智利还款期限的意见都是“同我的指示完全（异体字系尼克松自己所用）背道而驰的”，我们的政策是孤立智利。但是尼克松并没有说明我们如何才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没有同任何人（包括我在内）商量便搞出了一个文件，发给财政部长，同时抄送国务卿和我。

一月十五日康纳利来文收悉。兹委托财政部率美国代表团去巴黎参加智利贷款问题会议。任何或明或暗地说我赞成美国支持达成一项协议、就智利贷款问题重开谈判的说法，均系全然违背我多次会见有关部门代表时就此问题所表示的观点。

康纳利向来在争权夺势时毫不留情，但真正办起事来却也颇有计。一个例子就是，国务院并未提出过康纳利所说的那种建议。当然，他对于国务院的倾向所作的分析倒也八九不离十。但是当时我们甚至都还没有通过官方途径去了解其他债权国的态度，自己也还没有正式表态。再者，康纳利坚持要美国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孤立智利，作为一种深谋远虑的战略方针，这其实也是我所赞成的（而且我想国务院也是赞成的），只不过他用的是对抗的语言罢了。我的观点已经在几个内部文件中表达过，即美国一方面应当在巴黎会谈中采取强硬路线，同时最后仍应与其他债权国

协调行动。如果我们脱离了他们，阿连德就有可能从拒绝偿还全部外债转为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样一来，阿连德就会获得智利各在野民主党派和军队出于爱国主义的支持以共同反对美国巨魔。这时阿连德就可以毫无障碍地同其他债权国协商解决债务问题而单单把对美国一国的债务（占智利应还外债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一笔勾销。照我看，最好还是同其他债权国搞统一战线，坚持要智利按照协商一致的方案重新谈判它的全部债务问题。如果条件不能令人满意，到时再退出也不迟。

我同康纳利的几次谈话，证实了他同意美国应该做工作，争取各债权国取得一致。这样，一旦要与智利摊牌就不至于由我们独家去背黑锅。如果欧洲国家坚持认为还债期限可以重新安排，我们也就随大流。总而言之，尽管慷慨激昂地唱了半天高调，作出的决定还是要推迟智利还债的期限——这等于是一种间接的经济援助。

在巴黎债务谈判进行期间，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公开的克制态度。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九日的声明中重申，根据希肯卢珀修正案，美国的法律要求凡是征用美国资产又未给予充分赔偿的国家，不能再得到新的美援。尼克松主动表示，美国愿同其他有关各国共同研究，就公平合理赔偿的具体内容订出各方一致同意的标准。一九七二年二月九日总统发表一年一度的《外交政策报告》，再次伸出了这一橄榄枝：

智利的领导人不会由于受美国方面所作姿态的影响而放弃他们根深蒂固的信念。我们承认他们都是严肃认真的人，他们的意识形态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毫不掩饰地同我们的意识形态原则相抵触的。尽管如此，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意识形态，而是取决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所作所为。我已多次表示，智利政府愿意同我们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愿意同它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这一次又碰了钉子。阿连德似乎完全为自己意识形态方面的热诚和他的那帮狂热的信徒所左右。他继续在实际不给赔偿的情况下，不仅没收外国的而且也没收本国公司的财产。一九七二年一月初，阿连德政府公布了拟予国有化的五十三家企业名单，另有三十八家则规定改为公私合营。一个月后（二月七日）阿连德在康塞普西翁市发表讲话，宣称要在第二年再对一百二十家公司实行国有化，征用两千个农场，并且完成由国家接管银行和对外贸易的工作。

与此同时，智利国会中占多数的民主党派议员日益下定决心要抵制阿连德的政策。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九日，智利国会通过一批宪法修正案，企图限制国家接管私营部门的权力。这些法案具有追溯效力，规定自一九七一年十月起始，未经国会具体授权，政府不得没收任何企业。阿连德于二月二十一日宣布，他要否决此项法案。他扬言，如果国会宣布他的否决无效，他就要上诉智利立宪法庭（这是一个特别法庭，其成员多数是阿连德指定的）。接着，反对党就向阿连德提出挑战，要求就国民经济社会化计划举行公民投票。

战斗的阵势现在已经摆开。无论在智利国内，还是在智利与美国关系上，阿连德都在走向最后的摊牌。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日益加剧的智利危机

令人奇怪的是，事情的爆发最初是由一位美国记者引起的。通过报业辛迪加发表文章的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公布了据说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些内部文件。这些文件概述了大约两年以前，即一九七〇年，企图阻止阿连德当选总统的一次尝试。安德森在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的专栏文章中声称，国际电话电报公

司华盛顿办事处负责人威廉·R·梅里亚姆于一九七〇年十月九日向该公司董事（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汇报说，他在中央情报局的熟人对“击败阿连德”的前景感到“十二分”悲观。尽管如此，他“还继续在军队中多方活动，物色对象，以图让他们领头起事……。在设法把智利经济搞乱方面，实际上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安德森在三月二十二日的专栏文章里叙述了九月十一日的一次电话谈话内容，对话双方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国际关系部主任J·D·尼尔和我手下负责拉美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瓦伊伦·P·瓦基。尼尔在电话中谈到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董事长哈罗德·S·吉宁“对智利局势感到关切”。据说尼尔在电话中请瓦基转告我，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愿意提供资助，金额高达七位数字。”安德森的文章还特别提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以及国务院对该公司所作的这一主动表示采取了“一般说来是既客气而又冷淡的态度。”但文章又说，中央情报局的态度则“较为友好。”

我并不了解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这些内部文件内容是否很准确，但是安德森针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揭露倒是颇为真实的。的确，我曾于一九七〇年九月应当时任总统助手的彼得·弗拉尼根的要求，会见了该公司的两名高级职员。他们主动提出可以资助目的在于阻止阿连德当选的活动。我客客气气地把他们挡了回去，因为我认为私营企业不宜插手这种活动。

但是，在一九七二年的激烈气氛中，安德森的这几篇专栏文章却对阿连德迅速走向激进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文章中所讲到的那个计划，美国政府实际上从未接受过——这一点在安德森的专栏文章里其实倒也说得很清楚。我国政府为达到同一个目的所进行的努力——阿连德大概并不知道——在将近两年以前也已放弃。尽管如此，阿连德政府仍然迫不及待地力图把反对政府的

民主派同所谓由中央情报局指挥的阴谋活动牵连在一起。智利中央劳工联盟于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组织了四起游行，支持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极左的内政部长埃尔南·德尔·坎托利用人民义愤填膺的民族主义情绪，于三月二十八日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就指控右翼阴谋分子曾在几天以前密谋刺杀阿连德以夺取政权，并暗示这些阴谋分子是由美国指使的。

智利国会复会后，于三月二十八日投票决定指派一个十三人委员会，就有人指控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一九七〇年干涉智利内政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反对党的领导人此时采取守势，愤怒地否认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任何来往，但同时又要求另组委员会，调查安德森揭露的另一情况，即圣地亚哥的古巴大使馆是煽动武装革命的中心。一段时期内，杰克·安德森竟然成了智利政治的一位中心人物。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一日，由我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研究小组会议，对智利局势的发展进行分析。我手下的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拉美事务的工作人员威廉·J·乔登撰写的一个文件准确地概括了我们的政策：

我们一直谋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尽量孤立智利，同时避免采取任何授人以把柄的行动，以免我们的行动被指控为纯粹是受反阿连德情绪的支配。

我们一直努力争取使各美国公司及时得到公平的赔偿，使这些公司的债务得到偿还。我们一直努力维护正当债务必须偿还、国有化的资产必须得到补偿的原则不可侵犯。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都能同时兼顾这些目标。但是安德森事件却使我们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并使我们的政治动机受到怀疑。更重要的是，为重新协商智利债务问题而举行的巴黎会谈迫使我们决定究竟如何处理好既要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又要维持“外表上正确的姿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为了从政府文件中推断美国政策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不仅限于进行分析，而且还得研究美国高级官员所必须决定的具体对

策。就智利问题而言，关键倒并不在于怎样对智利内政施加影响，而是要决定在下届巴黎债权国会议上采取什么方针。我们是否应当争取对没收资产的争执——特别是对赔偿问题——实行具有约束力的仲裁，在这一点上是有争论的。国务院自然希望这样做，因为这将对国际法作出重大贡献。财政部——为了什么缘故我现在记不清了——却反对由美国出面提出要求仲裁的主张，但是如果智利方面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是愿意接受的。

高级研究小组的讨论后来并没有影响巴黎会谈的结果。尽管康纳利在内部讨论时态度强硬，但后来还是同意采取不和其它债权国闹分裂的方针，以免阿连德有隙可乘，把他的债务问题都赖到美国头上。康纳利附和会议的一致意见，同意延长智利共约二亿五千万美元债务的偿还期限。作为交换条件，智利承认它在国际上所欠债务均属有效的原则——这是智利若想保持借贷信用起码应该做到的事情。

此外，智利还同意就国有化问题与有关各国进行磋商，但是却要以两种互相抵销的准则为依据。智利表示愿意既根据智利法律也根据国际法，对国有化的资产给予“公正”的赔偿。但是所谓根据智利法律予以赔偿，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智利法律规定，对超额利润追征税金，这样一来，不论确定下来的“公正”赔偿的款项有多少，都可以作为对超额利润追征的税收而加以收回。至于国际法，智利随即声明，其中对没收资产问题并没有规定任何原则。因此，实际结果是，智利在丝毫没有改变自己政策的情况下，就取得了几乎所有债务都宽限一年的好处——这等于是取得了某种形式的经济援助，其数额超过了以往历届民主政府在任何一年之中所获得的经援。智利继续享受着这种事实上延期偿还债务的好处，直到同各债权国协商签订具体的双边协定为止。

尽管如此，阿连德的国内问题还是与日俱增。政府机构臃肿、

效率低下，他的政策又加剧了通货的恶性膨胀，这些都损害着政府的稳定和社会的团结，情形一月不如一月。连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奥尔兰多·米利亚斯也在一九七二年三月间承认，中心问题是怎样使已经国有化的各企业“能够继续提供象以往给资本家提供的那样多的巨额利润。”实际情况是，这些企业在收归国有以后，成本增加而生产率却下降了，这种情况又对通货膨胀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一九七二年智利官方承认年通货膨胀率已达百分之一百六十三（后来又上升到百分之三百五十），对经济和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国内政治形势十分紧张，致使阿连德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底让智利国会停止活动达一周之久。

尽管发生了以上这些情况，智利在这一时期所得到的外援，实际上比以往任何相应时期所得到的外援都要多。不但西方同意延长智利偿还所欠二亿五千万美元债务的期限，而且共产主义世界对智利的贷款也在不断增长。到阿连德被推翻前夕，共产党国家的贷款已超过了六亿美元。而且智利还打破了东西方援助两者不可得兼的迷信，它与共产主义世界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并没有构成逐步改善同西方经济关系的障碍。它甚至又一次同西方谈判私人贷款问题。六月十二日，智利同二十八家美国私人银行签订协议，为智利偿付所欠的一亿六千万美元债务重新提供贷款。^{*}美国各银行早先对于向智利提供短期贷款做了种种限制，现在也开始放宽。^⑥六月十三日，智利政府宣布从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获得一亿美元的贷款，将用以购买生产资料和消费品。

无论是放宽偿还债务的期限，还是新提供的国际援助，都没有阻挡住阿连德迫不及待地与美国对抗。四月十三日，他在圣地亚

^{*} 根据智利驻华大使馆公布的材料，智利全部债务的四分之三（原应于一九七四年到期）被推迟八年偿还。同时又削减了一九七二和七三年偿付到期债务的数额。

哥主持第三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开幕式时，慷慨激昂地谴责各工业国家——其中特别点了美国的名——造成了这样一个世界：“穷国既出劳力又出资源，换来了富国的繁荣。”四月十四日，智利外交部副部长阿尼瓦尔·帕尔马在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上发表讲话，指控美国企图阻止多国信贷机构向智利提供开发贷款，并且谴责我们破坏智利争取延期偿还债务的努力——这同我在本书中概述的情况正好相反。阿连德在五一节群众集会上指责美国正在对智利实行经济封锁。显然，不管我们干了什么还是没有干，阿连德反正需要制造一种美国敌视智利的迷信心理，以图在实现阿连德式的社会主义的进军已经日益不得人心的局面下争取支持。

然而，既然阿连德的国内问题不是由美国造成的，那么也就不可能依靠把人们的不满情绪一古脑儿往美国身上发泄的办法来消除这些问题。阿连德的一套作法本质上是不符合宪法的，这就使他与智利国会不断发生冲突，其剧烈程度是智利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智利众议院于七月五日投票决定内政部长坎托停职，因为他没有实施保护私有财产和人权的法律，拒绝对煽动强占土地、工厂的左翼分子起诉，并且批准来自古巴的十三个神秘的板条箱不经正规的海关检查就入境。^⑩ 政府坚持说这些都是送给阿连德个人的礼品。反对派却指控箱内装有违禁的武器。^{*} 智利参议院于七月二十六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并于七月二十七日投票表决，以二十七票对十四票通过对坎托表示不信任并撤销其职务。这是国会中的各民主党派第二次罢免违反智利宪法、蔑视智利法律的内政部长了。

至一九七二年夏季，智利社会政治力量的两极分化已告完成。

* 阿连德倒台后有文件表明，这些板条箱里装有一吨多武器。而当初包括阿连德在内的智利政府官员却一再声称箱里装的是“艺术品”。这就是说，早在一九七二年三月间，阿连德政府就已经在设法秘密武装其追随者了。

阿连德假借控制通货膨胀的名义，极力设法使国会通过增税措施，其实际后果将是剥夺中产阶级，并把剩下的私人企业的大部分都收归国有。结果智利国会采取了反对这些措施的对策。在此以后，政府似乎就再也没有能重新控制局势。从一九七二年七月至一九七三年九月政变的这段时期内，物价逐月上涨，生产则逐月下降。由于联合执政的党派联盟出现了分歧，加之立法机构的强烈反对，政府无法实行一贯的政策。智利历届政府与反对党之间素有的以礼相待的传统，至此也告完结。七月十二日，坎托谴责立法与司法机构“同帝国主义大国的利益勾结”，此后阿连德同司法机构的关系完全破裂。最高法院给阿连德写了一封公开信，对行政部门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抗议。

政局的不断发展日渐演变成阿连德同反对派之间的较量。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智利商人罢市，抗议通货膨胀、商品短缺、物价管制和其他种种限制正逼得他们无法经商。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市都发生了示威游行。在警察与示威群众发生冲突后，阿连德宣布圣地亚哥省处于紧急状态。政府谴责反政府集团“掀起闹事浪潮”，并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措施。政府查封了“洛杉矶”广播电台，警察对右翼集团进行了镇压，对外国侨民的活动也施加了限制。智利基督教民主党把国家的混乱归咎于阿连德本人及其“错误的、对社会产生消极作用”的经济政策。八月三十一日，数千名亲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与反政府分子在康塞普西翁市街头大打出手，该市随即实行军管。

智利局势日趋混乱绝不是由于美国进行了干涉。我们没有通过中央情报局或其他任何渠道同罢工领导人或抗议组织有过什么牵连。我们既没有批准向他们提供过任何公开的或秘密的援助，也没有给他们出过任何主意。

九月十四日阿连德又象以前一样再次指控“法西斯分子”正在

密谋反对他的政府，但是他只能点出一位退休少校的名，此人当时正流亡在玻利维亚。整个九月份都一直流传着智利军方将要介入的谣言。九月二十九日，智利军队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冈萨雷斯斩钉截铁地辟了谣，并保证支持政府。

随着对抗的加剧，智利国会通过了三个法案，以求限制政府的国有化计划，约束政府对舆论机构的打击，并制止政府鼓励恐怖活动。第一个是宪法修正案，规定禁止没收面积在四十公顷（九十八点八四英亩）以下的地产。第二个法案规定，对经费困难的电台和报社由公家给予资助，并规定保证不得实行没收。（当时亚历山德里报业公司濒临破产，促使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该公司只获准提高报纸售价百分之十九，但同时却不得不承担因为必须提高职工工资百分之二百到三百而增加的成本。另一个使国会感到震惊的因素是，政府以所谓歪曲报道为理由封闭了两家反政府的电台。）但是阿连德否决了这个关于舆论机构的法案。

基督教民主党的第三个关键性行动，是通过立法禁止支持阿连德的左翼分子非法进口武器。武器管制法授予军队进行搜查并把违令者提交军事法庭审讯的广泛权力。尽管人们原先以为阿连德会否决这项法案，而且他自己领导的社会党也敦促他这样做，然而他除了接受该法案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从一九七二年十月起，他便面临着愈演愈烈的罢工浪潮，只有求助于军队才能制止罢工。而这一次军队对支持阿连德政府所索取的代价就是实行新的武器管制法。

智利这时已出现典型的革命格局。在政权解体的一定阶段，会出现既无足够力量实行镇压，又无足够的威严可以一作让步就得到一点好处的局面。实际上，一旦到了这个阶段，无论是镇压也好，让步也好，都只会加速政权的垮台；这是因为使用武力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实行让步也并不会使人觉得政策宽大，却只会使人

认为是慑于反对派的强大。智利当时的形势正是如此。阿连德只有通过扩大军方的作用才能取得对付罢工所需要的力量；而反对政府的民主派恰恰也是依靠军方来约束政府的违宪行为。因此，阿连德在《武器管制法》问题上实行让步，就鼓励了其他集团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们采用的方式是罢工，矛头直指政府而并非针对雇主——其实有些罢工就是雇主自己搞起来的。

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九七二年十月十日爆发的罢工。当时卡车主联合会号召举行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宣布要成立一个与之竞争的地区性公共卡车公司。这次罢工迅速发展成为一场相当于总罢工的民众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基督教民主党支持卡车主的行动，该党全国委员会宣布政府违反了《民主保证法规》——即大选前协商制定的使阿连德得以上台的《人权法案》。基督教民主党提出了解决争端的条件，其中包括对表达意愿的自由给予有效保障。十月十六日，工程师联合会参加了罢工，其后银行雇员、加油站工人、律师、建筑师、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司机、医生和牙医也陆续参加了罢工。^{*}智利政府在全国二十五个省中的二十个省实行了宵禁，并接管了所有的电台。

罢工终于在十一月五日结束，但其代价是军方作用的进一步扩大。有四名武装部队的代表参加了阿连德的内阁。负责公共秩序的内政部也交由参加结束罢工谈判的陆军司令普拉茨将军负责。这个喘息的机会为时并不长。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第四十号委员会于十月二十六日决定拨款一百四十二万七千六百六十六美元资助智利各民主党派参加一

^{*} 据一种说法，全体出租汽车司机和大部分公共汽车司机都参加了罢工。据罢工领导人估计，在罢工高峰期，百分之百的运输业人员、百分之九十七的商业人员、百分之八十的自由职业者以及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合作社都参加了罢工。罢工的总人数估计在六、七十万人之间。^①

九七三年三月份举行的国会选举。其中又将十万美元作为资助私营部门的团体（搞选民登记活动）的专款，动用这笔款项须经美国驻智利大使批准——但戴维斯大使却未予批准。后来有一个同中央情报局作对的参院委员会派人进行调查，拚命想要找到一些违反华盛顿当局有关严格规定的实例。他们确实发现了不多不少只有一起这样的事例，即“违反中央情报局规定”^⑨、挪用二千八百美元送给了罢工的卡车主。

十月十七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工作人员威廉·乔登向我转达了中央情报局的预测，认为尽管智利国内局势日趋混乱，军方起来推翻阿连德的可能性只有四成。乔登曾在华盛顿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其中包括约翰逊总统任期内一度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他还对我说：“根据我的经验，所谓四成就意味着肯定某事不会发生，但万一真的发生了，也不算估计十分错误。”有一份关于智利局势的部际报告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智利不会发生政变，除非政府采取了比以前更加公然违反宪法程序的行动。

阿连德在国内受挫，就于十一月三十日启程出国，去墨西哥、联合国、阿尔及利亚、苏联和古巴进行为期十五天的访问，企图以此重新招来好运。他借这次出访的机会大搞反美亮相，大唱反美老调。十二月一日，他在墨西哥国会发表讲话，大肆抨击所谓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对智利的侵略。十二月四日，他在纽约向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对美国进行了极其恶毒的攻击。

阿连德在阿尔及尔逗留了十九个小时，这期间他继续进行反美宣传。他说：“阿尔及利亚和智利两国今后的关系将是革命的友好关系，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十二月六日至八日，他在莫斯科受到苏联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宣称，智利和古巴正在为拉美社会主义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波德戈尔内主席向阿连德保证，苏联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支持阿连德在智

利进行的“革命性的改革”。在最后公报中，苏联保证继续向智利提供政治和经济援助。

阿连德在他精神上的故乡哈瓦那受到了作为卡斯特罗上台以来第一位访问古巴的拉美国家首脑所应得的盛大欢迎。十二月十四日为庆祝访问结束而发表的联合公报再次号召拉美各国团结起来反对“外国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公报说，这种外国的经济剥削和压迫企图扑灭拉美的“解放斗争”——这些语言都是号召进行反美革命讨伐的暗语。

对于阿连德本人来说，不幸的是，对激进国家首都的访问并没有使他在国内赢得人心。十二月十四日阿连德一回到智利，马上就受到反对派基督教民主党人的谴责。他们指控他正在“使智利依附于苏联。”他们要求对他出访期间所达成的全部协议进行调查，并声称这些协议对智利的未来构成经济上的严重威胁。这位按宪法程序选出的总统，一心一意想推翻宪法，他与反政府的民主派之间的下一轮斗争，是围绕着订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举行的智利国会选举展开的。

一九七三年：阿连德的最后危机

阿连德与尼克松是在同一时期先后垮台的，而且都同样带有命中注定的性质。到一九七三年，智利的政府危机越来越频繁。阿连德不是用妥协的办法来对付危机——也许是他认为自己已无路可退，必须背水一战；也许是比他更激进的左翼盟友不让他作别的选择——相反，他却加紧推行最先引起局势动荡的两项措施，即没收智利的私营企业和箝制舆论界。他这样做就好象只有先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然后再硬按自己的意志收拾残局才是他的唯一出路。这场斗争日渐发展成为有关各方政治上的生死存亡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要不就得让阿连德下台，要不民主就会崩溃。德高望重的前总统、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开始竞选参议员。他谴责阿连德政府制造“灾难性”的局面，企图把智利人民分裂成势不两立的集团，并散布仇恨与暴力。

弗雷的这些预言很快就都不幸而言中。一九七三年一月十日，阿连德宣布对食油、大米、肉类、食糖、咖啡和小麦等基本食品实行新的分配制度。这就等于由政府来决定究竟谁能购买这些必需品，购买多少和价格高低。根据计划，由“采取合作态度”的街道商店负责零售，整个分配系统由阿连德的党派联盟成员所控制的“物价和供应委员会”负责管理。尽管规定参加这一分配计划要根据“自愿”原则，但是不参加分配计划的商店和家庭是不能以官方补贴的低廉价格买到这些必需食品的。

这个办法不仅是对私营企业的打击，而且等于是实行严格的配给制，结果必然使罢工重新爆发。同样不出人们所料，阿连德的对策又是变本加厉地肆意攻击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他在国会选举中争取支持的一种手段。二月五日，阿连德的执政联盟公布了竞选纲领，再次建议进行宪制“改革”，把立法机构置于总统控制之下；阿连德早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就曾提出要进行这种宪制“改革”，但未能得逞。更令人不安的是，阿连德开始扬言要使用暴力，他在一次讲话中宣称，如果反政府的民主派继续作梗，那么，“智利革命就将被迫放弃民主道路而采取暴力手段。”

一九七三年三月四日智利举行国会选举，结果出现了相持不下的局面。阿连德的执政联盟由于对舆论工具有较大的影响，在众院增加了六个席位，在参院增加了两个席位。但所得的票数仍然只占选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四。反政府的民主党派在两院依然拥有很大的优势（在众院中是八十七席对六十三席，在参院中

是三十席对二十席)。但是在参院中,反对派没有获得使总统的否决无效或取消行政部门命令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这就是说,阿连德显然无法实行宪制改革,但是反对派也阻挡不了他用自己的办法执政。实际的结果就是双方壁垒更加分明。

这种对峙局面却使阿连德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他认为自己有权绕过国会,依靠行政命令来实行他原先竞选纲领中提出的一些比较激进的主张。选举结束两天以后,他就颁布政令,规定要彻底改革公立和私立中小学教育的体制和方向。根据教育部的提法,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使“青少年按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标准,全面发展自己的个性。”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想使教育体制政治化的行动,显然带有极端主义的气味,它的实际结果却是把各民主党派、军方、甚至破天荒头一遭还有天主教会在内的阿连德的所有政敌全都团结了起来。后来,就象以前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阿连德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中旬屈服了。教育部长接受了教会的要求,决定在进行充分的公开讨论以前暂缓实施这一改革计划。这种先以妄图越权开始、后以屈服投降告终的做法,必然使阿连德的权威进一步削弱。

至四月底,示威游行和罢工已遍及智利各省城和铜矿区。圣地亚哥市大街上发生了暴力行动。阿连德以基督教民主党总部附近发生的一起事件为口实,采取了封闭这个反对党中央机关的非常措施。五月六日,阿连德宣布圣地亚哥省处于紧急状态,一直过了十二天才取消。工人群众本当是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受益者,现在却同社会主义的政府公开对立,因为智利政府在实行国有化以后成了矿主。

五月十五日,基督教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指责智利政府“企图独揽大权,也就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搞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大会声明一定要使用(该党的)“一切力量”制止政府“极权主

义的不断升级。”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前总统弗雷当选为参议院主席。一位基督教民主党人当选为众议院主席。当阿连德在国会开幕会议上作年度报告时，弗雷拒绝出席会议，这就形象地表明了智利的政治生活已经两极化了。

国会一复会，就有人控告阿连德手下的一些部长违宪，并提出弹劾。这种在总统制中搞议会民主的特殊做法，造成了无休无止的内阁危机。五月二十五日，基督教民主党人提出弹劾阿连德的劳工部长和矿业部长，指控他们激起铜矿工人罢工。在此以前，国会已命令几位宽容左翼恐怖主义活动的地方官员停职。当时阿连德在谋求智利社会的革命化，而国会却在企图拆散他的政府。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经济日趋混乱的背景下发生的。说来几乎无法令人相信，在到一九七三年五月为止的一年之中，智利的生活费用竟然上涨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八。政府鼓励通货膨胀，把它作为一种剥夺中产阶级财产的手段，这就引起罢工再度蔓延。五月二十二日，私营公共汽车主停止营业，要求提高公共汽车票价、解决零件严重短缺的问题。政府的回答却是征用所有的公共汽车。

我的班子里的一名助手比尔·乔登于五月二十四日转给我几份情报，警告说智利军方正在策划阴谋。乔登认为对这种报告不可全信，但他又说：“对此还需留意观察，我们将会这样做的。但同时，我认为不应为此过于激动。最要紧的是，不应使美国以任何方式卷入这些事情。”乔登的建议轻而易举地便占了上风。既然没有人建议采取任何行动，因此也就没有采取行动。我们无论在哪一阶段都没有同那些进行密谋的军人发生过任何关系。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没有开会研究过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向主要拉美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一揽子计划中有一部分援助是给智利的，这是我们对智利军方唯一的表示。这个一揽子计划是为了防止苏联向这些国家出售武器。我在五月十五

日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表示赞成国务卿罗杰斯提出的建议，向包括智利在内的主要拉美国家出售F-5E型飞机。

迄今为止，他们（智利军方）一直顶住了阿连德的压力，没有接受苏联表示愿意提供的购买武器贷款。如果我们封死智利获得美国飞机的可能，那我们就不光是自绝于智利军方，而且也会使他们走投无路，只得屈从阿连德的压力去购买苏联装备，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苏联影响的扩大。

智利国内的局势越来越无法控制。六月五日，铜矿罢工进入第四十八天，政府不得不暂停铜的外运——这样就切断了外汇的主要来源。圣地亚哥市又发生街头冲突。六月十五日，阿连德与六位罢工领导人会晤以缓和暴力事件的发展。（智利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人谴责这次会晤是姑息。）同一天，圣地亚哥市又发生街头暴力事件；罢工的矿工向市区进军时有六十三人受伤。六月二十日，成千上万的学生、教师和医生罢课、罢工，声援矿工的斗争，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次日，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劳工联合会组织反罢工支持政府。罢工与反罢工使交通运输和商业陷于停顿，不仅圣地亚哥如此，瓦尔帕莱索、康塞普西翁和阿里卡等地的情况也都一样。因此不得不出动军队来镇压暴力行动。

六月二十一日，智利政府勒令很有威信的《信使报》停刊六天，理由是所谓“煽动颠覆”，因为该报刊登了国民党批评总统的声明。这一措施又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它既暴露了阿连德政府的日益虚弱，又暴露了他的反民主面目。由于上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信使报》只停刊了一天。智利政府还想取消国民党主席、参议员奥诺弗雷·哈尔帕的议员豁免权。六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指出智利有发生内战的危险，主要应由阿连德负责：

智利濒临内战边缘

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宣称：“一定要避免内战”。但是他那由马克思主义分子控制的联合政府却坚持实行必定会加速两极分化的政策方针，把智利推到了内战的边缘。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由于《信使报》登载了国民党指责阿连德博士违反宪法的声明，政府就封闭了这家立场保守、却受到广泛尊敬的圣地亚哥报社，结果却只不过得逞一时而已。

如果阿连德博士为了防止事态大爆发，把高级军官请进内阁，象去年十一月使全国陷于瘫痪的罢工爆发以后的做法一样，那就等于承认自己领导的失败。

阿连德博士的人民团结政府的领导人和支持者无休止地责骂“法西斯分子和叛徒”；但是他们无法掩盖与目前危机有关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场危机是由于特尼恩特铜矿工人奋起罢工反对国营铜矿公司而触发的。这个铜矿的许多工人在一九七〇年时投了阿连德博士的票，并为他实行铜矿国有化而欢呼……

包括像“祖国与自由”这样的法西斯类型的青年组织在内的极右翼阴谋分子，借特尼恩特罢工事件大做文章，企图使政府陷于瘫痪，并挑动军方进行干预。但是如果阿连德博士坚决顶住自己队伍内部的激进分子，主动与国会内的反对派，特别是基督教民主党人，进行真诚的对话，共商克服危机和对峙的治国大计，那么他还是能够使这些极右势力陷于孤立而无计可施的。

阿连德博士要这样做，就必然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放弃他本来就没有受权实行的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计划；但是这样就有可能使智利得救，避免出现军方接管或爆发内战的局面。阿连德总统现在担心出现这种局面是完全有道理的。

但是阿连德对于进行民主的对话毫无兴趣，他既害怕灭亡，却又一意孤行地走向自取灭亡。

军方开始行动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正是前一次智利军人企图推翻政府的四十二年之后，第二装甲团的一百来名士兵袭击了圣地亚哥的总统府和国防部。阿连德宣布智利进入紧急状态。忠于政府的部队在几个小时以内就把这次叛乱镇压了下去。这次战斗中共有二十二人死亡，其中多为观战的平民，另有三十四人受伤，交战地区成了一片废墟。

由于智利有着根深蒂固的宪法传统，所以这次阿连德政府受到猛烈冲击以后，有一些同它并没有什么关系的力量还出来保护它。海军司令和空军司令立即向阿连德表示支持。基督教民主党也呼吁保卫宪法秩序。当天晚上我向尼克松简要地汇报了这次未遂政变的情况：“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次政变是一次孤立的、没有很好配合的行动。包括陆、海、空三军司令在内的大多数军队领导人都仍然忠于政府。”

对于这次未遂政变，阿连德的反应又是不妥协，并且蓄意加紧推行他的激进政策。他的政府即使不是鼓励至少也是默许激进分子占领数百家企业。政府接管公司的数目，在短短一天之中就几乎翻了一番，由二百八十二家增加到五百二十六家。^⑭

七月十日，比尔·乔登呈上了情报部门的最新估计，认为不大可能再次发生军事政变。乔登本人的意见仍然是我们应当继续实行不干涉政策：

美国缺乏可以影响最后结局的有力而可靠的手段。如果继续鼓励智利内部的制约力量，并且继续在经济上施加压力，那将可能产生一些有限的影响。但是，如果实行公开、全面施加经济压力的政策，那在政治上给阿连德带来的好处会比在经济上给他造成的损害更大。

我们采纳了乔登的意见。

尽管灾祸临头，阿连德却继续采取硬顶的做法。他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紧缩开支方案，这个方案本来可能使智利的财政复元。他也不愿意宣布暂停没收私人企业；如果这样做的话，本来是有可能使他与反政府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致破裂的。他还不屑于同美国改善关系，尽管他的困难并不是由美国造成的，美国却有能力帮助解决他的困难。

随着新的罢工浪潮的袭来，又开始了恶性循环：先是罢工，接着是政府征用私人财产。七月二十六日，全国卡车主举行罢工。阿连德下令没收他们的卡车。在同一天，基督教民主党人同意与阿连德举行谈判，以求缓和紧张局势。会谈于七月三十日开始。至八月一日，该党致函阿连德，提出了几项要求：收缴极左和极右双方准军事组织的武器；在未遂政变发生后所没收的财产应归还原主；制定宪制改革法案，明确规定私营、公私合营和国营经济的范围；应有军官参加内阁以提供“宪法保证”。

同日，有十余家私人企业和同业公会联合起来，组成“公民阵线”，公开宣布其目标是要阿连德政府下台。八月三日，圣地亚哥的公共交通运输几乎完全陷于停顿；公共汽车与出租汽车主参加了私营卡车主的罢工。圣地亚哥自来水公司的职工也宣布罢工，医生和铜矿工人也扬言要举行罢工。阿连德谴责罢工浪潮是“煽动造反”，并宣布所有公用事业部门处于紧急状态。他拒绝考虑让军人参加内阁。对此，基督教民主党人的回答是宣布终止与阿连德的会谈。

最能说明智利的宪法秩序已经垮台的，莫过于反对派要求军人参加内阁以确保实行民主了。甚至连基督教民主党左翼的领袖也要求军人参政，以使局势“正常化”，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左翼曾在一九七〇年支持过阿连德提出的大部分社会和经济方针。八月九

日，阿连德在正式拒绝军方参加内阁后的第六天，终于实行妥协，请军人入阁。这已经是当年的第三次内阁改组了。曾任内政部长陆军总司令普拉茨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另外三名军官出任财政、交通和土地部长。如果撇开军人阁员不算，新内阁中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仍与原内阁相差无几——社会党人三名、共产党人三名、激进党人两名、独立人士一名，还有一些其他左翼小党头目。

这届内阁是一个革命派和保守派的稀奇古怪的混合体——生来就是搞不下去的。现在阿连德手里只剩下了——一张牌，就是利用人们的反美情绪。左翼报刊开始指责驻圣地亚哥的美国大使馆支持罢工、鼓动暴力。八月十三日《最后一点钟报》发表社论，由不久前因取缔恐怖主义不力而被国会撤职的前内政部长坎托署名，指控戴维斯大使通过中央情报局资助反政府舆论宣传活动。八月十五日，在三名美国大使馆官员的住所外边发现了炸弹。智利政府向戴维斯大使保证，绝不容许袭击美国外交官；但是八月二十一日，共产党报纸《纪事者报》继续指控外国阴谋破坏智利的独立和主权。

阿连德此时进退维谷。他不靠军人支持就无法镇住反对派，但是军人参政是为了要他的激进纲领刹车，而他却不愿意放弃他的激进纲领。普拉茨是阿连德政府在军人中最忠实的支持者，但是在众议院以八十一票对四十七票通过决议谴责政府“不断侵犯宪法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和保障”以后的第二天，在群情激昂的同僚们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同时辞去国防部长和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众议院再次要求国防部“指导政府的行动”以保障民主制度。基督教民主党主席帕特里西奥·艾尔文也表示支持这一要求。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导致随即发生的九月十一日政变的，正是新选出不久的众议院和智利的的主要民主政党。

政 变

尽管智利局势如此动荡，华盛顿的决策者始终把智利看作一个次要的问题。欧洲年、美苏最高级会谈以及中东问题使它相形之下显得远非那么重要。华盛顿只有在事到临头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一些决定，而且这些决定几乎总是与经济问题有关，诸如定期举行的重新商定智利延期还债问题的债权国会议，以及最后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三月搁浅的美智双边债务会谈等等。在这些问题上，财政部是主管单位，它所主要关心的是维护经济原则，诸如对没收的资产给以赔偿和避免造成不还债的先例。第四十号委员会继续把我们秘密援助的范围仅限于对智利民主党派和舆论机构提供的日渐难以为继的财政支持。

迟至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第四十号委员会仍然以电话表决方式通过在一九七四年年中以前向智利各民主党派再提供一百万美元的资助。这一事实证明，华盛顿高级官员中并没有人认为会发生政变。在这笔款项中，有二十二万五千美元是须经戴维斯大使批准而用于私营部门单位的。同上次十月二十六日决定拨出的专款情况一样，戴维斯大使又不予批准。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设法绕过大使，要求白宫授权把部分经费送到智利参加罢工者手里。但是比尔·乔登于八月二十九日建议不予批准：

大使（正确地）认为美国目前的政策是继续施加压力而不是采取行动推翻阿连德。大使认为这一新建议会把我们推向后者。

我接受了乔登的意见。没有根据科尔比的建议采取任何行动，甚至没有把他的建议上报总统。事态的发展很快就使这个建议失去了意义。

政变爆发前七十二小时，九月八日星期六，我第一次同纳撒尼尔·戴维斯会面。这次会面也成了臆造的美国罪行之一，据说是最后敲定推翻阿连德的计划细节的密谋。事实上，我这次约见戴维斯同智利问题毫不相干。我在八月二十二日被提名担任国务卿一职以后，请人开列了一张国务院最能干的高级官员名单，以备日后可能提升要职之用。这份名单上有戴维斯。由于我从未见过此人，就要国务院请他前来面谈。我提议在九月八日或九日周末时会面，因为我从圣克利门蒂回到华盛顿以后到那时才头一次有空。我还告诉戴维斯，如果这个时间不方便或者他必须留在圣地亚哥的话，可由他另选一个日子。

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国务院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谈话的结果是我任命戴维斯担任驻外机构总监。但是在谈到我所主要关心的正题之前，我请他就智利局势的最新发展给我吹吹风。戴维斯强调说，智利正在通往危机的道路上滑下去；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还不太清楚，政变的结果究竟是会像巴西那样成立一个亲西方的民族主义政府，还是像秘鲁那样出现一个第三世界激进政权。到最后一分钟，智利军方有可能打退堂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阿连德有可能搞成一个古巴式的专政。我推测如果阿连德被迫辞职，深受我们尊敬的爱国者和民主派、参议院主席爱德华多·弗雷将根据智利宪法接管政权。戴维斯提醒我说，军人一旦克服了重重顾虑而发动政变以后，是不会匆忙把政权让出来的。戴维斯真有先见之明。

我告诉戴维斯，不要让美国使馆介入日趋严重的智利危机。他强调说，他“严令全体馆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卷入。”戴维斯一丝不苟地坚持执行这一决定。由于事后人们（错误地）如此重视这次会见，我已经把同戴维斯的这次谈话的记录中有关智利问题部分在章末注中印出。^④

读了这篇谈话记录，就不会再对我们在智利政变前夕究竟了解多少情况和究竟有什么打算有任何怀疑了。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是每一个智利人，包括阿连德在内，都了如指掌的，即：已经控制政府关键部门的军方正在认真考虑进行接管，众议院和基督教民主党主席实际上已经邀请他们这样做了。但是对于政变的具体计划和日期我们都一无所知。我们也没有参与任何政变计划。

政变行动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六时三十分左右开始。反对派的电台广播了陆军、空军与国家警察的司令和海军作战部部长共同发表的宣言，要求阿连德总统立即辞职。他们宣称，军队和警察已经联合起来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把国家引向混乱的无能政府而战斗。他们保证维护工人已经获得的社会和经济权益。他们还下令所有亲政府的电台停止播音。

阿连德于上午七时三十分在重兵保卫下来到总统府。他向全国广播，拒绝辞职；他号召工人占领工厂，加紧抵抗。在空军进行轰炸以后，陆军部队在中午时分攻进总统府。他们发现阿连德已经身死。美国大使馆给华盛顿的报告说，阿连德显然是用卡斯特罗送给他的一支轻机枪自杀的。我无法对与此相反的种种说法发表意见。^⑨

我相当详细地描述了阿连德倒台的前后经过，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一些人是怎样编造政治谎言的。在某些人当中，所谓美国在智利“造成不稳定”已经成了他们随意污蔑美国政策如何邪恶的代用语。可惜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不是美国，而是阿连德自己的政府，在古巴的援助下密谋策划准军事暴乱和颠覆活动、秘密地向激进的共产党分子提供武器。我们所做的只是给一些自由报社和政党提供经费，因为他们要求我们帮助他们顶住蓄意在下次大选以前镇压他们的一系列严厉措施。

美国在智利的事态发展中算不上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

是阿连德在一九七三年把智利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搞得濒临崩溃，以致美国大使把拨给私营部门的援款扣住不发，省得为不可避免的崩溃背黑锅。老资格的革命家、中国总理周恩来十分同情阿连德的马克思主义试验，他对阿连德所作的盖棺定论恐怕是最为精辟的。我在阿连德死后几个月访问了中国。周恩来对我说，他曾劝阿连德要把步子放慢一点，不要太教条主义。但是阿连德始终把中国人的忠告当耳边风。

我们告诉他们(会有什么风险)，但是他们不信我们的话。那种情况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我只给阿连德总统写过一封信，劝他不要急于求成。信里只谈了经济问题，告诉他们应该事先做好准备工作。他们不应该想一口气把一切都办好，而要一步一步来。他们不要对老百姓许愿太多，否则就不能兑现。因为我们认为只能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可是人们一谈到社会主义就联想到福利。我给阿连德总统的信在报上登了出来，但是没有用，因为是一个外国人的意见，没有份量。

也许是经过精心策划，也许是由于他所领导的激进联合政府能量很大——很可能是两种因素同时起了作用——到一九七三年，阿连德已经使智利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其结局不是搞古巴式的专政，就是由军人执政，两者必居其一。智利所有的民主党派也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他们肯定没有充分估计到，军人一旦放弃其作为宪法保护人的历史地位而上台执政后，会如何恋栈。智利军人集团是由于局势开始混乱，在各民主党派的请求下，才决心采取行动的。而且根据种种现象来看，他们只是在感到自己受到大多数智利人民支持的时候，才极其勉强地采取行动的。他们一旦担起政治责任，就暴露出在政治上缺乏经验，如果不是幼稚无知的话。但是我们不应轻易否定他们对局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即：已经把智利引向内战边缘的现行政党结构不大可能改变当时的局面，正是这种局面使军人必须出面干预。

我们千万要记住像智利前总统弗雷这样一位赤诚的民主主义

者在军事政变后不久所说的这番话：

军人挽救了智利，也挽救了我们大家。我们个人的存亡当然不象智利国家的存亡那样重要，但是我们的生命都是人的生命，而且其中许多人以至所有人的生命至今都还没有保障，因为军队还不断发现秘密的据点和暗藏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分子原来早就在认真准备进行内战。而这一点是全世界并不了解也不了解的。④

华盛顿的反应

智利政变发生之日凑巧正是国会为确认我出任国务卿而举行听证会之时，因此美国的反应就慢了一点，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们最终的态度。

政变次日，即九月十二日的上午，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召开会议，威廉·科尔比首先在会上介绍情况，他的情况介绍尽管极其谨慎但却很中肯。科尔比说，政变领导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是一个迄今为止并不特别有势力的军官，向有亲美的名声。科尔比正确地预计到，军方将坚持对政治体制实行根本改革。因为他们不信任非军人政治家，因此极不可能很早就进行选举。他还预计军政权不会全盘推翻阿连德所实行的社会改革，但是会允许逐步恢复私有制。在对外政策方面，科尔比估计智利会停止肆意攻击美国，并且会冲淡阿连德的第三世界立场。新政府正在断绝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并且已经把一百五十名古巴人驱逐出境。

在这一背景下，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讨论了具体行动问题，诸如：我们是否应承认军政权？如果智利要求给予援或军援，我们应采取何种态度？对新政权我们应持何种公开立场？就象出大乱子时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此时决策者们却首先要就两个碰巧发生的偶然问题作出决定。一是如何处理美国空军特技飞行队即将

访问智利的问题，二是如何处理美国海军在离智利和秘鲁海岸不远的公海进行演习的问题。这两项活动都是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安排好了的。当时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一致的反应当然是为阿连德的倒台（但不是为他的丧命）感到宽慰。我们很清楚，他的倒台和丧命都有可能使我们为之受到指摘。当时正是越战方息、大闹水门事件的当口。在这种气氛下，美国不得不格外忍让，免得被人指责同智利事件有牵连，尽管全体与会者都认为智利这一事件是有利于我国的。

为此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向总统建议不谈外交承认问题。我们一般主张承认国家而不是政府。但是，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将极力避免成为最早承认智利新政府和最早同它发生关系的国家之一。我向总统提出书面报告，表示赞成采取“低姿态，以便让拉美各国政府，也可能还包括一些欧洲国家政府，有时间宣布继续保持同智利的关系。”我异常乐观地提出，这样一种做法会“使任何指责我们与智利事变有牵连的说法无法成立，这种说法不仅对我国政府不利，而更重要的是对智利新政府不利。”但是我们建议戴维斯大使以稳妥的方式通过中间人向智利新当局表示，我们基本上是抱欢迎态度的。他们应当懂得，推迟正式承认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关于经援问题，决定由一个部际特别工作组负责估计智利会提出什么要求，并提出适当的处理方案。我们决定作为例行公事履行我们在阿连德执政期间所承担的提供军需物资的义务。至于特技飞行队问题，我们让智利政府去决定是否希望该队前往。（智利政府取消了此次访问。）海军演习被取消了，而且美国海军还奉命远离智利海岸线，甚至要远离智利领海。总参谋部的代表提出了颇有道理的反对意见，他说我们总不能每逢有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就放弃使用该国附近公海的权利。由于估计到在有人指摘美

国插手智利时需要进行驳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要求中央情报局把过去三年来它在智利的全部行动开列一份清单——如果智利政变是我们所策划的，恐怕就不会给中央情报局布置这一任务了。有了这个清单，我们就能驳斥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并且也可以使我们自己确信，以往并没有未经批准就采取任何可能授人以柄的行动。中央情报局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行动。但尽管如此，也还是免不了遭到非议。

智利军政权与美国官员的第一次接触是在政变次日，即九月十二日。当时皮诺切特将军主动提出同美国军援顾问团团长进行秘密会晤。^{*}我向尼克松汇报说，皮诺切特强调，“在他们策划起事之前，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同僚连一点风儿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他还说，他认为这样做才比较好。”军政权的根本愿望是恢复同美国的传统友好关系。智利需要粮食援助和缓付债务一年。我在报告中最后说：

对于承认智利的问题，皮诺切特表示谅解，而且也不着急。他主动表示，美国显然不应该第一个出来宣布打算同智利新政府继续保持关系。他还承认目前最好避免公开与我们靠得过紧。

我在九月十三日向尼克松报告，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已发表声明，支持军政府，最高法院院长也这样做了。九月十四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再次开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可以向智利新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援助而不致因该政权可能采取的镇压行动损害美国的形象。

在这次会议上没有作出什么具体决定。我顶住了当时的财政

^{*} 这个日期不可靠。我向总统汇报这次谈话情况的文件上标的日期是九月十九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比尔·乔登起草的文件初稿上是九月十二日。这两个日期相隔很久，除了由于我当时忙于出席参院确认我出任新职的听证会，我找不到任何别的理由予以解释。

部副部长威廉·西蒙的压力，他要求“利用这次政变来讨价还价”，以解决智利没收私人资产和偿还债务这两个问题。我争辩说，如果这样做，就可能使新政府被人们看作是多国公司经济利益的工具。

我们在整个九月份始终就这样举棋不定。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九月二十日的会议上，我们回避了智利要求美国提供一千顶头盔和两千枚夜战用照明弹的问题。但是却决定在九月二十四日宣布美国认为同智利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延续性”的关系——这就等于是承认了智利军政权。在此以前，巴西、阿根廷、秘鲁、墨西哥、法国和瑞士都已表示了某种形式的承认。我们就这样用拖延的办法实现了不打头阵的方针。可能也是这种对本身利益的考虑，帮助我们制定了一项对头的政策。当时也没有人真想在确认我为国务卿的时候跟我为难。

对于智利的经援要求，我们的反应也同样是举棋不定。我们授权戴维森大使向智利政府表示，我们愿意提供紧急食品和药品援助，并且愿意同他们商谈中、长期的经援需要。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决定，可应智利政府要求派出工作组，对智利这方面的需要进行估计。

在这段时间里，智利军政府不断加强控制。它于九月二十一日宣布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非法，同时宣布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暂停活动。”九月二十五日，它取缔了亲阿连德的中央劳工联盟，解除了所有市长和市参议员的职务，不久又以军代表取代大学校长控制了各大学。

九月二十七日，智利军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请求援助，以挽救智利于“破产的边缘。”军政府保证要“创造条件，形成外援得以发挥效益的环境。”九月二十八日，新任外长海军少将伊斯梅尔·韦尔塔宣布智利愿意恢复谈判，协商对收归国

有的美国铜矿公司在智利的财产给予赔偿的问题。新政府撤销了管理粮食和管制物价的机构，此外还保证把阿连德统治时期非法没收的土地归还原主。智利货币埃斯库多贬值百分之一百四十三。

我们继续在走钢丝。一方面我们确信智利国内事态的发展从地缘政治上说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如果我们对智利态度过热，则可能会使自己在国内同国会多数派*的关系不好处，因为他们一贯对保守的外国政府持怀疑态度，我们尽力在这两者之间搞平衡。在公开场合，我们同智利军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私下则同意了他们的若干要求。我在十月一日对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说：

在对待智利新政府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不要给人以要同智利划清界线的印象，从而助长反对他们的声势；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采取为圣地亚哥当局的所作所为辩护的立场。

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在次日决定，不应以尚未全面承认该政府为由不邀请来纽约出席联大的智利外长韦尔塔参加国务卿为拉美各国代表团团长举行的午餐会，应该按正常的礼宾待遇安排他的座次。我还同意在韦尔塔在美逗留期间同他会晤。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处理，竟然都需要作出正式决定，这是那个时期的气氛的一种反映。当时只要有一个国家的激进政府被国内人民推翻，就几乎必然要归罪于美国的恶劣影响。

我们两人是在十月十一日会晤的。韦尔塔是一位彬彬有礼但缺乏外交经验的海军军官，他不知究竟该怎样对付我们这个奇怪的国家才好，因为美国的新闻界和国会对圣地亚哥的友好政府采取越来越敌视的态度，而早先他们对智利前一届马克思主义政府

* 当时民主党在美国国会中占多数。——译者

基本上采取了熟视无睹、甚至还稍带同情的态度，尽管那一届智利政府非常明确地要在整个西半球煽起反美的激进主义。韦尔塔确信智利军人把国家从一个极权政府统治下拯救了出来，从而也使美国少了一个敌人——他的这两个判断都是正确的。当时我向他表示，如果智利在国内实行残酷镇压，就会大大有损于它的国际形象。他的回答是，他的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国内局势”。我着重指出，我们认为新政府基本上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如果军政权采取可能削弱其国际地位的行动，我就会毫无顾虑地提请他注意——我以这种很婉转的方式提出了人权问题。

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表明，援助智利新政府是有重大障碍的。当然，随着智利没收财产问题的解决和紧缩开支计划的开始实施，美国私人银行对智利的贷款大幅度上升了。但是处于越南战争以后和水门事件期间的美国国会，对军人政府抱有强烈的反感，因此搞政府间援助的困难很大。由商品信贷公司向智利提供了两千四百万美元的贷款，替代政变当天就在公海上掉头运回国内的东欧和苏联的粮食援助。（这生动地证明了苏联的援助计划是带有政治动机的。）美国农业部在十一月中旬向智利追加了一笔两千八百万美元的贷款。此外我们主要依靠 PL-480 号粮食方案作为满足智利需要的渠道。由于粮食援助是用来帮助挨饿的人，同时美国政府在提供这一援助方面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便宜行事，因此国内在粮食援助问题上争议较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对于早先同阿连德政府达成的军需供应协议，尼克松政府执行起来也都很不痛快，唯恐会使国会哗然而影响到整个援外计划。因此，向智利提供三艘驱逐舰——这是早先答应阿连德的！——的时间推迟了好几个星期，直到国会通过了援外法案以后才交货。

智利经济代表团于十二月十二日抵达华盛顿，国务院和财政

部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宣布同智利签订了延期偿付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期间智利应还债务的协定（总额为一亿二千四百万美元）。智利开始按新的时间表还债。它重申保证履行一九七二年四月债权国协议中的各项规定，特别是准备同各有关公司协商对国有化的财产给予公平合理的赔偿的问题。重新安排智利在一九七三和七四两年中应还债务的偿付期限问题，拟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举行的巴黎俱乐部会议上讨论。

所有这些活动倒使得根本问题不那么惹人注意了：美国究竟该怎样使自己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同对人权问题的关切协调起来？如果否认阿连德的垮台使我们感到宽慰，那是毫无意义的。不管智利新政府有什么缺点，它绝不会象上届政府那样在一切国际讲坛上反对我们的利益。它也绝不会成为一个避风港，窝藏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让他们威胁要强化智利的极权主义并颠覆附近的西半球各国政府。我们无法使自己相信，拆新政府的台会有利于人权事业或美国本身的安全。但是，我们在阿连德统治时期保过的那些反对党和报社现在却又受到了军政权的镇压，对此我们是不能熟视无睹的。智利有着悠久的民主传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搞独裁统治特别令人遗憾——不过造成独裁统治的情况也是很特殊的。

不幸，在美国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正是再糟糕也没有了。当时正值越战方息、水门事件期间，因此如果主张我们必须争取做到凭良心办外交——我们能够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那必然是很得人心的。当时有一种不愿正视在现实生活中必须进行严峻的策略抉择的情绪。由于美国在历史上就有反对搞平衡的倾向，就更加助长了这种情绪。通过大张旗鼓提倡道德的形式来否定强权政治，这在美国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加上水门事件正闹得乌烟瘴气，更使人多少会相信政府不注重道德。

智利问题就这样同美国国内的一场争论搅在一起，这场争论超过了智利问题本身的范围。智利问题不得不要受到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的极大影响。尼克松政府并不象批评我们的人所说的那样，对智利军政权的那些很不策略的、有时又是很残酷的作法无动于衷。但是我们认为智利政府的更迭总的来说还是对我们有利的——即使是从人权问题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准备给智利军人领袖一个机会。我们多次私下同他们接触，要求他们把统治的方法改得温和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坚持搞静悄悄的外交削弱了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尽管这样做有许多次对智利是很奏效的。同样不容置疑的是，事过境迁之后，许多批评我们的人竟然看不到当年阿连德政府的极权主义性质，也看不到他同古巴和苏联结盟的危险了。他们无中生有，硬说阿连德的倒台有我们插手。他们这样做，就好像现在应当举国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就是推翻智利军人政权。

阿连德在世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他无能、腐化和破坏民主程序。现在他死了才不过几个星期，公众舆论就不再谈论这些问题了。有人一再把他称作“民主选举的领袖”，却只字不提他根本没有得到多数票的授权便强行按照自己意图实施改革，不提他的反民主政策一旦得逞就意味着智利宪制的毁灭，也不提他对美国采取恶意的敌视态度。

智利各民主党派在军政权统治下处于新的困境。这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我们大家忘记了过去的事情。智利国内不断逮捕和扣押平民，令人十分苦恼，对我们来说尤其如此。尽管我们知道有几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圣地亚哥的国家体育场里，却不允许我们使馆的官员同他们接触。据报告，还有一些美国人失踪了，有一些人丧了命。据非官方估计，投入监狱的人总数在三千五百到两万人之间，给犯人上刑的情况时有传闻。人们得到的印象是，所有的

犯人全是滥捕的。至于阿连德及其同伙把成千上万的外国革命者弄到国内并把他们武装起来的事倒无人提及了。

智利军政府于九月二十二日证实，前阿连德政府的高级官员关押在达松岛海军基地监狱中。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也已被捕，这个消息一透露，立即引起国际上各方面为他向智利军政府施加压力。后来，甚至连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也应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要求为科尔巴兰请命。这倒并非表明瓦尔德海姆同情共产党，而只是说明联合国领导集团采取了双重是非标准。后来伊朗革命发生后，尽管有比这多得多的人受害，而且他们所受到的待遇也恶劣得多，但是却没有人这样出来为他们请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年以后，还是由美国出面使科尔巴兰获释，以交换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布科夫斯基。

九月二十六日，在美国宣布认为与智利的的外交关系是“延续性”的之后两天，智利释放了政变期间逮捕的六名美国公民。其中二人在两天以后出席了由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难民问题小组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介绍了他们耳闻而未目睹的在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处决几百名犯人的情况。肯尼迪参议员对尼克松政府的“缄默政策”深表遗憾。他在十月二日提出援外法案修正案时说，国会的意思是总统应该下令中止对智利的援助，人道主义的援助除外，“直到他看到智利政府遵照《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对所有人——包括智利本国人和在智利的外国人——的人权都予以保护时为止。”

国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最后通过的援外法案并没有包括这一条，而是请尼克松要求智利政府尊重人权。参议员肯尼迪于一九七四年再次争取中止对智利的援助。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的一九七五年援外法案要求停止美国对智利的一切军事援助，“除非总统向国会报告智利在尊重人权方面有了根本的改

进。”到一九七六年，对智利的援助实实在在地全部停止了——以前对阿连德却从来没有采取过这种措施。

当时智利军政权正面临近乎内战的局面，同时又受到非同寻常的苛求。它采用独裁手段的时间恐怕是太长了些，可是也总还是有这么两个问题：难道美国有责任要单单把智利挑出来如此进行折磨吗？这些折磨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对阿连德所采取过的任何措施。这里面难道没有一个双重标准问题吗？在整个七十年代始终存在这种按双重标准行事的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没有哪一个激进的革命，不管它是多么残酷——我们想到的有古巴、伊拉克、阿尔及利亚、许多非洲国家、越南占领印度支那、霍梅尼的伊朗——曾经象圣地亚哥这帮愣头愣脑的独裁者那样受到各国报界的攻击，那样激起全世界的公愤。他们之所以有罪，究竟是在于他们所使用的统治手段呢，还是在于他的政治态度划分起来属于右派？它的罪恶究竟是在于不给公民自由权利，还是在于它拒绝左派的拥抱？据说象尼加拉瓜那样的左翼政府，可以用提供经济援助的办法使其变得温和，而智利这样的保守政府却非得用孤立歧视的办法来加以改造——这种主张为什么到处都吃得开呢？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在九月十三日就断绝了对智利的援助，这时政变还刚发生不到四十八小时，根本还不可能搞清楚它的含义。瑞典政府有没有如此干脆地反对过，甚至究竟有没有反对过那些左翼的暴君呢？事实上，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及战后，瑞典政府一直毫不吝惜地向河内提供援助。

我并不是想为智利军政权的所有行动开脱，我认为其中的一些做法是没有必要的、很不得当的、残暴的。我也并不怀疑有许多人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而批评智利军政权的。但是要知道，智利军政权所接过来的是一个动乱的局面，其中政府提倡暴力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切实对这些问题进行严肃的分析。

当时我们在国内日子很难过，甚至连提出这些问题都不可能。我们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违心地采取孤立智利的做法。正象杰克逊修正案中提出的，我们确信如果采用我们所主张的办法，本来是可以使局势更快地得到缓和，而又不至于冒风险迫使智利军政权走上反美民族主义的道路，或者把军政权搞垮，让极权主义的左派起来取而代之的。

由于发生了一些更为紧迫的事件——其中最主要的是中东战争——智利就变成了一个次要问题。智利军政权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美国国会不断对智利增加限制。一九七六年六月，我赴圣地亚哥出席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就人权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智利的人权情况确有好转，但是还不能令人满意；同激进的左翼政权相比，智利的情况要好得多，可是那些左翼政权却没有受到指责。全世界都赶时髦，声讨智利军政权——还声讨美国。至于说造成智利宪制崩溃的原因是阿连德的野心和无能，而并不是美帝国主义，也不是智利将军们的权欲——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则对不起，已经统统忘在脑后了。根据左派那一套神妙的理论，非得把阿连德的垮台说成是别人暗算的结果才行。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对于美国的公众舆论还是对于美国的决策者来说，智利问题慢慢就不再那么重要了。智利的历史、情况的发展和智利人民的精神将决定智利未来的体制，从而也决定美国同智利的关系。

① 美国国会参议院研究政府情报活动方面工作的小型特别委员会：《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三年在智利的秘密活动》（第九十四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内部报告，一九七五年版），第二页、第二十八页。

② 见《白宫岁月》第六五四——六五五页。

③ 罗吉斯·德布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连德的谈话》（纽约：万神殿图书公司

兰多姆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第一一九页、第一一八页、第八十二页。

④ 见《白宫岁月》第十六章。

⑤ 同上，第十七章。

⑥ 纳撒尼尔·戴维斯著：《一九七一年至七三年美国在智利的秘密活动》，载于《驻外人员通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号和十二月号。此处引文摘自十二月号该文第十一页。

⑦ 戴维斯著：《美国在智利的秘密活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第十二至十三页；威廉·科尔比和彼得·福巴斯著：《可敬的人：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生活》（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三七九—三八二页。

⑧ 戴维斯著：《美国在智利的秘密活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第十一页。

⑨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纽约时报》。

⑩ 保罗·E·西格蒙德著：《阿连德的倒台和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六年的智利政局》（美国匹兹堡市：匹兹堡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第一七一页。

⑪ 同上，第一八六页。

⑫ 见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三年在智利的秘密活动》，第三十一页。

⑬ 西格蒙德著：《阿连德的倒台和智利政局》，第二一五页。

⑭ 一九七三年九月八日我同纳撒尼尔·戴维斯大使谈话中有关智利部分如下：
基辛格：请给我讲讲智利目前的情况。

戴维斯：哦，我肯定没有使情况好转起来。经济在继续走下坡路；各派政治力量继续两极分化，海、陆、空三军内部都曾出现过危机，结果三个军种内部的反阿连德势力都增强了。你知道，普拉茨将军已经辞职了。

基辛格：他为什么辞职呢？

戴维斯：哦，一方面是由于普拉茨手下军官的夫人们，包括许多将军的夫人们都要求他辞职。另一方面是由于普拉茨顺从政府中的阿连德势力，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们的工具。

基辛格：会发生政变吗？

戴维斯：在智利什么事情都说不准。但目前形势有利于搞政变，尽管我无法估计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基辛格：我想我们不要介入。

戴维斯：是的。我严令全体馆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卷入。

基辛格：智利人征求我们的意见吗？

戴维斯：是的。有时他们偷偷跑来问我们对局势的看法。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严令馆员绝对不得与人谈论这个问题。

基辛格：阿连德能坚持到任期届满吗？

戴维斯：他干满任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小。

基辛格：噢，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智利有没有过总统辞职的事情？

戴维斯：有过。一八九一年有过一回，确实当时的情况同目前有点相似。

基辛格：那么，如果阿连德辞职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搞新的选举？

戴维斯：如果他辞职，就由参议院主席当国家元首，那就是弗雷了。但是我想你还是别指望会出现这种情形。如果军队接管的话，我十分怀疑他们会愿意急忙交出政权。

基辛格：这么一来智利就要走巴西的道路了？

戴维斯：是的，或者是秘鲁的道路。

基辛格：军政权会是什么样子？像秘鲁那样，还是巴西那样？

戴维斯：它会是十分亲美的，我们同智利军方的关系很好。但是智利有了一段激进的历史，因此军方不会想让人家觉得他们急于摆脱这段历史而恢复过去的保守状态。

基辛格：对。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智利不会成为拉美革命活动的中心，是吗？

戴维斯：是的，不会。

基辛格：我们在智利应当怎么办？

戴维斯：现在局势发展得很快。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要陷进去，我们应该让智利人去决定自己的前途。

基辛格：你估计阿连德被推翻的可能性有多大？

戴维斯：我觉得阿连德能一直干到一九七六年任期届满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我认为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军人进入政府、但起到实际管理政府作用的可能性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据我看，智利变成古巴那样局面的可能性按百分比算起来是微乎其微的。

基辛格：哦。万一智利竟然变成古巴那样的局面，它会是由什么样的因素逐步造成的呢？

戴维斯：如果军方不够沉着果断的话，就会逐步造成那种局面。话要说回来，过去有过智利军人不够沉着果断的情况。

基辛格：警方的情形怎样？

戴维斯：近来他们同军人的观点越来越接近了。可是他们的头头还是不想介入。

⑮ 西格蒙德在《阿连德的倒台和智利政局》一书的第四——五页，第二四四——二四七页对各种互相矛盾的说法进行了分析，他的结论是“根据种种迹象看来显然是自杀。”

⑯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同马德里《ABC》报记者的谈话，载《一九七三年归档备查材料年鉴》，第三十三卷，第八七二页。

第十章

担任国务卿

行政机构的危机

尼克松在水门之难中比较难以忍受的一个痛苦是我作为外交政策的头面人物出现。理查德·尼克松最大的愿望是作为和平缔造者名垂史册。他组织的政府使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视为外交政策的源泉。为此，他坚持对外主动采取的一切重大行动必须由白宫发起。他不留情面，有时带侮辱性地排斥国务院和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使其无法参与重大决策。^①我充当了他的主要工具，因为我似乎极其适合于在幕后起作用。我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缺乏政治基础，又是后来入籍的公民，说话带口音，因而被认为在公众面前没有吸引力。不管怎样，由于我是总统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白宫可以控制我与新闻界的接触。

起初，事情正如尼克松所设想的那样发展。我的办公室掌握了制定政策的过程，有几次敏感性很强的谈判都是委派我去进行的。后来有人说，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复杂的部际机构是为了使官僚机构*忙于事务，而我国对外关系的真正业务是通过我的办公室处理的。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我们既非那样卓有远见，也

* 指国务院。——译者

没有那样搞邪门歪道。这个部际机构负责处理现实问题。机构的设置是为了在政府内部集思广益，并确定向总统提供政策选择的范围。最后的决定往往是由尼克松一人或与我商议之后作出的。虽然官僚机构并未直接参加决策，但是似乎有点矛盾的是，它在决策的过程中却起了重大作用，因为它所提供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依据。

起初，我的办公室还按照尼克松的意愿不露锋芒地进行工作。我与新闻界打交道无不是应尼克松的要求去做的。我偶而向报界吹风时，经常结合总统的重要讲话或行动来谈，并且总是以提供“背景情况”的方式进行——这是一条规定，吹风者只能以“白宫高级官员”的名义出现。我当时很有影响，但声望不很高。

有三件事使我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我一九七一年七月秘密访华，一九七二年一月与越南进行秘密谈判，这两件事的披露迎合了美国人好冒险的精神，并且也许正投合美国人民的心理，即使在全国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仍渴望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华盛顿邮报》促使一名政界人士加快登上了舞台，这家报纸拒不尊重有关提供背景材料的规定（这一规定一度很严格，该报后来摆脱了这种束缚），这家报纸坚持要指名姓地称我为官方发言人，即使我举行背景吹风会，他们也这样做。一九七二年十月，我首次在电视实况转播节目中介绍了在越南和平谈判中取得突破的情况，广大的观众亲眼目睹我披露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十年的痛苦正趋于结束。

就这样，我在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之初，出乎意料地——而且实际上违反尼克松的意愿——竟然成为一位政界要人。尼克松从来也不想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务卿，他未曾料到最终却找到了一位身后有一批人追随的国家安全顾问。在通常情况下，我新树起来的名声几乎肯定会使我很快离开政府，因为一般的总统都不会容

忍这种状况，更不用提像尼克松那样十分计较自己在公众面前形象的总统了。在一九七二年整整一年内，总统和霍尔德曼抓住一切机会，让我尽量少出头露面；在我卷入争议时，与我划清界限；并表明我有赖于总统的恩情。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这是一九七三年底在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之初毅然下决心辞职的原因之一。

水门事件使这一切发生了变化。行政权威既然已开始受到侵蚀，我如果辞职会增加困难，使人们加深他们所得到的混乱不堪的印象。在极需人手稳住国家的巨舟时，离职将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况且白宫也没有施加压力要我辞职。事实上，尼克松和我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改善。尼克松不再使我处于惶惑不安的状态了，他原先曾认为必须那样才能使我懂得分寸。^②这一计谋是通过对我搞小动作来实现的，但尼克松本人从来不愿亲自卷进去。亚历山大·黑格担任白宫办公室主任后，尼克松的下属人员中没有人甘愿在这件事上为他效劳。尼克松自己也没有精力和胆量玩弄那些往常使他感到其乐无穷的小花招了。以往他常利用，甚至在必要时制造我和罗杰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我们俩不得不请求他或霍尔德曼给予支持。尼克松那时花在外交政策上的精力也日益减少。他几乎总是漫不经心地签署备忘录和接受我的建议，不像第一个任期内那样仔细地在文件上划道道，或在页边写上批语，表明他曾悉心阅读过我上送的文件。他也不再同我进行长时间很费神的、有时甚至是烦人的谈话了，而以往他常用这种谈话方式来澄清他头脑中存在的问题。在料理国事时，他越来越缺乏过去那种尖锐泼辣，甚至偶而专心一致、如痴若狂的工作精神。在正常的情况下，他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对问题作出决断，并磨炼自己采取独特的勇敢行动。

因而我的地位既是空前地强大，又是空前地岌岌可危。一方

面，白宫内没有一个人会为赢得一位精力分散、声名狼藉的总统的青睐而同我竞争。高级助手们，不再竞相去讨得总统的欢心，相反却极力与总统保持最大的距离。但另一方面，任何人要在白宫掌握残余势力都不太现实；白宫越来越容易遭到长期来忍辱负重的官僚机构以及国会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对我的名声日振完全一反常态，不再因公众对我十分注意而流露不满（虽然他必定感到忿忿不平）。他出自政治上的考虑，对此表示欢迎，以便加强自己的论点，说明水门事件只是在实现一项“宏伟计划”过程中的一次微不足道的越轨行动。可是，尼克松的地位已下降到动辄得咎的地步。尼克松越是强调他的外交政策成就，就越使批评他的人将大部分功劳归诸于我。最后，尼克松无奈只好同意说是我起了主要作用，虽然这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而且对他是十分不公正的。

我发现自己处于异常特殊的地位。我是经总统任命的总统班子里的成员，并未经参议院确认。我完全依赖于总统的信任而成了总统的一位代理人。在对政府展开大规模攻击的批评者中，大多数人看来是愿意使我从日趋强烈的深仇积怨的情绪中脱身出来，乃至保护我，似乎意在保全一位能表明这个国家具有连续性的政界要人。这无疑激起了我的虚荣心。但是我的主导情绪还是预感到灾难就要来临。权力被如此大幅度地削弱，迟早会导致外交政策的重大挫折。我竭力装出一副不受外界干扰、十分自信的样子，但心中不抱任何幻想。这样做只能推迟、而无法防止国家肌体必然遭到侵蚀。

经验丰富的尼克松不可能看不到危及我国外交政策的局面。他尽力保护我，使我免食由于他的行为而带来的苦果。按照默契，我不参加白宫内圈人士关于水门事件的讨论。尼克松和黑格尽最大可能将外交政策与丑闻分开。对于那些可能影响我们外交行动

的爆炸性的事态发展，黑格经常预先向我简单打个招呼。但一般说来，我并不参加有关水门事件战略或策略的讨论。每当总统准备在水门问题的讲话中提到对外政策时，总是先让我提意见。

正如我已述及，我总的看法是，尼克松唯一的希望是将一切和盘托出。我曾不断向伦·加门特说明我的看法，并且一有机会就对艾尔·黑格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制止浪潮般的冲击。只有这样，政府才能重新行使其职能。加门特和黑格原则上都同意我的看法，但他们都无力将其付诸实践。他们俩对引起这场灾难的来龙去脉并不了解。白宫中除龙·齐格勒之外，所有主要助手都已离职，因此白宫内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个机构的往事。当时尼克松本人对围绕水门事件所进行的活动，已经没有明确的看法了，如果说他曾经有过的话。根据他谈话的方式，他确实难以把自己郑重其事的命令同他信口开河、并不期待别人照办的话区分开来。他的沃尔特·米蒂*式的脾性使他视逃避为现实，给自己的如意算盘加上真实的标签。

一九七三年夏，白宫就水门事件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一些声明。这些声明几乎总是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只能使全国公众渴望进一步公布真相。尼克松答应在八月中旬作一次全面的讲话。他曾非正式地考虑过在发表这次讲话的同时，请求结束各种质询，免得愈益危及外交政策。这种论点抽象地说来是站得住脚的；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只会将外交政策搞乱，而毫不减轻对尼克松的压力。因为在这个阶段，无法制止质询，国会、新闻界和公众不会允许这样做。我请求黑格、加门特和尼克松的水门问题特别顾问查尔斯·艾伦·莱特不要将外交政策与水门事件联系在一起。他们都同

* 美国现代幽默作家詹姆斯·瑟尔布尔（James G. Thurber 一八九四——一九六一）笔下的一个典型人物。此人无多大能力，但爱想入非非。该作家以深刻的人物心理描写著称。——译者

意。最后尼克松接受了我们一致的忠告，没有表示任何异议。按照尼克松的价值观念，纵然他个人的痛苦到达了顶点，美国的国际地位却仍然处于他个人的祸福之上。

尼克松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五日发表了讲话，它同总统以前进行的所有“解释”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讲得太简单、太迟了。这次讲话重复了总统四月三十日讲话的内容：由于三月二十一日以后下令调查，尼克松在那天很晚的时候才了解到错综复杂的渎职行为。他像以前一样，感到十分矛盾，既想讨好于下属，又要避免得罪他们，否则，他们会翻脸攻击他。这次讲话对已经披露的调查结果既没有补充事实，也没有进行说明。讲话回避了是否应向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提供录音带的问题。正如预料，新闻界和国会的反应，从敌对到愤怒乃至无动于衷，什么都有。八月十五日讲话没有达到其主要目的，既未激发人们的同情，又未取得人们的谅解。

简而言之，及至八月，尼克松通过几位总统助理来管理国家的工作方式已经行不通了。总统助理的权力必须来自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必要时，应是铁面无私的总统。如果总统想依靠他的助理，他必须给予他们明确而果断的支持。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致预算署署长约瑟夫·道奇的信中写道：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你必须充当我的具有权威性的代理人。当然，每个部长也都可以直接同我联系，但是我认为十分重要的是，如果有人就你作出的决定向我上告，你当时必须在场。更重要的是，你和我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应当绝对持相同的观点，以使上告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③

归根结蒂，这意味着总统助理不再受到挑战；他理所当然地代表总统说话。（由此出现了总统助理采取武断行动的真正危险；此后，他究竟是确实反映了总统的意愿，抑或打着总统的名义自行其是，就很难受到检验了。）

一九七一年底的基本状况就是如此。我有同总统会面的独特机会，发给驻外使节的重要政策性的指示电都经我的办公室审批。这一切使罗杰斯国务卿的处境十分尴尬。如果他批发了一份电报或文件，那么在这份文电送交白宫之后，他可能会在下级众目睽睽之下，眼看着自己作出的判断被否定掉。如果他等到我发表意见之后再批文电，那么他要末光盖个橡皮图章，要末对于他明知总统已经批准的东西硬是表示不同意。（而如果总统助理很明智，或者熟稔官场的那一套，那他对有争议的问题，都会先与总统商量。）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过从甚密，经常交换意见，这个问题本来可以避免，从而也避免了对抗，就像后来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我那样。可是就罗杰斯和我来说，国务卿和安全事务助理之间的冲突几乎在设这两个职务时就已根深蒂固了。

尼克松一向不信任国务院，认为国务院内是一伙遗留下来的头脑糊涂的民主党自由派。此外，我至今仍认为，尼克松这次想与他的故交兼良师益友比尔·罗杰斯建立一种以他为主的主从关系，而在他自己倒霉的时期（例如他身陷危机，导致他作“切克尔斯”演说*，以及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期间），经常求助于罗杰斯。尼克松似乎急于证明，在有些方面他更内行些。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外交，而罗杰斯则是个杰出的律师，搞外交是生手。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便成为一个有用的、并且经常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免受尼克松耍弄之苦，他常玩弄复杂的、有时是迂回曲折的花招。身为总统而蓄意挑动下属相互角逐的，尼克

* 一九五二年九月间尼克松竞选副总统候选人时，有人指责他接受过“秘密”政治资金。尼克松为此发表电视广播演说进行反驳。演说中提到，他确实接受过一种礼品，那是一只名叫“切克尔斯”的小猎狗。后来人们就把这篇著名演说称之为“切克尔斯”演说。——译者

松决不是第一个。他虽然自称厌恶这类事情，但只要发生纠纷，而且不必由他亲自出面去裁决，他就要挑动。而霍尔德曼、米歇尔，有时还有埃利希曼，都随时准备着控制火势，但并不将火熄灭。

不管是尼克松有意策划的，还是觉察到以后而听之任之——很可能是两者兼有——罗杰斯和我之间的关系已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起初我们照例表明我们将不重蹈前几届政府内部发生摩擦的覆辙，但不久我们之间就不和了。我为自己有高超的学问而过于骄傲自信，罗杰斯则过于强调他的官僚特权，因而两人都不能做到豁达大度，使双方都摆脱旧的羁绊；更重要的是，都不能更好地为国效劳。

在尼克松第二任期之初，双方的关系已定了型。罗杰斯和我之间没有社交接触，在处理公事时，我们互相都公事公办，但都不主动。我是个赫赫有名的总统顾问；罗杰斯则控制着执行美国大部分外交政策的机构。局面越来越僵；我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罗杰斯被告知，有人将于一九七三年夏接替他的工作。但是，他也许认为他的上司会象以前几次那样，到最后时刻收回意见，也许觉得他的即将离任可使他从以前的羁绊中解脱出来。

不管怎样，罗杰斯向白宫赖以取得控制权的审批制度发动了攻击。举例来说，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国务院就决定与古巴就劫持飞机问题进行谈判。无论与古巴谈判什么问题，显然都有深刻的外交政策的含义，特别是总统对这个问题如此神经质地敏感。然而，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白宫得到通知说，国务卿已授权于下星期一上午开始谈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三十六个小时的时间去考虑一项重大政策行动，并且向其挑战，看他们是否敢否决一场已经定了日期的谈判。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是：要求白宫批准的指示文件，周末到官僚机构内部周转一圈还需要三十

六个小时。因此，审批手续本身也还可能碰到短路。同样，在白宫已下令对印度采取冷淡态度之后，国务院根本没有经白宫批准，就对印度伸出的有关改善关系的触角，作出了热情洋溢的公开反应。我还叙述过国务院一九七三年一月底对埃及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件事白宫是一无所知的。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由于水门事件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总统的支持之前。水门事件的发生不容置疑地表明，现有的体制已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一九七三年春某个时候，担任过短时间总统顾问的梅尔文·莱尔德告诉我，我作为总统助理的职务不能维持很久了。我将被国会和日益武断的官僚机构压挤得透不过气来。我必须作出决定，或者担任国务卿，或者辞职。（我不知道莱尔德是否也向尼克松谈过这件事，纵然谈过，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不久之后，艾尔·黑格告诉我，他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果我想继续起有效的作用，我就必须离开白宫，去接管国务院的工作。他说，他将向尼克松提出这个问题，但他知道要说服尼克松不大容易，要进行痛苦的、并且可能是长时期的交谈。

我并没有去追求担任内阁职务。鲍勃·霍尔曼在一本书中正确地描述了我一九七二年底的态度，并对我作了许多直言不讳的评论：尼克松的总统职权尚未受到损害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职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尼克松无意将我调至国务院。^④我也不相信尼克松会任命约翰·康纳利担任国务卿，除非是正如他声称的那样，怕失去我。尼克松知道，不管谁担任国务卿，一九七三年底我无论如何是要离职的。在总统正常执政的情况下，象康纳利这样政治上有权势的人物，在如何执行外交政策的问题上同尼克松的看法会截然不同。^⑤如果不发生水门事件，曾对达成一九七一年柏林协议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当时的副国务卿肯尼思·拉什会在一九七三年夏天被任命为国务卿，而我则会在数月之后离开白宫。

及至一九七三年夏，所有这些计划都已行不通了。水门事件一发生，我作为一名总统的工作人员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尼克松对罗杰斯—基辛格之争已感到厌烦，并已原则上决定要罗杰斯离职，而拉什因为太不知名不可能得到提升。如果尼克松当时坚持原计划任命肯尼思·拉什的话，我也准备继续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我从未改变过水门问题在全国被揭露时我所宣布的态度；只要危机继续存在，我将无条件地忠于职守。

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出现了黑格所预料的全部烦恼：要尼克松考虑，将主要内阁职务交给他的政敌正在吹捧的一个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总统看上去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这对他来说，必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有赞成任命我当国务卿的论据同时也强调了这样做对尼克松的总统职位将造成致命的威胁。因此，尼克松听了黑格的建议之后，默不作声，既不接受，也不拒绝。据黑格说，尼克松只是注意听了，但未加评论。他从未向我提起过此事，哪怕是很简单的也没有提过。这对大家都是沉重的负担，总统不甘心承认自己地位脆弱；黑格由于提出这个问题，冒着失去总统欢心的风险；而只要尼克松保持沉默，我就处于几乎度日如年的境地。

华盛顿最怕出现真空。七月中旬，我的政敌加快作出了当时我的朋友们尚未能提出来的决定。正当罗杰斯在远东访问期间，丹·拉瑟七月十三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里广播说，正在考虑由我来接替罗杰斯的工作。其他评论员不久也报道了这则消息。这时白宫的反应将提供关键性的线索。

华盛顿象一座罗马竞技场。斗士们在场内格斗，观众就如同在罗马圆形剧场里一样，通过发出适当的信号来决定斗士的生死存亡。美国国内其他各地很少有人注意到，向新闻界泄露消息对华盛顿来说，正是表明权势所在的一种提示。一旦出现争论，结果

如何多半取决于有权势的人士支持哪一方。这不一定是真理在起作用，而往往反映了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泄露的消息纵然并不确切，只要有权势的人不出来反驳，也照样可以树立或毁坏一个人的声誉。特别微妙的一种情况是，本来可以出来驳斥虚构的消息的人却籍口不语，任其流传，直至消息传遍新闻界时才予以否认。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受害者几乎照样受害，消息来源的声誉却得到了保护。

新闻记者既是不偏不倚地传播消息，又充当了裁决者的角色，他们根据“保护消息来源”的原则，庇护证人，而且经常对有争议的不同说法任意加以渲染，从而判定争论的结果。因而新闻界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人民“有权了解情况”——但只能了解到新闻界愿意告知公众的情况。在官场的内部争斗中，隐瞒泄露消息者的姓名往往就掩盖了最重要的那部分事实。新闻记者也许可以努力争取做到客观报道，他的竞争对手也可能出于某种动机而推翻他的报道，而泄露消息者却经常可以编出一套戏剧性的情节，根据受害者和权势经纪人的反应来规定事情发展的势头。正如某些“调查性”的报道文章那样，在新闻工作者抢登内幕新闻的兴趣和消息来源的自身利益一致时，纵然内中存在着严肃的道德问题，似乎极少有人会对消息来源的动机表示担心。要确定究竟是谁在利用谁，是困难的。

在任命我当国务卿这件事情上，消息报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旋即无声无息了。尼克松对此事无疑感到进退维谷，然而他依然噤若寒蝉。他感情上极不愿意我晋升，而他的理智却断定这是不可避免的事。黑格使白宫的表态不置可否。我在新闻界面前矢口否认同总统讨论过这件事。这是事实，但仅说明了部分事实。当时在东京的国务卿一行当然将这则消息的泄露归咎于我。丹·拉瑟——后来我同他有分歧意见——不愿告诉我他的消息来

源，但慨然向我证实，他是从一心想破坏这一前景的政敌那里获悉这条消息的。这些政敌看来已计尽才穷。国务卿在东京的随行人员很快认识到这种进行非难的伎俩已无济于事，继续渲染报道只会更突出罗杰斯的虚弱地位。支持他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说话；参议员中没有人出来支持；白宫没有人否认这条消息。泄露新闻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

八月初，黑格告诉我——到那时为止，尼克松对我仍只字未提——尼克松已同意任命我接替罗杰斯，只要不是由他亲自出面去罢免罗杰斯。因此，黑格于八月八日拜访了国务卿，建议他辞职。罗杰斯自始至终表现出非凡的力量、尊严和镇静自若的态度，他实际上把黑格逐出了他的办公室。罗杰斯说，如果尼克松要他辞职，必须由尼克松亲自向他提出来。他不能向一位中间人交出高级内阁职务。凡熟知尼克松惧怕发生个人冲突的人都清楚，罗杰斯的这一要求将使这件事再一次、并且可能长期地拖延下去。

这时，捉摸不定的事态发展已令人日益难以忍受；也许这正是尼克松为了采取这一实质上使他十分反感的步骤而蓄意索取的代价。他什么也没有对黑格说；尼克松借口要准备关于水门事件的讲话稿躲到戴维营去了。同往常一样，他为了起草讲话稿，接连数日拒绝接电话，哪怕是经常性的有关外交政策业务的电话也不接。八月十六日，尼克松终于召见了罗杰斯，并请他辞职。他仅在几小时前告诉了黑格，根本没有通知我。罗杰斯没有使老朋友为难，对此大家都感到惊讶，尼克松顿时如释重负。罗杰斯未待尼克松开口，当即呈上一份辞职书，内中毫无责怪或争辩之词。他这一手干得很漂亮。

然而，尼克松对我依然守口如瓶。甚至在他拿到罗杰斯的辞呈之后，一连数天仍然没有找我谈话。虽然我已得知罗杰斯晋见之事，并且黑格已告诉我尼克松将在下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的

任命，但尼克松依旧保持缄默。直至八月二十一日傍晚，在宣布任命我为国务卿之前大约十八个小时，我才在圣克利门蒂听他说到此事。尼克松借口要研究一下次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问答，把我引到游泳池的一角。他仰卧在水面上，毫无热情，毫无期待今后要同我紧密合作的表示，就事论事地对我说，他将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宣布任命我为国务卿。要不是我当时那么受感动的话，我的回答是会具有讽刺意味的，但实际上我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希望不辜负你的信任。”我们两人都认识到，在尼克松看来，对我的任命与其说是一项选择，倒不如说是因为希望缓和这场灾祸而违背他自己的意愿所采取的一个步骤。

八月二十二日西部夏令时间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尼克松在一次室外举行的有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对我的任命，并简单地说“我认为基辛格博士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众所周知的。”他没有加以发挥。

等待参议院确认

在我被提名后的数小时内，我感到似乎停留在真空中。数周以来捉摸不定的事态使我思想有点麻木；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使我惊叹不已。三十五年前，我作为一名逃避迫害的亡命者来到美国。我曾在一家胡刷厂里做过工，在美国陆军中当过二等兵，后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当我还是一个在极权统治下饱尝排斥和仇视的少年时，美国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梦境。如今协助领导这个养育我的国家度过它历史上一场最严重的宪法危机，我感到十分激动，但又不无畏惧之感。

同时我又感到异乎寻常地轻松。丘吉尔在被任命为首相时曾说过，他感到精神上获得了解放，他终于将独自担负起责任来。我

的名声没有他大。我的感受也不如他那样明晰。但我心中确实感到十分平静，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信念将按其本身的价值站住脚或垮掉，不因与别人的抱负发生矛盾而蒙受宦海浮沉之苦。

祝贺的电话犹如瀑布一般向我奔泻而来。我尤为珍视那些历经磨砺的前辈的电话。例如，迪安·腊斯克，曾因在一场痛苦的战争中犯了站在总统一边的罪过而可贵地默然忍受着社会的排斥。他在电话里向我谈到，为数不多的前国务卿肩负着超脱党派分歧而相互支持的民族责任。还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当时有许多人先是竭力主张进行印支战争，后来却留下他一人独自处理这场战争，虽然他内心对这场战争满腹狐疑，但又为对总统和国家的责任感所驱使。他几乎被那些人毁了。在尼克松第一个任期期间，没有人比麦克纳马拉更从人情的角度给我以有力的支持，纵然他对我们为了国家荣誉认为必须采取的许多政策感到担忧。此外，还接到不少政府官员的电话，包括埃里奥特·理查森。他在担任副国务卿时曾是我强有力的伙伴，但在水门事件期间，他是怀着厌恶的心情执行司法部长职务的。

外交使团也表示了祝贺。同国务卿融洽相处毕竟是各国外交使节的主要任务——尽管我并不特别重视他们的祝贺，但我觉得，他们对我们官僚机构内部的纷争即将结束是抱欢迎态度的。也有一些使节无疑会将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的分歧视为有机可乘，并且巧妙地加以利用。但是人们往往过高估计外国人理解我们内部斗争的能力，更不用说利用我们内部斗争的能力了。对大多数外交官来说，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的斗争使我国已经过于复杂的政治程序又更为复杂化了。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国务院本身打来的祝贺电话。肯尼思·拉什心里一定清楚，要不是发生了水门事件，接受这些祝贺的人本来就可能是他。他必定认识到，由于任命了一个颇有主见并且可

能将自己的一帮顾问带进国务院的人当国务卿，他作为副国务卿所起的作用将会缩小。然而，这种情绪在他语气亲切的电话里并没有反映出来。他向我表示，在过渡阶段将予充分合作。我邀请他早日到圣克利门蒂会面。

威廉·罗杰斯在尼克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之前就从华盛顿打来电话。他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将竭尽全力使过渡工作顺利地进行。他说，“你会发现国务院是一个了不起的部门。”我对他说，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委以重任；我在他同僚的前途问题上，将尽最大的可能听取他的建议。我们相约今后经常在一起进行磋商。这是一次空洞的保证。既然我俩在任职时彼此互不信任，那么在罗杰斯辞职后，我们就未必能成为知己。事实上，自从那次谈话之后，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联系。

然而，我必须为比尔·罗杰斯说句公道话：正如他过去执行国务卿职务时保持着尊严一样，他离职时风格很高。他必然感到不满，这是情有可原的，但他没有流露出这种情绪来。并且自那以后，他的行为一直堪称模范。他没有搞当时很时髦的事后批评那一套，也没有同别人一起对我进行攻击，尽管他远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有正当的理由感到忿忿不平。他能心平气和地对待旨在表明他的影响并不大的各种说法——包括我的解释在内。他表示，对他来说，为国效劳本身就是一种奖赏。

我对罗杰斯在官场上失意的描述（描述这些是为了说明尼克松政府的弊端），不应该掩盖这样的事实。罗杰斯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判断力很强，但当时的处境和他本人的个性未能使他发挥更大的作用。罗杰斯主张和解的本能使他在公开对抗面前畏缩不前，而尼克松进行越南问题辩论时的特点正是公开对抗。在政府各委员会内部，罗杰斯在印支问题上纵然提不出其他战略性的抉择，但他往往反对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所有这一切使他在这个困

扰尼克松第一任期的问题上没有能施加什么影响。他的忠告一般说来是明智的；他的价值观念是人道的。他往往能正确地推测他所反对的行动在国内会产生什么后果。他的特殊才能表现在善于分析具体案例，而不是提出某种全局性的思想。对一些具体的计划，例如命途多蹇的一九七一年侵入老挝的计划，他的看法是十分尖锐的。他如果充当私人顾问，一定会起到忠诚助手的作用。鉴于他的秉性和所受的教育，他不会要求矛盾重重的官僚机构提出前后一致的战略思想，也不会为捍卫这个机构而去反对具有敌意的新闻界和国会。尼克松无疑就是凭借罗杰斯的这些缺陷来加强自己的统治权的。我确实也曾无情地利用过他的这些缺陷。但是任何事物也改变不了人们对比尔·罗杰斯最后的定论：他是一个正派的、判断力很强的人。但是总统和他的同事们的复杂心理和国内因意见分歧而引起的激烈情绪把他的这些品质都埋没了。

确认提名听证会

得意洋洋的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几天之内我就得面临参议院确认提名这一关。在水门事件的紧张气氛中，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我是多年来第一个在总统任职的中期被任命的国务卿（前一位这样的国务卿是克里斯琴·赫脱），我也是第一个在被视为现行政策的主要缔造者之后才任职的国务卿。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尽管取得了许多成就，可是甚至在水门事件之前就已经引起了很多争论。因此，确认对我提名的听证会就成了人们公开发泄压抑已久的牢骚的场合。同时也为大肆渲染任何涉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水门事件沾边的问题提供了机会，其中主要的是我在第四章中已提及的窃听电话问题。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参议员们感到处境尴尬。这个委员会的

影响可与国务卿的重要性媲美。国务卿是沟通外委会与行政部门的渠道。外委会可以要国务卿对其负责，又可以向国务卿系统地表达其政见。国务卿拥有权势时，外委会就起重大作用。当国务卿的作用缩小时，外委会的作用也随之缩小。但是，国务卿和外委会之间生来就具有竞争性。国务卿必须力争保持一定的自行处理问题的行政权，因为外委会必然会力图将先入之见强加于国务卿。如果双方都较为克制，能同情对方的需要，两者就能相得益彰。如果国务卿或外委会中有一方固执己见走向极端，其结果就可能使外交政策瘫痪。

外委会过去曾对我这个安全事务顾问所处的突出地位深感不安，因为我作为白宫工作人员，不受外委会的支配。从这个角度来看，外委会多数成员是欢迎提名一位将来肯定是总统的外交政策主要制订者来担任国务卿的。另一方面，参议员中很少有人愿意被人们认为对政府的态度太宽容，因为政府过去在越南问题上公然蔑视过他们，现在又深陷于水门事件。此外，他们有追究十七盘录音带的借口。

结果，这次听证会从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至二十一日共持续了两个星期，这是战后为国务卿的提名所举行的时间最长的听证会之一。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程序，因为外委会的委员们一个个对我都有好感，急切地要确认我。他们十分清楚，当年尼克松以掌握行政特权为由不让白宫助理们去国会各委员会作证，正是由于我做了工作才使尼克松有所松动。经尼克松同意，我每年同外委会会晤两次，表面上装作是进行社交活动，但很快就象是国会听证会了。一开始，我们在外委会主席、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家里聚会，后来这种集会改在参议院一间隐蔽的办公室内举行。会晤的形式越来越正式。到一九七二年，由外委会办公室主任卡尔·马尔西整理了一份正式记录。我一直以个人身份同外委会的许多成

员保持接触，特别是休伯特·汉弗莱和雅各布·贾维茨两位参议员，他们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尽管我同富布赖特参议员之间存在着政治分歧的鸿沟，但他学识渊博、清廉公正并富有爱国主义精神，我仍然十分敬重他。眼下我们之间分歧的主要根源越南战争既然已经成为过去，外委会有理由向前看，期待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关系出现一个崭新的时代。我的提名肯定能够得到确认。

但是，外委会必须显示出确实认真地追究政府有无违法的迹象。为此，听证一半的时间花在电话窃听问题上。外委会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作了不寻常的努力，但它仍十分委屈地受到指责，说它过分轻易地把我放过了。^⑥在这种紧张气氛中，我未能按我的初衷将听证会开成两党共同处理外交政策的可喜开端。

我试图表现出和解的精神。九月七日，全国电视转播了我在听证会上的第一次发言。我强调了一个强大的、有自信心的美国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以及需要结束国内意见分歧的理由：

美国人最近经历了暗杀和骚乱的动荡、种族之间和不是同代人之间的对抗以及一场昂贵而痛苦的战争。当我们正在摆脱这种冲突时，我们又经受了另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些充满创伤的事态发展给我们传统的乐观情绪和自尊心投下了越来越长的阴影……过去高涨的乐观情绪曾使我们过于胆大妄为，现在精神上的不振又可能使我们缩手缩脚。这种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所带来的外交政策——对全世界的稳定性将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但是我对我们的前景是抱有希望的。美国是富有韧性的。这个国家一往无前的精神是抵挡不住的。不管我们有什么分歧，我们可以为争取建立一个和平的、顺应人类愿望的世界而团结一致。我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就会信心倍增。

在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外委会没有对我这个主动倡议作出响应，这并非由于他们缺乏善意，而是出于公开听证会的政治需要。除了水门事件的气氛之外，还要考虑到电视的巨大威力。当

选的官员们依靠宣传而生存。他们懂得，晚间新闻节目里每条新闻的报道时间极少超过两分钟，而且采用的大都是反映对抗或争论的消息，而不是反映协调一致的内容。我常和雅各布·贾维茨开玩笑说，当他一看到电视摄像机亮了红灯，他即使是提一些十分富有建设性的问题，也要提高嗓门，伸出食指，前额的血管不断跳动，以便给粗心大意的观众留下一个印象，似乎我自己十分迫切地要提出的看法是这位公共福利的积极捍卫者逼出来的。

果然，富布赖特参议员在听完我的开场白后就提出电话窃听问题。以后对这个问题几乎是每年都进行审议，在周期性的反复审议中，没有发现新情况。这一调查以及此后进行的其他调查，都证实了我在第四章中所叙述的事情前后经过是符合事实的。对于司法部长埃里奥特·理查森、司法部副部长兼联邦调查局代局长威廉·拉克尔肖斯所提交的一项声明，无论是以前还是后来的质询都没有提出过重大的异议。这项声明说：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所能做出的最好的判断，基辛格博士担心敏感性材料被泄露这一点起了作用。他的这种担忧加上总统的担忧传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那里，因此就采取了制止泄密现象的行动，其中包括对某些政府雇员和新闻记者进行电话窃听。他的作用还包括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一份名单，列有政府中可以接触到机密情报、并且为了确定这种情报的使用价值时而能阅读到情报审核材料的人员。^⑦

对老问题之所以进行反复调查，问题不在于事实本身。如果人们对政府采取的行动是否得体发生争论时，只要开诚布公地把问题全部摊开，争论总能平息下去的。困难在于怎么来确定什么行动是恰当的，什么是怀有利己动机的，还在于如何把当事人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区分开来。即使调查人态度公正，所有证人讲的都是实话，要对几年前所作出的每一个决定的来龙去脉重新搞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无论调查人是记者还是参

议员，他们很难理解决策时所承受的压力。从调查人的角度来看，所调查的问题本身是压倒一切的，对于政府的其他职责或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并不关心。他调查的方式好象说明他所调查的内容是当事人进行的唯一活动，并且曾经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

但是，身居高官显职的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其重要性同可以用来处理问题的时间很不相称。把任何决定同它的整个来龙去脉割裂开来，就会歪曲其实质。决策者在作出某一决定时，对该项决定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几乎肯定不会象事后的调查者看得那么清楚。他可能只有几分钟的考虑时间，而调查者却有若干天、若干周的时间去了解事情的各个侧面，况且事后看问题总是看得更清楚些。

如果某项决定是由好几个人共同作出的，那么很可能出现一些相互矛盾的证据。各部、局或署各自保存自己的文件材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提供给其他部门阅读的。各部门对事情经过的追述会深受其所承担任务的影响，而且对有争论的决定很自然会有推委责任的倾向。即使是用意极其纯正，各单位毕竟还是通过自己的先入之见的棱镜来观察事物的。过了几年当文件公开之后，人们可能被迫对当时的说法或者对当时只是隐隐约约了解到的情况作出评论，而要对事隔已久的事情作出反证是很困难的。

在听证会上，电话窃听问题比任何国际问题占用的时间要多。在第一次听证会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约翰·斯帕克曼和克利福德·凯斯两位参议员当时被指定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负责审理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另行举行秘密听证，并提出报告。此外还举行了一天内部听证会，会上我向外委会追述了电话窃听中的每个具体事实——尽管我对好几件事的回忆充其量也是模糊不清的。*

* 我在内部听证会上的证词后来发表时，略作了删节。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并且为了不使被窃听的人感到为难。⑥

正是在这些听证会上，我第一次看到埃德加·胡佛（一九七二年五月去世）保存的档案材料。材料中包括胡佛注有“请求”或“批准”历次窃听的官员名单。批准人总是司法部长米歇尔，而请求人又总是司法部以外的一些官员（其中有十来次是当时的黑格上校和我），尽管据我个人了解有四、五次是埃德加·胡佛首先向尼克松提出对这些人员进行窃听的。其实，所谓“请求”通常就是由我的办公室提供一份按总统规定属于第一类人员的名单：接触过已被泄露的机密情报的官员。究竟是我“主动提出”还是“请求”进行窃听的问题过了近一年的时间之后，又成为公开讨论的一大议题（参阅第二十四章）。

在听证会上没有人企图把尼克松政府的作法同过去历届政府的作法进行比较，以确定窃听的次数是超出了常规，还是说，正如我所持之见，这十七盘特别引人注目的录音带在数量上没有超出历届政府窃听的平均次数。不管怎样，我还是极力赞同最高法院在一九七二年——即窃听事件发生之后三年——作出的裁决，裁决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窃听需征得法院的许可。我在证词中对自己的态度归纳如下：

自从一九六九年五月尼克松作出窃听决定以来，最高法院对进行窃听所应遵守的程序下了新的定义，因而，本届和前几届政府过去进行窃听所引起的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争议未决的问题。今后在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案子中，我们将把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和保障自由认真地区分开来。

但除此以外，在窃听问题上又引出如何处理好人权自由和保障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问题。我认为，侧重点应放在人权自由这方面，只有当情况表明国家安全因素必须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时，才能侵犯人权自由。

在斯帕克曼和凯斯参议员的提议下，外委会一致同意：电话窃听问题不应妨碍对我的提名。

除了窃听事件外，对柬埔寨进行的所谓秘密轰炸，以及听证阶段在智利发生的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也引起了人们很

大的注意。参议员们提出了各自特别关心的问题：贾维茨提出了有关《战争权力法案》的问题，对此我表示了极大的保留。汉弗莱提出美国对外粮食援助在使用上应当更加全面、更富有人道主义精神。我答应汉弗莱，我将提出一项战胜世界性饥荒的美国新政策——次年，经美国倡议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粮食大会上，这一许诺实现了：我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全面的新计划。有一些参议员提出了苏联犹太人移民问题，似乎这是他们的新发明。^{*}他们意在影射我们忽视了人权或外交政策的道德准则。看来他们忘记了在尼克松执政期间，在国会就此问题大肆鼓动之前，苏联的移民率由每年四百名增加到近三万五千名。埃德蒙·马斯基参议员一九七一年一月在莫斯科对苏联总理柯西金讲过，他认为尼克松的对苏政策太强硬，国会将施加压力使它温和些。^⑥而现在这位参议员在他支持对我提名的单独声明中却坚称：“在走向缓和的同时，必须继续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使它更加尊重人权。”

两周后，听证终于结束。他们履行了职责：在不损害被提名者和外委会之间今后相互信赖关系的情况下，显示了国会所必须保持的警觉性。参议员们曾穷追不舍地提问，但总的来说，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如果说听证会上更多的是重提过去的纠纷，而不是为未来设计前景，那末可以说这些听证也从以往的争论中挤出了一些毒汁，从而为开创一个新的开端提供了条件。随着水门事件不可避免地走向结束，这些听证对于身为国务卿的我与外委会之间继续保持良好关系起着重大的作用。这种良好关系后来从未中断过，即使在福特总统就职后人们可以无拘束地重搞传统的党派政治时也未中断。以富布赖特参议员为首、以及后来由斯帕克曼参议员领导的外委会在关于确认对我的提名的报告结束语中有一段明

* 参阅第五章和第二十二章。

智的话，三年半以来，他们一直信守着这段话。当时他们这样说：

如果认为行政和立法机构之间的意见会永远一致，那是天真的想法。但是，如果把问题明确地摆出来公开辩论，就可以避免出现近十年来形成的公开的思想混乱、互不信任和感情隔阂。

行政和立法这两个部门各有各的权力和职能。两者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冲突，但这种情况有时对国家会有好处。近几年来，这两个部门有时可能过分强调了各自的权力，但不言而喻，只有在各个部门都清楚地意识到本部门的权限和另一部门的权利时，美国的立宪制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我们希望这种均势能够得以恢复，因为无论哪个部门都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九月十八日，外委会以十六票对一票通过了对我的提名。乔治·麦戈文参议员是唯一的一位投反对票的人。表决的前一天晚上，他同我通了电话，向我表示了他个人的崇高敬意。他认为，参议院应该对我的提名予以确认。他说，他投反对票是为了给那些曾在总统竞选中支持过他的人还债，并不说明他本人对我缺乏崇高的敬意，他也不是不想在我的提名得到确认后同我进行合作。我没有因麦戈文企图两面讨好而感到不快。由于情况所迫，任何公职官员有时都不得不做出一些虚伪的表现。他只能期望，最后的结果将证实他所辜负的事业是崇高的事业。

九月二十一日，参议院全体会议以七十八票对七票确认了对我的提名。九月二十二日，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在白宫东厅主持了我的就职宣誓，在场的有我的父母和孩子。尼克松总统怀着矛盾的心情和气地主持了整个仪式。东厅面积不大，在正式场合最多大约只能容纳一百五十人，特别是新闻记者采访要占去一大块地方。厅的东侧设置了主席台和讲台，面对讲台排列着呈半圆形的一排排座位。戴白色手套的军事副官彬彬有礼地把应邀的客人引入指定的座位。国会的两党领袖都出席了仪式。在场的还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特劳斯。斯特劳斯当时和以后对

我表达的友情表明美国外交政策所反映的目标是超越起伏不定的党派政治的。首席大法官为了主持我的宣誓而中断了他的欧洲之行，令人十分感动。对我的父母来说，这一切犹如在梦中。他们过去从自己的本乡本土上被赶了出来。我们家的十三位亲人成了人类偏见的牺牲品。我的父母简直不敢相信，三十五年之后，他们的儿子竟然登上了美国国内通过任命就职的最高行政职位。我原先已开始准备写发言稿，但发现自己的心情太紧张，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而凭借自己当时的灵感讲话。

只有尼克松看来象被鬼迷了心窍。他没有参加我宣誓前在红厅举行的、有首席大法官出席的家庭聚会。他在宣誓仪式上的讲话敷衍塞责，古里古怪。在讲话中，他一开始就指出，我是在战胜了国会的激烈反对之后才获得确认的，其含义也许是指和立法机构之间产生麻烦的并不是他独自一人。接着他竭力解释说，我的任命标志着又一个历史性的第一，理由有三条：我是加入美国籍的公民中第一个担任国务卿一职的；我是第一个在任命前就访问过北京和莫斯科的国务卿；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个不留分头的国务卿。前两条他没有加以发挥，而最后一条却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堆，就没有头发的迪安·腊斯克应属何种类型的问题胡扯了一通，说什么：“我的理发师是一位十分聪明，很少出差错的人。我对他说，‘腊斯克国务卿怎么样？’他说，‘总统先生，腊斯克国务卿头发不多，但仍留分头。’”我的答辞回避了这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而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总统先生，您提到了我的身世，确实如此，象我这样出身的人，竟然能在这里同美国总统站在一起，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的身世对制定我国的政策能有所帮助的话，那就是在我童年时代，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建立在仇恨、实力和不信任基础上的社会所出现的种种现象，当时我还亲身体会到美国这个国家和它的希望和理想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意味着什

么。因此，总统先生，在您的领导下实现和平结构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找出解决各种各样困难的实际办法，而且要认识到，只有当美国不仅为其本身的需要而生存时，它才是真正地忠实于自己。

我们正致力于建设一个富有正义感、同情心和人性的和平的世界，我们知道，美国在实现人类最深切愿望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美国本身最美好的理想。

说得婉转一些，尼克松一家对我的任命所怀有的矛盾心理，还表现在下列事实：尼克松夫人——我对她是十分敬佩的——在我宣誓之后拒绝站到迎接客人的行列中去。尼克松随即也很快离开了，他没有到宴会厅按传统正在举行的招待会上呆上一会儿，同客人周旋。

几分钟之后，国务院向各驻外使、领馆发出如下通电：

**亨利·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美国东部夏令
时间十一时零六分宣誓就任第五十六届国务卿。**

国 务 院

在白宫的西翼，所有的办公室，甚至包括总统办公室在内，都是相当简朴而窄小的。国家安全顾问尽管被认为掌有令人生畏的实权，也不得不总是在简陋而拥挤的地方凑合着办公，有时在底层，有时在地下室。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务院向国务卿慷慨提供的套间办公室，如同内阁其他各部向其部长提供的办公室一样，既宽敞又雅致，庄严地座落在高层，举目可遥望到华盛顿市和各种纪念性建筑物的壮丽景色。林肯纪念堂、波托马克河和阿林顿国家公墓美不胜收的全景尽收眼底。习惯这一环境，还真需要一段时间。在我白宫的小天地里，如果我遇到某些不称心的事而想以我惯用的强有力的方式来表示不悦时，我只需走几步路就可到房门

口找到近在咫尺的副手，把他作为我撒气的对象。但在国务院，我副手的办公室在走廊那头，相隔似有一英里之远，等我走到办公室外屋的门口时，究竟什么事引起我发的火我往往已忘得一干二净。那时如果我走出门去，会遇到简·罗丝（现名简·罗丝·莫塞莱姆）投来的不赞许的目光。简沉着、美丽，工作起来从容不迫、效率很高。她曾先后在四位前国务卿身边工作过，对国务卿应该有什么样的举止言行有她自己的标准。最后证明，她对我来说，正如对我的前任一样，是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

这还不是唯一的或是最重要的对照。某些在职官员往往认为，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能轻而易举地适应国务卿职责的需要，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一职务是由总统设立的，他只在总统授权下办事。他领导的工作班子很小。根据最初的设想，他的任务是就各外事部门和政府其他各部向总统提供的情况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否恰当一事，向总统提出谘询性意见。当然，一般来说安全顾问的工作还要多得多。因为他靠近椭圆形办公室，这就促使总统把安全顾问当作他解决棘手问题的心腹来使用。（也许某一天心理学家会作出解释，为什么偏偏让靠近椭圆形办公室的人沾了这点光；而那些只需坐十分钟汽车就可来到的官员却沾不了这个光。）

再说，安全顾问毕竟是人；他追求地位；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他的权力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表现自己有特殊的能耐。既然他唯一的职责是由总统赋予的，他可以提出对“大政方针”的看法。他可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而不为大量细节或者紧急问题所束缚，那些事情都是国务卿份内的事。如果他处事老练的话，在官僚机构内部争论时，他可以投总统所好，因为通常他可能比他在雾谷*的竞争者更深入地了解总统的喜好。

国务卿的职责则大不相同。他每天要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一大

堆事务，而这些事务并不一定列在总统的日程表上，也不一定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处，其中许多事情毫不引人注目。他必须为经济、军备控制、外援、签证和移民政策等等方面的问题不断地同一百五十个国家和各个国际组织打交道，并为一系列多边问题进行交涉。他所掌管的是一个庞大的企业。

就眼前看，国务卿由于主管的工作面很宽，陷入了官僚主义的不利处境。他必须尽力去应付许多俗套或处理高度技术性问题。他被迫去支持一些不得人心的事业，例如每年度的外援拨款等。他经常还要承担这样的风险：要末因为某些秘密问题急需总统决定而冒犯了总统，要末在总统面前成了特殊的求情人。

可是，从长远来看，一个总统对肩负重任的国务院产生不耐烦的情绪，终究是有损于国家利益的。要使一项外交政策真正取得重大成就，就必须在某个时候使之制度化，这种政策因而必须在常设机构中牢固地确定下来。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强使自己依赖于别人的才智。要使一项外交政策长久地持续下去，就必须让主管日常外交工作的人员很好地领会和贯彻，并且到一定的时候使其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扎根。

要实现这一切，总统和国务卿之间就必须建立起类似哈里·杜鲁门和迪安·艾奇逊之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间以及我为之供职的总统和我之间那种互相信赖的伙伴关系。重用安全顾问只能在短时间内起填补信任真空的作用，况且还存在着使官僚机构士气低落，并使外国政府迷惑不解的危险。如果总统不信任国务卿，他就应该调动他的职务，而不是采取绕过国务卿、起用安全事务顾问的办法。任何其他办法只能使本来应当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尼克松十分担心国务院走漏风

* 指国务院。——译者

声，因而只要有可能，他就不让国务院参加机密谈判。他的怀疑是事出有因的，但这也是一种自找麻烦的作法——尽管我在白宫时对此并不理解。越不让国务院参与制定政策，国务院就越不积极去保护他们自己努力获得的情报。确实，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或者不了解谈判的困难，国务院容易对新出现的事态乱攻一气。然而，对于重大的谈判，盟国的外长们比我们的国务卿更了解情况，这就说不过去了。直至我于一九七三年秋担任国务卿之后，我们才着手医治这种行政上的精神分裂症。

同时，国务院的官僚机构有铤而走险的倾向。由于国务院的职业是终身制，大量的弊端长期存在。一方面它意识到自己四面楚歌，可是另一方面却具有一种强烈的官僚特权感。国务院确信突出本部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执意要发挥自己的正规作用，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总统与国务卿之间无形的纽带关系，而这种纽带关系正是决定国务院实际影响的关键。早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尼克松宣誓就职之前，国务院为了保住约翰逊执政期间设立的几个部际小组委员会主席一职，竟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斗争，尽管这些组织已经过时，而且真正的决策是由约翰逊总统和内阁成员中的内圈人物在所谓星期二午餐会上作出的。地位所象征的东西看来比地位本身更重要。⑩

很不巧的是，有事实证实了尼克松的偏见。他不希望国务院在任何事情上突出，而国务院一味追求特权的做法却进而使他疑团重重。这一场毫无实际意义的地盘之争，使国务院赢得尼克松信任的小小机会丧失殆尽。虽然尼克松对国务院所作的判断未免过于苛刻，但他的直觉却十分敏锐，国务院根本不具备驾驭部际机构的能力。正如我要在下文中解释的那样，国务院的主要人员不论就其作风或所受的训练而言，一般都不善于遵照一定的总体思想去工作。国务院的组织机构只适宜处理眼前的事务，而不适宜

做需要从长计议的工作。如果某个国务卿试图处理部际事务的话，他必然会背上沉重的包袱。因为即使他能够克服国务院本部门的坏习气——不管部际机构是如何组成的，他最终必须做到这一点——在官场上他会陷于一筹莫展的处境。

美国政府往往是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进行工作的，这就要求部际小组主席必须处事客观。由一个部来主持部际联席会议，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根据自己的好恶试图操纵会议，或者不能充分反映本部门的观点。为了争取出人头地而造成这种结果，颇具讽刺意味。即使国务院里能出现一批像所罗门一样贤明、公正的主席，也照样会有人批评他们滥用职权，使他们不得不消耗大量精力来为自己辩护。在我国的制度下，没有一个部会长期容忍另外一个部居于自己之上，它将以程序和实质问题为由向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提出挑战。最后的结果是哪个部也休想占上风，只好由总统对多得不可胜数的争执作出裁决。

我在试图改革国务院的体制时，对以上这些问题曾经有过切身体验。我就任国务卿后，仍继续兼任国家安全顾问的职务，这使我觉得以统管部际机构的工作。如果在帝王时代，这会被人称为个人集权。但个人集权毫无用处。当我带着国务卿的头衔时，出席部际联席会议的国务院代表就是我的下级。我主持会议时，他们在发言中必须反映我的观点，否则，即使在国务院内部，我也无法控制部际事务。但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我或者作为主席去贯彻国务院的意图，或者表示不同意下级的观点。这实在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前后有两年时间，人们指责我对决策过程起着不应有的支配作用。如果我确实起过这种作用的话，那是因为我同我共过职的数届总统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而不是政府的组织机构的缘故。事实上，我的双重身份对我是一个不利因素，使我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福特总统撤消了我国家安全顾问

的职务。我对此怨气冲天，因为我认为这会影响到别人对我地位的看法。为此，有好几个星期我甚至考虑过辞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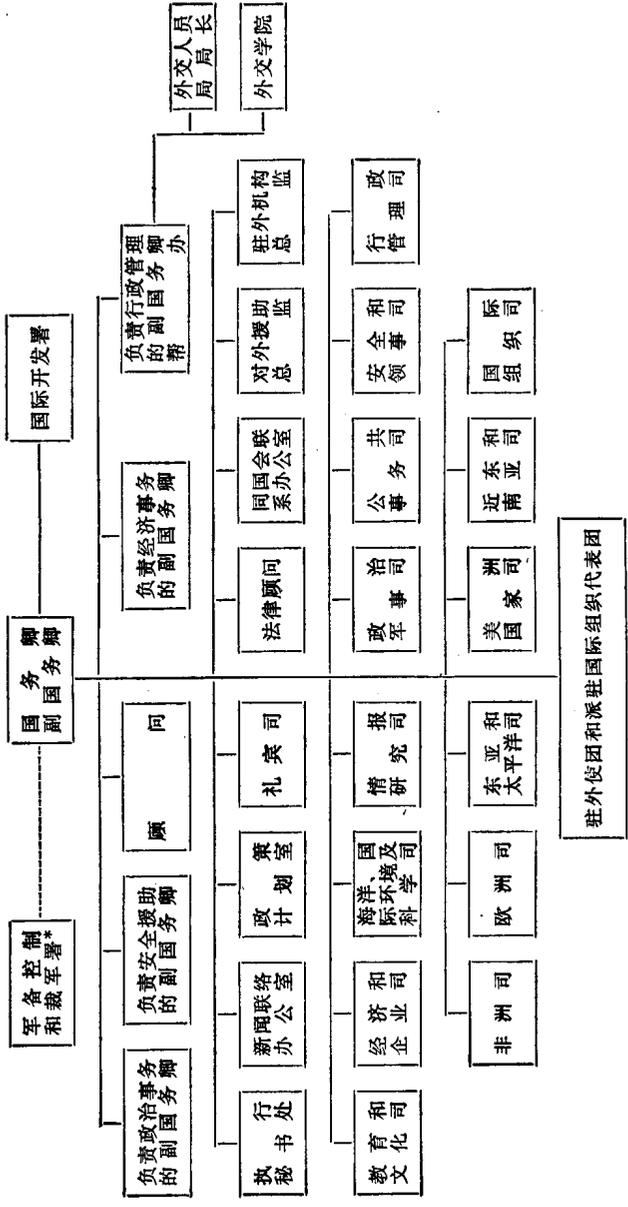
如果我真的辞了职，那就未免显得太幼稚了。实际上，这一组织上的变化并未影响到我的权势，我的心境也大大安宁下来。在有些问题上我的意见占了上风，因为我设法说服了福特；而当我的意见未被采纳时，即使我在名义上仍然担任（部际小组的）主席，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深信，管理部际机构的责任显然理应由安全事务顾问担负（也许在危机时期除外）。不管是谁主持部际会议，一位果断的国务卿一定会使别人了解自己的观点。安全事务顾问同新闻界及外交界的接触应该减少到最低限度。外交政策的发言权和执行权应当主要交给总统和国务卿（当然还包括他们所指定的人）。目前主要由部际机构负责准备各种供选择的方案，但这项工作本应属于安全顾问的职权范围。安全顾问应该选公正无私、思想明确、在政治上精明老练并甘愿埋头苦干的人。（艾森豪威尔手下的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和福特手下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就是两个杰出的榜样。）国务院的影响将取决于总统和国务卿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国务院研究分析工作的质量。

即使是对一位意志十分坚强的国务卿来说，要达到这样的工作质量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他面临着国务院的组织机构现状及其对思想理论很反感的头痛问题。

看一下国务院的内部结构是很有意思的。（第五六四页的图表表明国务院一九七三年的组织机构状况。）国务卿是国务院的首脑人物，国务院采取的一切行动都需运用他的名义，一切指示和电报也都要由他签发，但他不可能审阅全部文件。因此，一份由国务卿签发的、词藻华丽的电报，只能说明他此刻正在华盛顿，而不能说明电报是由他本人执笔拟写的，甚至也不能说明他是否知道

一九七三年的国务院



* 该署为一独立机构，署长直接向国务卿汇报工作，在军备控制及裁军方面，充任国务卿和总统的主要顾问。

电报的内容。在我担任国务卿期间，有一名（常务）副国务卿，以及另外三名分别负责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安全援助的副国务卿协助我工作。此外，还有一名不定职的顾问来承担国务卿认为他最合适的工作。（我的顾问是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他是一位在欧洲事务和美苏关系方面十分出色的专家。）这些官员都同国务卿一起，在国务院大楼的七层办公，充当国务卿的参谋，起码在理论上是如此。再下一级是助理国务卿。在我任职期间，有五位分管世界各地的事务，一位负责国际组织，七位负责专门业务，如：经济、教育和文化、海洋及科学、公共事务、同国会联系、行政管理以及安全和领事等。此外，还有一名法律顾问，还有政策计划室和情报研究司，这两个单位各由一名主任衔的官员领导。在我任期内，国务卿还有为数众多的特别助理，分管新闻联络、国际劳工事务、吸毒、难民和人权等。这些官员理论上都按照其专业直接向国务卿汇报工作。但任何一位国务卿都不可能亲自指挥这么多人，因此需要有一些处于中间地位的人员。

根据国务院的组织系统表，在七层办公的副国务卿们应该协助国务卿协调与在六层办公的助理国务卿之间的工作。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干脆利落。至今还没有一张组织系统表能确切地反映国务院职权划分范围的情况。就以副国务卿来说，他起多大作用主要取决于本人的特点及国务卿的作风。在迪安·腊斯克任国务卿期间，他和乔治·鲍尔几乎平分天下。有的副国务卿则起着总管全面的参谋长的作用，如杜勒斯时代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就是那样。我分配给副国务卿的职责是全面监督对外经济政策和业务司的工作，我本人则负责地区司。

至于其他主管专门业务的副国务卿，他们的作用不尽相同。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手下人员太少，很难应付工作。而负责安全援助的副国务卿则头衔太大，名不副实。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

务卿要处理全部有关对外经济政策的问题，但协助他工作的助理人员为数不多，下面的一个司由一名助理国务卿领导，人员既少，地位又过低，难以同政府中那些有权有势的部、局、署打交道，更何况这些部、局、署的任务又往往与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相抵触。增设负责安全援助的副国务卿一职是由于军事援助的作用扩大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军事援助的作用并没有扩大。因此，负责安全援助的副国务卿的职责要比某些助理国务卿还小些。我利用这一职务处理过一些新产生的危机，如一九七三年最初阶段的能源危机。

主管专门业务的副国务卿中，最重要的要算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这一向是制定政策方面最高的职务，通常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他负责协调部门之间政治上的协作，尤其是要使各地区司协调一致起来。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两个因素使这个职务找不到适当的人选。首先，要找到一位官员，既能做到办事刚毅果断，又能把喜欢各行其是的各个司统一到共同思想上来并非易事。对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来说，把符合自己专业的某些业务揽过来是具有很大诱惑力的。但这样做就等于增添了一名向国务卿直接汇报工作的官员，而这类官员本来已经不少了。其次，助理国务卿一般都不愿意在他们和国务卿之间再增设一层官员，他们往往坚持要行使自己的职权。而且从技术上来讲，他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在七层办公的官员人数很少，他们只有一、二名特别助理。除非明确规定职责，使在六层办公的官员无法绕过他们，否则七层的官员确有受楼下各司箝制的危险。

这些倾向说明国务院机构运转不灵，工作拖沓，使不少外人感到心烦意乱。由于国务院随时有可能瓦解成为一些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如果国务卿软弱无能，这种情况势所难免——很多时间就都花在“审核”上。不管什么问题，只要同哪个司的业务沾上一

点边,就必须同它磋商。没有一个司愿意让别人否决自己的意见,但它也不想压倒别的司,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它下次可能遭到失败。因此,大家就一味寻求折衷方案,而这种方案反映了最低的一般水平,扼杀了创造性。

听任国务院自行其是的结果是容易使机构墨守成规,难以发挥创造性,并且几乎变成一部巨型收发报机。针对国外所发生的事件、抱怨和请求而制定的各项政策,往往自下而上地慢慢传开。对每个重要国家都委派一位官员负责,并冠以醒目的头衔,如“某国处处长”。这些官员中,有些人似乎对制定美国对外政策并不十分感兴趣,却热衷于指导“他们”所主管的国家。或者说,他们往往把两者混同起来,使自己成了主管国家的代言人。为了对某种具体情况作出反应,主管国家的处长负责草拟电报,送有关司核阅,然后逐级上呈,有时附一份解释性的备忘录,但经常不附。不管怎么样,一般都就事论事,其内容深受当地情况的影响。如果他肯于屈驾,提出几项可供选择的方案,其采用的方式几乎总是要将司里的倾向性方案强加于上级。如果电报稿克服重重障碍得以通过,并且又属少量具有特殊政策意义的案子,就会被送到国务卿的办公桌上。但国务卿并不知道电报稿在送交他之前,有哪些意见在审核过程中被删去,哪些意见被修改过,也不知道——除非他自己已研究过这一问题——这份电报从长远来看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他可以重新改写电报,但是他很少有时间去写,又不了解详细情况。他也可以将电报稿退回,但如果他不很警惕的话,那份电报稿很可能经稍加改动后再次送给他。(一九七六年夏,我在处理某一具体问题,就收到许多内容基本雷同的电报稿,而我并不想按电报的意见处理。后来,我威胁说要撤换全司人员,这才制止了对我施加的压力。)

对任何一位国务卿来说,最困难的工作莫过于在随时有灭顶

之灾的文件堆中发挥自己的指导作用。甚至象我这样毕生都从事研究外交政策的人——而且这也是我的爱好——有时也难免被埋在文件堆里。这种体制为人们操纵事物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果某个司长与国务卿意见不一，他就可以利用这种体制来拖延。例如，一九七五年，当我处理安哥拉问题时，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由于担心我可能作出他所反对的决定，竟将此案拖延了近十个星期之久。他的手段无非是利用国务院这一出色的机构把我索要的一份备忘录按部就班地逐级送“审”。结果等到文件送到我手里时，已经时过数周，而且文件的内容已失掉了锐气。因此我的助手便将文件一次又一次地退回，要他们把内容搞得更确切些。但这样做恰恰中了这位司长的下怀，而我的要求却没有达到。反过来，国务院这一机构也可能使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员的陈词滥调畅行无阻，使一位不熟悉那些术语及其含义的国务卿稀里糊涂地点头同意。

我是在尼克松任期较晚的时候就任国务卿的，要想彻底改组国务院为时已晚。这样的改组应在总统第一个任期的初期便着手进行。改组国务院应达到这样的目的：每个司向主管副国务卿汇报工作；（作为第二把手的）副国务卿可以象国务卿的替身那样放手工作；在国务院七层设立一个正式机构，坚定地从事长期方针的研究。

由于这届政府受到水门事件的折磨，由于我被确认担任国务卿不到两周就爆发了中东战争，要进行必须履行立法手续的改组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我试图通过以下三个步骤来达到协调一致。第一，努力履行我所认为任何一个部的负责人所应负的主要职责；使他的下级达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能胜任的工作水平。我坚持备忘录的内容要做到周密精确。我不讲情面地要求下级拼命工作，许多人由于不能容忍我的工作步调和我的脾气而辞职。有关

我工作方法的不友好的宣传，很多都是出自他们之口。那些留下来的人——这是大多数——出色地经受住了这一考验。许多人因此成了我亲密的朋友，国务院的研究工作有了出色的改进。

第二，我将原来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物色的一些主要的同事，调到负责长远规划的岗位上。他们熟悉我的工作方法，并了解我十分强调战略。我把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安置在实际上不定职的顾问岗位上，主管东西方关系。后来，他由于所谓“软弱”而遭到中伤。这一荒谬的谴责反映出对一位杰出的社会公仆的信念和贡献无知到了可悲的地步。在本书中，我多次引用了他精辟的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析已证明是深刻、尖锐并具有真知灼见的。

我指派威廉·海兰负责情报研究司。他是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一位出色的分析家，他熟悉资料，对所有的情报和假设都要以怀疑的态度仔细加以研究，他用情报去指导政策的制定，而不是让情报去追随既定的政策。

从白宫调到国务院的另外两名主要人员是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和温斯顿·洛德。他们俩都很有才干，同我的私交也很深。伊格尔伯格的才能主要表现在人事和组织管理方面。他是位富有经验的外交官，他了解同事们的弱点，故而不会屈从于他们狭隘的见解。他对外交部门*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以这一巨大的热诚作为动力，试图把它建成一个出类拔萃的机构。最初他担任我的执行助理，后改任负责行政管理的副国务卿帮办，负责制定政策方面的工作。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反对我的意见。他一贯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移。他是同我共过事的优秀的社会公仆之一。

温斯顿·洛德担任政策计划室主任，主要负责推动政策思想的设计工作。我在白宫工作的那几年里，他曾和我密切合作，一起

* 此章中的“外交部门”包括国务院和驻外使领馆。——译者

处理过不少重大问题，包括打开对华关系、越南谈判等。一九七〇年，因美国出兵柬埔寨，他差点辞职。我竭力挽留他，并对他说，如果他这一代年轻人都用抗议来表达自己的理想，那就没有什么人去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了。为了维护自己的原则，留在政府里为结束这场战争干些实际工作，要比在政府外面作些姿态强得多。使我感到幸运的是，他终于留了下来——在这方面，他那位性格坚强的夫人贝蒂对他的影响不小。他成了我最好的合作者之一，成了我的知己和密友。他几乎比任何人都更熟悉我的观点。他不单纯着眼于局部地区，而且能纵观全球。我让他优先为其办公室挑选优秀的工作人员。我审批的大部分重要电报，都经他和他的同事们先加审阅，同时他们还为我提供有关基本问题或长期性问题的补充材料，这些材料往往是业务司所忽视的。他们和彼得·罗德曼一道帮助我撰写讲话稿，阐述我国对外政策的前提和目标。

彼得·罗德曼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所写的论文，是我在那里任教时所见到的最佳论文之一。他从牛津大学和法学院毕业后，于一九六九年夏到我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就职。我任国务卿之后，他作为同国务院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继续留在白宫。他才华出众，在工作中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中几乎成了一名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所起的作用是难以用一、两句话来说明的。除担任撰稿人以外，他还是我的一部专用活资料。他从事研究，尽力使我们在谈判中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同以前就此问题发表的声明，以及同我们内定的政策保持一致。几乎每一场敏感性的谈话他都参加了，他在名义上是记录员，实际上却是心腹和顾问。我任国务卿期间，他是位坚定的无名英雄。

第三，我以这个班子为基础，再加上（常务）副国务卿，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以及地区司的助理国务卿们，组织了一个政治班子，以帮助我制定战略计划。事实上，我每天都要就一些重要问

题和他们一起进行讨论。然而，在我任国务卿期间，如何改革国务院的领导体制始终是一个问题。

外交人员

尽管如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得以取得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现代支持历届国务卿工作的男男女女，即美国的外交人员。

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掌握国务院的机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国务卿的明确指示得到了严格认真的贯彻，起码在每个国务卿任职之初是如此，因为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总认为新国务卿应该得到他们的支持，直至他们了解国务卿能容忍的程度为止。然而，要做到事事都给予明确的指示可并不容易。那些精明能干、骄傲自负、工作勤勉但带有宗派观点的外交人员，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上级缺乏知识或修养，并设法以自己的建议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他们在亲密相处和共同的考验中形成了一套观点，而这些观点也就是他们所提建议的基础。他们因为自己是职业外交人员而感到自豪，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讨厌“半路出家”的人。这是一句行话，是指那些并非按台阶提拔而由于政治原因被任命的外交官员。麻烦的是，有时他们把国务卿也当作半路出家的来对待，因为没有一位被任命当上国务卿的人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才能在外交部门的激烈竞争中谋得这个位置的。

在一位有魄力的国务卿领导下，若配备学识渊博、处事谨慎、精力充沛的外交人员，外交部门是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工具的。外交人员确实需要经常保持警惕，免得由于过分自信而自作主张。过分自信往往会给他们的前程带来不利的影响。流传在美国人民中间的说法往往把我们的职业外交官歪曲为一群咬文嚼字、抱残守缺的人，看问题过于国际主义化，而捍卫民族利益时软弱无力。我

们在国外遇到的麻烦，往往是他们在那里惹出来的。国务院需要来一次“清洗”已成了我们在政治上的一句口头禅。有好几位国务卿在走马上任时都表达了这样的决心。但据我所知，当他们卸职离任时，都无不对那些具有献身精神的男女工作人员感到钦佩，因为正是他们为我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专业性意见，并使它保持了连续性。我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进国务院的，而当我离开时却改变了看法——我的新看法也许不太扎实，但它是在通向真理的途中克服了原有的偏见而得出的。

在一九五四年所谓的里斯顿改革之前，外交部门人员精干，机构很小，负责向国外派出外交人员并委派人员到国务院的一些重要岗位上去。它的正式名称叫“美国外交人员局”，这表明它是总统的一个工具。但事实上，它一直属国务卿领导。在改革之前，国务院由两部分官员组成，一部分人常驻华盛顿，他们是文职人员，另一部分人在美国国内外轮换任职，但多半喜欢到国外使馆——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驻外机构——去工作。这个时期的外交人员大多出身于以东部权势集团为背景的上层社会，绝大部分是新教徒，并在私立学校上过学——一句话，他们属于那些往往对美国如何在国际上起作用很关心的社会集团。他们中间许多人自有经济来源，他们的生活方式决不是单靠政府的薪水所能维持的。

通过里斯顿改革，建立了统一的美国外交人员局。要想只在华盛顿或单在国外工作再也不可能了。每个官员都必须作出抉择：或者参加外交人员行列，或者离开外交事业这一行。大多数人选择留下来。进行里斯顿改革很有道理。按照旧的制度，在华盛顿的文职官员只知道向使馆发指示，并不一定了解第一线的情况。反之，那些长年累月在国外工作的外交人员则逐渐将华盛顿的观点弃置脑后；他们很少有同国会打交道的经验，也缺乏各部门之间倾轧斗争的体会。由于他们和国内失去了联系，就难以有效地在国

外代表美国。(请想象一下,比如,一个人在一九七〇年离开美国后,在国外连续生活了十年,将怎样向外国人谈论美国的情况呢。)

里斯顿改革的宗旨是要外交人员获得全面的知识,要他们既有国内工作的经验,又有在国外工作的广泛阅历。在国务院起草指示电稿的官员要能预见这些指示在执行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国外工作的外交官则应了解国内社会的情况以及政府要考虑的中心问题,即解决先后次序的矛盾和部门之间的矛盾。

在实行里斯顿改革之后,国务院的重要职务均由职业文官担任。除最高一级政治职务外,外交人员的晋升一律采取逐级提拔的方式。同时,历届国务卿也竭力扩大外交部门的基础,使之更广泛地代表全体美国人民。因此,在外交部门工作的有妇女、少数民族、以及来自不同地区及具有各种不同学术知识的人。

令人惊奇的是,虽经上述改革,过去形成的价值观念却因袭未变。外交人员仍自认为高人一等。在国外工作,特别是大使这个职务,在价值天平上的份量几乎比在华盛顿的任何职务还要重。其部分原因是经过几次工资调整,出国人员的收入比别人高,但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些选择这一职业的男女外交人员真诚地致力于促进美国同它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他们通常被指责为一群“甜饼推销员”^{*}。但这种指责反而使他们因遭围攻而更加团结。由于他们远在国外工作,具有许多相同的经历,使这种团结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这种驻外的职务是他们与之打交道的一般文官或其上司们永远谋求不到的。应当再三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倾向都体现在一些才华出众、工作兢兢业业的男女外交人员身上,他们通过了在所有的职业中考题最难、科目最全的口、笔试,因此自然就产生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尽管如此,外交人员对待外交政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 指外交人员因常驻某一国家,总喜欢为该国说话。——译者

出美国公众的态度和历史经验。外交部门是在我国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当时对美国的安全还没有明显、直接的威胁。人们认为，美国当时卷入国外的主要问题不是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的——这在道义上被看作是一种鼠目寸光的观念——而是为了维护自由贸易这一开明的思想，为了奉行道义上的、或者至少是法律上的原则。我们曾经认为，美国是否需要卷入发生在本土之外的事件，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有时也参与消除巨大危险的行动，但我们对保持日常的力量均势不承担任何责任，往往否定其重要性，甚至指责保持力量均势是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之一，以显示我们在道义上的优势。美国的外交家们宣称他们信守国际法。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其他国家的行动是否违反国际法；而对这些行动是否打破了国际平衡，因而威胁到我国长期的安全，却反而不甚关心。没有人要求他们去制订地缘政治的计划。他们往往抵制地缘政治的观念，认为美国早已超越了这种观念所反映的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驻外机构认为自己仅仅是个谈判工具，而不是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其作用主要是解决新产生的具体问题，而不是考虑战略和如何引导事态的发展。外交官们长期在国外工作，所以对外国社会中的奥妙比对本国社会中不可捉摸的关系更为敏感。他们意识到美国有孤立主义的传统，总试图能打破这种状况。结果自己成了驻在国或在国务院内自己主管国家的代言人。在国务院里，人们把这叫做“地区病”或“唯主管国家主义”。如果一位外交官能给其主管国家带来点好消息——比如在发生纠纷时给以更多的援助或支持，或安排会见美国总统——他的工作就会好做些，或更愉快些。在国外工作的外交官面临的尴尬处境同国会议员面临的尴尬处境是一样的。在冒着可能被扣上地方主义帽子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失去华盛顿信任的情况下，一位国会议员即使同意自己选民们的观点，他又该在多大程度上去代表这

种观点呢？同样，对一位外交官来说，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采取那种客观实际迫使总统和国务卿不得不采取的全局观点呢？当他这样做时，他冒的风险是，不能向总统和国务卿充分提供他们在决定问题时需要了解的他对他主管地区的看法，同时，他还明明知道，尽管他自己力求做到“公允”，但其他大使或地区司长却会大力为他们主管的国家谋取好处。

外交人员总是强调可以进行谈判——这是表示知道对方可以接受某些观点的另一种表达方法。如果施加大的压力并对之进行刺激，那么可能改变那些谈判的内容。但他们对压力和刺激的敏感性较差。要求外交人员遵守的制度容易使之采取谨慎态度，而不是去冒风险。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制定外交方针，而是搞具体的外交事务；不是全局性的指导，而是某一项具体谈判中的策略；不是长远的后果，而是近期存在的问题。

不论在哪个国家，凡属在历史上受到高度评价的外交政策，多半是由那些遭到专家们反对的领导人制定的。归根到底，专家的职责是在他所熟悉的业务范围内工作，而领导人的职责却是要超越这个范围。国务院所需要的是坚强的、言行一致的领导，是以全球观点为其出发点，以明确的目的性为指导的领导。我们在基本国策上的多变性，常使外交部门陷于混乱，就象它在国外造成的混乱一样。如果领导显然无力应付复杂的工作，或是连最基本的问题也需要经常听取汇报，那就会引起外交人员自作主张，大搞本位主义。人们经常建议采用大换班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决不会取得什么好效果。更换的班子多半也具有相同的倾向，因为归根到底，这些倾向是从我国的社会和历史中产生的。胆战心惊的心理会妨碍外交人员的健康成长。但是在一位强有力的国务卿——如迪安·艾奇逊的领导下，外交部门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工具，而在所有的国务卿的领导下，它又是一个忠实的工具。

事实上，外交部门反映的倾向同它所代表的社会的倾向是一致的，它不得不进行同样煞费苦心的调整，以适应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一个新的战后世界。美国曾经是为捍卫自由坚持到最后的一个国家。一九四五年以后，它成了维护全球均势的主要国家。我国的外交必须准备依据自己的估计采取行动，而这种估计正确与否当时是没有把握的。对于任何看来是细微的变化，我们也必须制止。因为如果等到挑战变得明朗化时，就难以再控制局面了。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有更强的自信心、更敏锐的直觉感和更大的魄力，尤其是要有比过去更丰富的思维能力。

在早些时候，我放弃了自己的偏见，并认为，要想实施一项带有创造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没有外交部门是办不到的，更不用说去反对它了。当我们设法帮助我国社会认识新的情况时，我们面临着相互教育的共同任务。在此过程中，我很快就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外交部长拥有比我们更富于创造性、更熟悉业务和专业、更忠实的外交工作人员。

我利用被提名为国务卿后等待批准的四周时间，在外交部门进行了系统的发掘人才的工作。外界流传着关于我敌视官僚机构的滥言，事实上，在我任国务卿期间，我所任命的参与决策一级的官员中，要数外交人员局的官员所占的百分比最高。我所提升的是那些受到同事们尊敬、年纪较轻的出类拔萃的外事人员。对于被撤换下来的人员，包括那些出于对罗杰斯的忠诚，在我被任命为国务卿后公开批评过我的人，我都认真给予了妥善的安置。

毫无疑问，外交人员出色地辅佐了我的工作。当我受到攻击时，他们和我站在一起。是他们使我有可能会取得成功。我政策上有失误之处不应该归咎于外交人员。

接 管

在接管国务院之后，我当时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才能达到以下这一目标——事实上，我之所以被任命为国务卿，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尽管我国政府的权威日益削弱，必须执行一项强有力的外交政策；要在我国处于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中，运用内阁中的首席职位来激起人民对无愧于我们民族理想的未来寄予希望。我在国务院东厅的就职讲话，就是要为我在国务院的工作定下一个基调。在政府的权威已削弱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表现出镇静、力量和具有目的性，以对付敌手对我们施压，并给那些依靠美国的人们以希望。

如果历史对我们有什么借鉴作用的话，它使我们看到，目前危机已经不可避免。只要美国人民把我国的外交政策看作是争取和平与建立国际秩序的政策，而不仅仅看作由于政府软弱而引起动荡后做出的战术反应，我们就度过危机。我们必须让人们清醒地看到，报纸和新闻广播每天以头条新闻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卑劣地摧毁总统职位的东西。特别是在当时，必须提醒美国人民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美国政府的工作没有中断，它具有明确的目标，并能驾驭事态的发展。

这就是我在就任国务卿之后的头两周内要安排三次讲话的原因。我在宣誓就职后四十八小时内，在联合国大会上发了言。我觉得自己在宣誓就职前不宜去找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所以这篇讲话的初稿是我发疯似地用了大约三十六个小时夜以继日赶写出来的。最后那天晚上还进行了多次修改，使国务院的秘书和后勤工作人员第一次尝到了我的强制性工作方法的苦头。当一切就绪后，我们却因过于“想当然”而遭到了技术上的报复。当时，我正站

在沃尔道夫旅馆我办公室的门廊里，焦急地等待工作人员为我影印一份讲话的最后定稿以备存档，然后赶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正在这时，我的新任秘书简·罗丝鼓足勇气告诉我说，由于机器过热，我们唯一的一份完整的打字稿有一页被其吞噬。那一页稿纸送进机器后，根本就没有出来。幸好，手写稿还保留着。简镇静地坐下来，照着手写稿用打字机把丢失的那一页重打了一遍。实际上，我第一次在联大发表讲话的场面，远远比不上准备讲话稿的过程那样富于戏剧性。

我在联大的发言中要求世界各国“与我们一道从缓和走向合作，从共处走向和睦相处。”然后，我列举了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在联合国讲坛上谈这些目标，就不能不对每一个重要地区和麻烦地点一一点到，并多少讲几句有份量的话。漏掉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有可能造成外交事件，要知道，老生常谈往往比大胆打破常规更为人称道。（我因为缺乏经验，忘了这一教训，竟在讲话中把欧洲遗漏了。我为此付出了代价。这件事是我办事疏忽的许多事例之一。）我一反惯例，要求把国际合作提到能够反映当代世界相互依赖关系的议事日程上来，我说：

事实上，我们是同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现代科技和新型的通讯联络方式使我们互相接近了，但对此我们在政治上没有准备。技术发展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的制度所能应付技术发展成果的程度。我们在政治上的想象力必须赶上我们在科学上的远见。

为了实现我对汉弗莱参议员的诺言，我于一九七四年提出召开世界粮食会议。我答应美国在穷国和富国的对话中时刻准备以人道和合作的精神承担自己的责任。

十月八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给世界以和平”会议上，我发表了一篇早已准备好的讲话。在讲话的第七大段，我摘引了美苏关系部分的内容，其中中心意思是呼吁全国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有新的

一致的认识。对于政府所强调的力量均势——即我对世界事务的所谓超道德的看法——一直存在着争论。我试图对道德和实用主义的关系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

我们这个国家一直有一种使命感。美国人一直认为，美国象征着某种高于或超越其物质成就的东西。采取纯粹的实用主义政策，既不能给别国提供评价我国行动的准绳，也不能提出使美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准则。

但是，如果政策过于道德化，就会变成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就会产生危险。自以为垄断真理有碍于谈判及谅解。在寻求一条永远难以达到的理想出路时，可能反而会失去良好的结果。在虚张声势和冒险举动面前，政策可能成为牺牲品。

进行一场有益的全国性辩论的前提应该是：政策的制订者和评论者应该相互正确理解对方的观点，并尊重对方的意图。政策制订者必须懂得，评论者必然要强调政策中的不足之处，以便提出质疑，促使采取行动。同样，评论者也应该承认决策者作出抉择的复杂性及难以避免地缺乏鲜明性。政策制订者关心的应该是能够取得的最好结果，而不只是设想中的最好结果。他因为不了解那些事后为分析家们所了解的情况，不得不在缺乏完整资料的情况下探索行动。他知道——或应该知道——他既要对成功的好处负责，也要对灾难的后果负责。他有时不得不修改某些目标，这并不是因为这些目标本身不足取，而是因为失败的风险超过了潜在的利益。尽管他希望问题能立即解决，但往往不得不慢慢来。他必须和旁人妥协，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也必须和自己妥协。

然而这仍然是个有希望的时代。我相信，一场深思熟虑的辩论甚至能帮助我国拨正方向。我们具有历史意义的理想主义是指引我们越过新的危险的最好的罗盘，而我们现在正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些危险。十月四日，我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出席联大的各国代表团举行的晚宴上发表了讲话：

在这一星球的万物之中，只有人类的大部分痛苦是自己制造的。

在一个潜伏着核灾难的时代，在一个存在着意识形态冲突但能迅速进行交流的时代，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是去打破这些表面上看来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建立一个以正义、而不是以强权为基础的世界共同体，是我们这个时代

的需要……

我向你们保证，美国已为开始踏上这一通向世界共同体的征途做好了准备。甚至当我们不得不调整步伐时，我们的视野将随之扩大。我们不做过份的许诺，但我们将信守我们许下的每一个诺言。我们把稳定看作是通向实现人类梦想的桥梁，而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知道，只有当所有国家——不论大国和小国——都为实现和平而努力的时候，和平才会到来；只有当所有国家——不论强国和弱国——都把自己的利益与持久和平联系在一起时，和平才能持久。

在我发表讲话后两天，中东战争爆发了。

① 参见《白宫岁月》，特别是第二十六——三十二页。

② 参见H·R·霍尔德曼和约瑟夫·迪莫纳合著：《权力的目标》（纽约：纽约时报丛书，一九七八年）第九十四——九十七页；比尔·古利和玛丽·埃伦·里斯合著：《离开隐藏之地》（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一九八〇年）第一三三页和第二五一页。

③ 参见弗雷德·格林斯坦和罗伯特·赖特合写的《里根——另一个艾克？》（《公众舆论》第六期第三部分，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九八一年一月号第五十二——五十三页）。还参见弗雷德·格林斯坦和赖特合写的《政治老手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华尔街日报》）。

④ 参见霍尔德曼著：《权力的目标》，第一七六——一七七页。赫布·克莱因揭发，他曾于一九七二年底大选结束后偷听到我询问霍尔德曼什么时候宣布由我接替罗杰斯。但霍尔德曼本人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得很清楚，当时曾考虑由肯尼思·拉什接替罗杰斯。参见赫伯特·G·克莱因著《水落石出》（纽约花园城：道尔布戴公司，一九八〇年）第三〇九——三一〇页。

⑤ 我发现尼克松与戴维·福罗斯特的说法不一致。参见戴维·福罗斯特著：《我给了他们一把剑》中的《采访尼克松的幕后活动》（纽约：威廉·莫罗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一六六——一六七页。

⑥ 参见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纽约人》中《城里的流言蜚语》一文；威廉·萨菲尔撰写的《忠告和宽恕》（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纽约时报》）。

⑦ 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一九七三年九月十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的证词，参见注⑥。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联邦调查局前代理局长威廉·拉克肖斯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电视台《面对国家》节目的评论：“搞窃听不是他（基辛格）的主意。他仅埋怨走露消息而已。”

⑧ 参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出版的关于第九十三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的记录《亨利·A·基辛格博士在对某些政府官员和新

闻记者窃听一案中的作用的听证》，其中包括我于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在国会所作的公开和秘密的证词。

⑨ 参见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华盛顿明星新闻》中所载《马斯基告诉苏联总理，美国国内在国防费用上有分歧》一文中马斯基的话。

⑩ 参见《白宫岁月》第三十八——四十八页。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一线希望

第二章 河内之行

第三章 中国：又前进了一步

第四章 即将爆发的水门事件

第五章 欧洲年

第六章 动乱中的中东

第七章 缓和：从扎维多沃到圣克利门蒂

第八章 印度支那：一叶知秋

第九章 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倒台

第十章 担任国务卿

封底